

A Study of the
RUSSIAN SOCIAL
REVOLUTIONARY
PARTY, 1901-1925

解国良 / 著

俄国
社会革命党
研究
(1901~1925)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本书以俄国社会革命党社会思想与实践的冲突为主线，揭示了民粹派思想演变的基本理路，梳理了社会革命党产生、徘徊、兴盛、衰落的过程。本书注重历史脉络，注重西方派与斯拉夫派、自由派与民粹派的横向对比，注重国际国内环境对于思想演变的影响，全面认识社会革命党，还社会革命党一个有血有肉的鲜活的历史个性。

解国良 / 著

【 俄国
社会革命党
研究 】

(1901~192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俄国社会革命党研究：1901～1925/解国良著．—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4
ISBN 978-7-5097-3135-2

I. ①俄… II. ①解… III. ①俄国社会革命党-研究-
1901～1925 IV. ①D351.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23258号

俄国社会革命党研究(1901～1925)

著 者 / 解国良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3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近代史编辑室 (010) 59367256

责任编辑 / 赵 薇

电子信箱 / jxd@ssap.cn

责任校对 / 谢 敏

项目统筹 / 徐思彦

责任印制 / 岳 阳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27.5

版 次 / 2012年4月第1版


字 数 / 464千字

印 次 /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3135-2

定 价 / 79.00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苏州科技学院人才引进项目
2009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项目编号：09YJA770046

目 录

CONTENTS ←

绪 论	/ 001
第一章 从民粹派到社会革命党	/ 019
第一节 社会革命党产生的社会经济前提	/ 019
第二节 俄国民粹派思想的演变	/ 034
第三节 社会革命党的诞生	/ 048
第二章 社会革命党的社会学说及纲领	/ 054
第一节 社会革命党的社会学说	/ 054
第二节 社会革命党纲领	/ 063
第三节 社会革命党的第一次分裂	/ 072
第三章 社会革命党的组织结构	/ 077
第一节 社会革命党组织	/ 077
第二节 社会革命党成分分析	/ 096
第四章 社会革命党的战斗策略	/ 121
第一节 “一大”前的战斗鼓动	/ 121
第二节 第一次革命中的激进策略	/ 130
第三节 杜马召开期间的策略摇摆	/ 142
第四节 “六三”政变之后的绝望	/ 160

第五章 社会革命党的联合策略	/ 180
第一节 一战与联合策略	/ 180
第二节 社会革命党的骑墙政策	/ 191
第三节 与资产阶级的联合	/ 207
第四节 苏维埃与立宪会议的较量	/ 233
第六章 寻找第三条道路	/ 261
第一节 第三条道路的提出	/ 261
第二节 第三条道路的尝试	/ 286
第三节 社会革命党的再次分裂	/ 309
第四节 对农民士兵暴动的应对	/ 340
第五节 社会革命党的结局	/ 362
结语：俄国民粹主义的最高阶段	/ 392
参考文献	/ 404
人名译名对照表	/ 417
后记	/ 432

绪 论

一 选题的意义和研究的目的

受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俄国的对外扩张已经耗尽了帝国的所有力量。社会发展陷于停滞。先知先觉的贵族知识分子，自19世纪初期就致力于社会改造运动，到20世纪初期已经发展成为席卷社会各个阶层的声势浩大的革命运动，出现了政党。通过对俄国传统的分析，知识分子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从文化流派上来讲，分为西方派和斯拉夫派。依此而论，20世纪初期的俄国政党的所有政治学说也可以划分为西方派和斯拉夫派。^①

社会革命党是20世纪初期俄国最大的革命政党之一，属于斯拉夫派，是俄国民粹主义的最高阶段。社会革命党产生于1902年，1905年12月末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自己的纲领和组织章程。社会革命党经历了1905~1907年第一次革命和1917年第二次革命，在1917年3~10月有过与资产阶级联合执政的经历，在工兵代表苏维埃、农民代表苏维埃和铁路职工联合会、合作社等群众组织中占据优势。左派社会革命党曾经与布尔什维克党有过共同执政的经历，后因农民问题、和平问题与布尔什维克分道扬镳。社会革命党坚决反对专制制度，希望在普遍选举的基础上建立人民民主政权。俄国不具备建立民主政治的条件，社会革命党的主张成为乌托邦。国内战争期间，社会革命党不惜与资产阶级为伍，依靠捷克斯洛伐克兵团和资产阶级同盟国的力量召开立宪会议，建立民主共和国，败坏了自己的道义形象。国内战争

^① Н. Блинов,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артии России в зеркале энциклопедии: проблемы и решени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1997, №.3, с.147.

结束以后，社会革命党陷入孤立，遭到了布尔什维克的取缔和审判，1925年，失去了在俄国的影响力，走上了流亡的道路。

社会革命党是俄国的民粹派政党。民粹主义作为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社会思潮在俄国具有特别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民粹主义反对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争取人民的解放，具有革命民主主义的特征。民粹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希望通过农村公社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具有浓厚的空想色彩。社会革命党继承了民粹派学说，通过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继承，逐渐走向了社会民主主义。^① 社会革命党承认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价值，然而反对俄国必须经历西欧资本主义的“铁锅蒸煮”阶段，主张经过人民劳动革命，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打进一个楔子，逐渐走向社会主义。社会革命党谴责资本主义的非道德性，希望通过发挥知识分子的道德榜样作用减轻和弱化社会转型带来的痛苦，把国家的镇压职能转化为文化建设职能。社会革命党提出了利用传统文化——村社传统实现社会转型的重大理论问题。然而，由于受西方自由主义因素的强势影响，村社集体主义传统一直作为消极因素长期存在着，成为俄国现代化的障碍因素。^② 现代化的强势推进，不仅没有削弱反现代化因素，相反引发了剧烈的社会动荡，造成现代化的曲折。正视“传统文化因素”^③，而不是“彻底铲除封建主义遗毒”^④，成为社会转型的关键问题。

社会革命党是摇摆型政党。由于社会革命党在观点上并不确定，常常摇摆于自由派与革命民主派之间，既赞成自由，又拥护民主。沙皇倒台之前，它成为激进的革命政党；沙皇倒台后成为无原则的妥协派政党。社会革命党的激进性秉承民粹派的反资本主义倾向，是由政府倡导的激进资本主义改革引发的。^⑤ 它以人民的代言人自居，倡导“公正”，反对一切拉开“档次”的“激进”改革，简单地把自由主义改革归结为“官僚”的杜撰。社会革命党美其名曰争取“政治权利”，实际上为了

①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00 - 1907.6, Т.1, М., РОССПЭН, 1996, с. 8 - 9.*

② 刘祖熙：《夏日堂史集》，人民出版社，2007，第138、143页。

③ В. Г. Хорос, *Русская история в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м освещении, § 2. Традиционное общество в России (история и культура), с. 37.* http://www.gumer.info/bibliotek_Buks/History/Horos/02.php.

④ 高放：《封建主义的社会主义不同于社会封建主义》，《东欧中亚研究》2001年第4期。

⑤ *Михаил Геллер,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Т. 3, С. 91.* http://www.krotov.info/history/11/geller/gell_19c.html#_Toc81495841.

表达自己的“观点”，走上了“恐怖暗杀”的道路，造成了严重的信任危机。沙皇垮台以后，社会革命党迅速“崛起”，浪得美名的社会革命党不能解决类似“和平”、“土地”和“面包”问题，纠缠于没有社会根基的“抽象民主”，逐渐失去了人民的信任。从沙皇政府到民主政府没有夭亡于内部激烈的利益冲突，却夭亡于战争、土地和面包问题。显然，内外战争已经不是简单的利益之争，而是以利益为形式的文化之争。社会革命党虽然提出了改造俄国的文化问题，但是，由于没有落实到反映文化内涵的政治经济利益问题上，成为停在半空的半知识分子政党，^①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

社会革命党是反映农民愿望的知识分子政党。^②农民问题是俄国社会革命的根本问题。虽然农奴制改革把农民从农奴主的依附下解放出来，但是，农民没有摆脱官僚的束缚。农民的负担加重了，不仅反对地主和资本家，而且反对国家，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社会革命党提出土地社会化纲领，解决了农民与土地的分离，激发了农民劳动的创造力。土地社会化是按照农民的习惯确定的，符合农民的法律意识。土地社会化从根本上触动了帝国的发展模式，由对外扩张转向对内发展。由土地改革引发的社会发展模式的改变不仅影响了农民，而且影响了整个社会，是一场思维方式的大革命。由于自然条件的恶劣引发的经济和社会的落后，造成与西方文化的激烈对抗，严重制约了俄国的创造力。土地社会化纲领常常为西方文化的拥护者所诟病，影响了热衷于抽象自由民主的社会革命党对它的完善和发展。社会革命党在农业问题上没有走到尽头，失去了人民的支持。

社会革命党称自己的革命为社会革命，又叫做人民劳动革命。它把这场革命的性质界定于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依靠农民、工人和民主派的知识分子。社会革命党理解的人民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有着文化上的差别，它希望通过“批判的思维着的个人”——知识分子启蒙，使资产阶级和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变成经济发展、社会公正的人民民主

① 利哈乔夫把在欧洲文化面前丧失独立性的知识分子称为半吊子知识分子，社会革命党在这方面缺乏应有的独立性，显示了这方面的特征。参见德·谢·利哈乔夫《俄罗斯思考》下册，杨晖等译，军事译文出版社，2002，第357页。

② 外国学者波罗夫金认为，社会革命党是一个为了农民的政党，而不是农民自己的政党。参见 A. A. Кононенко, Современная зарубежная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я партии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2005, №2, с. 159.

共和国。社会革命党一直站在政府的对立面，充当政府与社会的联系人。由于俄国面对帝国主义的外在压力，不可能在削弱国家力量的前提下，壮大社会力量。所以，社会革命党的反政府行为造成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人民劳动学说基本上属于乌托邦。

综上所述，社会革命党属于知识分子政党，是后发型宗法伦理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必然产物。由于俄国的宗法性特征在与西方的竞争中一直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社会革命党以民粹这种宗教忏悔的悲剧形式，提出了传统宗法文化在现代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问题，对于宗法伦理浓厚的国家走向现代社会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

二 本课题的研究概况

社会革命党几乎是俄国唯一的依靠自己意识形态起家的政党，^①具有开创作用。所以，从一开始，社会革命党的纲领和策略就得到了农民和反对派政党的关注。1905年革命中，社会革命党因恐怖而震惊朝野。1917年又以深入群众之中而得到社会各阶层的关注，并获得了1917年8月城市杜马选举和1917年11月12日立宪会议选举的胜利。社会革命党的激进性和亲民性引起了沙皇警察局、立宪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等反对党的注意。立宪民主党 П. Н. 米留科夫、А. А. 考夫曼、П. Б. 司徒卢威、М. И.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孟什维克 Б. И. 尼古拉耶夫斯基、布尔什维克列宁和沙皇警察侦探 А. 斯皮里多诺维奇等人都谈到了社会革命党的土地纲领、恐怖政策和小资产阶级性质。立宪民主党对土地社会化纲领褒贬不一，列宁则揭露了社会革命党的两面性，斯皮里多诺维奇留下了有关社会革命党恐怖的真实材料。同时代的反对派领导人给予社会革命党的评价形成了对社会革命党的研究背景。

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以后，借用了社会革命党的土地社会化纲领、国家的联邦制思想和工农政府以及合作社思想^②，对于社会革命党的评价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根据社会革命党与布尔什维克的特殊关系，俄罗斯学者 А. 泽维列夫把有关社会革命党的研究划分为两大时期，即十月革命之前时期和十月革命之后时期，而十月革命之后时期又分为20世纪20年代、30 ~

① А. А. Кононенко,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я создания и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партии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в 1901 - 1922 гг.*, Тюмень, 2005, с. 10. www.tmnlib.ru/DbFileHandler.axd? 420.

②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00 - 1907. 6*, Т. 1, с. 8.

50年代末、50年代末到90年代初，90年代几个阶段。^①这样的划分淡化了苏联解体之后对社会革命党研究的突破性进展。A.科诺年科也做了类似的划分。^②

根据20世纪90年代到今天俄国对社会革命党的研究，我认为有关苏联、俄国对社会革命党的研究应该划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20~50年代末，20世纪60~80年代末和20世纪90年代至今。20世纪20~50年代末对于社会革命党的研究主要着重于批判。20年代学者的着眼点在于左派社会革命党，揭露社会革命党如何背叛自己的纲领成为反革命，通常把社会革命党与孟什维克连在一起介绍；30年代把社会革命党看做“外国资产阶级间谍机关的代理人”。^③20世纪60~80年代开始利用档案材料进行系统研究。60年代，开始强调左派社会革命党的革命性。70年代，注重社会革命党的农业纲领、民粹派意识形态、人数和成分构成、策略、内部分裂、各地方社会革命党等具体问题的研究，对社会革命党的民主革命性和小资产阶级性进行详细分析，出现了一批总结性的专著。20世纪90年代至今，对于社会革命党的研究逐渐变得客观。首先，公布了大批的档案材料；其次，消除了教条主义的束缚；最后，还社会革命党于本来面目。

三个阶段的划分反映了苏联历史发展进程对于社会革命党研究的影响。俄国历史的苏维埃时期（1922~1991）是社会主义发展时期。^④由于受社会发展转型因素的影响，俄国历史的激进倾向占据上风，出现了对抗的敌人模式（образ врага）。^⑤敌人模式反对专制政权、反对资产阶级，具有强烈的道德意义，政治和社会意义比较抽象。^⑥敌对模式是社会经济、政治制度

① Под ред. А. И. Зевелева и др.,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артии России: истор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М., РОССПЭН, 2000, с. 15.

② А. А. Кононенко,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я создания и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партии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в 1901 - 1922 гг., с. 15.

③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第9、395页。

④ 张建华：《俄国史》，人民出版社，2004，第8页。

⑤ 关于“敌人模式”，在20世纪90年代中叶已经引起了俄罗斯学者的关注，代表人物有Б. И. 科洛尼茨基、Е. С. 谢尼亚夫斯卡娅、И. С. 库兹涅佐夫和О. В. 沃洛布耶夫。“敌人模式”的提出是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激进主义提法的继续，不同的是，“敌人模式”的提法已经比较客观，把它看做经济落后国家实现社会转型的必然现象。参见Е. А. Сазонов, Предпосылк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большевиками образа “врага народа” к октябрю 1917 г., См. Под ред. В. И. Шишкина, Гражданская война на востоке России Проблемы истории, Новосибирск, Новосиб. Гос. Ун-т., 2001, с. 3.

⑥ Под ред. В. И. Шишкина, Гражданская война на востоке России Проблемы истории, с. 24.

落后在思想上的反映。不仅存在革命者对统治者的敌对，也存在革命者内部的敌对。社会革命党前期的革命性受到赞扬，而后期的妥协性受到谴责。敌对模式造成对社会革命党的不公正的评价。

研究的第一阶段，苏联学者把社会革命党定义为小资产阶级政党。1920年代写了一些小册子，只具有宣传性质。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初期，仅具有描述性质。30年代到50年代初期，研究陷入了停滞。从50年代下半期开始，适应国际革命运动开始研究社会革命党的革命性。受研究目的的限制，对社会革命党的研究主要限于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国内战争时期和新经济政策初期，主要内容是研究左派社会革命党与布尔什维克的合作及其分裂，社会革命党如何与白匪军和外国侵略者勾结，如何组织富农暴动，对于社会革命党的社会基础缺乏认识。20年代的代表作有B. 梅谢里亚科夫的《社会革命党》和A. 卢那察尔斯基的《落魄者·社会革命党史纲》，30年代的代表作有A. 阿加列夫的《布尔什维克党反对小资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党的斗争》、E. A. 卢茨基的《围绕土地法令的斗争（1917年11～12月）》。^①

研究的第二阶段，社会革命党成为革命民主主义阵营的一部分。60年代，对于左派社会革命党的研究加速，强调左派社会革命党的革命性和阶级基础，对其纲领、策略、成分进行了分析，代表作有K. B. 古谢夫的《左派社会革命党的崩溃》、B. B. 科明的《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准备和胜利时期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破产》。^② 70年代，对社会革命党的整体研究比较活跃，研究他们的意识形态、土地纲领、策略、党内分裂等。代表作有古谢夫的《社会革命党·从小资产阶级革命性到反革命》，B. H. 基涅夫的《1917年俄国农业问题和小资产阶级政党》，B. Г. 霍罗斯的《19世纪末民粹派意识形态和马克思主义》，A. Ф. 茹科夫的《社会革命党最高纲领主义的思想政治的崩溃》，H. Д. 叶罗费耶夫的《第一次俄国革命中的人民社

① В. Н. Мещеряков,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ч. I - II, М., Гос. изд., 1922. А. В. Луначарский, Бывшие люди: 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партии эсеров, М., Гос. изд., 1922. А. Агарев, Борьба большевиков против мелкобуржуазной партии эсеров, Пропагандист, 1939, №16. Е. А. Луцкий, Борьба вокруг декрета "О земле" (ноябрь-декабрь 1917 г.),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47, №10.

② К. Гусев, Крах партии левых эсеров, М., Изд.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63. В. В. Комин Банкротство буржуазных и мелкобуржуазных партий России в период подготовки и победы Великой Октябрьской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М., Московский рабочий, 1965.

会党》。^① 1980年代, 研究逐渐细化, 通过对社会革命党人数和社会成分的研究, 改变了社会革命党知识分子—恐怖主义者的形象。代表作有基涅夫的《为农民而斗争及俄国新民粹派的危机(1902~1914)》, М. И. 列昂诺夫的《1905~1907年社会革命党的人数和成分》和《1905~1907年社会革命党·组织结构、成分和人数》等。^②

从50年代开始, 欧美学者利用流亡者的档案、会议记录、报刊和回忆录等材料着手社会革命党的研究。主要内容关注社会革命党在1904~1905年的政策, 第二届杜马的组织情况, 社会革命党的纲领、策略、成分和人数。代表作有英国学者M. 佩里的《1905~1907年俄国社会革命党的农业政策》, 芬兰学者H. 伊姆莫涅恩的《1900~1914年俄国社会革命党的农业纲领》, 美国学者O. 莱特基的《布尔什维主义的农业起源·俄国社会革命党的许诺和失言(1917年2~10月)》。欧美学者的研究在材料和方法方面都对苏联学者构成了冲击。德国学者M. 希德迈尔(Hikdermeier)在《1900~1914俄国社会革命党、农业社会主义和现代化》一书中说, 苏联学者把社会革命党看成小资产阶级政党, 就不可能理解俄国革命的特性, 社会革命党失败的原因应从落后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带来的社会经济变迁中寻找。作者注意到了农业社会主义和现代化关系的理论问题。受此影响, 俄国学者霍罗斯也把俄国民粹主义看做平民主义, 是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相互作用的结果。民粹派的目的就是利用村社合作化的“非资本主义手段”实现国家工业化, 探索一条缓和原始积累引发的社会冲突的慢性现代化道路。他对民粹派的贡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研究的第三阶段整理出版文件集, 拓宽研究领域, 渐趋公正地评价社

- ① К. Гусев Партия эсеров: от мелкобуржуазного революционаризма к кортпреволюции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 М., Мысль, 1975. В. Н. Гинев, Аграрный вопрос и мелкобуржуазные партии в России, Л., Наука,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е отделение, 1977. В. Г. Хорос, Народническая идеология и марксизм (конец XIX в.), М., Наука, 1972. А. Ф. Жуков, Идеи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крах эсеровского максимализма, Л., ЛГУ, 1979. Н. Д. Ерофеев Народные социалисты в первой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М., МГУ, 1979.
- ② В. Н. Гинев, Борьба за крестьянство и кризис русского неонародничества 1902 - 1914 гг., Л., Наука,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е отделение, 1983. М. И. Леонов, Численность и состав партии эсеров в 1905 - 1907 гг., См., Отв. ред. А. П. Корелин,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артии России в период революции 1905 - 1907 гг. Количественный анализ, М., Б. и., 1987. М. И. Леонов, Партия эсеров в 1905 - 1907 гг.: организационная структура, состав, численность, См., Под ред. К. В. Гусев, Непролетарские партии России в трех революциях. М., Наука, 1989.

会革命党。最先在资料上做出开创性工作的是荷兰学者马克·詹森。他利用切尔诺夫和拉伯博波特保存的档案材料阐述了1917~1925年社会革命党的活动情况。90年代中后期,俄国政治百科全书出版社陆续出版了由叶罗费耶夫等人编辑注解的三卷本的社会革命党资料集(1996~2001)、左派社会革命党资料集(2000)和社会革命党最高纲领派资料集(2002)、劳动团人民社会党文件集(2003)。公布了一系列党的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党务会议和地方党委员会的记录、决定和决议,社会革命党著名活动家的回忆录、对阿泽夫的审判记录等。2002年,由С. А. 克拉西利尼科夫、К. Н. 莫罗佐夫等人牵头整理了1922年6~8月俄国共产党对社会革命党的司法诉讼材料。《历史问题》杂志在2000年公布了切尔诺夫注解的1917年6月至1918年3月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记录,在2006年刊登了Ю. Г. 费尔施金斯基和Г. И. 切尔尼亚夫斯基编纂的苏维埃政权初期的社会革命党材料。

对于社会革命党的研究整体上着重于1905~1914年的社会革命党和1922年的社会革命党。代表性的著作有列昂诺夫的《1905~1907年的社会革命党》,莫罗佐夫的《1907~1914年的社会革命党》和《社会革命党的司法诉讼和监狱对抗(1922~1926)·对抗的伦理与策略》,Г. И. 兹洛卡佐夫的《1917年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①恐怖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代表作有Р. А. 戈罗德尼茨基的《1901~1911年社会革命党的战斗组织》、А. 柯依弗曼的《恐怖网络·阿泽夫事件和俄国革命》、Л. Г. 波拉伊曼的《恐怖分子和革命者·侦探与奸细》、《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俄国个人政治恐怖》。^②关于社会革命党人物的研究的代表作有Д. А. 科列斯尼琴科的《世纪之交的俄罗斯·历史肖像》,古谢夫的《切尔诺夫政治肖像的刻画》,О. В. 科诺瓦洛娃的《跨越时代的切尔诺夫的政治

① М. И. Леонов,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в 1905 - 1907 гг., М., РОССПЭН, 1997. К. Н. Морозов,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в 1907 - 1914 гг., М., РОССПЭН, 1998. К. Н. Морозов, Судебный процесс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и тюремное противостояние (1922 - 1926): этика и тактика противоборства, М., РОССПЭН, 2005. Г. И. Злоказов, Меньшевистско-эсеровский ВЦИК Советов в 1917 году, М., Наука, 1997.

② Р. А. Городницкий, Боев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ПСР (1901 - 1911 гг.), М., РОССПЭН, 1998. А. Гейфман, В сетях террора Дело азефа и Рус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М., АИРО, 2002. Л. Г. Прайман, Террористы и революционеры, охранники и провокаторы, М., РОССПЭН, 2001. К. Н. Морозов, Индустриальный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террор в России XIX-Начало XX в. 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М., «МЕМОРИАЛ», 1996.

理想》，П. В. 沃洛布耶夫的《1917年俄国政治活动家》。^①关于社会革命党社会学说和土地社会化纲领的研究成果有Б. 亚尔采夫的《社会革命党和布尔什维克制度》，О. 科诺瓦洛娃的《混合经济——切尔诺夫方案》，《克服民粹派教条——切尔诺夫论资本主义演进类型》、《切尔诺夫和社会革命党农业纲领》。^②党内分化问题作为一个俄国普遍现象提出，不仅注意到了社会革命党本身，而且注意到了社会革命党与其他政党的分歧。这种分歧首先是在意识形态上，后来转变成利益纷争。分歧的转向说明俄国社会分化不充分，无论社会革命党和社会民主党之间，还是社会革命党内部并不存在原则上的分歧。这为正视社会革命党的社会地位提供了案例。由于布尔什维克的民粹化和社会革命党的民主化，左派社会革命党与布尔什维克的分与合，社会革命党与自由派以及白军、盟军的合与分，社会革命党对农民暴动的支持等问题都能做出恰当的评价。代表作有Л. М. 奥夫卢斯基、А. И. 拉兹贡的《破灭的希望·左派社会革命党》，А. В. 多布罗沃利斯基的《西伯利亚掌权的社会革命党和反对派（1917~1923）》，В. В. 萨佐诺夫的《坦波夫农民起义的根源》和А. П. 诺维科夫的《社会革命党的领袖与1921年喀朗施塔德暴动》。^③

中国关于社会革命党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最早从事社会革命党研究的是北京大学教授徐天新先生，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受苏联学者的影

① Д. А. Колесниченко, В. М. Чернов, См., Россия на рубеже веков: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портреты, М., Политиздат, 1991. К. В. Гусев, В. М. Чернов Штрихи к политическому портрету, М., РОССПЭН, 1999. О. В. Коновалова,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деалы В. М. Чернова: взгляд через годы, Красноярск, Сибирский юридический институт МВД России, 2006. Гл. Ред. П. В. Волобуев,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деятели России 1917 год, М., Большая рос. Энцикл., 1993.

② Б. К. Ярцев, Чернов, эсеры и большевистский режим, 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 XXI, 1994, № 5. О. В. Коновалова, Преодоление народнических догм——В. М. Чернов о типах 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эволюции, 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 XXI, 2001, № 4. его же. “Смешанн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Вариант Виктора Чернова, 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 XXI, 2002, № 3. его же. В. М. Чернов и аграрная программа партии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2002, № 2.

③ Л. М. Овруцкий, А. И. Разгон, Разбитые надежды: левые социалисты-революционеры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исты), См., Под ред. А. И. Зевелева, Истор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партий России, М., Высшая школа, 1994. А. В. Добровольский, Эсеры Сибири во власти и оппозиции (1917 - 1923), Новосибирск, Наука, 2002. В. В. Сазонов, У истоков крестьянского восстания на Тамбовщине,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2001, № 4. А. П. Новиков, Эсеровские лидеры и Кронштадтский мятеж 1921 года,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2007, № 4.

响，他重视左派社会革命党的研究，指出了左派社会革命党的革命性和动摇性。^① 另外两位先生则是金雁和曹维安。他们对社会革命党的研究具有附带性质，一个从农民现代化的角度，一个从俄国思想史的角度。两位先生摆脱了对社会革命党的小资产阶级定位，金雁先生把社会革命党定义为没有完成民主主义转化的“人民专制”^②，曹维安先生沿袭了俄国学者的观点，把社会革命党定义为民粹主义的最高阶段，肯定了他们的农民民主主义特征。^③

据不完全统计，有关社会革命党的研究著作作用俄语写成的将近 700 部，用外语写成的将近 90 部。^④ A. A. 科诺年科专门撰写了有关社会革命党历史编纂学专著。无论从方法论还是问题意识方面都有新的突破，社会革命党研究上了新的台阶。

三 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关于社会革命党的研究在俄国已经走过了一个世纪。受方法论的影响，对社会革命党的研究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侧重点。苏联时期，受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苏联学者否定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不同道路。社会革命党作为小农利益的代表者，缺乏应有的前途。研究的重点在于社会革命党的小资产阶级性、左派社会革命党的革命性和反动性、社会革命党的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政党的分裂、理论和社会现实的脱节等。而党的分化、性质、在革命中的影响和地位、布尔什维克对社会革命党的态度成为研究的重点。^⑤ 虽然布尔什维克利用了社会革命党的土地社会化纲领、合作社主张，但是对农民的小资产阶级的定性影响了对农民问题的重视，成为影响苏联人民精神现代化的瓶颈。苏联的解体、俄罗斯的休克疗法并没有换来俄罗斯的振兴，20 世纪初期的俄国道路之争再次成为俄罗斯学者关注的焦点。

社会革命党研究首先面对的就是方法论上的突破。早在 20 世纪 70 年

① 徐天新：《平等、强国的理想与苏联的实践》，第 47 页。

② 金雁、卞悟：《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村社传统与俄国现代化之路》，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第 312 页。

③ 曹维安：《俄国史新论——影响俄国历史发展的基本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第 364 页。

④ А. А. Кононенко,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я создания и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партии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в 1901 - 1922 гг.*, с. 5.

⑤ 徐天新：《苏联史学界研究俄国社会革命党的概况》，《平等、强国的理想与苏联的实践》，第 53～57 页。

代，苏联学者霍罗斯在西方学者的启发下率先做了这样的尝试。他用平民主义的观点代替了小资产阶级的提法。平民主义“强调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与反资本主义的结合，传统主义与现代主义的结合。作为社会文化阶层的人民（首先是农民）的思想在资产阶级关系的冲击下正在瓦解，但为了全面发展的民族目的应该给予保存和巩固；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思想经历了传统集体主义的维持、发展和完善阶段；倾向捍卫社会演变的非阶级道路，既否定人民当中的阶级差别，又否定其领导社会、批判知识分子的阶级功能；承诺农业改革，因为它不仅能够奠定工业化基础，而且确保现代化进程中必要的社会平衡”。^①平民主义与小资产阶级提法的不同在于，平民主义强调被边缘化的阶层回归传统和保守是社会发展的正常反映，是经济社会落后国家发展资本主义的必经阶段，是发展的标志，其核心在于其矛盾性，注重他们的文化心理；小资产阶级的提法则强调被边缘化阶层的动摇性、反动性，注重他们的政治性。正是由于把农民、小市民、知识分子的反抗、保守的心理看做过渡现象，而不是反动的特征，这些社会阶层的存在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成为积极团结的对象。平民主义提法的不足之处在于过分强调了边缘化阶层在经济社会落后国家变迁中的普遍性，忽视了俄国民粹主义极端性的时代和国别特征，不利于俄国内部自身的改造。

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学者M. 列昂诺夫打破了意识形态的禁锢。虽然仍在强调东西方的对立，如西方属于极富侵略性的技术存在论、俄国属于宇宙中心存在论，强调东正教与基督教的对立，但是，已经开始注意到俄罗斯帝国是“唯一一个组织复杂的家长制类型的民族社会和地理经济制度”。^②强调地理和家长制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民粹派学说的合理性。沙皇政府采取的强化资本主义的措施激化了社会矛盾、民族矛盾和宗教矛盾。社会革命党希望利用西方的技术和俄国的村社力量改造俄国社会，成为抗衡按照西方模式改造俄国社会的社会民主党的现实力量。从社会革命党1917年选举获胜和政党的无组织性和内部分裂的矛盾状况，列昂诺夫无法确定社会革命党在俄国的地位。

德国学者希德迈尔教授解决了这个问题。他认为，社会革命党虽然提出了“土地社会化纲领”，但在1905~1907年革命当中没有特别宣传自己

^① В. Г. Хорос, Идейные течения народнического типа в развивающихся странах, М., наука, 1980, с. 130.

^② М. И. Леонов,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в 1905 - 1907 гг., с. 3.

的经济纲领，而是特别强调农民改革的不公正性，甚至害怕斯托雷平改革会消灭农民的革命性，不积极利用杜马开会的机会解决农民渴望已久的土地问题。经过1905年革命的洗礼，特别是经历阿泽夫间谍案的暴露，社会革命党主流（中右和右派）放弃了革命的道路，与立宪民主党左翼和孟什维克的右翼一起转向渐进改革，着手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这种选择是正确的。然而，由于农民集体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矛盾性，社会革命党在1917年陷入分裂。革命者左翼与布尔什维克结合在一起，改良者与资产阶级结合在一起，社会革命党失去了实践社会化纲领的机会。布尔什维克利用左派社会革命党在农民中聚集起来的人气，实践了土地社会化纲领。布尔什维克的举动是在现实面前的退却，目的是赢得农民的支持。随后，布尔什维克提出的直接过渡思想显示了自己的激进性。理想与现实的脱节成为俄国所有知识分子政党的通病，也是俄国20世纪初期党派林立的根本原因。布尔什维克最终能够胜出，其原因在于它拥有一个民主集中的革命家组织。希德迈尔教授认为古谢夫和基涅夫等苏联学者把社会革命党看成小资产阶级政党，只能把它归入反革命阵营。^① 俄国的问题是两难的，它清楚地表明了社会经济结构和文化心理水平的非规律性。只有民主的多元论而不是内战才是政治解决两难的机会。^②

俄国学者和西方学者关于在评价社会革命党性质上的方法论上的争论反映了他们侧重点的不同。俄国学者越来越重视社会革命党提出的不同于西方价值观念上的选择，反映了俄国学者在急剧变迁的社会当中寻求自我的心态，医治因心灵的迷失而带来的社会动荡。虽然他们观念各异，缺乏统一的认识，但分歧正好折射出俄国思想多元化的社会现实。西方学者能够对社会革命党的思想文化价值给出自己的解释，甚至指出他们的矛盾性和未来出路，原因在于他们认识到个人和社会的发展就是文化的进步。俄罗斯学者终于走出文化的封闭，不再从政治上一味谴责或者崇拜不同于自己的文化，这本身就是进步。俄罗斯着重强调的“社会越现代，传统文化价值越重要”^③的结论从根本上肯定了民粹派的重要价值。方法论上的突破

① М. Хильдермайер,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и рамки аграрного социализма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См., Реформы или революция? Россия 1861 – 1917, Спб., Наука, 1992, с. 156.

② Реформы или революция? Россия 1861 – 1917, с. 157.

③ В. Г. Хорос, Русская история в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м освещении, с. 73. http://www.gumer.info/bibliotek_Buks/History/Horos/index.php.

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革命党的研究方向，提出了不同于以往的全新问题。

关于社会革命党的纲领问题的研究不再追究社会革命党纲领的矛盾性，如在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发展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与农民的阶级对立，土地社会化纲领中平均主义和劳动原则的矛盾等^①，而是深入研究在俄国条件下实行土地私有制带来的剥削和压榨行为，从而扼杀劳动者的创造性；强调农民、工人、职员、知识分子的相同的一面——劳动性，从而通过教育的方法弥补因身份、职业和政治利益而带来的隔阂，加强社会自治，壮大社会力量，完成政治结构的转变。切尔诺夫在与马克思主义者论战的时候，强调“土地社会化对于私人的权利基础没有任何触动，因为土地的使用和生产本身仍然是个人的，任何人也不能破坏属于个人的土地权利。”^② 列昂诺夫不再以西方文化为标准，更不把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不同作为对立，而是指出社会革命党以俄国农民的法律意识为标准，以挖掘他们的劳动创造力为准绳，努力消除妨碍社会发展的一切障碍，首要的是官僚国家，其次是在国家保护下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社会革命党的纲领并没有确立未来社会的性质，只是后来发明了“人民政权”这个词。俄国有工人、职员、商人、贵族、农民等社会分层，但这些都与政治身份联系在一起，阻碍了个人的发展。从发展的角度来讲，俄国所能依靠的就是资源，而土地是最主要的资源。解决好土地资源的利用就是抓住了俄国的根本，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土地问题才成为俄国的首要问题。社会革命党提出土地社会化是针对俄国全体国民的，而不是仅仅针对农民。只有解决了包括城市在内的土地问题，才能把人从土地的诱惑中解脱出来。土地社会化的重点不在于土地所有权，而是对土地使用者的管理。俄国土地问题的瓶颈正是所有权，所有权的直接后果就是投机，扼制了人的创造力。把土地所有权社会化，医治了人对土地的贪婪。土地社会化的重点在于劳动定额和民主监督。劳动定额解决了土地的抛荒问题，民主监督解决了官僚主义的问题。最终，俄国通过社会主义走向自由。列昂诺夫没有给出社会革命党定位，未来土地社会化是否一定走向生产社会化也还不能确定。但列昂诺夫对土地社会

① 如古谢夫曾从阶级角度指出了它们之间的矛盾性，进而得出社会革命党理论是传统民粹派和西方机会主义的折中的结论。К. В. Гусев, Партия эсеров: от мелкобуржуазного революционаризма к контрреволюции, с. 36, 39, 40, 36.

② Д. А. Колесниченко, Викт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Чернов, См., Россия на рубеже веков: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портреты, с. 322.

化的层层剥离，最终让读者对社会革命党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列昂诺夫的不足之处在于缺乏对社会革命党纲领的宏观分析和方法论的突破，因而对社会革命党缺乏深入认识。

结合方法论的突破，对于社会革命党的策略也有了全新的认识。古谢夫在《社会革命党·从小产阶级革命性到反革命》中说：“社会革命党恐怖运动的政治结果等于零。恐怖运动的锁链既阻挡不住反动派的进攻，也阻挡不住六三杜马的建立，更阻挡不住对进步力量的镇压。虽然恐怖运动某种程度上为社会革命党扬名，然而也给它造成了巨大的损失。”^①显然古谢夫是从革命的角度指责社会革命党不能从制度上给沙皇政权以致命的打击，相反给了沙皇政府镇压革命运动的口实。列昂诺夫则充分估计了恐怖运动对于提高群众革命情绪的作用，同时指出恐怖运动是知识分子以个人牺牲的方式参加政治运动的方式，^②反映了政府与社会的巨大隔阂。Л. Г. 波拉伊曼不再指责革命者和反革命者，而是分析 20 世纪俄国社会动荡的复杂现象。他指出，俄国出现红色恐怖和黑色恐怖现象是俄国政府长期推行警察统治的结果。格尔舒尼、阿泽夫组建恐怖小组不是出于简单金钱的需要，而是出于信仰。沙皇在对外扩张的过程中不断推动俄国快速发展。快速的社会进步推动了社会矛盾的加剧。从阿泽夫双料间谍的情况来看，他的组织不仅搅动了俄国政局，而且搅动了革命者的情绪。从阿泽夫起初为了生计从事间谍工作到革命中亲自参与暗杀推行反犹太主义的内务大臣普列维和莫斯科总督亚历山大洛维奇大公，可以看出他在争取独立生存、维护个人和民族尊严的矛盾心态。但从政治观点来看，阿泽夫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拥护君主立宪制度。1905 年革命之后，他强烈要求停止恐怖，是他的真实心声。^③ 社会革命党尽管在推翻沙皇政权方面不遗余力，但是，在社会观点方面仍然左右摇摆。摇摆不仅不是落后的标志，正是发展的征兆。

经过 1905 ~ 1907 年的革命洗礼，社会革命党从激进逐渐走向了保守，从封闭走向了开放。尽管社会革命党的领导人不情愿退出恐怖运动，但俄国立宪运动的浪潮推动了社会革命党走向群众，开始与自由主义反对派、

① К. В. Гусев, Партия эсеров: от мелкобуржуазного революционаризма к контрреволюции, с. 75.

② М. И. Леонов,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в 1905 - 1907 гг., с. 125 - 126.

③ Л. Г. Прайсман, Террористы и революционеры, охранники и провокаторы, см. § 6. <http://socialist.memo.ru/books/lit/priceman/index.htm>.

革命民主主义反对派联合。对于恐怖运动之后的社会革命党，苏联学者贬损的很多，主要集中于：社会革命党坚持护国主义立场，在沙皇政权垮台以后，患上了政权恐惧症，拱手把政权让给了资产阶级；社会革命党背叛了自己的纲领，失去了人民的信任；从内部分化出来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与布尔什维克联合在一起，建立起联合政权，由于左派社会革命党仍然热衷于人民主权，不理解布尔什维克因战争困境采取的对德让步和余粮征集制，走上了恐怖暗杀道路；右派社会革命党为了建立民主政权，公开走上反革命的道路，与君主派和国内外反动派联合起来，挑起了国内战争；虽然在高尔察克政变之后，社会革命党放弃推翻苏维埃政权的目的是走上了“纯民主的”自我发展道路（第三条道路）；国内战争末期，社会革命党公开支持农民暴动，攻击新经济政策，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走上了流亡的道路。^①

古谢夫把走向民主的社会革命党的动摇、背叛乃至绝望（左派社会革命党的暗杀）归结为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具有宿命论的色彩，忽视了作为平民阶层代表的社会革命党，在极端复杂的国际国内背景下（世界大战、内战）向进步方向做出的努力。

社会革命党在1917年所做的工作主要是进行民主化建设，由俄国社会的所有人一起解决战争、土地、国家性质、食品、工人问题和民族问题。由于知识分子组成的政党在确定解决的方法问题上彼此不信任，社会革命党的政策不能兑现，其力量也随着民主化进程的一再推迟而消耗殆尽。俄国的民主化浪潮是在战争环境下出现的，而战争是帝国主义相互竞争的结果。俄国社会处在分化的过程之中，恶劣的战争环境不利于社会的建设，相互猜忌严重。战争结果成为考量政权的晴雨表。沙皇政权就是在战败环境下垮台的，立宪民主党也因不能结束战争被称为反动派，社会革命党因同情资产阶级被称为“民主反动派”；只有布尔什维克坚决反对资产阶级，提出一切权利归苏维埃的口号，才赢得了人民的支持。

战争常常被看做中断俄国现代化进程的外在因素予以考虑，造成学者对1917年革命的误读。战争是俄罗斯帝国的生存方式，中央集权国家便是战争的产物。战败造成了俄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引发了社会发展道路的争论。西方派一直热衷于西方发展道路，并把具有竞争机制的发展道路作为

^① K. В. Гусев, Партия эсеров: от мелкобуржуазного революционаризма к контрреволюции, с. 100, 223, 255, 266, 236, 360.

普世道路；斯拉夫派则热衷于社会和谐，把俄国村社的集体主义精神加以放大。虽然在大改革时期西方派与斯拉夫派之争已经告一段落，但是关于社会道路的争论一直没有结束。一战期间，知识分子之间的思想争论演化成为制度争论，在战争问题上变成了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之争。社会革命党由于不能最终放弃利益之争而被宣布为人民的敌人。

1917年革命标志着战争体制的结束，建设机制的开始。由于战争机制给俄国人民造成极为严重的伤害，精神严重失落。凡是与战争有关的政权、财产问题都成为消灭的对象，影响了社会的正常发展。社会革命党的平均主义的民粹主张以及布尔什维克的民粹化演变都是这种现象的客观反映。

社会和谐的互帮互助和劳动价值论原本是社会发展的正常原则，在俄国却成为特殊的规定。这些原则之所以没有得到正常发展，原因在于俄国战争体制的长期延续。结束战争体制当然应该从正视这些正常伦理原则开始，同时还要让饱受战争伤害的人民有正常发泄的渠道。社会革命党没有深刻认识战争与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简单地把灾难归结为政权、资本主义，做出了否定政权、否定竞争的结论。沙皇垮台之后，社会革命党陷入了原则与现实前所未有的矛盾之中。社会革命党的困境不只是政见的分歧，更是俄国社会的困境。西方派与斯拉夫派的争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争论如果脱离了俄国的社会环境就变成抽象的口舌之争。俄国社会革命党致力于民主政权建设，致力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模式之争，虽然不失学理价值，但是对于指导困境中的俄国社会发展来说无异于自杀。

社会革命党与资产阶级政党合作的失败，立宪会议很快被工兵代表苏维埃替代都充分说明俄国已经进入了摆脱战争，建立人民政权的阶段。布尔什维克所进行的国内战争是摆脱战争的战争，旧有军官中将近一半在红军中效力，说明他们拥护布尔什维克的决定。随着战争的结束，帝国主义盟国纷纷撤退，特别是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十四点和平主张以后，布尔什维克的发展势如破竹。

社会革命党因不能认识战争在俄国社会中的作用而痛失执政的机会，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则取决于巧妙地把握了帝国主义战争给予的机会。战争结束以后，如何开展国家建设的问题再次浮出水面。社会革命党试图通过选举重新回到苏维埃，再次作为反对派制衡布尔什维克政权。布尔什维克以从事恐怖活动和背叛祖国为名对社会革命党进行了审判，剥夺了社会革命党参政的机会。

苏联学者主要从社会革命党与资产阶级结合认识其反革命的本性，忽视了其建设性的作用。俄罗斯学者虽然对社会革命党提出的萨马拉模式（即社会革命党在萨马拉建立的模式）赋予了替代军事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的角色，但仍然给出了否定的评价，认为它不适合俄国的社会现实。社会革命党缺乏统一的纲领和策略。^①这两种评价仍然把社会革命党在政治上的失败归结为纲领上的失败，对社会革命党的社会认识缺乏建设性的评价。人民厌战以至于厌恶与资本主义国家一切有关的东西只是情绪上的反应，国家为社会的发展创造空间是革命的最高要求，从这个意义上，社会革命党的纲领开创了政府与社会合作的新思路，值得探讨。社会革命党支持农民暴动，反抗苏维埃政权，社会革命党只能成为资产阶级的附庸的观点都是富有偏见的。关于社会革命党不能坚持多党制的建设更是无名的指责。

晚年，列宁认可了农民和资产阶级的地位，通过新经济政策给予他们发展的机会。无论是西方化道路还是民粹派道路都有其产生的历史环境，对于俄国来说都没有纯粹的价值。俄国的未来在于深入俄国社会内部，尊重兴起的市民社会，创造具有俄国特点的现代化道路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无疑，布尔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创造都有着自己的价值。从战争状态转向建设状态是在与西方交往的条件下产生的，也必然出现模仿西方、反对西方的情绪化反应，但俄国的最终出路还要自己探索。社会革命党在这方面做出的牺牲式的尝试具有重要的价值。

四 本书要解决的问题

通过对社会革命党研究存在问题的解析，俄国社会革命党的研究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首先，对于社会革命党的活动情况进行梳理，揭示该党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

其次，不以成败论英雄。社会革命党的活动是对俄国社会发展方向的悲剧性探索，是自十二月党人以来俄国社会发展探索的总结。为了深入研究俄国社会的矛盾现象，本书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采用文明史观

^① Г. А. Трухан, Антибольшевистски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России, М., Институт истории РАН, 2000, С. 38. См., А. Ю. Сулов,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в годы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войны: современная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я, С. 228. http://www.sgu.ru/faculties/historical/departments/oinp/viip_7/docs/029.pdf/.

和社会形态史观相结合的方法，对于社会革命党在东西方文明之间所做的弥合工作给予肯定，同时指出社会背景下，利益冲突带来的悲剧色彩。

第三，本书将以社会革命党社会思想与实践的冲突为主线，通过回顾民粹派思想的产生、演变和异化分析社会革命党产生、徘徊、兴盛、衰落的过程。本书注重历史脉络，注重西方派与斯拉夫派、自由派与民粹派的横向对比，注重国际国内环境对于思想的影响，横向、纵向、立体地全面认识社会革命党，还社会革命党一个有血有肉的鲜活的历史个性。

第一章

从民粹派到社会革命党

第一节 社会革命党产生的社会经济前提

一 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理论的再认识

1861年农奴制改革之后，俄国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无论是出于克里米亚战争俄国战败的原因，还是为了解决地主与农民之间的敌对冲突，亚历山大二世推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就是通过发展资本主义解决国内面临的问题。改革促进了工业、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然而，由于传统文化的坚固性，1861年俄国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动荡和社会各界激烈的争论。民粹主义就是围绕俄国发展道路产生的一种社会思潮，并成为社会革命党重要的思想基础。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发展资本主义就是从传统的自然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从自给自足走向受市场支配。列宁则把这个过程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直接生产者的自然经济转化为商品经济，第二，商品经济转化为资本主义经济。第一个转化是由于出现了社会分工，即单独的个别的生产者专门从事一种生产部门的生产。第二个转化是由于个别生产者在各自单独为市场生产商品时，发生一种竞争关系，每个人都力图高价卖出，低价买进，结果必然是强者更强而弱者垮台，少数人发财而大众破产，使独立生产者变成雇佣工人，无数小企业变成大企业”。^①在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时候，农民的分化是简单的财富分化，但随着农民与市场联系的加

^① 《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第72~73页。

强，在生产经济关系方面出现了不同的阶层，如宗法式农民、小商品生产者等，而在社会关系方面，农民则仍然属于统一的阶级。在从简单的商品生产转化为小资产阶级生产的过程中，第一，商品经济占统治地位，它在生产者孤立的情况下在他们中间造成竞争，使大众破产，使少数人发财；第二，劳动力变成商品，生产资料变成资本，就是说，生产者失去生产资料，一些最重要的工业部门按资本主义方式组织起来。^① 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生产的共同特征就是都受商品经济规律的调节，市场成为社会生产的调节者。不同特征是：如果在简单的商品市场上，商品生产者彼此对立，那么，在资本主义市场上，商品不仅作为商品交换，而且作为资本交换；在简单商品市场上，价格由商品价值决定，在资本主义市场上，价格等于生产剩余加上平均利润率。

这里涉及两个问题：一个是俄国是否已经完成从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宗法制生产、小商品生产、资本主义生产是否同时并存；另一个是俄国发生的社会矛盾是旧的传统文​​化引起的，还是资本主义不发达的缘故，是允许多种成分的存在，还是采取革命的手段予以消灭。俄国社会思想界对这两个问题有着不同的认识，并直接影响了对其评价。

19世纪90年代，在对俄国资本主义的认识问题上与民粹派形成对垒的有两派：一派是“合法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派是马克思主义者。“合法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司徒卢威为代表，马克思主义者以普列汉诺夫和列宁为代表。司徒卢威认为，交换经济就是广义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大型集中生产就是狭义的资本主义生产。商品生产是强大的文化因素，整个文化、政治、经济上的进步都取决于它的发展，而文化、政治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繁荣。俄国农民经济的危机和居民的贫穷是自然经济的历史遗产。俄国农业在交换经济基础上发展将造就一个市场，促进工业资本主义发展。国家合理的政策就是为这一过程扫清道路，并缓和它的社会影响。^②

普列汉诺夫是从民粹派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因此，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说：“我们完全不害怕资本主义的发展。我们坚决相信资本主义越是有力地发展，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矛盾越是大大地尖锐化，社会主义的胜利就越会临近。”“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绝对不会同意妨

① 《列宁全集》第1卷，第391页。

② II. 司徒卢威：《俄国经济发展问题的评述》，商务印书馆，1992，第223~225页。

得资本主义发展的措施。”^① 普列汉诺夫认为，资本主义体现了科学精神，俄国进入资本主义以后，村社已经开始解体，农民走向资本主义不可避免。普列汉诺夫根据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理论，从经济、心理、政治制度角度论证了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艰巨性，严格划分了资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在社会革命方面主张发展工人阶级力量的渐进性观点；坚决反对列宁不顾俄国经济、社会心理发展状况，通过革命家组织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做法，认为这样只能导致旧制度的恢复。

列宁对于俄国资本主义的认识也经过了一个发展过程。1894年，列宁认为，农村中虽然存在着小生产者，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它已经成为商品生产者、小资产者了。资本主义的顶峰（工厂生产、铁路、银行等）不过是在俄国，在各个领域即一切生产部门中早已形成的、使劳动受资本支配的商品经济的最后发展阶段。另外，列宁看到了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在每一个具体阶段上所具有的阶级对抗形式。^② 1898年，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发展》一书中总结了俄国资本主义不仅在工业中，而且在农业中占据优势，并指出资本主义的特征就是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化（生产的集体性、雇佣劳动、人口流动、工人占据优势、改变精神面貌等）。^③ 1907年，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一文中重新认识了俄国农业资本主义，他说：“我们当时正确地判明了发展方向，却没有正确地判明所处的发展时机。我们以为资本主义农业成分已经完全形成了，既在地主经济中，也在农民经济中完全形成了，以为农民经济已经分化出了强有力的农民资产阶级，因此就没有进行‘农民土地革命’的可能。这一错误纲领的产生，并不是由于我们‘害怕’农民土地革命，而是由于我们对俄国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估计过高。”^④ 到1918年，列宁在《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一文中承认俄国仍然存在多种经济成分（宗法式的，即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自然经济的农民经济、小商品生产、私人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而且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占据优势。^⑤

① 《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三联书店，1964，第172、220页。

② 《列宁全集》第1卷，第454~455、458页。

③ 《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第548~549页。

④ 《列宁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84，第255~256页。

⑤ 《列宁选集》第3卷，第522页。

从接受马克思主义到建立社会主义政权，对资本主义的认识逐渐从理论走向了实际。俄国社会主义是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小农国家实现的，遇到了许多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不相一致的地方，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俄国社会主义建立在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基础上。如果仍然把自然经济与封建主义联系起来，把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就无法解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问题，以及发展个体经济和发财致富的问题。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理论，更是一种现实，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现实选择，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重新认识俄国的资本主义。

司徒卢威引用舒尔采 - 格弗尼茨的话说：“在商人取得统治的一切地方，都建立起了不同于以前的法律关系，用财产自由和个人自由代替了财产和个人的不自由。”并得出结论：“商品生产和广泛的社会分工只有在货币交换的条件下才能实现。所有这些现象都是依靠私有制，经济自由原则和个人主义意识历史地发展起来的。”^① 在西方发达国家，私有制、经济自由和个人主义经历了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发展时期，并延续至今。在那里，专制王权和个人权利同时并存，权利和义务同时并存。然而俄国却恰恰相反，不仅农民、就连贵族也成为王权的奴隶。西方派代表奇切林认为，俄国对各个阶层的解放完成了从贵族、市民、国家农民到农奴的过程，国家对贵族和农民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② 俄国经济发展是在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条件下实现的。俄国历史学家 C. 索洛维约夫、B. 克柳切夫斯基把它们归结为俄国的地理环境、种族和民族以及外部条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俄国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成为阻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严重障碍，造成宗法自然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不平衡的局面。1861 年农奴制改革为各种经济成分的发展提供了法律前提，激发了个人意识的觉醒，但也造成了传统农业文明与现代工业文明的激烈对抗。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成为俄国转化的障碍机制，消灭它们成为俄国自由派和革命政党的共识。新兴的工农民主政权为俄国经济的发展开辟了崭新的道路，然而，多种经济成分的问题仍然存在。宗法自然经济是专制制度的基础，如果不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发展独立的个人能力，新兴的政权仍然会回到

① П. 司徒卢威：《俄国经济发展问题的评述》，第 76 页。

② Г. А. Герасименко,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науки (дооктябрьский период), М., Изд. РАГС, 2002, с. 203.

专制之中。

俄国史学家对俄国资本主义的认识反映了这一发展过程。苏联学者 И. 科列斯尼琴科认为, 19 世纪 60~70 年代, 农民经济从自然经济转化为小商品经济, 小商品经济又转化为小资产阶级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19 世纪 70~80 年代, 农民经济转化为独立的自由经济, 商品生产占统治地位, 劳动力变成商品, 工业主要部门组成资本主义大生产。^① A. 安菲莫夫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研究了地主经济之后认为, 半农奴制的残余——工役制在农业中占据优势; 1959 年进一步得出结论说, 直到 1917 年前, 半农奴制的关系在俄国农业中处处占据优势。1997 年俄国《历史问题》连续 4 期刊登了安菲莫夫生前写的《没有结束的争论》文章, 再次重申了这一观点。^② B. 秋卡夫金在 2001 年出版的《大俄罗斯农民与斯托雷平农业改革》一书中对这两种观点都提出了质疑。他说: “工役制的问题被列宁政治化了。当然, 工役制与经典资本主义制度相比缺陷很大, 但是经典的资本主义是不存在的。甚至马克思也不得不从封建的残余中抽象出来, 建立资本主义模式的理论。列宁也指出, 纯粹的资本主义是不存在的, 总是掺杂着封建的、小市民(指的是小商品生产)等各种残余。所以, 我们分析工役制的本质发现, 工役制不仅是封建主义的残余, 也是前封建主义的残余, 不仅现在会有, 将来也会被进一步使用, 因为它只是支付方式, 一种雇佣方式。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说, 工役制不是一定发展阶段的特征。”^③

综上所述, 1861 年改革, 开始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 但同时也开始了从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从这个意义上讲, 对俄国资本主义的认识不仅要关注资本主义的发展, 更要关注非资本主义的存在; 既要关注市场经济的发展, 也要关注自然经济的现实。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马克思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的三种社会形式逐渐引起了学者的注意。他说: “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 是最初的社会形式, 在这种形式下, 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

① И. Д. Колесниченко, Т. Л. Моисеенко, Н. Б. Хелунская,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строй крестьянск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Европейской России в эпоху капитализма, М., МГУ, 1988, с. 68.

② А. М. Анфимов, Неоконченные споры,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7, № 5-9.

③ В. Г. Тюкавкин, Великорусское крестьянство и Столыпинская аграрная реформа, М., 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2001, с. 98.

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① 关于第一个形态下人与人的依赖关系，马克思概括为这样几个特征：第一，人生活在共同体中，个人不过是实体的偶然因素；第二，个人生产纯粹是为了谋生，而不是发财致富，属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第三，生产力的低下，交换手段的落后使人的关系更多地表现为封建主和臣仆、地主和农奴的等级关系。^② 第二个形态具备如下特征：第一，人的一切产品和活动是为了交换，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商品经济，市场成为调节生产和分配的手段。第二，物的依赖性指人与人的关系不依靠共同体（血缘、等级等），而是依靠自己制造出来的商品——货币维系。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第三，人的劳动的社会性只有通过交换才能表现出来，所以人必须拥有所有权，特别是劳动财产所有权，通过所有权的买卖实现人的劳动交换，这就是物的依赖性基础上的人的独立性。第四，通过交换才能实现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③ 显然，俄国 1861 年以后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符合马克思描述的从第一形态向第二形态的过渡情形。在这样的框架下分析俄国资本主义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俄国的专制制度虽然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但专制制度对俄国各个阶层的压榨成为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严重障碍。资本主义改革引发了革命，建立的新兴社会主义政权必须为多种经济成分的发展开辟道路，把传统的自然经济引上文明的市场经济，实现个人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马克思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④ 因此，改造传统，而不是完全否定传统以适应生产力发展才是正确的发展之路。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引发了个人与社会的冲突，并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帮助下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 52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第 126、128、58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第 50～68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 33 页。

二 1861年改革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1861年改革极大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这首先表现在工业领域。俄国工业发展经历了手工业阶段、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工业阶段。自从19世纪40~50年代俄国纺织业开始工业革命以来，60~80年代逐渐转向机器制造业、铁路、矿山、冶金、煤炭和石油业，经过80年代下半期和90年代完成工业革命并在20世纪初期进入帝国主义阶段。1890~1900年间，企业数目从3.2万个增长到3.8万个，增长了18.7%，工人数目从200万增长到237万，增长18.5%，生产总额从15亿卢布增长到30亿卢布，增加了一倍。工业结构方面，重工业比重上升，1887~1897年，矿业增长11.2%，化工业增长10.7%，金属业增长8.4%，纺织业增长7.8%，食品业增长1.7%。^①对比1854、1881、1896、1913年的工业化发展程度，1854年工厂数为9944个，工人人数46万，产品总额1.6亿卢布，人均产品348卢布；1881年它们分别为31173个、77.1万人、9.98亿卢布、1294卢布；1896年为38401个、174.2万人、27.45亿卢布、1575卢布；1913年则为27566个、393.89万人、65.21亿卢布、1656卢布。在工农业发展比例上，据波克罗夫斯基讲，1894年，矿山和加工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6%，农业与森林、家庭副业、手工生产、渔业占64.2%；到1913年，前者为28.7%，后者为54%。工业增长率，据格尔申克隆讲，1885~1913年工业品年平均增长5.72%，其中1885~1889年为6.1%，90年代初为8.03%，1894~1899年为9%。在世界工业中所占份额，1881~1885年，俄国为3.4%，美国为28.6%，英国为26.6%，德国为13.9%，法国为8.6%；1913年，俄国为5.3%，美国为35.8%，英国为14%，德国为15.7%，法国为6.4%。^②

沙皇政府的本意是通过发展资本主义巩固专制制度。然而，资本主义本身是以自由经济制度为前提的，与专制制度背道而驰。这直接决定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特点，并在客观上为专制制度的垮台创造了前提。专制制度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性直接影响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与西欧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相比，俄国资本主义发展落后，工农业发展严重失衡，农

^① 梁士琴科：《苏联国民经济史》第2卷，李延林等译，人民出版社，1954，第198、201页。

^② В. Т. Рязанов,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развитие России-Реформы и российское хозяйство в XIX - XX вв., Спб., наука, 1998, с. 144 - 145.

业成为工业发展的牺牲品，轻工业成为重工业的牺牲品。工业发展仅仅集中在彼得堡、莫斯科、顿涅茨、乌拉尔、巴库等地。工业中农奴劳动长期存在，廉价劳动力阻碍了技术水平和工人工资的提高，1900 ~ 1913 年，年实际人均工资如下：1900 ~ 1904 为 253.6 卢布，1905 ~ 1909 年为 233.5 卢布，1910 ~ 1914 年为 250.5 卢布，不到英国、法国、德国工资的一半。^① 工人劳动时间长，缺乏劳动保护，政治上无权。国家通过保护关税、贸易顺差、榨取税收、举债、国家订货、国家奖励、国家经营（如铁路）造成行政命令有余、市场管理不足、工商资产阶级严重依赖政府、俄国依赖外国的局面，具有“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特点。正如费德罗夫所说，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基本上呈粗放式经营，虽然在产值、技术等方面也能够与西方相媲美，但是俄国的资本主义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经济不反映生产者的能力、市场发育能力，经济结构失衡，生产者缺乏独立性，企业缺乏后劲。在资本主义大生产突飞猛进的历史时期，俄国手工业、工场手工业同样获得发展，其中小独立生产者超过 60 万个，还有 400 万个农民手工业者。小工业在俄国中部工业中心得到广泛传播，农村地区的工业村现象保持到 20 世纪。那里手工工场占据统治地位，大约一半是独立的手工业者、半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另一半是在家里做活的手工业雇佣工人。西部省份是小工业生产形式，乌拉尔发展的是家庭工业。小工业与大工业竞争的手段是增加劳动力和降低自己的需求。^②

总结俄国工业的发展特点，1861 年改革使俄国迅速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并取得骄人成果。但由于行政干预、工农业脱节和保护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农奴制残余和专制制度严重制约了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动荡。1900 年以后，发展自由市场经济，减少行政干预，大力发展农业的结构调整成为统治上层关注的焦点。由于战争的爆发，调整无法实行。由经济矛盾引发的社会危机，使专制制度走到了尽头。

农奴制改革使地主农民从法律上获得了人身自由，为俄国农业发展扫清了道路。农民个人意识觉醒，提出了公正分配土地的要求。改革加速了土地流转和两极分化，贵族土地减少，领地贵族从 1877 年的 11.8 万俄亩减少到 1905 年的 10.7 万俄亩；土地从 19 世纪 60 年代的 8700 万俄亩减少到

① 刘祖熙：《改革和革命——俄国现代化研究（1861 ~ 1917）》，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第 148 页。

② В. Д. Федоров, Истрия России 1861 - 1917, М., Высшая школа, 2001, с. 188.

1905年的5300万俄亩，40年中减少40%。1905~1915年，欧俄47个省减少1100万俄亩，每年减少100万俄亩。^① 购买土地者除了农民、商人外，买进土地的地主贵族占卖出土地的50%~60%。由于农民人口增加，黑土地带份地逐渐减少，欧俄50个省提出的男性份地比例，从1861年的平均4.8俄亩减少到1905年的2.6俄亩。^② 1000万个农户拥有7300万俄亩的土地，28000个贵族大地主和暴发户大地主却拥有6200万俄亩的土地。^③ 私有土地增多，从1861年赎买开始，1915年达到3440.4万俄亩，占33.8%。1905年之前，私人购买者中10俄亩以下的占64%；10~50俄亩之间的占27%；50~100俄亩的占4.7%；500~1000俄亩的占3.6%，包括46个超过5000俄亩的大土地所有者。49万私人购买者中有46万人购买的地块在50俄亩以下，小地块占据优势。^④ 地主租给农民的土地不超过2500万俄亩（包括耕地、割草场、牧场），在1917年将近2000万俄亩。^⑤ 20世纪初，整个欧俄的份地租赁在700万到2000万俄亩之间波动。租赁者通过租地使每户份地的规模从5~6俄亩（播种10~15俄亩）增加到20~25俄亩（播种25俄亩以上）不等。挣外快的农民增加。土地播种面积增加，农业地区专业化进一步加深，谷物出口成为俄国农业经济的支柱。耕作制度和农业技术的逐步改进促进了俄国农业的发展。斯托雷平改革以后，个体经济获得进一步发展，粮食产量在1913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同时也应该看到，俄国农业改革服从两个目的，一是为工业发展募集资金，二是为了巩固沙皇专制制度。农民缴纳的税收不仅没有减少，而且增多了。不仅交纳赎金，而且交纳租金，赋税也有很大的提高。他们支付的赎金超过市场价值的70%，欧俄50个省的农民欠税从1871~1875年的2900万卢布增加到1896~1900年的1.19亿卢布，增加3倍。^⑥ 沙皇的两次农业改革（1861年、1906年）都以保护地主土地所有制为原则，但产生的结果并不尽如人意。1861年改革以后，地主获得的大量赎金并未能直接推

① 孙成木：《俄国资产阶级的形成及其历史作用》，《世界历史》1989年第5期。

② 刘祖熙：《改革与革命——俄国现代化研究（1861~1917）》，第61、37页。

③ 《列宁全集》第16卷，第191页。

④ В. Г. Тюкавкин, Великорусское крестьянство и Столыпинская аграрная реформа, с. 76, 77, 79, 80.

⑤ С. М. Дубровский, Сельское хозяйство и крестьянство России в период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М., Наука, 1975, с. 149-150.

⑥ С. М. Дубровский, Крестьян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революции 1905-1907 гг., М., Изд. АН СССР, 1956, с. 21, 23.

动资本主义的发展，1863～1872年9年中地主可得赎金8.67亿卢布，市场地价6.48亿卢布，差额2.19亿卢布，但有一半以上的赎金被用于抵偿地主的欠债。受美国、澳大利亚粮食竞争和国内保护关税政策的影响，削弱了向市场经济的转化，以致贵族常常利用出租和出卖土地大搞投机行为，从60年代到世纪之交，土地租价上涨60%，土地出售价格从1890年每俄亩的49卢布，上升到1905年的136卢布。^① 贵族将货币赎金用于挥霍消费。美舍尔斯基王公这样描绘道：当贵族地主拿到赎金后，“大部分贵族以令人惊异的快速，便把这些赎金券抛售出去……大戏院的意大利歌剧和米海伊洛夫戏院的法国戏剧，都从来没有像这个冬天这种富丽堂皇的二楼厢座的贵族社团给我留下的印象深刻……这是童话戏剧中的华丽服装和家传宝石的陈列柜。”^② 而地主庄园里仍然推行工役制和小农土地所有制。1906年斯托雷平改革推动了农业资本主义发展，但对大土地所有者和农村资产阶级的保护，加剧了村社农民追求反改革的公正。

农业资本主义的改革目的是推动地主农民走上市场发展轨道，但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村社土地所有制仍然占据优势。在所有土地中，份地占据主流。份地分两类，独户份地和村社份地。两类中，不足5俄亩的少地户中，村社社员所占比例低于独户，18.1%对41.1%；而在多地户中（超过15俄亩）村社社员高于独户，19.7%对11.01%。比较有保证的农民中（5～15俄亩），村社社员占62.2%，独户占47.9%。同时，不同的地域和类别情况又有所不同：中央黑土地带，村社农民份地平均7.3俄亩，独户农民平均8.9俄亩，前地主农民土地更少；其次是中央工业区，村社社员份地8.3俄亩，独户份地7.2俄亩；西北地区村社社员份地平均11.2俄亩，独户5.8俄亩。农民中，地主农民土地最少，哥萨克份地最多。从土地占有形式上看，平均主义占据上风。从经营方式来说，列宁将之划分为工役制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和混合经济，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显而易见。俄国是个村社占优势的国家，村社社员普遍缺乏独立的个人意识，集体主义、连环互保成为村社的主要特征。虽然村社土地集体所有，个人使用的局面包含村社走向瓦解的因素，但俄国农业改革并没有成功摧毁村社，俄国农业从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道路漫长，它不仅涉及制度层面的改变，更涉及

① В. Г. Тюкавкин, Великорусское крестьянство и Столыпинская аграрная реформа, с. 82.

② 扎依翁切可夫斯基：《俄国农奴制度的废除》，叔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第178页。

社会整体水平的发展和思想意识的转变。

总结俄国改革后的工业、农业发展特点不难发现：俄国自然经济和市场经济同时存在，多种所有制形式同时存在，这是社会不同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俄国从自然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是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但兼顾追求平等的共同发展的愿望也是政治家优先考虑的问题。沙皇从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出发，忽略了觉醒的被统治阶级的利益，使沙皇专制制度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消失在革命的洪流之中。工农革命政权代表人民的利益，既要保证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又要兼顾各个阶层的利益，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进行了现实的俄国社会主义的探索。

三 俄国革命化

俄国的改革伴随着革命，它不仅是利益不均造成的结果，而且是传统和现代激烈碰撞的产物。1861年前后，俄国的农民运动最为激烈，达到了1826年以来的顶峰。1826~1839年平均每年19次，1845~1854年平均每年35次，1858年为86次，1859年为90次，1860年为126次，1861年头5个月猛增到1340次，整个一年达到1859次。随后农民运动呈下降趋势，从1863年开始迅速结束。^①运动的主要形式是杀死地主、赶走官吏、烧毁庄园、夺取粮食，有的迅速逃亡乌拉尔、西伯利亚、高加索等地。农民不愿意相信对他们非常不利的“自由”出自沙皇之手，他们不仅减少了以往的份地，而且还要忍受比过去更加沉重的赋税和劳役，还要为减少的份地支付赎金。从1862年开始，农民拒绝签署法定文书，一方面由于他们不满意“解放”的条件，另一方面流传谣言说，沙皇将在最近赋予新的、真正的自由，无偿分配所有土地。

关于1861年农奴制改革的原因，一直是争论不休的话题，概括起来有两派意见。第一，让步说。苏联学者H. A. 察哥洛夫认为，衰朽的农奴制度，不但使革命民主派的反农奴制斗争迅速高涨，而且也引起统治阶级本身内部的思想危机。一部分统治阶级代表人物由于害怕革命不得不号召本阶级做出让步，废除农奴制度。第二，内部发展说。波克罗夫斯基认为，农奴制农业经济转变为资本主义农业经济的过程是一个纯粹的自发过程，

^① 孙成木、刘祖熙、李建主编《俄国通史简编》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第97页；B. Д. Федров,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1861 - 1917, с. 36.

因为多数贵族的经济利益要求消灭农奴制度。^① 以上两种说法都强调了农奴制改革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这是很重要的因素。然而，我们也不能忽略另一面。俄国在对外战争中遭遇了经济先进国家——英、法的挑战，加速了国家对经营方式的改变，对外贸易的市场竞争也会激发大贵族走向资本主义的经营。因为在农奴制条件下，只有大贵族有机会和资金进行这样的转变，而对独立的小生产者来说，由于超经济强制，被种种束缚和限制的天罗地网包围起来，感到走投无路。^② 政府为维护自己的统治会主动起来改革自己的经济基础，为工业发展开辟道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但我们还要注意俄国农业经济的主要形式——俄国的村社经济。

在改革以前，对于国家和领主来说，村社是管理农民经济、收取赋税的机构。按照领主与村社的关系，村社分为警察式、公社式和混合式三类。但从生产的管理职能来讲，村社保留着自古留存的特点，并随着赋税征收的加剧而加强。第一，村社实行土地公有、定期重分的土地制度。第二，村社实行强制耕作、强制聚居的管理方式。这是由俄国的三圃制的耕作方式决定的。^③ 第三，实行劳动组合，保留共耕地。第四，在征税、分摊劳役方面实行连环保制度，赋税劳役连环互保，平均分配，成为共同体联系的纽带。第五，村社还是互助互保的自治单位，抵抗人为灾害和自然灾害。村社制度是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完整制度。集体主义、平均主义是其重要的原则，它因自然条件恶劣、生产力低下、赋税征收而进一步加剧。集体主义、平均主义虽然可保农民安定，但也成为农业发展的巨大障碍。因为它抑制了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成为俄国经济落后于以私人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西欧经济的重要原因。俄国的村社经济与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为只有强制的农奴制度才能把农民留在土地上，成为国家剥削的对象。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工业的发展，农奴制的障碍因素更为明显，然而长期的农奴制压制，用强制手段把村社经济从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状态过渡到开放的市场经济是极端困难的。农民走出自然经济状态还需要一个较长过程，需要在市场中培养自己的独立意识。

① 察哥洛夫：《俄国农奴制解体时期经济思想概论》，厉以宁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第63、53页。

② 波克罗夫斯基：《俄国历史概要》上册，贝璋衡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第173页。

③ 三圃制是俄国19世纪流行的耕作制度，它分为三块：春播地、秋播地以及休耕地。三块地轮换，休耕地为共同放牧的地方。

做到这一点首要的是获得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这是农民起义的首要要求。所以说，农奴制改革为农民走向市场提供了机会。然而，国家和贵族出于对农民的掠夺，一方面把农民仍然束缚在村社中，另一方面对农民的份地进行无情的掠夺，并强迫农民赎买。农民成为工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最大牺牲品。

关于村社制度的作用问题一直存在着争论，这是影响社会转型方式的关键因素。国家学派的代表人物 Б. 奇切林说：原始的“自由公社”（9~11世纪）消亡了，而新的“土地公社”（13~14世纪）是领主政权为了保证课税而建立的，随后它又为保证国家赋税的“国家公社”（16~17世纪）所代替。^① 斯拉夫派坚决反对村社是国家为纳税而建立的观点，坚持村社是自古就有的。而农奴制的出现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使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农民开始定居，农民固着在土地上，土地属于地主，而农民拥有使用权。^② 二者的不同反映了不同的现代化道路：西方派把农民当做了孩子，虽然对他们的成长秉持批判态度，但是忽视了他们不成熟的思想；斯拉夫派把农民当做了母亲，虽然有非理性的因素，但是最终让他们在抚爱中走向独立。西方派的观点不是不能达到目的，但是显然忽略了地理因素对农民发展的影响。据俄国学者 Л. 米洛夫的考证，不利的自然气候条件为村社的长期存在创造了条件，^③ 当然也促进了农奴制的发展。如果从发展个性的角度出发废除农奴制，必须从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向在自由村社所有权基础上把土地固定给农民转变。^④ 自上而下的改革显然具有一相情愿的成分。

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资本主义带来的两极分化加剧了农民运动。资本主义是对农民传统观念的挑战，除了利益的激励，还要有政府的关爱与扶持。然而，沙皇政府出于保护抽象国家利益的需要，加紧了对农民的榨取，资本主义成为大多数农民的沉重包袱。资本主义促进农具的改良，化肥和农业技术的采用，但是由于国家的超额榨取，几乎每个地方都有局部挨饿的现象发生。三年一中荒，五年一大荒，特别严重的饥荒发生在 1873、

① 卞梧、金雁：《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村社传统与俄国现代化之路》，第 57 页。

② 白晓红：《俄国斯拉夫主义》，商务印书馆，2006，第 178 页。

③ И. Д. Ковальченко, Аграрный строй России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ы XIX-начала XX в., М., РОССПЭН, 2004, с. 451.

④ 白晓红：《俄国斯拉夫主义》，第 178 页。

1883、1891、1902 和 1905 年,^① 每次饥荒都伴随着极为严重的社会动荡, 最后演变成俄国历史上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据 C. 杜布罗夫斯基统计, 1900 ~ 1907 年工人、农民运动汇总如下 (见表 1 - 1)。

表 1 - 1 1900 ~ 1907 年俄国工人、农民运动情况

年份	农民运动登记次数	工人运动 (根据参加罢工工人人数)
1900	48	29389
1901	50	32218
1902	340	36671
1903	141	86832
1904	91	24904
1900 ~ 1904 年总计	670	210014
1905	3228	2863173
1906	2600	1108406
1907	1337	740074
1905 ~ 1907 年总计	7165	4711653

资料来源: C. M. Дубровский, Крестьян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революции 1905 - 1907 гг., с. 38.

从农民运动分布的地区看, 规模最大的运动发生在中央黑土地带 (2196 次)、乌克兰左岸和右岸 (1835 次)、伏尔加河中游 (724 次) 产粮地区, 最小的运动分布在非产粮区 (下诺夫格罗德 244 次、立陶宛 168 次和北方地区 54 次)。中央黑土地带和伏尔加河地区的农民运动主要是由于歉收和饥馑引起的。农民运动主要反对地主和警察 (分别是 5404 次和 1041 次), 反对富农的斗争仅为 97 次。农民斗争采取的基本形式有摧毁庄园 (846 次)、焚烧庄园 (979 次)、掠夺牧场 (573 次)、砍伐森林 (809 次)、农业工人运动 (723 次) 等。^② 参加运动的主要阶层有贫农、中农和富农, 而且他们的态度一致。中农和富农成为运动的领导者, 要求降低租赁土地的条件, 割让私人、公家和其他土地分给愿意耕种土地的人, 驱逐地主、焚烧庄园也是为了夺取土地。而贫农, 据来自波多利亚的报告说, “运动的领导人是较为富裕的农民, 参与运动最胆怯的是无地者, 因为如果没有日

① C. M. Дубровский, Крестьян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революции 1905 - 1907 гг., с. 26.

② C. M. Дубровский, Крестьян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революции 1905 - 1907 гг., с. 60, 65, 67.

工资收入的话，他们将无法生存”。^①

关于农民运动的要求，杜布罗夫斯基列表如下（见表1-2）。

表 1-2 1905~1907 年俄国农民运动要求

土地和社会经济要求	条约数	与总数的百分比 (%)	社会政治要求	条约数	与总数的百分比 (%)
废除土地私有制，把私有、公家、皇室、教会等土地分给农民	146	100	召开立宪会议	50	34.2
			召开四级立法国家杜马	123	84.2
国家杜马或立宪会议确定土地转交给农民的条件	114	78	实行政治自由	101	69.1
将地主和农民土地赎买归公	2	1.4	消灭等级实现农民与其他阶层的权利平等	109	74.6
根据需求部分农民土地归公	6	4.1	公职人员选举汇报制	106	72.6
确定平均使用土地	4	2.8	选举地方自治局并扩大其权利	83	57.0
			取消常备军并代之以民兵	3	2.0
废除雇佣劳动	86	59	取消军人地位以及强制保安	11	7.5
废除赎金	115	78.7	大赦政治犯	127	87.0
废除间接税并实行直接所得税	123	84.2	废除死刑	10	7.0
把农业工具转交农民	2	1.4	普遍的义务教育	146	100

从表1-2可以看出，社会经济要求中，农民最关心夺取土地、废除土地私有制、废除雇佣劳动、废除赎金和间接税，由立宪会议和国家杜马确立使用条件，最不关心平均使用土地以及把农业工具交给农民；社会政治要求中，最关心的有：召开有自己参加的国家杜马、政治自由、消灭等级制度、实行选举、大赦政治犯以及实行免费的义务教育；最不关心的有：消除常备军和废除死刑。综合农民的要求，农民并不反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是要求国家能够充分听取人民的呼声，为人民创造宽松的发展条件。资本主义的发展促进了农民意识的普遍觉醒。

^① С. М. Дубровский, Крестьян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революции 1905 - 1907 гг., с. 86 - 87; Т. Шанин, Революция как момент истины 1905 - 1907 гг., М., Весь Мир, 1997, с. 151.

第二节 俄国民粹派思想的演变

一 民粹思想的产生

农奴制改革和资本主义发展是扩张和西化的产物。这是俄国军队踏上法国土地带来的结果。受到法国生活方式触动的十二月党人在俄国组织秘密协会，利用亚历山大一世和尼古拉一世交接政权的机会，试图通过军事政变的办法按照西方的方式改造俄国社会。虽然政变失败了，多数军官被流放，但是俄国贵族上层开始了寻找俄罗斯思想的过程。在实现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俄国学者承认俄国根本没经历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17～18世纪的科技革命。但自尊心的驱使让他们得出俄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趋势与其他欧洲国家基本相同，只是开始的时间和发展的程度有所不同的结论。^① 这样的结论只是从表面上考察俄国是否具备公民社会的指标，如“个人和大众思想的世俗化，社会和政治关系的理性化、合法化，经济的市场化，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集中化、一体化”等，忽视了俄国真正的思想跃进。19世纪20、30年代之交，俄国正经历这种哲学的诞生或觉醒，“内在追求”和“外在现实”的分裂。^② 而这种分裂正是俄国思想觉醒的开始。

俄国的社会转型观念受到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但扩张带来的多民族和多资源却不利于俄国的社会转型，消除社会转型的这些障碍性因素需要巨大的意志力，需要激烈的社会碰撞。俄国贵族知识分子西方派最先产生的自卑心理和斯拉夫派随后产生的自负心理都是精神苦恼的表现，但也正是这种精神苦恼促使知识分子们开始了俄国特有的文艺复兴。从俄国斯拉夫派寻找俄国的民族性到俄国民粹派实践这种民族性就是这种探索的真实写照。

斯拉夫主义是俄国民粹派思想的先驱。斯拉夫派在东正教、专制制度和农民的村社世界方面都有所贡献。官方东正教一直阻碍人民的思想进步。

^① 鲍·尼·米罗诺夫：《俄国社会史》下卷，张广翔等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第316页。

^② 格·弗洛罗夫斯基：《俄罗斯宗教哲学之路》，吴安迪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297页。

Б. Н. 米罗诺夫说：“18世纪以前的所有俄国人对基督教教义知之甚少，以严格遵守教规和宗教仪式（膜拜圣像、到圣地朝圣、斋戒）代替内心的虔诚，盛行迷信和预言，在教会礼拜和进圣餐时缺乏必要的虔诚，具有功利目的（希望遵守宗教仪式能够带来实际利益——好收成、健康和工作成绩等），甚至俄国平民在20世纪以前一直有上述特征。”^① 为了克服这种功利性，启迪人民的智慧，斯拉夫派把信仰看做认识世界的工具，开启了俄国的宗教哲学。斯拉夫派的重要特点在于努力克服历史上形成的对先进文明的膜拜，在东正教中挖掘属于本民族的东西。根据俄国人民（而不是官僚）发展的历史，А·С. 霍米亚科夫提出了聚合性的观点。聚合性来自 *собор* 一词，有两个含义：一个是会议，即由一些代表或官员商讨解决某些问题的会议；一个是大教堂，即由几个教会的神职人员共同举行宗教礼拜的大教堂。^② 从精神的意义上讲，它表达了多样性中统一的理想观念。

聚合性有三个内在属性，一是自由，一是有有机性，一是恩典和爱。自由不破坏统一，而且产生统一，它统一到真理之上；有机体是自给自足的完整个体构成的统一体，每一个成员都因加入这个整体而使自身得到丰富，又通过这一丰富而得到改造，获得新的含义和新的生命；恩典和爱是基督通过大爱把独立的个人连接成为统一体。^③ 霍米亚科夫从社会生活、哲学和宗教三个方面解决了俄国人认识世界的问题。首先，教会不再是外在的权威，而是内在的精神共同体。基督的宗教对上帝的信仰不依靠对权威的恐惧，而是共同的信仰和内在的精神体验。其次，宗教体验体现在历史之中。霍米亚科夫说：“历史批评家所应当关注的第一个和主要对象，是民族信仰……文明的性质和文明的起源都取决于信仰的程度、性质和起源。”^④ 俄罗斯不同于西方天主教和新教国家，它的精神不建立在片面的理性之上，而是信仰、意志和认知理性的统一。信仰是指认识者对实在的直接加入，与实在融合的精神境界，它先于理性而存在，是历史发展的推动力，也就是“活知识”。意志是理性的特殊力量，属于前对象领域。正是意志在人的意识中划分了什么是“来自我自己”的东西和什么是“不来自我自己的东

① 鲍·尼·米罗诺夫：《俄国社会史》下卷，第320~321页。

② 徐凤林：《俄罗斯宗教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19页。

③ 徐凤林：《俄罗斯宗教哲学》，第20~22页。

④ 《霍米亚科夫选集》第2卷，莫斯科，1994，第237页，转引自徐凤林《俄罗斯宗教哲学》，第25页。

西”。如果意志支持理性全能的东西，人就会奢望以自己的力量达到完善。在信仰和意志基础上的认知才是理性的认知。再次，俄国人的认识来源于社会生活。A. И. 科舍廖夫在《俄罗斯谈话》中说，我们的村社不是氏族的（血缘的）、不是国家的，而是米尔的、共同协作式的，它产生于俄罗斯民族的古代生活方式。^① 俄罗斯人民纯朴、谦逊、智慧、渴望体现良知和保持精神自由的共同性生活。俄罗斯人民从不把胜利和成果归功于自己，而是归结为上帝的意志，他们永远赞美上帝。俄罗斯人民不问政治，以追求内心生活和尘世生活为己任。^② 正是这一点促成俄国专制制度的形成，它是基于人民的道德、宗教禁欲主义、人民对政权的自我节制的结果。

无疑，斯拉夫派的观点有拔高俄国文化的嫌疑，但是，在一个缺乏对俄国文化认可、社会动荡的国家，斯拉夫派具有凝聚俄罗斯思想、稳定社会的作用。从长远来看，斯拉夫派开启了构建俄罗斯民族文化的先河，开启了宗教信仰和理性认知的统一。

然而，与斯拉夫派对立的西方派，利用文明统一和资本主义发展的物质威力对斯拉夫派展开了猛烈的批判。他们认为，俄国与西方属于同一发展轨道，是封建的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决计按照西方经验把俄国建成立宪民主国家。西方派指责斯拉夫派美化彼得以前的俄罗斯，是一种倒退。A. И. 赫尔岑作为西方派的代表更加严厉地指出，“彼得以前的俄国是丑陋的，贫困的，粗野的，而斯拉夫派要恢复的就是这样一个社会”。^③ 西方派与斯拉夫派的争论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正在形成中的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特征，西方派反映的是俄国的理性精神，而斯拉夫派看到了徘徊在人民生活中的非理性因素。

非理性因素的过分发展并非斯拉夫派指出的优越于西方的因素，相反是社会不发达的标志。正如马克思所精辟指出的，俄国是踏着蛮人的足迹发展起来的，虽然让欧洲听到了他傲慢的语言，但内心仍留存着奴才的痕迹，而摆脱这样的状态不经过宗教中爱的因素的发展是没有出路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斯拉夫派的观点无疑具有这样的倾向。赫尔岑经过 1848 年革命的洗礼，认识到抽象的教条给法国人、德国人、匈牙利人带来的危害，主张具体地解决社会问题，实现社会的创造。他说：历史有计划、剧本吗？

① 白晓红：《俄国斯拉夫主义》，第 188 页。

② 白晓红：《俄国斯拉夫主义》，第 144~145 页。

③ 赫尔岑：《往事与随想》（中），项星耀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第 162 页。

有的话，历史将“索然无趣，变成……乏味、可笑”。没有时间表、没有宇宙模式；有的只是“生命之流”、激情、意志、即兴创作；路，有时存在，有时不存在；无路之处，“天才会打出一条来”。^①

赫尔岑从反对非理性因素到承认非理性因素和利用非理性因素，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恢复人的自由，为此，不惜任何代价。赫尔岑反对宗教，反对小市民（资产阶级的习气），他从俄国的现实出发，从农村公社出发，发明了“农民社会主义”。赫尔岑把自由与村社联系在一起，其目的是通过村社这样一种形式，让村社社员成为完全自由的人。^② 赫尔岑的一个主要的目标是解放农民，让他们走向自由。赫尔岑之所以反对资本主义，原因在于资本主义不适合俄国。赫尔岑没有利用西方的社会主义制度改造村社，而是发展村社，在发展的过程中消除村社的阴暗面。^③ 从赫尔岑的创造性的方法论来说，他的发展村社的主张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农民社会主义。他反对把村社的观点制度化，而是通过村社或者社会主义实现自由。他说，自由不合多数人的口味，只为受教育者所嗜。欲得自由，并无保证成功的方法，欲得社会福祉，亦无稳定平顺之路。我们必须尽力而为，而且我们可能永远失败。^④

赫尔岑的观点显然是从个人出发，因而对于社会和国家来说是一种反动。这些观点虽然符合社会发展的总体潮流，但是对于追求帝国的政府和追求功利的社会来说都是不切实际的要求。不过关于自由主义的观点对于俄国农奴制的废除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样，由于政府的自由派忽视了俄罗斯农民忠君和集体主义传统，引发了反对改革的起义浪潮。

如果说贵族知识分子能够依靠自己的修养巧妙地应对社会转轨给生活带来的冲击，那么对于刚刚脱离农民的平民知识分子来说，就变成剧烈的反资本主义的社会运动，而始作俑者便是鼓吹否定一切权威的赫尔岑。通过社会主义实现自由的主张也变成了农民社会主义的乌托邦。

平民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有 И. Г. 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 Н. А. 勃罗留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出生于萨拉托夫的一个神甫家庭，教会中学毕业。受

① 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彭淮栋译，译林出版社，2001，第233页。

② Н. М. Пирумова, 《Русский социализм》А. И. Герцена. См., Под ред. Б. С. Итенберг, Революционеры и либералы России, М., Наука, 1990, с. 119.

③ Под ред. Б. С. Итенберг, Революционеры и либералы России, с. 120.

④ 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第241~242页。

教会思想的影响，他博览群书，善于思考。他以宗教观念看待世俗问题，^①看到平民和农奴的悲惨生活，决定利用知识拯救这个社会。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哲学、美学、文学、社会学、历史学等领域都有广泛的涉猎，形成了自己的社会观点。由于生活艰苦，车尔尼雪夫斯基一直寻求经济上的独立，确立了劳动价值论的主张。车氏的劳动价值论不同于亚当·斯密，他把财富和劳动联系在一起，提出劳动的观念和劳动产物所有权完全符合的基本思想。^②车氏的经济观来自他的生活观。车氏在论美学的文章里，强调美即生活。在评论大学教育的时候，认为大学不应该脱离生活而谈论抽象的学问。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学问的生活化反映了他的功利主义思想。这种观念使他积极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之中。对于农奴制的改革，他坚决反对不带土地解放农奴的主张，认为这是对农民的掠夺。他在给赫尔岑的信中说，“为促进问题的和平解决，您做了所能做的一切。请改变一下调子吧！……唤醒俄国，拿起刀枪。”^③车尔尼雪夫斯基发展了赫尔岑的村社社会主义理论，与赫尔岑不同的是，他认为村社并非俄国特有的现象，而是俄国落后的标志。车尔尼雪夫斯基关注农民的生活、关注劳动者的生活，并在村社的基础上发明“劳动人民的政治经济学”，只具有伦理学的意义。

车尔尼雪夫斯基与斯拉夫派揭示的是同一个主题，不同的是，他强调以顽强的意志、革命的方法实现推翻专制制度的目标，实现缺乏理性和责任基础的自由。车氏的努力使得劳动者走上了反政府的道路，当然在激烈的革命斗争中也加大了对剥削的强调，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了斯拉夫派所强调的通过宗教的改造实现俄国精神复兴的目的。俄国农民革命越来越受激情的支配，平民知识分子也逐渐演化成为膜拜村社、膜拜人民、反对资本主义、反对政府的民粹派。

如果车尔尼雪夫斯基从宗教信仰的角度还能理解俄国社会发展的畸形状态，那么生活在贫困状态中的杜波罗留波夫则走上了反宗教的道路。他从反对宗教的教条主义到反对宗教本身，从而变成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杜波罗留波夫把自己的文学观点建立在功利主义的基础上，但并没有换来人民对他的理解，最终走上脱离传统宗教文化、脱离社会生活的孤独的发

① 博戈斯洛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叶芳等译，黄河文艺出版社，1986，第6页。

② 车尔尼雪夫斯基：《资本和劳动》，《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下册，周扬等译，三联书店，1962，第314、315页。

③ 博戈斯洛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第254页。

展道路。И. С. 屠格涅夫深刻地揭示了这种现象。他说：“我们的新一代人身上看到的却是根本不在乎什么权威人士，他们冷漠、片面，没有任何美学追求，他们都好像暮气沉沉的人……他们没有童年时代、少年时代和青年时代，他们是精神的怪胎。”^① 杜波罗留波夫因此而与屠格涅夫决裂。对于人民，杜波罗留波夫则说：“人民大众跟我们是志趣各异的，我们的痛苦他们并不理解，我们的狂热他们觉得可笑。我们是为了不管怎么说是为数不多的小圈子的利益而活动和写作的，因此，我们往往目光短浅，追求低微，一切见解和同情都带有狭隘的性质。”杜波罗留波夫在理解普希金的诗篇时建议：“要成为真正的人民诗人……必须渗透人民精神，体验他们的生活，跟他们站在同等水平，抛弃一切等级偏见，摒弃脱离实际的学识，同他们一起感受人民所拥有的那种朴实感情。”^② 从此，民粹现象在俄国知识界广为流传。

从十二月党人掀起的俄国思想解放运动开始，经过贵族思想家、平民思想家、沙龙争论到革命运动，俄国以反对西方、反对资本主义的方式完成了思想解放的运动。虽然血雨腥风，虽然具有反文明、反社会的虚无主义成分，但是它是俄国历史在俄国思想解放中的回响。俄国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遭遇了太多的苦难，造成了心理的严重失衡，影响了正常的理性判断。如果不考虑到俄国这样的历史特点，仅仅从西方一般的人类发展道路得出结论，恐怕就会犯教条主义的错误。俄国的特殊性认识正是俄国走向思想觉醒的开始。

二 民粹派思想的演变

俄国民粹派分成许多流派，五花八门，从革命民粹派到自由主义民粹派，甚至还有保守的民粹派等等。民粹派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有 П. Л. 拉甫洛夫（1823 ~ 1900）、П. Н. 特卡乔夫（1844 ~ 1885）、М. А. 巴枯宁（1814 ~ 1976）、В. П. 沃龙佐夫（1847 ~ 1918）、Н. Ф. 丹尼尔逊（1844 ~ 1918）、Н. К. 米海洛夫斯基（1842 ~ 1904）等。民粹派从阶段上大体分为革命民粹派时期和自由主义民粹派时期，时间跨越了 19 世纪 60 ~ 70 年代到

① 普罗托波波夫等：《别林斯基、杜波罗留波夫、皮萨列夫、冈察洛夫》，翁本泽译，海燕出版社，2005，第 123 页。

② 普罗托波波夫等：《别林斯基、杜波罗留波夫、皮萨列夫、冈察洛夫》，第 144 页。

19世纪80~90年代。^①列宁指出：“民粹主义由来已久。人们公认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是民粹主义的创始人。70年代革命者‘到民间去’（到农民中去），那时候颇有影响的民粹主义盛极一时。19世纪80年代，瓦·沃（沃龙佐夫）和尼古拉·一逊（丹尼尔逊）最完整地制定了民粹派的经济理论。20世纪初，社会革命党人最周满地表述左派民粹派的观点。”^②

受1861年农奴制改革的影响，反感自私自利的青年大学生逐渐开始组织极端小组，开始了“虚无主义”运动。虚无主义极端怀疑和否定普世价值（理想、社会生活形式、道德规范和美学原则），将个人主义原则极端化。60年代中期，他们分为两派，一派主张把知识和文化送给群众，到工业城市做工，在工人中间组织合作社，开办文化补习学校，成为“到民间去”的开端；另一派主张恐怖活动，主要代表是H. A. 伊舒京和加拉科佐夫组成的小组，曾于1866年4月组织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推进以村社原则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伊舒京的刺杀没有成功，但成为70年代无政府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先声。

开展革命运动的民粹派在革命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理论，分为宣传派和暴动派。拉甫洛夫属于宣传派，贵族出身，军事学院的教授。他从40年代就对社会主义思想产生了兴趣，并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在《现代人》、《祖国札记》等刊物上发表文章。他坚持进步史观，认为决定历史进步的有两个因素：一个是个人自觉意识的发展，一个是人们之间团结范围的扩大。他特别鼓吹英雄史观，认为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的是批判的思维着的知识分子。他把知识分子看做高于人民之上的人，是人民的精华和文明的优秀代表，而把一般人比作动物。一般人为了让社会精英有暇思考付出了极为高昂的代价。社会精英推动了社会的进步。首先，社会精英在头脑中产生先进思想，然后从个人的头脑传到另一些个人的头脑。随着这些个人在智力上和精神上的成长，而在质量上发展起来，随着这些个人数量的增加，而在数量上发展起来；而当这些个人意识到他们是志同道合的，并且决心采取一致行动的时候，它就变成一种社会力量，当充满这种思想

^① 《俄国民粹派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第1页。俄国最新的观点认为民粹派产生于19世纪60~70年代，经历了革命民粹派和自由民粹派时期，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激进的民粹派小组和组织，继续70年代革命者的事业。См., В. Д. Федров, Истрия России 1861-1917, с. 112-113.

^② 《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84，第326~327页。

的个人把它纳入社会形态中的时候，它便取得胜利。社会进步产生于需求，首先是生理需求，其次是习惯需求。需求可能会引发个人的悲剧，因此需要把它变成思想，也只有这种思想才是高尚的需求。高尚的需求能够抵御自己的爱好、自己的需求，也只有把这些纯思维活动变成科学、艺术和精神需求的时候，文化就转化为文明，人类历史也就随之开始。^①

拉甫洛夫的进步史观一方面把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区分开来，把自己凌驾于社会之上；另一方面否定了人民的本能需求、习惯和文化。知识分子成为脱离社会实际的超人，同时也把自己当成真理和正义的化身。虽然拉甫洛夫具有良好的愿望，但由于个人无论如何不能成为真理和正义的化身，必然造成远离民众、孤苦伶仃的悲剧。

走向民间的运动以失败告终，除了遭到政府的镇压，更主要的是遭遇了人民的不理解。以巴枯宁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直接组织暴动。巴枯宁也是贵族出身，从小接受了良好的教育，钻研法国和德国的哲学，产生了浪漫主义思想。他一生到处游历，四处发动革命。自由是他的毕生追求，不过在他那里，自由到了没有任何约束的程度——无政府主义。他有一句名言：破坏的热情就是创造的热情，因此被称为暴动派。虚无主义在巴枯宁这里表现得最彻底。他否定一切宗教的、政治的、官僚的、法律的、学术的和财政经济的设施，直接提倡在未来建立农业组合和工人联合会自由联盟以及各族人民的自愿联合。巴枯宁的直接和功利到了废止科学和教育的程度，认为一切取决于人民的需求。他说：“任何一位学者甚至不可能为自己确定，人民在社会革命的未来日子里将如何并且应当如何生活，这首先取决于每个民族的现状，其次取决于它们本身所表现出来的和越来越强烈作用的意愿，而不是取决于领导和来自上面的解释以及在革命前夕臆造出来的任何一种理论。”^② 巴枯宁直接变成了实证主义者。巴枯宁的主张虽然被赫尔岑认为有些幼稚，但是却具有不同寻常的魅力，吸引了无数的强者和弱者采取行动。^③

特卡乔夫更加直接，是一个试图利用由纯粹的革命者组成的密谋组织完成社会革命的人。首先，他认为只有少数革命家才能完成革命。因为“一些实际的革命者，是那些把自己完全献给解放人民群众的伟大事业，为

① 《俄国民粹派文选》，第67、83页。

② 《俄国民粹派文选》，第304页。

③ 赫尔岑：《往事与随想》（下），第396页。

了纯粹人民的理想而斗争的人，是把革命视为生活的唯一目的的人，是绝不与现存制度妥协并且根本否定这一制度的人。”^①

其次，只有掌握权力才能具有力量。特卡乔夫把权力看做组织，是各个职能的统一和集中以及职能尽可能细致的划分。他嘲笑斯拉夫派对道义力量的相信、对信仰的相信，认为这不过是耶稣教会让人们在智慧、意志和心灵对自己的顺从。他嘲笑无政府主义者只要消除政权，就会自然而然产生统一的联邦国家的观点。在特卡乔夫看来，“权力愈分离、愈分散、愈不集中，它也就愈保守……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地方势力、地方习俗的压制，受到历史传统的压制”。^②

再次，为了实现自己的社会主义理想，他把人民看做暴动的工具。他说：“人民的社会理想是自治的村社、个人服从米尔、土地的私人使用”，但这只是共产主义的胚胎。人民除了自己千百年来所尊崇的、习惯的土地占有方式，习以为常的宗法官场等级制度、个人对米尔的消极服从，除了自己的传统家庭关系等之外，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不知道。为了使这个胚胎能够走向共产主义，特卡乔夫建议需要少数革命家给他们的观念添上一些新的内容，并从外面灌输进去。“革命的少数人在把人民从对最高政权感到害怕和恐惧的沉重压迫下解放出来以后，就使得人民有可能表现自己的破坏性革命力量，就可以依靠这种力量，巧妙地运用它来消灭革命的直接敌人，就能破坏保护他们的堡垒……然后，革命的大多数人利用自己的力量和威信，就能给人民的生活环境带来一些新的、进步的共产主义因素……”^③特卡乔夫为共产主义而献身的思想，最终导致对自由和人民意志的扼杀。

革命民粹派虽然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但是过分夸大自己（知识分子）的力量反映出他们长期贵族生活的过分恣意和对劳动人民生活的过分蔑视。民粹派的反文化、反社会的举动遭到了政府的镇压和群众的举报。革命的民粹派转向了自由民粹派。

自由民粹派是列宁的称谓，其含义具有两重性，一是自由主义，二是农奴制的残余。^④ B. A. 巴卢耶夫根据资料研究了自由民粹派，认为他们没

① 《俄国民粹派文选》，第399页。

② 《俄国民粹派文选》，第404页。

③ 《俄国民粹派文选》，第411页。

④ 《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84，第166页。

有统一的观点，目的只是面对农奴制改革，从西方和历史中寻找有利的因素，建立一条属于俄国的发展道路。显然，自由民粹派没有完成这个任务，切尔文斯基、尤佐夫、沃龙佐夫、丹尼尔逊、米海洛夫斯基、吉霍米罗夫等人分别从各自的方面做出了探索，直到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列宁指出，沃龙佐夫、丹尼尔逊以及米海洛夫斯基对民粹派理论的贡献只是一个方面，而且最终没有形成统一的民粹派理论。自由民粹派从文化上继续探索俄国发展道路，不再拘泥于单一的方面，形成俄国的民主氛围。他们希望从政府那里获得合法探索的机会，这就是争取个人自由的根由所在。民粹派中无论是革命派、自由派还是保守派都是寻找属于俄国发展道路的一个分支，是社会革命的开端。无论哪一派都有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问题，都需要时间的检验。俄国由于缺乏良好的精神素养，陷入了非常严重的敌对状态，胜王败寇的原则代替了理性的原则。

走向民间的运动开启了知识分子了解人民（主要是农民）的过程。了解的成果在《星期周报》和《俄罗斯财富》两个文献上发表。

切尔文斯基针对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形态的经济决定论，提出俄国国民经济发展类型理论，试图摆脱达尔文的学说。他在《我们的民族特点》、《来自自己还是来自农村？》、《我们的文献为什么没有生命力》等文章中提出，知识分子不仅应该教育农民，而且应该向农民学习。他说，过去我们戴着欧洲眼镜或者从书本上看待农民生活，得出俄国落后的结论。现在，通过深入民间生活，发现俄国并不是落后，而是具有自己的特征。知识分子的主要任务就是发展民族的自我意识。^① 切尔文斯基号召知识分子向农民学习善良，农民向知识分子学习智慧。米海洛夫斯基批评切尔文斯基过分强调俄国的特殊性，并把这种特性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这样就放弃了1860年代革命民主主义者看待村社农民遗产的批判性态度。实际上，知识分子和农民“在相互交流和相互丰富的过程中，出现了选择的问题。在人民的道德领域中，除了好的品质，还具有刚好来自习惯法和刚刚分化时形成的村社中最不好的民族传统品质。所以，在和知识分子相互交流的时候，知识分子从人民那里希望得到的并不完全是一般意义上的道德品质，而是那些来自他经济独立、自我满足人类需求能力的道德禀赋”。“知识分子的任务则是启蒙人民，同他们分享知识和思想。”这样，米海洛夫斯基就推翻

^① Б. П. Балуев, Либеральное народничество на рубеже XIX – XX веков, М., Наука, 1995, с. 29 – 30.

了切尔文斯基关于反对戴上欧洲眼镜或者从书本上看待农民生活的观点，^①也明确了知识分子和农民两个独立的社会阶层的区别和联系，捍卫了知识分子的尊严。

综合切尔文斯基和米海洛夫斯基的争论，可以说，他们没有放弃 60 年代以来革命民主派争取恢复因争霸而丧失的人权的主张。他们的争论在于切尔文斯基从犯罪的忏悔角度向人民膜拜，把人民神圣化；而米海洛夫斯基以知识分子的清醒指出，要正确认识东方与西方，小心农民因无知给知识分子带来的伤害。米海洛夫斯基逐渐成为自由民粹派的中心。

民粹派知识分子怎么做才能恢复人的本性呢？这就是关于什么是民粹派的争论。尤佐夫（卡波利茨）说，应该相信人民，因为人民是睿智的；他们清楚地意识到和感觉到，真理在哪里，谎言在哪里，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在表达他们的利益之前，应该听取他们关于这些利益的意见；而知道这一点的知识分子比较少。^②沃龙佐夫主张为人民做些力所能及的“小事”。他作为一个学者分析了一个农民如何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存的理论，写成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一书。书中说：“众所周知，关于俄国资本主义的意义问题，至今还没有得到解决。一些人顽固地认为，我国今后的发展应该按照西欧的模式进行，并把这种见解用一些多少有点分量的、但多半是理论的考虑装饰起来；另一些人竭力抵制这种结论，但他们用来与之对抗的主要是说明我国没有必要步西方后尘的否定性理由，或者关于东西方势不两立的斯拉夫主义倾向等等。”^③

沃龙佐夫没有从理论的高度评述这个问题，而是从经济角度论述了这个问题。他说：“的确，有不少迹象不仅可以说明我国已经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而且甚至可以使粗心的观察者上当，以为我国已经相当迅速地在既定的道路上前进。例如，近 20 年来我国建成了二万俄里铁路……尽管存在这些可观的表面现象，然而我们仍然认为这一切大都是资本主义的儿戏，并非真正资本主义关系的表现。”最后他建议：我国大工业的发展是在对外销售极端有限，并有可能广泛利用较发达国家的一切完善技术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它的发展方向不是粗放经营，而是集约经营，因此，它的繁荣不需要俄国人民进一步失去土地，自然也不需要消灭村社，使失地

① Б. П. Балуев, Либеральное народничество на рубеже XIX – XX веков, с. 39.

② Б. П. Балуев, Либеральное народничество на рубеже XIX – XX веков, с. 50.

③ 《俄国民粹派文选》，第 652 页。

农民在工厂找不到工作等。^① 沃龙佐夫之所以提出给农民创造经济发展的机会，原因在于他认为俄国农民只是政治和宗教运动的材料，不能把自己看做社会发展的独立力量，他们反对现有秩序，不是为了斗争，而是躲避反基督者。^②

吉霍米罗夫走得更远，在革命失败后成为保守分子。吉霍米罗夫曾经参加了民粹派的各种活动，但激进的革命让他看到了无政府主义所带来的巨大破坏。他从1888年开始改变政治立场，对于俄国君主制条件下社会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1904年12月18日完成了《君主国家体制》（монархическа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ь），全面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主张使用民粹主义者的眼光，从村社和农民的角度对俄国君主专制的合理性做出解释。他认为，俄国命运直接取决于未来沙皇最高政权和人民权利相结合的程度。由于沙皇和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建立君主制的人民代议机构——人民杜马是可行的，它可以避免西欧资产阶级政党政治的弊端，更好地体现君主与人民的利益。他认为，以君主制为代表的最高政权即使是最小程度上也要比民主政体理智得多、巩固得多。^③ 吉霍米罗夫的思想常常由于与沙皇同流合污而被当做警察社会主义的代表，忽视了他利用俄国的宗教、村社文化对君主政权所作出的改造。他认为，民粹派的主要错误在于不会在农民当中发现有生命力的民族阶层，而是在其中发现断裂的阶级。“如果我们的农夫脱离了他的民族整体，那就失去了任何可教育的东西乃至任何特点。那时也不可能对他们的利益作出评判，不再要求一切通过人民，以及使他们获得独立。”^④

受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确立农民在社会上的平等地位并不容易，为此，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学说在俄国获得迅速发展。马克思的学说不仅解决了俄国革命者对资本主义弊端的批判，而且解决了俄国被压迫阶级摆脱“封建残余”的问题。苦苦寻求解决因资本主义发展给民粹主义带来的危机问题的知识分子，现在找到了答案，他们利用马克思主义学说对民粹派的缺陷展开批判。

民粹派是最早一批给马克思写信寻求解决资本主义发展给俄国带来的

① 《俄国民粹派文选》，第652~653、656页。

② Б. П. Балуев, Либеральное народничество на рубеже XIX - XX веков, с. 55.

③ 张建华：《俄国知识分子思想史导论》，商务印书馆，2008，第279页。

④ Б. П. Балуев, Либеральное народничество на рубеже XIX - XX веков, с. 75.

困境的学者，由此引发了新一轮西方派与乡土派的争论。马克思从始至终都没有给出有关俄国发展道路的明确答案，相反，对于米海洛夫斯基把自己的关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哲学概括上升为一般历史哲学的做法提出了批评，认为他这样做会给自己过多的荣誉，也给自己过多的侮辱。^①于是，以米海洛夫斯基为首的“俄罗斯财富”杂志的编辑们与合法的及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自由民粹派与普列汉诺夫、列宁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争论的焦点在于历史的创造者、资本主义的作用等方面的问题。普列汉诺夫从唯物主义的角度论证了英雄与群众之间的关系问题，利用马克思关于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的理论批判了民粹派夸大“批判的思维的的个人”作用的观点。列宁指责米氏的不足在于否定资本主义在俄国的进步性、认为俄国经济制度具有独特性以及知识分子具有超阶级性。^②米氏继续强调历史的选择性，也就是自己的主观社会学，即“真情真理和正义真理”。米氏反对马克思主义者关于1861年改革后农民是瞎胡闹的观点，要求从道义的角度正视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给他们指出发展道路。米氏与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争论在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程度，村社、生存状态以及存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马克思关于基础优于上层建筑、社会经济形态的预定更替、阶级斗争是历史的基本动力，主观社会学的捍卫”^③等问题。归结起来就是什么是进步、什么是个性的问题。

根据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学说，历史是不断进步的。马克思根据同样的原理确定了经济因素在历史当中的基础性的决定性的作用，并因此确定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根据德国学者洛维特的考察，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来源于基督教的末世论，即资本主义条件下，劳资矛盾这套推动历史前进的社会关系最终由资本家呼唤出来的工人打破，并最终拯救这个世界。洛维特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剥削说仍然是一种道德判断，是一种绝对的不义，是这个时代的“原罪”。这样，洛维特就把资本主义劳资对抗与基督教的神俗对抗联系起来，世俗界的发展是神学界的信仰发展的结果。如果脱离基督教的精神世界，资本主义的世俗世界的发展是不能想象的。所谓的进步学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42页。

②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18页。

③ Б. П. Балуев, Либеральное народничество на рубеже XIX – XX веков, с. 171.

说也是基督教预定天命的历史要素的世俗化。^①

俄国的东正教学说反对私有制和财富，认为这是一种罪恶。无疑，这是俄国农耕社会价值观念在社会生活中的反映。如果不顾俄国农民的价值观念，而从不断进步的价值观念出发否定农民的存在，就会出现反人道的局面。米氏从正义真理角度重提价值观的问题符合俄国农民社会的发展现实。米氏的主观社会学来自人伦道义，但面对无神论的唯物主义价值观显得非常苍白。米氏提出教育农民社会的任务，并提出了为个性而斗争的命题。米氏指出，俄国的马克思的学生们坚持未来的乐观主义，他们相信光明的未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会随着马克思揭示的社会经济形态更替的规律而出现，而在他看来，人类进步的一个弹簧是个人与社会的对抗、人类对自由的执著追求与来自社会的各种束缚不断给予它的压力之间的冲突。社会分化越严重，人类个性在其中受到的束缚也就越厉害，他注定只能履行一个狭小的职能。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是以泯灭人性为代价的。他希望把人从激烈的社会斗争中解放出来，实现社会的和谐。^②

司徒卢威则从社会整体的角度出发，认为人作为具体的个人，是所有过去的和当代的个人，即社会集团的派生物。司徒卢威把社会集团而不是个人作为考察的对象，忽视社会学中的个人，或者确切地说，从社会学中把个人一笔勾销，实质上是追求科学认识的个别场合，追求符合同一律的个别场合。^③ 司徒卢威承认这是一种方法论，通过这种方式把个人变成社会的零部件。司徒卢威把社会观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上是基于把俄国变成强大的俄罗斯的考虑。不过这个国家不是建立在对沙皇的膜拜上，而是建立在民族文化的认同上。他说，国家是个有机体，可能解体，也可能重新组合；国家也是一个相互关系或关系的体系，但是这都不会抹杀一个事实，即从精神上来说，每一个国家都具有某种个性，个性都有自身存在的最高法则，这个最高法则就是国家的强大。^④ 但随着人民的不断反抗，司徒卢威越来越意识到建设强大俄罗斯的艰难，希望政府与人民之间实现建设性的和解。

① 卡尔·洛维特：《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历史哲学的神学前提》，李秋零等译，三联书店，2002，第51、19页。

② Б. П. Балув, Либеральное народничество на рубеже XIX – XX веков, с. 189.

③ 司徒卢威：《俄国经济发展问题的评述》，第30、31页。

④ 张建华：《俄国知识分子思想史导论》，第290页。

司徒卢威的退却已经充分说明了社会共性对个性的压制。司徒卢威转向了唯心主义，Н. 别尔嘉耶夫、С. 布尔加科夫转向了东正教。别尔嘉耶夫写作的《恺撒王国与精神王国》、《自我认识·思想自传》等书中对于精神解放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首先肯定人的精神的创造性行为是对东西无限的追求，是对超验东西的追求，是内在的，而现实世界不过是对天意的信仰的世俗化了的体验。其次，他肯定对知识的批判和实现社会革命，但希望这个革命少一点暴力，少一点残酷。^① 在自传中，他谴责 20 世纪初期的大部分知识分子追求宗教神秘主义，认为他们在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上还不如 19 世纪 40 年代的斯拉夫派；还谴责左派知识分子致力于革命，追求法国浪漫主义所追逐的虚无主义和唯物主义，在精神上失去了任何创造力。^② 别尔嘉耶夫从此开始致力于个人精神解放的工作。

自由民粹派和合法的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争论结果给米海洛夫斯基的主观社会学留下了应有的地位。但正如米海洛夫斯基自己叙述的那样，俄国的未来充满了悲观。关于俄国绕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和资本主义是俄国必然趋势的学术之争变成了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人民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之间的党争。^③

第三节 社会革命党的诞生

一 社会革命党小组

自由民粹派虽然稳定了民粹派的立场，但是不能阻挡政府加快发展“资本主义”的步伐。而资本主义发展对于广大的农民来说就是空前的灾难。1891～1892 年，俄国发生了歉收，范围波及欧俄 18 个省并伴随着霍乱。1.19 亿人口中，超出正常死亡率者达 64.55 万人。^④ 1901～1902 年，粮食的主产区哈尔科夫、波尔塔瓦省发生了农民暴动，得到了同为粮食主产

① 尼·别尔嘉耶夫：《精神王国和恺撒王国》，安启念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第 95、96 页。

② 尼·别尔嘉耶夫：《自我认识·思想自传》，雷永生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第 141、140 页。

③ Б. П. Балуев, Либеральное народничество на рубеже XIX—XX веков, с. 196.

④ Б. П. Балуев, Либеральное народничество на рубеже XIX—XX веков, с. 4.

区萨拉托夫、坦波夫、奔萨、赫尔松和基辅各省的声援，最终成为1905～1907年革命的原因之一。

曾经沉寂的革命民粹派再次兴起。革命民粹派小组主要有1892年成立的“年轻民意党小组”、1893年在外国成立的“旧民意党小组”、1894年成立的国外社会革命党同盟、1896年在国内成立的北方社会革命党同盟、1897年成立的南方社会革命党同盟和1899年成立的俄国政治解放工人党。

北方社会革命党同盟在萨拉托夫成立，后迁往莫斯科。他们活跃在彼得堡、雅罗斯拉夫尔、波尔塔瓦、托姆斯克等城市。同盟发表了自己的声明《社会革命党纲领的基本原则》，重申以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民意党的失败使他们把俄国的社会定位在宗法制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时代，不再简单地把目标盯在农民身上，也不仅仅追求经济利益，而是把争取政治自由、推翻沙皇专制制度作为他们的近期目标。他们追随民意党，采取包括恐怖措施在内的一切措施在群众中进行宣传，涣散敌人组织。北方联盟积极与外国民粹派小组和自由民粹派取得联系，1900年还出版了自己的报纸《革命的俄罗斯》，宣传自己的主张。主要领导人有A. A. 阿尔古诺夫、C. И. 巴雷科夫、B. H. 佩列维尔泽夫、M. Ф. 谢柳克。

南方社会革命党由基辅、波尔塔瓦、哈尔科夫、彼得堡和沃罗涅什的小组组成，出版了《社会革命党宣言》。他们倾听社会民主党对民粹派的批评，倾向于马克思主义。他们把希望寄托于大城市的工人，与国外的社会革命党达成一致。领导人有B. A. 沃兹涅先斯基（彼得堡小组）、И. A. 季亚科夫（基辅小组）、M. M. 梅利尼科夫（彼得堡小组）、A. O. 瑟强科（沃罗涅什小组）。

俄国政治解放工人党在明斯克成立，在彼得堡、叶卡捷林诺斯拉夫、别罗斯托克、日托米尔、德文斯科等地有自己的分支机构，热衷于恐怖活动。领导人为Г. A. 格尔舒尼（1870～1908）、E. K. 布列什科—布列什科夫斯卡娅（1844～1934）等。它把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建立人民政权作为自己的目标，把专制的根源仅仅归罪于沙皇的奴役，对社会主义的目标只字未提。

外国民粹派以X. O. 日特洛夫斯基（1865～1943）为代表，民意党失败之后流亡欧洲。他获得柏林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对民粹派的失败进行了总结。他认为土地自由社否定政治自由、民意党热衷于战斗，而社会民主党则为了城市工人的直接经济需要而牺牲了政治斗争。他坚持社会主义与政治自由相结合，指出沙皇专制与资本主义给俄国带来了压迫，束缚了人的

解放，号召培养农民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和政治自由。

综合以上存在于国内外的民粹派小组的特点，他们缺乏统一的思想 and 组织机构。为了实现建立统一思想纲领的目标，B. M. 切尔诺夫做了大量的工作。

切尔诺夫出身于伏尔加河畔萨马拉省的一个农民家庭。由于从小受宗法父亲的压制和后娘的虐待，他把自己归为家里受压迫的仆人一级。在托尔斯泰文学作品的感召下，从小就有同情心，坚信要建立一个平等的社会。受民意党哥哥的影响，从中学开始就投身于革命，参加 M. A. 纳坦松组织的民权党。民意党强烈的道德纯净感激起了切尔诺夫对功利社会的强烈不满，直到结识 C. B. 巴尔马舍夫（1902 年为了理想刺杀了内务部长 D. C. 西皮亚金），才认识到这是一种病态。大学期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组织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举行大学生暴动。大学生暴动完全依据理论说教，缺乏社会根基。切尔诺夫带着困惑拜见了自由民粹派大师米海洛夫斯基。米海洛夫斯基的反对暴力说深深触动了切尔诺夫。从此，切尔诺夫走向了西方民主主义，致力于把俄国的民粹派学说和西方民主主义学说结合起来的尝试，寻求一部能够约束俄国社会的法律，并为此奉献了一生。

切尔诺夫不再简单地依据某一种理论指导自己的行为，而是根据俄国的农业发展状况进行新的探索。他把自己的学说命名为建设性社会主义，认为对于整个民粹派来讲，俄国的发展必然是社会主义，这是资本主义的结果，也是俄国农民社会的国情决定的。根据西方社会主义的理论，社会主义不再是抽象的教条，而是建设性的具体步骤。切尔诺夫以自己在坦波夫建立的捍卫人民权利兄弟会宣言为依据，结合马克思主义、西方民主社会主义、米海洛夫斯基的主观社会学进行理论的构建和现实的尝试，最终形成社会革命党行动的纲领。

俄国社会是一个神权社会，把俄国从这样一个社会状态下解放出来，知识分子应该扮演唤醒者的角色。切尔诺夫虽然对此有所认识，但是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对于东正教农民的膜拜注意不够，仅仅把他们称为暴民，希望通过道德的感化解决纠纷。为此，切尔诺夫仍然支持恐怖，希望通过恐怖唤醒民众，认为民众兴起的时刻便是民主时代的到来。然而，革命越发展，社会越混乱，革命便成为一切。俄国在发展资本主义的情况下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人民宗教革命，不仅烧毁了旧的政权，而且烧毁了革命者自身。

社会革命党小组的重新诞生成为引爆群众力量的大炸弹，它以恐怖开始，

以国内战争结束。社会革命党在组建统一政党的时候曾经有过建设性的步骤，但道德的说教无法阻挡战争引爆的社会革命，在群氓转变成成为人民的过程中，知识分子组成的政党已经无能为力了。

二 社会革命党的组建

各个民粹派小组虽然在未来发展的目标、依靠的对象上存在分歧，但在推翻专制政权、争取政治自由方面却达成了一致。共同的利益推动了社会革命党走上了组建政党的道路。

切尔诺夫为制定完整的革命纲领于1899年到国外拜访了Л. Б. 阿克雪里罗德和日特洛夫斯基。在日特洛夫斯基的支持下，切尔诺夫召集了在国外的社会革命党小组于1900年在巴黎组建了农业社会主义同盟，Л. Э. 希什科、Ф. В. 沃尔霍夫斯基和Е. Е. 拉扎列夫担任领导人，计划依靠农民实现俄国的社会转型。

1901年，已经在俄国国内致力于政党联合的格尔舒尼来到国外，会见了国外的民粹派小组，虽然双方存在着分歧，但格尔舒尼为首的犹太社会革命党和切尔诺夫为首的俄罗斯的社会革命党都放弃了自己的本位主义。

社会革命党的联合是在与国内以С. В. 祖巴托夫为首的警察社会主义的竞争下开始的，其主要目标在于推翻专制制度、建立人民政权。在格尔舒尼和布列什科—布列什科夫斯卡娅的组织下，他们在国内组建印刷所，印刷传单和报纸，组织学生罢工，着手对高级官员的暗杀。1901年，北方社会革命的机关报纸《革命的俄罗斯》被查抄，领导人С. Н. 斯列托夫以及谢柳克把报纸迁到国外出版，然后偷偷运回国内。为了加快工作的进展，在国外的切尔诺夫、М. 戈茨，国内格尔舒尼、布列什科—布列什科夫斯卡娅、Е. Ф. 阿泽夫给予了积极的推动。

1902年，《革命的俄罗斯》第三期刊登了国内外社会革命党小组联合的消息，标志着社会革命党的成立。新成立的党以《革命的俄罗斯》为机关报，《俄国革命通报》为党的理论刊物。社会革命党的成立虽然缺乏共同的纲领、组织章程，但以共同的名义印发传单、组织恐怖活动。社会革命党就是这样开始了自己的发展进程并有力地推动了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

关于社会革命党成立的时间，史书上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概括起来如下所述。《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一版、第二版、第三版都持1901~1902年

的说法。苏联学者以古谢夫为代表,^①依据是1902年《革命的俄罗斯》第三期刊登的通告。1996年出版的《俄国政党百科全书》,列昂诺夫的《1905~1907年的社会革命党》中则坚持1905年成立的说法,^②理由是1905年12月召开了社会革命党成立大会,制定了纲领和章程,选举了中央委员会。基涅夫认为,社会革命党从1902年开始联合,到1914年结束。理由是,随着一战的爆发,社会革命党和人民社会党在农村进行的小规模的活动也停止了。^③我国学者则采用了1902年宣告联合,1905年正式成立的折中说法。^④

折中说比较有根据。第一,《革命的俄罗斯》第三期刊登消息称:“社会革命党联盟和南方社会革命党联合出版《革命的俄罗斯》并把《俄国革命通报》定为党的理论刊物,希望看到与国外的社会革命党力量组成一个整体。”“我们深信,俄国经历的重大历史时刻迫切地要求俄国所有的革命力量联合起来,我们,社会革命党认为最重要的是自己有义务促进引导我们走向联合的事业。”^⑤

第二,小组联合纯属个人行为,格尔舒尼和布列什科—布列什科夫斯卡娅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社会革命党联盟领导人阿尔古诺夫一直怀疑联合的现实结果,而且不急于与南方社会革命党平等联合,认为联合只能借助《革命的俄罗斯》、围绕社会革命党联盟才能实现。同时,据谢柳克和M. M. 梅利尼科夫^⑥证实,格尔舒尼在联合过程中,除了给《革命的俄罗

① К. Гусев, Партия эсеров: от мелкобуржуазного революционаризма к кортрреволюции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 с. 31.

② М. И. Леонов,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в 1905 - 1907 гг., с. 38;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артии России. Конец XIX-первая треть XX века,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М., РОССПЭН, 1996, с. 433.

③ В. Н. Гинев, Борьба за крестьянство и кризис русского неонародничества 1902 - 1914 гг., с. 3.

④ 孙成木、刘祖熙、李建主编《俄国通史简编》下册,第280~281页。

⑤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00 - 1907. 6, с. 60, 68.

⑥ 梅利尼科夫,小市民出身,彼得堡矿业学院的大学生。20世纪初,积极参加伏尔加河和南俄地区的社会革命党组织,在哈尔科夫创办印刷所,帮助格尔舒尼建立战斗组织并参与暗杀内务大臣西皮亚金。1902年秋参加基辅社会革命党领导人会议(还有格尔舒尼、格拉夫特、阿泽夫),会上通过党内分工决议,阿泽夫负责北方,梅利尼科夫负责基辅,格拉夫特和格尔舒尼为流动党务工作者。梅利尼科夫反对指定中央委员会,主张由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这是他和格尔舒尼的第一次分歧。第二次是他怀疑阿泽夫是奸细,并在狱中告知格尔舒尼,从而引发新的冲突。由于个人偏见,格尔舒尼没有重视梅利尼科夫的意见,给党造成巨大损失,梅利尼科夫也因此流亡海外。

斯》编辑部提供木质印刷车床及其相关设备之外，主要从事恐怖活动。^①

第三，从社会革命党和农业社会主义同盟的联盟条约来看，也没有实现真正的联合。条约说，两个组织之间保持联盟关系，但前提条件是每一个组织完全保持内部独立；条约双方中的每一方有权与其他不与双方的活动目标相抵触的组织保持联系；农业社会主义同盟仍像以前一样被允许吸纳持有各种社会思想观点的人；双方只是在共同出版书籍、提供资料和物质帮助上达成共识，但仍允许独自出版自己的书籍；本条约双方都可以解除。^②

第四，社会革命党在1905年之前没有统一的组织、选举机关、章程和入党准则。

这样，社会革命党在1905年正式宣告成立。

① 据梅利尼科夫证实，关于格尔舒尼走遍社会革命党组织的目的不是为了联合，而是为战斗组织寻找候选人。谢柳克证实说，这段时间（指在国外）格尔舒尼的主要心思在恐怖上，当然也高兴找到了阿泽夫这样的助手和同事。См.,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00 - 1907. 6, Т. 1, с. 64, 638。

②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00 - 1907. 6, Т. 1, с. 69.

第二章

社会革命党的社会学说及纲领

第一节 社会革命党的社会学说

一 新民粹派的社会理论

作为政党，首要的条件就是具有统一的思想。旧民粹派之所以不能站稳脚跟，最主要的是不能在思想上给出可以确定的某些东西，因此被以赛亚·伯林称为一股“激进运动”。^① 切尔诺夫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赋予自己的政党以一定的科学性。

民粹派与马克思主义论战涉及的最主要的问题是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道德伦理问题，也就是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问题。马克思认为：“物是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在我们之外存在着的。”^② 而米海洛夫斯基认为：“历史进程是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没有一个规律一成不变地、跨越整个人类历史地发挥作用，并影响所有国家。事态按照历史规律发展不能逃脱道德的审判……它们为意志顽强的个人留下了一定的空间。”^③ 米海洛夫斯基否认规律的永恒性，但同时又把顽强意志的人独立于历史进程之外，就形成了一个无法克服的矛盾，这就是列宁所说的民粹派忽视了知识分子与一定社会阶级的物质利益的联系。历史进程是有规律的和历史进程应该有人性究竟是什么关系就成为社会革命党理论家切尔诺夫必须解决的问题。

① 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第251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77页。

③ Б. П. Балуев, Либеральное народничество на рубеже XIX - XX веков, с. 198 - 199.

切尔诺夫首先否定了“绝对的超人性的真理”。他说：“关于世界的真理性观点只是不同心理组织的不同类型。”这样一来，“人对社会存在的态度不可避免地具有人的主观理解的色彩，并反映在他的理想——评价标准当中，人将透过这个标准理解现实”。切尔诺夫强调人的主观色彩，并不排斥看法的科学性，其中的玄机就在于“透过”。切尔诺夫把人的理想看做“人的精神所有的积极倾向和需求的高度统一，是建立在相互联系和尊严之上的价值体系”。作为万物之灵的人，在认识历史的时候不是寻找决定事物进程的规律，而是探索不同因素的相互依存性。只有所有历史条件通过一定程度的协调才能从历史的可能性变成必然性。人的作用只是确定一定条件下的时间和地点，如果时间和条件改变了，发展的方向、进程和性质也相应发生改变，结果也发生变化。这样，人就不再是规律的奴隶，而是历史进程的积极组成部分，历史也不再被不依赖人的外在的规律管理着，而是通过人展示出来。^①

切尔诺夫对人能动性的肯定并没有否定人的局限性，他认识到人不是任意行动的，而是受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的限制。切尔诺夫把地理、气候和土壤归结为客观条件，把作为生物的、人类学的和社会存在的人归结为主观因素。他强调，人不仅控制自然，而且是自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任何社会制度条件下，自然因素总是对人的生命力产生实实在在的影响，然而，自然因素的影响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②

现时代，人逐渐显现出与自然的不同。切尔诺夫认为，人与自然最大的不同就是行动上具有一定的内在规律，表现出一定倾向的综合特征。切尔诺夫把这种综合特征归结为人的个性需求。个性需求是一种心理结构，它随着时空的变化而逐渐发展，于是出现了经济需求、政治需求、文化需求。经济需求尽管很重要，但是也只是人的需求之一。它的满足不仅需要人的参与，而且受到宗教的、社会政治观点的影响。这样，在切尔诺夫的眼里，重要的已经不是规律性这个决定性的东西，而是不可分的、不可中断的和实实在在存在的思想。^③

这样，切尔诺夫就把马克思讲的冷冰冰的历史规律转化成为人的思想，

① О. В. Коновалова, В. М. Чернов о путях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и, М., РОССПЭН, 2009, с. 34, 35, 36, 37.

② О. В. Коновалова, В. М. Чернов о путях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и, с. 37.

③ О. В. Коновалова, В. М. Чернов о путях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и, с. 39.

并提升了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主动性，因而体现了不同于沙皇压制人性、不同于马克思主义者受规律束缚的灵活性。但是，切尔诺夫仍然没有解决人何以在此时而不是在别的时候有这样需求，人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会有这样的需求，有这种需求的人和没有这种需求的人究竟是什么关系，谁将服从谁等一系列必须回答的问题。这也是恩格斯所说的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真实内涵。

切尔诺夫的困境在斯托雷平土地改革引发的私有制危机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给俄国造成的压力下一再表现出来，引发了社会的离心运动和党内剧烈的思想分裂。切尔诺夫无法自圆其说，发明了“平民”和“暴民”的理论，重新陷入了好人与坏人的宗法人伦道德困境。

切尔诺夫认为，“暴民常常表现出破坏性的情绪，轻信各种蛊惑，敌视知识分子……”。切尔诺夫把暴民的产生归结为战争和革命，从宗法伦理道德的角度否定了资本主义给他们观念带来的积极改变。他说，在逻辑上，历史并不是无可挑剔的、合乎规律的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而是一个创造力与破坏力进行斗争的自发过程。在人类的历史中，当破坏力占据上风，就可能出现后退的运动，那时就可能出现历史过程的循环。是破坏性的力量被克服，还是建设性的力量被克服并不只取决于外在的条件，还取决于人类本身。^①

这样，切尔诺夫就把自己的目光转向了全人类的社会价值。他说：“如果我对人类生活的真理、公正与合理的理想信仰不再奢求绝对没有错误的话，那么我就不会从这里获得容忍不同意见的道德原则。我必须接受它的挑战，把它看做忠诚和平等的武器——信仰的武器。如果在这场诚实的斗争中，别的思想取得了胜利并控制了大多数（社会）舆论，那么我就没有道义用武力弥补证据力量的不足。”^②

综上所述，切尔诺夫用主观与客观相适应的原理推导出了贯穿于资本主义社会和俄国传统社会条件下的“普世原则”，完成了民粹主义的“普世化”，把民粹派理论推向了最高峰，因而也被称为新民粹派。但是，由于切尔诺夫把宗教看做“个人因惧怕死亡而表达的利己主义原则”，^③不能从传统的东正教中开发出永恒的道德，以致在建立在永恒道德基础上的资本主

① O. B. Коновалова, В. М. Чернов о путях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и, с. 40, 42.

② O. B. Коновалова, В. М. Чернов о путях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и, с. 44.

③ O. B. Коновалова,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деалы В. М. Чернов: взгляд через годы, с. 55.

义面前败下阵来，成为实用主义理论的牺牲品。

二 资本主义文化类型说

马克思说：“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①这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普世价值的经典概括。切尔诺夫根据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观点，把资本主义看做一种文化类型。他说：“在为实现社会团结和个性全面协调发展的斗争中，人类社会的进步是人适应人口及其需求发展而提高对自然力量权力的必要条件。但是，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这种提高不是在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经济，而是在个体经济分散竞争、生产资料私有制、把它们变成资本并脱离直接生产者的原则下进行的。由于这些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形式太狭隘，限制和扭曲了集体劳动形式和大规模社会生产的发展，所以，现代经济发展必然出现一些消极的、破坏性的方面：危机时走向极端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经济力量的白白浪费、高级经济形式在劳动力廉价或者容易间接剥削独立生产者时呈现出来的物质上的无利可图、工人群众的贫穷和无保障、为了生存和维持特权地位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自私自利的斗争、金钱的权力摧毁了日常生活的一切道德基础。”^②

切尔诺夫对资本主义的认识，首先肯定了社会化大生产，其次批判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对集体主义道德的损害。切尔诺夫的指责是片面的。首先资本主义不仅仅是简单的社会化大生产，而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利益对抗条件下的社会化大生产。“这种利益上的对立是由他们的资产阶级生活的经济条件产生的。资产阶级借以在其中活动的那些生产关系的性质绝不是单一的、单纯的，而是两重的；在产生财富的那些关系中也产生贫困；在发展生产力的那些关系中也发展一种产生压迫的力量；这些关系只有不断消灭资产阶级单个成员的财富和产生出不断壮大的无产阶级，才能产生资产者的财富，即资产阶级的财富；这一切都一天比一天明显了。”^③马克思的话清楚地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一定产生出私有制和一大批无产阶级，集体主义道德的破坏和劳动力的“浪费”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

切尔诺夫最不认同的就是这种必然性，他总是从文化的角度对它做出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04页。

②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00 - 1907. 6, Т. 1, с. 273.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3页。

道德追问。但是，切尔诺夫不明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背后正是基督教文化，是对伦理道德文化的一种革命，或者叫资本主义精神。

资本主义建立在社会分工的基础上。随着人们交往范围的扩大，基于伦理道德之上的集体主义越来越成为个人发展的障碍，抑制了社会的进步。集体主义的藩篱必然要被打破。然而，习惯于集体生活的人虽有脱离集体的愿望，但也害怕脱离集体的风险。这样一来，只有当个人脱离集体的愿望超过脱离集体风险的时候，个人才有冲出集体的可能。

基督教信仰为习惯于集体生活的人提供了这样的可能。它不仅能满足个人发展的要求，而且能给比宗法集体更大的集体——社会带来不求任何回报的无私的爱。基督教伦理产生资本主义伦理，个人从对天职负有责任^①的愿望出发而理性组织社会生活。俄国的官方东正教价值观虽然也教育人民为上帝付出一切，但是它仅仅停留在“容忍政权”的偶像阶段，抑制了人民的创造性。民粹派试图以推翻偶像的办法激活创造性，结果遭到了“人民的残酷报复”。^②

于是，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俄国政府与社会陷入一种相互否定的革命之中，而正是这种从经济到政治领域的否定变成一场俄国从政府到社会的精神解放。切尔诺夫意识到了这种悖论，用积极面和消极面表达了这种对立。积极面使“国民经济处在这样的状态：自由交换原则、个人自由和所有制的自由达到了每一个单独的国民经济部门生存所需的经验条件和经济发展的压力所能确定的相对制高点”；^③消极面表现在它的使用范围非常狭小，并造成道德沦丧。社会于是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被剥削阶级首先开展经济斗争，随后转入政治斗争。剥削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通过辛迪加和托拉斯控制生产和销售，把国家管理机关变成统治阶级的工具并使科学、文学和艺术从精神上和物质上服从自己。^④

切尔诺夫看到的生产力是人通过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产生的结果，而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的自由竞争机制。受宗法伦理的影响，切尔诺夫

① 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第38页。

② Н. Бердяев, Духовные основы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опыта 1917 – 1918 гг., Спб., Русский Христианский гуманитарный институт, 1999, с. 352, 351.

③ О. В. Коновалова,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деалы В. М. Чернов: взгляд через годы. Красноярск, с. 59.

④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00 – 1907. 6, Т. 1, с. 274.

把资本主义理解为获利的欲望，对赢利、金钱的追求。与此同时，他又希望通过技术的改进吸收资本主义的成果。这种矛盾的认识恰好说明切尔诺夫的认识处在宗法集体观念和公民社会观念的转变之中。

为了把这种反差协调起来，切尔诺夫发明了资本主义的类型论，把资本主义的内涵与不同国家进入资本主义的时间和空间结合起来。他认为，越早进入资本主义的国家，如英国、法国和美国，资本主义的积极面大于消极面；越晚进入资本主义的国家，如德国、东欧和俄国，资本主义的消极面大于积极面。较早进入资本主义的国家，大工业渐进发展，关注技术的进步，采用大规模的生产，工人集中。向高级阶段的转变是渐进实现的，一种形式的消亡和另一种形式的产生、破坏性和创造性之间比较协调。这样，资产阶级比较进步，遵循自由主义价值，工人阶级在赢得政治和经济自由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较晚进入资本主义的国家，从自然经济时代的最原始的形式直接跳进欧洲的最高工业形式，创造性和破坏性的过程没有适应期、稳定期，缺少均匀和渐进式的发展，结果，农业超过工业，经济依靠外资，民族资产阶级软弱、反动。这样的社会经济状况，不仅造成农民的无产阶级化，而且造成农民的赤贫，为工农联盟提供了现实可能。由于这些国家的政治问题没有解决，缺乏公民和政治权利，工人阶级必须使自己的经济斗争服从政治斗争。这一切造成社会主义思想在工人阶级中广泛传播。^①

切尔诺夫的资本主义类型论虽然能够解释英美与东欧国家资本主义的不同表现形式，但是却忽略了资本主义背后的价值观的革命。所以，在他的眼里，资本主义只有分散和组织。分散的古典资本主义变成了“奢侈的竞争和一切人为了消灭肉体与道德的生存和特权地位而反对一切人”；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则变成了“仅仅为了定额生产、片面操纵价格、以自己集中的经济实力给现代国家施加一切重力的金融寡头的利益，力图克服生产无政府状态，使国家隐蔽地或者冠冕堂皇地服从自己的专制统治”。^②

的确，资本主义在发展初期出现了严重的劳资对抗和经济危机，甚至到了帝国主义阶段，这种对抗转变成成为种族、民族和宗教冲突，工业国与农业国之间的冲突。但是，冲突的最终结果，个人主义在高度发达的基础

① О. В. Коновалова, Преодоление народничества догм—В. М. Чернов о типах 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эволюции. 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 XXI, №. 4, 2001, с. 60, 61—62.

② О. В. Коновалова,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деалы В. М. Чернов: взгляд через годы, с. 67.

上走向了社会合作，从而超越了宗法伦理道德的社会和谐，完成了精神的创造和升华。

所以，资本主义不只是一种文化类型，具有普世价值。切尔诺夫以类型论代替了对资本主义普世真理的探索，使自己的观点显得软弱无力。

三 建设性的社会主义

当切尔诺夫认识到自己的矛盾之后，为了弥合与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分歧，提出了相互宽容的政治主张，1925年命名为建设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切尔诺夫把社会主义看做一种乌托邦。他说：“社会主义的过去常常被看做从乌托邦向科学的转变，同样，社会主义的今天和未来就是从科学向建设的或者有组织的社会主义的转变。”^①其次，切尔诺夫把马克思提出的“资本主义没有释放出最后的能量就不会灭亡的观点”归结为经济宿命论，提出用建设者的经验这种“富于创造性和令人振奋的乐观主义代替悲观主义”。^②再次，建设性社会主义的问题就是“为社会主义培养个性的伟大的文化历史问题”，^③这样，切尔诺夫把真理变成了乌托邦，把体现基督教价值观的利益博弈变成了简单的文化宽容，变成经过资本主义及其立宪改革的城市道路和通过劳动经济、直接的合作社——村社社会化的农村道路^④之间的协调，知识分子则成为调停者。

切尔诺夫的建设性是一种主观臆断，是对看似都具有“社会性”的两种文化本质的忽视。

切尔诺夫倡导的建设性社会主义首先是土地社会化。土地社会化有三个含义：第一，消灭土地所有权并退出商品流通；^⑤第二，确定土地使用权，同时依靠劳动获得土地；第三，由选举产生的中央和地方机构实现对土地的管理。^⑥切尔诺夫提出不同于罗马法体系的使用权概念，源于俄国村社农民根深蒂固的土地理念，即土地是无主的，是上帝的财产，“像阳光和

① В. М. Чернов, Конструктивный социализм, М., РОССПЭН, 1997, с. 12.

② В. М. Чернов, Конструктивный социализм, с. 20.

③ В. М. Чернов, Конструктивный социализм, с. 22.

④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17. 10 - 1925, Т. 3, Ч. 2, М., РОССПЭН, 2000, с. 663.

⑤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00 - 1907. 6, Т. 1, с. 362.

⑥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00 - 1907. 6, Т. 1, с. 277 - 278.

空气一样不可能属于某一个人所有”，^① 只有劳动才能获得土地，这就是村社的劳动资格（право на труд）和劳动权利（право труда）概念。^② 俄国农民形成这样的土地观念和集体主义思想，源于俄国地多、人少、土地不容易耕作的国情。正是这一点形成了俄国农奴制的基础。^③ 切尔诺夫建议，在村社的基础上，建立生产者合作社，逐渐引导农民成为独立的生产者。

其次是工厂的社会化，切尔诺夫称之为辛迪加化。切尔诺夫说，革命的辛迪加主义把辛迪加和劳动交易所看做新社会肌体的骨架。除了辛迪加之外，还有合作社、职业联合会等，它们都脱胎于旧社会。正是这些机构把工人集中起来，同时让他们学会了服从。从法律意义上讲，辛迪加是公民自由加入的私法组织，只受道义约束。如果把辛迪加扩大，变成由工人可以参加的职业联合会，那么，辛迪加就会从私法组织变成半公法组织。这样，辛迪加不仅是组织生产的机构，而且变成解决劳资纠纷的机构，变成加快消灭雇佣劳动制度本身的手段。^④

土地社会化依据的是习惯法。习惯法虽然也是法律，但是，它建立在满足农民基本生存需求的基础上，缺乏对自我能力的开发意识。从土地是无主的这个认识出发，承认土地社会化也就等于宣布个人劳动成果可以任意剥夺。所以自由民粹派代表科列涅夫（Н. Ф. 安年斯基）坚决反对废除土地所有权，提出土地国有化，给予人民土地使用权的观点。^⑤ 由于土地所有权的不明确，1917年切尔诺夫主政农业部的时候，迟迟不能与土地所有者达成一致，造成土地的抢劫风潮和农村经济的动荡。^⑥ 不明确的政策很快让农民和社会革命党发生分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对立。切尔诺夫认为这是土地所有者不好说话，其实是两种价值观——维持生存和自立自强价值观的对立。

工厂辛迪加是为了自我开发而发展起来的，属于股份公司，以营利为目的，用切尔诺夫的话说是私法组织。切尔诺夫以工厂主给予工人平等参

① Ю. С. Пивоваров, Русская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ь, русская власть, русская мысль, Росс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2002, № 1, с. 12.

② В. М. Чернов, Конструктивный социализм, с. 120.

③ Л. В. Миров, Великорусский пахарь и особенность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процесса, М., РОССПЭН, 2001, с. 434.

④ В. М. Чернов, Конструктивный социализм, с. 88, 90.

⑤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00 - 1907. 6, Т. 1, с. 285.

⑥ Т. В. Осипова, Российское крестьянство в революции и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войне, М., Стрелец, 2000, с. 29.

与权利为由，把辛迪加变成职业联合会，从根本上改变了辛迪加的性质，使其具有了宗法特征。

通过土地社会化，切尔诺夫最终把国家变成一个伟大的全俄土地村社，最终摆脱对国家的崇拜。这样，不仅“克服了村社的狭隘性和有限性”，而且“使农业和农夫直接进入未来的国家”；通过辛迪加化，让资本家慢慢放弃工厂公社中的专制特权，承认工人不再是工厂个别的参访者，而是有组织的集体；雇用和解聘工人都要通过集体实现。最后，切尔诺夫把社会化等同于“从唯一和绝对的精神上消灭所有权……从此以后，国家不应再是独裁者。独裁应该从国家法中删除，不仅删除君主独裁，而且删除人民独裁，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独裁以及整体对个人的独裁”。^①

从反土地所有权到反专制政权再到反权力本身，切尔诺夫混淆了公民权利和宗法权利。尊重人权不是废除权力，而是对权力给予约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彼得一世以来的专制政权发展了俄罗斯的个性化原则。不同的是他利用了政治手段，因而具有强制特征。利哈乔夫把这种特征称为巴罗克式风格，即自信，与上帝的对抗、对宗教不敬同时又无疑笃信上帝等许多矛盾的本性。^②这种矛盾正是对善恶的超越和对习惯的批判。切尔诺夫忽略了彼得专制的精神性质，试图用人民集体反对专制制度，结果犯了用宗法伦理代替理性精神的错误，重复了民粹派前辈“人民专制”^③的悲剧。

切尔诺夫的社会化概念触及了俄国人的精神。在俄国村社制度条件下，农民认为占有财富是不道德的行为，金钱总是通过违背良心的不正当途径得来的，拥有财富就是损害别人的利益，甚至认为，谁积累财富就是迈向地狱。这种观念支配下的农民即使被吸收到合作社当中，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改变财富观念，更不会合作发家致富。进城的农民虽然进了工厂，但是他们对物质财富的追求仅仅是满足功利主义的欲望，内心仍然倾向于过安稳的生活，不愿意为财富冒险。因为在他们的心里，自由就是对制度的挑战，就是暴动。暴动虽然使得他们获得了自由，但是自由成为他们的沉

① В. М. Чернов, Конструктивный социализм, с. 282 - 283, 286, 303 - 304.

② 德·谢·利哈乔夫：《俄罗斯思考》下卷，第25、28页。

③ 人民专制，即人民是一个抽象的整体，它只能由少数英雄来代表，其余的人则通常落后、僵化、思想一贯保守，只是1后面的0。参见金雁、秦晖《无产阶级专政与“人民专制”》，《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7年第3期，第12页。

重负担，不忏悔就会死去，如果忏悔，就要请求沙皇、人民和村社的宽恕。沙皇、人民、村社永远正确。^① 而资产阶级的财富精神不再侵害他人利益，也不违背社会秩序，相反，获得财富、促进社会进步是对上帝的荣耀。“这样一种态度绝对不是天然的产物……只能是长期而艰苦教育的结果。”^② 切尔诺夫直到革命结束的时候才认识到这一点，因而成为自己理论的牺牲品。

第二节 社会革命党纲领

一 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划分

和社会民主党一样，俄国社会革命党的纲领也是从序言开始，阐述了世界发展过程的本质特征，划分了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社会革命党以实现社会主义为最高目标，具体内容是：“劳动、所有制和经济社会化；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消灭，消除社会的阶级分化本身；在保留和发展社会机关国家正常文化职能，即有计划地组织共同劳动以便共同受益的情况下，消除社会机关阶级的、强制的、镇压的特点。”^③ 当最高纲领实现以后，“工人阶级不再由于社会财富的增长受剥削、受压迫，而是由此获得幸福和自由；人类的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不断发展；他们的语言既不会由于游手好闲和饱食终日而退化，又不会由于极端繁重和笨拙的体力劳动、不能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求而削弱，人类的个性在社会团结的基础上获得全面和谐的发展”。^④

切尔诺夫在提出最高纲领之后，根据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和农业非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提出了最低纲领。第一，在政治和法律方面，建立州、城市村社和农村村社广泛自治的民主共和国，赋予人民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罢工、选举、教育、诉讼等广泛的公民权利。第二，在工人立法方面，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确立最低工资和劳动保护，在一些部门禁止使用童工和女工，组织工会；在农业领域和土地关系领域实行土地社会化，实

① 鲍·尼·米罗诺夫：《俄国社会史》上卷，第338、345页。

②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44页。

③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00 - 1907. 6, Т. 1, с. 274.

④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00 - 1907. 6, Т. 1, с. 274 - 275.

行地方和中央的广泛的自治管理；征收累进所得税和保护性关税；广泛开展社会服务。第三，同专制制度进行斗争，召开不分性别、等级、民族、宗教，自由选举的缙绅会议（立宪会议），以便消灭专制制度，重建现代秩序。^①

综观整个纲领，存在着诸多问题。首先，从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具体内容来说，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有重复的地方。最高纲领非常具体，涉及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最低纲领也非常具体，也涉及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它们的不同仅仅是最低纲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允许资本主义的工业和非资本主义的农业同时发展，工人利用辛迪加同资本家做斗争，把它变成发展自己的场所；农民利用村社和合作社同封建主做斗争，把它变成自己的自立机构。当工人和农民成长起来以后，或者通过选举的方式，或者通过“临时革命专政”夺取政权，实现更高层次的联合，完成最高纲领的建设。其次，最低纲领向最高纲领的过渡是少数革命的知识分子、工人和农民在建设的过程中实现的精神升华。切尔诺夫对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抱信心，认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最终结果就是经济权力、政治权力和宗教权力的融合，阻碍了个性的独立、社会的和谐。因此他主张土地社会化，实行地方自治，把管理机构从榨取财富的职能变成文化职能，实现俄国法律秩序的构建。

纲领公布以后，以上两个矛盾立刻反映到左右两派代表中。右派代表米亚科京说，纲领是社会民主党纲领的翻版。首先，纲领把工人和人民进行了混淆；其次，没有明确区分近期目标和远期目标，最终目标如何也不太明确。既然纲领不否认最终的目标是全人类的自由和解放，那么为什么还要规定一个阶级的范畴，一个民族的范畴？左派最高纲领派代表波罗申说，既然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仅仅是土地社会化和生产社会化的区别，为什么不把贯穿于土地社会化中的革命精神直接扩展到工厂，实现生产社会化，以此实现社会所有代替私有的目标？^②

切尔诺夫对于代表质疑的回答，完全暴露了他社会学说的缺陷。首先，他指出，社会主义最高目标在于对社会的道德论证。他说：“直到现

^①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00 - 1907. 6, Т. 1, с. 276 - 278.

^②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00 - 1907. 6, Т. 1, с. 283 - 284, 295.

在，我认为社会主义的道德基础就是努力从历史个性的角度、个性全面和谐发展的角度以及预示社会团结胜利的角度，合乎规律地分析整个历史进程。在毫不忽视社会团结内部命运的反面——个性命运的情况下，分析社会现象和最严谨的现实主义之间的因果联系，这就是说，理论研究与道德评价、世界观的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真情真理和正义真理要不断融合。”^①然而，在切尔诺夫眼里，由于道德论证只是人的一种感觉，一种乌托邦，虽然乌托邦发挥了预测未来的作用，但是，“乌托邦在一点上是不行的，即试图确定遥远未来的社会制度，它们不能提前预测主要的框架之一，即未来的技术状况”。随后，切尔诺夫慨叹道：“人的智慧在构建新制度的时候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探到自然的奥秘？它能够开发哪些力量为人类的需求服务？与此相适应，生产力能够得到怎样的发展？”^②对人智慧的怀疑表面上看来是理论要经过实践检验的问题，实际上是对人的智慧缺乏信任。而对人的智慧充满信任不是哲学问题，而是宗教问题。由于俄国的东正教长期充当人民的监督工具，丧失了应有的独立性，在纷繁的社会变革面前装聋作哑，弄不明白、害怕，甚至认为这一切都是多余的。^③宗教思维的发展直接导致切尔诺夫对宗教的否定。而宗教对人性关怀的缺乏，直接导致认识上的功利主义。

其次，法律框架解决不了信仰问题。在最高纲领中，切尔诺夫大胆提出消灭私有制，通过所有权的社会化最终消灭阶级分化本身。阶级分化没有了，社会和国家管理机关就变成了文化机构。生产分工、社会分工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切尔诺夫在这个问题上也非常认同，他把这个称做资本主义的优势，把马克思也尊奉为经济学领域的伟大导师。研究农民习惯法的专家波莫尔采夫（М. В. 维什尼亚科）甚至建议把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贫困化问题从纲领中删除。既然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带来了物质利益上的进步，个人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为什么要把资本主义创造力引发的道德重塑看做是剥削分子的寄生思想，而从根本上否定私有制和社会分化本身呢？这不同样是把洗澡水连同孩子一起倒掉吗？切尔诺夫的根本问题就出在把资本主义看做资本家残酷剥削的结果，是一种非道德的行为，把马克思关于

①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00 - 1907. 6, Т. 1, с. 307.

② В. М. Чернов, Конструктивный социализм, с. 13.

③ С. Н. Булгаков, Христианский социализм, Новосибирск, Наука сибирское отделение, 1991, с. 36.

资本主义带来的阶级斗争激化的说法看做“纯经济问题”，而不是社会政治问题。他把阶级问题纳入整个社会领域，把构建自己的社会学看做自己的贡献。更有甚者，他把知识分子作为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道德君子，引导陷入“经济泥潭”的“暴民”——工人、农民走出困境。^①

显然，切尔诺夫的认识是片面的，是俄国社会极端功利、文化极不发达的表现。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显然是一种社会理论，只不过这种社会是马克思所讲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西方社会之所以发达就在于经过了宗教改革，实现了人从讨厌财富到为上帝创造财富的转变；经历了启蒙运动，相信人能够通过自己的理性解决这个社会的问题。马克思正是解决了这样的信仰之后，才确立了工人在经历了资本主义的炼狱之后实现彻底解放的历史使命。所以，马克思的工人阶级的绝对贫困化理论绝不是一个经济判断，而是一个道德判断。工人只有经过资本主义的炼狱才能达到精神的升华，这是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切尔诺夫关于马克思工人阶级绝对贫困化的经济判断是一种误读。俄国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正好说明俄国没有经历宗教改革。所以，俄国的问题不是经济改革问题，也不是政治改革问题，而是宗教文化改革问题。切尔诺夫认识到了把俄国的管理部门变成文化部门，否定管理机关的经济职能和社会职能，恰好说明俄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没有达到把管理部门变成文化部门的程度。而俄国通过国家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也正是文化不发达的表现。

所以，国家和社会都是个人不断完善和发展的产物，绝对不是个人杜撰的东西。知识分子超然于世外，做道德君子，刻意回避国家和社会机构是幻想的产物。正是这样的虚假认识导致社会革命党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混淆不清和实用主义，也导致最低纲领的矛盾以及党内的分裂。

二 党的最低纲领

社会革命党的最低纲领包括政治法律纲领和经济纲领。社会革命党希冀通过纲领的实施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打进一个楔子，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的目标。然而，由于其学说的内在矛盾性，造成了最低纲领的内在矛盾。

1. 矛盾的政治纲领

1861年农奴制改革之后，虽然社会有所发展，但直到1905年还没有成

^①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00 - 1907. 6, Т. 1, с. 293, 311, 311; В. М. Чернов, Конструктивный социализм, с. 19.

熟到公民社会的程度，至多只是朝着这个方向有所演进，^① 所以，切尔诺夫提出的建立民主政权的目标是不切实际的。纲领说：

在政治和法律方面，建立的民主共和国无论在城市和乡村，州和村社，都要具有广泛的自治权利；在处理各个民族之间的关系方面，要尽可能地广泛采用联邦制原则；承认各民族具有无条件的自决权；不小于20岁的所有公民，不分性别、宗教和民族，有直接、秘密、平等、普遍的选举权；按比例分配代表；直接的人民立法（全民公决和创意权）；对所有公职人员随时选举、撤换和审判；实行完全的信仰自由和言论、出版、集会、罢工及结社的自由；实行完全的普遍的公民平等；实现完全的国教分离并宣布宗教为个人的私事；实行义务的、平等的、由国家承担的普遍的世俗教育；语言平等，免费诉讼；取消常备军，代之以民兵。^②

纲领首先说在城市、乡村，州和村社，都要有广泛的自治权利。什么是自治权利？按照列昂诺夫的解释就是公民权利。^③ 公民权利不仅包括权利，而且包括义务。所谓直接的选举权、受教育、服兵役等不仅是权利，更是义务。然而，从纲领的叙述来看，首先，切尔诺夫站在了人民受到虐待的立场上，要求给予人民普遍的权利，甚至要求解除人民保卫国家的义务。显然，这对于安全处在第一位的俄罗斯来说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其次，俄国人民没有能力履行自治的权利。民粹派纲领中说：“人民群众对政治完全没有兴趣，也不理解，更谈不到教育他们去积极进行政治活动了。在工人中间传播政治理想要容易得多，但数量太少，为此必须有农民群众的协助和支持，而农民群众自己没有政治理想。因此根本改变政治制度的问题比起土地变革的任务来自然就退到次要地位。政治变革只能在土地变革之后发生，所以，政治变革也必然与社会变革交织在一起。”^④ 这个认识经受了民粹派到农村去的考验。即便到了1905年，农民提出的要求仍然是

① 鲍·尼·米罗诺夫：《俄国社会史》下卷，第149页。

②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00 - 1907.6, Т.1, с. 276 - 277.*

③ *М. И. Леонов,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в 1905 - 1907 гг, с. 106.*

④ 《俄国民粹派文选》，第603~604页。

土地要求。再次，纲领给人民提出的社会经济权利仍然是权利而不是义务。如在工人立法方面，保护工人阶级的精神和体力，尽可能地缩短劳动时间，制定最低工资和劳动保护；在税收领域，征收累进所得税和遗产税，消除间接税、保护性关税和所有对劳动施加的所有普通税。^①而实际上，俄国的大部分税收来自农业领域，即便是富有者也非常贫穷，俄国需要向西方举债才能完成工业化的进程，才能具有立足之地。从以上三点可以看出，社会革命党的政治纲领仅仅是知识分子从西方社会主义纲领中剽窃过来的不切实际的口号。

社会革命党把争取政治自由放在第一位并不能真正说明社会革命党放弃了民粹主义的主张。正如一大代表菲尔索夫所说：“我们提出把政治自由放在第一位，是因为在实现政治要求之前无论是土地社会化、八小时工作制以及最低纲领中的其他经济要求都是不能实现的。”争取政治自由是不得已而为之。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社会革命党对于未来社会政权的性质未置可否。它在纲领的序言中提出在必要的时候建立“临时的革命专政”，但在纲领的最后又提出在资产阶级的范围内加强政治民主化，保证工人抗衡官僚，既反对国家资本主义，又反对国家社会主义，在自由选举的基础上重建社会制度。^②列昂诺夫根据萨拉托夫委员柳斯季克信中的话“土地社会化只有在资产阶级制度下实现”而断言未来的社会制度是资产阶级制度是不公正的。^③切尔诺夫之所以出现模棱两可的情况，原因在于他没有弄清楚什么是资产阶级政权，什么是无产阶级政权，充其量也只是从理论上开始认识阶级这个概念。当然，他也犯下了把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劳动的知识分子加以混同的逻辑错误。

当然，社会革命党最低政治纲领尽管存在着逻辑上的错误，但切尔诺夫凭借着知识分子的道德热情，积极投身于对农民问题的研究，他提出的土地社会化纲领对于解决资本主义条件下农民的解放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也是社会革命党在1917年立宪会议选举中赢得选举的重要原因之一。

2. 突破社会危机的土地社会化纲领

土地问题是切尔诺夫关注的核心问题。虽然切尔诺夫在政权问题上怀

①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00 - 1907. 6, Т. 1, с. 278.

②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00 - 1907. 6, Т. 1, с. 328, 276, 278.

③ М. И. Леонов,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в 1905 - 1907 гг., с. 108.

有太多的感情成分，但是这是他基于对农民的爱，有些爱屋及乌。也正是这种爱使得切尔诺夫认真地调查了俄国农民问题。

农民的土地问题早在农奴制废除之前就已经存在，主要表现为农民缺乏积极性和独立性，生产效率低下。亚历山大一世和尼古拉一世根据西方自由主义原则进行农奴制改革，但成效不大。1803年颁布的自由农民法令解放了47000余名农奴，占全部农奴的0.5%。1842年基谢廖夫进行的“义务农民”的改革只使2.5万人成为义务农民。自由主义改革成效不大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农民没有能力管理自己。正如卡拉姆津所说：“虽然他们通常是老实的、值得尊敬的好人，但他们的整个精神结构打上了数百年来奴隶地位的烙印。”^①

1861年农奴制改革并没有改善这种状况，出现了农奴制残余大量保留的情况。米罗诺夫通过农奴制前后农业发展状况的比较分析得出结论：农奴制关系是被自上而下废止的，而不是从自身内部瓦解的。从经济角度讲，农奴制经济尚未完全发挥其潜能。广大的农民和地主尚未作好在市场经济下实行新的生产方式的准备。^②

俄国的农奴制是广泛的，从下至上，从农民至皇室，覆盖了整个社会，涵盖了所有的国家制度。^③虽然贵族、大商人从叶卡捷琳娜二世开始就得到了解放，但是到20世纪初期，农奴制残余仍然大量保留着，特别是在人们的思维观念中，对财富的憎恨是普遍现象，^④形成自由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对立。

俄国人性的觉醒是解决农奴制的关键，这首先产生于贵族知识分子之中。随着贵族自由主义浪潮在社会的普及，形成了强大的革命运动。然而，革命运动当中关于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道路仍然在普鲁士道路和美国式道路之间徘徊，忘记了俄国自己的国情。了解了这些情况之后，切尔诺夫提出了土地社会化主张。

切尔诺夫的土地社会化纲领主要内容如下：

在土地政策和土地关系问题上，社会革命党给自己提出的目标，

① 姚海：《近代俄国立宪运动源流》，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第41、65、52页。

② 鲍·尼·米罗诺夫：《俄国社会史》上卷，第423页。

③ 鲍·尼·米罗诺夫：《俄国社会史》上卷，第426页。

④ 鲍·尼·米罗诺夫：《俄国社会史》上卷，第353页。

是为了社会主义和反对资产阶级所有制原则而利用村社和一般劳动的观点，利用俄国农民的传统和生活方式，特别是秉持土地是所有劳动人民的共同财产的观点。在这些方面，党将支持土地社会化，即支持土地不再属于某些个人或集团私有，而把它变成全民财产。

社会化的土地将由中央和地方人民自治机关支配，即由从民主组织的无等级的农村村社到国家来支配（移民、迁徙、管理储备土地等）。使用社会化的土地，应该平均的劳动的原则，即在个体和合作劳动的条件下，通过征收社会需求税，在使用租金的条件下保证需求定额；在土地的使用权从一个人和集团转给另一个人和集团的条件下，给土地改良予以补偿。土地不经任何赎买转为社会所有，由此出现财产转移损失的人，只在适应新的经济环境时享有社会支持的权利。^①

土地社会化纲领涉及了土地所有权、劳动权利、雇佣劳动和土地管理问题。

土地社会化最重要的原则就是消灭土地所有权。切尔诺夫说：“土地社会化不是必须把没收的土地交给谁所有，而是完全脱离罗马法的所有权体系。既不是把土地变成村社和州的财产，也不是简单地把它变成现代国家财产，而是把它变得无主，从而成为全民财产。”^②

切尔诺夫废除私有制不是因为痛恨私有制，而是基于俄国农民的现实状况做出的选择。首先，俄国农民对于土地一直有一个土地无主的观念。其次，俄国土地开发并不容易。据米罗夫研究，俄国土壤天然肥力低，特别是农民的劳动时间不足，导致农业技术水平低、耕地少及农业劳动生产率低。要想在收益低、不稳定并带有风险的农业条件下生活，农民只有团结一致，成立互帮互助的村社，这样也就必然延缓了土地私有制的发展。^③尽管鼓励私有制的资本主义的改革实行了半个世纪，但是在斯托雷平实行改革的时候，农民占有的土地为欧俄所有土地的 17.3%，即 1.387 亿俄亩的土地中的 2400 万俄亩，到 1911 年也不过达到 25%，即 3000 万俄亩。^④

①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00 - 1907.6, Т.1, с. 277 - 278.

②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00 - 1907.6, Т.1, с. 362.

③ 鲍·尼·米罗诺夫：《俄国社会史》上卷，第 38 页。

④ Г. И. Шмилев, Национализация земли в теоретических схемах большевиков и в реальности,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2003, №2, с. 34.

可见资本主义个人开发的成效并不明显。再次，俄国拥有大量的土地，勾起了俄国人对土地的贪欲，开发土地变得越来越艰难。据人民社会党领导人佩舍霍诺夫说，当农民在杜马中获得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的时候，农民最大的愿望是“想获得更多的土地”，革命巩固和发展了这种本能。^① 基于以上情况，俄国的土地问题不是所有权问题，而是使用权问题。

土地社会化的提出优先解决了这个方面的问题。纲领规定，土地归社会所有，这些土地不再是政府、官员、贵族地主用于剥削的对象，而是属于亲自耕种土地的人。土地社会化一方面从法律上制止了人们的土地贪欲，另一方面明确了劳动在土地占有中的作用，从根本上支持了农民开发土地的愿望。

土地社会化第二个要点就是土地使用的两个原则，一个是平均使用土地的原则，另一个是劳动原则。平均使用土地的原则确立了人们的劳动权利，体现了社会公正的原则；提倡劳动的原则促进了人们的劳动开发，满足了人们的劳动习惯。

土地社会化只是土地退出商品流通，但允许使用雇佣劳动，被开发的土地转让时给予资金补偿，充分体现了劳动价值论原则。

切尔诺夫最反对的是国家和行政机关对劳动者的剥夺，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对农民最大的榨取——国家的掠夺，土地社会化纲领加强了对土地的管理。这就是土地的民主管理。不仅村社的管理机构是选举产生的，就是州、国家的管理机构也是选举产生的。这样，国家的职能就不再是剥夺人们的工具，而是为劳动者分忧、解难的工具。

土地社会化的难点在于抑制弱肉强食的掠夺，这不仅要改变国家制度，而且需要人性的觉醒。切尔诺夫的土地社会化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进行的，面对资本主义的巨大压力，不经过剧烈的社会动荡，俄国的整个社会形势根本得不到扭转。所以，尽管切尔诺夫提出了问题，但是解决这些问题异常艰难。

由于切尔诺夫的观点在俄国没有实施的希望，在国家制度问题、思想观念问题上，党内发生了极为严重的争论。随后，社会革命党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在理论争论上，削弱了内部的力量。

社会革命党的民主理论建立在道德基础上，它与资本主义的发展格格

^① Г. И. Шмилев, Национализация земли в теоретических схемах большевиков и в реальности, с. 36.

不入。俄国只有两条路：或者放弃帝国主义观念，或者放弃俄罗斯的自我发展。俄国追逐西方的过程已经很久了，精神上的彻底觉醒则需要持续的社会动荡。恶成为善的直接源泉。

第三节 社会革命党的第一次分裂

列宁在1906年9月评述社会革命党的一篇文章中曾指出：“社会革命党的纲领草案表明它显然正在经历‘从民粹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转变。实行这样的转变的党，内部必然发生分裂是显而易见的。”^①

事实正是如此。社会革命党在组建统一政党的过程中，在纲领和策略问题上出现了严重分歧。他们利用俄国自由的政治环境，分别在1906年9月20日和10月12日成立了劳动人民社会党和社会革命党最高纲领派联盟（CCPM）。列宁在谈到社会革命党分裂时指出：“社会革命党则是在第一次试图公开行动一下，证明自己是作为一个真正的党在行动的时候，便分裂成了三派：左派——最高纲领派；中派——旧式的社会革命党；右派——机会主义者（或者叫‘合法主义者’、‘劳动人民社会党人’）。”^②

最高纲领派属于社会革命党中的左派，最早被称为“农业恐怖分子”，其领导人是M. H. 索科洛夫、E. M. 乌斯季诺夫。1905年，他们在日内瓦出版《自由论坛报》和小册子，宣传农业恐怖和工厂恐怖，同年在别洛斯托克组织“社会革命党联盟”。1905年末，B. B. 马祖林成立“莫斯科反对派”，大力发展恐怖运动。最高纲领派曾参加社会革命党“一大”，不满社会革命党的温和主张。他们先后策划了暗杀内务部长斯托雷平和抢劫“莫斯科相互信贷组织”的活动，广泛宣传最高纲领主义，把恐怖看做实现最高纲领主义的唯一手段。1906年10月12～24日，最高纲领派在芬兰召开成立大会，成为独立政党。1906～1908年是最高纲领派的活跃时期，组织遍及许多省、县，从事的恐怖活动数量超过50次。1910年，最高纲领派逐渐销声匿迹。该派活动分散，人数没有确切统计，人数最多的是彼得堡小组，1907年曾达400人。^③ 1917年10月15～21日，最高纲领派恢复活动，同布尔什维克一起反对临时政府，推动劳动人民向“劳动共和国”过渡。

① 《列宁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84，第391页。

② 《列宁全集》第13卷，第391～392页。

③ А. Ф. Жуков, Идей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крах эсеровского максимализма, с. 20.

他们曾参加第2~7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并被选入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年分裂，部分加入俄国共产党，部分加入左派社会革命党。

劳动人民社会党前身属于民粹主义改革派，围绕《俄罗斯财富》开展活动，以理论分析见长。^① 1905年革命之前就形成了自己的思想纲领和策略原则，主要代表人物有米海洛夫斯基、B. Г. 科罗连科；A. B. 佩舍霍诺夫、安年斯基、B. A. 米亚科京。民粹主义改革派主张渐进发展社会主义，与各种政治组织保持联系。社会革命党制定纲领的时候，他们与切尔诺夫共同发表文章，探讨农业和策略问题。^② 1904年，参与“解放同盟”。1905年12月末，被邀参加社会革命党“一大”，在纲领和策略上与切尔诺夫发生了争执。

杜马的召开为民粹主义改革派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在头两届杜马中，他们帮助劳动团^③拟订“104人土地法草案”，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④ 1906年9月，民粹主义改革派通过吸收劳动团和左派立宪民主党，组建劳动人民社会党，公布了自己的纲领和组织构想。六三政变之后，逐渐淡出政治。劳动人民社会党一直保持知识分子特征，人数最多时达1500人。1908年开始走下坡路，1910年人数只有228人。^⑤ 一战中，坚持护国主义立场。1917年6月，与劳动团组合并，人数接近1万，参加临时政府和立宪会议选举。1918年8月，被苏俄政府取缔。

通过以上对最高纲领派和劳动人民社会党的简单叙述，可以看出，最高纲领派的特点在于立即实现社会主义，他们把社会主义当成了劳动革命；而劳动人民社会党则强调为人民争取做人的权利，因此从土地方案做起。

劳动人民社会党纲领强调最多的是为人民争取人和平等权。其纲领

① Д. А. Колесниченко, Аграрные проекты трудовой группы в I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думе,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записки, Т. 82, с. 47.

② Н. Д. Ерофиев, Народные социалисты в первой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с. 44.

③ 劳动团又称劳动派，是1906年国家杜马开幕后出现的农民党团，主要成分是农民和农民知识分子，领导人 A. 阿拉季因、С. 阿尼金等。受自由民粹派和社会革命党的影响，他们曾在第一和第二届杜马选举中两次提出了104人土地法草案，表达了农民的土地愿望。参见 Д. А. Колесниченко, Трудовики в первой россий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М., Наука, 1985, с. 5-9, 277-284.

④ 科列斯尼琴科认为，劳动团的草案是独立拟订的，他们对比了自由民粹派和社会革命党草案，最终倾向于自由民粹派草案。参见 Д. А. Колесниченко, Аграрные проекты трудовой группы в I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думе, с. 61.

⑤ Н. Д. Ерофиев, Народные социалисты в первой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с. 131-133.

中是这样说的：

所有俄国公民，不分性别、民族和信仰，在法律面前都应平等。这样，男人和女人，俄国人、波兰人、亚美尼亚人、鞑靼人、犹太人，东正教徒、天主教徒、路德教徒、伊斯兰教徒、旧礼仪派、史达敦教派，所有的人都应获得平等的权利。

等级差别和特权应该消灭。贵族称号、市民称号、商人称号以及其他称号都应该取消。代替它们的只有一个共同的称号——俄罗斯公民。^①

纲领还列举了和社会革命党纲领同样的公民权利。从社会革命党的纲领中可以看出，由于切尔诺夫没有把俄国的人民权利与西方的公民权利区分开来，因而总是徘徊于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之间，纠缠于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划分上。显然，切尔诺夫受拉甫罗夫和马克思的影响，遵循从西方经验推导出来的社会主义理论。但他出于对农民的同情，又希望依靠农民建设社会主义，于是，基于这样一个矛盾心理，他在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化和村社的集体主义经济之间架起了消灭私有制和土地社会化的桥梁，在资本主义掌权的情况下，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即在政权上实现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在经济领域开展社会革命。切尔诺夫的最低纲领是从社会主义理论中推导出来的，但现实问题是，最低纲领应该回答“掌权之后的政党做了什么，能够做什么”^②的问题（Н. 拉基特尼科夫语）。也就是说，社会革命党不仅应照顾到农民与社会主义的对接，还要照顾到其他社会阶层与社会主义对接的问题，这就不可避免地涉及资本主义乃至其他主义在俄国的地位，所以，把最低纲领确定在为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做物质准备上，只能引起党内纷争和社会纷争，贻误现实问题的解决。

而劳动人民社会党则把主要目标瞄准在确立人权问题上，并把未来的政权称做“人民政权”，这样不仅避免了社会革命党在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之间的纠缠，而且还能体现古代俄国缙绅会议的特色。它在纲领中说：“党首先要达到的是在俄国通过人民代表实行管理，

^① Программы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партий России Конец XIX-начало XX вв., М., РОССПЭН, 1995, с. 210.

^②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00 - 1907. 6, Т. 1, с. 299.

其依据是：人民代表会议应该由人民选举的一个议会组成（国家杜马）……人民代表会议应该获得完全的立法权。任何法律不经它的意志不能颁布。所有其他权力机关不能停止或者废除它所通过的法律。”^①

劳动人民社会党虽然有些脱离俄国的现实，把人民代表会议确立为国家唯一的最高立法政权，但它明确有关国家权力的思想，在可以夺权的情况下积极建立政权，而在无法夺权的情况下则利用沙皇给予的合法机会，伸张自己的权利，表达自己的意见。它积极参与杜马活动，提出符合农民愿望的土地法草案，对于斯托雷平土地改革起到了应有的推动作用。

劳动人民社会党还提出如下具体措施：加强地方和州的自治，建立公民独立法院，废除死刑，确立军人的公民权，以民兵代替常备军；实行土地国有化，在私有土地转为全民财产时，由国家提供补偿，各种等级的份地仍留给土地所有者，发展劳动经济；所有人有权使用土地；但当地从事农业的居民优先得到土地；国家和地方自治局将采取一切措施支持劳动经济，特别是村社和劳动组合经济；立法确定工人劳动时间，逐渐增加工人参与管理工业企业；实行保险，征收所得税，增加教育投入；政教分离，社会机关和个人都有权自由开办学校，在内部事务上，学校有自治权；停止战争，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国家之间的争端；等等。

从以上列举的措施来看，劳动人民社会党站在普通劳动者立场上，就事论事，不刻意从价值观念上区分是资本主义措施还是社会主义措施；不具体提出是建立民主共和国还是君主国，只是强调宪法的作用，通过加强教育，改善国民相互仇恨的心理，通过和平的方式推动社会革命。

相反，最高纲领派则直接把社会主义革命称为劳动革命，直接表达了农民的愿望，从左的方面实现了农民价值观与政治经济政策的对接。该派在纲领中分析了俄国存在的各种性质的社会关系，如奴隶制关系、农奴制关系以及资本主义关系，但认为这些关系中没有正面的文化价值，而是完全归结为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归结为功利关系。^② 该派提出，只有消灭私有制，把土地和工厂收归国有，平均分配给劳动人民，才能实现全面的社会团结。该派对俄国保留了凝聚劳动人民的劳动公社表示欣慰，认为它将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桥梁。

最高纲领派真正体现了旧民粹派的意图，企图通过一次革命“直接过

① Программы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партий России Конец XIX-начало XX вв. , с. 211.

② Программы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партий России Конец XIX-начало XX вв. , с. 225.

渡”到村社社会主义，与社会革命党相比，显示了更强烈、更激进的革命性。在策略问题上，他们主张立刻发动革命，实现最高纲领，认为实行民主改革，与资产阶级政党达成可耻交易，就会把社会主义理想推到虚无缥缈的未来。他们否定国家杜马，否定历史上的任何社会关系，主张按照劳动原则重建社会。最高纲领派还不断煽动社会仇恨，从事恐怖活动并开展游击战争，把革命引向刑事犯罪和社会动乱，因而脱离群众，也丧失了进步意义。

1905～1907年革命为社会革命党提供了发展的契机，但由于在纲领问题上试图用一种社会伦理统摄整个分化的社会，陷入了理想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泥沼，因而丧失了革命的大好时机。

第三章

社会革命党的组织结构

第一节 社会革命党组织

一 组织特点

在政治纲领中，社会革命党不断声明推翻专制制度，实现民主，于是民主也成为党组织的原则。但是，纵观社会革命党的全部历史，民主制度一直得不到有效贯彻，总是受到专制和无政府的困扰。

据 M. 列昂诺夫考证，社会革命党直到 1905 年 6 月才提出自己的组织章程，由于分歧很大，通过的组织章程还是临时的。^① 为何社会革命党早在 1902 年就提出建党，却迟迟不提出组织章程呢？原因就在于对民主原则的争论。

组织章程的第三条规定：“承认选举原则是建立所有党组织的基本原则。”由于政党不能公开活动，选举显然经常受到限制。但是，根据党的政治纲领，“无论在城市和乡村，州和村社都要具有广泛的自治权利；在处理各个民族之间的关系方面，要尽可能广泛地采用联邦制原则；承认各民族具有无条件的自决权；年满 20 岁的所有公民，不分性别、宗教和民族，有直接、秘密、平等、普遍的选举权；直接的人民立法；对所有公职人员随时选举、撤换和审判；实行完全的信仰自由和言论、出版、集会、罢工及结社的自由；实行完全普遍的公民平等”；等等。现实与原则的不一致常常导致原则被搁置，甚至在组织章程的第三条不得不加上一条，“由于工作的

^① М. И. Леонов,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в 1905 – 1907 гг., с. 38.

密谋性条件，加聘权利成为对选举原则的临时修正”。甚至，参加章程讨论的一些代表提出设立两个原则：一个是现在使用的严格密谋的集中的原则，另一个是一有可能就要实施的民主原则。^①

民主原则时时受到考验。社会革命党的组建是从战斗组织开始的。战斗组织遵循的不是民主原则，而是严格的密谋原则。战斗组织的章程第2条说：“战斗组织享有完全的技术和组织上的独立性，有自己独立的金库，只通过中央委员会与党保持联系。”章程的第4条说：“中央委员会和战斗组织之间的所有关系通过由战斗组织成员组成的战斗组织委员会选出的特别全权代表维持。”第5条说：“战斗组织的最高权力机关是由其成员通过加聘充实的委员会。”^②由于战斗组织的保密性和独立性，常常出现战斗组织做了什么中央委员会不清楚的情况。战斗组织俨然成为会党，执行的是某个人的指令而不是集体讨论的决议。沙皇警察局的奸细阿泽夫通过加聘成为社会革命党的创始人，原因只是此人得到了战斗组织的创立者格尔舒尼的信任，是对社会革命党民主原则的最大讽刺。

如果说社会革命党在组建初期由于公开选举条件不够而出现密谋战斗组织的情况，那么，到了1917年社会革命党成为执政党时，情况应该有所好转。但事实上，1917年的俄国社会根本不具备组建民主政党的条件。住在奥尔洛夫省叶列茨克县的农民作家米·普里什文曾做过奥尔洛夫省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的代表，走遍了各县、各乡的他说：“农民把一些刑事罪犯选进各委员会和苏维埃。我打听到并确信，这个现象在我们那个地区带有普遍性。”在谈及为什么这样时，他说：

说真的，农村不能搞自治，因为村里全是自己人，而人们认为，只有外来人当权才起作用。比如，在我们村，谁也不能种白菜和黄瓜，因为邻居家的小孩和牛犊会全给你祸害掉。我曾多次提议对这种祸害菜地的事要罚款，但行不通。

“那这种事就得动刀子”，人们说。

村里太挤了，全是自己人，而权力是六亲不认的，权力没有亲人。

梅什科夫就这样当选了。这是个刑事犯，智力贫乏，房无一间，

①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материалы 1900 – 1907. 6, Т. 1, с. 247, 253.

②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00 – 1907. 6, Т. 1, с. 150.

地无一垅，一无所有，就是因为他成天板着脸，敢坚持真理，人们才选了他。他坚持的是什么真理？无人知晓。他拿什么活着？不是靠这个世界。他的权力也并非来自这个世界。^①

既然俄国无论是选民——农民，还是被选举出来的社会革命党员都是一些不着边际的人，俄国如何能够实行普遍选举呢？显然，这是社会革命党理论家的一相情愿，是一种从西方舶来的教条。

社会革命党理论家切尔诺夫在论证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灵魂时说：

自从宗教从政治领域被驱逐以来，自从自由的苏维埃公民性实行以来，人类除了共同的人类意识之外，再也没有最高的正确标准了。任何一个人，无论他多么聪明，也不可能希冀自己的看法没有错误，自己对这样那样的生活问题的解决不受指责。直接感觉人的伟大失去了保证，因为通常越是大人物，犯的错误也越大。所以，所有的意见、所有的建议、所有的制度都应该通过在彼此的自由竞争中获胜证明其正确，都应该赢得所有人，至少是大多数人的智慧。^②

切尔诺夫没有忘记真理有的时候会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但是他却不能说清楚为什么真理会掌握在少数人而不是多数人手中。他说：

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这不意味着，多数人总是不犯错误的。每到这个时刻，刚刚产生的真理几乎只存在少数人的头脑中，可能只在某几个人的头脑中。但这也说明了，它还只是刚刚产生的真理，即还处在萌芽状态，还没有完全巩固和成熟到排挤大众意识中与之竞争的旧“真理”。在这场思想斗争中，经过轮番的反对和批评，真理就会从萌芽状态转向发育、分化状态，真理中所有隐藏的东西扩展为丰富的可能性，它就会初步变成真理，而不是真理的一些迹象。^③

① 谢·卡拉—穆尔扎：《论意识操纵》，徐昌翰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第47、49~50页。

② В. М. Чернов, Конструктивный социализм, с. 568.

③ В. М. Чернов, Конструктивный социализм, с. 568.

切尔诺夫的叙述表明，在他的眼里，真理是人的一种意见，经过多方的辩论和批评，最终呈现出来。这样一来，真理失去了绝对性。少数人掌握的真理只是真理的萌芽状态，而萌芽状态的真理必须经过多数人的反对、攻击和讨论才最终成为真正的真理。多数人对于少数人来说是对真理的明晰。切尔诺夫最后得出结论：科学就是“思想的共和”，科学的基础就是最深刻的民主原则。^①

同样，切尔诺夫从真理即是多数人的意见出发，把专制看成从上面派来的，是神的启示和涂油的垄断者，就是把自己强加给社会的知识的垄断者。^②

这样，社会革命党就把人与真理之间的联系隔断了，真理变成了人的意见的总和，当然专制者也应该走下神坛，成为人民当中的一分子。

从1906年社会革命党确定这样的民主原则到1917年走上执政道路再到退出历史舞台，一直让切尔诺夫困惑的是人民依赖集体的惰性无论如何也不能消灭。为了解决这个困境，切尔诺夫提出了劳动资格的观点。劳动是针对非劳动说的，它将是所有人参与生活和国家管理的条件。^③

切尔诺夫之所以确定劳动作为参与生活和国家管理的条件，一方面是因为它能够把普通的劳动者纳入社会乃至国家管理者的行列，以实现平等的社会发展目标；另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是它能够把真理具体化，即普通人通过劳动体验真理，并从这个意义上，得出“社会主义是经济民主”^④的结论。

切尔诺夫从劳动出发为劳动人民争取到了参与生活和国家管理的权利，但是他不能回答不参加劳动的牧师、官员是否算作劳动者，是否应该给予他们参与社会生活和国家管理的权利。切尔诺夫从劳动是每一个人的权利的角度为过去的非劳动者申请劳动权利，同时提出比较正面的解决方法，把所有人变成劳动者。如果非劳动者不愿意成为劳动者，切尔诺夫认为可以采用匈牙利人的做法，如给予同志式的劝告，写入黑名单，减少股份直到开除公职，但不能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⑤ 因为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就是

① В. М. Чернов, Конструктивный социализм, с. 568.

② В. М. Чернов, Конструктивный социализм, с. 571.

③ В. М. Чернов, Конструктивный социализм, с. 576.

④ В. М. Чернов, Конструктивный социализм, с. 576.

⑤ В. М. Чернов, Конструктивный социализм, с. 578.

使他们失去了自决的机会。^①

切尔诺夫怀着“劳动者”的仁慈，把“非劳动者”的神的启示的代表者当做个人意志的强加者，从根本上否定了绝对的标准（真理），与此同时，又把自己杜撰的劳动标准强加给“非劳动者”，造成了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切尔诺夫提出的符合人民意志的劳动标准是否得到了人民的拥护呢？从奥尔洛夫省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的代表米·普里什文对切尔诺夫的描述就可以看出端倪。他说：

切尔诺夫是个微不足道的人物，这从他扭捏作态，面带微笑、言语空泛、说话费解又毫无内容就可以看出来。“农村”这个词他是用法语腔说出来的，还称自己是“庄稼人部长”。可以看出，他胸无点墨，不过，现在大多数“庄稼人部长”无不如此，这些部长现在是农村送到乡上，乡上送到县里，县里又送到首都。这批农村使者往往是农民从刑事犯中选出来的，因为他们受过苦，很不幸，没有家产，是自由人，因此他们个人不受任何损失便可替农民办事。他们可以速成学会必需的政治入门知识，说出的外文词语令人可笑，就像这位知识分子派出的使者切尔诺夫一样，说出的农村话总带个法语词 de，令人忍俊不禁。“庄稼人部长”和那些农村代表在心理上同真正的庄稼汉是抵触的。^②

切尔诺夫可以说为了组织农民费尽了心机，但换来的却是农民的不理解。当然，问题不是出在了农民身上，而是出在了切尔诺夫身上。他对农民的真正需求没有了解，对他们的能力也没有真正的认识。

切尔诺夫当然不是农民所认为的那样胸无点墨，但是，切尔诺夫所提出的观点并没有得到农民的理解。切尔诺夫像所有自由主义者一样，真诚地希望把农民从对集体的依附中解脱出来，让他们参与社会和管理。但是，俄国农村的民主主义，如俄罗斯学者科日诺夫所说，是“愚昧”农夫的民主主义，最粗糙，但也最深沉。试图从俄国的东正教、专制制度和人民性的文化传统中找出不同于西方文化的优势来的学者，认为自己的文化并不逊于西方文化。他们认为，西方的科学传统来自进步史观并取代了

① В. М. Чернов, Конструктивный социализм, с. 580.

② 谢·卡拉—穆尔扎：《论意识操纵》，第 47 页。

对上帝的信仰，而俄国的精神强调生产力的发展不能牺牲社会的协调。凡是有思想的人都认识到，巨大的科技进步已经使人类的生存本身到了灾难的边缘。^① 俄国的思想家从绝对真理的高度而不是从西方的进步史观角度对资本主义的科技提出批判，指出科技进步的同时也不能出现人性的堕落，是对资本主义产生的宗教伦理的回归和对资本主义的升华。

切尔诺夫错把资本主义的伦理当做了人的恣意妄为并试图用农民的宗法伦理加以替代，结果犯了取消资本主义宗教伦理的错误。而资产阶级追求私有制以及资本的竞争不是简单的对别人劳动的占有和权利的剥夺，而正是消除人身上惰性的方法，是精神解放的表现，是一种社会进步。俄国自亚历山大一世以来的保守派贵族所做的在维护君主制基础上对农民的一点一点的解放，也是根据俄国的精神特点所做的自由主义与传统的结合。如卡拉姆津所主张的，应该给予那些勤劳的农民拥有地产权利的权利，使他们逐渐在事实上成为能够支配自己的人，然后再考虑放弃地主对于农民的保护人资格的问题。^② 卡拉姆津做出的判断，一方面注意到了给予农民自由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还注意到了农民的宗法伦理特点。这样的判断当然不是把君主这个上帝的化身的所作所为以恣意妄为为借口一棍子打死，同时也照顾到了农民的要求。切尔诺夫简单地把西方的民主主义拿过来在农民头上实施，农民当然根据自己的价值观提出获得本属于地主的土地，但同时又从贪婪的惰性出发不承担开发土地的义务，反而要求政府和主人给予帮助。切尔诺夫没有办法了，这些在他眼里曾经可爱的人民在1917年成为了暴民，他不得不借助于资产阶级的力量启发这些不太可爱的人民，这就是切尔诺夫式的妥协政策，最终酿成民主专政的悲剧。所以，别尔嘉耶夫说：“对许多业已习惯压迫和不公正的俄国人而言，民主表现为某种固定而又简单的东西——它应该给人带来巨大福祉，应该解放个性。为了民主的某些不容争辩的真理，我们曾经准备忘记民主这个宗教如何为卢梭所宣布，又怎样为罗伯斯庇尔所实现，但它不仅未能解放个性和确立它不可剥夺的权利，而且是彻底镇压了个性，根本不想理会它的独立存在。国家专制政体无论是在最极端的君主政体中，还是在民主政体中，都可能存在。以人民政权为原则的形式上的专制政体的资产阶级民主便是这样……专制政体的本能和熟练技巧转化为民主，它们在所有最民主的革命中都占统治

① В. В. Кожин, Россия Век XX-й, 1901 - 1939, http://usinfo.ru/c4.files/xx1_02.html.

② 姚海：《俄罗斯文化之路》，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第113页。

地位。”^①

所以，切尔诺夫把民主原则确定为未来社会主义的灵魂，但由于不能理解民主原则的精神内涵，仅仅把追求自由看做一种意见的表达，结果，民主越发展，人们的行为越功利，而在内心里却越厌恶自己的革命。最终，社会革命党这个社会主义政党用自己的仇恨或者冷漠摧毁了俄罗斯国家，激起了俄国民众的精神反抗。社会革命党成为民主的牺牲品，而人民重新成为专制的基础。

人民建立与绝对标准（真理）的关系是其走向自治的基础。切尔诺夫对绝对真理的否定源于真理脱离人性。其实，真理通过人并构成人认识的相对性，并“不归结为相对主义，这就是说，它不是在否定客观真理的意义上，而是在我们的只是向客观真理接近的界限受历史条件制约的意义上，承认我们一切知识的相对性”。^② 俄国革命者从自由主义走向革命民主主义又最终走向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根据俄国社会的状况所做出的对人民一步一步解放，一步一步通过教育接近真理。列宁所做的从外部灌输一种思想给人民之所以不是个人意志的强加，是因为“它们对人的号召既不隐蔽，而且是大声疾呼。这些影响是促使人们行动的方向和标准，是完全公开对外宣布的，这些方向和标准同所宣布的社会价值是明明白白地公开联系在一起。”^③

二 组织原则的演变

社会革命党的组织章程经历了三次从兴盛到衰败的演变，从不与政府合作到接受政府，从探索民主自由的价值到寻找苏维埃的精神价值。鉴于社会革命党以农民劳动者为基础探索俄国劳动者的真理，经历了组织章程的不断演变，德国学者希德迈尔把社会革命党定义为“介于政党与社会运动之间的一种组织”。^④

社会革命党首先是一个密谋的知识分子小组型政党。最早的组织为通过恐怖运动宣传自己的战斗组织。战斗组织追求自由的理论宣传和恐怖唤

① 谢·卡拉—穆尔扎：《论意识操纵》，第45页。

② 《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第43页。

③ 谢·卡—穆尔扎：《论意识操纵》，第52页。

④ M. Hildermeier, Die Sozialrevolutionäre Partei Russlands, S. 32 - 33. См., К. Н. Морозов,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в 1907 - 1914 гг., Гл. 1, с. 2. <http://socialist.memo.ru/books/lit/morozov3/index.htm>.

醒，以此发动群众，具有强烈的密谋特点。

1905 ~ 1907 年革命中，社会革命党面对革命形势以及沙皇政府赋予的公开组建政党的机会，在建党原则上出现了分歧。经过讨论，1905 年末和 1906 年初第一次代表大会制定了临时组织章程，确定了民主原则和加聘原则作为组织原则。

第一次代表大会确立的建党原则以民主原则为主，加聘原则为辅，待条件成熟后，完全废除加聘原则，实行民主原则。^① 民主原则体现为如下三点。第一，入党条件宽泛。凡接受党的纲领，服从党的决定并参加一个党的组织都可以成为党员。第二，组织结构自下而上选举产生。中央委员会由中央委员、州、省和与省平级的县和城市委员会的代表选举产生，而这些代表是由党务会议根据人数比例确定的。省委员会由本省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而本省有权利的党组织都可以派代表参加省代表大会，包括城市组织、县级组织，乃至职业组织。城市和县级组织也按照省级组织办法选举产生。在省、市县委员会之上设立州委员会，由省和与之同等权利的城市和县组织组成的州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第三，定期召开各级会议。会议规定，党的代表大会一年召开一次，为了讨论和解决党的代表大会没有预见到和因条件变化而必须立刻解决的策略和组织问题，由中央委员会或所有州组织的半数以上提议，就可以召开党务会议。在特殊情况下，根据地方委员会或三分之一的地方党组织成员的倡议就可以召集党的所有地方成员的全体会议，如果可能，可以召开地方组织代表全体会议。加聘原则是指选举产生的委员会有加聘权，但加聘的人数不得超过选举产生的人数。^②

由于俄国社会政治条件以及社会革命党领导人密谋思想的影响，民主原则没有得到有效遵守。1905 年革命以后，由于民主制度的推行，社会敌视现象加重，出现了为民做主和人民自主的争执。社会革命党领导人对政府推行的自由主义改革并不满意，认为其有很多财产、社会地位、民族等方面的限制，同时对自由的程度也不认同。当社会革命党提出无限自决权和抽象个人自由的时候，遇到了很多的麻烦：首先，民族自决将造成波

^①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00 - 1907. 6, Т. 1, с. 249.

^②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00 - 1907. 6, Т. 1, с. 247 - 249.

兰、芬兰、高加索等地的民族独立；其次，所有人的自由将损害被剥削阶级的利益，有人主张应该突出强调工人阶级甚至粗工的权利。绝对的自由权利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变成了理想。不同阶层的人开始追求各自的利益，出现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

社会革命党不顾俄国的现实条件，在一大上根据理想制定了战斗策略，导致了自己的第一次失败。战斗策略分为两项，一为继续从事恐怖活动，加强在工人和军队中关于民主的宣传，引发工业恐怖和农业恐怖；另一为积极准备武装起义。^① 群众对民主权利的不解使得工业恐怖和农业恐怖变成了对国家和个人财产的抢夺，变成公报私仇的行为。社会革命党的形象严重受损。在切尔诺夫等人的干预下，社会革命党在1906年5月紧急召开第一次党务会议，调整战略。会议没有放弃战斗策略，但是提出要学着利用合法存在的机会，把党从密谋政党转变成民主选举的政党；社会革命党抵制杜马，但要通过杜马的劳动党团把杜马变成沙皇政府的反对派，争取普遍、直接、平等、秘密地召开立宪会议；暂时停止恐怖活动。^②

社会革命党的矛盾策略没有得到有效贯彻。战斗派利用解散杜马的时机发动工人、农民和军队起义，重建战斗组织，加强以中央为首的集中恐怖行动；妥协派以起义被镇压为借口，积极投身于杜马。为了适应形势，1906年9月，社会革命党召开了第二次党务会议，决定参加杜马选举和杜马活动，建立稳定的选民组织和群众组织。^③

策略的改变引起了党内的分裂。为了统一思想，社会革命党于1907年2月在芬兰的塔麦尔伏尔斯召开了第二次非常代表大会。会议在党的策略问题上发生了争执，以布列什科—布列什科夫斯卡娅为代表的超激进派仍然热衷于激烈的手段主张，继续发动起义，推翻政权；以切尔诺夫为首的温和派主张利用杜马和平推动革命进程。社会革命党党刊编辑部成员H. 卢萨诺夫提出了利用地方委员会参加杜马与加强恐怖的对立策略。^④ 最终，格尔舒尼的发言平息了党内的分歧，通过了以小组名义参加杜马的决定，对于恐怖活动，则加强了中央的监督。

党的策略在和平发展与武装斗争之间的左右摇摆破坏了党的威信。二

①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00 - 1907. 6, Т. 1, с. 418.

②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00 - 1907. 6, Т. 1, с. 194.

③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00 - 1907. 6, Т. 1, с. 218.

④ М. И. Леонов,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в 1905 - 1907 гг., с. 351.

大上，尽管党的策略转向了杜马，但党以小组的名义参加杜马说明中央在决策上面的不坚定，为恐怖的实行留下了活口。代表们对代表大会缺乏统一的策略表示了忧虑，担心社会革命党围绕群众的情绪所采取的策略会损害党的权威。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代表对党章的第一条关于什么是党员提出了修正，以此约束党员的行为，维护党的统一。报告说：“任何一个承认党的纲领和策略，服从党的决议和纪律，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并正常缴纳党费的人都可以成为党员。”与一大通过的党章相比，强调了对党的决议和纪律的维护，同时要求参加组织并交纳党费。然而，为了尽早扩大党的规模，格尔舒尼还是以附件的形式把确认党员标准的权力交给了地方委员会。^①

二大以后，党员的标准大打折扣，二大通过的遵守党的决议和纪律的规定又一次化为泡影。第二届杜马期间，参加杜马选举的地方组织加强了与群众组织和反对派政党的联系。他们首先与立宪民主党合作，随后和劳动团、人民社会党一起拟定农业纲领。社会革命党杜马代表拒绝作为杜马党团开展工作，不对中央负责。37名农民代表中除了10名代表履行党的战略之外，多数农民代表对社会革命党的政治战略不感兴趣，他们只关心农业纲领，坚决反对中央的恐怖政策。热衷于恐怖的社会革命党不顾中央限制恐怖的策略，加强了恐怖活动，从1906年7月至1907年5月共实施了72次暗杀。由于沙皇警察局安插在社会革命党战斗组织内部的领导人阿泽夫的破坏，暗杀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②随后，阿泽夫奸细案的败露，严重败坏了社会革命党的道义形象。

社会革命党组织连续遭到破坏，大部分领导人流亡海外。1908年8月在伦敦召开了社会革命党第一次代表会议，会议就党的组织原则进行了深刻的反省。经过讨论，社会革命党深刻认识到密谋条件下民主原则的危害性，对党的组织章程作出了重大修改，提请下一次党务会议批准。第一，党委会应不少于3人；当党委会只有2人时，在选举之前具有加聘权，在补充之前，党委会失去自己的权力，只履行临时机关的职能；当党委会只有1人时，应该重新选举；在不能选举时应由任命的领导集体取代。第二，当下级组织偏离党的纪律，被发现存在未被揭露的奸细材料以及因极端不隐

^①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00 – 1907. 6, Т. 1, с. 577, 578.

^② М. И. Леонов,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в 1905 – 1907 гг., с. 367, 374.

秘和无能而败坏党组织的行为，经中央委员会同意，省和州委员会有权解散下级组织并由授权解散下级组织的中央委员会直接上报党务会议。第三，如果被解散的领导集体不能立刻重新选举，那么将派遣指定的领导集体取代他们以恢复组织，直到召开代表大会并举行选举；被指定的领导集体只履行领导地方工作的一般职能；或者经中央委员会同意，在保留部分组织的情况下，重新起一个名字。第四，依据同样的原则，中央委员会在没有类似组织的地方设立州、省等地方委员会。第五，党务会议由州代表大会代表组成，州代表大会由省代表大会代表或者代表会议代表组成等等；当出现任何偏离的情况下，如派出的代表不是来自下级组织的代表大会，而是来自执行机关，这样的代表只有发言权，表决权只能由代表大会派出的全权代表会议专门投票授予。^①

以上修改加强了中央领导，严格了各级党组织的权力，对于加聘权给予了特别的限制。遗憾的是，中央领导并没有充分履行自己的责任，也没有认真分析不利于民主原则的客观社会环境。俄政府总理大臣斯托雷平在打击社会革命党的同时，实行了土地私有化改革和西方各省的自治改革，极大地缓和了紧张的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特别是关于犹太人的自由化改革，缓解了犹太人领导的俄国革命运动。社会革命党推行的推翻沙皇政权的政策被推向了不确定的未来。社会革命党内部的分化是斯托雷平改革产生的结果，社会革命党也陷入了改革带来的利益冲击之中。

如果说1908年伦敦代表大会还能提出严格党的纪律的要求，但在党的领导层出现破坏党的纪律的决定时，所谓严格党的纪律的要求就变成空中楼阁。第四次党务会议还决定加强中央派到地方组织中的全权代表的权力，但到了1909年5月第五次党务会议，中央委员会不得不因阿泽夫案件而辞职。中央委员会的削弱使得原本松散的社会革命党陷入了组织上的瘫痪。

社会革命党在第一次革命阶段建党的尝试由于民主原则和加聘原则而遭遇失败。与其说是社会革命党策略上的失误，不如说是社会革命党对革命性质认识上的失误。第一次大革命的现实表明，俄国连有产阶级的民主都不能实现，广泛的民主只能成为炫耀自己的招牌。革命失败后流亡海外的社会革命党并没有对民主原则进行反省。留在国内的社会革命党则利用1912年俄国工人、农民运动的高潮投身于日益火热的合作社运动之中。

^①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07.6 - 1917.2., Т.2, М., РОССПЭН, 2001, с. 295.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对俄国的宣战再一次把资本主义的压力倾泻到俄国人民的头上，俄国反资本主义的浪潮再掀高潮。由于战争，农民成为社会的主角，^①他们利用手中的武器直接向沙皇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为农民呐喊的社会革命党再一次成为工农群众的社会组织苏维埃的直接领导者，也再次接受了民主与现实不相一致的考验。

1917年是俄国最“民主”的历史时期。崇尚民主的社会革命党得到了人民特别是农民的“衷心”拥护。1917年的3～8月，加入社会革命党的人整村、整连，到8月社会革命党人数就达到100万，成为俄国所有政党中最大的政党。^②一战中，社会革命党根据国际社会主义的情形在革命和爱国问题上再次分为两派。社会爱国派以俄国同德国斗争失败就是争取自由的失败为由先支持政府打败德国，后发动国内战争；国际派揭露战争是彻头彻尾的罪恶，反对战争，捍卫受到战争威胁的社会主义国际。^③战争问题成为考验社会革命党普世价值与民族利益的试金石。社会革命党连续在1917年3月莫斯科第一次代表会议、4月3～5日的彼得格勒第二次代表会议和1917年5月25到6月4日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连续通过了关于战争的决议，但是所有的决议都是妥协性的。第一，以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为首的全权代表机关应该号召各国民主派支持民族自决基础上的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口号，对本国政府施加影响。第二，俄国革命民主派应该千方百计地加快革命国际的重建，召开国际社会主义代表大会，恢复国际劳动人民的团结，制定最终实现和平的条件并付诸实施。第三，提请所有交战国的民主派注意，由于他们不能完全坚决地反对他们的政府关于战争掠夺目的的最后声明，使得俄国的民主派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也使国际劳动人民的统一变得困难。^④

社会革命党附和孟什维克提出的不战不和的理论实际上是把发动战争的责任推给了国际社会，希冀通过与国际社会主义者谈判结束战争当然没有成效，只能在战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当因战争问题引发的第一次政府危机出现时，社会革命党不惜违背不与资产阶级同流合污的诺言，从5月3

① 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施用勤译，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第4页。

② К. В. Гусев, Партия эсеров: от мелкобуржуазного революционаризма к кортпреволюции, с. 99;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России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с. 440.

③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07.6 - 1917.2., Т. 2, с. 501, 473.

④ А. А. Смирнова, От коалиции к катастрофе петроградские социалисты в мае-ноябре 1917 года, Спб., ООО «Береста», 2006, с. 50.

日社会革命党彼得格勒组织联席会议决定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开始，就陷入了是否坚持原则的考验。切尔诺夫以发展生产力为名，以组织政府来组织劳动的俄罗斯为由开展与资产阶级的合作。^①虽然社会革命党左派卡姆科夫等人提出的“临时政府不走向消灭战争和完全民主地重组国家的道路，任何临时政府都将悬在空中”的话有些极端，但是，他提醒切尔诺夫等曾经的中左派领导人未能陷入为了利益而丧失原则的境地。可惜的是，切尔诺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分析与立宪民主党不能合作的原因时仍然把责任推给了立宪民主党和整个俄国，认为“俄国是一个旧制度下各民族的监狱，革命激发了国家受迫害的人——所谓没有国家的民族，或者承认革命激发的各民族的合法权利，或者独立……立宪民主党利用了专制制度下沙皇所有不成功的外交政策，弹拨受伤的爱国主义琴弦，逐渐从自由和平的政党变成了一个与帝国主义同流合污并因此获得金融寡头、官僚和贵族同情的民族自由党”。^②从切尔诺夫的关于俄国不具备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推论，立宪民主党的背叛就是一种必然。如果说立宪民主党在一战中未能抛弃帝国主义的利益而发动革命，那么社会革命党也重复了立宪民主党的错误。因为，社会革命党在1917年就一直把革命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遗憾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把俄国卷入社会主义革命的浪潮中。仍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社会革命党被突来的胜利冲昏了头脑。

原本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应该好好地讨论是否与资产阶级合作并在此基础上加强党的组织，但是，社会革命党却把大量的精力用来讨论与资产阶级的合作，着手城市和地方自治选举，着手土地法和立宪会议的准备，涉及加强党的纪律的组织章程也因时间关系挪到下一次党务会议，代表大会只是宣读了组织部门草拟的一个临时章程。章程只是在加强党的纪律、加强地方组织建设以及中央对地方的领导方面做了具体规定。例如，专门设立了供发表不同言论的机关报，但对于代表大会允许讨论的问题不得另辟特殊专栏，不允许脱离党团、委员会，不允许其他党组织单独发表与党代表大会相抵触的言论，党的中央机关报是全党刊登党的意见的唯一机关报；每个城市、每个省和每个州只能有一个相应的党组织，有自己的日报，

①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17.2 - 10, Т.3, Ч.1, с. 94, 108.*

② *В. М. Чернов, Перед бурей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Нью-Йорк, Изд. Имени чехова, 1953, с. 337.*

任何小组都没有权利创立与之竞争的报纸；每个党组织都有义务向中央交款，对没有交款的组织，建议党务会议取消其参加代表大会的资格；设立中央委员会机关，向农业部、立宪会议召集的特别会议和土地总委员会派出自己的代表；等等。^①

接下来的时间里，社会革命党和立宪民主党不断地闹摩擦，互相攻击。克伦斯基政府先后召开了莫斯科国务会议和彼得格勒民主会议讨论资产阶级与社会主义者的合作问题，终因各自的利益而不欢而散。处在前线的士兵和将军以开小差和发动科尔尼洛夫暴动示警，但不能扭转政府分裂的局面，直到1917年10月革命的爆发。

由于社会革命党中央的不作为，右派与资产阶级合作，成立预备议会；左派则与布尔什维克合作发动十月革命，切尔诺夫一气之下于10月22日离开彼得格勒，视察莫斯科卫戍军和明斯克西方前线农民团代表大会，直到11月下旬才回到彼得格勒。^② 关于加强党的领导和纪律的组织章程到了已经失去政治权力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11.26～12.5）才予以提交。

大会并没有对党的骑墙政策作出纲领性的思考，仍然维持过渡阶段的定论。大会把社会革命党的无作为归结为布尔什维克的篡权和党的分裂。会上三大中央委员 B. M. 津季诺夫回顾了社会革命党内部左右派的分裂过程，将左右两派开除出党。左派社会革命党不服代表大会的决议，组织独立的左派社会革命党并推动与布尔什维克的联合。社会革命党中央着手寻找既不与布尔什维克联合又不与资产阶级联合的第三条道路，试图利用自己在农民当中的威信通过立宪会议选举夺取政权。

四大对党章进行了比较全面的修改。第一，在民主选举原则上，用联邦原则代替集中原则。第二，针对左派社会革命党和社会革命党护国派彼得格勒小组组委会的派别活动，以及党员个人单独提出候选人参加地方自治机关和立法机关选举的分裂行为，加强了党的纪律要求和惩罚力度，特别明确了中央委员会开除党员和临时开除党组织的权力。第三，加强了党的集中，加强了中央对地方、上级对下级的领导；重申党的代表大会每年召开一次，党务会议每4个月召开一次；扩大规模，中央委员会的人数由5人增加到20人；地方必须把财政收入的10%上交中央；选出的议会党团

①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17.2 - 10, Т.3, Ч.1, с.574, 653 - 654.

② В. М. Чернов, Перед бурей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с.345.

必须对全党负责，服从中央委员会的领导；地方党组织的工作方向由代表大会或者代表会议选举的责任委员会确定；等等。第四，加强对中央委员会技术工作的核查，核查结果提交代表大会。^①

加强党的领导和纪律约束未能扭转社会革命党的颓势。建立清一色的社会主义政府的主张决定了社会革命党不能与布尔什维克划清界限，追求民主和立宪会议使社会革命党不能建立强有力的政权。社会革命党在立宪会议选举中赢得了选举，但因路线不清楚而遭遇了被解散的命运，从而结束了自身发展的第二个高峰。

社会革命党发展的最后一个高峰是在 1918 ~ 1921 年的国内战争时期。这个时期，社会革命党吸取第二个高峰期失败的教训，开始确立自己的发展道路——第三条道路，谋求建立自己的政权。第三条道路就是既不与资产阶级联合，也不与布尔什维克联合，走所谓劳动革命的道路。切尔诺夫的第三条道路走得并不平坦，遇到的第一个挑战便是布列斯特和约。社会革命党不忘保护国家的领土，坚决反对与德国签订割地赔款的条约，走上了反布尔什维克的道路。1918 年 5 月召开的第八次党务会议成为与布尔什维克进行武装斗争的分水岭。切尔诺夫从维护建设社会主义的目标出发主张不与布尔什维克闹翻，但是，他提不出不反对布列斯特和约的理由，更主要的是不能接受布尔什维克提出的余粮征集制的做法。第八次党务会议通过了津季诺夫、М. Я. 根捷里曼提出的与君主派、资产阶级、沙皇军官结盟，消灭苏维埃政权，并与协约盟国联合开辟东方战线的决议。^② 社会革命党与资产阶级合作的目的是在俄国建立君主政权，而是通过让步恢复立宪会议。右派社会革命党的妥协政策压制了对第三条道路的探索。党务会议授权中央委员会全权处理只有党务会议才能决定的政治和策略问题，同时坚持让所有党员和党的组织严格执行党的纪律。^③ 社会革命党从 1918 年 5 月到 1918 年 11 月都在执行与资产阶级、君主政权的妥协政策，直到高尔察克发动政变，右翼社会革命党流亡为止。

高尔察克的政变使得社会革命党重新回到第三条道路的轨道上来。以

①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17. 10 - 1925, Т. 3, Ч. 2, с. 177, 178 - 179, 196, 178.

②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в первые годы Советской власти,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2006, №6, с. 5.

③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17. 10 - 1925, Т. 3, Ч. 2, с. 392.

В. Г. 沃尔斯基为代表的左翼开始与布尔什维克谈判，支持苏维埃政权。1919年2月，布尔什维克因社会革命党放弃与其的武装斗争而恢复了社会革命党的合法地位。但在3月召开的社会革命党中央全会上仍然致力于第三条道路，社会革命党又一次失去了其合法地位。6月召开的第九次党务会议重申了放弃与布尔什维克的武装斗争，但并不是因为同意布尔什维克的主张，而是因为自己没有力量两线作战，同时重申坚持人民主权的民主路线，与追求“虚假的阶级专政”实际上是党的专政的布尔什维克制度不做任何妥协。党务会议要求党员必须严格遵守党的纪律，规定：如果上一级党组织的决定不违背党的代表大会、党务会议和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所有党组织必须无条件地遵循上一级的决定；中央委员会有权开除在政治活动中所有违反全党决议的党员；中央委员会有权解除行动中脱离代表大会和党务会议决定的中央委员。^①

第九次党务会议关于加强中央权威的决定反映了党坚持独立路线的决心。由于社会革命党的力量已经分散到西伯利亚、乌克兰、乌拉尔、南俄等地，缺乏足够的力量执行独立的路线，再加上布尔什维克的巩固和社会革命党中央领导人部分流亡海外，党的纪律仍然不能有效地执行。1919年10月，从社会革命党中独立出来的人民小组加紧与布尔什维克的合作，被中央开除出党，随后成立的社会革命党少数派公开挑战中央。社会革命党第三条道路以失败而告终。1919年末到1921年12月末，社会革命党人陆续被捕。1921年9月，社会革命党在条件艰难的情况下召开了最后一次党务会议。会议把遵守党的纪律当做党的最主要的任务，特别提出与因人而异的政策、地方组织的分离主义和削弱党的纪律的现象作斗争，建立中央与地方的联系。^②然而此时的强调未免有些姗姗来迟，不过进一步印证了党关于民主观念的错误。

总括社会革命党三次确立农民政党地位的努力，都由于不能从俄国的人民运动中挖掘出普世价值而不能成功。社会革命党因观念的分歧造成的分裂贯穿始终，见证了民主化的失败。

三 组织人数的变化

入党标准的宽泛、党纪的松弛、中央与地方联系的缺乏，使社会革命

①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17. 10 - 1925, т. 3, ч. 2, с. 461, 466.

②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17. 10 - 1925, т. 3, ч. 2, с. 784.

党组织以及具体的党员人数成为有争议的问题。关于社会革命党人数的统计，社会革命党中央在自己存在的 20 多年中只进行过一次（1907 年的二大），这为彻底搞清社会革命党人数、组织发展情况带来了困难。英国学者佩里、德国学者希德迈尔都是根据某州或者省委员会组织人数推演得出总人数。俄国学者列昂诺夫、叶罗费耶夫等人多使用警察局统计材料、地方文献资料，配合农民运动的规模、党的报刊资料来统计社会革命党人数。由于材料来源不同、统计方法上的差异，有关社会革命党的组织、人数问题总是存在这样那样的分歧。例如叶罗费耶夫认为 1905 年前夕有 43 个组织，宪兵头子 A. 斯皮里多诺维奇认为有 53 个组织，社会革命党领导人在 1904 年斯图加特大会上认为有 54 个组织，列昂诺夫认为有 77 个组织。^① 所以，有关社会革命党的组织和人数情况不可能完全搞清楚，这里只根据各位学者的研究对社会革命党的组织概貌做一基本勾勒，以期对社会革命党有一个整体了解。

根据列昂诺夫的最新研究成果，1905 ~ 1907 年社会革命党组织、人数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情况列表如下（见表 3-1）。

表 3-1 1905 ~ 1907 年社会革命党地域分布和人数

地区	组织数 (个)									党员人数 (人)
	州			省以及类似省			城市和县			
	1905年初	1905年末	1906~1907年之交	1905年初	1905年末	1906~1907年之交	1905年初	1905年末	1906~1907年之交	
欧俄	2	6	8	23	39	61	43	110	329	54619
高加索地区	-	1	2	2	5	7	2	4	58	5693
西伯利亚	-	-	2	-	3	6	3	8	25	1875
中亚	-	-	1	1	2	4	1	2	16	422
芬兰	-	-	-	-	-	-	-	-	1	-
波兰	-	-	-	-	-	-	-	-	3	-
总计	2	7	13	26	49	78	49	124	432	62609

资料来源：M. И. Леонов,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в 1905 - 1907 гг., с. 45.

^① Н. Д. Ерофиев, К вопросу о численности и составе партии эсеров накануне первой россий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См., Не proletарские партии России в трех революциях, с. 123, 124.

革命的初期,委员会多分布在省城,有26个委员会和49个小组,在县城只有4个委员会和19个小组。分布地区主要在欧俄,集中在彼得堡、莫斯科、伏尔加河流域、乌拉尔以及西部和南部各省。主要成分是工人、农民和大中学生。农民联盟主要分布在中央黑土地带和西部非黑土地带12省,欧俄中部10个省分布着人数较少的“人民教师联盟”,莫斯科、敖德萨、比亚韦斯托克、别尔季切夫等地建立了战斗组织。这个时期的人数是1500~2000人,叶罗费耶夫认为是2651人。^①

1905年期间,形成了5个州、23个省级委员会(15个由小组组成),84个县级和城市小组。1905年末,达到了7个州、49个省、118个县和城市组织,其中欧俄有6个州、39个省和110个县和城市组织。1906年是组织大发展的一年,规模达到13个州、78个省、432个城市和县级组织。社会革命党组织中还有民族组织。这一时期,社会革命党组织在地域上的分布仍然没有改变。在中央黑土地区,农业组织发达,城市组织薄弱;北方区,在沃罗格达、阿尔汉格尔斯克省,城市组织比较发达,而在普斯科夫、诺夫哥罗德,农业组织比较活跃;西北地区有许多的手工业者和铁路工人组织。乌克兰规模较大的城市组织在基辅和哈尔科夫省,最大的农业组织在切尔尼戈夫省,城市组织在叶卡捷林诺斯拉夫省。在南部草原,赫尔松省城乡组织工作开展得都比较活跃,在塔夫利达(现在的克里木)省,城市和军队组织则比较活跃。社会革命党组织最活跃的地区是伏尔加河流域,几乎每个省都有大规模的农业组织,有名的城市组织分布在喀山、阿斯特拉罕、察里津。乌拉尔、高加索、中亚、西伯利亚等地也都有发展。除了表3-1列举的组织外,还有2067个基层农业组织,包括26068名农民。

关于组织人数的说法也很多,社会革命党二大统计不超过5万人,同情者不下30万人。^②英国的佩里认为社会革命党的人数为5.5万~6万人,同情者35万人。^③列昂诺夫的统计数字为62609人。基谢列夫等人的统计为

① Непролетарские партии России в трех революциях, с. 127.

②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00 - 1907. 6, Т. 1, с. 566.

③ M. P. Perrie, The social composition and structure of the Socialist-Revolution Party before 1917, *Soviet Studies*, 1972, Vol. 24, No. 2, p. 224.

58541人。^①几个数字的出入都不大。关于组织成分的划分，在65个省、12个州的范围内，1905~1907年共建立军人组织114个，其中可确定具体人数的有23个，2488人，其余的组织不能确定人数；工人组织170个，其中106个组织有25535~31396名工人，其余的不能确定人数；在142个州、省、县中有农民组织2755个，164个州、省、县中也有农民组织，但数目不确定，在306个有农民组织的州、省、县中，86个组织有31945~42633人，其余的人数不确定。^②工人党员主要分布在莫斯科、彼得堡、塞瓦斯托波尔等城市，影响最大的是全俄铁路联合会和伏尔加河轮船组织的工人和职员。大学生党员主要在两个首都、托姆斯克，中学生主要在萨马拉、奔萨等地。综上所述，社会革命党人数从1905年前夕的2000多人增加到1907年的60000多人，农民、工人占主体，标志着社会革命党开始从知识分子小组向群众性政党转变。

社会革命党组织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期是1917年二月革命以后。社会革命党放宽了入党条件，恢复旧组织，建立新组织。特别是在接管了工兵代表苏维埃和农民代表苏维埃之后，入党工作整村、整乡、整个工厂地展开，社会革命党在人数上迅速超过了其他政党。1917年5月，社会革命党组织已在俄国63个省、州发挥作用，其中48个省举行了党的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③到1917年8月1日，国内共有436个社会革命党组织，包括312个委员会和124个小组，其中欧俄46个省州共有333个组织、247个委员会和86个小组；西伯利亚9个省州共有35个组织、25个委员会和10个小组；突厥斯坦3省州共有10个组织、7个委员会、3个小组；高加索10个省州共有23个组织、19个委员会、4个小组；芬兰和国外共有13个组织、8个委员会、5个小组；军队中有22个组织、6个委员会、16个小组。^④由于以上组织没有具体人数的统计，关于社会革命党的人数争议很多，斯皮林认

① И. Н. Киселев, А. П. Корелин, В. В. Шелохаев,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артии в России в 1905 - 1907 гг. : численность, состав, размещение (количественный анализ), История СССР, 1990, №. 4, с. 78.

② М. И. Леонов,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в 1905 - 1907 гг., с. 456 - 490. 列昂诺夫把具体的州、省、县和城市的各种组织、人数一一列出，本书在此基础上做了统计。

③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17. 2. - 10, Т. 3, Ч. 1, с. 615 - 62; Х. М. Астрахан, Большевики и и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ротивники в 1917 году, с. 232.

④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17. 2 - 10, Т. 3, Ч. 1, с. 703 - 705.

为有40万，阿斯特拉罕认为有70万，^①叶罗费耶夫认为1917年夏党员人数超过100万。^②参加社会革命党的主体仍然是工人、农民、军人，同时增加了工程师、教师、律师、学生、职员、医生、农艺师、小贩、手工业者等中间阶层。据阿斯特拉罕研究，1917年俄国社会革命党主要分布在城市、前线和农村。根据部分省和县的资料，到1917年秋天，俄国城市中的社会革命党人数将近30万，主要分布在罗马尼亚、西南前线和北方前线12军中的军人党员有21万，加上西线、波罗的海和黑海海军和农村中的党员，总数将近70万。数字上的出入并没有妨碍我们得出结论：社会革命党在1917年已成为真正的群众性政党。

另外，从历次代表大会和立宪会议代表人数的变化也能够看出社会革命党组织的发展情况。1905～1906年之交，党的一大有来自51个组织的64名代表参加，中央委员会邀请了19名代表。1907年，二大有来自79个组织的117名代表，1917年5月，三大有来自7个州、56个省和军队、全俄农民代表大会、南俄铁路组织的316名代表。1918年1月初选出的立宪会议代表有来自59个州、省和军队的320名社会革命党，其中左派社会革命党38人。^③

总之，从社会革命党组织和人数发展情况来看，它代表了农民和与农民休戚相关的工人阶级的利益，表达了俄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中人民的愿望。

第二节 社会革命党成分分析

一 领导人成分分析

1902～1905年期间，社会革命党是一个由知识分子组成的秘密小组，彼此之间的联系依靠友好的私人关系。社会革命党组织不是自下而上形成的，而是从上到下通过知识分子的宣传实现的。所以，以出版杂志、传单、小册子、报纸方式发展组织是社会革命党的一大特色。到1905年末一大召

^① X. M. Астрахан, Большевики и и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ротивники в 1917 году, с. 233.

^②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артии России Конец XIX-первая треть XX века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с. 440.

^③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 1, с. 443 - 445, с. 625 - 627; Т. 3, Ч. 1, с. 615 - 627; Т. 3, Ч. 2, с. 261 - 265.

开的时候，社会革命党已经有了许多非常有名的知识分子领导人，他们在决定党的观点、纲领和策略方针，调整党的内部机制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央政治领导人包括中央委员和中央委员会下属的工人、农民、军人、出版等委员会的全权代表。1905 ~ 1907 年社会革命党领导人构成列表如下（见表 3 - 2）。^①

表 3 - 2 1905 ~ 1907 年社会革命党领导人简况

领导人	出身	教育程度	1902 年前参加的革命运动	生卒年与入党时间	备注
Н. Д. 阿夫克先基耶夫	贵族官宦之家	大学	90 年代小组	1878 ~ 1943 1905	党右翼领导人，曾担任一大、三大中央委员。1917 年担任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主席、临时政府内务部长，立宪会议代表。坚持与资产阶级联合，1918 年始参与复兴同盟、乌法执政以及共济会。曾先后办过《祖国之子报》、《劳动旗帜报》、《呼声杂志》、《现代人札记》和《为了自由报》，1943 年病逝于纽约
В. К. 阿加福诺夫	教授	大学肄业	民意党小组		中央全权代表，有创意者少数小组的创始人
Е. Ф. 阿泽夫	小市民、匠人之子	大学	1890 年代小组	1869 ~ 1918 1899	社会革命党创始人之一。1902 年起任中央委员，一大、二大中央委员，1903 年起任战斗组织领导人。1893 年成为警察局的奸细，1908 年被揭露并流亡德国。坚持自由主义
А. И. 阿尔托夫斯基	税吏之子	大学	1890 年代小组	1880 ~ 1975 1901	1903 ~ 1905、1919 年中央委员，中央全权代表，流亡期间在国外党小组发挥作用。1920 年被捕，曾被判处死刑，后改为 5 年监禁。曾进过苏联集中营。属于党右翼
А. А. 阿尔古诺夫	贵族官员之子	大学肄业	1890 年代民意党小组	1866 ~ 1939 1895 ~ 1896	1905 年中央委员，一大中央委员，二大增补为中央委员。主要从事党的组织工作。护国派，右翼分子。立宪会议成员，参加了乌法执政。1922 年退党，组建农民俄罗斯。曾编辑《劳动旗帜报》和《呼声报》
А. Н. 巴赫	小市民	大学肄业	民意党	1857 ~ 1946 1905	中央全权代表，阿泽夫侦讯委员会主席，反对恐怖。护国派。曾编辑《新闻报》、《在国外》和《呼声报》。1917 年回国，并逐渐脱离革命，从事科学工作
В. Г. 比利特	商人之子	大学	民意党	1864 ~ ? 1900	中央委员会全权代表。党内花炮技术专家。反对继续恐怖，战后成为护国派并逐渐脱离革命，20 年代在苏联驻巴黎贸易代表处工作

^① М. И. Леонов,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в 1905 - 1907 гг., с. 491 - 498.

续表

领导人	出身	教育程度	1902年前参加的革命运动	生卒年与入党时间	备注
A. O. 邦奇—奥斯莫洛夫斯基	贵族地主	大学肄业	“土地和自由”社，黑分社	1898~1899	1905年中央委员，中央全权代表
E. K. 布列什科—布列什科夫斯卡娅	贵族地主之女		柴科夫斯基小组、走向民间组织	1844~1934 1899	社会革命党创始人之一，1902~1905年、1907年中央委员，中央全权代表。三大被选为党荣誉主席，有“革命的奶奶”之称。1903~1913年，不断被监禁和流放。1905年支持恐怖，1917年后转为右派，立宪会议成员。1917年革命后转战俄国，1919年后流亡
Ф. B. 沃尔霍夫斯基	贵族	大学肄业	柴科夫斯基小组，“土地和自由”社	1846~1914 1904	社会革命党军事组织领导人之一，1904~1905年中央委员，中央全权代表。曾编辑《为人民报》和《劳动旗帜报》
A. B. 杰奥诺夫斯基	神甫之子	大学	“土地和自由社”、民意党、民权党	生卒年不详 1901	1904~1905年中央委员，国外组织领导人
Г. A. 格尔舒尼	小市民	中学	1890年代小组	1870~1908 1898~1899	社会革命党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1902~1903年二大中央委员，1902~1903年战斗组织创始人、领导人，死于肉瘤
M. P. 戈茨	商人之子	大学肄业	民意党	1866~1906 1901	社会革命党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1902~1905年中央委员，中央委员会在国外和战斗组织中的代表，《革命的俄罗斯》助理编辑。党的核心人物。由于长年监禁，重病缠身，死于柏林
B. M. 津季诺夫	商人之子	大学	1890年代小组	1880~1953 1902~1903	社会革命党主要领导人，一大至四大中央委员。徘徊于中右派之间。一大就接近中央权力核心，1917年领导莫斯科委员会，1918年为党萨马拉政权领导人。立宪会议成员。反对与布尔什维克合作。1919年流亡法国，二战后流亡美国并死在美国
П. C. 伊万诺夫斯卡娅—沃洛申科	神甫之女	阿拉尔钦培训班	民意党		1905年中央委员
П. П. 克拉夫特	贵族官员之子	大学肄业	1890年代民意党小组	1870~1907 1895~1896	社会革命党创始人之一和主要领导人。1902~1905年中央委员，中央全权代表，组织局领导人，一大后增补为中央委员。参与暗杀西皮亚金

续表

领导人	出身	教育程度	1902年前参加的革命运动	生卒年与入党时间	备注
E. E. 拉扎列夫	农民之子	中学	走向民间组织, “土地和自由”社, 民意党	1855 ~ 1837 1902	1902 ~ 1905 年中央委员, 中央全权代表。护国派, 右翼。立宪会议代表。萨马拉政权教育部长, 1919 年流亡, 参与政治和文化社会工作
B. B. 列昂诺维奇	贵族	大学肄业	1890 年代民意党小组	1900	1904 ~ 1905 年中央委员, 中央全权代表
O. C. 米诺尔	拉比之子	大学肄业	民意党	1861 ~ 1934 1902	1905 年中央委员, 中央全权代表, 第二国际国际会议党代表。1917 年坚决反对布尔什维克, 不惜与白军联合, 1919 年流亡
C. Ф. 米哈列维奇	贵族	中学	“土地和自由”社	1903 ~ 1904	1905 年中央委员, 中央全权代表, 中央军事局领导人。
M. A. 纳坦松	拉比之子 (富商之子)	大学肄业	柴科夫斯基小组, “土地和自由”社, 民权党	1850 ~ 1919 1905	1905 年, 一大中央委员, 主管中央组织和财政工作。一战期间成为国际派代表。1917 ~ 1918 年成为左派社会革命党领导人之一。死前成为革命共产主义者
B. C. 潘克拉托夫	工人	中学	民意党	1864 ~ 1925 1904	1905 年中央委员, 中央州全权代表, 1909 年中央委员。护国派, 右翼。全俄农民联合会中央委员, 临时政府保护沙皇一家委员
A. И. 波塔波夫	贵族	大学	民意党	1869 ~ 1915 1901 ~ 1902	社会革命党创立者之一, 1903 ~ 1905 年中央委员, 中央全权代表。农业问题专家。1909 年流亡, 战争爆发后回国, 曾为莫斯科医生
H. И. 拉基特尼科夫	农民之子	大学	1880 ~ 1890 年代民意党小组	1864 ~ 1938 1900 ~ 1901	自党成立起就成为中央委员, 参与起草党纲。农业问题专家。一战中成为国际派。1917 年担任农业部副部长。反对对布尔什维克实施恐怖, 参与与布尔什维克的谈判。曾为苏联统计学家。1922 年作为证人出席对党的审判。1938 年被枪决
И. А. 鲁巴诺维奇	小市民, 律师之子	大学	民意党	1859 ~ 1922 1901	1902 ~ 1905 年中央委员, 中央全权代表, 三大、四大中央委员, 党在第二国际局的代表。党内马克思主义反对派
B. B. 鲁德涅夫	贵族	大学	1890 年代小组	1879 ~ 1940 1902 ~ 1903	一大中央委员, 中央全权代表, 莫斯科委员会领导人, 中央在彼得堡委员会组织代表, 莫斯科市长。护国派代表, 立宪会议代表, 参加复兴同盟, 不惜借助外国力量恢复俄国统一。1919 年流亡后加入党右翼组织

续表

领导人	出身	教育程度	1902年前参加的革命运动	生卒年与入党时间	备注
Б. В. 萨温科夫	贵族	大学	1890年代小组	1879 ~ 1925 1903	1905 中央委员, 第二次党务会议增补为中央委员, 战斗组织阿泽夫副手。1917 年临时政府陆海军副部长, 10 月被开除出党。曾组织保卫祖国和自由委员会。1920 年在波兰组建军事队伍以袭击苏联。1924 年被捕并死在狱中
М. Ф. 谢柳克	世袭荣誉公民之女	妇女培训班	民意党 1880 ~ 1890年代小组	1872 ~ ? 1898	1903 ~ 1905 年中央委员, 曾创建党机关报《革命的俄罗斯》。参加阿泽夫案件侦讯工作, 后脱离革命
С. Н. 斯列托夫	贵族官员之子	大学肄业	1880 ~ 1890年代小组	1876 ~ 1916 1898 ~ 1899	社会革命党著名活动家, 曾参与党纲的制定。1902 ~ 1905 年中央委员, 一大后增补中央委员, 中央全权代表。曾热衷于农业恐怖。1912 年成为右翼。一战中成为护国派分子, 参加法国志愿军, 在法国作战中牺牲
Н. С. 秋切夫	贵族	大学肄业	“土地和自由”社、民权党	1856 ~ 1924 1904	1905 年中央委员, 中央全权代表, 参加战斗组织。二月革命后参加了分析文件和警察局案件委员会, 编辑《苦役和流放》杂志
А. Ю. 法伊特	医生之子	大学	1880 ~ 1890年代民意党小组	1864 ~ 1926 1903	1905 年中央委员, 1907 年增补中央委员, 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成员。一战赴法作战。1917 年成为党彼得格勒委员会成员, 曾帮助克伦斯基进攻彼得格勒, 立宪会议代表。1918 年脱离党的工作
И. И. 丰达明斯基	商人之子	大学	1890年代小组	1880 ~ 1942 1902 ~ 1903	一大前和三大中央委员, 中央全权代表, 莫斯科委员会领导人。1912 年起成为右翼领导人, 护国派。反对十月革命, 参加复兴同盟与布尔什维克作战。1919 年流亡法国并编辑《现代人札记》, 死在德国集中营
Н. В. 柴科夫斯基	贵族	大学肄业	柴科夫斯基小组, “土地和自由”社	1850 ~ 1926 1903	革命的老前辈, 走向民间运动失败后热衷于合作社运动。1904 ~ 1905 年中央委员, 中央全权代表。1907 年革命后与人民社会党接近。1917 年之后成为自由经济学会主席, 工兵代表苏维埃执委会成员, 参加人民社会党, 出席国务会议和民主会议, 反对布尔什维克。立宪会议成员, 组织复兴同盟。1918 年成为阿尔汉格尔斯克政府首脑。1920 年参加邓尼金政府。流亡后, 参加巴黎立宪会议代表会议。有“革命的爷爷”之称

续表

领导人	出身	教育程度	1902年前参加的革命运动	生卒年与入党时间	备注
B. M. 切尔诺夫	贵族	大学肄业	1880 ~ 1890年代民意党小组, 民权党	1873 ~ 1952 1896 ~ 97	社会革命党创立者, 主要领导人和理论家。1902 ~ 1903年, 一(大)至四大中央委员, 坚持新民粹派理论的创立工作。1917年曾任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副主席, 农民代表苏维埃名誉主席。临时政府农业部长, 立宪会议主席。1918年之后致力于第三条道路的探索, 试图在党的左右派中调停。由于理论上创新的失败导致党的灭亡并流亡欧美, 1953年病逝于纽约
Л. Э. 希什科	贵族	大学	走向民间组织	1852 ~ 1910 1904	70年代民粹派, 社会革命党著名领导人。曾不断被监禁流亡, 坚持革命道路。《革命的俄罗斯》编辑, 农业问题理论家。1904 ~ 1905年中央委员
Я. Л. 尤杰列斯基	律师之子	大学肄业	1880 ~ 1890年代小组	1868 ~ 1957 1901 ~ 02	1905年中央委员, 经常从左面批评党的方针, 少数派领导人之一。《革命思想报》编辑。长期在巴黎流亡, 和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相识。参与揭露阿泽夫。一战后坚持极端国际主义立场, 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 参加复兴联盟。二战后生活在纽约并死在了那里
A. B. 亚基莫娃	神甫之女	中学	走向民间组织, 民意党	1856 ~ 1942 1905	曾因刺杀亚历山大二世被捕流放, 后来回到俄国成为1905年中央委员, 中央全权代表。1907 ~ 1917在赤塔从事革命活动。1921年在莫斯科组织苦役犯和流放犯协会, 编辑《苦役和流放》杂志。1941年疏散到新西伯利亚, 1942年病逝

表3-2列举的387位领导人中, 出身于贵族的有16位, 占42%, 商人4人, 知识分子和职员9人, 工人和农民3人, 神职人员5人。他们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 其中受过大学教育的有27人, 其余受过中学教育。商人之子大都在国外接受良好教育并接受了欧洲新思想。他们大都从中学或者大学开始从事革命活动, 是职业革命家。从参加革命的时间先后来看可分为这样几批。第一批是出生于19世纪40~50年代的旧民粹派, 如希什科、柴科夫斯基、秋切夫、鲁巴诺维奇、纳坦松、拉扎列夫、沃尔霍夫斯基、布列什科—布列什科夫斯卡娅、巴赫、米哈罗维奇、邦奇—奥斯莫洛夫斯基, 他们是传统民粹派的捍卫者, 热衷于恐怖宣传, 对组织持怀疑态度。第二批是60~70年代出生的, 如阿尔古诺夫、阿泽夫、切尔诺夫、格尔舒尼、

M. 戈茨、格拉夫特、米诺尔、潘克拉托夫、拉基特尼科夫、波塔波夫、萨温科夫、谢柳克、斯列托夫、法伊特、尤杰列夫斯基，在高层中占 40%，在州省级委员会中占 1/5。^① 他们在 80 ~ 90 年代走上革命道路，在形成党的思想和纲领，制定党的路线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第三批是 80 ~ 90 年代出生的，如阿夫克先基耶夫、丰达明斯基、津季诺夫、A. 戈茨、鲁德涅夫等，他们在 1905 年革命时期才崭露头角，在 1917 年之后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综合以上特点可以看出：从成分结构来说，以贵族为主，农民工人占少数；从年龄来说，年轻人占多数，年老者占少数；从革命程度来说，除巴赫外，其他人都是职业革命家；从知识结构来说，知识分子占多数；从革命经历来说，革命的思想 and 纲领正处在形成时期，各种流派观点、各种生活经历都可能对社会革命党组织的发展产生致命的影响。克服个人精英主义、贵族骑士风气、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形成一种切合实际的理论，把自己与群众结合起来，需要全才领袖和严格的组织纪律。然而，遍寻党内有影响的人物，似乎缺乏这样的全才。阿泽夫、萨温科夫坚持自由主义立场，恐怖使他们走到一起，对群众运动持轻蔑态度；拉基特尼科夫、布列什科—布列什科夫斯卡娅、斯列托夫站在左派立场上，支持把党的力量用于宣传、动员群众，直接发动起义推翻沙皇政权，支持农业恐怖和掠夺运动；切尔诺夫、津季诺夫、纳坦松等人站在中派的立场上，在斗争与妥协、个人恐怖与群众运动、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之间摇摆。切尔诺夫是著名的理论家，但缺乏组织才能，他在党内赢得的威信得益于他的妥协。M. 戈茨和格尔舒尼有着突出的组织才能，但恶劣的斗争环境使他们的生命之花过早凋谢。俄国正处在转型时期，分歧不断，社会革命党领导层内容纳了持有各种观点的人物，通过妥协联合起来。党也处于从知识分子小组向群众性政党的转变之中。

1917 年二月革命以后，随着社会革命党组织规模的壮大，党的领导成分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现将三大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第七次党务会议拟订的参加立宪会议名单，四大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以及社会革命党左右派领导人列表如下，可以看出 1917 年社会革命党领导层的变化情况（表 3-3）。

^① 这是德国学者希德迈尔的估计，参见 См. , М. И. Леонов,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в 1905 - 1907 гг. , с. 69.

表 3-3 1917 年后社会革命党领导人简况

领导人	出身	教育程度	生卒年	入党时间	备注
B. A. 阿尔加索夫	邮政官员	大学肄业	1887 ~ 1938	1905 年前	曾参加第一次俄国革命。一战中站在国际主义立场, 1917 年成为全俄工农代表苏维埃主席团成员, 十月革命后成为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 在苏维埃政府中任无任所的内务部长。1918 年 3 月退出政府, 6 月退出左社加入布尔什维克和红军。1920 年起在高校教书。1938 年被判处死刑
B. Г. 阿尔汉格爾斯基	神甫	神学	1869 ~ 1948	1906	早期因革命曾遭监禁和流放。1907 年被选入第二届杜马, 1917 年三大中央委员, 9 月进入预备议会, 立宪会议成员, 四大后加聘中央委员。1920 年流亡, 1921 ~ 1926 年编辑《革命的俄罗斯》, 被苏联政府判刑, 因在国外没有执行
A. A. 比岑科	农民	师范培训班	1875 ~ 1938	1902	早年参与暗杀萨拉托夫侍从将官, 被判处流放, 1917 年 3 月释放。三大代表, 坚持左派观点, 组织左派社会革命党。十月革命后参加莫斯科人民委员会工作, 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7 月因暗杀德国驻苏俄大使米尔巴赫被捕。创建革命共产主义者党, 后加入俄共。1938 年被枪毙
K. C. 布列沃依	农民	中学	1888 ~ 1934	1905	1907 年 4 月加入社会革命党县委员会, 后因焚烧地主庄园而坐牢。1917 年 6 月曾任沃罗涅什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十月革命后退出苏维埃, 组建农民代表苏维埃。四大中央委员, 立宪会议成员。参加萨马拉立宪会议政权。反对高尔察克反动派, 1919 年与布尔什维克谈判, 创立人民小组和社会革命党少数派并因此被开除出党。1922 年被逮捕流放。1934 年被枪毙
H. Я. 贝霍夫斯基	小市民	中学	1875(1876?) ~ 1938	1901	1902 ~ 1905 在全国各地开展革命工作, 1907 年加入彼得堡委员会, 全权代表。1909 年起从事工会和文学工作。农民代表苏维埃的组织者和领导人, 三大候补中央委员, 立宪会议成员。1918 ~ 1919 成为西伯利亚行政中心农业部长。1920 ~ 1923 年在大学教书。1922 年遭指控, 1924 年被捕。1938 年被枪决
M. A. 韦杰尼亚平	地主	大学	1879 ~ 1938	1905	萨马拉党组织领导。1914 年成为护国派, 1917 年革命后建立伊尔库茨克党组织和苏维埃。三大、四大中央委员, 主持中央财经工作。立宪会议成员。1918 年到萨马拉, 主持外交工作。同高尔察克斗争, 支持停止与布尔什维克的斗争, 支持红军。1922 年被起诉判刑和流放。1938 年死于心力衰竭

续表

领导人	出身	教育程度	生卒年	入党时间	备注
П. А. 维赫利亚耶夫		大学	1869 ~ 1928		曾任特维尔省、莫斯科等地地方自治局主管, 农艺师、统计员。参与制定农业纲领以及 33 人和 104 人土地法草案, 临时政府农业部副部长, 土地总委员会主席团成员。曾写下大量关于农业问题的著作
В. К. 沃尔斯基	贵族	大学	1877 ~ 1937	1903	早年参加革命运动, 多次被捕。1908 ~ 1911 年领导沃洛格达州社会革命党。参加银行工作, 编辑《合作社生活》杂志。战争中坚持让政府失败的观点。1917 年革命后任特维尔工兵代表苏维埃副主席。参加民主会议和立宪会议以及乌法国务会议。从 1919 年起与布尔什维克谈判, 创立人民小组和社会革命党少数派。1922 年被捕, 1937 年被枪毙
М. В. 维什尼亚克	商人	大学	1883 ~ 1976	1905	早年参加革命, 一大代表, 研究俄国普通法。1909 ~ 1914 年在国外, 1915 年与津季诺夫在莫斯科办合法报纸。护国派。1917 年革命后组织莫斯科委员会, 参加立宪会议法律的起草工作。十月革命后加入拯救祖国革命委员会。立宪会议代表。1919 年流亡法国, 成为社会革命党右翼, 办《现代人札记》, 公开批判左右派教条主义
В. В. 沃罗诺夫 (列别杰夫)					党职业工会和合作社运动主要理论家, 1909 年被选为中央委员。护国派。编辑《劳动旗帜报》等杂志
А. Д. 维索茨基	商人	大学	1881 ~ 1937	20 世纪初	莫斯科出版协会的创立者, 1905 年积极参加莫斯科武装起义。1917 年 7 月被选为彼得格勒委员会主席, 市杜马议员, 参加预备议会。立宪会议成员。四大和第八次党务会议代表。1921 年 11 月被捕, 监禁流放。1929 年起做教师, 1938 年被枪毙
Д. О. 加夫龙斯基	商人		1883 ~ 1949	1904	1905 ~ 1907 年加入党莫斯科委员会, 党社会主义国际代表。1917 年 4 月被选入莫斯科工兵代表苏维埃主席团。1917 ~ 1918 年为莫斯科委员会成员。立宪会议成员。1918 年参加斯德哥尔摩国际社会主义会议。柏林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21 年参加巴黎全俄立宪会议成员会议。1922 年被苏俄缺席判处反苏活动

续表

领导人	出身	教育程度	生卒年	入党时间	备注
М. Я. 根捷里曼	医生	大学	1881 ~ 1938	1904	因参加革命运动被多次流放, 1907年因参加社会革命党出版联合会而被捕。1917年3月被选为莫斯科工人苏维埃执行委员, 三大、四大中央委员。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主席团执行委员, 莫斯科市杜马委员。预备立宪委员。主张建立没有布尔什维克的清一色社会主义政府。立宪会议成员, 捍卫祖国和革命委员会成员。萨马拉立宪会议政权代表, 参加乌法会议。1922年被判处死刑, 后改为5年监禁。1938年被枪毙
Л. Я. 格施泰因	市民		1877 ~ 1935	1898年参加革命	入党后遭监禁4年流放5年, 直到1917年。三大参加党军事委员会, 四大中央委员。立宪会议成员。1918年参加萨马拉政权。1918年成为伊尔库斯克政治中心领导之一。1921年4月被捕, 被指参与农民联合会暴动。1922年被判处5年监禁。1935年因病去世
А. Р. 戈茨	富商	大学	1882 ~ 1940	1901	1917年后党主要领导人之一。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执委会副主席, 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主席团成员, 三大、四大中央委员, 立宪会议成员。十月革命后曾参加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 复兴同盟。1919年则坚持第三条道路主张。1922年曾被判处死刑, 后改5年监禁。1938年重新被捕并死于狱中
Я. Т. 杰杜先科	顿河哥萨克	大学肄业	1890 ~ ?	1906	从1906年参加革命起就遭流放。一战前在普斯科夫省地方自治局工作。1917年2~10月彼得格勒市食品管理局成员。立宪会议成员。参加第八次党务会议, 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管理食品、贸易和工业。1922年被起诉。后从事合作社和工会工作, 脱离党的工作
Д. Д. 顿斯科伊	农村医生	大学	1881 ~ 1936	1905年前后	曾因人党而流放托博尔斯克, 一战期间在高加索前线当医生。1917年前线政委, 四大中央委员。1918年领导军事委员会, 反对布尔什维克。1919年被契卡逮捕, 直到1922年被判处死刑, 后改判5年监禁。1936年病逝
А. Б. 叶利亚谢维奇	医生	大学	1888 ~ ?	1905	1905~1907年作为党的宣传员开展工作。1907~1917年没有参加党的活动, 在大学教书。1917年3月为社会革命党拟定市政纲领。四大中央委员, 立宪会议成员。1919年3月停止党的工作, 在萨拉托夫大学教书。5月退党。1922年被起诉, 特赦, 作为证人参加社会革命党审判。1929年被流放。1949年参与列宁格勒案件。1953年被大赦

续表

领导人	出身	教育程度	生卒年	入党时间	备注
C. C. 扎克	小市民	大学	1867 ~ 1930	20 世纪初	1905 年革命敖德萨城市委员会成员, 党的农业问题理论家。1908 年出国, 1917 年成为左派社会革命党, 参加三大。因拒绝退出第二届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大会而被开除出党。参加左社活动。1920 年末回到敖德萨, 被开除出左社。很快脱离政治工作, 从事经济统计工作
M. П. 扎东斯	工人		1882 ~ ?	1905	1905 年革命中参加工人代表苏维埃。积极参与党的报刊出版工作。三大中央委员, 预备立宪成员和立宪会议代表, 四大代表。1920 年被捕, 1922 年被判刑。后不知
H. H. 伊万诺夫	大学		1888 ~ 1937	1906	北方飞虎队成员。服苦役 15 年。四大候补中央委员, 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 立宪会议和乌法会议代表。先后被高尔察克和布尔什维克逮捕。1926 年被流放, 1937 年被枪毙
E. A. 伊万诺娃	小市民	培训班	1884 ~ 1937		1907 ~ 1915 年为图书管理员。1915 ~ 1919 年没有工作, 1920 年为办事员。1921 年被捕, 审讯时发现她参与社会革命党战斗组织暗杀布尔什维克党领袖, 在谢苗诺夫和中央之间保持联系。她否认自己的党性。同情布尔什维克, 但批评其政策。1922 年判处死刑, 后改为 5 年监禁。1937 年被枪毙
B. Д. 卡姆科夫	地方自治局医生	大学	1885 ~ 1938	20 世纪初	一战时坚持国际主义立场。左派社会革命党领导人, 倡导党内独立。苏维埃二大左社党团领袖, 没有参加苏维埃政府。反对布列斯特和约, 积极参加 1918 年 7 月暴动。乌克兰、白俄罗斯和立陶宛左派社会主义运动组织者。1919 年停止与布尔什维克斗争。1930 年被捕, 监禁。1938 年被枪毙
A. Ф. 克伦斯基	律师	大学	1881 ~ 1970	1917. 3	社会政治和国务活动家, 第四届杜马代表, 工兵代表苏维埃副主席, 临时政府司法部长、陆海军部长、临时政府总理。十月革命后试图组织反布尔什维克行动。1918 年夏流亡欧洲, 反对欧洲强国人侵, 支持右翼社会革命党主张, 在俄国建立民主共和国。二战后流亡美国, 晚年试图回到苏联, 但未能如愿。1970 年病逝于纽约
И. Н. 科瓦斯基	小市民	大学	1880 ~ 1962	1899	1909 年中央委员, 莫斯科委员会成员, 莫斯科副市长。不承认十月革命, 参加俄国复兴同盟。1919 年流亡, 参加社会革命党右翼。1940 年迁往纽约, 领导俄国医生协会
H. Д. 康德拉季耶夫	农民	大学	1882 ~ 1938	1905	护国派。领导彼得格勒地方自治联盟经济统计部, 国家食品委员会副主席, 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执委会成员, 立宪会议成员, 1919 年脱党, “长波经济理论”的创立者

续表

领导人	出身	教育程度	生卒年	入党时间	备注
M. Л. 科甘一别恩施泰因	民意党	大学	1886 ~ 1918	1909	1909年留学回国。一战中为齐美尔瓦尔德分子，领导沃罗涅什省委员会，编辑《社会革命党报》。参加三大、四大，沃罗涅什苏维埃副主席，四大中央委员。立宪会议代表。第三、四届全俄中央执委会党团领导，参加第八次党务会议，反对与布尔什维克进行武装斗争。1918年参加萨马拉政权。1918年9月离开乌法会议，同年被枪毙
A. Л. 科列加耶夫	民意党	大学	1887 ~ 1937	1906	1917年任莫斯科喀山铁路协会律师，省地方自治管理局成员。喀山左派社会革命党创立者。参加十月革命，全俄苏维埃执委会代表，左社党中央委员，苏维埃政府农业部长。反对布列斯特和约，1918年3月卸任农业部长。革命共产主义党组织者。1918年11月加入苏共。1936年被捕，1937年被枪毙
C. Л. 马斯洛夫	小市民	大学	1873 ~ 1938	1902	1906年被捕，1913年开始在合作社工作，编辑《农民报》、《土地自由报》。1917年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主席团成员。土地总委员副主席，土地法草案的作者，临时政府农业部长，立宪会议成员。1918年脱离政治活动，在高校教书。1938年被枪毙
Ф. Е. 马辛	哥萨克	军校	1882 ~ 1945	1906	一战中罗马尼亚前线第八军区司令部作战室长官，校官。十月革命后建立地下军官组织。应中央要求，1918年参加红军，在乌法前线转向人民军。1920年流亡，参加国外社会革命州委员会，1941~1945年效命南斯拉夫，不久去世
C. Д. 穆斯基斯拉夫斯基	贵族	大学	1876 ~ 1943	1904	军人联合会的组织者，军官联合会机关报编辑。积极参加二月革命。彼得格勒社会革命党委员会成员，北方州委员会副主席，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支持布尔什维克，从1917年12月起领导游击战争。1918年反布暴动之后被捕。1918年末反邓尼金。参加苏波战争。1921年回国后从事工会和文学工作
C. П. 波斯特尼科夫	教师	大学	1883 ~ 1965	1906	是参加革命起就是阿尔汉格尔斯克省委员会成员，参加巴黎党代表会议。1912年创立《遗嘱》杂志，《思想报》、《俄罗斯新闻》、《现代人》、《祖国之子》杂志编辑。一战时反对护国主义和失败主义。1917年创立党机关报《人民事业报》。彼得格勒城市杜马党团代表，立宪会议代表。1921年流亡，参加国外社会革命党代表团，与切尔诺夫编辑《革命的俄罗斯》

续表

领导人	出身	教育程度	生卒年	入党时间	备注
П. П. 普罗相	作家	大学	1883 ~ 1918	1903	敖德萨社会革命党组织领导人之一。多次因参加革命运动被捕、流亡。一战中成为国际主义者,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苏维埃政府邮电人民委员。由于不同意布列斯特和约退出政府,协助刺杀德驻俄大使米尔巴赫,后死于伤寒
И. А. 普里列扎耶夫	神甫	农艺师	1881 ~ 1946	1902	入党后即在全国各城市从事宣传工作,多次被捕。1915年参加新民粹派大学生组织,成为执委会委员。从事合作社研究。1917年3月加聘基辅省委员会。三大、四大中央委员,立宪会议成员。参加党的农业问题委员会,与切尔诺夫在观点上发生冲突,退出中央,退党。1918年3月到莫斯科食品委员部工作。1922年声明同意布尔什维克的纲领和策略。1923年号召前社会革命党人加入共产党。1931年成为预备党员
Д. Ф. 拉科夫	农民	大学	1881 ~ 1941	1905	1905 ~ 1907年领导喀山教师联合会,创立全俄农民联合会地方组织。1907年4月流亡欧洲,1910年回国。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成为三大、四大中央委员。从1917年6月开始从事党的出版和组织等工作。1918年1月进入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主管萨马拉立宪会议政权财政。1919年流亡欧洲。1920年回到莫斯科领导地下工作。1920年6月被捕。1922年被判10年监禁,后改为5年监禁。1937年再次被判刑,1941年被枪毙
Е. М. 拉特纳	医生		1886 ~ 1931		俄国预备议会成员,四大中央委员,1918 ~ 1919年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19年被捕。1922年被判死刑,后改为5年监禁。后在不同地方流放,1931年死于癌症
В. Н. 里希特	航海员	大学	1880 ~ 1932	1902	早年曾参加战斗组织。1906年参与建立南俄州委员会。1907年逃亡国外,被选为国外社会革命党州代表。1908 ~ 1914年在海外学习。1917年成为意大利记者联合会成员。二月革命后被选为三大、四大中央委员,立宪会议成员。第八次党务会议后退出中央委员会回到敖德萨。1918 ~ 1921年在中学教书,1921年被捕,监禁到1929年,1930年之后被流放。1932年死于伤寒

续表

领导人	出身	教育程度	生卒年	入党时间	备注
Д. С. 罗森布吕姆	小市民	大学	1873 ~ ?	1905	早年参加革命运动。社会革命党著名活动家。1917 ~ 1918 年主持全俄合作社代表大会法律部。1921 年之前在中央联合会工作。1921 年 3 月到莫斯科农业合作社经济部工作，同年被捕。审判时他宣称从 1918 年起就已脱离党的工作。1922 年被特赦
Н. С. 卢萨诺夫	商人	大学	1859 ~ 1939	1905	早年曾创办《俄罗斯财富》、《人民自由通报》和《俄国革命通报》。社会革命党理论家，是党内的马克思主义反对派。参加了第一二次代表大会，继续编辑刊物。1905 年后成为《俄罗斯财富》唯一的社革党编辑。1912 年办《遗嘱》杂志。1917 年二月革命后办《人民事业报》。三大、四大中央委员，立宪会议代表。1918 ~ 1920 年参加国际社会主义代表大会。1923 年开始参加国外社会革命党并创办《革命的俄罗斯》。30 年代开始脱离党组织，写回忆录
Н. В. 斯维雅基茨基	律师		1887 ~ 1937		党立宪会议选举委员会秘书，立宪会议成员。1918 年萨马拉立宪会议政权秘书，人民小组成员。内战后在苏俄机关工作
П. А. 索罗金	匠人	大学	1889 ~ 1968	1905	俄国著名社会学家。一战前就开始写作社会学著作。1917 年成为党右翼领导人，编辑《人民自由报》。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执委会成员，制定立宪会议章程。1918 年声明党已经失去农民支持并退党，从事科学和教学工作。1922 年离开俄国，先后生活在布拉格和美国，从事社会学教学研究。从 1964 年始任美国社会学协会主席
В. В. 苏霍姆林	民意党	大学	1885 ~ 1963		1917 年《人民事业报》编辑，四大中央委员。1918 年 3 月加入社会革命党国际代表团，社会主义国际局成员。编辑《革命的俄罗斯》和《俄罗斯自由报》。二战时支持苏联和红军同法西斯斗争，1947 年接受苏联国籍，1954 年回国
М. А. 斯皮里多诺娃	六品文官		1884 ~ 1941	1905	1906 年因刺杀卢热诺夫斯基被判刑。1917 年被克伦斯基释放。三大代表，左派组织局成员。左社领导人，支持十月革命。立宪会议名誉主席。拥护解散立宪会议。反对布列斯特和约，1918 年 7 月刺杀德国驻俄大使米尔巴赫。随后不止一次被捕、流放。1941 年被枪毙

续表

领导人	出身	教育程度	生卒年	入党时间	备注
М. И. 苏姆金	农民	大学	1873 ~ 1942		1907年之前多次参加革命运动,被判刑。1907年到巴黎,参加国外代表团。1908年开始在科斯特罗马开展工作。1911~1912年从事科学工作。1917年4月在下诺夫哥罗德当政委,不允许有任何强制,希望和布尔什维克谈判化解危机。立宪会议成员,四大中央委员,领导中央农民部。因反对必须对布尔什维克采取积极行动而退出中央委员会。1920年起继续研究冻土学
И. И. 捷杰尔金	小市民	工人	? ~ 1918		1917年主持第一次彼得格勒代表会议,三大、四大候补中央委员,立宪会议成员,参加第八次党务会议。1918年,因参加伊热夫和沃金斯基工厂暴动而被契卡枪决
Е. М. 季莫费耶夫	民意党	大学	1885 ~ 1941	1903	1903年第一次被捕,1906年因刺杀普梯洛夫工厂副厂长被捕,判10年苦役。1910年因在监狱中领导社会革命党再次被判10年苦役。1917年二月革命后被释放,参加伊尔库茨克组织并领导苏维埃。三大、四大代表,立宪会议成员,四大中央委员。1918年春组织军事委员会,参加第八次党务会议,为恢复俄国独立而斗争。1919年参加党南俄局。1920年被捕,判处死刑,后改为5年监禁。1939年再次被判25年监禁,1941年被枪毙
В. Е. 屠鲁多夫斯基	文学家 经济学家	大学	1889 ~ 1937	1917	左派社会革命党领导人之一。在彼得格勒委员会领导市政局,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城市地方自治人民委员。从1917年起在苏维埃政府任城市地方市政人民委员。布列斯特和约之后退出政府,1918年暴动后被捕。1937年被处决
А. М. 乌斯基诺夫	富裕地主	大学	1879 ~ 1937	1906	一战中为国际主义分子,左派社会革命党领导人,北方州委员会成员。后被开除出党。土地社会化法令拟定者之一。革命共产党创始人和领导人。谴责左派社会革命党暴动。1920年加入苏共。1921年起在苏外交部门工作

续表

领导人	出身	教育程度	生卒年	入党时间	备注
В. Л. 乌特果夫	宪兵将军	大学	1887 ~ ?	1906	1905 年开始进行革命宣传, 参与创立军官联合会, 党军事局成员, 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代表, 彼得格勒军事组织主席, 党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立宪会议代表。1918 年参加萨马拉立宪会议政权, 坚持中立立场。1919 年在合作社工作。1921 ~ 1922 年为奔萨省经济联合会代表。1922 年被捕, 判处 5 年监禁。1925 ~ 1928 年被流放。1937 年被枪毙
Ф. Ф. 费奥多罗维奇	贵族	大学	1877 ~ 1928	1902	早期不止一次被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获得自由。四大中央委员, 立宪会议代表。参加第八次党务会议和萨马拉政权, 参加乌法国务会议。1919 年参加中央西伯利亚代表团, 任政治中心主席。1920 年去莫斯科, 1921 年参加中央会议。1922 年被判死刑, 后改为 5 年监禁。1926 年起被流放, 死于血感染
А. А. 霍夫林	世袭贵族	大学肄业	1877 ~ 1933	20 世纪初	1902 年因参加学潮被捕, 参加 1905 年起义。从 1906 年起成为莫斯科州委员会委员, 在军队中宣传。1909 年中央委员, 1917 年三大候补中央委员。1920 ~ 1921 年几次被捕流放, 1922 年被逮捕起诉。1933 年逮捕流放, 死在路途
В. Ф. 柴金	农民	自学	1886 ~ 1941	1903	1917 年四大中央委员, 领导民族委员会, 宣传联邦制。立宪会议成员。1918 年初在乌克兰工作, 退出中央委员会。1919 年倡议调查英国入侵者和里海东岸临时政府枪杀巴什基尔委员问题。社会革命党对这件事没有发表意见, 柴金在报刊上发表调查结果。1922 年被捕, 遭审判。1938 年被捕, 1941 年被枪毙
А. А. 施赖德尔			? - 1930		左派社会革命党领导人, 1917 年 7 月成为彼得格勒委员会副主席、主席, 工兵代表苏维埃、农民代表苏维埃执委会成员。苏联政府副司法人民委员。布列斯特和约后退出政府, 1921 年始任国外左派社会革命党代表
Г. И. 施赖德尔	商人	大学毕业	1860 ~ 1940		市政管理专家, 1917 年彼得堡市长, 1918 年领导立宪会议东南委员会, 宣传蒙蔽策略, 希望服从乌法执政。流亡期间投身于切尔诺夫领导的左翼

对比两个阶段的发展状况,我们不难发现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新时期的领导层内,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发挥作用的领导人已经不多,保存下来的已经形成稳定的领导集体。他们是切尔诺夫、丰达明斯基、拉基特尼科夫、津季诺夫、A. 戈茨、阿夫克先基耶夫、卢萨诺夫、米诺尔、鲁巴诺维奇、纳坦松。切尔诺夫、拉基特尼科夫、津季诺夫、卢萨诺夫、A. 戈茨五人三大、四大连续担任中央委员,对于稳定党的领导集体作用重大。切尔诺夫确定了革命性质,把党引上民主建设的轨道,成为“党统一的化身”。^① 1917年5~8月他出任临时政府农业部长,提出土地法草案,1918年1月被选为立宪会议主席。他在党内和农民中的威信之高,使人相信只有他才能保证党员和农民给予临时政府最大的支持。^② 阿夫克先基耶夫担任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执委会主席,内务部长。津季诺夫担任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执委会党代表,领导彼得堡委员会——三大前中央委员会,为党迅速夺取工兵代表苏维埃领导权发挥重大作用。拉基特尼科夫重建萨拉托夫地方党组织,担任三大主席团主席、农业部副部长,参与制定立宪会议土地法草案。

第二,涌现出大批新人。他们是各方面的专家,参与各种群众组织、引导运动方向、积极制定土地法、准备立宪会议,使党的力量迅速壮大。他们是农业问题专家、合作社运动的推动者马斯洛夫、维赫利亚耶夫、康德拉季耶夫、贝霍夫斯基、普里列扎耶夫、沃罗诺夫、扎克、乌斯基诺夫等;法律问题专家维什尼亚科、索罗金、斯维亚基茨基、Г. 施赖德尔;社会活动家克伦斯基、维索茨基、加夫龙斯基、韦杰尼亚平、根捷里曼、格尔施泰因、拉科夫、拉特纳、斯皮里多诺娃、屠鲁多夫斯基、苏霍姆林、苏姆金等;军事问题专家乌特果夫、Н. Н. 伊万诺夫等。

第三,从出身看,来自贵族官宦之家12人,商人之家6人,工人、农民和小市民之家16人,知识分子之家10人,神甫之家2人,革命家庭4人,身份不明者2人,平民领导增多,成分更加复杂。

第四,从年龄结构来看,19世纪40年代出生的1人(布奶奶),50~60年代出生的11人,70~80年代出生的51人(其中80年代出生的23

①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17.2 - 10, т.3, ч.1, с.198.

② И. Г. Церетели,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о Феврал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Кн.1, с.470. См., К. В. Гусев, В. М. Чернов Штрихи к политическому портрету, с.64.

人), 90年代出生的1人, 出生时间不详的6人。对年龄结构分析表明: 1917年革命中占多数的是70~80年代出生的30多岁的年轻人。

第五, 从教育程度来说, 受过大学教育的有42人, 家庭妇女1人, 中学教育的6人, 不详的5人, 受教育程度更高。

第六, 复杂的等级结构、年轻的知识分子面对各种政治势力和战争环境迅速分化成三派。以纳坦松、斯皮里多诺娃、比岑科、阿尔加索夫、扎克、卡姆科夫、格尔施泰因、普罗相、穆斯基斯拉夫斯基、屠鲁多夫斯基、乌斯基诺夫和A. 施赖德尔为首的左派, 1917年三大上提出“42人纲领”, 秋天组成左派社会革命党独立党团参加民主会议, 与布尔什维克一起参加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 11月举行左派社会革命党成立大会, 12月, 6人加入人民委员会。左派社会革命党反对与临时政府合作, 反对战争, 主张立刻夺取地主土地, 实现土地社会化, 建立清一色的社会主义政府。以阿夫克先基耶夫、阿尔古诺夫、丰达明斯基、布列什科—布列什科夫斯卡娅、克伦斯基、科瓦尔斯基、韦杰尼亚平、维什尼亚科、沃罗诺夫、A. 戈茨、马斯洛夫、索罗金为首的右派坚持与立宪民主党合作, 反对农民夺取土地, 主张召开立宪会议, 反对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以切尔诺夫、津季诺夫、卢萨诺夫、苏霍姆林、季霍米罗夫、费奥多罗维奇、波斯特尼科夫等人为首的中派联合了社会革命党大多数, 与立宪民主党合作失败后, 走上了既反对与立宪民主党联合, 又反对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道路, 把一切希望寄托于立宪会议, 主张通过民主方式建立联邦自治共和国。还有一些经济方面的专家如贝霍夫斯基、维赫利亚耶夫、康德拉季耶夫、普里列扎耶夫等人, 埋头土地法的制定, 政治观点相对温和。拉基特尼科夫、沃尔斯基、布列沃依等人先站在中派立场, 高尔察克政变后转为与布尔什维克合作。

1917年, 社会革命党领导阶层规模扩大了, 成分复杂了, 文化水平提高了, 与工人、农民的结合程度进一步加深。然而, 由于过分强调民主, 面对沙皇倒台留下的政治真空, 并没有加强组织建设, 团结一致夺取政权, 反而在战争问题、土地问题、政权问题、夺取政权的手段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分裂。由于领导层内部的分歧, 这个百万党员的大党在政治上毫无建树。

二 党员成分分析

社会革命党组成成员包括三个部分, 工人、农民和革命的知识分子。

1905年革命之前，党的结构中主体是知识分子，工人和农民成分虽有所增加，但不占主流。根据叶罗费耶夫的统计，社会革命党中的知识分子包括大中学生、教师、医生、律师、作家、农艺师、统计师、职业革命家等，共1587人，占72.2%；工人共有575人，占26.16%；农民有36人，占1.63%。知识分子大多分布在敖德萨、基辅、莫斯科、彼得堡、萨拉托夫、哈尔科夫、奔萨和国外；工人主要分布在基辅、敖德萨、叶卡捷琳诺斯拉夫、萨拉托夫、彼得堡和基什廖夫等地，农民主要分布在坦波夫、瓦西里苏尔斯等地。^①

1905年革命，特别是10月17日宣言颁布以后，知识分子适应革命形势，纷纷奔赴农村、工厂，在工人和农民中间开展宣传工作。工人和农民大批加入社会革命党，使党的成分大大改变。1905年秋，奔萨省建立了60个农民兄弟会，萨拉托夫建立了150~200个农民兄弟会，参加的人数有上千人。莫斯科有几千工人加入社会革命党，基辅、彼得堡、德文斯克也有几百个工人加入。1906、1907年之交是社会革命党组织发展最快的时期。据列昂诺夫统计，21个省组织中共有党员21752人，其中工人9394人，占43.2%；农民9835人（包括士兵），占45.2%；知识分子2521人（包括中学生），占11.6%。^②英国学者佩里认为，社会革命党中工人占45.3%，农民占7.7%，牧师和店员占12.8%，业主占16.5%，学生占16.5%，其他人占0.9%。^③列昂诺夫认为佩里的数据不可信，因为他只使用了苦役犯的资料。工人党员主要分布在彼得堡、莫斯科、斯摩棱斯克、图拉、维亚特卡、乌拉尔、中亚和高加索。农民党员主要分布在伏尔加、乌克兰和中央黑土地带。农民人数超过50%。

社会革命党内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的结合有如下特点。第一，在吸收工人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功。以第二届杜马选举资料为例，据米哈依洛夫研究，工人选票共有36568张，孟什维克获得了9581张，布尔什维克获得了5329张，非党团社会民主党获得2210张，整个社会民主党共获得17120张，占总选票的46.8%，社会革命党获得了13223张选票，占总选票的

① Непролетарские партии России в трех революциях, с. 128 - 130.

② М. И. Леонов,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в 1905 - 1907 гг., с. 59.

③ M. P. Perrie, *The social composition and structure of the Socialist—Revolution Party before 1917*, p. 245.

36.1%。^① 社会革命党吸收的工人主要是一些文化水平较低、与农村保持联系的人，在吸收有觉悟、有文化和政治经验的产业工人方面，社会革命党大大逊色于社会民主党。第二，在有工人参加的省委员会中，工人常常与知识分子发生冲突，对他们的霸道和寡头习气非常气愤。库尔斯克工人联合会罢免了知识分子，选出自己的代表顶替他们；在莫斯科，因工人小组与知识分子小组的冲突，O. 叶麦里扬诺夫远走海外。在彼得堡等地实行民主选举的工人、农民自治组织，常常因知识分子破坏民主选举原则而脱离省委员会，转为反对派。第三，在农村参加社会革命党的主要是中农。由于独立的财产意识，他们常常感到国家加速的工业改革给落后的农业带来巨大冲击，膨胀的贪欲常常使农村的富农恶魔盗窃村社的财产，破坏村社的安定，他们坚决反对分割集体的行为，呼吁勤劳致富。社会革命党通过农村知识分子如教师、农艺师、医生、统计员等为农民服务，吸引农民走上革命道路。农民欢迎知识分子的救助，但坚决反对不经赎买没收私人购买的土地。参加第二届杜马的39名社会革命党代表中，农民代表15人，反映了社会革命党成分的变化，但由于社会革命党的恐怖政策而退出社会革命党的6人中有4人是农民。^②

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社会革命党在组织上开始向群众政党转变，但由于历史的过渡性，知识分子的等级观念和教条性使他们与农民、工人结合的道路变得漫长。

经过了近十年的组织瘫痪、思想反省，特别是对因恐怖政策和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群众离散的反思，社会革命党走上了参与各种群众组织，加强组织建设的道路。1917年二月革命之后，社会革命党利用战争和革命造成的民主机会在各种民主组织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组织规模迅速扩大，并成为真正的群众性政党。社会革命党主要集中在三个阵地。第一个阵地仍然是它们的传统阵地农民群众。这一时期吸收农民入党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首先，特别注意吸收农村知识分子，如教师、医士、统计员、农艺师及其助手，通过他们给予群众具体的帮助，提升党在农民中的形象。其次，派出自己的宣传员在群众大会上宣读自己的纲领，而后让农民登记入党。例如，在切尔尼戈夫省斯塔罗杜波县召开的第一次群众大会上，有240名农民

^① М. И. Леонов,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в 1905 – 1907 гг., с. 360.

^② М. И. Леонов,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в 1905 – 1907 гг., с. 499 – 504.

登记入党。^① 第三, 加强乡基层组织建设, 加强省、县委员会与基层组织的联系。科斯特罗马省瓦尔纳文县委员会在 21 个乡中与 6 个乡建立了联系。沃罗涅什省 180 个乡中有 104 个乡建立了党组织。^② 非常遗憾的是, 究竟或者大概有多少农民加入社会革命党, 缺乏完整的统计资料。阿斯特拉罕只是笼统地讲, 在革命初期, 社会革命党在全国许多地区垄断了农村工作。^③ 1917 年 10 月, 苏俄人民委员会派特使到萨拉托夫各县农村调查各政党影响情况, 调查结果表明: 社会革命党在农村占据优势。调查在 10 个县进行, 共散发了 46 份问卷, 其中回答社会革命党占绝对优势的有 32 份问卷, 回答布尔什维克占优势的只有 3 份问卷, 有 9 份问卷在社会革命党和布尔什维克之间产生了分歧, 有 2 份问卷在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之间产生了分歧。^④

社会革命党第二个阵地是军队。由于战争的影响, 大量的农民参军, 军人便有了“穿着军服的农民”的称号。3~4 月, 喀朗施塔德的水兵中有 5000 人加入社会革命党。В. И. 米列尔对罗马尼亚、西南前线和其他前线的选票做了调查, 支持社会革命党的有 186.4 万张, 估计军队中的社会革命党党员有 26 万人。^⑤

如果说农民和穿着军装的农民是社会革命党影响的传统阵地, 那么社会革命党在城市中的胜利则是它走向群众政党的鲜明标志。Н. В. 斯维雅基茨基对城市杜马选举情况所作的统计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斯维雅基茨基把城市划分为 4 类, 在拥有 10 万以上居民的第一类大城市 (21 个) 中, 社会革命党有 857 人当选议员, 占总数 (2214) 的 38%; 孟什维克有 256 人当选, 布尔什维克有 337 人当选, 联合社会民主党有 76 人当选, 三者共占总数的 30%; 劳动人民社会党有 38 人当选, 占总数的 2%。在拥有 5 万居民以上的第二类大城市 (48 个) 中, 社会革命党参选了 23 个, 629 人当选, 占总数 (1403) 的 44%; 孟什维克 79 人当选, 布尔什维克 153 人当选, 联合社会民主党 204 人当选, 三者共占总数的 31%; 劳动人民社会党 27 人当

① Х. М. Астрахан, Большевики и и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ротивники в 1917 году, с. 235.

② Х. М. Астрахан, Большевики и и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ротивники в 1917 году, с. 236.

③ Х. М. Астрахан, Большевики и и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ротивники в 1917 году, с. 237.

④ Г. А. Герасименк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положение Саратовской деревни в октябрьские дни. См., 1917 год в судьбах России и мира Октябрь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от новых источников к новому осмыслению, М., Институт ро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1998, с. 164.

⑤ Л. Г. Протасов, К истории борьбы эсеров за армию в 1917 г. См., Непролетарские партии России в герх революциях, с. 171.

选，占总数的2%。在拥有2万~5万居民的51个中等城市中，社会革命党在16个城市参选，有323人当选，占总数（660）的49%；孟什维克有63人当选，布尔什维克有1人当选，联合社会民主党有63人当选，三者共占总人数的19%。在拥有不足2万人的101个小城市中，社会革命党参选了24个小城市，有273人当选，占总数（617）44%；孟什维克有41人当选，布尔什维克有20人当选，联合社会民主党有66人当选，三者共占总数的21%。在84个参选城市中，社会革命党有2082人当选为议员，占总数的42%，社会民主党当选议员占总数的28%，孟什维克占总数的9%，布尔什维克占10%。84个参选城市中，社会革命党在45个城市占绝对优势，主要集中在伏尔加河地区、南方和西伯利亚。^①

1917年二月革命以后，各种群众组织纷纷成立。除了我们知道的工兵代表苏维埃、农民代表苏维埃外，还有许多非无产阶级的组织，例如彼得堡、莫斯科城市自治局，全俄职业联合会、冶金工人中央联合会、印刷工人职业联合会、铁路工人职员联合会、邮电工人职员联合会、全俄工商职员联合会、莫斯科消费协会、莫斯科人民银行、合作社中央委员会、农业组织中央机关、彼得堡工人合作社联合会、人民军军官联合会等。社会革命党因强调非党性、超阶级性、坚持中立的立场，得到非无产阶级组织（或称中间阶层）的大力支持。在沃罗涅什工兵代表苏维埃中，1917年3月初，社会革命党占67%，孟什维克占20%，布尔什维克占13%；奥尔洛夫苏维埃参加全俄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除布尔什维克外就是社会革命党；7月，沃罗涅什工兵代表苏维埃改选中，社会革命党占44%，孟什维克占6%，布尔什维克占10%。^② 俄国城市中间阶层（半无产阶级的雇佣劳动组织、职员、知识分子、大学生、小资产阶级）超过1400万人，职业联合会是他们参加政治生活的主要形式。在非工业省城市职业联合会中央局中占优势的是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1917年夏举行的第三次全俄工会联合会代表大会，参会代表220人，大部分来自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占优势的省份，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获得105票，布尔什维克获得73票。1917年党

①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17.2 - 10, т.3, ч.1, с.735 - 740.* 关于各城市议员人数·斯维雅基茨基统计出现错误，笔者根据分表做了更正，特此说明。

② *В. В. Канищев, К вопросу о причинах преобладания эсеров в городских Советах Черкоземного Центра весной 1917 г. См., Непролетарские партии России в терх революциях, с.174.*

的三大上，在提交的 245 份履历表中，几乎有 200 名代表来自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阶层。^①

对 1917 年社会革命党组织成分的分析发现，社会革命党不仅代表了农民和与农村保持联系的工人的利益，而且吸引了大批城乡中间阶层，社会革命党组织迅速壮大。在分析社会革命党发展迅速的原因时，20 世纪 70～80 年代苏联学者多从社会革命党的积极宣传、党的小资产阶级性、组织的松散性等方面着手。比较典型的有阿斯特拉罕的《1917 年布尔什维克和它们的政敌》、古谢夫的《社会革命党·从小资产阶级革命性到反革命》、Л. М. 斯皮林等主编的《俄国非无产阶级政党·历史教训》等书，书中都谈到社会革命党加大了宣传力度，截至 1917 年 5 月，出版了 30 份报纸，10 月达到 90 份；由于战争的原因，大量的农民、商人、手工业者、职员、知识分子充实到军队、工厂，小资产阶级成分遍布各行各业，社会革命党提出的土地社会化、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民主共和国、召开立宪会议、与盟国和平体面地结束战争的观点吸引了小资产阶级，特别是社会革命党主张通过妥协、谈判的方式解决劳资纠纷符合小资产阶级维持资本主义秩序、只追求经济要求的愿望；加上社会革命党降低入党标准，使得社会革命党迅速成为庞大的“三月政党”^②。

从阶级的角度分析社会革命党的发展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在战争期间，沙皇政权倒台以后，为什么这么多的小资产阶级政治化，成立自己的政治组织？为什么会出工人阶级的小资产阶级化？这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战争是实力的较量，沙皇因战败而垮台，褪去了笼罩在沙皇头上的神秘光环，被压制或者说失去了依靠的农民、工人、军人以及各种中间阶层纷纷按职业成立自己的群众组织以自保。例如，农民提出获得土地，工人要求提高工资和福利，军人要求减少体罚、废除死刑，各种中间阶层也纷纷要求恢复社会正常秩序，确定法律维护自身的

① Г. Н. Каверина,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ьные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средних городских слоев и мелкобуржуазные партии в период мир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революции (на материалах Тамбовской и Воронежской губерний). См., Непролетарские партии России в терх революциях, с. 179, 182, 180.

② “三月政党”即三月份趁着二月革命（格里高利历为三月革命）的机会一下子膨胀起来的政党，主要有知识分子、官员、军官、小商人等，因追求数量而忘记了对党纲的遵守，具有讽刺的意味。Х. М. Астрахан, Большевики и и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ротивники в 1917 году, с. 239 - 242; К. Гусев, Партия эсеров: от мелкобуржуазного революционаризма к корттреволюции, с. 98 - 101; Под рек. Л. М. Спирина, Непролетарские партии России уроки истории, М., Мысль, 1984, с. 253 - 257.

私有权利。正如列宁所说：“实际上，俄国目前的政治形势的关键就在于非常广大的人民群众充满了立宪幻想。不了解这一点，就根本不能了解俄国目前的政治形势。”^① 应该承认，这是普通百姓正常的经济和人身要求。社会革命党提出沙皇推翻后迎来的是劳动民主阶段，“根据党的纲领和以往为劳动阶级的利益而做的斗争，我们有权期待把现在普遍追求政治生活的城市工人力量和农村劳动人民大批地吸收到自己的队伍中来，组织地方委员会甚至乡或者村委员会，建立民主共和国，实行土地社会化，根本改造工业劳动组织，在普遍、直接、平等和秘密投票的基础上选举立宪会议”。^② 社会革命党的主张反映了战后广大农民、工人以及中间阶层的心理和利益要求，在结社自由的条件下，社会革命党的壮大应是情理之中的事。

第二，经过了1905~1907年战斗洗礼的社会革命党，因执行战斗策略、忽略在群众中进行组织建设，闹得众叛亲离。经过阿泽夫间谍案之后，社会革命党领导人进行了深入的总结，完成了从战斗策略向联合策略，从只注重口号宣传向关心群众疾苦的过渡。根据社会革命党提交给哥本哈根国际会议的材料，转变策略的社会革命党加紧了群众宣传，在国外出版了《劳动旗帜报》、《工人报》，在国内出版了大量地下小册子、传单，还在巴库出版了《现代人报》、《海浪》等军人报，在奔萨、伏尔加河地区、南方和中央区出版了各种名称的农民报。1910~1914年从国外向国内运进了大量报刊，在工人、农民和士兵中广为流传，扩大了社会革命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同时，社会革命党还在彼得堡、莫斯科、基辅、敖德萨等大城市的工人中，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士兵和水兵中加强活动和联络。^③ 经过战争条件下的几年苦心经营，1917年，迅速填补了沙皇垮台之后留下的政治真空，力量迅速壮大。

战争同样消耗了国家的一切经济力量，用切尔诺夫的话说，战争像一个唧筒（泵）抽走了整个国家的资源；对于俄国来说，战争也像涨潮的巨浪，退潮后暴露出国家真实的经济沙滩。战败后出现的衰败景象在俄国内部迅速掀起了强烈的爱国热潮，暂时掩盖了各阶级之间的矛盾纷争。社会

① 《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92，第17页。

②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17.2 - 10, Т.3, Ч.1, с.33 - 34.

③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07.6 - 1917.2, Т.2, с.464 - 467.

革命党站在这样一个基点上，呼吁各阶级克制，同仇敌忾，共同建设，并把它当做建设未来社会主义的起点，忽视了阶级之间的差别。社会革命党的错误在于：把政治热情当做政治能力，忽略了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自身的经济软弱和政治幼稚，使自己陷入政治两难的尴尬境地。切尔诺夫认识到俄国的有产阶级已经有效地组织起来，而俄国的大多数农民与工人还没有组织，或者组织得不好，俄国的强大首先取决于工人和农民组织。

然而，在如何实施组织问题上，切尔诺夫没有明确的想法。组织的问题说起来是个经济问题，但实际上是一个政治问题。农民或者中间阶层由于自己虚弱的经济地位，常常在政治问题上中立或者左右摇摆，在政治上的幼稚常常使他们怀念过去的政治制度——君主制度。正如米留可夫所说，“为了巩固新的制度需要强大的政权，并且只有依靠群众熟悉的权力象征，政权才可能存在，这种象征就是君主制度。一个临时政府没有这样的象征作为支柱就不能生存到立宪会议的召开。它就会像一艘破旧的船在人民骚动的汪洋大海中沉没”。^① 社会革命党试图依靠没有经济实力、不懂政治为何物的广大民众，在没有民主传统的专制国家里建立民主制度，高估了民众的政治实力。所以，列宁深刻地意识到：在政权问题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势不两立。“要使大多数人真正能够决定国家大事，必须具备一定的实际条件。这就是：必须稳固地建立一种有可能按照大多数人的意志决定问题并保证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政权。”^② 实际上，1917年的俄国，由于中间力量的弱小，在政权问题上面对的正是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或者地主资产阶级政权，或者无产阶级政权。社会革命党的观点虽然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愿望，但在1917年的俄国没有能力付诸实施，这就是它在1917年3～10月和平发展时期力量发展那么迅速，涌进的阶层那样庞杂，但最终走向失败的原因。

① П. Н. Миллюков,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М., 1991, с. 468. См., С. Е. Руднева,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е совещание сентябрь 1917 г. История форума, М., Наука, 2000, с. 244.

② 《列宁全集》第32卷，第22页。

第四章

社会革命党的战斗策略

第一节 “一大”前的战斗鼓动

一 战斗鼓动策略的提出

社会革命党从1902年宣告成立始，便着手党的建设。社会革命党由一些小组合并而成，主要成分为知识分子，包括大中學生、教师、医生、律师、作家、农艺师、统计师和职业革命家。一个知识分子政党要想成为群众性的政党，首要的任务就是鼓动宣传。

由于在革命性质上的分歧，社会革命党领导人内部对于鼓动策略存在分歧。构成社会革命党的北方社会革命党的纲领中说，“鼓动的目的就是在批判现有制度、摸清实现自由的方法的基础上，在所有的阶层中传播政治自由的思想、阐述党的近期和远期的任务。宣传的目的就是激发不同阶层对建立在不同地方需求和利益基础上的现有社会制度的抗议。鼓动和宣传既要产生社会革命党的支持者，也要为党今后更成功地发展创造条件”。由于把争取政治自由和推翻现有社会制度作为首要任务，北方社会革命党的宣传重心就放在了能够理解政治任务的知识分子和被共同利益团结起来的工厂无产阶级身上。至于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农民则成为未来经济政治生活的主要角色。北方社会革命党斗争目标和依靠对象的转向表面上看起来与社会民主党接近，其实，他们没有放弃不切实际的幻想——否定现有的社会经济制度。争取政治自由不是他们认识到了自由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而是缺乏政治自由，他们就没有在俄国活动的机会。至于说转向工人，不是由于工人代表了先进的社会制度，而是由于工人比农民更加关

心社会利益，更加感受到剥削的严重性。因此，在宣传和鼓动的手段上，一方面仍然寄希望于系统的政治恐怖，另一方面热衷于工厂和农业暴动、游行等能够造成更大轰动效应的举措。^①

社会革命党中的南方社会革命党特别强调提高人民群众的自我意识，并指出自我意识对于争取政治自由、推翻专制统治、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意义。自我意识的提高与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关，所以，南方社会革命党不再反对资本主义，把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社会分化看做进步现象和必经阶段。尽管他们还坚持采用一切能够推翻专制制度的手段，但是，他们显然把工作的重心放在反对专制制度对人权的践踏。他们不仅争取政治权利，而且争取经济权利；不仅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而且淡化了地主与资产阶级、工人与农民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他们以工人为革命依靠的重心，也不忘记分析农民阶级，如把农民划分成农村无产阶级、农村小资产阶级和少地的农民三个部分。他们认为，即便是最落后的少地农民，在贫困化之后也转向市场训练自己的工作能力，与无产阶级的政治和法律利益完全一致。^② 他们以同样的方法分析资产阶级，甚至把介于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中间阶级称为劳动者。最后，他们甚至团结加入俄国的少数民族，为他们的自治而斗争。培养人民的独立意识，而不仅仅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斗争，就决定了南方社会革命党放弃了虚无主义，是与传统民粹派的决裂。南方社会革命党的转变迎合了俄国社会发展的需要，但是忽视了资产阶级和农民的本质区别。资产阶级反专制，但是他们也反农民；同样，农民希望获得土地，但是他们不愿意废除沙皇专制。当资产阶级与农民最终走向决裂的时候，社会革命党则从战斗策略转向了改良，维持了自己确立人民群众自我意识的历史使命。

关于革命性质的分歧，社会革命党内部分化成为两派。一派是为个人自由而斗争；另一派则为社会主义而斗争。为了自由斗争的一派可能会采取恐怖手段，也可能与实行自由主义的政府握手言和；而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一派可能反对恐怖政策，但绝对不会容忍政府的改良政策。这是贯穿于社会革命党内部的不同文化派别的斗争。以格尔舒尼、M. 戈茨和阿泽夫为首的犹太文化出身的社会革命党深刻地认识到了自由的可贵，他们不惜

①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00 - 1907. 6, Т. 1, с. 21, 23, 25.

②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00 - 1907. 6, Т. 1, с. 29.

一切手段为捍卫自由而斗争。而以布列什科—布列什科夫斯卡娅、切尔诺夫和拉基特尼科夫为代表的俄罗斯文化底蕴的社会革命党则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纠缠于农民的权利问题，在恐怖问题上区分政治恐怖和经济恐怖，在改良问题上纠缠于部分解放和全面解放等细枝末节，错过了革命发展的大好时机。

在恐怖问题上，社会革命党内部围绕恐怖的作用、恐怖的类别展开了争论。以格尔舒尼为代表的“俄国政治解放工人党”直接把自己的纲领称为《自由》(свобода)，把自由看做呼吸的空气一样重要。由于俄国顽固不化的专制制度，强制和恣意妄为到像一堵厚墙一样，他们决定采取走向绞刑架的恐怖活动。格尔舒尼等人的政治恐怖不是简单的个人英雄主义，而是为自由信仰而战的壮举。他们说：“我们并不像我们的敌人所说的渴望鲜血，我们牺牲掉的第一条生命也是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朋友的生命，是人最珍贵的生命。”他们宣誓：“当我们赢得政治自由的时候，重心就会转向宣传和鼓动，而战斗队伍则用于捍卫宪法。”^① 所以，格尔舒尼的革命活动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用于恐怖活动，一部分用于鼓动和宣传。

切尔诺夫在《我们纲领中的恐怖因素》一文中把恐怖看做引导群众运动的前哨战，呼吁党员不仅要把它正式写进党纲，而且希望给予监督和组织上的配合。切尔诺夫一方面把恐怖看做专制条件下群众的自卫手段，另一方面又指出恐怖对捍卫人的尊严，特别是激发人民对政府的刻骨仇恨，起来推翻沙皇专制政权的重大作用。他说：“如果民意党的英雄斗争，在俄国文化和政治还不太成熟的时代还能发挥作用，在缺乏群众的积极支持下还能动摇王位并把宪法问题提上日程的话，那么，在现在存在比较激烈运动的条件下，在广大的文化阶层普遍充满反对派的情绪下，在农民的不满越来越强烈地爆发出来以及国家的经济和财政状况普遍瘫痪的情况下，重复这样的斗争，无疑将产生更大的成果。与以前消除了对政府强大的信心相比，更加激起普通人对革命者力量的巨大的崇敬。”^② 切尔诺夫对恐怖策略的认识是矛盾的。一方面，切尔诺夫试图通过战斗组织这样的先锋队唤醒人民的自主意识，另一方面又把恐怖仅仅当做配合群众运动协调发展的一种手段。切尔诺夫的根本目标不是实现个人自由，而是争取包括农民在

^①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00 - 1907. 6, Т. 1, с. 33, 36, 38.

^②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00 - 1907. 6, Т. 1, с. 83 - 84.

内的普遍的解放，建设社会主义。

在社会革命党内部，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化基础并不一致。倾向于恐怖活动的格尔舒尼、阿泽夫等人虽然也谈发展社会主义，但是，他们更加热衷的还是自由，特别是个人的自主意识。但在俄罗斯族的社会革命党中，特别是热衷于农民运动的切尔诺夫和布列什科—布列什科夫斯卡娅更加热衷于社会主义。切尔诺夫的社会主义建立在农村集体主义的基础上，与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是格格不入的。从策略上来讲，虽然争取自由的格尔舒尼和阿泽夫等人也热衷于恐怖，但一旦政府在自由问题上做出让步的话，他们就会逐渐停止恐怖。

犹太人社会革命党和俄罗斯族社会革命党在文化上的不同决定了他们不能建立具有统一思想的政党，也决定了他们在策略上的激烈分歧。

二 “一大”之前的鼓动活动

亚历山大三世统治时期的政治上的反动，曾一度使得民粹派浪潮大大削弱，但是，亚历山大三世的经济改革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1891～1892年发生的农民饥荒使得沉寂的民粹派再度兴起。新民粹派更加坚定了民粹派的目标，于1902年联合组成了社会革命党，明确了自己的任务。

1902年，《革命的俄罗斯》第三期刊登的党的近期任务说：“为了获得政治自由、为了赢得国家自由立宪的形式，我们党的近期任务就是同专制制度作斗争。只有实现自由和立宪，党才能有机会公开地按照社会主义原则从根本上改造社会。而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党要结合现有的周边条件在所有关心推翻专制制度的各个阶层中从事宣传和鼓动。”^① 社会革命党在行动中发展壮大。

行动分为两部分，一是文字宣传，二是恐怖宣传。从文字宣传到恐怖宣传采取的是循序渐进的方式，二者相互协调、相得益彰。

1902年社会革命党成立以后，以《革命的俄罗斯》为中央正式机关报，以《俄国革命通报》为机关刊物。^② 《革命的俄罗斯》第1～2期在国内出版，从第3期开始迁到了国外，由切尔诺夫和M. 戈茨负责。

^① 《Неотложная задача》，《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Россия》，№ 3，Январь 1902 года. См.，А. И. Спиридович，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и её предшественники，Пг.，1916，Гл. IV. <http://socialist.memo.ru/books/parties.htm>.

^②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00—1907. 6，Т. 1，с. 68.

社会革命党在未合并之前主要任务是建立印刷所，印发报刊书籍和传单，寻找各种机会把国内或者国外印发的材料传递到社会各阶层的手中。1891年秋天，“民意党小组”在彼得格勒发行了两份传单，一份批评政府对农业歉收的地区所采取的措施，认为政府只能有害于人民，对人民有利的只能是人民选举的社会组织；另一份批评政府是歉收的罪魁祸首，号召革命者建立革命组织，掌握主动权。^① 随后的社会革命党小组不断地利用农民暴动、大学生罢课和工人罢工的机会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沙皇政府也不断地派出警察摧毁社会革命党的印刷所，逮捕和流放社会革命党员。在与沙皇斗争的过程中，社会革命党不断团结各种反对派，如与社会民主党联合举行罢工，联合自由派抨击政府的政策主张。

从宣传的文献来说，有传单、报刊、书籍。如1902年，中央委员会出版了第2期《俄国革命通报》，第3~14期《革命的俄罗斯》，第3期《流动小报》，第1、2期《人民事业报》；出版了《万诺夫斯基改革》^②，《2月19日》，《第二次自由》、《打倒专制制度》、《红旗》、《论税收》、《大学生为什么暴动？》、《农民的破产源自哪里？》、《沙皇与饥饿》、《致俄国所有社会主义革命者》、《致全体俄国农民书》、《我们纲领中的恐怖因素》等小册子。46种不同名称的刊物，印数达27.3万份。中央委员会和农业社会主义同盟一年内共印发了31.7万份，105.9万印张。1902年在俄国印刷和提供的文献超过60000磅，1903年超过85000磅。^③ 文献宣传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据列昂诺夫讲，多数委员会和小组不知道中央委员会，只知道《革命的俄罗斯》，政治上的自决激发了社会冲突和纲领的宣讲。^④

从宣传的对象来说，有教师、工人、农民、军队等多种阶层。知识分子是社会革命党的骨干，如何让更多的知识分子加入社会革命党的行列是党扩大影响力的关键。在知识分子中从事宣传是一个一个进行的，比较偶然。共同的职业、在工作岗位上相遇、熟人可以给党员提供机会让人们了解自己的观点，交换看法。如果可行，就会提供文献、扩大宣传、介绍加入组织。比如低级医护人员、地方自治局的教师、铁路管理处的职员、

① А. И. Спиридович,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и её предшественники, Гл. II.

② П. С. 万诺夫斯基 (1822 ~ 1904), 在 1882 ~ 1898 年曾担任军政部长, 在任期间进行了军事改革。

③ А. И. Спиридович,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и её предшественники, Гл. VII.

④ М. И. Леонов,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в 1905 - 1907 гг., с. 33.

被开除的高校大学生、没有固定工作但受过4~6年学校教育的中学知识分子，所谓来自犹太人当中的走读生，都充实了党的队伍。1903年库尔斯克小组组织地方自治局医护学校的学生进行宣传，6月15和22日举办了两次教师会议，6月27日，地方自治局又为教师举行了野餐会。由于野餐会明显具有反政府示威性质，随后的逮捕使得宣传陷入了瘫痪。1903年5月，社会革命党组成了教师联合会，同时组成了领导机关委员会。委员会号召教师参加社会革命党，在党的旗帜下前进并领导已经巩固的觉悟的农民大军。教师联合会很快扩展到中央各省，数目达到十几个。他们在农民中宣传，扩大了社会革命党的影响。在学校主要是利用学生进行宣传。如1903年，敖德萨组建了“新俄罗斯大学社会革命党大学生组织”，在彼得堡组建了“社会革命党大学生组织”，在基辅组建了接近社会革命党的“大学生革命家组织”等。^①

受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影响，工人成为社会革命党宣传的重点。宣传员在工人当中宣传社会主义思想，提出他们亟须解决的问题。具体讲，宣传员通过询问工人的劳动条件、他们的需求，激发他们反对现有的生活方式。1903年，萨拉托夫和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的宣传最为出色，并制定了宣传章程。宣传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从革命社会主义的角度讨论国内外最迫切的和重大的事件，批评政府、地方自治局和杜马所采取的所有措施，指导不同社会组织的行为；另一种是对各种问题做出系统的解读。为了举行座谈会，宣传员对其他派别的杂志进行跟踪。社会革命党在工人小组中的宣传，仍然把重点放在了村社土地所有制、连环保和退社等问题上，目的是指出现代社会给工人带来的社会矛盾。社会革命党把诸如雇佣劳动、租赁、债契、直接税和间接税、高利贷、采购以及剥削者的各种诡计都归结为剥削。这种剥削不仅是经济剥削，而且是政治剥削和道德剥削。工人和农民的无权以及工人的无知成为统治阶级奴役的手段。而最终解决这些问题则要取消私有制，实现土地和一切生产资料的社会化。^②工人在俄国社会中的比例并不大，到20世纪初期也只占全国人口的10%，产业工人也只有500万。在俄国，工人的数量并不是主要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的农民文化传统。有的学者认为，20世纪初，俄国工人的思维比农民更加保守，比

^① А. И. Спиридович,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и её предшественники, Гл. VI.

^② А. И. Спиридович,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и её предшественники, приложение №5.

生活在农村的人更像农民。^① 资本主义给他们带来的冲击更加强烈，社会革命党在工人当中的宣传效果比农民更好。С. В. 祖巴托夫曾经作为沙皇警察局的一名官员组织合法的工人组织，通过渐进的方式解决俄国工人的经济问题，收效甚微，被后来的学者称为“警察社会主义”。

农民是社会革命党的主力军。切尔诺夫、斯列托夫、布列什科—布列什科夫斯卡娅热衷于唤醒农民。1899年，切尔诺夫流放坦波夫期间，根据农村教师的建议组建了第一个农民兄弟会，通过了会议章程。章程的目的就是团结所有兄弟会成员，实现人民主权，平分地主土地。章程被切尔诺夫带到国外，在国外俄国社会革命党联合会杂志上再版，他同时写就了《论农村革命工作》小册子在农民中传播。^② 1901年冬天，布列什科—布列什科夫斯卡娅到波尔塔瓦，联合了200多个被监视的知识分子，在农民当中做宣传。布氏很快在农村站稳了脚跟，把文献在农民中散发。1902年，波尔塔瓦和哈尔科夫发生了农民骚动，社会革命党利用这个机会抓紧宣传。为了领导各地的农民运动，社会革命党还成立了社会革命党农民联合会。经过1903和1904年的工作，社会革命党的学说在农村每天都会取得新的胜利。^③ 社会革命党相信，恢复在俄国农民当中的宣传是党最大的功绩，因为“只有在整个工人阶级，包括农夫的帮助下，革命运动才能使祖国摆脱屈辱，消灭笼罩在俄国头上的、以专制制度为首的、在思想上无法无天地跨越所有思想界限的桎梏。”^④

影响最大的宣传鼓动是格尔舒尼、阿泽夫等人领导的恐怖运动。民意党在19世纪80年代被镇压以后，并没有停止活动。如1886年，哈尔科夫组织地下民意党小组，领头的是三个青年大学生，他们组织暗杀政府官员、奸细。列宁的哥哥亚历山大组织暗杀亚历山大三世，被判处绞刑。随后，恐怖政策受到质疑。1889年，寄居在瑞士的13个恐怖分子从事恐怖活动，被瑞士政府驱逐。恐怖分子移师巴黎，并派遣恐怖分子回到俄国。1889年秋，米列尔被派到彼得格勒，参与К. 科恰罗夫斯基的恐怖活动。1893年，无政府主义者在巴黎暗杀法国总统卡尔诺，打乱了民意党小组的进程。恐

① *Кара-Мурза*, Советская цивилизация, Т. 1, штрихи к социальному портрету России: кто шел в революцию, http://www.kara-murza.ru/books/sc_a/sc_a13.htm#hdr_20.

② А. И. Спиридович,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и её предшественники, Гл. V.

③ А. И. Спиридович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и её предшественники, Гл. VI.

④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00 – 1907. 6, Т. 1, с. 137.

怖主义活动慢慢平静下来。

社会革命党小组建立以后，格尔舒尼、M. 戈茨、切尔诺夫、阿尔古诺夫仍然热衷于恐怖，他们决定开展系统恐怖，直到自由的实现。虽然社会革命党内部南方社会革命党对于恐怖持严格的反对态度，但由于客观形势，他们并没有阻止恐怖的开展。1900年，基辅大学生发生骚乱，抗议教育部门把参加暴动的大学生送去服兵役的“临时条例”。1901年，从国外回来的П. В. 卡尔波维奇刺伤了国民教育大臣Н. П. 博戈列波夫。格尔舒尼着手组建战斗组织，进行一系列的政治恐怖。

1902年4月2日，格尔舒尼委派基辅大学生巴尔马舍夫枪杀了内务部长Д. С. 西皮亚金；4月5日，格尔舒尼委派陆军中尉Е. К. 格里戈里耶夫暗杀圣主教公会总监К. П. 波别多诺斯采夫，由于格里戈里耶夫的临时退却而失败。1902年的7月29日，格尔舒尼派卡丘拉暗杀了哈尔科夫省长И. М. 奥博连斯基；1903年5月暗杀了乌法省长Н. М. 波格丹诺维奇。^①

格尔舒尼的暗杀是有计划进行的。首先，他从枪杀内务部长开始，具有很强的轰动效应。其次，杀手经过精心的选拔。比如，暗杀内务部长西皮亚金的杀手名叫巴尔马舍夫，出身于世袭贵族家庭，父亲是民粹派党人。从父亲那里他就认识到，俄国政府通过镇压的办法对付革命党人，和平地从事社会主义建设是不可能的。巴尔马舍夫的行为进一步巩固了人们意识中恐怖主义英雄的形象，他们意图的纯洁性不应该受到丝毫的怀疑。^②再次，在暗杀西皮亚金以后，马上成立了恐怖组织，在印发的传单中写上了社会革命党战斗组织的名字。

如果说暗杀西皮亚金体现了巴尔马舍夫的个人英雄主义，那么随后的暗杀波别多诺斯采夫以及哈尔科夫省长奥博连斯基并没有收到这样的效果。格尔舒尼在挑选暗杀波别多诺斯采夫的杀手时，选中了一位陆军中尉。为了坚定陆军中尉格里戈里耶夫的信心，格尔舒尼反复与他谈话，宣传恐怖的意义。格尔舒尼在回忆录中承认，选择格里戈里耶夫的目的就是加强在军队中的宣传。虽然格尔舒尼让格里戈里耶夫写下了遗书，给了他左轮手枪和毒子弹，格里戈里耶夫却在最后时刻放弃了自己的暗杀行动。

① Р. А. Городницкий, Боев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партии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в 1901 - 1914 гг., с. 52 - 53, 70.

② Р. А. Городницкий, Боев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партии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в 1901 - 1914 гг., с. 42 - 43.

暗杀哈尔科夫省长的是一位农民，名叫卡丘拉。他的家庭在农奴制改革后迁往城市。生活的动荡使得卡丘拉对于改革渐生怀疑，产生了革命的意识。他先参加了社会民主党，后转入了社会革命党，从事恐怖活动。卡丘拉在行刺哈尔科夫省长之后，特别是在得知奥博连斯基为他向当局请求免除死刑判决的时候，公开表示忏悔，并认为“革命者是对社会有害的成员”。^①

战斗组织作为革命者同沙皇专制制度斗争的工具，吸收了最激进的人参加革命运动。也正是恐怖运动使得社会革命党在全国乃至世界都非常有名。1903年5月，格尔舒尼被捕之后，接替格尔舒尼执掌战斗组织的是社会革命党的创始人之一，沙皇警察局的密探阿泽夫。在阿泽夫领导下，社会革命党的恐怖运动被推向了高潮。新任内务部长普列韦被杀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欢呼。暴动的次数增加了。据社会革命党统计，1905年，暗杀的次数达到54起，推动了社会运动的发展。除了社会革命党之外，从1905年开始，许多党组织都从事恐怖活动。据内务部的С. Д. 萨佐诺夫给驻伦敦大使А. К. 本肯道夫的电报中说，1905年的恐怖活动共杀死了223人，伤358人。^② 普通群众对于反动部长的结局无不感到高兴。社会革命党的捐款增多了，^③ 阿泽夫在党内的地位获得了极大的提高，达到了崇拜的程度。身为俄国最高统治者的沙皇尼古拉二世也把普列韦被杀带来的影响当做“上帝因自己的愤怒而对我们进行的一次严格的造访”。^④

刺杀普列韦引起的全社会的骚动是1905~1907年革命的开始。^⑤ 对于社会革命党来说，这却未必是一件好事。俄国的问题不是争取自由，而是确定未来发展方向。社会革命党以为俄国一旦实现了立宪，社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但是，当沙皇政府在普列韦被杀以后着手执行自由主义政策时，俄国的社会不是平静了，而是更加愤怒了。沙皇政府因镇压1905年1月9日革命运动而失去了人民的信任，以至于在随后的革命浪潮中不仅不能因向人民做出让步而平息革命，相反，人民越来越把目光盯到了沙皇的残暴

① Р. А. Городницкий, Боев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партии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в 1901 - 1914 гг., с. 53.

② М. И. Леонов,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в 1905 - 1907 гг., с. 128, 129.

③ Анна Гейфман, В сетях террора: дело Азеф и рус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с. 89.

④ М. И. Леонов,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в 1905 - 1907 гг., с. 130.

⑤ О. В. Будницкий, Терроризм в российском 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м движении: идеология, этика, психология (вторая половина XIX-начало XX в.), с. 153.

上。社会革命党因过激而丧失了自己的目标，党内也在策略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

第二节 第一次革命中的激进策略

一 对 1905 年革命的积极推动

1905 年 1 月 9 日，首都彼得堡的 30 多万工人，带着请愿书、举着沙皇和皇后的画像向冬宫进发。他们的领导是一名 30 多岁的神父格奥尔基·加邦。请愿书批评资本主义和官僚主义对人民的剥削，号召通过普选产生立宪会议。请愿书还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如公民起码的完整自由权、国家资助的普遍教育权、平等法律权、教会与国家的分离、结束日俄战争、废除农民的赎金、把更多的土地交给农民、8 小时工作制，以及一系列涉及授予工人在与雇主斗争中更大权利的规定。^①沙皇没有答应工人的要求，相反，派军队镇压了请愿运动。根据明显被缩小的数字材料，工人死亡 130 人，伤 330 人。工人们开枪做出的反应是构筑街垒，全城罢工。沙皇政府陷入了一片恐慌之中。^②

传统观点认为，俄国由于经济和社会的落后，引发了激烈的社会冲突。沙皇专制制度成为农奴制残余的集中体现，它不愿意对人民做出任何让步。改革也只能在大的军事失败或者强大的人民起义的压力下进行，因此，改革不可能是激进的，他们的目的就是安抚人民群众。只有革命才能摧毁农奴制度，为重建社会扫清道路。^③这种观点无疑受到当时社会激进环境的影响，即俄国的落后或者失败是俄国完全没有走西方发展道路造成的。于是，无论是革命者还是自由派，他们的共同目标就是进行自由主义的改革，通过选举建立自由民主制度。

然而，从工人提出的要求来看，工人与自由主义者、革命者并不一样。他们作为社会的第三支力量，反对资本主义和官僚的榨取，希望回到过去平静的生活。他们对自由民主没有多少兴趣，只是由于沙皇坚决推进资本

① 沃尔特·G·莫斯科：《俄国史（1855～1996）》，张冰译，海南出版社，2008，第92页。

② М. И. Леонов,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в 1905 - 1907 гг., с. 149.

③ И. М. Игнатенко, Революция в историческом процессе: очерки, Минск, Беларускі кнігазбор, 1997, с. 102.

主义性质的改革，才不得不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建立他们向往的“民主国家”。民主自由对于他们来说是借用来的。他们的内心想法就是和平和安居乐业。因此，列昂诺夫怀疑，1905年革命中工人争取政治自由、个人权利不可侵犯、言论、出版等要求有多少真实性。^①

由于不能定性社会革命党的战略，列昂诺夫在分析社会革命党策略的时候，感到党在左右摇摆：一会儿主张与自由派、社会民主党联合，一会儿又反对自由主义对政府的投降主义政策；一会儿主张坚持武装斗争，不仅继续恐怖政策，而且还要发展成为群众式的武装起义，一会儿在恐怖和群众斗争之间摇摆，在争取政治自由和推翻沙皇政权之间摇摆。社会革命党在召开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时，立刻在恐怖、群众斗争还是合法斗争上产生了分歧，并以此区分革命与反革命。

社会革命党之所以被称为民粹派，原因就在于他们反对资本主义，反对私有制，恢复农民的互帮互助。虽然切尔诺夫在纲领中反复提出他们早就接受了资本主义，同时把工人、农民与知识分子连接起来，通过选举建立民主自由的共和国，但是，他们没有正式回应资本主义，他们在未来建立的还是取消私有制的农民社会主义，只不过把社会主义看做了理想，把资本主义看做了现实；或者说把社会主义看做了目的，而把资本主义看做了手段亦或策略。由此，他们在理论上陷入了两难困境：如果他们在策略上团结农民或者知识分子，他们便成为小资产阶级；如果他们与工人团结在一起，他们便是革命的民主主义者。

从整个1905年革命的进程来看，社会革命党的策略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积极推动革命运动，第二个阶段是试图组织革命运动，明确自己的革命纲领。从时间上来看，1905年10月17日是两个阶段的分界线。

在第一阶段，社会革命党积极运用革命运动为自己争取自由。地方组织积极参加彼得堡工人请愿，同时推动其他城市的罢工。彼得堡工人请愿由加邦领导，彼得堡社会革命党委员会与社会民主党一起准备干预事态的发展，但没有成功。当加邦遭遇政府镇压，着手与政府谈判的时候，社会革命党先是阻止工人冒进，后是顺应工人运动，并帮助工人筑起街垒。社会革命党还在莫斯科、布良斯克、罗斯托夫、索尔马沃、敖德萨、萨马拉、

^① М. И. Леонов,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в 1905 - 1907 гг., с. 148.

戈迈利、马基列夫和其他省城和工业中心组织罢工。当彼得堡工人起事的消息传到莫斯科，莫斯科委员会和工人联合会立刻着手组织总罢工，社会革命党领导人津季诺夫、Б. 切尔年科夫、Н. 马祖林、Л. 尼基福罗夫、А. 尼基茨基、С. 赫连科夫、В. 佩列维尔泽夫、Л. 叶梅里亚诺娃、А. 埃夫龙、С. 马祖林等近 40 人被捕。^① 社会革命党在布良斯克领导了有 15000 人参加的别瑞茨工厂的罢工；积极影响在 1905 年冬春铁路工人罢工期间成立的全俄铁路联合会，在欧俄所有的省城和许多县城和铁路车站建立了人数不多的工人组织。

积极参加农民运动，鼓动农民起义。据统计，1905 年 1 月，农民运动有 17 次，2 月有 109 次，3 月有 103 次。库尔斯克省德米特罗夫斯克县的事件成为转折点。2 月 10 日，在德米特罗夫斯克县的萨林村出现了社会革命党的传单，号召农民兄弟会成员举行起义。2 月 13 日，农民抢光了距离萨林村两俄里远的切尔尼金节省下来的粮食，之后又捣毁了其他地方的庄园。^② 自此以后，有组织的“抢劫”成为农民运动的特点。基辅成为农民抢劫运动的试验场，伏尔加河流域成为农民兄弟会的试验场。萨拉托夫是社会革命党农民运动的基地。省委员会领导人拉基特尼科夫等人召开农民代表会议，用党的纲领影响农民运动。几个世纪农民与地主结下的仇恨很难不使农民产生过激的反应，社会革命党顺应形势，领导农民，组建战斗小分队，策划 1906 年春天的农民起义。除了萨拉托夫外，社会革命党还在哈尔科夫、切尔尼戈夫、沃伦、波尔塔瓦、叶卡捷林诺斯拉夫、赫尔松、塔福利达、比萨拉比亚、沃罗涅什、坦波夫、奥伦堡、图拉、梁赞、斯莫棱斯克、明斯克、维捷布斯克、莫吉廖夫、彼尔姆、库塔伊西省组织了兄弟会。1905 年 6 月 3 ~ 7 日，社会革命党农民工作者代表大会对半年来农民中的工作进行了总结，认为在伏尔加河流域的工作比较成功，在西北地区的投入比较少，工作成果还包括参与组织了全国农民联合会，等等。

社会革命党为了把革命运动引向深入，策划不切实际的武装起义。在起义规划中，彼得堡占有特殊的地位。从 1904 年 1 月 10 日到 1905 年 2 月 10 日城市委员会共支出了 7139.59 卢布，花在武器上的资金是 2130 卢布，而从 1905 年 2 月 10 日到 4 月 1 日，总支出 4651.12 卢布中有 2640 卢布用于

^① М. И. Леонов,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в 1905 – 1907 гг., с. 170.

^② М. И. Леонов,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в 1905 – 1907 гг., с. 174.

购买武器。^①

不过，热衷于恐怖的人坚决反对武装起义。萨温科夫、施维策尔^②进一步加大暗杀活动。除了前面提到的1905年2月4日暗杀了莫斯科总督谢尔盖·亚历山大洛维奇外，在3月1日，施维策尔利用官员祭拜亚历山大二世的机会，准备组织对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大公，近卫军和彼得堡卫戍部队的总司令、彼得堡总督特列波夫、内务部长布里根及副部长杜尔诺沃的暗杀。由于施维策尔在制造炸弹时不小心发生了爆炸，暗杀被迫取消。^③高加索中央委员会的全权代表B. K. 沃尔斯基2月12日向切尔诺夫建议对尼古拉二世实施暗杀，最终因3月1日的爆炸而作罢。战斗组织的恐怖尽管由于阿泽夫的阻挠而没有多少作为，但是1905年的地方恐怖十分活跃。据统计，1905年1~9月，社会革命党共完成了30次暗杀，其中28次是战斗队队员的杰作，1次是伏尔加河州飞虎队所为，只有1次是战斗组织策划的。^④

虽然社会革命党对于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恐怖活动缺乏统一的规划，但是1~9月的工作有力地推动了革命运动的发展。

1905年10月17日，沙皇政府在革命运动的推动下，颁布了《10月17日宣言》。宣言说：“依据确保人身不受侵犯、信仰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诸原则，恩赐平民以公民自由之坚实基础。不阻止原定之国家杜马选举，而今尚须在杜马召开前余下之有限的时间内，尽量吸收迄今全无选举权之居民阶级参加杜马，然后依据新确立之立法制度进一步发展普选法原则。规定下述不可更改之原则：任何法律未经国家杜马认可不得生效；民选机构得以确实参与监督朕所授予之权力行使是否合法。”^⑤

沙皇的抉择是在革命运动的压力下慌乱中做出的。因为就当时各派的反应来看，俄国的出路只能是改行宪制。^⑥但是，宪制的实行存在着君主如何向议会过渡权力的问题。维特说，“沙皇的力量，和所有的君主一样，在

① М. И. Леонов,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в 1905 – 1907 гг., с. 179.

② М. И. Швейцер 曾经是莫斯科大学的学生，社会革命党战斗组织成员，化工专家，1905年4月26日死于为暗杀亚历山大洛维奇大公准备炸药的一场事故中。

③ М. И. Леонов,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в 1905 – 1907 гг., с. 183.

④ М. И. Леонов,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в 1905 – 1907 гг., с. 182.

⑤ 谢·尤·维特：《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续集）——维特伯爵回忆录》，张开译，新华出版社，1985，第1页。

⑥ 谢·尤·维特：《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维特伯爵回忆录》，张开译，新华出版社，1983，第444~445页。

于某种隐秘之处”^①。人们不理解这种隐秘，沙皇也没有把这种隐秘的力量与社会运行的力量加以协调，因此阻碍了社会的发展。以沙皇为首的君主主义者以为权力的来源不是人民而是上帝。沙皇在授予人民以公民权并决定设立杜马和国务会议之后，仍然以为他的作为不是出于任何纯世俗的推理，而是其本能和内心的智慧，^② 并把希望寄托在农民的忠诚之上。^③ 而立宪的自由主义者根据西方国家的模式进行限制君主的立法，同时通过议会与沙皇分享权力。于是，沙皇与议会的关系就变成权力分割与制衡的关系，这也成为衡量沙皇立宪真假的标准。

分权无疑是社会发展的结果。然而，从革命者提出的目标以及杜马召开后各派争权夺利的情况来看，分权并不是瓜熟蒂落的产物。比如10月11日罢工的要求说：“在普遍、直接、平等和秘密投票的基础上召开立宪会议；取消被强化的安全和军事条例；罢工、结社和集会自由；铁路上实行八小时工作制。”^④ 立宪民主党等自由主义者逐渐放弃了召开立宪会议的主张，一面坚持立宪主义原则，随时准备与已经成为立宪君主的沙皇对话；一面又不放弃把最激进的“劳动组织”的同盟掌握在手中。^⑤ 社会各派与政府之间失去了最起码的信任，社会在不明白自己的真正需要的情况下成了一盘散沙。

沙皇的紧急转向使革命者感到很突然。他们觉得，“罢工正在从他们的手中滑落，抵触在人民当中滋长。他们没有感到胜利。关于自由和杜马立法权宣言的颁布正在他们中间产生误解，是狡猾的伎俩还是投降？”^⑥ 人民之间的分歧正在使“俄国的旗帜发生着动摇和倾斜”。^⑦

本来就不能确定纲领的社会革命党意见更加分歧。曾经热衷于恐怖的彼得堡委员会，如阿泽夫率先提出停止恐怖的计划，转向自由主义。而紧急派往彼得堡的莫斯科委员会的代表，如萨温科夫、B. C. 潘克拉托夫和 A.

① 谢·尤·维特：《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维特伯爵回忆录》，第442页。

② 马克·斯坦伯格、弗·赫鲁斯塔廖夫：《罗曼诺夫王朝的覆灭》，张蓓译，新华出版社，1999，第17页。

③ С. С. Ольденбург, Царствование императора Николая II, Ростов - на - Дону, Феникс, 1998, с. 243.

④ С. С. Ольденбург, Царствование императора Николая II, с. 254.

⑤ Под ред. А. Б. Зубова,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XX век: 1894 - 1939, М., Астрель АСТ, 2009, с. 191.

⑥ С. С. Ольденбург, Царствование императора Николая II, с. 260.

⑦ С. С. Ольденбург, Царствование императора Николая II, с. 266.

萨佐诺夫断然拒绝停止恐怖的计划，并提出如果不让暗杀镇压农民运动的知名人士，就准备分裂。^① 11月中旬，在明斯克召开的西北地区的社会革命党代表大会上，代表们把停止恐怖看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背叛”。最后，切尔诺夫从中调停，通过了在城市中坚持防守策略的新方针。中央委员会利用合法的机会，创建了新的报纸《祖国之子报》代替《革命的俄罗斯》，切尔诺夫、佩舍霍诺夫、米亚科京参与报纸的编辑，以他们为首的社会革命党妥协派逐渐走向了合法化政党的建立。

革命并没有随着革命者内部的妥协而停止。作为革命政党的社会革命党有大批的工人、农民、职员、大学生加入，队伍不断壮大。在城市和工业村镇出现了55个苏维埃。社会革命党派自己的代表进入苏维埃，影响工人。11月，社会革命党成立“出版者联合会”，社会革命党的文献充斥城市和乡村。根据阿泽夫的倡议，社会革命党成立了军事委员会。

维特被选为首任大臣委员会主席之后，着手政治体制的改革。人民所热衷的土地问题被搁置一旁。好像约定好一样，萨拉托夫、萨马拉、奔萨、坦波夫和其他地道的俄罗斯省份的地主庄园同时起事。整个村子的人奔向庄园。农民摧毁了庄园和经济设施，之后，在黑暗中散去。剩余的年轻人焚烧财产。^② 社会革命党对于农民运动的支持使得他们在全俄农民联合会中的地位得到很大提升。

11月末，政府从惊慌失措中醒悟过来，着手镇压农民起义。政府的举措引发了莫斯科政治总罢工，进而转化为武装起义。宣布进行总罢工的是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12月6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全俄铁路联合会宣布总罢工并得到了彼得堡的支持。社会革命党在全俄铁路联合会代表大会之前曾经召开了北方首都和城市全权代表会议，否决了莫斯科罢工和起义。然而，起义已经不能阻止了。虽然社会革命党对于莫斯科的罢工斗争没有抱多大希望，但是，他们积极参加了莫斯科普列斯纳起义。根据可以掌握的资料，社会革命党参加了1905年12月至1906年1月所有大的起义，地域遍布整个俄罗斯帝国的城市 and 军区，从明斯克到符拉迪沃斯托克，从雅罗斯拉夫尔到塔什干，只有波兰、芬兰和某些其他的民族地区除外。^③

纵观社会革命党在整个1905年的表现，我们不难发现，社会革命党在

① М. И. Леонов,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в 1905 - 1907 гг., с. 195.

② М. И. Леонов,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в 1905 - 1907 гг., с. 201.

③ М. И. Леонов,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в 1905 - 1907 гг., с. 214.

未来局势不确定的情况下，采用各种办法积极推动了革命运动。10月17日宣言之后，他们试图控制革命运动的形势，但是，社会革命党内部的自由派和革命派发生了分裂，直接推动了革命纲领的形成。

二 “一大”关于革命策略的争论

1905年10月17日宣言的颁布，搅乱了社会革命党的发展方向。在党内首先引起争论的是关于恐怖的问题。恐怖问题表面上看是与专制政府斗争的手段问题，其实是关系到俄国社会发展方向的大问题。布尔加科夫从革命英雄主义的角度论述了这个问题，认为是宗教抑制而产生的极端的无神论。一方面，他们幻想成为全人类的救赎者，或者至少是俄国民众的救赎者；另一方面对生活的声音置若罔闻。^①当1905年革命迫使沙皇政府做出让步以后，革命的目标似乎已经实现了，但是，革命者没有停止自己的脚步，而是继续革命。

10月17日宣言的颁布使得沙皇和社会之间的矛盾削弱了，出现了保皇派与革命派之争。社会革命党虽然继续革命，但是不可避免地也受到这个因素的影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2月20日，社会革命党领导人M. 戈茨突然宣布召开社会革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会议于1905年12月29日到1906年1月4日在芬兰的伊马特拉召开。会议在极端保密的条件下进行。除了战斗队员做好了安全保卫工作外，即便是开会的地点也是在开会之前才知道的。^②参加会议的有38个组织，共54个投票权。除了西伯利亚代表由于铁路罢工没有经过候选人选举外，其他地区的代表都是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会起初只有3票投票权，经过商讨，才增加到5票，充分体现了社会革命党的民主性。会议还邀请了农民联合会代表，并给予了3票投票权；邀请了其他与会者15人，给予他们发言权，体现了社会革命党广泛的社会属性。^③

第一次代表大会主要解决的是党的精神统一问题。但是，会议一开始就分裂成为三派。一派是以佩舍霍诺夫为代表的温和的社会主义者，一派是以波罗申（真名是里夫金）为代表的最高纲领派，一派是以切尔诺夫为

① C. 布尔加科夫：《英雄主义与自我牺牲》，《路标集》，彭甄等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第36页。

② М. И. Леонов,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в 1905 - 1907 гг., с. 229, 228.

③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00 - 1907. 6, Т. 1, с. 237.

代表的中和派。温和的社会主义者主张建立合法政党，而最高纲领派则主张推翻沙皇，立刻建立社会主义政权。以切尔诺夫为首的中和派，既不否认进行革命的必要性，也不肯定立刻建立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而是把社会主义作为最高发展目标，同时提出争取自由、实行土地社会化以及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最低纲领。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和最高纲领派，分别在1906年成立了自己的政党，社会革命党着手内部统一的尝试失败了。

苏联学者阿列克谢耶娃认为，社会革命党不能实现统一的原因完全在于他们的阶级本质。“许多人把革命看做历史的怪异现象，某种妨碍平静生活以及思考对抗性、社会团结、为个性而斗争的偶然的、不必要的东西……完全不愿意阐明群众的革命斗争。”^①阿列克谢耶娃强调社会革命党忽视了革命的资产阶级的民主性，直接关注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做法，并没有从精神上解决俄国革命的发展方向。无论是社会革命党因资本主义的剥削性而否定资本主义，还是社会民主党因资本主义的科学性而赞同资本主义，都只是提出了资本主义给俄国带来的问题。社会革命党只是以回避的态度化解资本主义的冲击。所谓的民粹派精神——妥协，是一种假精神。

社会革命党提出的假设是，沙皇政府在改革的过程中执行了有利于地主、资产阶级的政策，于是沙皇、地主和资产阶级成为人民的剥削者。统治阶级的不仁慈已经说明它不代表人民的利益，应该被推翻，以实现根本的和平。社会革命党采取恐怖手段，使沙皇政府胆寒，放弃“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实现土地社会化，建立民主共和国，并没有从精神上否定沙皇专制制度，而是反对统治阶级的残忍性。当沙皇政府真的给予社会革命党机会参与解决俄国因改革所带来的社会问题时，他们并没有参与讨论，而是在怀疑沙皇的动机是否纯洁方面下工夫：从根本上否定沙皇政权的激进派认为沙皇的让步是耍花招；怀疑农民、工人革命性的保守派则走向了“做小事”的道路，取消了关于俄国未来的精神思考。

在分析社会革命党的领导成分时，列昂诺夫已经注意到社会革命党的民族成分。他以1908年8月参加伦敦社会革命党代表会议的代表为例，说明了这个问题。参加会议的59名代表中，45人为俄国人，9名犹太人，德

^① Г. Д. Алексеева, Народничество в России в XX в. Идеиная эволюция, М.: Наука, 1990, с. 140.

国人和亚美尼亚人各 2 名，格鲁吉亚人和拉脱维亚人各 1 人。^① 1901 ~ 1903 年战斗组织成员的民族成分是，俄国人 8 名，犹太人 3 名，乌克兰人 1 名，波兰人 1 名。参加 1903 ~ 1906 年战斗组织的人的民族成分是，43 名俄国人，19 名犹太人和 2 名波兰人。领导战斗组织的犹太人有 5 名，俄国人有 2 名。^② 注意到参加俄国革命的民族构成，就可以把认识的重点转向革命的文化冲突。如果俄国革命是统治阶级资本主义式的改革引发的，被统治阶级表面上把矛头对准了执行改革的统治阶级——沙皇、地主、资产阶级的共同利益，实质上，他们反对的是统治阶级模棱两可的价值观。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革命党的内部。不同的只是，社会革命党从民族文化的角度为农民辩护，反对刚刚兴起的资本主义的残酷性；社会民主党则经过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反对的是沙皇的保守性。

俄国社会革命党当中的犹太人、乌克兰人、亚美尼亚人和波兰人，他们参与革命的原因是反对俄国在向西扩张的过程中产生的越来越严重的排外情绪。仅以俄国对犹太人的态度来看，就可以看出俄国与西方宗教认识上有多么大的纷争。1880 年，俄国著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犹太人和银行如今无处不有。欧洲和启蒙主义、整个文明和社会主义——尤其是社会主义，因社会主义之助，犹太人根除了基督教，毁灭了基督教文明。”以救世主自居的俄国越来越不能忍受不同于他们的犹太人的“胡作非为”，产生了强烈的反犹情绪。1881 年春，俄国在乌克兰对犹太人实行了大屠杀。1882 年，泛斯拉夫主义者伊格纳季耶夫颁布了“临时条令”，在集镇和乡下禁止犹太人在任何地方定居或为其财产支付财产税，也不准其在主日早晨或基督教神圣的日子做买卖。1887 年，犹太学生不得超过定居点内初高中录取总数的 10%。在 1889 年，犹太人的选举权被剥夺。^③ 对犹太人的屠杀在 1903 ~ 1906 年达到高潮。

俄国政府的反犹政策以及犹太人的革命运动反映了俄国多民族条件下的宗教矛盾。就拿对土地的看法来说，俄国人强调土地社会化，反映了他们以劳动获得土地的观点。但是，对犹太人来讲，作为外乡人，他们渴望像其他公民一样有权享受大地母亲的怀抱。当犹太人决定在世界的边缘寻

① М. И. Леонов,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в 1905 – 1907 гг., с. 69.

② Р. А. Городницкий, Боев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партии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в 1901 – 1914 гг., с. 86, 131.

③ 沃尔特·G·莫斯：《俄国史（1855 ~ 1996）》，第 73、85 ~ 86 页。

找一块建立自己祖国的土地之后，他们表现得不是特别自尊，面对不公正也能悄悄地活出自己真正的权利。^① 所以，当沙皇政府决定实行公民权利基本法之后，犹太人停止了革命；而俄国人则不满足于沙皇的让步，继续革命。在犹太人的眼里，公民权已经足够了，他们会利用这种权利达到发展的目的。俄国人则不仅要这种权利，还要沙皇帮助他们分配地主的土地，提供生产生活的条件。

同样的政策在不同的文化氛围下获得了不同的理解。反犹主义者把犹太人停止革命看做反革命，喊出了“打倒犹太人！犹太人滚蛋！”的口号。而激进的革命者则在革命的道路上继续前进，演变成为一场抢劫运动。同样的政策产生不同的结果，崇拜人民的民粹派最终只能依靠投票来决定走向。关于社会革命党是坚持革命，还是走向妥协，大会通过了切尔诺夫的折中方案：决定不号召武装起义，但进行准备，以防止起义的自动发生；继续群众的组织工作和恐怖策略。^② 方案虽然通过了，但是对于利益冲突的各方来说，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三 对革命行动的迷恋

对于俄罗斯人的革命党来说，激进的左派把革命从城市烧到乡村。鲁德涅夫说：“我们所经历的时刻是极为有利的，而且再不会重复。国家机制陷入了一片混乱，而且国家没有大的组织力量可以依靠。”H. C. 阿列菲耶夫补充说，“如果拖延用革命的手段夺取土地，农民的情绪将不可避免地衰落下去”，需要把春天开始的各地农民运动组织起来，并转化成为一致的行动——在农民群众中宣传，支持他们在明年春天用革命的手段夺取土地。^③

切尔诺夫、米诺尔、С. П. 什韦佐夫等温和派对农民运动没有把握，认为随着党的灭亡，他们意义上的农民革命也随之灭亡。但是，切尔诺夫不能给农民指出一条明路，只是意识到俄国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危机，并且建议加强集中组织的政治恐怖和游击战争。^④

切尔诺夫与鲁德涅夫的区别在于：切尔诺夫通过革命获得的是组织农

① В. М. Чернов, Записки социалиста-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а, Т. 1, берлин-петербург-москва, Изд. З. И. Гржебина, 1922, с. 79.

② К. В. Гусев, Партия эсеров: от мелкобуржуазного революционаризма к контрреволюции, с. 62 - 63.

③ М. И. Леонов,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в 1905 - 1907 гг., с. 233.

④ М. И. Леонов,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в 1905 - 1907 гг., с. 234 - 235.

民的权利；鲁德涅夫要求的是夺取地主的土地。柴科夫斯基道破了天机：他们反对的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当沙皇答应给农民权利的时候，农民运动在1906年初消失了。当时在俄国社会流传着一个谣言：皇帝陛下在杜马选举之前打算把地主的土地许诺给农民（以示对参加动乱的地方自治局成员的惩处），并且得到与解放运动开展斗争的农民的支持。谣言虽然不是事实，但是它反映了民意，就是希望沙皇能够秉持公义。然而，沙皇并没有从热爱农民的角度看待农民的要求，只是以高高在上的君主口吻重复了以前的政策。他在1月8日接待库尔斯克的农民时说：“任何所有权都是不可侵犯的，属于地主的東西仍归地主，属于农民的东西仍归农民。地主控制的土地属于地主，就像你的土地属于你一样，是不可分割的权利。”^①

虽然从资本主义的角度看，沙皇的解释是正确的，但它违背了沙皇一直在农民当中宣传的教条。农民的宗教虽然也是基督教，但是与启蒙阶层的基督教有很大不同，它非常实际，更多具有实用和仪式化的特点。农民试图透过宗教解释生活当中的事件和现象，还不能掌握基督教中最复杂的教条和伦理细节。政府保持现有宗教和教育类型的政策，保守农村的宗法根基，与资本主义产生的新的行为方式以及市场向农民提出的社会动员发生了冲突。工人是社会民主党争取的对象，也是社会革命党争取的目标，原因是他们能够提出经济要求和政治要求，他们的识字率在1897年曾经达到51.9%，是全国人口的识字率的2.5倍。但是，从精神兴趣来讲，他们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他们把《圣经》看做超人的力量，当做圣物来加以崇拜。受这种观念的影响，他们对别人的所有权缺乏尊重，相信分配社会财产是不公正的，是上层的贪污行为。^②

沙皇尊重私有权利的观点与农民和工人的蔑视私有制观点是这样的不一致，对于社会革命党来说只能得出两个结论：第一，沙皇给人民以选举权是在革命运动的压力下的让步；第二，选出的杜马只是沙皇的反对派。

社会革命党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提出了继续革命的主张，一直革命到沙皇政府满足符合农民价值观的需求。但是，社会革命党的理论为抢劫私有土地开了绿灯。

社会革命党反对资本主义的观点决定了它站在自由派的反面。首先，

① С. С. Ольденбург, Царствование императора николая II, с. 278.

② О. С. Поршнева, Крестьяне, рабочие и солдаты росии накануне и в годы перв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с. 77, 128, 130.

社会革命党与自由派分道扬镳。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社会革命党坚决与立宪民主党划清界限，提出不与他们做任何妥协，完全把他们看做资产阶级的反对党。^① 其次，遭到沙皇政府的镇压。1905年革命是群众性的自发革命，并在工人代表苏维埃和全国铁路联合会的号召下举行了莫斯科大罢工。然而，在10月17日之后，政府就可以分化瓦解反对派政党。社会革命党认为的政府的“挑唆手段”，如1905年11月3日颁布的《改善和缓和农民处境》^② 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引发反对派的分裂，从而巩固政权。最后，社会革命党失去了在杜马斗争的机会。社会革命党把政府召开杜马看做“假象”，仅仅是向西方借款的由头。^③ 从纲领出发，社会革命党关闭了自己理性交往的大门。

1906年3月，社会革命党在传单和《人民通报》上宣传“国家杜马是掌握在政府手中最卑鄙的组织”，是“官僚们制造出来的产物”。在伏尔加河代表大会和南俄州代表大会上宣传组建战斗队、夺取地主的土地。从各地获得武器，运往萨马拉，鼓动萨马拉起义。社会革命党积极地参加农业罢工。在西南、东南俄罗斯的切尔尼戈夫、叶卡捷林诺斯拉夫、赫尔松、萨马拉和奥伦堡，农民要求提高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在沃罗涅什、萨拉托夫、坦波夫省期待通过提出不合理的要求，破坏地主经济，迫使地主逃跑，这样土地自然流入农民手中。^④

1906年5~6月，局势变得尖锐起来。社会革命党在全国农民联合会中央局的全权代表，走遍了基辅、波尔塔瓦、切尔尼戈夫、哈尔科夫、沃罗涅什、坦波夫、明斯克、斯莫棱斯克、莫斯科、萨拉托夫、辛比尔斯克省、顿河军区。根据他们的印象，农民的情绪是这样高昂，以致宣传员不得不抑制不合时宜的革命运动。全农会中央局建议在杜马解散时积极地斗争，夺取收获物或已经收获的粮食。^⑤

社会革命党的恐怖活动也获得迅速发展。1906年春，战斗组织膨胀到了30人，包括A. 戈茨、津季诺夫、库德里亚夫采夫、雅科夫列夫——中央委员会的全权代表、莫斯科委员会的成员。他们中的一些人，如戈茨、

① М. И. Леонов,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в 1905 - 1907 гг., с. 247.

② 根据《改善和缓和农民处境》的宣言，从1906年1月1日起，赎金减少一半，从1907年1月1日起，赎金完全废除。

③ М. И. Леонов,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в 1905 - 1907 гг., с. 262.

④ М. И. Леонов,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в 1905 - 1907 гг., с. 269.

⑤ М. И. Леонов,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в 1905 - 1907 гг., с. 270.

库德里亚夫采夫饶有兴趣地利用车夫、卖香烟的货郎，监视政府的高级人士；另一些人如津季诺夫，受战斗组织气氛的影响，怀着凝重的感情回忆自己从事恐怖活动的过去岁月。^① 一大之后，中央委员会委托战斗组织在国家杜马开幕之前组织暗杀内务部长杜尔诺沃和莫斯科的总督杜巴索夫。同时派津季诺夫到塞瓦斯托波尔调查组织暗杀 Г. П. 丘赫宁海军元帅的可行性。

资料显示，1906年的1~6月，社会革命党共完成了31次暗杀，其中战斗组织2次，州飞虎队16次，战斗队13次。暗杀的目标有6名总督和省长，5名高级军事长官（元帅、将军和校官），14名国家机关的中上层职员，4名秘密警察局、护卫队和宪兵部的奸细。最轰动的是斯皮里多诺娃（坦波夫委员会战斗队）暗杀了省长助理 Г. Н. 卢热诺夫斯基。^② 直到杜马召开，恐怖运动才逐渐衰落。

第三节 杜马召开期间的策略摇摆

一 在杜马中的尴尬

社会革命党中的激进行为并没有阻止农民走进杜马。面对杜马选举的既成事实，社会革命党对党的策略做出调整。

1906年5月召开的社会革命党第一次党务会议上，首先承认抵制杜马的正确性，但是，鉴于杜马的存在，社会革命党决定把杜马发展成为政府的反对派，把杜马变成纯粹劳动人民的杜马，引导杜马转向同政府的斗争，激发群众的自我意识。社会革命党由于害怕参加杜马玷污了自己的名声，决定通过劳动团影响杜马，直到在普遍、平等、秘密和直接投票的基础上召开立宪会议，承认消灭土地私有制的原则。^③

利用杜马作为反对政府的工具，标志着社会革命党革命策略的失效，也是对社会革命党最低纲领——推翻沙皇政权，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挑战。社会革命党的领导人、恐怖运动的领导者格尔舒尼在监狱中给社会革命党写信，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格尔舒尼说：“我们不相信杜马能够成功地做一

^① М. И. Леонов,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в 1905 - 1907 гг., с. 272.

^② М. И. Леонов,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в 1905 - 1907 гг., с. 275.

^③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00 - 1907.2, Т. 1, с. 194.

些事情，我们不相信杜马能够避免与政府之间的冲突，我们不相信政府能够做出重大让步，我们不相信事情没有人民的积极干预会得到解决。但是，我们知道，积极的干预只有在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开展行动，在全体劳动人民发展起来，在运动成为全民族的运动的时候，才能产生有利于人民的结果。”^①从几个“不相信”中已经可以看出格尔舒尼唯人民马首是瞻，把政府归结为沙皇或者资产阶级政府，因反沙皇和资产阶级而反政权。他号称捍卫自由，但这种自由体现的不是人民的愿望，而是他自己的愿望。他说：“这种运动只有当以劳动阶级为首的国家贯彻一种思想，融合一种感情才是可能的。那就是现在解散杜马起到了这种凝固的作用。但是，解散杜马的责任将全部像重担一样落到政府肩上，杜马只能在刺激全民运动的意义上发挥重要的作用，届时，杜马无论是作为多数的代表，还是作为少数有影响又有决定作用的代表，只有当吸引其他人与议会外人民运动协同一致时，在群众的意识中才会成为自由事业的捍卫者。”^②格尔舒尼的看法无疑已经道出，沙皇的政权已经脱离了人民，未来的政权只有反映民意才能具有合法性。杜马的存在已经说明革命者愿意重新回到谈判桌前，这对激进社会革命党来说是一种剧烈的转变，促使他们开始思考权力的性质，不清楚的只是政权的形式。

切尔诺夫也参加了与富人编辑部关于未来政权性质的争论。列昂诺夫认为这是社会革命党可以在杜马成为反对派的基础上召开立宪会议的证据。然而，切尔诺夫本着社会革命党的纲领：即未来的俄国将建设成为民主共和国，而限定了政权的形式，与土地社会化、特别是村社土地所有制背道而驰。切尔诺夫只得以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形式隔断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换句话说，切尔诺夫坚持政治上建立民主共和国，是对西方民主制的抄袭；而坚持土地社会化又是对赫尔岑村社社会主义观点的抄袭，没有对俄国社会性质做创造性思考。参加富人编辑部讨论的温和的社会主义者佩舍霍诺夫击中了问题的要害。他说，俄国的问题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通过人民”，但是“不能受到或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或是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俄国社会主义理论的教义束缚”。俄国纲领的目的就是赢得自由和法律所捍卫的人类个性的独立，人的全面发展和无限的完善。佩舍霍诺夫提出了人民主权概念。他根据俄国国家强大、人民软弱的特点，指出“农

^①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00 – 1907. 2, Т. 1, с. 197.

^②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00 – 1907. 2, Т. 1, с. 197.

民的消极性与他们几个世纪以来忍受困苦和侮辱有关，因为这在他们的心理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农民的斗争具有非政治的特点，必须采取一切措施避免无政府主义、竞争和农民之间的敌视”。所以，佩舍霍诺夫一方面强调国家机关在革命中的作用，不接受社会革命党的民主共和国，认为那是漫长的发展过程；另一方面通过国家的形式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理解他们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波罗塔索娃说：“一百年过去了，佩舍霍诺夫的思想比当时更具现代性，更合时宜。”^① 佩舍霍诺夫最重要的思想是呼吁俄国社会各界关注苦难的人民。

佩舍霍诺夫积极主张合法化。他以农业专家的身份参加劳动团，并制定 104 人土地方案。劳动团主要来自农业发达的萨拉托夫省。农民在政治上把票投给了立宪民主党，但是在农业问题上则支持社会革命党。参加第一届杜马的农民党团劳动团共有 107 名代表，其中农民 42 人，工人 19 人，占劳动派总数的 41.6%。^② 劳动团在杜马中提出了自己的农业法案，称为“104 人方案”。104 人方案要求“所有的土地连同土地上的资源和水源都属于全体人民，它只能归靠自己的劳动耕种它的人使用，所有的公民都享有平等的使用权。为此建立全民土地储备，包括国家的、皇室的、内阁的、寺院的和教会的所有土地，被征用的地主的土地和超过了当地劳动标准的其他私有土地。份地和不超过劳动定额的私有土地仍然留在现有的土地所有者手中，但是应该采取立法措施避免超过劳动定额的土地集中在一个人手中，并逐渐把它们转为全民所有。强制征用和自愿让出作为全民土地储备的私有土地由国家补偿。补偿的规模和支付的条件由各地的人民讨论决定”^③。劳动团的农业草案具有社会主义的特征，但是愿意在国家补偿的情况下容忍私有制。

社会革命党派出切尔诺夫、布纳科夫（丰达明斯基）、К. Р. 科恰罗夫斯基等人参与了 104 人方案的制定，^④ 但是，由于社会革命党不能容忍私有制和雇佣劳动，退出了劳动团，提出了符合土地社会化纲领的 33 人方案。

33 人方案首先提出了土地基本法，反映了他们的革命原则。基本法说：

① О. Л. Протасова, А. В. Пешехонов Человек и эпоха, с. 46, 50.

② 刘显忠：《近代俄国国家杜马：设立及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第 105 页。

③ Под ред. В. Г. Тюкавкин, Хрестоматия по истории СССР 1861 - 1917 гг., М., Просвещение, 1990. С. 324.

④ Д. А. Колесниченко, Трудовики в первой россий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с. 56.

“俄罗斯国内的任何土地私有制完全绝对地消灭，任何土地包括矿藏和水源属于俄罗斯国家全民所有。不分性别、信仰和民族，经过普遍、直接、平等、秘密投票选举产生的人民政权确定详细的土地及其所有财富的使用法律；人民政权监督确定的法律秩序不被破坏；等等。”为了保证土地使用的公正，方案规定，任何一个人都有权定期和无限期地使用土地……任何人无权使用超过自己与家人在不使用雇佣劳动情况下所使用的土地……任何人不准出租土地。^①

与劳动团的方案相比，33人方案更加重视原则，完全废除私有制表现出与私有制势不两立。法律不是现有国家确立的，而是重新选举产生的国家确立的。在土地的使用上严格遵守平均主义的原则，不准与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相纠缠。104人方案虽然也提出了土地归全民所有，但是给土地私有制和现在的国家留下了余地。33人方案的激进性使其没有可能提交杜马讨论，最终，社会革命党通过33人方案，在地方按照普遍、平等、秘密和直接的原则建立地方委员会，为推行土地社会化做准备。立宪民主党认为这是与社会革命党分道扬镳的起点。

社会革命党参加了杜马，先后有16人，同时古科夫斯基和拉特纳进入了法律委员会，切尔诺夫、拉基特尼克夫、科恰尔洛夫斯基、布纳科夫进入了农业委员会。参加委员会已经是对革命的背叛，但他们遵循僵化的教条，强化了自己的革命特征。社会革命党出尔反尔的做法一方面遭到了激进社会革命党的反对，造成社会革命党的分裂；另一方面又遭到了斯托雷平政府的镇压，陷入了十分尴尬的境地。

二 铤而走险

根据维特伯爵的回忆，第一届杜马解散的命运早就在预料之中。提议解散第一届杜马的是大臣会议主席Л. И. 戈列梅金，并得到了沙皇的批准。理由是杜马竟然不顺从国务会议，竟然讨论强制平分私有土地的问题。^②

据维特回忆，真正想要解散杜马的是戈列梅金为首的保守派，而沙皇是冤枉的。沙皇因害怕革命化而被戈列梅金绑架。理由是当戈列梅金收到解散杜马的通知之后，立刻通知家人不要叫醒他，直到第二天解散杜马的

^①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00 - 1907. 6, Т. 1, с. 202, 203 - 204.

^② 谢·尤·维特：《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续集）——维特伯爵的回忆录》，第321页。

通知颁布。^① 维特把解散杜马的罪责归于戈列梅金等保守派显然是片面的。纵观整个第一届杜马的活动可以看出，杜马是一个革命的杜马。关于土地问题原则的讨论总体看来存在着两种意见：一种意见坚持土地私有化；另一种意见坚持土地社会化。二者似乎针锋相对，互不相让。无论哪一方，都可以找到无数条理由。其实，撇开土地私有化和土地社会化两种观点不谈，真正引起他们纠纷的是双方互不相信的事实。而沙皇成为他们相互攻击利用的对象。关于土地问题也同样如此。土地私有制中包含着土地公有的成分，土地社会化中包含着土地私有的内涵。

关于杜马的性质，关于土地问题的性质归结起来可以说是一个问题，这就是社会分化问题。旧体制下，沙皇是一切权力的拥有者，他对上帝负责，臣民只有服从。从东正教的角度来说，沙皇是所有子民的代表；从世俗的角度来说，沙皇与所有的子民一样，只是其中的一分子。虽然社会变革，有产者想与沙皇分享世俗权力，并在土地问题上挑动私有和公有的纷争，无产者也以沙皇为地主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回避沙皇的精神身份问题，同样不能赢得世人的尊敬。无疑，在劳动者的心目中，沙皇的精神位置在此时是不能替代的。私有和社会所有的争论不能回答俄国社会政教分离的问题。遗憾的是，以西方资本主义模式为样板的俄国自由主义，以俄国村社为样板的村社社会主义以及理论上崇尚自由主义实际上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俄国马克思主义都回避了俄国精神发展的真问题，纠缠于沙皇改革带来的不公正、俄国战争失败的问题上。

维特曾是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由于否定俄国斯拉夫派提出的俄国专制制度、农奴制度的精神基础问题而大力推动俄国的工业革命和自由主义改革，造成俄国精神基础的衰落。反映在土地问题上，关于土地私有制和土地社会所有制之争已经不是土地问题本身，已经变成了俄罗斯精神和西方精神之争。但是，在自由主义占据上风的情况下，沙皇的保守性成为所有革命者攻击的对象。

解散杜马的消息一传到杜马，200多名杜马代表齐聚维堡，发表《维堡宣言》。维堡宣言号召民众拥护国家杜马，要求人民以拒服兵役、拒绝纳税的方式支持杜马。^② 参与发表维堡宣言的有立宪民主党人、劳动团和社会民主党，主体则是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认为立宪民主党的做法是消极抵

① 谢·尤·维特：《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续集）——维特伯爵的回忆录》，第323页。

② 刘显忠：《近代俄国国家杜马：设立及实践》，第168页。

抗，这对于革命来说无异于自杀。^① 社会革命党于是把工作的重点用于推动革命的抗议。

首先，社会革命党劝代表不要承认政府解散杜马的行为，并迫使政府动用武力对抗自己。在没有得到参加维堡会议的杜马代表回应的情况下，社会革命党让位于彼得堡的中央委员和全权代表像杜马一样继续开会，逼迫他们武力抗击。^② 当初步措施没有收到效果之后，社会革命党马上转入武力行动。

武力行动分几个方面。在城里举行了三次暴动，分别是7月17日斯维尔波尔克（свеаборг）暴动、7月19日的喀朗施塔德暴动和同一天列维尔港的“纪念亚速夫”巡洋舰起义。^③ 三次起义收效甚微，遭到沙皇政府的残酷镇压。7月20日，社会革命党恢复了跨党情报处。社会民主党号召所有的工人举行罢工，以恢复解散的杜马，遭到了情报处的一致否决。最后会议通过了近期举行市民普遍罢工的决定。7月20~21日夜，跨党情报局举行第二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俄国社会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崩得（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进步与社会主义政党、劳动团委员会以及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杜马党团代表。会议发表了《告全国人民书》，决定举行全民大罢工。^④

跨党情报处会议之所以通过大罢工的决议源于社会革命党对工人罢工的意见。社会革命党吸取1905年革命的教训，认为俄国革命的主体是农民，只有在农村发动全面的起义，才能彻底推翻沙皇政权。社会革命党固执地认为1906年是大好机会并全力推动，从1906年春天开始就在军队中进行宣传，3月末建议社会民主党放弃意识形态分歧，在波罗的海海军中派驻自己的代表，宣传自己的土地纲领。社会革命党在三个地方的暴动就是这种宣传的反映。

伏尔加河流域是土地问题最突出的地方。据萨马拉的副省长 И. Ф. 科什科回忆，这里的农民对政府充满了敌意。7~8月，萨马拉有73起农民暴动，萨拉托夫有123起农民暴动。维堡宣言散发了几十万份，几乎在所有的村子都能见到。在杜马解散前，伏尔加河第四次会议就安排农村开展游击

①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00 - 1907. 6, Т. 1, с. 207.*

② *М. И. Леонов,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в 1905 - 1907 гг., с. 311.*

③ *С. С. Ольденбург, Царствование императора николая II, с. 300.*

④ *М. И. Леонов,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в 1905 - 1907 гг., с. 316 - 317.*

战争，暗杀当地的官员。7月21日，木工工人Г. Н. 弗罗洛夫在街角用沃斯科列先斯基和沃兹涅先斯基扔在轿式马车的炸弹炸死了布洛克省长。7月29日又往宪兵局扔了一颗炸弹。萨马拉宪兵局长И. И. 卡拉塔耶夫将军的神经都有些支持不住了。^① 社会革命党进攻农村的目的就是在这里建立地方政权。

社会革命党的努力失败了。主要原因在于，无论是工人还是农民都已经厌倦了。据官方资料统计，参加7月罢工的总共有169000人，其中75000人是由于经济原因。^② 社会革命党想凭借只有经济要求的工人农民为支柱推翻沙皇政权的要求有些过高了。另外，沙皇政府对社会革命党的革命行动做了充分的估计。他们把预定清洗的革命分子列入了黑名单，^③ 在7月4日就逮捕了12名彼得堡委员会的成员，组织了有内务部和警察局高级官员参加的大规模的屠杀试验。仅从喀朗施塔德起义的情况来看，这次镇压就足够血腥。参加喀朗施塔德起义的有970人，遭到审判的有701名炮兵、170名水雷手、99名水兵，55人准备枪毙（28人被枪毙），127人被罚服苦役，700多人被监禁。^④

社会革命党的铤而走险没有成效，表面看起来有很多客观原因，但更主要的源于他们的动机。从社会革命党一大到第一届杜马被解散时的表现可以看出，它一直生活在自己的幻想中，不顾一切投向革命而忘记了革命的目的。而从一部分人发动暴动，而另一部分人参与杜马的情形来看，他们堕落成为谋取私利的刑事犯，成为挑唆群众斗争但又参与自认为是贵族老爷傀儡——杜马的“叛徒”。

社会革命党无疑被革命的激情冲昏了头脑，丧失了推动社会革命的机会。但对已经智慧枯竭的社会革命党来说，这次冒险又成为他们深入理解革命的一次推动。

三 在杜马问题上的困境

戈列梅金解散第一届杜马以后，斯托雷平接任了大臣会议主席的职务。斯托雷平采取了两项措施解决第一届杜马遗留下来的问题。第一，1906年8

① М. И. Леонов,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в 1905 – 1907 гг., с. 328, 330.

② М. И. Леонов,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в 1905 – 1907 гг., с. 328.

③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00 – 1907. 6, Т. 1, с. 206.

④ М. И. Леонов,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в 1905 – 1907 гг., с. 325.

月 19 日设立战地军事法庭。根据这一条例，政府有权决定不将犯人送交普通法庭，甚至不送交根据正常制度依法行事的军事法庭审判。杀人或武装抢劫之后送交法庭不超过 1 昼夜；审理案件不超过 2 昼夜；判决在 24 小时之内执行；这样，犯罪和惩处之间不会超过 3~4 天。第二，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如信仰自由；个人和公民的法律权利不可侵犯；改善农民土地占有制；改善工人的日常生活（国家保险）；改革地方自治（小的地方自治单位）；在沿波罗的海和西部地区实行地方自治；在波兰王国实行地方和城市自治；改革地方法院；改革中等和高等学校；实行收入税；警察和宪兵合并；颁布新的非常条例，加紧宗教会议的准备以便审议类似对于犹太人的限制等问题；类似移民这样的刺激和明显过时的条例立刻废除；等等。^① 斯托雷平实行的以上改革是根据宪法第 87 条非常条例进行的，具有临时性质。两类法律一软一硬。硬的方面加强了执法力度，坚决镇压革命行为；软的方面着手解决革命提出的问题。

斯托雷平解决真问题的做法具有强烈的震慑作用，无论是革命政党还是保守派政党同时出现在第二届杜马，开始了争夺群众的赛跑。斯托雷平直面社会问题，标志着 1905 年革命的结束。追求自由的所有政党从此发生了分化，异化也从此开始。对于斯托雷平来说，他可以利用宪法第 87 条推行改革，但改革能否成功取决于群众的认可程度；对于革命者来说，仅仅利用沙皇政府的战争失败和镇压革命赢得群众支持也不能坚持到底，同样需要直面群众提出的问题，赢得群众的支持。所以，对于社会革命党来说，参加第二届杜马成为被迫的选择。

转变对杜马的态度促使社会革命党先后召开了两次会议：一次是 1906 年 10 月召开的第二次党务会议；一次是 1907 年 2 月 12~15 日召开的非常代表大会。由于社会革命党一直把杜马看做资产阶级的杜马，不能有效地利用杜马为争取人民的信任服务。斯托雷平政府正视杜马的行为把社会革命党逼到了墙角，迫使其不得不转变对杜马的认识。对杜马认识的转变是艰难的，它关系到对革命性质认识的转变，即革命是否一定要推翻政权，可不可以与有产者协商。当第一届杜马代表们只讨论大赦和土地问题，斯托雷平通过社会改革和土地改革着手解决这两个问题以后，社会革命党已经无路可走了。自由民粹派——人民社会党提出建立合法政党，以切尔诺夫

^① С. С. Ольденбург, Царствование императора николая II, с. 303, 302.

为首的社会革命党中派参与杜马劳动团的讨论，已经揭开了承认杜马的新篇章。

鉴于社会革命党在杜马态度上的剧烈转变损害了党在 1905 年革命中赢得的威信，它不得不反复解释转变对杜马态度的理由。社会革命党在党务会议决议中说：第一，参加杜马选举不是承认杜马为正常的立法机关；第二，参加杜马选举与坚持战斗策略同时并举；第三，政府、反动派与反对派和革命者之间的斗争就是选举权的斗争；第四，党无论是参加杜马选举还是参与杜马活动都应该使群众革命化并组织群众，让他们不要相信通过现在的杜马的立法活动可以满足他们的基本需求，向他们证明，只有通过普遍、平等、秘密、直接选举的立宪会议，才能够并有权解决他们提出的要求。^①

从社会革命党提出的正视杜马的四条理由来看，他们的观点是矛盾的。第一，社会革命党以杜马没有充分的代表性为由继续革命，是对自己参加革命源于政治解放的背叛；第二，是对第一届杜马提出的大赦问题和土地问题的回避，是把人民引向纷争的步骤。

第二次党务会议决议是社会革命党对政府政策变换的不理智的回应。社会革命党老革命家、著名记者希什科谈到理由时说：“所有人的情绪都是绝望的，无人相信有开展广泛运动的可能性，即便革命政党也是如此。”本已激进的社会革命党最高纲领派陷入了更加疯狂的恐怖之中。据统计，1906 年，革命者杀死了 768 名、打伤 820 名政权的代表和代理人。^② 最激烈的恐怖指向把社会革命党置于死地的斯托雷平。1906 年 8 月 12 日，社会革命党对斯托雷平一家实施了爆炸，爆炸致使 27 人当场死亡，32 人受伤（其中 6 人因重伤而亡）。斯托雷平虽然幸免于难，但他 14 岁的女儿和 3 岁的儿子被石头砸成重伤。^③ 经历这样的事件以后，斯托雷平的“自由派面目逐渐消失了……在治国的最后两三年中大搞恐怖活动”。^④ 斯托雷平自己也简单地认为社会革命党的恐怖就是让他“举起手来”，^⑤ 更加疯狂地镇压革命行动。

俄国从事政治学研究的 A. H. 梅杜谢夫斯基从现代化的角度解释了这种

①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00 - 1907. 6, Т. 1, с. 217.

② М. И. Леонов,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в 1905 - 1907 гг., с. 334, 335.

③ С. С. Ольденбург, Царствование императора николая II, с. 301.

④ 谢·尤·维特：《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续集）——维特伯爵的回忆录》，第 326 页。

⑤ С. С. Ольденбург, Царствование императора николая II, с. 312.

异化行为。第一，亚洲国家（梅杜谢夫斯基把俄国归入这类国家）由于过分长久地保存了传统的社会政治组织体制并用宗教和政治价值使之合法化，大部分居民的家长制心理在与外部世界的直接接触中遭遇了侵蚀。第二，对于欧洲政治组织模式的理解不是社会结构有机发展的结果，甚至不是地方政治人士自觉选择的结果，而是欧洲强国经常直接施压而采取的强制措施的结果，最多也不过是克服威胁发展中国家在未来丧失独立的政治和社会落后的一种努力。第三，在现有社会条件下和短时期内不能实现欧洲宪法组织的模式和类型，将导致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实施这种模式的时候，加进其他一些社会内容，并因与欧洲国家相关联以及按照欧洲的观点做预测而履行一些相反的社会职能。^① 斯托雷平和社会革命党在相互博弈的过程中走向了反面。

斯托雷平在接任内务大臣之后采取的一软一硬两项措施让社会革命党无地自容。硬的方面就是揭露社会革命党表面上积极参与杜马选举，实际上利用杜马给予的机会从事破坏活动。软的方面就是实现西部地方自治和对犹太人的宽容政策，按照资本主义方式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两项措施让社会革命党苦不堪言，危机四伏。硬的方面让社会革命党在遵守秩序的人眼里成为“刑事犯”，在革命者眼里成为投降派。^② 软的方面，社会革命党成为反立宪运动的恐怖政党和维护中世纪村社的保守势力。无疑，斯托雷平改革推进了俄国的法律立宪制度^③和俄国村社的解体过程。^④ 但是，斯托雷平的强制改革加剧了政权与社会的矛盾，最终酿成了社会更强烈的反现代化行为。社会革命党成为反社会的“丑角”。

面对政府的咄咄逼人的进攻，第二次党务会议模棱两可的策略使得社会革命党日渐削弱。1907年2月12~15日，社会革命党在塔麦尔伏尔斯召开了非常代表大会，制定新的策略。参加会议的有117名代表，其中68人有投票权，49人有发言权。117名代表来自50个地方、13个州，还有来自中央委员会、军事局、国外局以及军官联合会、全农会、全铁联、劳动团

① A. H. Медушевский, Демократия и авторитаризм: Российский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ализм в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й перспективе, М., РОССПЭН, 1998, с. 461.

② К. В. Гусев, Партия Эсеров: от мелкобуржуазного революционаризма к контрреволюции, с. 66.

③ А. Ф. Смирно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дум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1906 - 1917, М., Книга и бизнес, 1998, с. 271.

④ 鲍·尼·米罗诺夫:《俄国社会史》上卷,第504页。

和社会主义犹太工人党的代表。^① 会议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会议一开始就分成了两派。一派以布列什科—布列什科夫斯卡娅为代表,属于激进派,她认为,杜马只是部分事实,找不到可以赋予它独立意义的理由,呼吁抵挡它……建议党把主要的工作用于组织群众、战斗小分队、夺取土地、接替政权等方面。布列什科—布列什科夫斯卡娅的观点得到来自弗拉基米尔、阿斯特拉罕、斯塔夫罗波尔、科斯特罗马和其他省州组织的赞同。^② 一派以切尔诺夫为代表,属于温和派。他代表中央委员会提出公开参加杜马活动,但也不放弃战斗策略。切尔诺夫的观点遭到了激进派的鄙视,阿斯特拉罕的代表甚至指责他沿着立宪民主党的道路滑落。^③ 最后,在党内享有崇高威信的格尔舒尼的发言,才使得陷入困境的社会革命党走出了危机。他说:“在杜马不存在的情况下,我们甚至不知道人民运动如何才能摆脱困境;当杜马出现的时候,就像有人难听地把它称为溺水者抓住的那棵救命稻草。”^④ 格尔舒尼,也只有格尔舒尼的定调才为社会革命党指明了方向,转向了杜马。但社会革命党长久形成的思维惯性——对政府的怀疑导致非常代表大会做出了互相矛盾的决定:社会革命党参加杜马选举,但不确定以杜马党团还是小组形式参加杜马活动;参加杜马活动,但在活动的时候团结社会主义和左派革命政党以反对政府和杜马右派;参加杜马活动,但是随时准备解散杜马并把责任推卸给政府,视情况决定加强恐怖还是暂停恐怖。^⑤

社会革命党积极参加选举。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出版“选举指导书”,建议不仅吸收劳动人民,而且吸收非劳动人民,如律师、医生和工程师等。在选举过程中与立宪民主党、人民劳动团、社会民主党、人民社会党、全国铁路联合会和全国农民联合会结成联盟对抗黑色百人团。^⑥

社会革命党首先遭到了立宪民主党的拒绝。立宪民主党主席米留科夫认为,杜马首先应该放弃、至少在开始应当放弃对斯托雷平内阁的不信任态度,不要急着像第一届杜马那样提交自己的法案,而应只限于从事立法

① М. И. Леонов,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в 1905 – 1907 гг., с. 349.

② М. И. Леонов,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в 1905 – 1907 гг., с. 350.

③ М. И. Леонов,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в 1905 – 1907 гг., с. 350.

④ М. И. Леонов,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в 1905 – 1907 гг., с. 352.

⑤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00 – 1907. 6, Т. 1, с. 537 – 538.

⑥ М. И. Леонов,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в 1905 – 1907 гг., с. 354, 356.

工作，对内阁的法案进行修正。更为重要的是，立宪民主党断然拒绝革命恐怖，也不想滥用质询权。立宪民主党的目的就是在杜马建立强有力的立宪中心，以推动杜马的立法工作。^①米留科夫拒绝了社会革命党的邀请。

社会革命党遭遇了社会民主党的竞争。据统计，在首都彼得堡，社会革命党获得了13223张选票（36.1%），整个社会民主党获得了17120张选票（46.8%）。在莫斯科，情况还不如彼得堡。^②

社会革命党与劳动团和全农会、人民社会党普遍结盟。社会革命党与人民社会党结盟，叫做劳动联盟或左派联盟，结盟城市达到39个。社会革命党为了对抗右派，在立宪民主党拒绝的情况下，还在42个城市与之结盟。

社会革命党在选举过程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62席，其中社会革命党员37人，其他为同情者。62名代表分别代表31个省州。最多的来自库尔斯克和维亚特卡省——6人，来自基辅和萨拉托夫的5人，来自萨马拉的4人，来自喀山、彼尔姆、沃罗涅什各3人。伏尔加河地区（阿斯特拉罕、喀山、尼日诺夫格罗德、萨马拉、萨拉托夫、辛比尔斯克省）派出了15名代表，不足整个代表的1/3（来自伏尔加河地区的50人）。社会革命党的主要代表（34人）来自黑土地带。有着很强的宗法关系传统、国家冶金和金属加工厂集中的地区——乌拉尔三个省（维亚特卡、彼尔姆、乌法）派出了10名代表。^③

社会革命党尽管第一次参加选举就取得了不少席位，但是，由于不是以党团而是以小组的名义参加杜马活动，社会革命党的杜马代表没有多大作为。“小组在自己的行动上完全自治并遵循党的代表大会或者党代表会议的命令。他们必须向代表大会汇报自己的行动。小组独立确定自己的策略。小组的主要任务就是在群众中传播党的思想，以党的纲领精神影响杜马，帮助党在议会外活动。”^④杜马小组成员小心谨慎，害怕承担杜马解散的责任。

社会革命党对杜马的态度反映了对自由特别热衷的一些人，如格尔舒尼、切尔诺夫的观点。但是，激进的反西方的社会革命党不以为然，仍然激烈地从事着恐怖活动。1906年7月至1907年5月，社会革命党共完成了

① 刘显忠：《近代俄国国家杜马：设立及实践》，第157～158页。

② М. И. Леонов,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в 1905 - 1907 гг., с. 360, 361.

③ М. И. Леонов,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в 1905 - 1907 гг., с. 364.

④ М. И. Леонов,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в 1905 - 1907 гг., с. 365.

72次暗杀。被暗杀的人当中有10位高官，分别是省长、总督、直辖市市长、上校指挥官、将军和元帅，其余大部分是警察局的秘密奸细，警察、守卫队员，中下层行政官员。参与准备和实施刺杀的是7个州组织的飞虎队、中央战斗组织、南方战斗队和省委员会下属的战斗队。^①在阿泽夫的干预下，战斗组织无所作为，失去了领导作用，遭到了战斗组织成员的责备。对于恐怖活动观点暧昧的斯列托夫和切尔诺夫成为攻击的对象。战斗队员要求他们退出中央委员会。阿泽夫和萨温科夫拒绝领导战斗组织，中央没有就衰落的恐怖活动做出明确的回复，害怕伤害寄托了革命信仰的恐怖革命者。

为了重振社会革命党恐怖分子的信心，中央委员会成立了以Е. И. 西尔伯贝格为首的中央战斗队。西尔伯贝格几次策划谋杀沙皇，被阿泽夫一一破坏。斯托雷平以此为由打击社会革命党，在杜马中揭露社会革命党的两面派行为。随着社会民主党策划军事阴谋的败露，革命政党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和逮捕。社会革命党被迫转入地下，大部分人士流亡海外，失去了利用杜马巩固政党的机会。

四 在农业问题上的异化

斯托雷平在农业问题上的改革对社会革命党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也是他们逐渐失去农民基础的原因。斯托雷平在农业问题上采取了两个方面的措施。第一个措施是土地私有化，第二个措施是移民。

根据1906年11月9日（俄历）法令，每一个在村社拥有份地的主人，任何时候都可以要求把他们的份地确定为自己的私产；超过家庭人口定额的份地，主人可以将多余的部分按照1861年改革规定的价格赎买；个人不仅有权支配土地，而且有权支配退出村社的庄员的全部财产；农民退出村社必须取得村会的同意。如果村社共同重新分配土地，确定份地的主人有权要求村社尽可能分给他在一个地方的土地，以代替分散的土地。11月9日法令在1910年6月14日变成法律。为了加快土地私有的进程，1911年5月29日，杜马和国务会议通过了1906年3月4日颁布的土地规划条例。根据这个条例，份地不论是否预先确定为私产，凡是实行土地规划的地方，即自动变为私产。^②

^① М. И. Леонов,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в 1905 - 1907 гг., с. 373.

^② 孙成木等主编《俄国通史简编》（下），第346页；刘祖熙：《改革与革命——俄国现代化研究（1861~1917）》，第74~75页。

斯托雷平的土地私有化法令推动了独立田庄和独家农场的建立，也推动了土地的买卖。为了推动土地的开发，政府通过农业银行建立储备地。农民可以抵押自己的土地获得贷款。没有能力经营自己土地的农民，可以在国家的帮助下移民西伯利亚、中亚和高加索。

斯托雷平土地改革是1902~1905年维特土地改革的继续，所不同的是斯托雷平把土地改革上升到了政治高度。斯托雷平通过摧毁村社、培植私人土地所有者，为俄国成为法制国家奠定了社会基础，也是俄国恢复秩序的可靠保证。^① 斯托雷平土地改革引起争议的地方在于，一是采取了强制措施，二是为了维护沙皇专制制度。如维特说：“俄国必将成为一个事实上的立宪国家……问题只在于：是平静和理智地做到这一点，还是要通过流血的形式完成这项任务。”^② 列宁说：“他们避开一切‘符合宪法的’法律，以使用暴力来摧毁村社……他们为了维持本阶级的统治只能这样做，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必须适应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不是同它斗争。而他们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就只能联合‘暴发户’……挽救我们政权的基础。”^③ 列宁把斯托雷平和黑帮视为一类人，忽视了斯托雷平改革在于重建法制国家，势必得出斯托雷平巩固的国家就是沙皇专制制度的结论。斯托雷平改革是借助于沙皇之手实现摧毁专制制度，建立法制国家的改革。斯托雷平在第二届杜马中说，当俄国从无限专制向杜马议会君主制转变，按照君主的意志改造的祖国就应该变成法制国家。^④ 当说到农民的时候，他说：“我认为，首先应该建立公民，农民所有者，小土地所有者。当这个任务实现的时候，国家性就会笼罩整个俄罗斯。起初是公民，然后是国家性。”“所以，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巩固下层。他们是国家的一切力量。他们要超过一个亿。请相信，到那时，国家的根基将变得健康并得到巩固，俄国政府在欧洲和全世界面前发出的声音将完全不同。”^⑤

维特、列宁和斯托雷平的发展方向是一致的，但由于各自所采取的方法完全不同造成了彼此的对立，甚至在斗争过程中完全忘记了共同的目标。斯托雷平指责革命者说：“国家性的反对者想选择激进主义道路，摆脱俄国

① В. Г. Тюкавкин, Великорусское крестьянство и Столыпинская аграрная реформа, с. 162, 161.

② 谢·尤·维特：《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续集）——维特伯爵的回忆录》，第287页。

③ 《列宁选集》第1卷，第780页。

④ В. Г. Тюкавкин, Великорусское крестьянство и Столыпинская аграрная реформа, с. 162.

⑤ В. Г. Тюкавкин, Великорусское крестьянство и Столыпинская аграрная реформа, с. 167.

历史的以往和文化传统。他们需要伟大的动荡，我们需要伟大的俄罗斯。”^①

动荡和稳定是革命者与斯托雷平最大的不同，但是，无论动荡还是稳定都是手段，而不是目的。那么目的是什么？用斯托雷平的话说，就是寻找“精神情绪普遍高涨”的东西；用民粹派的话说，就是寻找人民的声音——神的声音。斯托雷平的方法是让农民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从斯托雷平土地私有化法令执行的结果来看，脱离村社、建立独立田庄和独家农场的富农只占全体农户的10%，90%的农民仍在村社中生活。^② 据Г. А. 格拉西缅科统计，在斯托雷平改革所涉及的47个省、463个县、49568个村社中，都普遍存在着农民的反抗。他们反对政府政策的每一个步骤，尤其反对土地整理与“村社分离者”。农民的反改革运动对1917年十月革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它形成了十月革命的社会经济前提，造就了革命的社会主义政治力量。^③ 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最终没有实现建设法制国家、建设强大俄罗斯的目的。1911年9月，斯托雷平在基辅被社会革命党人Д. Г. 博格罗夫枪杀。

斯托雷平土地改革推动了俄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具体表现在播种面积增加了，谷物年均总产量得到提高，地主和富农的农业商品率获得增长，农村得以稳固。^④ 从转换思维方式来说，农民皇权意识淡薄了，公民意识和民主精神进入农村。^⑤ 我认为，斯托雷平农业改革最主要的成果就是搅动了整个传统社会，促使人们对资本主义思维方式和村社思维方式的思考。

首先，激发了农民的投机意识。从斯托雷平开启改革进程，截止到1913年村社购买土地306万俄亩，合作社购买土地1000万俄亩，私人购买土地368万俄亩，从1911年至1915年，俄国总的播种面积为8500万俄亩，土地买卖的规模不大。但是，土地流动引发了投机浪潮。根据研究，农村土地银行收购的土地平均价格为45卢布/俄亩，地主和银行卖给农民的土地价格不低于125卢布/俄亩。巨大的差价引起各类人物投资土地。仅以图拉省叶费莫夫斯基县为例，105个被调查的银行独立农庄庄员中，52个为市民、僧侣、警察和酒铺掌柜，29个为农村富农，24个为农民。投机带来了

① В. Г. Тюкавкин, Великоорусское крестьянство и Столыпинская аграрная реформа, с. 162.

② 刘祖熙：《改革与革命——俄国现代化研究（1861—1917）》，第86页。

③ 金雁、卞悟：《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村社传统与俄国现代化之路》，第207、208页。

④ 刘祖熙：《改革与革命——俄国现代化研究（1861—1917）》，第84～85页。

⑤ 苏文：《从不公正的改革到反改革的革命——沙皇斯托雷平改革述评》，《开放时代》1998年第1期。

两个后果：一些人真正投资于农业，建立起农业庄园；一些人卖掉土地或者进入城市，或者迁往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促进了农业的开发。^①

其次，土地买卖促进了村社的转型。斯托雷平改革期间，合作社经济获得了空前发展。1910年，俄国拥有13000个合作社。1914年，信贷合作社达到12789个，消费合作社有10000个，农业组织4400个，农业联合会有1301个，合作社牛奶厂2000个，手工协会将近500个。各种协会达到1000万个。信贷业务超过6亿卢布，消费合作社业务达到2.5亿卢布。^②合作社经济长期以来被看做资本主义经济，列宁在《论合作制》一书中则把它看做建设社会主义的步骤。С. Г. 卡拉—穆尔扎则把它与资本主义经济相提并论，称之为劳动经济。А. В. 恰亚诺夫承继民粹派的观点，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即“表面上当家庭劳动经济适应主流经济关系（即资本主义雇佣关系）的时候，它具有特殊的、稳定的内部特征。表面上看，这些内在特征显示不出来”。^③卡拉—穆尔扎指出，恰亚诺夫在资本主义体系下不能理直气壮地为劳动经济正名。通过对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的研究，卡拉—穆尔扎得出资本主义经济越发展，传统村社经济越要巩固的结论。^④

斯托雷平土地改革是西欧式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改革的重要特点是直面俄国的农业问题。无论褒贬，斯托雷平土地改革造成了古老村社的内部分化。社会革命党自从正式参加杜马活动以来，不可能仅仅停留在像第一届杜马那样简单地以抽象的土地社会化来对抗土地私有制，引导农民放弃和平发展，走向革命，他们必须也通过把土地社会化纲领具体化，从建设性的角度吸引农民，赢得农民的支持。

经历了1906年农民起义的洗礼，社会革命党越来越不能认同农民的农业恐怖活动。当斯托雷平土地改革吸引大批农民之后，社会革命党内部对斯托雷平解散村社的举动越来越担心，甚至有人提出重新审查土地社会化纲领。经过争论，党内形成了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以拉基特尼科夫中派

① С. Г. Кара-Мурза, “Советская цивилизация”, Т. 1, уроки Столыпина, с. 216 – 242, 243 – 260.

②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07.6 – 1917.2, Т. 2, с. 463.

③ С. Г. Кара-Мурза, “Советская цивилизация”, Т. 1, Трудности понимания крестьянск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взгляд А. В. Чайнова, с. 163 – 189.

④ С. Г. Кара-Мурза, “Советская цивилизация”, Т. 1, Укрепление общины как условие развития капитализма: взгляд из конца XX века, с. 115.

为代表,认为村社虽然被摧毁了,但它在土地社会化纲领中不是重心,因而没有必要重新审查党的纲领。第二种意见以丰达明斯基等右派为代表,认为村社摧毁了,实现土地社会化纲领必须推迟到未来。第三种意见以科恰罗夫斯基为代表,认为村社没有被摧毁,农业纲领没有必要重新审查。切尔诺夫作为土地社会化纲领的创立者,面对党内的争论,连续发表了《作为党的策略问题的土地社会化》、《村社的摧毁和我们的纲领》、《份地的买卖与农民的阶级分化》。文章说:“对村社做出最终审判还为时太早,因为既没有充足的材料,也没有理论根据。”^①

切尔诺夫从杜马召开以来就着手利用合法的机会把杜马变成争夺农民的基地。第一届杜马,鉴于社会革命党一大刚刚通过了抵制杜马的策略,不好随便更改,切尔诺夫只有借助于劳动团的力量了解农民的心理。经过第二次党务会议和第二次非常代表会议的争论,切尔诺夫终于得到格尔舒尼的支持,合法地走进杜马。1907年2月18日,社会革命党主动邀请劳动团、人民社会党以及社会民主党组成跨党情报局。3月5日,社会革命党又倡议建立讨论农业问题的杜马委员会,劳动团做出回应,向社会革命党和人民社会党建立财经、预算、农业、大赦和地方自治委员会。^②经过认真讨论,社会革命党在33人土地方案和劳动团104土地法方案的基础上提出了105人土地法方案,^③并于5月3日提交第二届杜马讨论。

105人土地法方案第一次把反映社会革命党土地社会化纲领精神的土地方案提交杜马,使得社会革命党不再是以口号,而是以法律的形式展示了自己的建设性形象,赢得了劳动团的支持。据切尔诺夫在1908年党的代表会议上讲,为了使“土地和自由”的口号具有具体而显明的形式,社会革命党邀请了完全内行的农艺师、统计学家和文学家组成农业委员会,在莫斯科召开专门会议。^④切尔诺夫从法律角度阐释了土地法草案的精神。他说:“改革的道路有两条:第一,农民按照私有制的原则分配土地;第二,农民在扩大社会土地所有权的基础上组织农民平均使用。第二条道路不仅

① О. В. Коновалов, В. М. Чернов и аграрная программа партии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2002, №. 2, с. 51 – 52.

② М. И. Леонов,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в 1905 – 1907 гг., с. 370.

③ 105人土地法案实际上只有104人签署,原因在于一个人的签名出现了两次。См.,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00 – 1907. 6, Т. 1, с. 661.

④ В. Н. Гинев, Борьба за крестьянство и кризис русского неонародничества 1902 – 1914 гг., с. 164.

有利于社会主义者，而且认为它在经济计划中是最为有效的。”^①

切尔诺夫像斯托雷平一样把自己的目光盯到了村社上。不过切尔诺夫不是从贬的角度认识村社，而是在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基础上从古老的村社当中剥离出合理的内核。这就是劳动资格（право на труд）和劳动权利（право труда）。劳动资格就是村社保证每一个人获得同等地块的权利；劳动权利就是法律保证农民耕种土地的权利。^② 农民作为国家的纳税人，由于受到国家和地主的双重盘剥，认识不到劳动在自己生存中的地位。长此以往，他们也逐渐养成了粗放式的经营思想，平分土地成为他们的革命愿望。同理，在基本法等所有法律命令反映等级精神^③的情况下，斯托雷平的土地私有制法令中的个人私有制就变成了少数人侵犯大多数人利益的手段。^④ 而实行土地社会化，一方面保证个人仍然可以利用自己的土地，同时还能给国家的每一个公民不受任何限制地耕种土地的机会。^⑤ 所以，切尔诺夫在提交给杜马的 105 人土地法方案中开宗明义地讲明：“俄罗斯境内的所有的土地私有制从现在起永远废除。所有土地连带水源和矿藏被宣布为俄罗斯国家的财产。”^⑥

切尔诺夫通过 1905 ~ 1907 年革命深刻地认识到农民的依附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切尔诺夫在平均主义原则和村社劳动原则的基础上正式提出了消费定额和劳动定额的概念。消费定额就是分配的最低定额，是建立在确定家庭劳动力正常预算的基础上，注意维持个人经济生存和发展所需的最低消费和基本支出的标准。劳动定额则是多地者分割土地的最高标准。^⑦ 两个标准的确定使得多地者退出自己的份地，少地者有了最低的基本保障。更主要的是，通过两个定额的划分，平均分配土地不再通过强制的手段直接没收使用者手中的土地，而是通过法律税收的方式使得使用多余土地的人缴纳级差地租，使得使用消费定额土地的人享受国家税收的优惠政策，人人从土地政策中得到实惠。法案不再对雇佣劳动的使用和土地出租做出规定，也没有无条件优先解决无地农业居民的土地问题，相反法案规定，

① О. В. Коновалова, В. М. Чернов о путях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и, с. 66 - 67.

② О. В. Коновалова, В. М. Чернов о путях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и, с. 66.

③ А. Ф. Смирно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дум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1906 - 1917, с. 294.

④ 金雁、卞悟：《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村社传统与俄国现代化之路》，第 186 页。

⑤ О. В. Коновалова, В. М. Чернов о путях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и, с. 68.

⑥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00 - 1907. 6, Т. 1, с. 219.

⑦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00 - 1907. 6, Т. 1, с. 221.

对于贵族土地银行、农民土地银行经营的土地、私下买卖和转让的土地暂时停止执行，等待选出土地委员会加以解决。这些内容被苏联历史学家基涅夫视为向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妥协，是社会革命党理论家和领袖日益发展的小资产阶级现实主义的明证。^①

土地社会化的确没有区分农民与地主，而是对所有经营土地的人有效。如果考虑到俄国多数农民仍然生活在贫困状态，如果考虑到俄国革命无非是“要求彻底铲除官办教会，打倒地主和地主政府，消灭一切旧的土地占有形式和占有制度，扫清土地，建立一种自由平等的小农的社会生活来代替警察式的阶级国家”^②的农民资产阶级革命，那么，土地社会化的意义已经完全表明社会革命党为农民争取公民权利的决心。遗憾的是，因立宪民主党、十月党、社会民主党等反对派都支持斯托雷平改革的革命举动，社会革命党的土地社会化思想已经变成落后的标志，是向资产阶级的“投降”。社会革命党自己也因特别热衷于建立民主共和国家，把农民看做“独立的法律力量”^③而失去了利用杜马继续扩大自己影响的机会。社会革命党不断地与立宪民主党、社会民主党结盟抗衡俄国的黑帮党。但是，由于立宪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不断地声讨社会革命党的落后性，社会革命党忽视了进一步挖掘土地社会化思想的机会，在走向合法解决农民问题的道路上因自己表面激进，实际保守而异化了。斯托雷平因崇尚自由主义拉拢立宪政党，排挤了反映民意的社会革命党，导致他们重新回到反政府的激进道路，丧失了与革命政党和解的机会。1907年6月3日，斯托雷平以社会不驯服而强行修改了选举法。虽然第三届杜马是“顺服”的杜马，但是却是残缺的杜马。六三政变最终把反对派排除在外，内部要与保守派贵族决战，外部又要与革命党搏斗，斯托雷平的改革变得步履维艰，最终以失败告终。

第四节 “六三”政变之后的绝望

一 抵制策略的重新出台

如何评价1907年6月3日斯托雷平内阁解散杜马并修改选举法，将决

① В. Н. Гинев, Борьба за крестьянство и кризис русского неонародничества 1902 - 1914 гг., с. 164.

② 《列宁选集》第2卷，第243页。

③ О. В. Коновалова, В. М. Чернов о путях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и, с. 67.

定如何看待社会革命党虽激进但实际保守的战斗策略。

六三政变是革命政党对斯托雷平修改选举法的称呼，意指其极大地限制了工人、农民和非俄罗斯民族的选举权，“保证了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在杜马的优势，保证了沙皇制度对杜马的绝对控制”。^①若从立宪的角度来看，六三政变则表明地主与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与专制主义的妥协，^②标志着1905~1907年革命的结束，俄国步入“立宪轨道”的开始。^③第三届杜马较之第一和第二届杜马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杜马。虽然沙皇和极右派有把杜马变成咨询机构的企图和尝试，但杜马最终还是维护了自己的尊严，扮演了限制沙皇权力的角色。

第三届杜马之所以成功地运行了5年并顺利地移交给第四届杜马，其原因是政府利用了十月党和右派政党，即十月党与右翼政党和立宪民主党与左翼政党分别组成的两个多数。十月党则成为政府政策稳定运行的中心。十月党是大资产阶级政党，其基本目标是通过发展地方自治，争取公民的基本权利。^④十月党的保守性说明俄国社会还不存在建设法制国家的基础，在法制观念上还存在着激烈的争论。革命政党不能容忍地主资产阶级与工人农民的和平共处，把立宪这种带有普世价值的观念与资产阶级相提并论，认为其目的就是维护剥削阶级的统治。社会革命党提出的用立宪会议代替杜马的观点基本上还停留在立宪幻想的阶段。

俄国学者关于杜马咨询性质和立宪性质的争论实际上是实与虚的争论。从实际情况出发，第三届杜马更多地发挥装点性质的作用，实权则多掌握在沙皇政府手中，如总理斯托雷平基本都是通过宪法第87条非常法进行日常改革；从虚的情况来看，俄国受西方资本主义的影响，不断着手自由主义性质的改革，如斯托雷平土地改革、西部各省的地方自治和乡自治改革等。斯托雷平改革的目的是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顺利地实现向自由主义的过渡，实现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目标，完成俄罗斯的现代转型。然而，俄国由于长期执行功利主义政策，自由主义常被简单地理解为私有制和强大的工业经济，形成了自由主义之虚与私有制和强大工业经济之实的对立。

① 孙成木、刘祖熙、李建主编《俄国通史简编》，第343页。

② 姚海：《近代俄国立宪运动源流》，第171页。

③ 祝政宏：《罗曼诺夫王朝的最后日子——沙皇灭亡前的上层危机》，海天出版社，2000，第232页。

④ 姚海：《近代俄国立宪运动源流》，第172页。

自由主义源自个性的发展。俄国人的个性长期受到外部敌人的压制，形成了专制主义的氛围。俄国虽有贵族中的自由主义兴起，然而毕竟不能冲破专制主义氛围，相反却出现了农奴制的加强，造成农奴对自由主义的反对。农奴制的废除，加剧了农民与自由派贵族的对抗。要想解除这种对抗，必须从恢复贵族对农民的爱开始，从而苏醒农民久久压抑的个性。斯托雷平的强制，激化了农民与地主之间的不信任，阻碍了农民的解放和自由主义的发展。土地改革和地方自治改革甚至引发了东西方文明的冲突，造成了俄国政府与社会的对抗和民族纷争。

社会革命党首先从社会主义角度对斯托雷平改革作出了回应。在1907年7月召开的第三次党务会议的决议中说，“六三反动政变甚至夺去了人民享有的不多的权利。两届杜马的经验充分展示了立宪幻想的幼稚性和无根性……由于被广泛展示了社会内容的俄国革命吓坏的所有非社会主义成分的右转，社会主义成分甚至不能把第二届国家杜马成功地变成人民运动的组织中心。第三届杜马必将成为黑色百人团和虚假宪法的组织形式，最终成为反革命力量的组织形式”。^①

在社会革命党看来，缩减农民和工人在杜马中的份额就是反对革命，就是虚假立宪和恢复专制制度，进而把自己与贵族资产阶级做了社会主义与非社会主义的区分，并对立起来。同时，社会革命党也认识到，斯托雷平改革造成了知识分子的分裂和劳动群众革命能量的抑制。社会革命党的任务就是有组织地聚集力量并加强战斗策略。^②

社会革命党用社会主义抵挡自由主义，并把它看做文明之间的冲突。那么，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有没有共同的基础呢？从民粹派关于社会主义的学理上的理解即争取个性自由和社会团结来看，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有着共同的基础。然而，从俄国的现实来看，个性的发展一直受到国家的束缚，所以，俄国的自由主义就演变成为保证社会团结的个性发展，也就是民粹派提出的社会主义概念。如果对这样一个现实情形缺乏了解，如果按照西方的自由发展模式衡量俄国的自由主义道路，必然得出沙皇政府维护专制，农民因愚昧而无力追求自由主义的结论。

①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07.6 - 1917.2, Т.2, с. 28.

②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07.6 - 1917.2, Т.2, с. 26 - 27.

无疑，从政府及各个政党提出的政纲来看，他们都致力于自由主义的改革。但是，由于东正教的公义性受到了质疑，东正教会被当做“灌输忠君思想”的工具，^① 阻碍了俄国社会的发展。斯托雷平若想重振俄国，把俄国建成一个伟大的国家，需要重振俄国的精神。斯托雷平试图通过信仰自由的尝试，消弭宗教的纷争，回归历史的本体论。斯托雷平的信仰自由只能解决宗教胁迫引发的社会问题，至于社会问题本身，斯托雷平只能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加以解决，以此挽救俄国危亡的历史命运。

从第三届杜马的立法活动来看，俄国面临的两个主要问题是土地问题和民族问题。斯托雷平解决俄国的土地问题采取了解散村社、扩大私有制的做法。虽然它符合资本主义世界式样，但却违背了资本主义背后的慈爱精神。俄国人世代生存的村社主要不是为了分地，而是一种村社管理，是世代经验产生的生活方式、传统和习俗。^② 从精神的角度来说，它属于耻感文化。斯托雷平怀着蔑视心理否定耻感文化，就会使村社农民“产生怨恨，沉湎于对旧事物的憎恨而不能自拔，妨碍了创造力的发挥”。斯托雷平的蔑视心理本身不得自由主义的真谛，因为自由主义的精神是“罪感文化，经过悔过与和解，将产生创造力”。^③ 斯托雷平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强行摧毁村社，虽然开启了农业商品经济的大潮，却给传统农民带来了胁迫。当改革的道理受到质疑的时候，带来的必然是传统农民对政府的抱怨和激烈的破坏。

斯托雷平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在俄国西部地区实行地方自治和在农村实行乡自治。俄国西部地区是多民族地区，分布着波兰人、芬兰人、波罗的海人、德国人和犹太人。斯托雷平的办法是通过增加俄罗斯人在地方自治局的人数促进西部的发展，引起了具有强烈民族情绪的保守派政党的反对。斯托雷平利用给沙皇下最后通牒的办法，取得了沙皇的支持，却引发了保守派的破坏行为。斯托雷平显然小看了俄罗斯人的东正教的保守情绪。乡地方自治是播种者和守护者走向全权公民道路的重要一步。^④ 由于在乡地方自治农民选举产生的自治局是否受县地方自治局官僚监督的问题上产生分歧，乡地方自治改革被搁置。地方自治改革是缓解改革引发的社会矛盾的

① 尼·米·尼科利斯基：《俄国教会史》，丁世超等译，商务印书馆，2000，第249页。

② А. Ф. Смирно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дум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1906 – 1917, с. 360.

③ 格·弗列罗夫斯基：《俄罗斯宗教哲学之路》，第560页。

④ А. Ф. Смирно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дум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1906 – 1917, с. 376.

必要步骤。由于斯托雷平的强制推行引发了保守派的反对，自治改革推迟进行。削弱的自由主义和革命势力重新抬头。

斯托雷平改革之所以波波折折，原因在于它彰显了公义，但缺少了慈爱。被斯托雷平攥紧的拳头又重新张开。1908年，知识分子重新思索国家与社会对抗的精神因素，并结成《路标》文集，出现了短暂的“宗教复兴”。俄国的路标从此发生了转换，从横向扩张转向纵向探索。

社会革命党抗议斯托雷平借助宪法第87条修改了选举法，示威式地抵制第三届杜马，同时恢复了战斗策略，如培训战斗群众、实施集中恐怖等等，以抗议斯托雷平对宪法的破坏。社会革命党理论家切尔诺夫甚至从理论上论证了斯托雷平改革并没有消除农民反对私有制的心理，奉劝党保持革命的乐观主义。但是，几乎所有的领导人都知道这不可能消除人们对未来的担心。虽然，第三次党务会议最后通过了抵制第三届杜马的决议，但是，从加强对群众的战斗培训、反对抢劫、加强在职业联合会和合作社的组织工作来看，^①社会革命党也开始认真对待农民和工人提出的资产阶级改革给他们带来的冲击，试图从根本上弄清资本主义背后的道，走出革命的危机。

二 伦敦第一次代表会议的策略争论

根据第三次党务会议的决议，社会革命党立即着手人民武装起义。起义主要在塞瓦斯托波尔、基辅、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和符拉迪沃斯托克举行。^②起义都没有获得成功。1907年11月初，社会革命党就在芬兰召开会议，总结军队起义失败的原因。决议指出，起义失败的原因，第一是群众缺乏革命高潮，第二是群众缺乏独立性，第三是军事组织不完善，第四是全党组织不合要求。1907年12月，社会革命党开始对第三次党务会议做出的开展局部斗争的观点做出修正，承认在国内安定、革命组织削弱以及警察的残酷镇压下，社会革命党不可能完成第三次党务会议提出的艰巨任务。社会革命党之后向农民分发问卷，向他们寻求摆脱革命危机的办法，标志着社会革命党陷入了空前的危机。

经历了沙皇政府的镇压之后，社会革命党经历了组织的危机。为了对

^①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07.6 - 1917.2, Т.2, с. 29 - 30.

^② К. Н. Морозов,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в 1907 - 1914 гг., Глава II. Тактика партии. <http://socialist.memo.ru/books/lit/morozov3/index.htm>.

革命形势和今后的策略做出判断，社会革命党中央领导召集能够召集的代表于1908年8月在伦敦召开了第一次全党代表会议。会议经过认真讨论，对革命面临的危机做了定论并在第四次党务会议批准生效，成为法律文件。

首先，会议听取了来自各个地方的形势报告，其次，切尔诺夫代表中央委员会做了主旨报告，最终形成了党的决议。从会议的决议来看，本次会议是对1905~1907年革命的总结。

对于形势，社会革命党延续了第三次党务会议做出的保守派反攻倒算和自由派政治退化的论断。对于国内出现的工业高涨、农业复兴没有给予特别的思考，而是从资本主义破坏了人们对沙皇的信任，旧制度没有摧毁，新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政府利用武装力量向工人、农民和少数民族夺取阵地，资本主义也在政府的庇护下发展起来等处着眼。^①

对于自身的情况，特别是社会革命党在政府的镇压下出现的两种表现：即“在更加自觉的人士中间，有了一种强烈的独立向下、让城乡工人组织站稳脚跟并成为未来更猛烈更重大行动的保证的愿望；在更没有耐力和脱离轨道的人士中间，倾向于非理性、无组织和分散的复仇、经济恐怖乃至各种打家劫舍的行为，把自己等同于道德败坏的流氓无产者”^②，会议归结为党的纲领宣传不够、组织得不好等技术原因，对于斯托雷平改革给社会革命党带来的影响，及自身纲领的缺陷缺乏足够的认识。

社会革命党的危机是思想危机。列宁概括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区别。^③ 如果从思想的角度来认识，列宁讲出了农民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区别，即农民属于一个正在分化的阶级，其未来一定是资产阶级，但在目前还是小资产阶级，而无产阶级是已经分化过的阶级，经过了资本主义的炼狱，其结局一定是社会主义。切尔诺夫一直认为，俄国的自由主义基本上是知识分子的一个流派，在俄国缺乏社会根基。^④ 俄国是一个成长着的社会，俄国的未来取决于俄国的创造性，那就是革命的民主化的知识分子对于群众（工人和农民）的组织和教育。在策略方面，

①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07.6 - 1917.2, Т. 2, с. 293.*

②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07.6 - 1917.2, Т. 2, с. 294.*

③ *К. В. Гусев, Партия эсеров: от мелкобуржуазного революционаризма к контрреволюции, с. 67.*

④ *О. В. Коновалова, В. М. Чернов о путях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и, с. 90.*

基于反动派的镇压和群众的疲惫，社会革命党必须开展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深入开展自己的宣传工作，既要附和群众日益强烈的精神躁动，又要满足化解所经历的事件并给予总结的迫切需求；第二，在组织建设方面既要同分散群众力量的情况作斗争，又要在现有条件下创造富有生命力的组织类型，还要集中全党力量建设一个渗透统一策略和革命纪律的和谐整体；第三，加强集中的政治恐怖。^① 用切尔诺夫的话说就是，“可以也应该用广泛的和不可战胜的融合和反专制的恐怖及在无产阶级、农民、军队以及受过教育的先进社会阶层中的鼓动、宣传，代替没有任何次序的完全相反的措施轮替：或在农民中宣传、或同专制制度进行恐怖斗争，或者在城市无产阶级之间宣传。”^② 切尔诺夫美其名曰这是把政党斗争和群众斗争、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结合在一起，但是他仅仅把工人和农民看做简单的劳动者，看不到资本主义给农民和工人带来的价值观念上的冲击，试图通过加强纪律整合纷争，不是思想混乱的表现吗？

据来自俄国各个地区的会议代表介绍，经过斯托雷平的镇压，社会革命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瘫痪。北方地区地方组织大多遭到毁坏。波罗的海地区由于缺乏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语文献而无法开展工作。普斯科夫省各个组织的成员由于 A. M. 叶列明的奸细行为而遭逮捕。诺夫哥罗德由于缺乏工作人员而完全陷入瘫痪。彼得堡省有 5 个县开展工作，是开展工作比较好的地方，但工作规模不大。他们更多注意的是农村合作社的工作。^③

彼得堡作为首都，每个区最多只有一个宣传员。大学生中那种广泛的宣传组织已经没有，只是在知识分子范围内有一些小组，规模很小。超过 200 人的工人组织已经没有，有的只是个别会议。工人苏维埃被消灭。无党派的工厂委员会也被消灭。在所有区存在的选举委员会也被城市委员会解散。工厂委员会之所以不发挥作用，一方面是因为黑色百人团的镇压，另一方面因为他们的工资得到了增加。更为主要的是工人对于实行抢劫的人深恶痛绝，认为他们从工人联合会那里得不到什么好处。^④

①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07.6 - 1917.2, Т. 2, с. 294.

② О. В. Коновалова, В. М. Чернов о путях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и, с. 91.

③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07.6 - 1917.2, Т. 2, с. 59, 60.

④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07.6 - 1917.2, Т. 2, с. 65 - 66.

一般来说，外高加索地区组织几乎不存在，原因是这里的人个人意识比较强，集体意识比较差。农民组织也没有，因为在这个地方，无论是政府还是沙皇都没有威信，不能扎根。北高加索地区原有3个州委员会，由于从事敲诈行动而损害了自己的形象。^①

乌拉尔地区由于缺乏有经验的党务工作者而堕落成为没有社会主义追求和革命精神的战斗小组。比如兹拉托乌斯特夫区组织有450人，其中200人在兹拉托乌斯特城，分布在7个区。其他250个人分散在不同的地区。组织的预算不大，每个月60卢布，光红十字会每月就花掉30卢布。每个小组也就只能发点文献了。总结下来，宣传工作开展得弱，源于工作人员少。职业联合会和合作社有不少，但不能发展，政府的随便什么镇压就把他们弄得妻离子散，他们不得不回乡种田。^②

伏尔加河流域是社会革命党群众基础较好的地方之一。1907年秋有科兹洛夫、坦波夫、奔萨、萨拉托夫、奥伦堡、察里津和阿斯特拉罕小组。他们以散发文献、从事宣传为主。以奔萨委员会为例，他们把主要精力用于出版事业，可是，政府镇压一来，他们马上陷入瘫痪。奔萨委员会也在农民中开展工作，但是他们的工作很少有人注意。^③

莫斯科是社会革命党活动的另一个中心。1907年召开了解散组织的会议，理由是工作人员少和存在奸细的行为。^④在乌克兰州，党的工作者光被捕的就有几百人，不过多数组织属于自创，自己推选领导人并很少培训。沃罗涅什省农民组织有几千人，现在完全被摧毁。被捕的农民有2000多人，农民情绪很不稳定，保有很强的战斗性并组织了許多战斗小分队。^⑤乌克兰州中央的全权代表不多。3个同志管辖8个省。1906年10月，委员会由2人组成，尼基塔和玛利亚^⑥，一个在哈尔科夫被害，一个离开。州委员在开

①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07.6 - 1917.2, Т. 2, с. 67, 74.

②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07.6 - 1917.2, Т. 2, с. 76 - 77.

③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07.6 - 1917.2, Т. 2, с. 80.

④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07.6 - 1917.2, Т. 2, с. 84.

⑤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07.6 - 1917.2, Т. 2, с. 89.

⑥ 尼基塔和玛利亚是假名，具体指谁没有破译。

会的时候一直抱怨，人数太少，不能开展工作。州委的工作只能巡视。^①

国外的社会革命党组织人数最多，不少于24个小组，300～350人。虽然有丰富的组织人员，但是整个国外组织属于无党组织，各个小组是按照联邦原则组织起来的，过着自治的生活。^②

综上所述，社会革命党组织分布很广，但所做的工作很肤浅。派出的特命全权代表只能从事些文献散发和宣传工作。各地的地方组织，特别是农民组织基本处于自发状态，虽然与社会革命党有些联系，但接受的是反政府宣传，陷入了反社会的行为之中。社会革命党热衷的农民和工人组织提出的最多要求也都属于经济和社会福利方面的。

社会革命党的组织人数很少，他们的衰落多来自政府的镇压和奸细的破坏。对比社会革命党应对组织瘫痪的举措，我们不难发现，社会革命党把败坏的责任归结为政府、人民以及财政困难，从来没有问一下自己的举措为何没有获得人民的支持。

社会革命党绝望了，一方面一些人不顾党组织的涣散，以个人的名义加入了工人联合会、合作社、工人俱乐部等群众组织，美其名曰是了解人民，培养他们的革命性和启蒙工作，保护他们不受政府伤害，实际上，是放弃了自己的思想影响，陷入了对群众的膜拜；另一方面，一些人以民主知识分子自居，对于工人掀起的工厂恐怖和农民掀起的农业恐怖以“抢劫”为名加以谴责，同时又以集中恐怖和政治恐怖为名为工厂和农业恐怖张目。社会革命党对于非理性的群众的纵容，说明他们已经失去抗衡政府改革发展的道义，面临堕落成为刑事犯的危险。为了摆脱危机，一些右派人士转而走向迎合从事资本主义经营活动的地主和资本家，表面上害怕由于过分压迫资本家和地主而导致他们分化成为小资本家和小地主，从而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其实是对资本主义的无原则的投降。^③

社会革命党举措的矛盾，反映了斯托雷平改革对社会革命党思想造成的深刻冲击。在代表会议上，代表们已经指出了切尔诺夫代表中央所做的回应是混乱的。来自彼得堡的代表格拉切夫质疑切尔诺夫的盲目乐观，主

①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07.6 - 1917.2, Т.2, с. 90.

②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07.6 - 1917.2, Т.2, с. 95.

③ 本段及以下数段，分见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07.6 - 1917.2, Т.2, с. 298, 152, 157, 163, 164, 165, 167, 192, 193 - 194, 181.

张保持健康的悲观主义，间接地指出了斯托雷平已经吸引了大批的群众，大有平息俄国动荡社会的趋势，并用这次参加会议的人数只有60人，三分之一是选举的实例加以说明。格里高洛维奇（即日特洛夫斯基 X. O. Житловский，犹太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人）坚决反对切尔诺夫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即工人、农民和民主的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贵族和官僚的对立来看待俄国的革命，指出，俄国的阶级斗争有着很深的宗教基础，正是统治阶级怀着“把白神品东正教沙皇的世界统治看做自己的任务”捍卫沙皇专制制度，俄国的革命不从这个角度加以认识就会显得非常肤浅。

来自国外的列文（即尤杰列夫斯基）对于切尔诺夫的观点从思想的高度进行了批判。他认为，社会发展的进程并不如自然进程一样缓慢发展，而是可以预防的过程。第三届杜马以来的革命是政府的全线胜利，革命的失败和消亡。他以民意党的失败作比喻，认为民意党的失败是党内的道德败坏，现在则是道德败坏的纵深发展。他从理论上探究社会革命党失败的原因，在于生活不能证明党的期望，党不能证明生活的期望。党之所以在革命期间出现了策略上的动摇，究其根本在于理论上的动摇。切尔诺夫以文雅的“融合”来说明自己的理论，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民粹主义、半巴枯宁主义和半无政府主义没有达到有机联系的混乱的结合”。这样，“当第一、第二届杜马解散以后，期待人民起义，甚至想从上面发布命令，但对其他的斗争方法不够重视，尽管党不能不知道它必须与死板的和狡诈的敌人打交道。中央在选择方法的时候存在着动摇和不稳定：一会儿命令大规模的战斗行动，一会儿又追求一种现实的政策，一会儿又承认在再次出现类似情况下执行起来有困难。有利的时刻错过了，极端严峻的时刻来临了，出现了软弱无力的征兆，但党和中央却表现出新的动摇和惊慌失措。”列文建议“重新审查党的世界观，从根本上重新审查对革命性质的理解以及由此而来的任务”，真诚地承认并面对严重的危机。

列文的指责是根本性的。虽然列文在处理的方法上有违民主的风格，对于群众性非理性有着针扎一样的刺痛，但是，他指出了问题的症结。切尔诺夫在对列文的指责给出回应的时候说，列文的话没有任何深刻的解释，只是把革命比作一艘沉船，希望船上的人一起灵活应对。切尔诺夫认为这不是一种创意，而是一种少数派，是依靠少数派对群众的一种强制。他以十月党、立宪民主党等都有自由主义的意识为由指出俄国并不缺乏立宪的东西，缺乏的只是统治者对人民的宽容。切尔诺夫从爱的角度为自己的策

略摇摆做辩护，认为这是根据情况的变化对群众革命运动的方式所做的调整。他信心十足地认为，俄国的革命意识已经深入人心，统治者的得胜只是由于他们手中拥有军队，如果一旦扩大战果，俄国就将取得革命的胜利。

鉴于切尔诺夫的威信，会议以多数票通过切尔诺夫的决议。但是，不能由于列文没有提出建设性的建议就否定深化社会革命党世界观的必要性。切尔诺夫承认自己的观点是经验批判主义，他害怕成为一个创造者，因为这样将让无意识的成分局限有意识的历史作用，他宁愿把这种作为让位于一个美好的理想，只要社会主义制度到来，一切问题便都迎刃而解。切尔诺夫的社会主义观念显然是基于俄国传统的农民意识，并一再指责列文不相信农民革命。切尔诺夫提出的这种以官僚、贵族和资产阶级与民主知识分子、工人和农民的对立为内容的“人民劳动革命”缺乏对俄国革命性质的判断，他以一个过渡来代替对俄国革命的定位，使得俄国的革命失去了前进的方向。

列文与切尔诺夫的分歧就在于俄国革命的真问题。俄国的问题不仅仅是解决沙皇政府、地主和资本家对人民的剥削问题，更主要的是俄国如何迈过资本主义国家以及俄国的资产阶级给俄国带来的剥削问题。如果俄国能够从根本上解决俄国的发展方向问题，那么是否剥削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而解决这个问题不是与资本家妥协还是杀死不肯放弃剥削的俄国统治者的问题，而是解决俄国如何才能主动接受资本主义带来的剥削问题。俄国受到胁迫不仅仅是俄国群众的问题，俄国的精英也同样遭遇了胁迫。俄国的问题是生活转向的问题，因此，从这个意义上不是社会政治问题，也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文化的问题。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列文的观点才有了意义。

遗憾的是，俄国由于当时太需要解决日常生活问题，深层文化乃至宗教问题遭到了众人的忽略，这也是俄国革命的悲剧所在。切尔诺夫代表了一般人的看法，继续保持恐怖战略，造成社会革命党的精神危机。阿泽夫间谍案的破获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

三 阿泽夫案件带来的冲击

尤杰列夫斯基与切尔诺夫的争论是有关革命道义的争论。尤杰列夫斯基提出的有关文化的话题已经触及了俄国人民的精神层面，试图为俄国革命者的恐怖运动找寻出一个道理。虽然尤杰列夫斯基是为恐怖辩护，并把恐怖当做俄国政治解放的唯一手段，大有回归民意党的架势，但是尤杰列夫斯基从

传统的道义出发，指出“俄国的命运掌握在俄国革命者的手中……只有英雄的行动，只有战士为了不朽的理想而在死前创造的不朽的杰作才能提升群众的先锋队，鼓舞他们投入战斗”，^①谱写了一曲英雄主义的挽歌。

正当尤杰列夫斯基为革命行动正名的时候，从事恐怖活动的社会革命党战斗组织第二代领导人、社会革命党的创始人之一阿泽夫被俄国警察局长（1902~1905）A. A. 洛普欣揭发，被证明是俄国警察局派往社会革命党的奸细。奸细案的出现给党内关于恐怖主义的革命手段的争论火上浇油。切尔诺夫虽然为恐怖政策辩护，认为恐怖运动是必要的自卫手段，是人民对实施警察统治的政府的道德审判，最重要的是它是能败坏政府的组织，激发人民的革命热情的工具。但切尔诺夫从来不认为恐怖是达到目的的唯一途径，更不认为如果放弃恐怖就不再是社会革命党。^②恐怖活动是一种被迫行为，如同革命者从事宣传、组织工作一样，是一种分工。当时代变迁的时候，恐怖活动就要暂时停止。既然恐怖活动不是必然，也不是一种抢劫、犯罪的刑事行为，那么，阿泽夫的奸细行为并不能证明社会革命党如何败坏，只不过反映出沙皇政府的荒唐，这就是存在于当时俄国社会的深处的东西。

阿泽夫的奸细行为，在把人看做经济动物的人的眼里是正常行为，但在把人看做有尊严的人看来，是一种道德的败坏。对于从道义角度提出问题的社会革命党来说，阿泽夫为政府和社会革命党两头做事是一种不能容忍的行为，它冲击了社会革命党的道德底线。如果社会革命党能够容忍这样自私自利的小人，说明它也是追求私利的政党。

为了使社会革命党摆脱阿泽夫事件给自身带来的道德困境，必须弄清楚阿泽夫究竟是不是追逐私利的势利小人，参加社会革命党是不是“犹大之吻”。阿泽夫在参加社会革命党之前就参加了警察局的工作，负责搜集国外俄国大学生反政府的情报。他通过给警察局提供情报工作获得了稳定的收入。他与激进分子打交道不是基于信仰，而是基于个人利益。因此，他没有感受到道德怀疑的痛苦。^③他在国外求学直到结束，一直过着非常节俭的生活，从来不浪费钱财。在担任战斗组织第二代领导人之后，他组织暗

① О. В. Будницкий, Терроризм в Российском 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м движении: идеология, этика, психология (вторая половина XIX-начало XX в.), с. 186.

②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07.6 - 1917.2, Т. 2, с. 330.

③ Анна Гейфман, В сетях террора: дело азефа и рус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с. 228, 50.

杀了内务部长普列韦和谢尔盖·亚历山大洛维奇亲王，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同情，并有大量的钱财进账。阿泽夫不仅养活了自己，而且供养中央委员会，引起了中央对战斗组织挥霍钱财的不满。^① 对比战斗组织的三代领导人格尔舒尼、阿泽夫和萨温科夫，阿泽夫领导战斗组织时期是最有钱的。

阿泽夫无论为沙皇警察局效命还是为社会革命党服务都获得了双方的好评。第一个写作俄国革命运动的警察局官员斯皮里多诺维奇说：“1903～1909年的阿泽夫是最有信仰的革命恐怖主义者。他为了自己的私人目的为俄国政府服务，把那些他认为有可能、有需要或者有益处出卖的革命匪徒和革命事业提供给政府。”格尔舒尼认为，如果党内有人对阿泽夫不信任，那是不可思议的。M. 戈茨在谈到阿泽夫时眼含热泪地说：“你相信阿泽夫就如同相信我。”^②

阿泽夫为政府和社会革命党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对于社会革命党，他设计了一整套恐怖方法，间接地影响了群众抗议专制制度行动的产生和推广，把最积极的革命分子集中到战斗组织中，使得那些忠于思想的幻想家准备无条件地为了革命的祭坛献出生命。^③ 对于沙皇政府来说，他成功地瓦解了战斗组织，特别是1905年10月17日宣言发布以后，他是率先提出结束恐怖的社会革命党领导人。从1904年7月开始，阿泽夫就未踏上俄国的土地。^④ 从这个意义上讲，切尔诺夫称他为带着炸弹的立宪民主党，^⑤ 即在思想上倾向于自由主义。

其实，阿泽夫既不站在政府一边，也不站在社会革命党一边，他只站在自己的一边，利用沙皇和社会提供的机会获得生存的权利。他的奸细的身份就是沙皇政府和社会革命党之间的信息通报人。^⑥ 受到伤害的不是阿泽夫本人，而是俄国的政府和社会。对于俄国政府来说，揭露阿泽夫，无非是想说社会革命党是为了谋取私利而破坏社会的稳定，没有给人民和国家

① Р. А. Городнийкий, Боев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партии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в 1901 – 1911 гг., с. 124.

② Р. А. Городнийкий, Боев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партии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в 1901 – 1911 гг., с. 166, 170.

③ Р. А. Городнийкий, Боев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партии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в 1901 – 1911 гг., с. 129.

④ Анна Гейфман, В сетях террора: дело азефа и рус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с. 50.

⑤ Р. А. Городнийкий, Боев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партии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в 1901 – 1911 гг., с. 171.

⑥ Анна Гейфман, В сетях террора: дело азефа и рус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с. 224.

谋福祉；对于社会革命党来说，继续恐怖无非是把希望寄托于社会的觉醒，起来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结果，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革命党都大失所望：政府通过揭露社会革命党领导人的奸细行为消弭了革命的浪潮，但是也破坏了社会对政府的信任；社会革命党通过恐怖活动唤醒了俄国沉睡的社会，但是也激发了社会的破坏欲望。这样，俄国要想取得社会转型的胜利，社会革命党要理解政府激进措施背后的动机，政府也要给革命者留有生存的空间，这就需要二者都能接受的新的思维方式。

社会革命党领导人在清理党的恐怖思想、更新党的思维方式方面分成了左右两派。以尤杰列夫斯基和阿加福诺夫为代表的有创意的少数派继续为恐怖的道义正名。他说：“党不仅在法律上重组，在道义上也要重组。要有更多的独立性，更多的首创精神，更多的创造性地干预党的计划工作。这样，有创意的少数派发展积极行动的理论 and 实践，重新审查理论世界观，重新教育并重组政党，刻不容缓地完成这些任务就是我们对革命问题的实际回答。”另一派则是以阿夫克先基耶夫、В. И. 列别杰夫、斯列托夫和丰达明斯基为代表，由于他们以杂志《创举》（почина）为阵地而被称为创举派。创举派把革命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党的封闭性，脱离人民，人民没有得到很好的组织，也没有充分的政治意识和意志追求自己的历史使命。阿夫克先基耶夫建议1912年党面临的任務就是革命的解放。他依据贵族组建全俄组织、大资产阶级组织全国规模的辛迪加的模式要求广泛而有计划地把劳动人民组织起来。阿氏的判定不是根据党的纲领，而是根据革命之后出现的新形势做出的。阿氏认为，经过革命之后，文化社会需求普遍增长，城乡劳动人民有很高的政治和阶级意识，劳动的社会性、复杂性和政治生活本身的淡化日益发展，出现了职业联合会、合作社、启蒙协会。阿氏建议，党应该积极参与这些群众组织的活动，宣传党的纲领。阿夫克先基耶夫对群众组织的认可并积极参与说明，他不仅认可六三政变的成果，同时也承认了实实在在存在的杜马舞台。他认为，虽然“国家杜马没有把能够有机发展、赋予它人民代表性质的因素包括进来，相反，它成为反动派的工具，执政联盟统治国家的新形式。由于现在的代表制没有进一步发展，俄国的法治将随着专制政权的消灭而消亡……社会主义政党也不可能在杜马进行任何组织工作。虽然如此，利用国家杜马作为全俄讲坛是实在而重要的事实”。^①

^①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07.6 - 1917.2, т.2, с. 372, 424, 425, 426.

社会革命党内出现的两派借用列宁的说法叫做“召回派”和“取消派”。顾名思义，召回派就是把自己的杜马成员召回来，重新走向封闭；取消派就是放弃自己的地下斗争，与时俱进，积极参与日益兴起的社会活动和杜马活动。列宁说，无论是召回派还是取消派都是取消派，^①即取消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否定党地下斗争的重要性。作为召回派的有创意的少数派回应说，党的观点中拥有太多的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即把自发过程和自发的阶级斗争放在第一位，并以此压制个人的创造性和有创意的少数派的作用。有创意的少数派主张重新审查党的纲领和世界观，放弃全民武装起义的口号，开展通过包括暗杀沙皇的恐怖办法改变社会制度，按照非集中化的原则组建政党。^②有创意的少数派坚持按照社会主义的标准改造社会，并把民主看做社会主义的灵魂。然而，1905 ~ 1907 年的革命群众运动的失败使他们转向了思想的探索，手段的激进性和目标的民主化旨在寻找适合俄国的办法。他们知道，只有在斗争中和工作中才能弄清他们可以确立的界限。^③这样一来，召回派把争取政治民主，包括资产阶级的民主看做机会，从此走上了争取立宪会议的道路。立宪会议只是进行道路探索的形式，与社会发展方向无关。这对迫切需要确定社会发展方向的社会革命党来说，无疑是放弃了社会主义的目标，走向了改良主义道路。而实际上，有创意的少数派通过实际操作的办法探索俄国发展道路，也遭到了社会革命党正统派的质疑并被开除出党。

同样，取消派是通过利用政府提供的各种合法机会进行俄国发展道路的探索，也遭到了最高纲领派和社会革命党正统派的质疑。例如，拉基特尼科夫在《俄国思想流派》这篇文章中说：“《创举》杂志小组没有弄清楚政党和群众组织之间的关系……按照欧洲社会主义政党的样子，我们看到了这些政党和劳动者的各种经济组织经常保持联系，并给自己规定明确的任務，每一个政党都要独立生存和发展。谈政党与群众经济组织并存或者完全把党与这些组织融合将导致党的瓦解并取消其称号。”阿夫克先基耶夫回应说：“所有政党的活动方式可以用共同的模式来表述，即它们或者概括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260页。

② К. Н. Морозов,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в 1907 - 1914 гг. -М., РОССПЭН, 1998. Глава IV, Внутрипартийные группировки и идейно-тактические поиски.

③ Открытое письмо в редакцию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Мысли”, 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Мысль, 1909, №6. с. 4. К. Н. Морозов,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в 1907 - 1914 гг. -М., РОССПЭН, 1998. Глава IV, Внутрипартийные группировки и идейно-тактические поиски.

为抽象地宣传革命和社会主义思想，或者概括为尝试用自己的力量同现有的制度作斗争，通过激烈的打击唤醒俄国民众，引发动荡。”^①正是这一点使得党脱离群众，失去了建设性的作用。阿氏的回应显然是针对恐怖活动转变成为刑事犯罪这样的事实说的，其目的是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革命党恐怖活动的失道问题，摆脱危机。

取消派和召回派的做法是当时俄国所有政党对代表制度的回应，不同的是他们的行动方式。从探索俄国的发展方向来讲，还没有一个政党找到解决俄国政府危机的道路。即使路标派知识分子指责社会革命党的行为也不过是认为他们过分地重视伦理道德，造成对真、美和上帝理想的忽视。^②由于俄国政府长期忽视对民生的关注，人们已经失去了继续为国家奉献的动力。如果政府以及各政党不从价值观念上思考俄国人民的现实状况，即政府的长期道德缺失，那么就不可能真正认识俄国民粹派政党以及俄国人民如此激进的原因。所以，奸细事件虽然打击了革命政党的激进行为，并造成对革命政党的道德拷问，但是，若想解决俄国革命者的道德危机，必须对他们的激进行为做宗教探索，因为没有一种人们的感情和理性不能忍受的矛盾，是上帝的理性和爱不能解决的。^③也只有通过这样的道路才能使不安定的心灵得以安定。遗憾的是，俄国的宗教探寻并不能为俄国的社会所接受，敏感的知识分子在政府的打压下远走海外。

四 战斗策略的终结

受奸细案的影响，社会革命党内部出现的思想分裂和组织衰落使得社会革命党不得不转向实际。这个实际就是上面讨论的俄国整个社会的分化。经过讨论，社会革命党在第五次党务会议上通过了清除党内奸细、加强党的纪律、加强中央领导的决议。以切尔诺夫为代表的二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辞职，从事文学工作，对党的策略和革命性质进行了充分的讨论。

1905~1907年革命标志着社会革命党战斗策略的失败。从党内分裂的左派和右派来看，社会革命党已经进入了走向民主化的过程。民主化不在

^①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07.6 - 1917.2, Т.2, с. 447, 430.

^② С. 弗兰克：《虚无主义的伦理学》，参见《路标集》，第161页。

^③ С. А. Котляровский, Оздоровление, См., Из глубины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о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С. 9. <http://www.vehi.net/deprofundis/kotlyarovsfky.html> 2009 - 6 - 8.

于俄国已经确定了未来的发展方向，但是说明俄国通过革命已经进入到前所未有的觉醒期。经过 1908 ~ 1911 年间谍案后的沉寂期，从 1912 年开始，社会革命党利用第四届杜马选举和勒拿河金矿罢工斗争的机会，积极参与社会斗争。^① 社会革命党真正发展到融入社会的历史时期。

社会革命党从热衷于抽象的理论到热衷于实际行动，从破坏政府的形象以便唤醒人民到利用政府改革创造的合法斗争的机会以宣传自己的思想，逐渐完成了策略的转变，即从战斗策略向联合策略的转变。

战斗策略的根本目的是涣散政府，督促政府进行符合人民愿望的改革。尽管社会革命党一直想通过恐怖斗争发动群众，建立人民主权的民主共和国，但是，俄国人民并没有循着共和国的道路前进。从群众运动中出现的农业恐怖和工厂恐怖来看，他们并不热衷于共和国的建设，而是特别关心自己的经济利益和社会需求。社会革命党从此不再把眼光盯住劳动人民，而是转向了中间阶层，特别是有产者阶层；他们也不再仅仅从抽象的道德原则出发思考农民的土地问题和工人的工资问题，而是打开自己的视野，切实关心人民的实际。用尤杰列夫斯基的话说，就是人们能力和意识所及的社会主义。用切尔诺夫的话说，就是如何把欧洲的社会主义理想和俄国的独特条件结合起来。^②

欧洲的社会主义理想和俄国独特的条件的结合意味着什么？俄国当时占据主流的观点是俄国无论从经济条件还是文化条件来说都不能发动社会主义革命，正是这一点使普列汉诺夫不指望俄国“有成功的革命发动”，而是希望通过杜马让具有政治觉悟的无产阶级教育农民群众，并且把这理解为一个人民逐渐成熟的过程。^③ 切尔诺夫并没有放弃民粹派的农民社会主义理想，同时又对人民在革命中的表现大失所望，所以，切尔诺夫一直试图寻找既不同于民意党也不同于自由派的第三条道路。但是，切尔诺夫的第三条道路一直在准备之中，对于任何事情不能做出判断。切尔诺夫在国外

① 据统计，工人和农民广泛参与了俄国社会政治生活，被称为 1912 年的高涨期。如 1911 年 5 月 1 日托尔斯泰逝世纪念日举行罢工、1912 年 1 月 9 日和 4 月 4 日举行纪念 1905 年革命和勒拿河矿山枪击案罢工、1913 年 1 月 9 日和 4 月 4 日举行同样的罢工等。农民积极参与合作社的建设，其规模前所未有的，总数超过 1000 万个。См.,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07.6 - 1917.2, Т. 2, с. 463。

② К. Н. Морозов,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в 1907 - 1914 гг., Глава IV. Внутрипартийные группировки и идейно-тактические поиски.

③ 《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 (1903 ~ 1908)》下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第 392、391 页。

创办的《遗嘱》杂志上连续刊载诋毁人民革命的萨温科夫的文章《一无所有》和《羸弱的马》，其主题就是宣讲俄国革命打着某种理想的旗号，实际上干的是没有人道的杀人勾当，如同弗兰克所说的“思想意义上的暴行”，^①造成反秩序和反文化的行为。切尔诺夫之所以允许刊载这样的文章，其目的就是探索革命所带来的非建设性。

为了把二者有机地协调起来，切尔诺夫闯入了宗教领域。切尔诺夫关于宗教信仰的论述早在坦波夫建立农民兄弟会的时候就着手。他试图在传统、东正教、社会主义之间建立联系。切尔诺夫把上帝看做“世界上发挥作用的力量，是一切变化的基础和原因。灵魂与肉体是不可分的，上帝与物质也不可分。在人这里，上帝就是精神、就是良心、就是追求完善和发展的愿望。”^② 切尔诺夫把宗教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既表现出对农民信仰的尊重，又通过社会主义的词句解放他们。知识分子为农民牺牲生命就是一种宗教行为。但是，由于东正教在官方那里长期以来被当做世俗政权服务的工具，东正教所揭示的神学真理被长期世俗化，具有了功利主义的特征。当恐怖运动作为一种道义彰显的手段时，它具有了宗教特征。然而，在功利主义的理解下，恐怖运动变成了抢劫运动，他的功用就变成了对俄国文化和法律的践踏。

社会革命党为了改变这样的局面必须挖掘出恐怖的道义价值。在阿泽夫事件把俄国的抢劫运动的非道义性提升到顶点的时候，^③ 社会革命党内部试图建立宗教分会，提出一系列问题，如解决社会公正是否一定要杀人，通过和平的方式是否能够实现同样的目标，社会公正和实现社会公正的手段究竟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俄国流传下来的是仇恨而不是慈爱，等等。参与这些实质问题讨论的是 Д. С. 梅列日科夫斯基、З. Н. 吉皮乌斯和萨温科夫。梅列日科夫斯基说，萨温科夫的小说提出了革命者杀人也是不道德的

① С. 弗兰克：《虚无主义的伦理学》，参见《路标集》，第160页。

② К. Н. Морозов,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в 1907 - 1914 гг., Глава IV, Внутрипартийные группировки и идейно-тактические поиски.

③ 俄国社会革命党恐怖运动的衰落起自1904年的农业恐怖，最著名的是1906年8月12日最高纲领派对莫斯科相互信贷协会的抢劫，总额为87.5万卢布，抢劫运动引发了农业恐怖和工厂恐怖的浪潮，影响了社会革命党的道义形象。斯托雷平被刺以后，政府通过奸细行为揭露社会革命党的刑事犯罪。随着政府的稳定，特别是阿泽夫奸细案的败露，社会革命党威信降低到最低点。尽管恐怖运动仍然存在，但是，影响微乎其微：1908年3起，1909年2起，1910年1起，1911年2起。См., О. В. Будницкий, Терроризм в Российском 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м движении: идеология, этика, психология (вторая половина XIX-начало XX в.), с. 178.

观点，涉及了宗教问题，但没有宗教意识。^① 换句话说，从功利主义的角度讲，地主资产阶级和农民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不可调和，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你死我活的剥削关系；但是，从宗教的角度来讲，地主资产阶级和农民无产阶级的关系则可以通过上帝之爱化解。社会革命党从人道角度要求政府改变地主和农民、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并以恐怖的方式献祭，遭遇的不仅是政府的镇压，更主要的是遭到了群众的背离。

萨温科夫贬低社会革命党威信的道德追问，一下子把社会革命党引向思考资本主义剥削背后的道义问题。由于否定阶级斗争的必然性，他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走向民主的道路并把它看做社会革命党的灵魂，由此引出了求同存异的文化寻根问题。连续的道德追问使得社会革命党逐渐放弃了恐怖主义政策，走上了与资产阶级政府的联合道路。尽管切尔诺夫还不能从理论上作出解释，特别是在阶级斗争几乎是必须经过的炼狱的情况下，切尔诺夫的调和道路变得异常艰难。从这个意义上讲，第一次世界大战成为俄国实现社会和解的障碍，社会革命党成为俄国走向新生的牺牲品。社会革命党试图用宗法伦理道德解决宗教道德伦理问题，忽视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基督教之爱不仅让人们得到恩典，而且让人们在激烈的竞争中学会顺从和创造。俄国所面临的问题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提出来的，西方理性的发展严重制约了俄国理性的进步，造成俄国非理性的发展。非理性涉及感情问题，不经过超越人道之爱的大爱无法修复俄国亏欠的人伦之爱。社会革命党对恐怖道义的不断追问标志着对政治激进主义的宗教升华。遗憾的是社会革命党中派切尔诺夫的折中思想延误了民粹思想的深入。

俄国能否走向劳资和解、政府与社会和解的道路，即德国出现的修正主义的道路呢？无论是探索民粹派社会主义的尤杰列夫斯基，还是利用六三政变后政府提供的合法发展机会的创举派小组都不可能无条件地认可斯托雷平的矛盾行为，即一方面加强沙皇专制制度，另一方面又进行自由主义的经济和社会改革。因为横亘在他们中间的是不同的思维方式。宗法传统社会的思维方式是利用人们对神的恐惧，依靠律法实现社会的发展；而资本主义社会则是利用人们对神的热爱而完成在精神上的解放，从而促进个人在社会中的发展。这就是恩格斯讲的他“反对宗教不是为了消灭宗教

^① К. Н. Морозов,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в 1907 - 1914 гг., Глава IV, Внутривнутрипартийные группировки и идейно-тактические поиски.

而是为了革新宗教，为了创造出一种新的‘高尚的’宗教”^①的原因。俄国正处在这种思维方式的转型之中，即从“恐惧创造神”这种宗教认识下认识资本主义的剥削转向通过阶级斗争消除这种恐惧的社会根源，从而完成劳动阶级解放的目的。德国已经完成了这种宗教观念的革命，在民族形式下的利益斗争中削弱了阶级斗争的威力，实现了劳资合作。但在转型中的俄国就表现为阶级斗争形式下的宗教观念之争。如果把德国的劳资合作拿到俄国来，就变成了机会主义。因此，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民粹主义在俄国都会变成乌托邦，原因就是没有完成价值观的革命。列宁所主张的要“经过几代人有时甚至经过几个世纪得到巩固的独特道路”^②就是西欧走过的社会转型道路，就是俄国激烈的阶级斗争。

切尔诺夫意识到了俄国与西方的不同，希望借助土地社会化实现传统向现代社会的转向。但是，由于恐怖运动所带来的败坏，切尔诺夫不得不自揭其短，利用《遗嘱》杂志刊登萨温科夫揭露恐怖失道的问题，虽然有损于党的威信，但绝对是认识真理的必经的炼狱。尽管有拉基特尼科夫夫妇的反复劝说，要求切尔诺夫阻止对党所做的诋毁行动，切尔诺夫仍然不予回应。切尔诺夫显然无法从理论上回答革命道义问题，他只有以沉默经历着这个心灵的炼狱。列宁也没有从宗教角度认识这一问题，但他采用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结合俄国的实际，走上了让实践说明理论的道路。列宁坚持了阶级斗争的社会理论，而切尔诺夫像阿夫克先基耶夫一样，虽然坚持民粹派独特道路的主张，但实践的妥协政策丧失了自己对群众的号召力。联合道路虽然一时满足了俄国社会各个阶层的要求，却丧失了对资本主义道义的探索。民粹派社会主义的转型走向了失败。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247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第330页。

第五章

社会革命党的联合策略

第一节 一战与联合策略

一 战争与革命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俄国 1917 年革命的关系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话题。否定革命的一方认为：“如果没有战争和战争给俄国各民族带来的灾难和困难，没有引起帝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变化，就不可能引起二月革命乃至十月革命。”为革命辩护的一方则说：“从历史的角度说，革命不可避免，因此，它是历史的必然和道德的确凿。在革命支持者的眼里，即便没有一战引发的那些问题，1917 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也是不可避免的。”^①二者的可贵之处在于都强调了战争和革命对历史的巨大推动作用，不足之处在于人为地割裂了战争与革命的有机联系。

对于俄国来说，战争是被迫的。一战中英国的首相劳合·乔治说：“它（俄国）最渴望的就是和平。因此，无论如何它都不是进攻方。”^②但是，出于传统，俄国在遭遇外来威胁的情况下无论如何不能后退。^③这样一来，俄国便陷入了被动应付的状态。

① Леопольд Хаймсон, Развити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и социального кризиса в России в период от кануна перв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до феврал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Россия и первая 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 Спб., Дмитрий Буланин, 1999, с. 17.

② В. В. Носков, 《Война, в которую мы верим》: начало перв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в посприятии духовной элиты России, Россия и первая 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 с. 327.

③ С. С. Ольденбург, Царствование императора николая II, с. 451.

战争很快使得俄国团结起来，同仇敌忾，这是自1905年革命以来处于政府与社会对立中的俄国从来没有过的。据史料记载，从1914年7月11~19日，俄国上下同心，政府宣布全国动员的立场得到普遍的赞扬。7月26日，两院召开非常例会，立法机关和政府战争问题上达成一致。国家杜马一致通过了所有与战争有关的贷款和法律草案。^①与此同时，俄国知识界也对战争的意义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寻找战争的道德含义。经过讨论，知识分子得出结论，战争是德国挑起的。B. B. 罗赞诺夫直接说：“这不是简单的战争，不是政治战争，而是两个世界之间的斗争。”^② C. H. 布尔加科夫把西方人所进行的战争看做是市民文明基础上的征战。而B. Г. 塔尔多夫则把俄国与德国的战争看做人类精神反对物质文化魔鬼的斗争。

知识界关于战争道义的讨论解决了俄国战争的动力问题。然而，悲剧在于：德国已经完成了精神向物质的革命，即德国不仅从宗教上接受了资本主义，而且还在世俗领域大力发展了资本主义，实现了第二次科技革命并为战争创造了强大的物质基础；俄国还停留在精神转型阶段，从物质层面上不接受市民社会，这样，俄国与德国的战争就变成了精神与物质的战争。如果说英国、法国与德国的战争是同一文明基础上的物质战争，那么对于正处在精神转型的俄国来说，则变成了反对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精神战争。虽然精神可嘉，但对于处在东西方交界处的俄国来说就是一场灾难。一方面，俄国政府要为战争的道义与社会不断地辩论；另一方面，还要用怀疑疑问的士兵对抗德国。战争的胜利会成为证实政府争战道义的依据，而失败则会变成讨伐政府丧失道义的借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第一次世界大战成为俄国最大的一场革命。它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国际革命，一个是国内革命。

战争是一场国际革命。国际革命的含义是从道义上说的。列宁说：“1914~1918年的战争，从双方来说，都是帝国主义的（即侵略的、掠夺的、强盗的）战争，都是为了瓜分世界，为了瓜分和重新瓜分殖民地、金融资本的‘势力范围’等等而进行的战争。”^③列宁分析战争背后的社会性质是为了厘清战争是否具有正义性。显然，列宁是从阶级剥削、经济压迫

① С. С. Ольденбург, Царствование императора николая II, с. 457 - 458.

② В. В. Розанов, Война 1914 года и русское возрождение, Пг., 1915, с. 31 - 32, Россия и первая 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 с. 328.

③ 《列宁选集》第2卷，第577页。

的角度认为帝国主义失去了道义，因而否定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道义问题的探讨。

然而，列宁又从辩证的观点把帝国主义的战争看成社会主义的前夜。列宁说：“如果资本主义大企业成了垄断组织，那就是说，它面向全体人民。如果它成了国家垄断组织，那就是说，由国家（在革命民主制的条件下，国家就是居民的，首先是工人和农民的武装组织）来指导整个企业。但是为谁的利益服务呢？或者是为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服务，那就不是革命民主国家，而是反动官僚国家，是帝国主义共和国？或者是为革命民主派的利益服务，那就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①

列宁的话清楚地表明：“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②帝国主义战争就是对立面斗争的一种极端化的表现。从斗争的双方来讲，资本家、地主、官僚与工人、农民和广大的人民之间的斗争，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斗争，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斗争，工业国与农业国之间的斗争就变成了一种动态的平衡，这是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共同规律。

列宁把战争做了社会化的解读，使得国际战争变成了国内战争，把国际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变成了国内的政治斗争和国内的经济斗争。

既然战争就是斗争，战争也就变成了革命。如果从辩证的观点出发，资本主义就意味着发展，而发展就意味着革命的话，战争、斗争就变成了常态，于是就有了国际战争和阶级斗争。于是，战争和阶级斗争不可避免。

战争或者阶级斗争是斗争哲学在社会领域里的反映，如果把它还原为抽象的理论来看，斗争是一种认识论，也就是人要革命性地认识社会，扮演生活中的角色，促进整体的进步。

如果从认识论出发看待第一次世界大战，看待俄国国内的阶级斗争就会明白，地主与农民、资本家与工人、官僚与人民、城市与乡村、宗主国与殖民地、工业国与农业国是人在社会中扮演的一个角色，是人的共同体在社会中扮演的一个角色。在发展中，矛盾和和谐是社会存在的两种不同时段下的形态，矛盾与统一相互协调而不破坏发展就是革命发展观的认识，也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共同追求。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理解革命，就是普朗克所讲的科学真理。他说：“新的科学真理不是由于说服它的反对派，使他们接受而获得胜利，而是由

^①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65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第557页。

于这些反对派最终死去，而熟悉它的新一代人成长起来使科学真理获得胜利。”^① 这就是价值观念的革命或者改宗，即观念和信仰上的改变。这种观念或者信仰就是遍布于宇宙人间中的道，是客观存在的。人在认识上和行动中贯彻这样的道，就是革命。

因此，从道或者规律这个意义上讲，战争与革命是一回事，不同的只是在军事和社会层面上表现形式的差别。

由于战争带来的是对财富和人生命的毁坏，所以，从人的生命角度来说，战争是令人厌恶的。但是，若从宇宙存在的道来讲，战争成为人认识宇宙规律的最高手段。列宁从战争讲到革命，深刻地揭示了主题。帝国主义就是战争，这句话的含义在于，当资本主义国家达到垄断这种程度的时候就走向把人类毁灭的战争，而作为经受了压榨和战争炼狱的无产者就是以自己的鲜血让已经被金钱和地位蒙蔽双眼的资本家重新回到思想解放的轨道上来，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

二 一战对社会革命学说的初步检验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社会革命党正处在分裂状态。据右派社会革命党鲁德涅夫回忆，俄国向奥地利宣战迫使他到瑞士的巴塞尔，继续自己的医学学业。鲁德涅夫的一个目标就是学成以后回到俄国，在地方自治局当一名医护工作者。他对俄国参与战争的头一个反应就是放弃自己的政治见解，投身于保卫祖国的工作之中。他们家有五个孩子，为了祖国奉献了三个。

回国参战是一个拥有正常民族感情人必然做出的正常反应。但是，作为一个政党，对于战争问题应该有一个鲜明的态度，那就是参战和革命应该如何统一起来。1914年8月22日，社会革命党在瑞士的日内瓦湖畔召开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20多人，主要是流亡国外的社会革命党代表，如E. E. 拉扎列夫、丰达明斯基、切尔诺夫、阿夫克先基耶夫和纳坦松，还有很少温和的阿尔古诺夫。会议讨论的核心问题就是一个对于专制制度采取不妥协态度的政党是否应同情和促进沙皇俄国在本次战争中取得胜利。切尔诺夫和纳坦松认为，虽然俄国有危险，但还是要站在推翻俄国上层的国际主义的立场，不允许任何形式的参战。这样，在社会革命党的内部就形

^① 科恩：《科学中的革命》，鲁旭东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第583页。

成了两派：一派是以切尔诺夫为代表的国际派；一派是以阿夫克先基耶夫为代表的护国派。阿尔古诺夫干脆把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革命区分开来，回避了战争与革命这样一个作为革命政党必须回答的重大理论问题。^①

丰达明斯基明显站在支持参战的立场上，主要的理由是通过参加协约国，可以迫使沙皇政府必须进行自由主义改革，并预言，沙皇政府在实行对波兰和犹太人的改革之后，不久就会废除非常法，实行普遍的政治大赦。阿夫克先基耶夫更加直接地说：“我们希望三国协约胜利，因此，作为协约国的成员，我们希望俄国取得胜利。”^②

对于阿夫克先基耶夫、丰达明斯基等合法的民粹派代表提出的挑战，作为理论家的切尔诺夫在1914年11月在巴黎创办的《思想》报上连续发表了《战争与资本主义》、《对战争的社会评价》、《战争与社会主义的重新审查》和《俄国社会主义者的立场》四篇文章，回答战争与革命的关系的问题。^③

切尔诺夫从经济角度出发，把帝国主义看做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阶段，或者叫做有组织的资本主义阶段。先进工业国家彼此之间日益发展的竞争使得它们扩大对落后国家的影响和殖民变得越来越激烈。后起的德国为了加强竞争，过去的教权、军权、政权结合在一起，使得现代的欧洲由于过去的遗产而变得更加复杂，出现了不能解决的民族问题，如波兰问题、亚美尼亚问题和南斯拉夫问题等。正是德国的竞争打破了欧洲的平衡，德国的不肯让步造成战争的出现。切尔诺夫的分析把战争的起因归结为资本主义的竞争，这是与鲁德涅夫、丰达明斯基和阿夫克先基耶夫不同的方面。然而，切尔诺夫根据自己的文化类型理论，倾向于民主资本主义模式，否定专制类型的资本主义模式。因为在切尔诺夫的意识里，民主意味着进步，专制意味着封建主义的残余。这样，切尔诺夫最初给出的结论是：为了反对沙文主义、民族主义和教权主义，推动民主化进程而积极参战。因为“奥、德的胜利将巩固两个反动的军国主义君主国对欧洲的统治，给沙皇制度以强大的支柱，给俄国劳动民主派的解放斗争带来极大的困难，而如果

①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07.6 - 1917.2, Т. 2, с. 473, 474.

②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07.6 - 1917.2, Т. 2, с. 475, 476.

③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07.6 - 1917.2, Т. 2, с. 485.

改变欧洲平衡体系，沙皇将失去国际主义的支柱，届时，因战争引发的社会活动的高涨将促进俄国民主政治组织的发展。”^①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把各国的工人也卷入战争之中，也就是出现了切尔诺夫所讲的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友敌关系”，即资本主义通过辩证的发展出现了自我否定的新形式的时候，切尔诺夫极力否定这样的形式，号召工人不要为这种形式所动，继续保持无产阶级身体和精神的健康。至此，切尔诺夫终于开始正面认识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类型，也开始正视德国修正主义对马克思的革命性做出的修正，即通过议会斗争的合法形式争取工人的权利。切尔诺夫号召“重新评价所有社会主义世界观的价值，毫不吝惜地抛弃那些决定战争危险面前社会主义实际破产的因素”；在实践上为没有放弃社会主义的那些人制定统一的行动路线，为每一个政党勾画出他们特殊的政治使命。^②

在俄国，切尔诺夫号召所有的社会主义者联合起来，号召劳动团与社会民主党的杜马党团放弃对政府军事拨款的投票，驳斥社会主义者尽可能广泛参与战争以赋予战争人民性质的口号。但与此同时，切尔诺夫又号召积极参加所有社会组织，医治战争给人民和他们经济生活的基础带来的伤害，如照顾伤员、帮助因战争而失去家园的人们、帮助参战的家庭、筹集食品、开展社会工作、参与合作社、自治管理、各种联合会和协会等。^③

切尔诺夫对战争的反应是矛盾的。在理论上他主张清算民族社会主义，但在实践上主张帮助受到战争伤害的人们。他在理论上把人民和政府对立起来，成为祖国的敌人；但在实践上通过参与后勤工作又实实在在地参与了战争。当人们问起他如何解决俄国社会主义的未来问题的时候，他走向了国际主义，也就是通过“邀请所有国际主义政党，制定适合自己条件的策略，远离裁军，尽可能快地、成功地让社会主义和民主派的力量参与进来，以促进和平、文化、民族自由和社会公正的胜利”。^④

①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07.6 - 1917.2, Т.2, с. 482, 489.

②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07.6 - 1917.2, Т.2, с. 478, 486.

③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07.6 - 1917.2, Т.2, с. 486.

④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07.6 - 1917.2, Т.2, с. 487.

表面上看来, 切尔诺夫批评了阿夫克先基耶夫等人利用合法的机会参与战争的投机主义行为, 但实际上回避了战争给俄国民粹派提出的如何看待资本主义、如何看待德国修正主义的问题。切尔诺夫以法国民主主义为样板, 视民主为偶像, 其目的是为俄国的村社民主张目。切尔诺夫为农民争取民主权利是无可指责的, 利用传统村社民主走向现代社会也无可厚非, 但是, 对资本主义给整个社会阶层带来的思想启蒙和社会进取于不顾, 是一种僵化的表现。切尔诺夫身为社会革命党的领袖和理论家不能正视资本主义给农民带来的冲击等于放弃了自己的旗帜, 使社会革命党在理论上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

1915年7月16~17日, 根据克伦斯基的倡议, 来自彼得格勒、莫斯科、基辅、萨马拉、萨拉托夫、沃洛格达、维亚特卡、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托姆斯克、叶卡捷琳堡、下诺夫哥罗德的社会革命党、人民社会党和劳动团的30名代表在彼得格勒举行了民粹派会议。会议坚决谴责第二国际部分代表抵制制止——欧战爆发的行为, 主张尽快恢复国家社会主义组织的团结, 同时在实现这些条件之前, 积极参加保卫国家不受外来强制的斗争。会议还对政府作出了谴责, 认为他们没有能力正确地组织国防, 保护军队不再遭受无谓的牺牲并防止国家急剧的经济和财政崩溃, 主张民主派集中建立对普选产生的人民代表负责的新的权力执行机关。^①

1915年10月5~9日, 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在日内瓦召开了共同会议, 制定应对战争的策略。参加会议的实际上是孟什维克代表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他们首先重申了1910年哥本哈根共产国际会议和1906年法国社会主义党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各个民族的自卫权和保护所有国家免遭武装进攻和强制服从的决议, 对于德国和奥地利给俄国造成的伤害进行了声讨。两党对战争给俄国造成的伤害进行了区分, 指出, 战争不仅给政府带来了伤害, 而且给人民带来了伤害。如果战争胜利了, 人民还有机会从事革命活动; 如果战争失败了, 俄国将成为德国的殖民地, 俄国人民将在德国和沙皇政府的压迫下饱受专制之苦。所以社会主义者为了经济和政治的解放, 必须积极参加国家防御。这样, 社会主义者就以保护民主利益为由参加了战争。

两党在《告俄国自觉的劳动人民书》中进一步谴责了德国社会主义政

^①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07.6 - 1917.2, т.2, с.491.

党支持本国政府进行战争的行为，但与此同时又以德国战胜俄国，不仅不利于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而且将丧失生存权为由参加了战争。《告人民书》花了大量的篇幅论证俄国劳动人民若不参加战争将给劳动人民带来物质和精神的压迫，立论的基础就是德国的专制政府一定比英国和法国的政府更坏。与此同时，它又不顾沙皇政府动员全国人民与德国抗战的事实，把赢得战争的胜利看做战胜沙皇专制制度的机会。因为在俄国民主派的眼里，“德国对英法等国家的胜利就是君主制原则对民主原则的胜利，就是旧的对新的胜利”。即使是用人民专制代替沙皇专制也在所不惜。^①

社会革命党和社会民主党的联合应付外敌以及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政策对于分裂的俄国民主派有着警醒的作用。一方面，民主派把祖国与沙皇俄国区分开来，号召人民为了保卫自己必须保卫祖国，明确了自己对祖国的一份责任；另一方面，民主派把争取战争的胜利与实现自己的权利联系起来，把革命的理想落到了实处。然而必须指出的是，两个社会主义政党以民主为指针，忘记了帝国主义战争是两种现代化模式的较量，而不是新与旧的较量。德国以专制政府和容克地主资本主义化，劳资团结代替劳资对立的方法实现社会转型，试图通过战争完成“彻底的精神更新”^②。两党以俄国战胜德国就是先进战胜反动的观点实际上重复了德国人关于“俄国人的胜利将是欧洲最反动势力的胜利”^③的空话，却忽视了德国通过劳资结合实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特点，无意中放弃了对俄国社会转型特色的探讨。从民主的角度来说，两党虽然表面上做了努力，但在不能驾驭民主的国度里，特别是需要凝聚国家力量的战争时期，两党为了争取民主而加大支持战争的力度无异于加剧社会彼此之间的不信任。这样的举动不仅分裂了国际社会主义的阵营，而且加剧了国内的混乱。

民粹派的精神就是反对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榨，反对其缺乏精神的庸俗化。右派社会革命党以战争失败将导致财富和生命的终结为由，放弃振兴国民精神的探索，标志着俄国民粹精神的死亡。如果说阿泽夫案件拷问了社会革命党的革命道义，那么在战争问题上的妥协政策则标志着社会革命党彻底放弃了道义的旗帜。

①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07.6 - 1917.2, Т.2, с. 498.

② 罗兰·斯特龙伯格：《西方现代思想史》，刘北成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第430页。

③ 罗兰·斯特龙伯格：《西方现代思想史》，第431页。

从切尔诺夫在战争爆发之后发表的几篇文章来看,他已经意识到重新审查社会主义思想的问题,但是他局限于自己的方法论,周旋于第二国际和国内民主派和自由派之间,试图以行动认识自己的理论,结果陷入了行动挑战理论的试探之中。切尔诺夫把接下来的策略称为联合,实际上是一种缺乏原则的妥协。

三 联合策略的出台

截至1915年8月,俄国在战争中死伤和被俘的人数已经超过400万。5~8月,俄国每个月死伤30万,俘虏20万。俄国军队不断后退,后退。沙皇不得不亲自执掌军事指挥大权,希望借助于上帝的力量和毫不动摇的信心取得最后的胜利。^①8月25日,立宪民主党和进步党与杜马的温和派党团左派十月党、地方自治局十月党等结成联盟,组成进步同盟。进步同盟的出现是对沙皇政府战争能力的怀疑,他们一方面组成许多的社会组织,如全俄地方自治局联合会、城市联合会以及军事工业委员会支援战争;另一方面准备组成人民信任的内阁领导战争。国内出现了互不信任的局面。

社会革命党彼得格勒的知识分子虽然在组织上与社会革命党的工人有些疏远,而且护国主义的情绪在党内占据上风,但是,通过一年的检验,社会革命党右派通过支持政府推动俄国民主化进程的策略逐渐式微。1915年9月5~8日,社会主义国际派在瑞士的齐美尔瓦尔德召开会议。会议是意大利和瑞士的社会主义者召集的,参加会议的有11个欧洲国家的38名代表。社会革命党纳坦松代表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国外代表团多数国际派、切尔诺夫代表社会革命党流亡国际生活报组织出席了会议。^②会议召开前,列宁组织了国际社会主义者小组——齐美尔瓦尔德左派抗衡齐美尔瓦尔德右派和中右派。列宁在会上提出了左派草案,揭露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坚决谴责社会民主党支持本国政府战争的沙文主义行为,号召交战国工人发动国内战争,夺取政权。会议通过妥协性的协议,唤起了国际社会主义者为争取和平而斗争的愿望。纳坦松在会议的决议上签了字,切尔诺夫以决议不体现社会革命党精神拒绝签字。

随着战争的持续进行,国内逐渐产生了厌倦战争、争取和平的心理。

^① С. С. Ольденбург, Царствование императора николая II, с. 485.

^②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07.6 - 1917.2, Т. 2, с. 562.

一个最主要的表现是国内开始流传保守派 И. Г. 谢格洛维托夫、Н. А. 马克拉科夫等人正在制造与德国单独签署条约的阴谋。^① 阴谋论可能有多种原因，但是这件事直接推动了齐美尔瓦尔德派在左派中逐渐扎根，社会革命党内部的左派逐渐抬头。

1916年4月24~30日，社会主义者国际派代表大会，即齐美尔瓦尔德第二次会议在瑞士的昆塔尔举行。参加会议的有10个国家的43名代表。社会革命党的纳坦松、切尔诺夫和卡姆科夫参加了会议。会议驳斥了列宁提出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让自己的帝国主义政府在战争中失败以及召开第三国际的观点，通过了宣言。第一，会议给战争定性，指出两年的战争是流血牺牲和反动派发疯的战争，隐藏在战争背后的不是别人，正是统治阶级。无论是君主政府，还是共和政府、秘密外交、强大的企业组织、资产阶级政党、资本主义的报刊、教会，都应为发生滋养他们和极力维护的社会秩序并为了他们的利益而进行的战争承担一切责任。第二，战争把千百万人送进了坟墓，给千百万家庭带来了灾难，千百万人变成了寡妇和孤儿，毁坏了无数的财物。而且战争没有任何结果，为了结束战争还要牺牲千百万人。第三，战争没有战胜者，统治阶级关于建立世界帝国统治的幻想没有实现。第四，社会主义者呼吁结束战争，立刻签订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条约。打倒战争，和平万岁。^②

与第一次齐美尔瓦尔德会议相比，第二次齐美尔瓦尔德会议确定了社会主义者鲜明的立场。社会主义者全面谴责战争，认为战争不会有利于任何一个人，社会主义者不应以任何名义支持战争。社会主义国际派对于护国派以战争消灭军国主义梦想的观点进行了批判，认为它不过是以暴易暴，带来的仍然是复仇和奴役。会议把资本主义看做战争的因由，号召社会主义者夺取政权，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国际社会主义者派希望消除杀戮和苦难，恢复人民的幸福和自由。他们把结束战争的希望寄托于中立国家的无产阶级，寄托于所有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希望他们通过自己的代表影响本国议会和政府。^③ 会议组成了齐美尔瓦尔德派。

① С. С. Ольденбург, Царствование императора николая II, с. 493.

②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07.6 - 1917.2, Т. 2, с. 563.

③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07.6 - 1917.2, Т. 2, с. 564, 565.

无疑，切尔诺夫和纳坦松、卡姆科夫属于齐美尔瓦尔德派。对于社会革命党有意义的是，第一，左派不再与右派同流合污，亮明了自己的旗帜；第二，不再与资产阶级为伍，主张建立自己的政权。然而社会革命党国际派拒绝了资本主义的文明，是一种理论上的倒退。在结束战争的具体做法上，社会革命党国际派在国际上依靠中立国和国际社会主义者给本国政府施加压力；国内则通过革命斗争推翻沙皇政权，回避了战争与革命道义问题的探索，再一次重复了民粹派的老路，实际上成为没有原则的机会主义者。

综上所述，社会革命党先后走过了两条道路。第一条是资产阶级议会民主道路。俄国走民主立宪道路是1905年革命的成果。从第一、第二届杜马的执行情况来看，俄国缺乏立宪的社会基础；从六三政变后斯托雷平改革的结果来看，自上而下的自由主义改革仍然举步维艰，所以，资产阶级议会民主道路不能成功。社会革命党一直追求民主，貌似比自由主义的民主更加民主，其实，这是建立在村社基础上的村社民主，从资产阶级的民主走向村社民主这是一种倒退，是不现实的。社会革命党接受斯托雷平改革的教训，特别是吸取了恐怖的教训之后，不得不通过合法方式重新探索俄国发展道路，追求立宪会议的目的不过是一种全民公决，由全民决定俄国未来的发展方向。

第二条道路就是苏维埃道路，或者叫做村社道路。社会革命党在农民问题上一直很矛盾，一方面恐惧于农民的农业恐怖、工人的工厂恐怖；另一方面又欣喜于农民创造的合作社、工人创造的职业联合会。1912年革命浪潮以及1915年社会因战争而出现的各种联合会，社会革命党右翼积极参与，切尔诺夫也不反对这样的举动。但是，他们对于农民联合会、工人联合会缺乏指导，表现出行动上的摇摆。比如，俄国军事工业委员会由于是俄国资产阶级创立，社会革命党拒绝参加第一次选举。第二次军事工业委员会选举时又以在委员会中设立工人委员会为条件参加了选举。然而，在军事工业委员会工人小组发言的时候，社会革命党又表现出左右摇摆：一会儿批评布尔什维克的失败主义，一会儿号召与资产阶级联合推翻沙皇专制制度，最后又拥护齐美尔瓦尔德宣言。^①

社会革命党把这种联合策略的革命叫做社会革命。在一战爆发前，切

^① Доклад: Эсеры в годы перв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http://www.istorya.ru/referat/referat2/22524.php>.

尔诺夫通过对 1905 年革命的总结把自己的革命叫做人民劳动革命。这种革命介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由于俄国的资产阶级不发达，在西方资本主义的竞争下与沙皇官僚结合在一起，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被剥削的农民在与资本主义私有制做斗争的时候逐渐发展了自己的劳动权利。到了某个时候，俄国的人民劳动革命借助于西方的社会主义起义就发展成为社会主义革命。^① 经过一战，社会革命党的人民劳动革命更加成熟。战争中，由于沙皇的战败俄国走上了资产阶级民主道路。由于俄国农业经济的落后，俄国的资产阶级依靠反动的阶级发动政治革命，不能改变社会结构。但与此同时，俄国农业革命阶段，能够与工人联系在一起，给私有制以沉重打击。这样，在资产阶级掌握政治权利的情况下，工人与农民联盟就可以实现民粹派劳工革命并确立政治民主，逐渐地充实了社会内容。这样，社会秩序虽然不是社会主义，但是已经为新型的生产关系奠定了法律基础。这种逐渐发展集体主义，削弱个人经济的做法就成为人民劳动革命的内容。劳动民主制度不是社会主义，但是在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上逐渐摆脱新的灾祸和革命，走上和平发展的道路。^②

这样，社会革命党最终被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烈所震慑，更加明确了切尔诺夫所坚持的人民劳动革命的定论，即在政权上依附于资产阶级，把自己的使命定位在社会组织之中，比如苏维埃、合作社、职业联合会等机构，以和平地完成社会革命的使命。一战使社会革命党停止了俄国社会性质的探索，周旋于民主派、革命派之间，为联合策略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二节 社会革命党的骑墙政策

一 二月革命

1917 年 1 月 9 日，彼得格勒的工人以纪念 1905 年革命为由进行罢工。俄历 2 月 23 日（3 月 8 日），彼得格勒的女工以纪念妇女节加入了罢工，提出“给我们面包”的口号。2 月 25 日，警察向平民开枪引起了平民的抵抗。

^①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07.6 - 1917.2, Т. 2, с. 138, 139.

^② В. М. Чернов, Великая рус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учредительного собрания 1905 - 1920, М., ЗАО Центрполиграф, 2007, с. 112 - 113.

2月27日，士兵调转枪口举行起义，工人和士兵冲进工厂和警察局，释放了罪犯，革命的局势无法控制。杜马主席 M. B. 罗将柯以局势恶化为名给沙皇尼古拉发电报，要求成立一个对杜马负责的政府。沙皇起初从大本营派兵镇压起义，遭到了其兄米哈伊尔·亚历山大洛维奇和 M. B. 阿列克谢耶夫将军的反对。2月27日，杜马在塔夫利达宫开会，组成了杜马临时委员会，几乎在同一时间，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和劳动团等左派政党成立了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2月27日晚11点左右，H. Д. 戈利岑内阁总辞职，杜马临时委员会行使“恢复国家和社会秩序的使命”。^① 在随后的几天里，杜马临时委员会任命了新部长，同时批准暴动的群众对沙皇部长的逮捕。

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由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掌控，组成了粮食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在2月28日的《告居民书》中提出了“应彻底推翻旧政权，它应让位给人民政府”^② 的主张。但是，鉴于俄国不具备建设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工兵苏维埃自愿把政权交给资产阶级为代表的杜马临时委员会，自己则派代表参加政权。

经过谈判，1917年3月3日，彼得格勒苏维埃和杜马临时委员会成立了临时政府，这就是第一届临时政府。第一届临时政府除了克伦斯基外，都是来自资产阶级的社会活动家。如总理兼内务部长的 Г. Е. 利沃夫为立宪民主党和地方自治局的活动家，陆海军部长 А. И. 古契科夫为十月党人、大资本家，外交部长米留科夫为立宪民主党主席，等等。^③

二月革命是一场群众自发的革命。表面上看来，首都居民因食品供应出现问题而引发起义，继而推翻了沙皇统治。战争引发了革命。由于俄国实力较弱，无力进行战争，作为战争的领导者沙皇尼古拉二世困兽犹斗，引起了国内各阶层的不满。各阶层出于不同的愿望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如一部分人号召与德国和平妥协，另一部分人主张把战争进行到胜利，第三批人主张没有任何条件地停止流血，^④ 从而肢解了国家。若从战争就是革命这个角度分析问题，俄国处在两种现代化模式的困局而引发的混乱中。

① 马克·斯坦伯格、弗·赫鲁斯塔廖夫：《罗曼诺夫王朝的覆灭》，第15页。

② 徐天新选译《世界史资料丛刊·现代史部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商务印书馆，1997，第5页。

③ 徐天新选译《世界史资料丛刊·现代史部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第9页。

④ Р. К. Баландин, Мифы революции 1917 года, М., Вече, 2007, с. 17.

从战争就是革命的判断中得知，战争是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德国挑起的。资本主义就是一种扩张，战争则是扩张的表现形态，不过付出的是一种人类牺牲的代价。从英国历史学家韦尔斯《世界史纲》对德国发动战争的原因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他从观念上就不接受德国式的崛起。韦尔斯认为，德国的崛起在于两点：第一点是组织科学研究以及把科学的方法运用于工业和社会的发展，这一点使得德国工业突飞猛进；第二点就是霍亨索伦王朝的政治传统，教育德国人在种族、道德、智力和体制上都比其他民族优越，对战争和王朝的特殊的忠诚等。^①这样，一战已经不再有道义，完全变成了一种政治。^②正是由于几乎所有的人都以这样的观点认识德国，德国转型的特征被忽视，受到更多关注的是它的专制传统。俄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秉承着东正教、专制制度和人民性三位一体的观点，把巴尔干看成自己的后院。一战中的沙皇虽然已经感觉到俄国的落后和人民的不满，但是他怀着对专制制度国家的一种宗教虔诚把战争进行到底。^③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以反专制为名，在俄国推行英法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以此挽救祖国，这样资产阶级以结束战争为名完成革命。然而，俄国资产阶级的举动不仅没有赢得选民的支持，相反，民主革命成为葬送自己的革命。

俄国的革命与战争联系在一起，因此，从一开始就带着功利的目的，其实，这种革命不能算作彻底的革命。二月革命在两个方面特别值得注意：首先，人民坚决反对战争，无论采用何种方式只要结束战争就是他们支持的，至于俄国未来走向哪里他们并不知道；其次，俄国资产阶级政党希望以英法为经验在俄国实行民主制度，但是对建设什么样的民主制度并不清楚。如米留科夫主张建立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度，^④但最终采取什么样的制度还是由普遍、平等、秘密和直接投票产生的立宪会议决定。^⑤

从临时政府宣言来看，临时政府完全按照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原则颁布了法令。如，完全和立即赦免由于政治和宗教事务，包括由于个人暗杀、军事起义、农业犯罪等事务被捕的人；实行言论、出版、结社、集会和罢工自由，这些政治自由应在军事技术条件允许的范围内扩大到军人；

① 赫·韦尔斯：《世界史纲——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吴文藻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第897、898页。

② A. 泰勒：《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何抗生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第21页。

③ 马克·斯坦伯格、弗·赫鲁斯塔廖夫：《罗曼诺夫王朝的覆灭》，第12页。

④ 马克·斯坦伯格、弗·赫鲁斯塔廖夫：《罗曼诺夫王朝的覆灭》，第18页。

⑤ 徐天新选译《世界史资料丛刊·现代史部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第9页。

废除一切等级、宗教信仰和民族的限制；用选举产生的民警代替警察，民警归地方自治机构管辖；通过选举产生地方自治机构；不解除参加革命运动的部队武装，也不把他们调离莫斯科；在保持队伍的严格军事纪律和履行军事职责的条件下，废除对士兵的一切限制，使他们享有其他公民所拥有的一切社会权利。同时声明绝不打算利用战争状态推迟实施上述改革和措施。^① 而建立君主立宪制的设想也随着尼古拉二世的儿子阿列克谢和尼古拉二世的兄弟米哈伊尔的拒绝而告吹。

临时政府所采取的措施并不符合俄国的现实。首先，俄国处于战争状态，如果把战争进行下去就必须保持社会秩序，而不是开展革命。其次，实行民主改革之后，特别是实行平等权利之后，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于3月1日通过了一号令。一号令说：“第一，在所有步兵连、营、团、军械库、炮兵连、骑兵连和各种军事管理服务机关立刻选举由以上单位下级官员选举的代表组成的委员会。第二，在没有选举代表到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所有军区，在3月2日早十时前，持书面证明到国家杜马大厦，按照每连一名代表选举代表。第三，军区的任何政治行动都要服从工兵代表苏维埃和自己的委员会。第四，国家杜马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只有在不与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命令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才能执行。第五，任何武器，如自动步枪、机关枪以及专用汽车和其他设备应该由连和营委员会控制和监督，无论如何都不发给军官，即便他们需要。第六，士兵在执勤和担任公职的时候应该遵守严格的军事纪律，但在职务和执勤之外，不应减少士兵在政治、公民和私人生活方面所享有的公民的权利……第七，同样取消阁下、老爷这样对军官的尊称，代之以将军先生、校官先生等称呼。第八，禁止对任何级别的士兵使用粗鲁的称呼，尤其是对他们称呼‘你’，军官和士兵之间若有任何争执和误解，士兵必须报告连委员会。”^②

一号令的颁布尽管有利于民主运动，但是破坏了战争进行应该具备的基本条件。这样一来，尽管政权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但是，他们基本上没有军权。资产阶级通过革命挽救战争的诺言基本落空。如果说沙皇专制制度是由于战争失败而垮台，那么资产阶级以革命拯救战争也不可能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措施随着战争的失败而失败。

由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能胜利结束战争，在人民的眼里，发动革命

^① 徐天新选译《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第9~10页。

^② Н. Стариков, 1917 разгадка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М., ЯУЗА, ЭКСМО, 2008, с. 87-88.

的资产阶级的代表——进步同盟就成了阴谋家，^① 甚至还有人认为，二月革命是共济会的阴谋。^②

综上所述，俄国的二月革命造成了俄国的混乱或者无政府。无论是资产阶级开出的药方，还是各种阴谋论的相互指责都说明，俄国社会在价值观上出现了问题。而价值观的革命正是西方资本主义革命或者现代化运动的基础。

俄国的立宪改革始自亚历山大一世俄国的顶峰时期。但是，俄国的军事奇迹没有使他们从根本上反思俄国救世思想。只是在法律的范围内修修补补，导致俄国在一战中的惨败。俄国的革命不是法律上的革命，而是价值观上的革命。正是俄国上下不能接受平等的契约观念，才致使俄国的革命始终停留在政治革命、社会革命阶段。因此，无论是资产阶级政党想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还是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等民粹派政党想建立人民民主政权，都不能赢得合法性。他们都因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支持战争而成为资产阶级的附庸，在价值观上遭到了俄国人民的反对。其实，二月革命爆发以后，无论是资产阶级的立宪民主党还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社会主义者都不能确定俄国到底走向什么样的未来，于是他们只好不断地讨好人民，发布类似临时政府宣言、一号令这样只讲权利不讲义务的奇怪法令，而把关于俄国未来发展方向这样的大问题留给全民公决式的立宪会议。无论是资产阶级政党，还是社会主义者都不能放弃俄国的利益——帝国的利益，最后，他们只能成为帝国遗产的牺牲品。

只有从战争和人民的社会需求中了解俄国未来的发展方向，才能赢得人民的信任，摆脱战争，完成俄国的革命。

二 对二月革命的回应

二月革命对于社会革命党来说有点措手不及。当时在彼得格勒发挥作用的是以左派社会革命党 П. 亚历山大罗维奇为首的社会革命党工人。津季诺夫和亚历山大罗维奇与民主派的代表一起成为彼得格勒代表苏维埃的发起者，津季诺夫和卢萨诺夫被选为代表，刚刚加入社会革命党的克伦斯基

^① Н. Стариков, 1917 разгадка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с. 58.

^② 共济会的阴谋论是普拉托诺夫的观点。他认为，除了革命的魔鬼和德国的奸细为代表的下层反对俄国之外，还有社会上层的共济会反对俄国。Р. К. Баландин, Мифы революции 1917 года, с. 88.

成为苏维埃的副主席和临时政府的司法部长。^①

对于二月革命，参加革命的津季诺夫把它看做自十二月党人革命以来的一个结果。^② 津季诺夫的认识几乎代表了当时所有革命民主派的呼声。他希望通过这场革命解决俄国所有不能解决的问题，如八小时工作制，建立工厂委员会和调停机构，等等。原因很简单，这次革命的主人是劳动人民。

当津季诺夫沉浸在革命成功的喜悦中时，人民的要求如何落到实处成为最重要的问题。于是，社会革命党在彼得格勒的代表在 1917 年 3 月 2 日召开了社会革命党彼得格勒第一次代表会议。会议支持临时政府提出的各项民主措施，号召社会革命党积极参加工兵代表苏维埃，建立农民联合会和其他组织，监督临时政府的活动并派克伦斯基代表社会革命党捍卫人民的利益和自由。莫斯科的社会革命党也迅速组织起来，出版了《劳动报》和《土地自由报》，同时于 3 月 3 日也召开了莫斯科第一次代表会议。

社会革命党虽然没有发动革命，但是社会革命党在大战中采取的积极参与社会组织的策略很快收到了效果。1917 年的 3 月是社会革命党迅速壮大的时期，因此，社会革命党也被称为“三月的政党”。

三月政党的含义是社会革命党容纳了各种中间分子，党性意识模糊。社会革命党根据党的最低纲领，把这种革命的性质归结为劳动性。劳动性的基本含义就是反对剥削。从革命的角度来讲，具有反封建的意义，因此又称为民主革命。从现代社会发展的两种类型来讲，社会革命党明显倾向于英法式的民主革命，而对于德国式的革命明显持轻视态度。一战中俄国与德国作战并显示出来的败绩进一步加深了这样的认识。

倾向于英法而讨厌德国发展模式使得社会革命党容忍了民主革命。然而，俄国的长期专制阻碍了人民视野的发展，虽然社会革命党称二月革命为人民劳动革命，也就是说劳动人民是革命的主角，但是，社会革命党一直没有信心执掌政权，提出的目标是在资产阶级掌握政权的条件下开展社会革命，把人民像资产阶级一样组织起来。社会革命党积极参加各种社会组织也就是积极组织革命的过程。^③

①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17.2 - 10, Т.3, Ч.1, с.5.

②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17.2 - 10, Т.3, Ч.1, с.24.

③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17.2 - 10, Т.3, Ч.1, с.33.

社会革命党积极加工兵代表苏维埃，而把政权则拱手让给了资产阶级。1917年3月31日，社会革命党的党报《人民事业报》刊登文章分析临时政府和工兵代表苏维埃之间的关系时说：“我们不参加细致地组建新的政权机关，可以确定这样一个事实：通过以委托书没有规定的执行委员会为代表的国家杜马与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之间的妥协，从革命中产生了临时政府，实际上是过渡时期共和国管理的最主要的机关。它的作用是历史赋予我们继续革命和巩固基本自由和民主类型的工具……而工兵代表苏维埃则是劳动和社会主义成分组成的革命压力。”^① 切尔诺夫只是在后来才把苏维埃民主派看做半是立法机关半是政府的东西，而且是无意识担当的。^②

1917年4月3~5日，社会革命党彼得格勒第二次代表会议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正式代表152人，邀请的客人有142人。会议在没有召开党代表大会之前发挥了核心作用。会议对于革命以来产生的核心问题，如战争问题、政权问题、土地问题、社会问题和与其他政党之间的关系问题做出了回答。

会议不忘重申社会主义原则，但是受沙皇长期压制的影响，社会革命党制定出的政策仍然具有强烈的理论色彩，缺乏实际考量。A. 戈茨做了关于战争问题的报告。戈茨承认战争对革命的至关重要作用，即战争把社会革命党从办公室推到了政治活动的前台，有机会实现自己的价值。但是戈茨没有把战争看做社会转型的一部分，特别是对于俄国革命来说具有决定意义的一部分，而是以阶级压迫为名把战争与自己隔绝开来，似乎战争是一小部分剥削阶级为了自己的私利发动的，所以，从道义的角度出发，俄国政府理直气壮地要求在民族自决的基础上，不割地不赔款地签署和平条约，公布沙皇政府和盟国签署的所有条约。^③ 社会革命党的观点是以革命代替战争，签署平等条约不是战争的一部分，而是革命的一部分。这样，社会革命党通过概念的转换，聪明地摆脱了责任，同时美其名曰地要求国际社会主义者阻止自己的政府进行掠夺性战争，如果不这样做，它就会以保卫革命成果的名义战斗到底。

①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17.2 - 10, Т.3, Ч.1, с.35.*

② *В. М. Чернов, Великая рус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учредительного собрания 1905 - 1920, с.104.*

③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17.2 - 10, Т.3, Ч.1, с.51, 76.*

社会革命党对战争的看法不仅不能结束战争，相反把继续战争的俄国临时政府推上了道义的审判台。同时，社会革命党又以劳动者落后还不能履行责任为名不参加政府，站在监督者的立场上提出八小时工作制，建立食品委员会、土地委员会，确定最低工资等在战争条件下不适合的要求。不参加政府并不是因为社会革命党本身软弱，而是害怕承担“不给予实权的政府所采取的措施所应承担的责任并因而导致劳动民主力量的瘫痪”。^①而对于其他的社会主义政党和民粹派政党则采取合作的方法，联合社会主义力量以抗衡资产阶级和反动的旧制度的势力。

社会革命党对革命的回应源自津季诺夫在二月革命刚刚爆发时所给予的过分期望。与其说社会革命党的不负责任是由于理论上的幼稚，不如说社会革命党在战争引发的革命面前被打了个措手不及。1917年二月革命之前的社会革命党还没有从斯托雷平的改革冲击下解脱出来，突然又遭遇了更加复杂的世界大战和战争引发的俄国革命，这不仅对于理论矛盾、经验缺乏的社会革命党是一个难以胜任的挑战，对于有着杜马经验的资产阶级政党来说，同样不能适应，正是这样，二月革命才在大部分学者看来变成了一场无政府运动。社会革命党从法国社会主义的思想出发，把民主思想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不仅忽视了德国社会主义者的改良道路，而且放弃了探索俄国特色发展道路的使命。

二月革命给革命理论带来的冲击已经引起了社会革命党内部的争论。例如，社会革命党中的左派卡姆科夫明确指出：“战争的原因来自两大集团双方的帝国主义性质。这样一来，我们俄国民主派同样也是野蛮集团的成员，因为即便我们放弃了割地和赔款，英法资产阶级也没有放弃。我们应该清楚和明确地警告自己远离英国和德国社会主义者的说法，就像我们保证自己远离德国帝国主义一样。”^②卡姆科夫对于护国派社会主义者推脱责任的批判可谓一针见血，虽然他还没有把一战看做革命，但是他已经朝着深入思考这个问题迈出了一步。关于土地社会化问题，虽然报告人贝霍夫斯基强调党的土地社会化原则，但是，在战争条件下，他提出采取过渡措施的办法解决土地关系问题，使党的政策朝着务实的方向迈出了重要一步。

^①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17.2 - 10, Т. 3, Ч. 1, с. 77.

^②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17.2 - 10, Т. 3, Ч. 1, с. 38.

社会革命党内部的分歧表明了二月革命后俄国形势的复杂性，它要求党对战争与革命问题做出理论解答，制定新的发展战略。

三 第一次政府危机

1917年4月18日，临时政府外长米留科夫发表照会，声明临时政府“愿将世界大战进行到底”。^① 声明立即引起了厌战人民的义愤。4月20~21日，彼得格勒的部分士兵和工人举行示威游行，提出打倒米留科夫的口号，引发了第一次政府危机。尽管4月21日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发表《告全体公民书》，要求人民保持镇静和秩序，但是，临时政府以米留科夫辞职、社会主义者加入政府才平息了这场危机。

政府危机反映了社会上层和下层之间的分歧。人民要求结束战争。政府危机反映了社会革命党投机策略的失败。

1917年5月3日，彼得格勒社会革命党委员会、北方州委员会、工兵代表苏维埃社会革命党党团局和执委会的代表在彼得格勒召开了联席会议，解决政府危机问题。会上对米留科夫照会遭遇人民反抗的原因产生了分歧。社会革命党左派代表卡姆科夫认为：“政府危机的原因不在于临时政府的构成，而在于政府执行的政策。直到现在，临时政府还没有走上消灭战争和完全民主化地改组国家的道路。”科瓦尔斯基分析了国家当下的政治经济形势，“呼吁建立能够执行坚定的军事和食品政策的权威政权。而这样的权威政权，工兵代表苏维埃是不能建立的，因为整个国家不是为了苏维埃。当下的政权应该建立在妥协和依靠群众的基础上”。卡姆科夫主张建立社会主义政府，而科瓦尔斯基主张建立联合政府。最后，切尔诺夫做了总结发言。会议通过了折中性的决议。首先，社会革命党改变了不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政策，临时政府的关键岗位，如劳动部长、食品部长、军政部长由社会主义者担任。其次，临时政府接受广泛的民主改革纲领，即在不割地不赔款和民族自决的基础上结束战争，准备把土地转交给劳动人民，全面地保护劳动，军队民主化并保持捍卫革命成果的战斗能力，实行广泛的民主自治，把税收的重担转移到有产阶级肩上，监督和调节生产、运输和分配，必要时组织生产，尽快召开立宪会议。^②

^① 徐天新选译《世界史资料丛刊·现代史部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第31页。

^②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17.2 - 10, Т.3, Ч.1, с.94, 95.

决议的折中性表现在社会革命党参加联合政府，但要求政府执行反映社会革命党思想的社会措施。社会革命党之所以不能脱离资产阶级，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不能非常自信地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劳动人民还需要自我组织起来。然而，受价值观的影响，社会革命党又不放心资产阶级能够秉承自己的意志，于是，就出现了实践与理论脱节的折中立场。

不过分析左右派的争论可以看出，社会革命党在价值观上出现了分歧。左派卡姆科夫完全坚持阶级立场，拒绝资产阶级的剥削政策，主张消灭战争。右派从现实出发，坚持跨越阶级界限，在民主自由的价值基础上组建联合政权。左派坚持社会主义价值、反对资产阶级是从根本上拒绝资本主义，是一种思想偏执的表现。而社会革命党右派之所以服从自由民主价值，并不是从根本上理解了资产阶级的自由价值，而是从俄国的现实出发，即如果不全力支持临时政府，俄国社会将完全被打垮。所以，社会革命党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参加临时政府。然而，在解释参加临时政府会不会像西欧社会主义者那样向资产阶级投降的问题时，阿夫克先基耶夫完全予以否认。他的解释是，这是革命的扩展。^①

左派和右派的争论说明战争的形势发展给社会革命党提出了与战争之前完全不同的理论难题。在建立第一届临时政府的时候，切尔诺夫认为，由于劳动人民还没有组织起来，不参加政府的举动是明智的选择，这样的举动具有政治洞察力。但是，随着危机的到来，切尔诺夫发现了大大超出自己意志的东西，他发誓要依靠的“有资格的俄罗斯”（цензовая россия）“无论如何也不能驾驭一下子给他们提出的任务”。^② 不仅如此，俄国即便上下齐心协力也不一定能够应对战争给俄国提出的任务。

受革命理论的影响，切尔诺夫并没有把战争看做一种革命，而是把战争与革命分割开来。他说：“或者革命吞灭战争，或者战争吞灭革命。”作为扼腕叹息的壮士，他不会轻易在战争中投降，这样一来，他只有转向了自己的祖国。他在1917年5月5日给农民代表苏维埃作报告时说：“问题已经不是劳动民主派组织的利益问题，而是应该着手另一个组织——处在极

①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17.2 - 10, Т.3, Ч.1, с. 97.

②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17.2 - 10, Т.3, Ч.1, с. 101.

端衰败状态、完全瓦解和被摧毁的国家。”^①

从剥削的角度声讨有产阶级转向不分阶级地建设民族国家，切尔诺夫完成了民粹理论的转变。换句话说，他不仅追求劳动者发展的权利，而且逐渐明确了劳动者在发展中所要承担的责任。他说：“同志们，为了这个事业，这个伟大的事业需要在意识上担负起落在我们身上的义务。这个事业，这个伟大的事业不是这样怀着轻松的心情做的。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就不是事业。我们大家应该深刻地意识到，现在，在这里，把我们的思想和感情凝结成一个集体的意志来建设俄国，我们奔赴各地并将在那里着手这项事业，启蒙那些仍然愚昧的力量。”^② 这样，切尔诺夫通过战争几乎走向了德国的社会发展模式，即建立劳资合作的民族国家。

遗憾的是，受法国革命的影响，切尔诺夫仍然不认同有机体国家的社会等级秩序。他一方面争取劳动人民的自由，因而不遗余力地坚持民主，另一方面又在战争面前承认与资产阶级建立权威国家；一方面批判德国社会主义者的社会沙文主义，另一方面又通过把临时政府建设成为对工兵代表苏维埃负责的政府实现劳资的联合。俄国与德国不同的地方在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还不太充分，还有很强的反封建的工作；德国此时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所以，切尔诺夫一方面要反对资产阶级，因而不认可英法的资本主义模式，另一方面又反对封建主义，因而不认同德国的有机体式的资产阶级革命。切尔诺夫最终把自己称为第三支力量，即既不同于英法模式，也不同于德国模式之外的第三支力量——革命力量。^③ 这样，俄国不仅拯救自己，而且能够拯救世界。切尔诺夫从此率领着社会革命党主流走上了探索第三条道路的征程。

切尔诺夫的第三支力量的思想在分裂的俄国十分艰难。社会革命党在政府中掌握有决定意义的部长，如劳动部长、供应部长、军政部长等，试图通过这些关键岗位在俄国开展社会改革；另一方面，通过采取社会措施平息劳资之间的相互怨气，达到统一的目的。然而，切尔诺夫一直没有信

①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17.2 - 10, Т.3, Ч.1, с.98, 111.

②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17.2 - 10, Т.3, Ч.1, с.112.

③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17.2 - 10, Т.3, Ч.1, с.99.

心开展政治革命，更没有信心进行价值观的革命。当切尔诺夫作为农业部长不断受到指责的时候，他变成了孤家寡人。社会革命党也成为备受非议的政党。切尔诺夫的理论尝试只是在党的代表会议和农民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如果想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必须经过第三次代表大会的认可。

四 第三次代表大会

1917年5月25日~6月4日，社会革命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如第六次党务会议决定的那样在莫斯科如期举行。本次会议是社会革命党处于发展顶峰时期，也是参与执政时期召开的代表大会，对于社会革命党能否完成俄国革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会议花了多一半的时间讨论二月革命以来俄国出现的新形势，也就是俄国未来的发展走向问题。主旨报告由切尔诺夫宣读，左派卡姆科夫、右派阿夫克先基耶夫等人分别提出了反对和补充意见。

正如主席团主席拉基特尼科夫在开场白中所讲的那样，“我们最好的期望，我们最好的宿愿就这样快地实现了。但是，同志们，我认为，我们不应该被胜利的迅速所陶醉。谁在二月末三月初的彼得格勒取得了胜利？是农民、工人以及彼得格勒穿着士兵服装的农民和工人，是他们取得了这场胜利。完成革命的这股力量在他们的手中，这股力量守候着革命，也左右着这场革命的意志。”^①

从第一次政府危机来看，拉基特尼科夫的开场白不可谓不中肯，同时也给第三次代表大会定下了调子，即俄国革命的钥匙掌握在人民的手中，无论任何政党，只有采取符合人民愿望的措施才能结束这场革命。然而，费思量的是，社会革命党不知道人民需要什么。第三次代表大会就成为猜测人民需要的大会。

会议继续了切尔诺夫提出的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上提出的观点，并在会议结束后成为社会革命党的指导思想。决议说：“现代战争首先是现阶段资本主义发展所特有的帝国主义倾向的逻辑结果，是资本主义试图在财政和银行寡头占据优势和领导地位的条件下组织和集中自己的权力控制世界的结果。”在帝国主义的条件下，资本主义失去了革命的动力，变成了保守的力量，它需要与政权、教权和军权结合，把自己的统治扩大到小的和

^①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17.2 - 10, Т.3, Ч.1, с. 141.

落后的国家，变成民族与民族和国与国的斗争。决议认为，这种斗争的结果是没有前途的。资产阶级由于自己的利益不能结束这种战争，只有落后国家和在这场战争中失败的国家才有可能组成第三支力量，因此号召交战国的社会主义者反对本国的资产阶级，从而结束战争。俄国就是第三支力量的堡垒。然而，俄国国内旧制度的瓦解速度快于民主力量的组织速度，所以，社会革命党认为必须集中革命社会主义民主力量完成创造性的任务。如必须参加地方政权的组织，准备土地改革，同瓦解军队的现象作斗争，巩固中央革命政权以对抗无政府的溃散，巩固向心力和组织力量以反对破坏组织和离心力的力量。^①

切尔诺夫的观点引起了与会者的激烈争论。左派卡姆科夫率先发难。卡姆科夫提出，切尔诺夫以否定帝国主义战争中出现的爱国主义行为而否定俄国参战的帝国主义性质是对现实的回避，俄国革命者无论以什么样的名义参加战争都是继续帝国主义战争。这样，俄国必然扼杀自己的革命。右派克伦斯基以战争具有防御性质，俄国的民主派为了革命的成果必须加强军队的战斗力，恢复军队的纪律，承担应该担负的责任为由，主张继续战争。两派涉及了是把战争看成革命，还是用革命代替战争的问题。如果战争就是革命，那么，俄国作为战争的一方就选择了一种现代化的模式与另一种现代化模式的较量，俄国必须作为一种模式的捍卫者而参与战争并把战争进行到底。如果用革命代替战争，那么，俄国就是现代化模式的反对者。俄国必然游离于整个现代化转型的体系之外，而这一点是无论如何不能成立的。原因很简单，交战国都处在战争状态，无论俄国愿意与否都必须参加战争，因为战争本来就是德国挑起的，退出战争也就是接受了德国人的奴役，这是主权俄国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俄国要想保持主权必须接受战争，同样，也就必须接受社会的转型。

从俄国人民不愿打仗的情况来看，不是俄国人愿意接受德国的屈辱，而是当政者没有把人民当做国家的主人，当做自己依靠的对象。人民以为保卫国家就是保卫沙皇政府，保护奴役他们的剥削者。这样的认识是革命者灌输的。现在沙皇统治结束了，革命者接过了沙皇的帅印，继续沙皇曾经的奴役的战争，只不过换了一个好听的名字——为了自己的祖国。在没有享受到祖国一点好处的人民看来，这无异于欺骗。左派社会革命党提出

^①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17.2 - 10, т.3, ч.1, с. 596, 598.

的观点就是这样的，认为没有必要接受沙皇和资产阶级丢下的烂摊子，应该直接发动革命，结束战争。

切尔诺夫以民主革命的名义回避了战争的非正义性，直接参加了战争，为民族自治，不割地不赔款的基础上结束战争而战。尽管切尔诺夫的做法是正确的，但由于以前过分地强调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也就是战争是为了统治者的私利而战，而拆散了帝国主义条件下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文化纽带，社会革命党被自己的理论绊倒了。

现在，对于社会革命党来说已经没有别的路可走了，只有与德国单独签署条约，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也只有这样，才能重塑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完成革命的转型。然而，出于人本能的需要，切尔诺夫发明了第三支力量，以劳动者的仁慈呼吁国际社会结束战争。切尔诺夫的做法没有奏效，切尔诺夫以革命替代战争的策略破产了。切尔诺夫作为农业部长走上了与资产阶级政府一样的反人民道路。社会革命党分裂了，切尔诺夫怀抱着无解的理论成为怨妇；左派社会革命党和布尔什维克夺取了政权，右派社会革命党走上了反革命和流亡的道路。

切尔诺夫的理论被后人称为不战不和的理论。不战不和的理论症结在于，切尔诺夫对于帝国主义战争理论的解读是错误的。他把本是价值革命的社会转型看做权利的再分配。资本主义是一场价值革命，这就是从过去的静态社会向动态社会的转变。在资本主义价值观下，人不仅要维持和平，更要不断地开发自己，改变生活的状态。英、法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农民变成工人，地主变成资本家，这是一种社会身份的转变，是自由的一种表现。至于在身份转变的过程中出现的动荡是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常态。德国资本主义的兴起，借助于政权、教权和军权的力量，完成了资本主义自上而下的自我转型，是不发生动荡的一种社会转型。由于俄国沙皇政府通过斯托雷平改革完成了也是德国式的社会变革，由于这种变革的内部压迫性造成不理解这种改革人民的反抗，于是出现了反对资本主义，随后又出现以民主对抗专制的革命。

由于政府把资本主义革命仅仅看做经济或者政治革命，忽视了价值观的革命，造成了从沙皇政府到社会下层的利益之争，不同的只是双方各自所站的立场。当俄国被迫卷入了一战之后，他们因无力完成价值观的转型，造成整个社会的分裂。俄国以战争代替革命，或者以革命代替战争都是一种对战争就是革命的误解，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失败。列宁以变帝国主义战

争为国内战争，完成了国内范围内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的社会转型，这种转型是理论上的，凡是崇尚和谐发展的社会力量全部边缘化。列宁的转型是从帝国主义角度做出的，对于不承认辩证哲学的人们来说，这种观点无疑成为乌托邦。^① 列宁的转型顺应了世界发展潮流，利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方法完成了劳资社会妥协的社会转型，这就是列宁理解的社会主义，即把资本家强制变成无私的劳动者。

列宁的做法与切尔诺夫的做法最大的不同，用列宁的话说就是实现了次序的掉转，“即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以此为前提”。换句话说，俄国正是由于世界大战成为“介于文明国家和被这场战争最终卷入文明之列的整个东方各国即欧洲以外各国之间的国家，所以俄国能够表现出而且势必表现出某些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当然符合世界发展总的路线，但却使俄国革命有别于以前西欧各国的革命，而且这些特殊性到了东方国家又会产生某些局部的东西”。这个次序的掉转是什么意思呢？第一，列宁承认世界发展的总趋势，这是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只要不灭亡就必须尊重这个规律。第二，列宁认识到，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样一场更广范围内的革命逼迫经常抱怨资本家剥削自己的传统社会的人调整自己过去的位置，不仅要理解资本家给他们强制进行的“培训”，而且要边学边干，与资本家一起成为能够开发自己的劳动者，资本家也逐渐和劳动者一样成为文明社会中平等的一员，这是德国资本主义在法国资本主义的压迫下走出的一条劳资结合的道路。同样，俄国在德国帝国主义的逼迫下，不仅要与资本家“结合”，更要成为与资本家一样的“执政者”。这不仅对于资本家是个挑战，对于工人和农民更是挑战，这就是列宁说的“用革命的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的含义。^②

在改造的过程中可能会存在各种各样的碰撞，但是，在世界发展的大势面前这是唯一出路。列宁的选择是基于信仰的原则作出的，正是凭着这样的信心有了这样大胆的举动，也正是凭着它使野蛮的俄国走向了文明。

切尔诺夫虽然提出了建设第三支力量的观点，但是由于没有足够的信

^① Г. И. Шмелев, Национализация земли в теоретических схемах большевиков и в реальности,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2008, №. 2, с. 40.

^②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776、777页。

心而成为资产阶级的尾巴^①，丧失了推进革命工作的机会。切尔诺夫与列宁的最大区别，在于他的要求是从人的意愿作出的。虽然有了人的怜悯，但是却失去了动态社会条件下的社会公义，即不发展毋宁死。正是由于切尔诺夫从一般的人伦道德出发把需要以死亡作为代价的资本主义看做人出于私利而进行的非人性的剥削，忽视了资本主义背后伦理规范的变更，从而把已经变更了精神价值的政权、军权和教权看做封建等级特权，而不是马克思·韦伯讲的为使社会组织的更加合理化和官僚化而采取的措施。^②

这样，在德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下，俄国必须走出一条比德国社会更加团结的发展模式才能摆脱战争，这条路便是资本家变成劳动者的独特的发展道路。受人本能的局限，切尔诺夫没有迈出这一步。

受对当前局势判断的影响，第三次代表大会对战争、政府以及各种社会、民族国家政策作出了自己的部署。这些部署与对形势的判断一样是矛盾的。

关于战争的态度，社会革命党相信只有民主派的共同努力才能结束战争，所以，一方面呼吁恢复革命国际并召开国际社会主义代表大会制定和平条件，在民族自决和不割地不赔款的基础上实现和平；另一方面呼吁临时政府不要把蛊惑士兵退出战壕以及不服从革命政府的命令带进军队。一方面支持临时政府刻不容缓地同俄国面临的崩溃的危险做斗争；另一方面发展城乡劳动民主的力量。一方面重申消灭土地私有制并变成全民财产；另一方面又主张把土地转交给民主选举的土地委员会，等待立宪会议加以解决。一方面发展不脱离民族形式的全人类的内容；另一方面又把它看做发展劳动人民国际理想的杠杆。一方面建立联邦民主共和国；另一方面又提出地域民族自治。^③一方面表明了自己的反资本主义的民粹派观点；另一方面又把决策权交给未来的立宪会议。

从社会革命党通过的一系列具体的政策来看，表面上，社会革命党既理想又现实，既一般又特殊，但是，从社会革命党对时局的功利主义分析来看，这些矛盾政策是缺乏自信的表现，对于不同的利益群体来说只能起

① 《列宁选集》第3卷，第29页。

② А. Н. Медушевский, Демократия и авторитаризм: российский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ализм в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й перспективе, с. 91.

③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17.2 - 10, Т.3, Ч.1, с. 599 - 600, 601, 602, 603, 604.

到分化瓦解的作用。

社会革命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没有完成用价值观凝聚整个社会的任务。

第三节 与资产阶级的联合

一 第一届联合政府

第三次代表大会是在社会革命党参与第一届联合政府的过程中召开的，为入阁的社会革命党提供了行动的指南。

社会革命党显然把人阁当做一场革命，用切尔诺夫的话说就是“组织自己的同时组织俄罗斯”。社会革命党的入阁是被迫的，是在资产阶级不能胜任俄国组织工作的情况下被迫进行的。社会革命党的举动无疑是对自己思想观念的挑战，即列宁提出的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向社会主义革命。切尔诺夫无论是在农民代表大会的发言还是在三大上的发言都没有确定俄国正在进行这种转变，只是通过参加资产阶级政府为社会主义革命做准备，或者用1925年切尔诺夫写的理论著作《建设性的社会主义》中的话说：“社会主义不再只是理论，各种情况迫使它作为实际的、实用的社会主义登台亮相。”^① 切尔诺夫不能明确社会主义理论和现实究竟是什么关系，简单地把社会主义等同于劳资之间的相互让步和妥协，即地主把土地交给农民使用，工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等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措施。切尔诺夫天真地以为通过劳资之间相互让步就可以完成社会主义基础的建设，实际上这跨越了从人到神，从物质到精神的本质上的转变。

第一届联合政府是1917年5月5日成立的。在这届政府中，资本主义的部长有10个，社会主义的部长有6个。虽然社会主义的部长人数少，分别担任农业部长、司法部长、劳动部长、邮电部长、食品部长和陆海军部长，^② 但是，他们是维系工人农民与资产阶级联系的纽带。

这一届联合政府要想得到农民、工人和士兵的拥护，必须首先结束战争，进行分配土地和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实行民族自治等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措施。这些措施成为扭转俄国失败命运的前提条件而不是相反。

^① В. М. Чернов, Конструктивный социализм, с. 20.

^② А. Ф. Керенский, Россия на историческом повороте мемуалы, М., ТЕРРА, 1996, с. 249.

这个顺序的颠倒正好反映了俄国社会中存在的两种不同的价值观。以战争态度为例，米留科夫的战争照会指出，临时政府代表人民的意愿，同盟国密切团结，解决同世界大战和结束大战有关的一切问题。虽然米留科夫反复声明，自由俄国的目的不是统治别的民族，不是夺取他们的民族财产，不是武力侵占别人的领土，而是在民族自决的基础上确立持久和平……俄国人民不允许他们的祖国在退出这场大搏斗时是屈辱的、有生力量遭破坏的国家。^①但是，俄国士兵权利宣言已经公布了不执行继续战争的战斗命令。不执行的理由正如列宁所讲的，因为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其目的是满足地主资本家的需要，是对人民的剥削。如果从社会主义革命的角度来讲，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也就是希望本国政府在战争中失败是工人农民的基本策略。列宁的号召得到了支持退出战争人士的拥护，出现了战壕中的士兵联欢和大量逃兵。战争实际上在俄国被停止。

列宁的策略使退出战争逐渐合理化。国内陷入了战争的道义之争，也就是社会革命。第一届政府的军政部长古契科夫早在4月份就尝试与苏维埃军事委员会成员商量并劝说他们让军队继续战斗，停止关于和平与战争目的的争吵。但是，他得到的回答是苏维埃不可能牺牲革命的利益而维持军队的战斗力。^②

以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为代表的苏维埃社会主义者也从革命角度认识战争的目的，但是，他们把革命的性质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从战争的意义上讲，为了保卫祖国，维持社会的存在，国家必须团结起来，实现联合；不仅联合资产阶级，而且联合工人和农民，把战争进行到底。社会主义者与资产阶级联合马上使自己的政党陷入瘫痪，反对战争的群众迅速左转，革命被迅速推向前进。^③召开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和实现国内团结的愿望被迫搁浅。社会主义者提出的解决战争的手段即“不掠夺别人土地、不夺取别国的赔款、不压迫各民族意志”^④的策略不能实现和平，必须进行为了和平的战争。

① 徐天新选译《世界史资料丛刊·现代史部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第29页。

② П. Н. Миллюков, Россия на переломе большевистский период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Т. 1, Париж, La source, 1927, с. 69.

③ П. Н. Миллюков, Россия на переломе большевистский период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Т. 1, с. 71.

④ А. А. Смирнова, От коалиции к катастрофе Петроградские социалисты в мае-ноябре 1917 года, с. 38.

为了使军队健康化，作为军政部长的克伦斯基宣布：“祖国处在危险中，每一个人不管多么艰难都要开动脑筋、尽一切力量阻止无政府状态，我不允许任何想在此时摆脱责任中的高级指挥官辞职；擅自离开陆海军指挥官岗位的人应该在指定的时间回到自己的岗位上；违反此命令者将遭到法律的严惩。”^① 5月11日，克伦斯基签署了第八号《军人权利法令》。其中第14节恢复了军官执行军事纪律的权利，包括在前线作战的情况下破坏上下级服从关系时诉诸武力的权利。作为第14条的补充，第18条规定，任命、调换和解职军官完全属于高级指挥官的职权范围。^②

对克伦斯基的命令，军官们常常执行得不坚定。12师和13师的某些团拒绝到达前沿阵地。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员继续在军队举行群众集会。克伦斯基下令把不服从命令的军官和士兵送交军事法庭。克伦斯基的命令并没有收到多少效果。克伦斯基也承认，布尔什维克取得成功就是拨动了人们本能深处的自卫心弦。然而，即便如此，克伦斯基本着与德国单独签署条约将会成为德国附庸的心理，还是和最高司令部一起发布了6月18日发动进攻的命令。

在进攻问题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态度并不坚决。6月12日，社会主义者政党在6月4~28日召开的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模棱两可的决议。决议没有明确支持即将开始的进攻行动，取而代之的只是判定，俄国的武装力量应该准备防御和进攻，但是进攻只有在战略必需的情况下才能采取。^③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之所以通过这样模棱两可的决议，原因在于他们从革命的角度把希望寄托于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但是除了类似比利时的社会主义者Э. 王德维尔德对俄国革命表示祝贺外，国际社会主义会议对此只字不提。不提的原因很简单，在战争状态下宣布交战国的战争是掠夺性的战争无异于宣布自己的护国行为也具有掠夺性。而俄国社会主义者把召开国际代表会议变成扭转战败命运的手段，对于战争的掠夺性以民主革命的形式加以掩盖无益于战争矛盾的解决。相反，布尔什维克提出的审查俄国的战争目的并公布秘密条约才是国际革命的真正表现。这不仅给国际社会主义者做出了榜样，而且满足了国内厌烦战争的民众的要求。从俄国社会主义者“单独签署条约不能使俄国摆脱世界帝国

① А. Ф. Керенский, Россия на историческом повороте мемуалы, с. 253.

② А. Ф. Керенский, Россия на историческом повороте мемуалы, с. 254.

③ А. Ф. Керенский, Россия на историческом повороте мемуалы, с. 265.

主义的束缚”^①的观念出发，布尔什维克的单独签署条约的观点无异于对祖国的背叛。克伦斯基不顾革命形势的发展，从主观地把俄国革命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视角，指责列宁的“间谍”行为是不负责任的表现。战争的进攻以失败而告终。虽然孟什维克以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名义批评临时政府贸然进攻是对帝国主义者的让步，是对签署不割地不赔款和平条约的背叛，但是，社会主义者因支持临时政府而陷入了背叛人民的困境，进攻政策使得工人远离孟什维克，越来越同情布尔什维克。

米留科夫从俄国生存的角度认为俄国社会主义者的举动必然导致政府的瘫痪，但是忽视了俄国社会主义者民主革命的诚意。社会主义者一方面承担起保卫祖国的责任，但另一方面也通过与国际社会主义者的谈判完成俄国的民主革命。遗憾的是俄国的革命并不是俄国社会主义者所理解的争取自由民主权利那样简单，俄国的革命在德国通过战争发出的，以劳资合作的面目（即战争时期德国表现出的社会主义者的爱国主义行为）出现的价值观性质的革命面前，也逐渐向价值观性质的革命方向发展。不同的只是德国的革命是主动的，俄国的革命是被动的。正是这种被动性质使得俄国社会主义者成为“谋取私利”的小资产阶级，使得布尔什维克变成了“背叛祖国”的德国奸细。看透世界大战是一场价值观革命的列宁为了顺利地摆脱战争给俄国带来的困境，不惜以国内战争的名义完成价值观的革命，这就是列宁提出的变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含义。

这里包含着两层含义：第一层是国际革命，即列宁反复宣称的国际无产阶级的大团结，这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即社会主义革命是国际性的，消灭资本是国际事业。^②这一条是从整个革命的性质来说的，来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际性。但与其同时，列宁又根据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提出了“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③的看法。如果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角度来看，俄国的革命具有国际性质，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紧密相连并成为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基础；但从俄国资本主义的剥削性来看，又必须在德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影响下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的方法实现劳资“合作”，完成俄

① A. A. Смирнова, От коалиции к катастрофе Петроградские социалисты в мае-ноябре 1917 года, с. 49, 50.

② 郑异凡：《史海探索》，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第277页。

③ 《列宁选集》第2卷，第554页。

国的社会转型。这就是资本主义竞争条件下发生的国际革命和俄国在战败情况下完成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民族革命。德国以议会斗争的形式实现了争取工人权利、实现社会转型的任务；那么俄国就只有通过激烈的国内战争完成这个任务。如果德国社会主义者的议会道路被俄国社会主义者看做沙文主义，那么列宁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就成为对国家的背叛。如果从价值观革命的角度来看，不仅德国社会主义者的爱国举动不是沙文主义，而且列宁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也不是背叛国家的行为，而是在一战这种特殊背景下实现社会转型的必要手段。

无疑，列宁的行为具有灌输性质，因而在民主革命模式下具有一小部分人发动的“政变”的特点。若从社会转型的全球情况来看，列宁的“政变”就具有相当深刻的价值因素。理解了这一点，不仅列宁革命具有价值论的意义，而且为处在革命危机状态下的俄国民众提供了宽阔的出路。

与此相同，在第一届联合政府中，社会主义的部长也在处理农民土地问题、八小时工作制问题以及民族问题方面同样面临这样的困境。

土地问题是社会革命党领袖担任农业部长期间着重解决的主要问题。自从5月5日上任伊始，切尔诺夫就着手制定土地法的准备工作。5月20日，切尔诺夫主持召开了立宪会议土地总委员会第一次例会，会议宣布了“土地社会化总原则”，即把所有土地不经赎买转交给农民使用。总原则刚一颁布就遭到了土地所有者联合会和农民协会的反。土地联合会成立于1917年5月初，参加者主要有地主、独立农庄和单独田庄庄员、租赁者和各种类型的土地所有者，大部分属于自己购买土地的农民。他们认为无偿把土地转交给农民就是使“普遍的抢劫、掠夺和偷盗合法化”。^①农民联合会是不同于农民代表苏维埃的组织，它成立于1905年，在1917年3月重新恢复，主要反对把土地退出商品流通。虽然1917年7月31日之后逐渐与农民代表苏维埃合并，但是在农民联合会的内部存在着两派：20%的人支持购买土地并支持土地私有，80%的人决心捍卫村社土地所有制并支持无偿没收包括农民购买的土地在内的所有土地。^②

农民对土地使用原则的不同认识反映了不同的价值观念。土地私有制的拥护者，特别是斯托雷平改革下成长起来的农民逐渐产生了独立自主的

^① В. М. Чернов, Великая рус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с. 241.

^② Т. В. Осипова, Российское крестьянство в революции и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войне, М., Стрелец, 2001, с. 19.

经营意识和商品交换的理念。但绝大多数农民由于长期依附于贵族地主，特别是不断受到国家的庇护，他们对于独立经营者产生了掠夺者、剥削者这样的观念。受国家一统思想左右的独立农民也不可能成为真正独立的所有者。所以，切尔诺夫宣布土地社会化原则就是通过消灭土地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散保证弱小者农民的健康成长。土地所有者批评土地社会化会支持土地抢劫，农民无产者批评土地所有者的剥削，双方都没有看到人的社会依附性和人的独立性这两个方面，即没有看透资本主义就是通过利益之争履行各自的社会职能，从而促进个性和社会的发展。

切尔诺夫不再从总原则上下工夫，而是试图借助于资本主义的政治力量实现农民劳动能力的发展和观念的转变。但作为同样缺乏全局观念的土地所有者仍然贬低农民的能力并把他们看成破坏性的力量。在第一届联合政府期间（5月5日~7月25日），切尔诺夫颁布了一系列过渡措施，如停止斯托雷平土地整理委员会的工作，从7月12日开始直到立宪会议前禁止土地交易，7月16日签署土地委员会指导书。通过这种方法调节农村不和谐的土地关系。^① 切尔诺夫的做法是矛盾的。一方面颁布禁止土地交易，另一方面经土地委员会批准又可以进行交易；^② 一方面禁止非法抢劫私有土地的行为，另一方面又希望把不使用的土地交给土地委员会管理。切尔诺夫的骑墙政策遭遇了土地所有者的反对和农民无产者的远离。土地所有者甚至把状告到了总理利沃夫那里，于是利沃夫致信农业部长和司法部长，谴责停止土地交易的行为。^③ 米留科夫甚至在《言论报》上指责切尔诺夫是失败主义者，利用德国人的钱办报纸，甚至在 В. Л. 布尔采夫和 П. Е. 谢格列夫的报纸上散播切尔诺夫为德国人服务的谣言。切尔诺夫不得已向总理递交辞呈。^④ 虽然切尔诺夫的辞呈没有获得批准，但是他自己和社会革命党的威信受到了极大的损害。

损害社会革命党威信的另一件事是民族问题。在1905年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社会革命党将解决民族问题与建立广泛的城乡州和村社自治联系在一起，尽可能广泛采用联邦原则处理各个民族之间的关系，即承认

① В. М. Чернов, Великая рус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с. 232.

② В. М. Чернов, Великая рус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с. 231.

③ Т. В. Осипова, Российское крестьянство в революции и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войне, с. 36, 37.

④ В. М. Чернов, Великая рус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с. 234 - 235.

所有民族的无限自决权。^① 虽然社会革命党强调通过劳动原则给农民分配土地，建设建设性的社会主义，但是，对于有着民族仇恨的波兰、芬兰、白俄罗斯、乌克兰、高加索和犹太人来说，无限的自决权就意味着民族独立和俄罗斯帝国的分裂。在推翻沙皇专制制度之前，社会革命党出于革命的考虑，他们的民族理论还没有充分估计到分裂国家的危害性，提出了承认所有民族的无限自决权这样的观点。当沙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推翻以后，参政的社会革命党与孟什维克一起看立宪民主党的脸色行事。在民族问题上，立宪民主党虽然在1917年3月的时候提出用民主共和国代替立宪君主制，但没有放弃重新回到君主制的可能性。当立宪民主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与会的民族代表已经提出把俄国建设成联邦共和国并要求承认各民族自决权，特别是乌克兰、白罗斯、立陶宛民族区域自治权利的时候，Ф. Ф. 科科什金看出了俄国分裂的危险。最后，立宪民主党在决议中只是提出在保持俄国统一的条件下给予各省或州地方自治局在地方经济、文化、民族文化生活方面的省自治，同时接受全国政权的监督。^②

社会革命党在民族问题上虽然仍然坚持民族自决原则，甚至右派社会革命党如人民社会党还提出给乌克兰、立陶宛、白俄罗斯、格鲁吉亚以及个别西伯利亚州以自治的权利。但是，一些活动家在民族问题上只局限于民族文化自治的思想，引起了崩得的不满。^③ 社会革命党在民族问题上矛盾的：既在理论上承认各民族的民族自决权，又害怕国家分裂，呼吁各个民族在立宪会议召开之前不要采取不正当的方式解决民族问题。社会革命党的矛盾政策给民族分子提供了分裂的口实。

乌克兰是民族运动的代表。基辅成为运动的中心。从事民族运动的有两个组织：一个是公民联合组织委员会，一个是被称为拉达的乌克兰组织，又叫苏维埃。公民联合组织委员会由商会、军事工业委员会、地方自治局、市政机关、报社编辑部、大学生组织和合作社组织组成；拉达由乌克兰科学协会、乌克兰教师协会、乌克兰民族联合会、合作社和大学生组织组成。公民联合会因参与者以俄罗斯化的城市代表为主，所以寻求乌克兰独立的态度不太积极。相反，名不见经传的拉达却给利沃夫和克伦斯基发电报，

① В. Е. Козляков,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вопрос и неонароднические партии (начало XX в. -конец 20-х), Минск, БГТУ, 2001, с. 52.

② В. Е. Козляков,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вопрос и неонароднические партии, с. 84.

③ В. Е. Козляков,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вопрос и неонароднические партии, с. 79, 86.

希望自由的俄国要满足乌克兰人民所有的合法权利，同时致电所有的省组织请求它们派代表到临时政府申诉乌克兰人民刻不容缓的要求，建立文化和教育组织，为民族文化基金会筹集资金。

受波兰独立和芬兰自治的影响，乌克兰也开始追求民族解放运动。^① 1917年4月，乌克兰运动正式展开。4月中旬，拉达得到巩固，乌克兰社会民主党也参与其中。5月上旬，拉达宣布召开乌克兰民族代表大会，邀请政治、文化、工会和所有其他组织的代表，支持乌克兰自治。布尔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都支持乌克兰自治并以联邦的形式重建俄国。两党的观点成为乌克兰民族代表大会的基础。

然而，城市革命民主运动和乌克兰民族运动，特别是农村民族运动存在着各种变数，互相不信任、不理解。拉达在羁押解送犯人的据点聚集了3000名士兵，打算组建乌克兰军团并派往前线。拉达向政府提出的理由是这样做可以大大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仅仅过了一天，拉达的决议就遭到了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公民委员会、基辅军区各代表和大学生联合委员会的反对。5月1日，士兵宣布自己为乌克兰第一团并通过了在乌克兰旗帜下把战争进行到胜利的决议。工兵代表苏维埃和社会民主党劝说士兵放弃乌克兰化，将军当中唯一温和派的人物 A. A. 布鲁西洛夫也坚决反对按照民族原则建立军队。

但是，5月5日，形势还是朝着建立乌克兰军团的方向发展。民族主义者也乘机抬头。农民、大学生、军人分别召开代表大会。农民和大学生主要追求乌克兰自治，而军人委员会则追求独立。思维理性的人认识到乌克兰不同于波兰，如果组建了乌克兰军队，也要组建分散在全俄各地的军队。他们先给临时政府发电报，要求承认乌克兰原则上自治。彼得格勒苏维埃以建立民族军队需要总参谋部和民族组织的帮助提交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决定为借口回绝。^②

6月初，克伦斯基访问基辅。中央拉达的领导人 M. C. 格鲁舍夫斯基和 B. B. 舒利金把问题公开化，提出虽然在过去的某个时候乌克兰已经成为独立国家，但是，“我们不致力于独立，只想在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内自治”。“此种形式的乌克兰运动对于俄国不是威胁，而是强有力的支持；如果想拯

^① В. М. Чернов, Великая рус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с. 257.

^② В. М. Чернов, Великая рус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с. 259.

救俄国，临时政府应该对它加以利用”。^① 他们希望临时政府不要拖到立宪会议，而是马上满足他们提出的迫切要求。6月17日，第二次军人代表大会开幕的时候，拉达与临时政府的矛盾公开化。临时政府通过专门法令，认为拉达组建乌克兰军团和选举乌克兰军官的许多次擅自行动等同于内战。在临时政府对同时召开的波兰、哥萨克等地军人代表大会没有做出回应的情况下，这一法令无疑是对乌克兰民族运动的打击。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号召召回参加全俄农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宣布中央拉达为临时乌克兰政府，召集乌克兰立宪会议，号召所有乌克兰士兵参加乌克兰民族军队。

最后，乌克兰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挽救了局面。社会民主党的代表说，“关于乌克兰自治的决定不经住在乌克兰的其他民族同意不能算数”。乌克兰的社会革命党代表说，“分离主义者喜欢喊口号，如果我们只宣布自己的共和国独立，那么，我们将失去自己的民主，同时也得不到土地……我们不仅应该给俄国的资产阶级施加压力，而且应该给自己的资产阶级施加压力。你们不要以为，如果地主和我们说同一种语言，就会站在我们一边”。^② 关于农民与乌克兰地主存在对抗的提醒发挥了作用，代表们不再追随分离主义者。临时政府以革命压倒民族运动为由拒绝了乌克兰独立的要求，希望他们等到立宪会议召开。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也谴责了乌克兰社会主义者对资产阶级的暧昧态度。

乌克兰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提出的有关民族平等和阶级关系的问题虽然可以暂时冲淡有关乌克兰民族运动未来走向的纷争，但后者对于社会革命党的民族政策提出了挑战。社会革命党认为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决权，包括乌克兰，但是，又认为乌克兰自治而不是完全脱离与大俄罗斯的联系是他们政治成熟和富有预见性的表现。因为在立宪会议召开前三个月，俄国被战争包围，内部隐藏破坏性的地下力量，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政策行动。这是民族问题上的列宁主义。它只能使在非集中化、自治和联邦原则基础上重建俄国这样简单而合法的事情本身变得极端复杂和困难。^③ 社会革命党以维护俄国统一而否定乌克兰民族独立并把独立看做布尔什维克的挑唆行为，实际上是对民族权力与国家统一问题实质的回避。布尔什维克提出的支持乌克兰民族独立是对俄国劳动人民之间在争取民族和社会解放的斗争

① В. М. Чернов, Великая рус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с. 259.

② В. М. Чернов, Великая рус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с. 261.

③ В. Е. Козляков,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вопрос и неонароднические партии, с. 97.

中形成的兄弟般信任的巩固，是民族独立在社会解放基础上的升华。

布尔什维克因发动7月3日起义而使拥护乌克兰独立的民族政策搁浅，社会革命党则支持临时政府派 И. Г. 策里铁里、М. И. 捷列先科与拉达谈判。结果拉达变成预备议会，成立秘书处作为执行机关，同时作为临时政府的地方代表。乌克兰民族运动的问题以乌克兰实现自治而得到解决，但压制了乌克兰人民的愿望。社会革命党与乌克兰社会主义者之间互相攻击对方为民族主义。

同样，按照社会革命党的自治原则，芬兰理应获得独立，并且把独立作为建立相互信任的联邦的基础。切尔诺夫提出的理由是“对于不断发展的民族感情压制得越深，追求摆脱压迫的愿望越强烈。”^① 社会革命党仍然在理论上坚持按照民族主义原则组建军队和国家，反对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以大俄罗斯优势民族的特权解决民族问题，并以革命初期觉醒的被压迫民族远离分离主义的行动为证。但是，社会革命党民族自决的思想还是无法解决沙皇各民族监狱的民族政策给俄国重建带来的困难。

综上所述，社会革命党在战争问题、农业问题及民族问题上虽然在理论上提出了符合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要求，但在行动上没有足够的信心与立宪民主党决裂，致使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与资产阶级的联合政权以失败而告终。

立宪民主党退出了联合政府，策里铁里以支持联合政府为由也退出了联合政府。7月18日，克伦斯基任命 Л. Г. 科尔尼洛夫为总司令，7月25日组建了新一届联合政府。克伦斯基任总理和陆海军部长，社会革命党阿夫克先基耶夫任内部部长、切尔诺夫任农业部长，孟什维克 М. И. 斯科别列夫任劳动部长、А. М. 尼基京任邮电部长，人民社会党 А. С. 扎鲁德内任司法部长、佩舍霍诺夫任食品部长。至于外交部长、财政部长、交通部长和工商部长以及国务总监和宗教事务管理局局长分别由温和无党派人士和立宪民主党担任。^② 温和的标志是政府被称为拯救祖国和革命的政府，同时以7月8日的纲领为政府行动的纲领，即“1. 国家和革命处在危险之中；2. 临时政府宣布为拯救革命的政府；3. 为了恢复军队的组织和纪律，为了和一切反革命和无政府现象作斗争，为了实现宣言中提到的所有措施，承认

^① В. М. Чернов, Великая рус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с. 272.

^② А. А. Смирнова, От коалиции к катастрофе Петроградские социалисты в мае-ноябре 1917 года, с. 136.

临时政府拥有无限权力；4. 社会主义部长向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汇报工作，一周不少于两次”^①。

二 第二届联合政府

7月8日通过的政府纲领宣称第二届联合政府为拯救祖国和革命的政府。祖国和革命是有着特定内涵的概念。首先，祖国已经不是沙皇俄国，而是所有人的祖国。无论是社会主义者还是资产阶级都是国家中平等的一员，不能有任何特权，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参加临时政府的杜马成员说：“如果政府不放弃联合国家所有有生力量的思想，政府就不应该以联合政府的名义执行让国家服从社会主义少数派的政策。更加不能容忍……的是，正是某些社会主义政党的活动，造成军队的分裂、公民世界的最终毁灭和劳动纪律的削弱。”杜马委员会最后得出结论：现在的任务“不在于深化政党的任务，而在于团结所有的政治派别和所有的社会阶层”。^② 克伦斯基从参加政府开始就准备与自己的政党脱离，自己承担责任。^③ Ф. И. 唐恩代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提出了共同方案，建议组成“强大的革命民主政府”并让所有的人都参与其中。唐恩的建议除了布尔什维克反对和孟什维克国际派弃权之外，没有人提出异议。^④

然而，除了人员和比例作了调整之外，参加政府的仍然是社会主义者和立宪民主党。他们之所以还能够团结起来，不是由于他们放下了彼此的纷争，而是由于外在的形势使然。是外在而不是内在的原因使得俄国出现了被迫的防御。外在的原因是出于一种安全的需要，而内在的原因则能够为了共同的目标积极进取。在俄国已经不具备打仗条件的1917年实现积极进取、扭转战争的局势必须如托洛茨基所讲的，让“人民和军队感到和深信，革命是他们的革命，政府是他们的政府”。^⑤ 而让人民和军队有这样的感觉就必须发动让他们感觉到可以为之献身的革命。

米留科夫、古契科夫以及利沃夫之所以退出政府，其根本原因在于不

① П. Н. Миллюков, История второй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Т. 1, Ч. 2, софия, Российско-болгаское книго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1921, с. 21.

② П. Н. Миллюков, История второй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Т. 1, Ч. 2, с. 22.

③ П. Н. Миллюков, История второй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Т. 1, Ч. 2, с. 38.

④ А. А. Смирнова, От коалиции к катастрофе Петроградские социалисты в мае-ноябре 1917 года, с. 137.

⑤ 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献给被遗忘的先知》，第243页。

认同工人农民的社会主义革命。米留科夫曾说，共产主义革命是一种乌托邦，俄国还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俄国的革命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正是这个因素使得国际社会主义联合起来，形成了一股大的潮流。战争的失败使得工农群众倒向了布尔什维克，革命从二月转向了十月。^①米留科夫把二月革命看做不流血的理性的革命，从根本上认同资产阶级革命，忽视了战争给俄国带来的国际范围内的革命。虽然米留科夫认识到战争对俄国革命的重大影响，认为十月革命是布尔什维克巧妙地利用了战争给革命带来的机会，实现了革命消灭战争的结局，但是，米留科夫还是以俄国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而停留在马克思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②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虽然承认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景。然而，由于他们仍然停留在从客观条件看待资产阶级革命上，虽然战争给他们提供了执掌政权的机会并通过战争的失败一次又一次地把他们推上了独立执掌政权的前台，但是，他们仍然抱着理论教条不放。孟什维克说：“因为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政府的权力的任务不是别的，而是保证资产阶级的统治，则很清楚，社会民主党在那里没有什么事可做的；它的位置不在政府中，而是在反对派中。”^③切尔诺夫在1917年8月6日的第七次社会革命党扩大党务会议上说：“支持新的联合政府、拥护社会革命党代表在政府中的行动。”^④

社会革命党特别是切尔诺夫由于受到第一届联合政府米留科夫和利沃夫的攻击，不断提出建立没有立宪民主党的联合政府，同时提出保持对临时政府行动的批评和对党员在政府中工作的所有同志行为的监督，支持革命的政府。

根据以上的叙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第二届联合政府完全成为把祖国与革命对立起来的政府。如果说从祖国的角度，资产阶级、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等社会主义者还有合作的可能性的话，那么，从革命的角度来看，俄国面临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困扰。社会革命党发生了分裂。如果说右派坚持与资产阶级政府联合，为了祖国宁可放弃革命，那

① П. Н. Милуков, Россия на переломе большевистский период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с. 40, 52.

② 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献给被遗忘的先知》，第249页。

③ 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献给被遗忘的先知》，第250页。

④ А. А. Смирнова, От коалиции к катастрофе Петроградские социалисты в мае-ноябре 1917 года, с. 147.

么，左派则彻底走向了建立清一色的社会主义政府，并通过一系列类似废除死刑、取消实施镇压时的行政虚妄、在民主原则上实现和平、实施土地法以及按照党的纲领调节农村的社会关系等措施，直接导致军队的瘫痪、战争的失败和政府的垮台。社会革命党把自己的力量都用于争夺地方权力以及立宪会议的召开，按照自己的原则重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由于社会革命党不能从信仰的高度确立工农民主专政，错过了社会革命党在8月城市杜马选举中获得的群众优势。据切尔诺夫统计，在彼得格勒市杜马中，社会革命党起初占54席，后来补充选举达到75席，是所有政党中最大的政党。在莫斯科杜马选举中，社会革命党占226席，占总数的60%。^①

俄国从社会发展水平来讲不具备发动世界革命的力量，但是德国的劳资妥协开辟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景，这就是恩格斯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讲的“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②德国通过战争传递出来的劳资妥协的社会主义模式对俄国的社会主义的建立构成了挑战。而战争中的俄国如果不通过革命的方式采取社会主义的步骤就不可能把政府变成人民的政府，同样也不可能结束战争。列宁明白了这是一种价值观的革命，从此不再纠缠于俄国是否具有社会主义革命条件这样的教条，也把纠缠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立宪民主党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驱逐出政权，建立了“劳资妥协”的工农民主专政。列宁的举动不仅完成了社会转型，而且能够把俄国从战争的泥潭中拉出来。这就是列宁所说的让俄国政府失败的含义。

列宁的举动让当时的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者都无法理解，7月3~5日游行之后，布尔什维克被送进了监狱。仍然在原有的轨道上徘徊的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者继续着价值观上对立但政治上又不得不联合的策略。这直接导致莫斯科国务会议的召开和科尔尼洛夫叛乱的发生。

莫斯科国务会议是第二届联合政府在纲领和行动上的一次联合行动，旨在确立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国务会议8月13日开会，参加会议的有2000人，其中来自工兵代表苏维埃、农民代表苏维埃和前线的共300人，来自第四届国家杜马的300人，来自城市和地方自治局的代表400人，来自工商业组织的代表120人，来自农民经济协会和地主组织的100人，来自大学和高等

^① В. М. Чернов, Великая рус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с. 369.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517页。

校的 100 人，还有 150 人来自工人组织，75 人来自劳动知识分子组织，300 人来自合作社，80 人来自民族组织。资产阶级与劳动人民完全对等。^①

克伦斯基召集莫斯科会议的目的就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内团结俄国的有生力量。特别是在镇压了布尔什维克 7 月 3 ~ 5 日的起义之后，他显得更有信心。他的依据是从 1917 年春天沙皇垮台以来，士兵和军官关系得到改善，开小差的开始减少；农民暴动尽管还存在，但比之 1905 ~ 1907 年少很多；工厂恢复了生产，虽然问题还很尖锐，但是已经不是工人和行政人员之间的不理解造成的，而是封锁造成的；8 月，多数地方自治局和城市管理局的重组已经发挥作用，苏维埃在完成推翻沙皇任务之后也处在瓦解的边缘。现在的任务就是团结国内所有的社会阶层。^②

但是，克伦斯基把极右派的君主主义分子和极左派的布尔什维克排除在外，并把他们的行为称为叛乱。科尔尼洛夫接替总司令之后和西南前线的 А. И. 邓尼金改变了对政治委员和军事委员会的态度，^③ 坚持有义务与政治委员和军事委员会合作的军官遭到了冷遇并被保守的支持旧制度的军官替代。8 月 13 日，前线执委会副主席卡钦斯基给军事部长和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写信指出，如果执行不经中央民主组织同意的政策将引发军队的骚乱。军政部长萨温科夫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是由于彼此的不信任造成的结果。克伦斯基干脆把军队中出现的军官组织看做军事阴谋的中心。^④

对于布尔什维克领导的 7 月 3 ~ 5 日的起义，克伦斯基定性为叛乱。在克伦斯基眼里，布尔什维克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行为为奸细行为，并指证列宁从瑞士回到俄国获得了德国人的帮助，作为回报，列宁在 4 月 21 日、5 月 5 日、6 月 9 日和 7 月 4 日通过和平示威促成了与德国的谈判。7 月的起义失败之后，列宁与德国单独签署条约的愿望没有实现。克伦斯基指责列宁不仅发动内战，同时还拿了德国人的钱，达到 8000 万金卢布。^⑤ 克伦斯基想不通的是，为什么德国能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实现劳资结合，

① П. Н. Миллюков, История второй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Т. 1, Ч. 2, с. 101.

② А. Ф. Керенский, Россия на историческом повороте мемуалы, с. 303 - 304.

③ 俄国在二月革命之后实行了军队民主化，对军队高层指挥官进行了清洗，废除了军事战地法庭，实行对军官的政治忠诚监督的政治委员制度。军队中还设立了掌管现有武器的士兵水兵选举产生的委员会，监督军官的活动等。

④ А. Ф. Керенский, Россия на историческом повороте мемуалы, с. 278.

⑤ А. Ф. Керенский, Россия на историческом повороте мемуалы, с. 287.

在俄国却出现劳资对抗，并以此建设社会主义的乌托邦，支援国际革命。

克伦斯基从7月中旬开始就通过调离科尔尼洛夫的办法使军队忠于自己，通过镇压布尔什维克、削弱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办法实现民主政权的确立。但在国务会议上仍然致力于资产阶级和工人、农民的联合，并把社会主义政党里铁里和大工业、商业资本的代表 A. A. 布勃利科夫的握手当做两个对立的阶级为了祖国的利益而相互做出的让步，^①把科尔尼洛夫恢复军队的战斗力和布尔什维克的失败主义看做对革命的背叛，看做反革命。

国务会议团结有生力量的努力没有成功，随后克伦斯基把主要精力用于同科尔尼洛夫争夺权力。

根据第七次党务会议的要求，社会革命党主张在第一时间废除死刑；消除行政机关在捍卫革命时采取的反对集会、出版和个人不可侵犯措施时的恣意妄为；积极推进在民主原则之上实现和平的外交政策；立即颁布并实施土地法，在党的纲领框架内调节农村社会关系；实现对本国产品生产和消费的社会监察机关民主化；通过更换指挥官、加强军事委员会的权威真正实现军队民主化；等等。^②社会革命党的政策仍然在第一届联合政府基础上运行，其效果已经遭到社会革命党少数派，即社会革命党左派的质疑。他们已经深刻地认识到俄国的问题已经不是联合问题，而是在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基础上建立政权，采取符合社会主义价值的社会经济措施，如立刻建议交战国在所有战线签署停战协定，有效而实际支持斯德哥尔摩社会主义代表会议；立刻把所有土地转交给土地委员会管理，最大限度地征收土地占有者的财产税，对生产、交换和所有生活必需品实行革命化的监督；立即废除死刑，取消所有的行政处罚和命令，停止对革命社会主义左翼（布尔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监视，恢复后方和前线出版和集会的自由，解散国家杜马和国务会议，采取坚决的措施镇压反革命的活动；最主要的是确立清一色的政权对工兵代表苏维埃和民主化的地方自治机关的责任关系。^③这样，社会革命党实际上拒斥了。

为了在政策上支持克伦斯基，社会革命党派切尔诺夫和阿夫克先基耶

① А. Ф. Керенский, Россия на историческом повороте мемуалы, с. 305.

②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17.2 - 10, т. 3, ч. 1, с. 720.

③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17.2 - 10, т. 3, ч. 1, с. 721 - 722.

夫在第二届联合政府中分别担任农业部长和内务部长。但是，无论是克伦斯基还是社会革命党都简单地把科尔尼洛夫和布尔什维克的行为归结为搞阴谋活动，不能比照德国的社会改革模式——劳资合作推进俄国的改革，深化革命。然而吊诡的是，战争推动了不能放弃各自阶级偏见的俄国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实现合作，导致不是资产阶级专政就是工农民主专政局面的出现。专政不是永恒的，它是德国社会发展模式对俄国社会发展模式的强加。这种国内战争式的转向是非常痛苦的，但客观形势的发展让俄国别无选择。

这样，仍然局限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认识的社会革命党虽然认识到参加国务会议没有必要，但是还是派代表参加了会议。在会议上发言的是社会革命党右翼代表阿夫克先基耶夫和布列什科—布列什科夫斯卡娅。他们还是从保护国家的角度看待俄国的政权，其实是不能割舍沙皇政府获得的既得利益，是保守派。如布奶奶对工人们说：“同志们，你们不只是口头上说说，也要到人民和军队中去工作。现在，俄国只为军队工作到最后一个人……同志们，我不知道在哪里可以亲眼看到你们，但我要请你们记住，你们的劳动像军队的劳动一样，同样是对我们共和国的拯救。”布奶奶又有产者说：“公民们，你们大家都是智慧的人，因为你们常年学习，你们去帮帮俄国吧。你们在哪里？你们的知识用在了哪里？你们的奉献在哪里？我们没有感觉到！现在，当你们自己知道，人们是这样需要启蒙，可启蒙在哪儿？谁参与了，谁为之说了什么，歌颂了什么？我没有看到，没有听到。它像从前一样依然没有朋友，没有老师，没有辅导员，没有长者。公民们，这是个巨大的错误！公民们，在沙皇时代我们就说俄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有才能的人民，奉献的人民，只是沙皇妨碍了他们的表现。公民们，现在谁也不再妨碍英勇的俄国人民了！”^①

布奶奶的话是朴实的，但是她的呼吁不能填平横亘在有产者与工人们中间的文化鸿沟。科尔尼洛夫将军企图让军事领袖重掌军权，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军事法庭的镇压，并把镇压的矛头在很大程度上指向苏维埃，特别是苏维埃的左翼。^② 而克伦斯基从一开始就把科尔尼洛夫的举措看做恢复旧

^①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17.2 - 10, Т.3, Ч.1, с. 732.

^② 德·阿宁编《克伦斯基等目睹的俄国一九一七年革命》，丁祖永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第282页。

制度的阴谋，最终造成双方互相设置障碍。设置障碍的结果不是造成资产阶级的专政就是无产阶级的专政。在科尔尼洛夫等将军们把军队民主化看做对国家的背叛时，苏维埃则把取消民主化看做取消革命，最终引发群众的愤怒。^①

米留科夫说，科尔尼洛夫与克伦斯基的斗争不是革命和反革命之间的斗争，而是实现同一个纲领的两种不同方法之间的斗争。^②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意义上来讲，这种讲法是正确的。但问题的关键是俄国不仅要进行资产阶级革命，而且还要进行劳资合作的社会主义革命；不仅要提高人民的独立自主的能力，还要让人们感受到劳资利益关系背后的相互关爱。俄国无产阶级还停留在等级社会阶段，不仅不能对不能自立的工农大众做出利益上的让步，还以农民愚昧为由对其加以藐视。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尽管策里铁里和社会革命党右派特别重视与资产阶级的握手言和，但正如米留科夫所说的，这种联合是缺乏信任基础的。科尔尼洛夫提出的让军队恢复纪律凭借的不是对群众利益的迎合，而是凭借着对国家和自己的良心。^③良心是什么？良心实际上就是对祖国和人民的信仰。由于俄国缺乏精神和政治上的信任，科尔尼洛夫的举动在克伦斯基的眼里变成了自私自利；而布尔什维克的行为变成了对祖国的背叛。既然俄国不能恢复到自由主义的改革之路，俄国只有实行既指明俄国发展方向——社会主义，又满足工农大众希望的布尔什维克道路——工农民主专政道路。克伦斯基由于抱着资产阶级和劳动大众联合的“民主”社会革命原则不放，最终逼迫科氏走上政变的道路。

正如克伦斯基所怀疑的，早在8月3日，科尔尼洛夫及其追随者就开始执行破坏道德精神和军队纪律的工作，即他们在得知德国即将进攻里加的情况下仍然在集会、报刊和司令部简报上大肆诽谤军事委员和军事委员会，给士兵对军官的信任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④布尔什维克退出战争的口号在军队中广泛流传。在德国没有进攻前，里加就陷入了俄国军队与布尔什维克的拉脱维亚射击军之间的内战前夜。科尔尼洛夫在8月14日就警告德国

① *Лев троцкий*, Рус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истор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совещание в москве. <http://www.1917.com/marxism/trotsky/HRR/2-7.html>.

② *П. Н. Миллюков*, История второй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Т. 1, Ч. 2, с. 98.

③ 德·阿宁编《克伦斯基等目睹的俄国一九一七年革命》，第266页。

④ *А. Ф. Керенский*, Россия на историческом повороте мемуалы, с. 278.

军队已经叩响了里加的大门，里加随时有陷落的可能。但是，里加的陷落只会增加士兵对科尔尼洛夫的仇视。8月14日，喀山炸药厂和弹药仓库起火，引发了爆炸。爆炸毁掉了将近100万发炮弹和12000挺机关枪。^①8月20日，科尔尼洛夫建议对铁路员工举行的大罢工采取镇压措施。8月21日，科尔尼洛夫向后方和受起义威胁的农村、县乡委员会发布法令，对地方当职人员窝藏开小差者严惩。

克伦斯基从联合的策略出发，派军政部长萨温科夫去大本营进行军队健康化的谈判。萨温科夫根据自己的纲领，将保留选举产生的军事组织作为在战士中贯彻纪律和公民意识的强大手段，同时保证平静地对待前线与后方拯救军队和国家所采取的严厉措施。但是军事委员会不能保证士兵对军官的尊重，造成军队的瘫痪。科尔尼洛夫要求取消军事委员会，但得到的答复是逐渐取消。原因在于克伦斯基要看工兵代表苏维埃的脸色行事。科尔尼洛夫认为克伦斯基太软弱，很容易受到别人的影响。科尔尼洛夫要求改组政府，建立强大的国家政权，即用非社会主义者代替社会主义者。萨温科夫同意科尔尼洛夫的观点，但是在各政党参与政治的情况下，希望有克伦斯基参加政府。科尔尼洛夫最后答应萨温科夫支持克伦斯基并履行诺言。^②

但在萨温科夫离开大本营回到首都之后，利沃夫来到大本营。临时政府在8月26日讨论萨温科夫的方案，当晚利沃夫带着科尔尼洛夫的新方案来到克伦斯基这里。根据米留科夫的看法，利沃夫并不代表任何人，他有自己的政治主张，主要目的是通过谈判解决政府的危机，吸收有生力量建立强大的政权。利沃夫以克伦斯基的名义来到大本营，目的是劝说军队和政府合作。科尔尼洛夫继续谴责临时政府的不作为，希望把前后方的权力都交给总司令，防止布尔什维克在8月28日和9月2日发动推翻临时政府的起义。科尔尼洛夫通过利沃夫给克伦斯基带去三个方案：第一个方案是克伦斯基退出政府；第二个方案是克伦斯基参加政府；第三个方案是由科尔尼洛夫专政。^③

科尔尼洛夫通过利沃夫给克伦斯基传递消息不仅表现出自己的不顺从，而且自认为这是对克伦斯基和萨温科夫生命的拯救。克伦斯基立刻意识到

① 德·阿宁编《克伦斯基等目睹的俄国一九一七年革命》，第286~287页。

② П. Н. Миллюков, История второй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Т. 1, Ч. 2, с. 159, 179.

③ П. Н. Миллюков, История второй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Т. 1, Ч. 2, с. 195.

这是政变的开始。为了利用利沃夫实现对科尔尼洛夫的镇压，克伦斯基首先让利沃夫写下科尔尼洛夫和利沃夫的谈话记录，作为科尔尼洛夫向临时政府发出的最后通牒。通牒的内容如下：第一，科尔尼洛夫将军建议宣布彼得格勒处于戒严状态；第二，把军事民事所有政权转交给最高总司令；第三，所有的部长辞职，不排除总理，把临时管理权交给副总理直到总司令组建政府。^①

克伦斯基是律师出身，懂得证据的重要性。他一方面利用利沃夫写下与科尔尼洛夫的谈话核实科尔尼洛夫的真实意图；另一方面通过这种方式搜集证据。利沃夫一直试图通过和平方式解决政府与军队的争端，恢复俄国的生机，配合克伦斯基完成了这样的行为。随后，克伦斯基把萨温科夫和 H. B. 涅克拉索夫叫来，验证利沃夫写下的文件。克伦斯基的目的是要萨温科夫打消对科尔尼洛夫的幻想，接受科尔尼洛夫叛乱的思想。但萨温科夫还是宁可相信这是一场误会，并奉劝克伦斯基不要过早下叛乱的结论。克伦斯基没有听从劝阻，还是召集最高军事部门寻求对付科尔尼洛夫叛乱的对策。

米留科夫认为克伦斯基倒向左派拯救了灵魂却摧毁了祖国，8月26日（讨论萨文科夫方案）就已经预定了10月25日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②托洛茨基认为这是克伦斯基和科尔尼洛夫共同策划的反对俄国革命的阴谋，提出的理由就是他们共同建立了保卫国家的专政。^③参与科尔尼洛夫叛乱的邓尼金几乎同时宣布拯救俄国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专政。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科尔尼洛夫的行为与其说是一场叛乱，不如说是一场运动更为确切。^④

从这场叛乱的结局来看，科尔尼洛夫在克伦斯基的一步步引导下走向了真正的发难。当接到克伦斯基宣布叛乱的消息之后，科尔尼洛夫决定派 A. M. 克雷莫夫率领的第三军团挺进彼得格勒。他的行动目的就是把首都从背叛者的手中解救出来。克雷莫夫将军率军向首都进发的时候，半路上受到了士兵的攻击。士兵提出的理由非常简单，科尔尼洛夫恢复军队的死刑是对士兵权利的践踏，而克伦斯基反对科尔尼洛夫则给予了他们自由。克雷莫夫在失去科尔尼洛夫的支持的情况下开枪自杀，科尔尼洛夫的支柱失

① П. Н. Миллюков, История второй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Т. 1, Ч. 2, с. 207.

② П. Н. Миллюков, История второй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Т. 1, Ч. 2, с. 216 - 217.

③ 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献给被遗忘的先知》，第270页。

④ 德·阿宁编《克伦斯基等目睹的俄国一九一七年革命》，第288页。

去了。为了最终平息科尔尼洛夫大本营的叛乱，克伦斯基让阿列克谢耶夫当中间人，说服科尔尼洛夫投降。科尔尼洛夫放下了武器，叛乱解除了。但从科尔尼洛夫发动政变的情况以及解决的结果来看，俄国面临着革命的困局。

这个困局不是自由派、民主派以及布尔什维克发动的阴谋，而是在战争失败的大背景下，俄国的传统体制即人们为了一个纯粹的弥赛亚的第三罗马的空想而耗尽了人民的生命的必然结果。战争失败让人怀疑这样的弥赛亚是否存在。德国劳资合作的新的现代化模式进一步昭示了长期压制人的愿望而满足抽象祖国的需求是一种过时的理念。沙皇成为这种抽象祖国观念的牺牲品，没有把人民的祖国这种观念落到实处的自由派、革命民主派也相继成为这种抽象观念的牺牲品。当关于祖国的观念从第三罗马弥赛亚的沙皇祖国转变成为人民的利益至高无上的祖国的时候，心灵的救赎是必然的。克伦斯基在抽象的祖国与心灵的救赎之间倒向了心灵救赎，从此开启了心灵救赎基础上对祖国的重构，这便是革命。军人出身的科尔尼洛夫忠诚于第三罗马理念下的祖国，最终以失败而告终。相反，克伦斯基在革命理念的感召下顺应了历史的潮流，为列宁在心灵救赎基础上重建祖国奠定了基础。

但是，克伦斯基倒向革命是妥协的产物，也是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者联合政策的结果。克伦斯基倒向革命民主派并没有从根本上明白俄国革命的真实含义。如果说克伦斯基召开莫斯科国务会议是向资产阶级请教重建国家的方略，那么在发生科尔尼洛夫叛乱之后，克伦斯基再次转向社会主义者，这就是8月31日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的在9月12日，后延期到9月14日召开的全俄民主会议。^①克伦斯基召开全俄民主会议无非是从向资产阶级请教转为向民主主义者请教，虽然显示了社会革命党向人民问询真理的虔诚态度，但却在支离破碎的社会意见面前无所适从，从而为列宁主义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三 关于与资产阶级联合的道德追问

科尔尼洛夫暴动以民主派的胜利而结束。但是科尔尼洛夫提出的问题并没有随着科尔尼洛夫暴动的失败而结束。这就是爱国与革命的兼容问题。

^① 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献给被遗忘的先知》，第281页。

科尔尼洛夫以爱国的名义要求恢复军队的死刑，不惜以牺牲生命为代价保卫祖国，而这样的举动在民主派的眼里则成为恢复君主专制制度的手段。科尔尼洛夫为保卫祖国而恢复死刑与民主派提出的恢复君主专制制度显然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科尔尼洛夫作为军队总司令执行的是保卫祖国的任务，没有价值观的问题。而民主派提出的则是科尔尼洛夫遵循的价值观问题，即科尔尼洛夫不是抽象祖国的保护者，而是革命纲领的执行者。

克伦斯基虽然以革命派的名义阻止了科尔尼洛夫的叛乱，但是，克伦斯基仍然无法对民主派放心，更不相信俄国脱离有产资格分子^①会保持民主和自由。克伦斯基提出的一个办法就是脱离政党的指令。如克伦斯基在回答政府和政党的关系时说：“作为政府首脑不可能执行来自某个政党的命令。”^② 克伦斯基自动脱离政党的约束招致了人们对他独裁的批评。如米留科夫说：“总理和总司令之间已经公开讨论科尔尼洛夫和克伦斯基本人辞职和为了建立真正的专政而发动国家政变的可能性和愿望问题。我们看到，克伦斯基早在莫斯科就已经盼望这种冲突的现实结局。最终他倾向于让自己在获得的总理的无限权力后成为总司令，接替科尔尼洛夫的位置。”^③ 托洛茨基则从正面肯定了出现“仲裁者、独裁者和拿破仑·波拿巴”的必要性。^④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也同意授权克伦斯基完全自由地组建新的临时政府。这样，俄国几乎所有的派别都同意建立强有力的政权。

但是，俄国究竟开展什么样的革命并不完全取决于俄国社会发展本身，而是取决于俄国能否通过革命体面地赢得和平。俄国有产资格分子和革命民主派相互指责的原因也在于无法体面地结束战争，以至于出现了或者战争消灭革命、或者革命消灭战争的观点。战争与革命对立的观点是俄国思想困境的表现，从有产资格分子一方来说为了利益重新回到旧的专制统治，其主要的理由就是劳动群众素质低下。如切尔诺夫在评论有产资格分子对无产者的态度时说：“有产者的俄罗斯不相信这里（指城乡劳动者）存在能

① Цензовые 一词可以翻译成有产资格分子。施用勤认为，这是民主派为了避免羞辱资产阶级而发明的一个新名词。但从价值观来讲，革命民主派把立宪民主党等资产阶级政党仍然看成社会的有生力量，是俄国仍然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表现。参见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献给被遗忘的先知》，第280页。

② С. Е. Руднева,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е совещание сентябрь 1917 история форума, с. 45.

③ П. Н. Милуков, Россия на переломе большевистский период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Т. 1, с. 87.

④ 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献给被遗忘的先知》，第286页。

够寻找确定生活形式和新范畴的有生力量，他们看到的只是无政府力量。”^① 切尔诺夫在民主会议上提出联合的理由也是基于对民主派的不充分的信任。切尔诺夫说：“民主从伟大的自我组织开始，有产者的俄国具有管理的经验，在立宪会议召开前有组织政权和立法的机会。”^②

其实战争就是一场革命，一场劳资合作推动的新型现代化模式。俄国在德国进攻的条件下不能有效地结束战争，其根本原因在于缺乏内部合作的一致。给人的直接感觉是似乎有产资格分子和民主派之间不能互相实现包容，都在为各自的利益而战。特别是相对于广大的工人和农民来说更是如此，他们直接要求结束战争，平分地主的土地，提高工资待遇以及军队民主化，等等。从爱国的角度来讲，这些要求是国家处于战争状态下无法实现的，如果实现这样的要求几乎等同于叛国。然而，由于俄国的有产者和劳动者之间缺乏基本的信任，无论命令是有产者发出还是劳动者发出都会造成一方对另一方的压迫，一方对另一方的背叛。而德国不断地利用信任在缺乏信任的俄国制造障碍，以至于出现凡是提出革命要求的反对派或者革命派都被冠以阴谋者的称号，先有发布一号命令的“俄国共济会”，后有充当德国奸细的“列宁”。而在革命者列宁的眼里，坚持民主革命的俄国社会主义者则成为“人民公敌”。

尽管资产阶级自由派和革命民主派以及社会主义者相互指责，但是，俄国的革命仍然在不断推进。资产阶级的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专制制度，这是俄国历史的巨大进步。科尔尼洛夫将军以拯救祖国为由发动的叛乱还是在人民的革命理由面前投降了，虽然科尔尼洛夫反复声明：“我，科尔尼洛夫将军，是哥萨克农民的儿子，向一切和每一个人声明，我个人除了保卫伟大俄罗斯什么也不应该做，我发誓通过战胜敌人的办法把人民带到立宪会议，让人民自己在会议上决定自己的命运、选择自己的新的国家生活。”^③

在科尔尼洛夫得不到人民的信任之后，俄国的革命派联合起来，着手拯救祖国和革命。祖国与革命的联系说明民主派已经把革命推进到民主共和国的程度。如1917年9月1日，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在8月31日召开的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上通过的共同决议中说：“立刻

①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17.2 - 10, Т.3, Ч.1, с. 769.*

② *С. Е. Руднева,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е совещание сентябрь 1917 история форума, с. 92.*

③ *П. Н. Миллюков, История второй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Т.1, Ч.2, с. 241.*

召开全俄民主组织和地方自治民主机关会议，应该解决能够把国家带到立宪会议的政权组织问题；在会议召开之前，中央执行委员会建议政府保持自己现有成员并祝贺他们迈出的第一步——宣布建立民主共和国……”^①

建立民主共和国用民主会议的话说就是团结国家的有生力量。何谓有生力量，就是没有参加科尔尼洛夫叛乱的所有的社会组织和政党。这样的组织有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工兵代表苏维埃各州委员会、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合作社、职业联合会、军事组织、铁路联合会、工商业联合会、邮电联合会、教师联合会、地方自治局、民族机关等；用政党称呼就是社会革命党，其中包括护国派、国际派和乌克兰社会革命党；社会民主党，包括孟什维克、护国派、国际派、布尔什维克和乌克兰社会民主党；统一派代表；崩得；社会民主联邦派；社会民主党白俄罗斯小组；劳动团和人民社会党；人民自由党；穆斯林社会主义者；犹太联合社会主义政党；党外社会主义者；乌克兰联邦主义者；吉尔吉斯人民党；犹太人民党；辛迪加；民族民主主义者以及无党派人士。^②

建立民主共和国不仅应该超越阶级界限，而且应该超越民族界限。但是从参加民主会议的组成人员来看，阶级的联合就是有产资格分子与劳动人民的联合；民族的联合就是斯拉夫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联合。但从以往的经验来看，阶级联合由于有产资格分子不能通过有利于农民的土地改革而失败；民族联合由于不能承认乌克兰的自治、波兰和芬兰的独立而名存实亡。有产资格分子的代表立宪民主党经过了两次政府危机之后基本上退出了联合政府，而占据民主会议主流的社会主义者以及所代表的社会组织几乎占据了多一半的席位，如社会革命党占据 293 个席位，社会民主党占据 274 个席位，工兵代表苏维埃 100 个席位，农民代表苏维埃 100 个席位，合作社 150 个席位，职业联合会 100 个席位，军事组织 84 个席位，等等，剩下的便是少数民族组织和无党派人士。社会主义者提出了进行社会改革、召开立宪会议以及实行民族自治等主张，但是，真正实施则在立宪会议之后，战争胜利之后。

战争胜利之后解决俄国的社会问题意味着仍然把革命停留在战争之前，换句话说，在社会主义者的眼里，战争并不是革命，从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定义来讲，社会主义者没有最终放弃沙皇俄国的战略目标，其改

① С. Е. Руднева,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е совещание сентябрь 1917 история форума, с. 49.

② С. Е. Руднева,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е совещание сентябрь 1917 история форума, с. 50, 60.

革的程度也不可能超出自由主义者的改革力度，最多只是在斯托雷平土地私有制改革基础上增加农民的改革要求。如果从消灭土地私有制角度来看还是对已有的改革成果的消灭以及劳动者对有产资格分子的破坏。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攻击社会主义者用民主的方法实现社会主义的主张，而布尔什维克则把社会主义者的做法称为对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的背叛。

社会主义者的尴尬已经不是如切尔诺夫所说的立宪民主党不好说话，也不是布尔什维克搞一党专政的问题，而是社会主义者仍停留在法国人道主义基础上提出的一般的人道人权，否定在德国劳资合作的社会转型模式逼迫下的俄国的劳资互让。

最终布尔什维克对于民主会议的革命方案坚决予以反对，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民主派看来严重背叛祖国的观点。第一，无须赎买地废除地主土地私有制，把它交给农民委员会管理，直到召开立宪会议，保证最贫穷的农民的农具。第二，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生产和分配、银行集中化的监督，对银行和最重要的工业部门如石油、煤和冶金等的监督；全社会的义务劳动；军工转民用的紧急措施，用固定价格组织工业产品供应农村。为拯救国家和经济崩溃的目的，对大资本和财产课以重税。第三，宣布秘密协议不再有效，立即向所有交战国人民建议共同实现民主和平。第四，保障居住在俄国境内的少数民族的自决权；立即废除对芬兰和乌克兰的镇压措施。应该颁布的紧急措施包括：第一，停止对工人阶级和它的组织的所有镇压；在前线废除死刑，恢复所有民主组织在军队中宣传鼓动的充分自由；肃清军队中的反革命成分。第二，选举产生地方组织的委员和担任其他职务的人。第三，全面武装工人，组织赤卫队。第四，解散国务会议和国家杜马，立即召开立宪会议。第五，消灭所有等级（贵族等）特权，公民完全平等。第六，实行8小时工作制，推行全面的社会保险。^①

布尔什维克的决议显然与资产阶级的观点完全对立，不仅宣布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与有产资格分子的对立，而且宣布俄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前驱与资产阶级国家的对立；不仅公布俄帝国与同盟国之间的秘密条约，而且宣布保障俄国境内少数民族的自决权。这些对立对于保护俄罗斯帝国利益不受损失的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无异于背叛祖国。但是，从布尔

^① 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献给被遗忘的先知》，第292页。

什维克的角度来看，以上措施是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必要步骤。因为布尔什维克非常清楚地知道，“俄国革命是在高度发达的世界资本主义时代展开的，在这里，资产阶级民主已经踪迹皆无，发号施令的是帝国主义，因此希望在于，在这个时代中，俄国无产阶级虽然年轻，但已经是革命力量高度集中的阶级，在这个时代再对我们说，让我们等待资产阶级民主的复活，它的努力，以便与它结盟。这是最大的乌托邦，这是有史以来所能创造的最大的幻觉”。^①

托洛茨基代表布尔什维克说出的这样一番话具有强烈的矛盾性。从常理来讲，经济文化依然落后的俄国只能慢慢地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甚至按照社会革命党的观点还要向后退却，实行土地的社会化与合作社。但是，若从俄国所遭遇的德国的巨大挑战来说，俄国只能相信依然年轻落后的无产阶级具有无限的创造力，而不是资产阶级所说的无政府的破坏力量。如果没有信心，托洛茨基所说的话一定会被认为是胡话，而不是相反。布尔什维克对社会主义民主派的资产阶级民主观点的推进直接导致了利用无产阶级政权建设社会主义。这就是德国模式给俄国社会发展带来的胁迫引发的布尔什维克对整个俄国资产阶级以及社会主义者带来的胁迫，这就是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布尔什维克完成的革命采用了专政的手段，但是，这种专政已经不再把无产阶级和农民当做奴隶了，而是俄国社会的主人，这是一种范式的剧烈转换，需要对社会主义革命坚定不移的信仰和教育上的不断灌输。布尔什维克取得了胜利，但是，跨越式的发展引发的却是极为严重的社会动荡，造成围绕信仰斗争的国内战争。

经历了几次政府危机的社会革命党领导人切尔诺夫也意识到了群众的创造性力量，由于没有在信仰的高度上认识他们，所以在行动上总是迟疑徘徊。在9月10日召开的社会革命党第六次代表会议上，切尔诺夫一方面承认焕发苏维埃的生机，督促加快土地问题的解决，把苏维埃看做革命依靠的对象，但另一方面又仅仅根据经验来评判立宪民主党的消极怠工，忽视了怠工背后的价值观的因素。结果切尔诺夫越在土地社会化问题上向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做出让步，即通过劳动定额肯定土地私有制的价值，就越激发立宪民主党对社会革命党的憎恨。与此同时，切尔诺夫虽然凭借经

^① 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献给被遗忘的先知》，第288页。

验越来越意识到苏维埃的重要性，在会议决议中提出在清一色和对民主派负责的原则之上建立中央革命政权；但是，清一色的政权并不意味着建立完全不同于资产阶级的人民政权，文件只是提出了建立对民主派负责的政权。^①

切尔诺夫的革命政权并不是根据自己党的纲领加以建设的，他把建立政权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国内民主派的拥护上面，由此他提出确立一个明确的纲领，这个纲领是任何人都可以接受的，即便不是社会主义的，而只是真正的民主派的纲领也行。^② 切尔诺夫为联合而联合的策略方针变成了如何团结国内的有生力量。首先社会革命党的会议决定着手召开民主会议，作为社会革命党寻求社会团结的重要手段。其次民主会议由于参加者的层次太杂，同时缺乏统一的意见，变成一场讨论是否需要进一步联合、与谁联合的辩论会。

由于作为社会革命党核心的切尔诺夫不坚持社会主义原则，更没有期望建立以社会革命党为核心的革命政权，在解决革命危机的问题上，社会革命党陷入了分裂。

首先，以阿夫克先基耶夫社会革命党右派坚持建立联合政权，不仅与民主派联合，而且与资产阶级和工业家联合。提出的理由很简单：一方面国内的形势非常复杂；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排除了政府的联合，那么所有的重担就会落到民主派的肩上。^③

其次，以 Л. С. 扎克斯、П. П. 杰康斯基、А. 施赖德尔、屠鲁多夫斯基、阿尔加索夫、И. И. 布尔施泰因、卡姆科夫、斯皮里多诺娃为代表的左派认为联合是不可能的。因为即便非民主派的成分通过了民主派的纲领，也不可能付诸实施。对于社会革命党来说，放弃农业工业领域的积极斗争是不可能的。“革命号召我们，如果其他人对政权实施怠工，那么我们就把政权夺在手中。”^④

①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17.2 - 10, Т. 3, Ч. 1, с. 758.

②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17.2 - 10, Т. 3, Ч. 1, с. 774.

③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17.2 - 10, Т. 3, Ч. 1, с. 766.

④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17.2 - 10, Т. 3, Ч. 1, с. 766.

1917年9月14~22日，民主会议在彼得格勒召开。经过激烈的辩论，会议通过了以齐赫泽在莫斯科会议提出的民主纲领，以776票赞成、688票反对通过了联合原则。切尔诺夫宣布弃权。^①在H. C. 齐赫泽、策里铁里、唐恩、A. 戈茨、B. B. 科斯京、A. M. 贝尔肯海姆、C. П. 马祖连科、Г. Д. 库钦和阿夫克先基耶夫的提议下成立预备议会，阿夫克先基耶夫被选为会议主席。新成立的政府对预备议会负责。

预备议会是类似缙绅会议的咨询机构，它的成立标志着人们对民主统一思想幻想的丧失。^②9月23日成立的新政府不仅加入了立宪民主党，就是新成立的预备议会也有120名资产阶级地主代表，占整个议会代表的四分之一。

民主会议的结果标志着建立清一色社会主义政府的失败。社会革命党虽然提出迅速把土地转交给土地委员会，军队迅速民主化，加速召开立宪会议，但是，没有能够抵制社会革命党右翼与资产阶级的联合。切尔诺夫的努力失败了。联合不仅使得社会革命党不能迅速解决社会问题，凝聚社会民主力量，相反背上了背叛革命的恶名。正如莫斯科市议会主席米诺尔所说：“以前落到沙皇头上的所有罪恶正落到民主派头上，它似乎为推翻民主派以便利用更有效的方式改善国家的物质生活做好了心理准备。”^③这就是布尔什维克的革命。

第四节 苏维埃与立宪会议的较量

一 布尔什维克的发难

早在民主会议进行之中，布尔什维克就揭露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与有产资格分子相勾结，策划扼杀革命工人、士兵和农民的共同步骤。如布尔什维克在民主会议通过的关于全俄民主会议的决议中认为：“拼凑的全俄民主会议一点儿也没有改善混乱的形势。相反，正是因为人为的选择，它无力解决革命政权的问题，它使革命民主派的软弱无力昭然若揭。同时，

^① С. Е. Руднева,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е совещание сентябрь 1917 история форума, с. 186.

^② С. Е. Руднева,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е совещание сентябрь 1917 история форума, с. 234.

^③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17.2 - 10, Т. 3, Ч. 1, с. 807.

它在自己的内部把实质上是反民主的右翼团结起来，后者对革命民主派提出最后通牒，随时准备转到公然反革命的营垒中，巩固有产资格分子的真谛，以此为反革命冒险开辟空间……所谓的预备议会事实上变成了这样的组织，其中给予民主派最保守的部分关键的位置，旨在损害工人、士兵和农民的革命组织。这样的预备议会变成与资产阶级的新一轮的交易、新一轮的拖延立宪会议、继续拖延帝国主义政策，也许还是进一步加深国家崩溃的幌子。”^①

布尔什维克的揭露抓住了社会革命党不能迅速结束战争的把柄，把召开民主会议以及成立预备议会看成了脱离人民、拖延立宪会议、继续帝国主义政策的借口。社会革命党纵然有千万张口也没有办法反驳布尔什维克的揭露，除了社会革命党与资产阶级的联合已经做了证明之外，最主要的是社会革命党在继续赢得战争胜利的条件下无论如何也不能重新赢得逐渐左倾的人民的支持。

布尔什维克的行动是早有准备的。根据克伦斯基回忆，早在8月30日，列宁就给中央委员会写来秘密信件。信件的主要内容是，列宁认为科尔尼洛夫叛乱是俄国事件的转折点，在这个时期必须重新审查并改变策略，避免陷入无原则之中。列宁提出的主要原则就是同克伦斯基作斗争。^② 列宁同克伦斯基作斗争就等同于把克伦斯基的民主派看做同米留科夫一样属于资产阶级，这是切尔诺夫所讲的列宁发动的新革命。新革命的含义列宁在《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一文做了解释。他说：“我们知道，立宪民主党人也同意把民主制教给人民。立宪民主党的女士们同意根据英国和法国最好的资料给女仆们作关于妇女平等的演讲，并且还准备在最近的音乐会上，在露天舞台上，在几千人面前表演接吻……感激不尽的人民将受到一次实例的教育，知道什么叫作共和制的平等、自由、博爱……我们承认，立宪民主党人、布列什科和策里铁里按照他们的方式忠于民主制，可是……在我们看来，为了减轻战争所造成的空前负担和灾难，为了医治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极其严重的创伤，就需要实行革命的民主制。就需要采取上述例子中那种根据贫民利益分配住房的革命措施。无论在城市或乡村，对食品、衣服、靴鞋等的处理，以及在农村对土地等等的处理都应当这样。我们可以立刻吸引1000万人，甚至2000万人组成的国家机构从事这种意义

^① 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献给被遗忘的先知》，第301页。

^② А. Ф. Керенский, Россия на историческом повороте мемуалы, с. 378.

上的国家管理，而这样的机构是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从未有过的……由于受过资本主义长期‘训练’而富有纪律性的工人，他们能够建立工人的民兵并逐渐把它扩充为全民的民兵。觉悟的工人应该进行领导，并且他们也能够吸引真正的被压迫劳动群众来从事管理工作。”^①

列宁发动的新革命与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者提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最大的不同在于，列宁把被压迫人民从过去的奴役的状态下解放出来。这种解放虽然因受到经验和知识水平的限制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是，在战争所带来的巨大压力面前，在工人和农民已经建立起苏维埃组织的情况下，这样的鼓励和行动无疑将焕发出难以想象的力量。这就是列宁认识到而立宪民主党和克伦斯基等社会革命党右派代表没有认识到的思想的力量。列宁不仅提出了这种思想，而且把它变成行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立刻实现和平、土地以及召开立宪会议的要求。

思想引导行动而不是行动决定思想是列宁根据俄国情况对马克思主义的一大改动。这个改动对于迷信俄国只有客观条件成熟以后才可以发动社会主义革命的社会革命党来说，无疑是巨大的理论挑战。这个挑战来自于信仰，而对缺乏信仰执著于物质条件的社会主义民主派来说是无法想象的。虽然社会革命党中切尔诺夫也认识到立宪民主党和克伦斯基由于过分贬低人民的力量而正在失去人民的支持，主张建立清一色的社会主义政权的社会主义革命党左翼甚至公开支持布尔什维克的主张，但是，缺乏信心的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没有任何可能采取这个会导致独裁乃至“背叛祖国”行为的行动。

在列宁的部署下，布尔什维克首先恢复7月3日起义之后放弃的“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在9月的彼得格勒苏维埃选举的过程中，布尔什维克占据了优势。9月5日，彼得格勒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布尔什维克党团提出重新选举执行委员会的必要性。虽然社会革命党以即将选举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为由加以拒绝，但在补充选举中，布尔什维克在执委会中占据7个名额，而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也占据了7个名额。在民主会议期间，布尔什维克党派团参加，揭露民主派的联合策略，捍卫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9月25日，彼得格勒苏维埃选举新的主席，托洛茨基当选。在执行委员会的工人和士兵分委员会选举中，布尔什维克在工人分会中占13个席

^① 《列宁选集》第3卷，第305~306页。

位，在士兵分会中占据 9 个席位；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分别占据 6 个席位、3 个席位，10 个席位和 3 个席位。具有投票权的 7 个席位中，布尔什维克占据 4 个。在主席团的选举中，布尔什维克占据 4 个席位，社会革命党占据 2 个席位，孟什维克占据 1 个席位。396 名工人分会成员中，支持布尔什维克党占 230 人，支持社会革命党只有 102 人，支持孟什维克的只有 54 人，支持孟什维克国际派的有 10 人。^①

9 月 25 日，彼得格勒苏维埃发表声明：科尔尼洛夫暴乱暴露出俄国全部有产资格分子都持反革命立场，在此之后，全部联合的企图都只能意味着民主派对科尔尼洛夫分子的投降。正在形成的内阁人员构成就是这种投降的表现……我们彼得格勒工人和卫戍部队对资产阶级全权和反革命暴力政府不给予任何支持……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将建立真正的革命政权。^②

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声明等于布尔什维克对临时政府的宣战。随后，布尔什维克在外交、土地与和平问题上向临时政府提出了质询，为革命找到了充足的根据。首先，布尔什维克认为，临时政府派斯科别列夫到巴黎与盟国谈判就是把俄国士兵的鲜血问题交给伦敦和纽约的交易所解决。^③ 切尔诺夫更加直接地提出这种外交就是害怕失去俄国的土地，害怕芬兰、波兰、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由于自决而独立。^④ 临时政府的秘密外交置人民死活于不顾无论如何都是不能忍受的。其次，在土地问题上，临时政府农业部长、社会革命党马斯洛夫仍然把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法停留在把土地交给土地委员会，利用没收的地主出租的土地、皇室土地以及闲置土地组建土地储备，在调节土地关系上，无法阻止日益激进夺取地主土地的农民。布尔什维克在这个基础上提出立刻解决土地问题，不经赎买立刻没收地主土地并分给农民，马上就会得到农民的支持。再次，在战争的态度问题上，社会革命党依然与政府合作，通过立刻与资产阶级国家的政府展开谈判的方法加以解决，与布尔什维克提出的“越过交战国的政府向各国人民提出停火建议”^⑤ 的主张相比，无疑是非常丧失人心的。

① A. A. Смирнова, От коалиции к катастрофе Петроградские социалисты в мае-ноябре 1917 года, с. 227, 249.

② 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献给被遗忘的先知》，第 312 页。

③ 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献给被遗忘的先知》，第 348 页。

④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17.2 - 10, Т. 3, Ч. 1, с. 851.

⑤ 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献给被遗忘的先知》，第 339 页。

在俄国面临的三个主要问题上，布尔什维克都能给出不同于社会主义者的主张并马上可以实现，尽管布尔什维克提出类似临时政府准备迁都莫斯科就是把革命的堡垒交给德国人，把卫戍部队调出首都就是对人民和革命的镇压等说法有夸大的嫌疑，但人民不会听从临时政府，而是会不遗余力地听从布尔什维克的召唤。更何况布尔什维克一方面继续深入革命，使得自己在政府那里获得正常活动的合法依据，^①另一方面，通过在10月20日召开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解决停火、把土地交给农民以及按期召开立宪会议的方法解决俄国亟须解决的问题，走的完全是合法的渠道，无可指责。^②

10月10日，布尔什维克召开中央全会提出武装起义的方针。10月12日，彼得格勒军事委员会建立，成为布尔什维克组织革命的中心，托洛茨基当选为军事委员会的主席。10月18日，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发表关于“发动”的声明，托洛茨基同时签署了领取5000支枪的命令。10月25日，在士官生和工人武装的支持下，布尔什维克占领了火车站、邮局、电话局、彼得格勒通讯社、国家银行，托洛茨基以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宣布临时政府被推翻，革命的卫戍部队解散了预备议会。彼得格勒苏维埃成立了工农政府。与此同时，第二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幕。十月革命几乎就像更换一次政权一样，在没有流血的情况下完成了。

二 社会革命党的回应

社会革命党自从民主会议不能按照切尔诺夫的心愿放弃与资产阶级的联合政策之后，越来越感觉到农民和工人的左倾，甚至越来越意识到，布尔什维克即便短期也不能容忍现在政权的存在，直到立宪会议召开。夺取政权的趋势已经势在必行。从9月30日社会革命党在《人民事业报》发表的文章来看，他们已经提出了是新的革命还是立宪会议这样的命题。社会革命党把革命归结为社会集团之间的相互仇视。仇视而不相互宽容的认识已经接近了问题的实质，但在采取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上，社会革命党却选择了两股力量的相互消长，即未来的出路或者革命或者立宪会议来加以解决。^③ 社会革命党的方法就是尽一切努力度过一个半月的时间，把最终的

^① П. Н. Миллюков, Россия на переломе большевистский период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с. 117.

^② 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献给被遗忘的先知》，第331页。

^③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17.2 - 10, т. 3, ч. 1, с. 820.

决定权交给立宪会议。

切尔诺夫认为解决农村的骚动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革命的立法解决人民生活中的所有问题。这种法律就是能够让劳动者充分获得权利，消除地主的恣意妄为。由于战争，有产资格分子组成的政权拖延了问题的解决。自发的群众骚乱在增长，在这场骚乱中，地主的处境变得越来越不利，现在留下的唯一出路就是把土地交给土地委员会。^①

从社会革命党发表的文章的口气来看，面对着日益骚动的社会，他们把社会集团之间出现的相互仇视归结为人的问题，解决的方法是各打五十大板，双方各让一步，在法律的范围内解决问题。社会革命党所倾向的是把俄国顺利地带到立宪会议。但切尔诺夫站在农民的立场上解决土地问题，显然又站在了布尔什维克一边。资产阶级因不满社会革命党的貌合神离不断拖延问题的解决，布尔什维克因不满社会革命党的拖延而把他们归结到小资产阶级的行列。社会革命党在武力夺取政权方面持反对态度，把主要的精力用于选举。他们认为立宪会议和苏维埃可以同时存在，但把立宪会议看做涵盖各个阶层的全国机关，而把苏维埃看做工人、士兵和农民的阶级机关。阶级机关当然要服从立宪会议这个全国性机关，这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所决定的。^②

受教条主义观念的影响，社会革命党全力奋创立宪会议。首先，右派继续在预备议会里延续着说了无数次但又没有任何意义的话。如阿夫克先基耶夫说：“公民们，人类和俄国遭遇流血的噩梦已经4年了。最近我们的命运又在经历着严峻的考验。敌人在我们的前线获得了新的成功。敌人在前进，进一步的失败威胁着我们的祖国，威胁着俄罗斯共和国和革命的成就。只有人民的伟大热情、千锤百炼的意志、力量的凝聚以及对自由的俄罗斯为之奋斗的事业的理解才能拯救国家……我相信，俄罗斯共和国会议同样把尽快实现承认各民族自决权的普遍的民主和平作为自己的任务。”其次，左派继续做着利用有产资格分子但又不与之联合的美梦。如左派代表A. 施赖德尔在社会革命党第八次代表会议上说：“由于社会主义者队伍中缺乏有业务能力的工作者，为此必须邀请几个有产资格分子。然而，我们

①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17.2 - 10, Т. 3, Ч. 1, с. 825.

②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17.2 - 10, Т. 3, Ч. 1, с. 826.

认为，既然管理权在我们的手中，可以允许没有危害的有产资格分子作为任务的执行者工作。这样，我们就可以达到双赢，既可以向人们证明，我们没有耍手腕，没有到处安插自己的人领导自己工作的意愿，而是关心为人民的利益服务；又离开与我们共同工作的有产资格分子的政党。”^①

关于立宪会议的准备，社会革命党早在8月份杜马选举获得胜利之后就着手进行。第七次党务会议选出了参加立宪会议选举的候选人。经历了科尔尼洛夫叛乱和布尔什维克的胁迫之后，社会革命党进一步加强立宪会议的工作。社会革命党左翼和右翼不同的地方是左翼坚持清一色的社会主义成分的联合，而右翼则坚持社会有生力量的联合。然而，无论左翼还是右翼，都是出于对物质利益的考虑。左翼代表屠鲁多夫斯基在社会革命党第七次彼得格勒城市代表会议上指出：“国家最严重的问题是经济问题，这是一个决定革命方向和国家未来命运的因素。俄国从来没有成为富裕国家，因为它的劳动生产力常常低下。现在我们的国民经济完全处在贫穷状态，纸币和债券的发行就是标志……如果我们为了支付赔款必须走上向人们征税的道路，那么我们将面临着使俄国劳动人民死绝和退化的前景。把这些花费转嫁给有产资格分子就意味着改变国家的社会结构并推动我们走上世界革命的道路。另一条路就是发展国家的生产力……为了发展生产力，国家就必须集中生产，必须调节生产，不是通过辛迪加和托拉斯，而是通过民主组织——民主国家政权干预国家生活而有计划地发展，这是一；二是通过自治政府的工厂组织而有计划地发展。”^② 在左翼眼里，有计划地发展就是建设社会主义。

右翼从同一个前提出发，却得出相反的结论。如米诺尔引用自己一派的话说：“固定的价格引发了革命。革命同样由于固定的粮食价格而被重复。同一个原因产生同一个结果：沙皇制度由于固定价格而灭亡，革命也会由于同样的原因而灭亡……正如我们自己所说的，莫斯科中央杜马选举取得胜利是由向愚昧的群众夸大希望决定的，如社会革命党几乎可以在一周内消灭昂贵的物价，提高工资59%~100%，消除住房的匮乏以及面包店和鞋店的长龙等等。实际上我们非常清楚，我们没有能力证实这样的愿望，

^①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17.2 - 10, Т.3, Ч.1, с. 829, 833.

^②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17.2 - 10, Т.3, Ч.1, с. 799 - 800, 801 - 802.

同他们斗争需要长期而艰苦的努力，特别是莫斯科的崩溃是与日益扩大和加深的全国的崩溃紧密联系在一起。”^① 这样，右派得出的结论不是急着拿出办法，而是跟在有产资格分子的后面把全国范围内的困难转交给立宪会议。于是，立宪会议就成为解决所有问题的万能上帝。

分析左翼和右翼解决俄国社会问题的视角，他们完全从俄国的经济状况出发考虑问题。经济崩溃无疑是俄国最大的问题，战争失败之后所带来的巨额赔款也同样使人们的生活更加艰苦。面对困难，他们同样采用了逃避的方法，左翼采用的方法是走向冒险，他们首先把战争的罪恶归罪于国际资本，为此他们用组织的办法与之对立，并命名为社会主义；右翼则干脆躺倒不干，把它交给了立宪会议。社会革命党面对日渐困难的俄国经济一筹莫展，原因就在于把所谓的“现实”当做了认识对象和立脚点，没有分析也没有采取解决的措施。他们向他们的领导人和主心骨切尔诺夫一样把所有的问题归结为人与人之间不相互信任和相互仇视。左派除了通过把责任完全转嫁到有产资格分子之外，右翼除了祈求有产资格分子发扬牺牲精神之外，没有更多的作为。

这与列宁提出的把劳动者组织起来，鼓励他们加入国家的日常管理行列，同时强迫有产资格分子交给劳动者管理国家的手段相比，无疑完全没有出路。社会革命党路越走越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的内心充满了恐惧，他们没有足够的信心战胜这种恐惧，更不可能引导深陷贫困之中的劳动者摆脱恐惧。

当民主派日益受到有产资格分子和布尔什维克无产者越来越多的胁迫的时候，当他们眼看着革命的民主成果马上就会被专政所替代的时候，他们一方面也组织起军事组织，准备起身捍卫革命成果，另一方面又重复着以前不断重复的信誓旦旦的话。如在9月末召开的首都和周边组织军事会议上说，立刻把所有农用土地交给土地委员会管理；通过由工人参与的国家的监督机关组织工业；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并使军队民主化；回到积极为和平而斗争的道路等等。^②

社会革命党的军事委员会成立于7月10日，军事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

①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17.2 - 10, Т. 3, Ч. 1, с. 807 - 808.

②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17.2 - 10, Т. 3, Ч. 1, с. 809.

确立党组织与军队的联系，在不存在党组织的军队中建立党组织；促进军队的民主化，巩固军事组织的地位，分散军事管理并选举军事指挥官；在前线开展立宪会议选举运动，并为党的军事分组织在立宪会议中开展工作准备材料。委员会又分为文化启蒙委员会、哥萨克委员会、高加索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根据社会革命党民主原则，军事委员会主要负责军队民主化和保护首都彼得格勒的工作。军事委员会把主要的力量用于军队的立宪会议选举，尽管在首都出现危机的情况下提出保卫首都的任务，但是，由于地方领导的分歧和资金短缺，军事委员会的工作进展不大。关于首都的保卫，社会革命党把目标用于防范黑色百人团，对于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举动停留在容忍的范围之内。

社会革命党右翼的工作重点仍然在预备会议，劝说革命政党保持克制，通过合法的渠道等待立宪会议的召开。切尔诺夫越来越意识到群众的布尔什维克化和布尔什维克党革命，但在民主思想的支配下，他也越来越把工作的重点放在立宪会议，而忽视了在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工作。甚至在十月革命期间，作为社会革命党核心的切尔诺夫却离开首都到各地视察。虽然他的目的是动员各地方的力量防止布尔什维克的起义，但是，切尔诺夫不在首都期间，在布尔什维克组织召开第二次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时候，社会革命党右翼 A. 戈茨和阿夫克先基耶夫却示威式地离开大会，错过了与布尔什维克联合的机会。^① 社会革命党从此陷入了分裂。右翼走上了反对布尔什维克的道路，而左翼则加入了布尔什维克政权。

三 苏维埃与立宪会议之争

布尔什维克在 10 月 25 日夺取政权之后，就于当天召开了第二届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不主张在 10 月 20 日召开大会，但遭到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否决。^② 社会革命党否决的原因很简单，他们把立宪会议看得高于苏维埃，而立宪会议的选举再过三周就要开始了，那时一切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布尔什维克则坚持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并且建立苏维埃政权，然后由苏维埃政权召集立宪会议。布尔什维克执意要在立宪会议召开前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或者说立宪会议迟迟不能召开不在

^① Протоколы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партии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с комментариям В. М. Чернова, Воросы истории, 2008, №. 8, с. 18 - 19.

^② 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献给被遗忘的先知》，第 374 页。

于资产阶级或者社会主义者故意拖延，而是正如利沃夫所说：“如果出现了真正的自由王国，就会点燃一些人对另一些人强制的无限蔓延的大火。那么，想在我们国家建立的应该给国家带来和平与安宁的立宪会议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建立在由相互仇恨和毫不妥协的敌视培育的基础上。要知道这样的基础什么也不可能建立。由此，宣传员就得出需要建立强大政权的结论。”^①

立宪民主党在科尔尼洛夫叛乱之后丧失了建立有产资格分子政权的机会，现在轮到了布尔什维克了。从解放人民走向自由的角度来说，布尔什维克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具有解放意识的先锋队通过行政命令的方法把人民从旧制度下解放出来，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对工人的锻炼和对工人能力信仰的基础上；而立宪民主党主张的君主立宪制度则建立在少数有产资格分子确立的法律制度的基础上。虽然立宪民主党主张的君主立宪制度在传统的意义上比较容易建立，但是，在帝国主义时代，特别是在帝国主义战争给俄国社会造成极大压迫的条件下，布尔什维克的信仰革命和政治革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正是这种革命唤醒了受沙皇专制压抑的愚昧而贫穷的工人和农民，投身于自身解放的战争。在托洛茨基眼里这几乎成为一种必然。^②

社会革命党等社会主义者仍然拖延着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工作，只是在会议召开的几天前，中央执行委员会才通知各地方必须进行选举。第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参加者党派构成是：布尔什维克 382 人，同情布尔什维克的无党派人士 31 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 70 人，无政府主义者 5 人，统一国际主义者 15 人，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 40 人，孟什维克护国分子 21 人，少数民族社会民主党 7 人，中派社会革命党人 36 人，右派社会革命党人 16 人，少数民族社会革命党人 8 人。^③ 与第一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参加者相比，布尔什维克占据压倒性多数，社会革命党占据少数。如果说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社会革命党在人数上遭受了打击，那么大会通过的组建苏维埃政权、通过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以及按时召开立宪会议三件事情上，对于社会革命党来说是致命的一击。布尔什维克完成了社会革命党在

^① E. A. Скрипилев, *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е учредительное собрание историко-правово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М. Наука, 1982, с. 127 - 128.

^② 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献给被遗忘的先知》，第 344 页。

^③ 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献给被遗忘的先知》，第 375 页。

立宪会议所要完成的全部使命，同时确立了属于人民自己的政权。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不得不以退场结束自己的尴尬。

社会革命党丧失了政权，源于自己缺乏建立人民政权的信心。正如 Н. Н. 苏汉诺夫在《革命札记》中所说：“须知苏维埃就是革命本身。没有苏维埃，革命就不存在，它能存在吗？须知苏维埃一直是组织和团结革命群众的革命战斗机构。离开苏维埃能去哪儿？须知这意味着正式与群众和革命决裂。”^①

诚如前面所说的，切尔诺夫把苏维埃和立宪会议并列看待，但当立宪会议一旦召开，苏维埃就失去了自己的作用。因为在切尔诺夫眼里，苏维埃具有自发的性质，他们的选举是在混乱中举行的，缺乏明确的活动规章，他们没有国务活动的经验，也不是天生就注定从事日常业务工作的。苏维埃首先是号召联合工人为自己的利益而斗争的组织。苏维埃的任务就是唤醒阶级意识，捍卫劳动人民的利益，是决定全民选举立宪会议的保证。^②

立宪会议在切尔诺夫眼里则具有了特殊的意义。立宪会议是人民主权思想的体现者。它的召开意味着俄国进入了自己发展的新时期，意味着俄国人民政治上的完善。只有具有全权的立宪会议能够有资格解决国家和政治制度问题、土地改革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立宪会议与议会的不同在于，它的权力谁也不能从外部预先确定。相反，它被认可可以重新建立未来制度所需要的机关，规定这些机关的权利和义务范围。立宪会议是全权的创造者，即原则上实现与过去的一切一刀两断的新的社会生活原则的创立者，是指向新纪元开始的路标，是人民主权直接和全面的胜利。^③

切尔诺夫把立宪会议赋予至高无上的地位，甚至取代苏维埃，只把苏维埃当成社会组织而不是政权机关的理论依据是俄国革命属于民主革命。民主革命对于劳动人民来说意味着容忍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和平共处。但是，1917年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之间劳动人民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和平共处被证明是失败的，说明俄国革命的性质已经不是西方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能涵盖。在切尔诺夫眼里，未来俄国应该是一种什么性质的革命已经变得模糊不清。得出这种结论的基本依据是切尔诺夫把包容俄国社

① 苏汉诺夫：《革命札记》第7卷，第192页，参见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献给被遗忘的先知》，第375页。

② О. В. Коновалова, В. М. Чернов о путях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и, с. 124.

③ О. В. Коновалова, В. М. Чернов о путях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и, с. 124.

会所有阶层的立宪会议看做绝对标准。而根据民主会议的经验，立宪会议就是按照确定的规章召开，在不寻求共同的价值观的情况下，也只能遵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这样也就陷入多数还是少数掌握真理的争论的困境。多数战胜少数是民主的胜利，但是，真理的问题没有揭示出来。所以，立宪会议就是承认所有社会阶层的人都有权参加，不可能成为绝对标准。立宪会议之所以最终成为绝对标准，原因是都强调自身利益的人为了不彼此伤害对方而做出的妥协，其实这更是对立宪主义膜拜的结果。

社会革命党对于立宪会议持膜拜的态度，因而否定布尔什维克的武装夺取政权的行动，认为“它有利于国家和民主派的敌人，加剧崩溃。”^① 社会革命党人为地把革命停留在民主革命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是俄国还没有达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这样的观点也成为当下自由主义史学家的核心观点。如梅杜谢夫斯基在《民主与专制：对俄国立宪主义的比较透视》一书中说：“如果抛开意识形态的考量，那么可以说，布尔什维克政权依靠的就是自身存在的简单事实，所以，只能依靠刺刀来维持。”^②

为什么要把革命人为地停下？为什么要抛开意识形态的考量？要知道俄国人民已经到了不结束战争，不解决土地问题，不尊重人民的呼声就不能继续生活下去的程度，布尔什维克正是顺应了人民的要求，提出立刻实现和平、土地社会化的主张并付诸行动，十月革命可以说几乎是一场不流血的革命。用托洛茨基的话说，这场革命“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公然预定的”。^③ 布尔什维克为什么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违反当时所有政党的约定而发动起义，同时得到了群众的支持，这不得不从价值观上进行认识。

列宁说：“要使大多数真正能够决定国家大事，必须具备一定的现实条件。这就是：必须巩固地建立一种有可能按照大多数的意志决定问题并保证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的国家制度、国家政权。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必须使这个大多数在阶级成分上，在其内部（和外部）各阶级的对比关系上，能够协力地有效地驾驭国家这辆马车。”^④ 列宁的这句话如果从利益斗

①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17. 10 - 1925, Т. 3, Ч. 2, с. 30.

② А. Н. Медушевский, Демократия и авторитаризм: Российский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ализм в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й перспективе, с. 480.

③ 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献给被遗忘的先知》，第388页。

④ 《列宁全集》第32卷，第188～189页。

争的角度来看，少数服从多数的确会造成多数对少数意见的压制，如果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甚至会引发人民专制。但是，若从价值观上来看，列宁强调了阶级关系，同时强调了阶级之间的相互协调。

阶级斗争在资本主义社会简化成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相互斗争。从革命的意义上来讲，它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①

关于资产阶级不顾一切地以贸易自由代替无数特许和自力挣得的自由，马克斯·韦伯把它归结为基督徒为获得上帝的恩宠而遵行的一种禁欲主义，是摆脱自然状态的一种手段。马克斯·韦伯说：这些人“在证明具有与自然人生活方式明显相异的特殊行为方式之后，才有可能取得这种恩宠，由此产生出对于个人的推动力，激励个人有条理地监督自己的行为，以使自己获得恩宠，并因此而把禁欲主义注入行为之中。但是，如同我们所见，这种禁欲主义行为意味着人的整个一生必须与上帝的意志保持理性的一致，而且这种禁欲主义再也不是一种不堪承受的负担，而是每一个确信拯救的人都可以做到的事情。”^②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具有这样的思想，但是一旦具有这种思想的人结成社会集团并把这种思想融入阶级之中就形成了利益对抗。能够接受这种禁欲的就成为剥削阶级，不能接受的就变成被剥削阶级，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价值观的斗争也就变成了阶级斗争。

马克斯·韦伯说：“自从禁欲主义着手重新塑造尘世并树立起它在尘世的理想起，物质产品对人类的生存就开始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控制力量，这力量不断增长，且不屈不挠……当天职观念已转化为经济冲动，从而也就不再感受到了的时候，一般地讲，个人也就根本不会再试图找什么理由为之辩护了。在其获得高度发展的地方——美国，财富的追求已被剥除了其原有的宗教和伦理意义，而趋于和纯粹世俗的情欲相关联……这个文化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4~275页。

②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19页。

的发展的最后阶段：‘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①

这样，对于处于一种机器状态的资产阶级，只有通过被剥削阶级的阶级斗争才能使他们重新想起曾经有过的价值观。这就是马克思所讲的“资产阶级处于不断的斗争中：最初反对贵族；后来反对同工业进步有利害冲突的那部分资产阶级；经常反对一切外国的资产阶级。在这一斗争中，资产阶级都不得不向无产阶级呼吁，要求无产阶级援助，这就把无产阶级卷进了政治运动。于是，资产阶级就把自己的教育因素即反对自身的武器给予了无产阶级……工业的进步把统治阶级的整批成员抛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或者至少也使他们的生活条件受到威胁。他们也给无产阶级带来了大量的教育因素。最后，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整个旧社会内部的瓦解过程，就达到非常强烈、非常尖锐的程度，甚至使得统治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脱离统治阶级而归附于革命的阶级，即掌握着未来的阶级。”^②

应该指出，马克思这里所讲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相互转化并不仅仅是说无产阶级上升为资产阶级，也不是说资产阶级“堕落”成为无产阶级，而说的是资产阶级在不断的斗争中才能保持着不被财富所异化，才会保持清醒的头脑，在精神上倾向于无产阶级，这样的斗争几乎成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相互依存的一种手段，一种升华的环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晚年才说“选举权已经被他们由向来欺骗的工具变成解放的工具”。^③

俄国的斗争并不容易。由于资产阶级的依附性和不彻底性，他们不仅不能承认工人与自己的不可分割性，相反对工人产生歧视心理。1917年2月到10月的经验已经说明了这一点。但是，德国劳资合作的一种客观形势逼迫着俄国不仅要有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相互谅解，而且还需要接纳传统的农民。而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充分使得这种价值观的转变变得异常艰难，不得不在工农民主专政的条件下争取劳资合作。工人阶级所表现出来的先锋队意义更多停留在理论上，常常需要把它作为一种价值观从外部灌输。从社会化不充分的角度来看，有一种一个政党发动政变的意味。

尽管列宁被攻击为发动政变，但他还是怀着“真理之光是刺眼的”这

①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42～14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16～517页。

种信念发动这场新的革命，并在革命的性质上对于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社会主义观点做了两点修正。第一个修正是：“如果‘大多数’本身只是一种形式，而在物质上、在实际上这个大多数只是资产阶级用来进行欺骗的各政党的大多数，那么这个大多数实际上又有什么价值呢？”列宁根据这种情况又做了第二个修正：“当然，只有弄清这种欺骗的阶级根源和阶级意义，才能正确地理解这种欺骗。这不是个人的欺骗行为，不是‘诈骗（说得粗一些）’，这是因阶级的经济地位而产生的欺骗思想……为了使人民大多数能够成为管理国家的真正的大多数，成为大多数的利益的真正服务者，成为大多数的权利的真正维护者，等等，就必须具备一定的阶级条件。这个条件就是：至少在决定性的关头和决定性的地方，小资产阶级的大多数同革命无产阶级联合起来。”^①从第一个修正中，我们可以看出列宁想用一种劳资相互友爱的精神与资产阶级真正达成一致，赢得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在社会地位上的真正认可；第二个修正就是在关键的地方把无产阶级和农民联合起来，从阶级的角度表现得更有力量，通过群众斗争以至武装斗争解决劳资合作问题。

这样，列宁在工兵代表苏维埃和立宪会议召开之前武装夺取政权，首先确立劳资合作、兄弟友爱的思想，这是在俄国资本主义不发达，自觉理性地生活还只是小部分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行为的条件下，不得不采取的一个步骤，也不可能获得多数人的同意；其次，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将所有的人民都发动起来的情况下，在工兵代表苏维埃掌握兵权的情况下，建立工农民主专政，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俄国的和平问题以及民族解放问题；最后，列宁在工人和农民拥护自己的情况下，联合社会革命党的左翼，联合孟什维克的国际主义派争取立宪会议的多数，以达到巩固政权，实现社会转型的目的。这就是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工兵代表苏维埃和立宪会议的逻辑关系。

在俄国资本主义不发达，甚至农民仍然占据多数的条件下，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思想非常超前，与社会革命党在思想观念上相差三步。第一步，有产资格分子要爱工人和农民；第二步，在热爱中逐渐让工人和农民获得独立；第三步，容忍工人农民的平均主义思想。社会革命党仅仅停留在期望有产资格分子容忍工人农民的平均主义阶段，与列宁的有产资格分子和

^① 《列宁全集》第32卷，第25、23~24页。

工人农民之间的相互友爱思想相差甚远。俄国处在相信劳资相互友爱的德国模式的胁迫（战争）下，摆脱这种胁迫（战争）不采取外部灌输的办法，无法完成。这样一来，理解了这一层的列宁不惜武力解决并引发内战也就成为一种必然。

四 社会革命党的护宪运动

执著于与有产资格分子寻求妥协的社会革命党在布尔什维克发动政变之后，迅速做出了反应。在10月25日致所有俄国民派呼吁书中说：“士兵、水兵、工人和农民同志们：布尔什维克政党用自己的队伍占领了彼得格勒的银行、车站、国家机关，试图用武装力量夺取国家政权。一直反对布尔什维克计划的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认为这个步骤是不明智的。”10月26日在给工人、农民和士兵、水兵的呼吁书中更进一步指出，这是下流的犯罪的欺骗，是对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名义的滥用。10月27日，社会革命党把与布尔什维克一起参加十月武装起义并留在第二届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左派社会革命党开除出党。10月28日，《人民事业报》发表编辑部文章，亮明了社会革命党的立场。文章说：“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夺取政权把革命置于非常危险的境地。一方面，布尔什维克军事委员会宣布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着手组织反革命……崩溃和瓦解全面展开，内战以非常残暴的方式席卷开来，具有某种内讧的征兆。”社会革命党几乎带有不屑的口气说：“布尔什维克答应立刻实现和平。现在他们已经准备说立刻建设和平。只是忘记公开声明，他们的民主和平只有在全世界的社会革命之后才能实现。布尔什维克许诺立刻把土地转交给农民，似乎不清楚，可以做的只能是立刻夺取土地，并且只能是更厉害的和殷实的农民才能得到，而列宁为之奔走的贫农则与此无涉。布尔什维克答应给予面包。现在他们自己看到，很快就会陷入所有人无面包的境地。”^①

显然，社会革命党对于布尔什维克做出的许诺持怀疑态度，一致认为这是蛊惑。文章最后建议立刻建立清一色的社会主义政权，没有布尔什维克，也没有有产资格分子。同时重复了以前重复了无数次的纲领，即消灭布尔什维克这个一遇到严峻的事实就像肥皂泡一样破灭的冒险；把所有农

^①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17. 10 - 1925, Т. 3, Ч. 2, с. 30, 31, 39 - 40.

业用地交给土地委员会支配；尽快地在各民族自决、不割地、不赔款的基础上签署和约；立刻召开立宪会议。^①

的确，布尔什维克宣布立刻实现土地法令与和平法令是凭着对未来的信心提出的。它要想得到人民的支持必须用行动加以证明。列宁夺取政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明。首先他公布了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这两个法令虽然被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等社会主义者重复了很多遍，但在列宁手里有了不同。一个不同是他手里有政权，二是他把两个反映民意的法令交给只由劳动人民组成的苏维埃批准并把各地全部政权一律转归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由各地苏维埃负责保证自己的革命秩序。

关于和平条约的履行，布尔什维克采取了如下能够证明自己诚意的步骤。第一，“俄国政府向一切交战国人民建议立即缔结这种和约，并且决心不等各国和各民族的享有全权的人民代表会议最后批准这种和约的全部条件，就立刻毫不迟延地采取一切果断步骤”。第二，“同时本政府声明，上述和平条件绝非最后通牒式的条件，也就是说，它愿意考虑其他和平条件，而只坚持任何交战国都要尽快地提出这种条件，条件要提得极端明确，没有丝毫的含糊和秘密”。第三，“本政府废除秘密外交，决意在全体人民面前完全公开地进行一切谈判，并立刻着手无保留地公布地主资本家政府从1917年2月到10月25日所批准和缔结的各项秘密条约。本政府宣布立即无条件地废除这些条约的全部规定，因为这些规定多半是为了替俄国地主和资本家谋取利益和特权，是为了保持和扩大大俄罗斯人所兼并的土地”。第四，“本政府向一切交战国政府和人民建议，立即缔结停战协定，并认为停战时间最少不少于三个月，以便有充分的时间使所有卷入战争和被迫参战的民族的代表完成他们所参加的和约谈判，同时也使享有全权的各国人民代表会议能召开会议最终批准和约条件”。第五，“俄国工农临时政府在向一切交战国政府和人民提出以上媾和建议的同时，特别向人类三个最先进的民族，这次战争中三个最大的参战国，即英法德三国觉悟工人呼吁……帮助我们把和平事业以及使被剥削劳动群众摆脱一切奴役和一切剥削的事业有成效地进行到底。”^②

列宁的和平条约与社会革命党提出的构建和平的建议的不同在于：列

^①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17. 10 - 1925, Т. 3, Ч. 2, с. 41.

^② 《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92，第10~11页。

宁的建议是向所有交战国的政府和人民公布的，无论是哪国政府和人民，只要有一方对这个建议有所回应就达到了目的。列宁的建议不是出于私利而是公心。主要表现为：首先公布本国的秘密条约同时规定具体的停战期限为三个月，其次提出的建议不是最后通牒式的。布尔什维克的举动充分表达了诚意和现实性。布尔什维克的和平倡议一提出，虽然没有得到英法盟国的响应，却得到了德国的支持。虽然德国提供的只是三个月的停战协定，同时也满足了其解除东方战线把军队调往西线的目的，以至于俄国的爱国者把列宁的举动看做卖国，并举证列宁早在1915年就通过A. Л. 帕尔乌斯接受德国人的资金支持，1917年通过德国回到俄国以及在俄国举行反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者的起义等；^①但是，列宁通过一系列行动赢得了三个月的宝贵时间，赢得了人民对布尔什维克政府的信任。

关于土地问题，列宁揭露了社会革命党人的欺骗，质问社会革命党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明智的措施造成过大暴行和无政府状态呢？如果政府的行为是明智的，如果它的措施合乎贫苦农民的需要，难道农民群众还会闹风潮吗？”列宁根据社会革命党人拟定的委托书颁布了土地法令，直截了当地指出自己并不同意这样的纲领，但是他还是决定把这个决议运用到实际中去，在各地实行起来。一方面列宁尊重事实，另一方面列宁想通过实践让人民群众享有发挥创造精神的充分自由。土地法令规定，“立刻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不付任何赎金；地主的田庄以及一切皇室、寺院和教会的土地，连同所有耕畜、农具、农用建筑和一切附属物，一律交给乡土地委员会和县农民代表苏维埃支配，直到召开立宪会议时为止。任何毁坏被没收的即今后属于全民的财产的行为，都是严重的罪行，革命法庭应予惩处……委托书的全部内容表达了全俄绝大多数觉悟农民的绝对意志，应立即宣布为临时法律，并应在立宪会议召开之前，尽可能立刻实行，其中哪些部分必须逐步实行，应由县农民代表苏维埃决定。普通农民和普通哥萨克的土地概不没收。”^②

在民族问题上，列宁根据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中“将保证俄国境内各民族都享有真正的自决权”的原则，承认芬兰独立，承认乌克兰独立。在

^① А. Ф. Керенский, Россия на историческом повороте мемуалы, с. 285; О. В. Волобуев и др., Россия XX век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Драм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большевики и революция, М., 2002, новый хронограф, с. 240.

^② 《列宁全集》第33卷，第17、18、20页。

组建政府问题上，由于支持布尔什维克的左派社会革命党拒绝参加人民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建立了由自己一个政党组成的临时工人政府。

列宁的一系列让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者，甚至自己的战友 Л. Б. 加米涅夫、А. И. 李可夫、В. П. 诺根、В. П. 米留金和 И. А. 泰奥多罗维奇都反对的举措就像一枚炸弹在整个俄国炸响。社会革命党组成“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试图动用哥萨克的部队进行反击，但这样的行动没有收到成效。全俄铁路联合会主张建立包括布尔什维克在内的民主联合政府，也遭到了布尔什维克的拒绝。随后，布尔什维克查封了资产阶级的报纸，改选了全俄铁路联合会和农民苏维埃，自己的政策得到有效的执行，政权也得到了稳固。

布尔什维克推行符合人民利益的举措很快稳定了国内的局势，证明了自己行动的初步效果。接下来布尔什维克则按时举行了立宪会议选举，试图通过立宪会议使自己的地位更加稳固。于是立宪会议成为社会主义者和布尔什维克争夺权力的最后战场。

对于布尔什维克取得的一系列成效，社会革命党感到非常紧张。除了开除参与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之外，更主要的行动是在 1917 年 11 月 26 日到 12 月 5 日召开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检讨了社会革命党自第二届临时政府以来所采取的妥协政策并制定未来的应对之策。

整个会议被一种牢骚声充满。牢骚围绕切尔诺夫的关于当前形势的报告展开。切尔诺夫回顾了社会革命党八个月来走过的道路，检讨了党的过错。切尔诺夫由于始终把革命的性质定性为人民劳动革命，即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过渡阶段，实际上等于放弃了判断俄国未来发展方向的使命。他把政权委身于资产阶级，放弃了组织政权的使命；把监督权委身于工兵代表苏维埃，放弃了监督权的使命。然而，一战中的俄国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口，任何一个政党执掌政权都要扮演为国家服务的角色，从而确立了公私之间、道德与利益之间的关系。

社会革命党站在工人农民的利益角度，把政权让给了资产阶级，名义上是俄国的人民还没有组织好，作为人民政党还不能接管政权，实际上忽视了政权背后的道德价值。受这一观念的影响，当米留科夫作为外交部长宣布履行职责把战争进行到底的时候，社会革命党指责米留科夫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当社会革命党参加临时政府着手土地法草案的准备而遭利沃夫指责的时候，切尔诺夫认为这是对自己的诽谤。当 6 月 18 日前线

进攻失败，出现危机的时候，社会革命党又指责布尔什维克组织7月4日的罢工是对政府的挑衅。当莫斯科国务会议执行联合政策导致克伦斯基等少数人执政的时候，社会革命党又指责孟什维克执行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原则。当科尔尼洛夫发动叛乱时，社会革命党又指责立宪民主党成为叛乱的后台。当民主会议在联合与建立清一色社会主义政府之间争执不下时，切尔诺夫不得不遵守党团纪律投下了弃权票，任凭右派社会革命党阿夫克先基耶夫、A. 戈茨等人参与联合政权。

切尔诺夫把社会革命党在关键时期采取的措施称为“在原地徘徊”。当左派社会革命党跟随布尔什维克建立社会主义政府的时候，切尔诺夫认为这是最高纲领主义，或者说是“苦难主义”（гогофизм，这个词来自耶稣蒙难地——各各地）^①。切尔诺夫认为左派社会革命党追随布尔什维克在俄国还没有条件发动社会主义革命，在人民觉醒的条件下试图利用超力量，努力发动最高纲领主义的社会革命，就是明知灭亡而强行进入历史的各各地，结果必然灭亡。“这种理论可能含有许多诗情画意、许多基督苦难精神，但很少分析历史情形，只是对政治思想给予最简单、基本的了解，可以说是一种掺杂了社会革命味道的最高纲领主义意愿的虚假理论。”^②

最后，切尔诺夫得出结论：“我们看到，我们没有改变关于革命性质的立场，但是遗憾的是，由于许多情况不能履行三大制定的党的纲领。但是党的错误不仅仅在这里。同志们，你们看到，党的处境多么艰难。权衡一下所有的困难和来自左右各派制造的障碍，我更加认为，错误来自党的各个方面。如果科尔尼洛夫起义之后，建立的不是联合政府而是真正清一色的社会主义政府，那么这时就可以使得政府摆脱内战……从这个视角出发，问题就变得非常简单。布尔什维克党团巧妙地利用民主会议期间对政权问题的拖延解决，巧妙地利用国内的不满和所有新政府的错误以及原地踏步，在苏维埃政权这个响亮的招牌下，在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就表现出强制苏维埃意志的情况。”^③

切尔诺夫的指责把应负的责任推到各种客观原因上，错把利益当做价

①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17. 10 - 1925, Т. 3, Ч. 2, с. 72.

②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17. 10 - 1925, Т. 3, Ч. 2, с. 73.

③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17. 10 - 1925, Т. 3, Ч. 2, с. 74.

值，在利益到来的时候抵挡不住利益的诱惑，结果陷入了道德丧失的困境之中。如第一届政府危机之后，根据切尔诺夫给社会革命党的定性，社会革命党不能参加政府，但在苏维埃的怂恿下还是挡不住诱惑执掌了政权。执掌政权期间社会革命党做的两件事，即准备土地法草案和处理乌克兰和芬兰的民族问题都反映了社会革命党的利益原则，激化了俄国的社会矛盾。当社会革命党意识到俄国必须建立清一色的社会主义政府，也就是用价值观念统帅政权的时候，社会革命党就把立宪会议看做夺取政权的手段，同时加紧立宪会议的准备。布尔什维克早在4月份就主张用价值观念统帅政权，即建立苏维埃政权，发动革命、召开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就是水到渠成的事。布尔什维克只不过做了社会革命党想做而没有做的事情。唯一与社会革命党不同的是，布尔什维克采取了武力手段。而从根本上来说，布尔什维克借用了社会革命党的土地纲领，把社会革命党坚持的只向英法盟国寻求和平条约转向向所有交战国的政府和人民求和，甚至不惜单独签署条约，是从价值观而不是利益角度理解土地问题与和平问题，是对德国劳资合作道德模式的超越，即全世界无产者不仅为了和平反对本国政府，而且为了社会主义事业热爱战争时期敌对国家的无产者。布尔什维克不仅是这种理论的提出者，而且在土地与和平问题上成为践行者。

布尔什维克的举动在当时许多社会主义者眼里无疑是不可理喻的乌托邦。它在俄国的实践显然会把俄国带入“耶稣蒙难的各各地”。依从现实主义的社会革命党显然把这种意志的强加看做恣意妄为，沽名钓誉。如切尔诺夫把布尔什维克党实行土地社会化纲领看做“从政府的高位上向其他在政治上占据优势的政党抛出的选举宣传画”，而把和平法令看做装样子，是对沙皇统治时签署的秘密条约的玩弄，是为了找德国的兴登堡单独签署条约。^① 接下来，切尔诺夫把布尔什维克的成功完全归结为社会革命党不能在应该发展的时候坚决地开展行动，在政权问题这个重大的责任问题面前后退。政权问题成为切尔诺夫关注的焦点。

这样，明确了俄国革命是一种过渡，同时把革命的完成看成一种权力斗争的切尔诺夫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矛盾。一方面，号召全党“切实地把为尽快在民主原则基础上消灭战争而开展的实实在在的斗争掌握在自己手中”；另一方面，又要求全党“不三心二意地，特别是义无反顾地执行党的

^①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17. 10 - 1925, Т. 3, ч. 2, с. 77, 78, 79.

纲领”。^①

来自军队基层的代表指出了切尔诺夫报告的矛盾性。来自军事委员会的乌特果夫说：“党的灾难不在于对政治的态度，而是不正确地执行社会路线。这里发生的不仅是政治革命，而且是社会革命，在经济方面重新安排阶级统治。人民干革命不是为了政治自由，而是为了社会改革，而我们在这方面却无所作为……布尔什维克提出了这个问题。政党的成功不仅由于获得了道德权威，而且由于其纲领已经成为社会改革的纲领……当我们提出把土地交给土地委员会的时候，像中央委员会这样的党组织并没有表现出足够的耐心。中央委员会把所有的注意力专注于政治问题，社会改革几乎没有讨论。他们在人民生活、军队、人民教育、医疗等方面什么也没有做。地方组织干得更少，不由得提出问题：社会革命党干了什么？我听到的意见是，社会革命党有一个好的纲领，但他们不履行纲领，是对人民的欺骗。”类似这样对中央不恭敬的声音比比皆是，并成为潮流。中央不得不为自己进行辩护。例如津季诺夫说：“我想消除在评价中央委员会活动情况时常常产生的一个比较大的误解。中央委员会是一个具有领导政治意义的独立力量。这不完全正确。中央委员会在当下实践中只是多种因素中的一个因素，所以对中央的指责完全源于对中央委员会意义的不正确的估计。”^②

津季诺夫的辩护充分暴露出社会革命党完全流于群众组织，失去了政党应有的价值。随后，津季诺夫回顾了党内右派和左派违反党的纪律的情况，指出了右派社会革命党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不顾党的纲领独立活动的情况。分裂的原因是关于战争的评价。以古科夫斯基、索罗金为代表的右派组织《人民事业报》，发表自己的观点。攻击中央执行的失败主义和最高纲领主义的政策。思想流派逐渐发展成为“社会革命党彼得格勒小组组委会”。严重的时候甚至组织自己的分支机构。如辛比尔斯克省曾发布命令反对中央委员会策略，尊“组织委员会”为自己的精神领袖。组委会决议公开违背中央第七次党务会议决议，在辛比尔斯克省提出与党的名单相并列的名单，由布列什科—布列什科夫斯卡娅和被开除出党的萨温科夫领导。^③

①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17. 10 - 1925, Т. 3, Ч. 2, с. 80.

②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17. 10 - 1925, Т. 3, Ч. 2, с. 92 - 93, 111.

③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17. 10 - 1925, Т. 3, Ч. 2, с. 147.

左派社会革命党分裂得比较晚。他们的据点是北方州委，领导人是卡姆科夫和姆斯基斯拉夫斯基。他们称自己是左派社会革命党国际派，分别在第三次代表大会、第七次党务会议以及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表示了自己的意见，要求在全线停战，建立清一色的社会主义政府。他们以《土地自由报》表达自己的看法。由于1917年11月27日被开除出党，左派社会革命党在12月3日召开了成立大会，成为一个独立的政党。

津季诺夫称右派社会革命党是没有军队的司令部，左派社会革命党则拥有自己的群众基础。可见，社会革命党追求的联合策略越来越脱离群众。左派所反对的也就是要求社会革命党放弃联合政策，在社会革命问题上有所作为。中央委员普里列扎耶夫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革命的重心完全不在于政权问题。我们曾经拥有过政权……我们很乐意批评布尔什维克法令并且在很多方面都是正确的。他们成功的原因是由于现在的策略中心不在于构建政权，而在于群众的创造性的热情。拉特纳同志非常正确地指出，我们在办公室里静静地等待创造性，要知道，就像从斯莫尔尼宫拟就法令那样，是不够的，人民群众的热情也有自己的心理。现在布尔什维克创造的不管是自发的运动还是什么东西，——但热情是肯定无疑的。我们把流氓行为和毁灭的情绪抛到一边，用什么来解释农民代表大会上我们必须努力捍卫的立场？我们应该占大多数的代表大会正在从我们的手中滑落。如果布尔什维克利用了这一点，那么革命的崩溃不可避免，我们也将走向黑色反动派。很清楚，我们应该和布尔什维克进行斗争，但是不应该使自己失去立足之地：因为同布尔什维克进行武装斗争的同时，也同健康的热情进行斗争。”^①

普里列扎耶夫显然已经发现了切尔诺夫的弊端在于失去了对群众的引领，也看到未来的社会革命党如果把重心转向夺取政权势必会转向反动派。普氏的警告不能扭转社会革命党对于民主的膜拜。会议最终通过切尔诺夫的关于革命性质的评价，仍然以群众无知为由抵挡对群众的发动。执行右翼联合策略的右派社会革命党和坚持建立清一色社会主义政府的左派社会革命党被开除出党。会议加强了党的纪律。为了进一步加强同布尔什维克的斗争，在立宪会议上重新夺取政权，会议通过了关于立宪会议的决议。决议赋予社会革命党立宪会议党团决定立宪会议的使命，也接受了普里列扎耶夫提出的进行社会革命创造的建议。由于社会革命党不能像布尔什维

^①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17. 10 – 1925, т. 3, ч. 2, с. 117, 124 – 125.

克那样在纲领上进行突破，实际的创造性变得异常艰难。争取立宪会议的斗争也必然演化成为与布尔什维克简单的夺权行为。

社会革命党在政策上相继表现为右翼与左翼倾向，原因在于它对于俄国社会性质缺乏把握。问题都出在对战争问题的态度上。比如组成组织的“社会革命党彼得格勒小组组委会”在9月16日《人民事业报》120期发表的《致所有的社会革命党书》中说：“在把俄国国家生存本身置于深渊的世界大战的危险时刻，破产的、痛苦不堪、濒临绝望的国家号召我党夺取政权。以前俄国不好但已经习惯了法规，被革命弃之一旁并化为灰烬，新的法规还在规划之中。它们还没有来得及确立明确的形式，划分发挥作用的领域，充实满足民主国家需求的单个条款。在没有现成武器以及没有完成行动计划而造成普遍崩溃的情况下，我们还应为新的大厦奠基，因为旧国家中未必有完全适合新大厦的形式。还要让我们所有的历史遗迹免遭炮火和毁灭。敌人的进攻已经使我们丧失了很多，现在我们又面临失去一切的危险：我们年轻的自由、我们对伟大人民应得未来的憧憬。国家的毁灭将永远夺去朋友对我们的尊敬，加深敌人对我们的蔑视，褻渎我们不能抚平的自我怀疑的心灵，进而导致对近期实现我们理想信念的丧失。摧毁祖国注定使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出现普遍停滞，并对德国产生奴隶般的经济依附。”^① 右翼的声明不可谓不豪迈，但是这种豪迈却把革命放在了为国家献身之后，走了沙皇和资产阶级为了拯救国家而放弃革命的老路。

左翼则一直坚持革命，认为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作为一个革命者无论找出多少理由继续战争都不能改变帝国主义战争的性质，所以，左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及社会革命党参与联合政府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完成革命，退出战争。正是因为这样一个理由，左翼退出了社会革命党，并支持布尔什维克建立革命政权。然而，左翼帮助布尔什维克建立政权不是为了对农民进行改造，而是为了满足农民的愿望。因此，左翼希望代表农民与布尔什维克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民主联合政府。但是布尔什维克与左派社会革命党的愿望还是根本不同的。首先，布尔什维克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不是为了土地社会化，而是土地国有化，通过土地国有化完成对农民的改造，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对于社会主义来说，不仅布尔什维克是工具，所有的阶层都是工具。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目标，布尔什维克会暂时对农民

^①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17.2 - 10, Т. 3, ч. 1, с. 778.

做出让步，不过这些都是权宜之计。由于布尔什维克与左派社会革命党在目标上完全不同，布尔什维克不仅会拒绝建立清一色的社会主义政府，而且拒绝在原则问题上讨价还价。这也是布尔什维克发动政变确立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原因。左派社会革命党想建立农民政权，然而由于社会革命党一直害怕建立政权而没有办法，最后不得不选择离开。社会革命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开除了左翼，导致左派社会革命党与布尔什维克的结盟。这种结盟也注定了左派社会革命党的悲剧。

立宪会议只是反映群众意见的地方，即对政党提出的政纲进行投票。立宪民主党的政纲经过几届联合政府已经证明得不到劳动人民的拥护。社会革命党的土地社会化纲领虽然反映了农民的愿望，但是，由于自己没有充分的信心，摇摆于左翼和右翼之间，丧失了夺取政权的机会。失去政权的社会革命党按照既定方针，即把立宪会议看成“确保个人自由、捍卫劳动人民利益的自由的人民主权”，成立了选举委员会，拟定了候选人名单。选举委员会由阿夫克先基耶夫、根捷里曼、A. 戈茨、津季诺夫、里希特、罗森布吕姆、丰达明斯基组成，津季诺夫为主席，斯维雅基茨基为秘书。候选人名单由130人组成，分布在55个省州和陆海军前线。^①

社会革命党在11月12~15日的选举中获得了48401962张选票中的19110074张，占39.5%，与布尔什维克的22.5%和孟什维克的3.2%以及立宪民主党的4.5%相比取得了明显的胜利。^②立宪会议共选出715名代表，其中社会革命党获得了370个席位，占总数的51.7%，布尔什维克党获得了175个席位，左派社会革命党获得了40个席位，两党加起来也没有社会革命党多。^③

夺取政权的布尔什维克召开立宪会议除了满足人民的立宪幻想，更主要的是希望通过立宪会议争取左派社会革命党，扩大苏维埃政权在人民当中的影响。在组建政权方面，“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承诺，不从第二次全俄工兵苏维埃代表大会排挤任何一个人，它现在完全做好准备让那些退出并承认在苏维埃内部联合的人回来，因此，似乎布尔什维克不与任何人

①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17.10 – 1925, т.3, ч.2, с.234, 244 – 261.

② Л. Г. Протасов, 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е Учредительное собрание: история рождения и гибели, с.164.

③ 姚海：《历史性的转折：1917年俄国革命》，参见沈志华主编《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第81页。

分享政权的讲话绝对是谎言。”^① 布尔什维克想建立联合政府，一个条件就是接受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即后来布尔什维克提交立宪会议批准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承认苏维埃政权。

布尔什维克把承认《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作为召开立宪会议的条件，完全不同于社会革命党关于立宪会议是人民主权本身的观点，建立清一色的社会主义政府更是不可能了。布尔什维克本着社会主义的价值标准，在11月21日起草并通过了召回立宪会议代表的法令，其主要目的是对城市杜马、地方自治机关和一切代表机关进行重新选举。11月23日，人民委员会宣布逮捕立宪会议筹委会的立宪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11月26日，人民委员会提出召开立宪会议的条件是全俄立宪会议的代表不得少于400人。11月28日，当部分立宪会议代表按照临时政府规定的开会日期和地点进入塔夫利达宫等待立宪会议人数达到400人时，人民委员会通过了“逮捕反革命内战祸首的法令”，立宪民主党被宣布为人民敌人，被剥夺了参加立宪会议的权利。12月20日，人民委员会确定1918年1月5日召开立宪会议，1月8日召开第三次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同时为了保证会议的秩序，把忠于布尔什维克的军队调入首都。^② 布尔什维克已经做好了随时解散立宪会议的准备。

为了保证立宪会议召开并夺取政权，社会革命党组织了军事委员会，曾经准备派出位于伊兹迈洛夫团队的谢苗诺夫团、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和装甲营进行武装护卫。激进的Ф. Н. 奥尼伯科还打算通过暗杀的办法消灭列宁和托洛茨基。1月3日召开的军事委员会会上经过反复讨论，护卫行动全部取消，代之以和平示威。理由是，“这样做不可能获得成功，更主要的是布尔什维主义已经像细菌一样感染了人民群众，谢苗诺夫团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都不值一提，利用他们除了带来灾难之外，不可能有任何结果”。切尔诺夫更是把“布尔什维克当做人民的一员，而我们的宗旨是不让人民流一滴血，因此同布尔什维克进行武装斗争就变成兄弟之间的残杀，这种斗争是我们不情愿的”。^③

① Ю. Г. Фельштинский, Большевики и левые эсеры. Октябрь 1917 - июль 1918. http://www.politology.vuzlib.net/book_0666.html 20 Jan 2004.

② 沈志华主编《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上册，第82~83页。

③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17. 10 - 1925, т. 3, ч. 2, с. 282, 283.

1918年1月5日立宪会议召开的时刻，被选为立宪会议主席的切尔诺夫尽量不采用比较刺激的字眼，谈得最多的就是革命、劳动人民、民主、法律、民族、社会主义、国际和农民。据波罗塔索夫计算，它们分别出现了155次、174次、127次、72次、65次、56次、54次、50次。^① 切尔诺夫的报告不仅引起了本党的不满，就连布尔什维克的《真理报》也说：“切尔诺夫所讲的完全是对苏维埃纲领的让步，因为在这里也出现了和平、土地、工人监督，上帝啊，还出现了齐美尔瓦尔德。”^② 即便这样，切尔诺夫还是不能阻止立宪会议被解散。

当切尔诺夫宣读完土地纲领和和平纲领之后，大会还没有来得及讨论，塔夫利达宫侍卫长 A. Г. 热列兹尼亚科夫走到切尔诺夫近前对他说：“所有的与会者离开会议大厅，因为哨兵累了。”切尔诺夫虽然很生气地向侍卫长喊叫“任何疲倦都不可能中断法律的宣读”，但是，立宪会议还是被强制解散了。

1月6日，人民委员会宣布了解散立宪会议的决定。1月8日，全俄第三次工兵代表苏维埃召开，通过了布尔什维克提交的立宪会议拒绝批准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苏维埃代替立宪会议成为俄国的议会。

立宪会议解散在俄国民众中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人民非常冷漠地接受了这个法令。社会革命党对人民的行为大失所望。切尔诺夫在会后写了一篇长文，题目是《暴民与平民》。切尔诺夫仍然利用资本主义在俄国发展不太有利的观点分析了俄国的暴民。他认为，俄国是一个流民社会，没有固定的职业，没有正常的生存手段，脱离生活的轨道而陷入流浪状态。在社会安定的时候，他们沉在锅底，一旦遇到社会风浪，就会沉渣泛起。毁坏的情绪是暴民的基本特征，同时伴有轻信的特点，轻信坏的方面，即对各种挑唆比较敏感。对于他们进行良好运作的心理基础就是组织上的疏远和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暴民和知识分子成为对立的两极。^③ 切尔诺夫把平民定义为充满了统一的意识、统一的意志和高度发达自律精神的结构匀称的统一体。平民对于知识分子非常向往并珍视他们。切尔诺夫把暴民变成平民的方法归结为教育。所以，切尔诺夫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地方自治而

① Л. Г. Протасов, 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е Учредительное собрание: история рождения и гибели, с. 313.

② К. В. Гусев, В. М. Чернов штрихи к политическому портрету, с. 112.

③ К. В. Гусев, В. М. Чернов штрихи к политическому портрету, с. 119, 121.

不是政治革命上。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切尔诺夫追求民主而不是专政，因为正是专政使得社会主义成为兵营式社会主义。

切尔诺夫的分析显然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但是，一战却制造了非理性的社会氛围。不仅对于俄国来说，就是对于德国来说也会出现反对政府进行战争的自私行为。切尔诺夫不顾俄国非理性发展的客观现实，对人民在非人性生存状态下表现出的非理性行为不仅没有爱护，相反极力责备。虽然切尔诺夫呼吁不要丧失对人民的信心，但是，由于他面对激情爆发的人民拿不出更好的办法，导致人民对社会革命党的远离。最终，切尔诺夫捍卫立宪会议的行动也就成为捍卫政党利益的行动。

第六章

寻找第三条道路

第一节 第三条道路的提出

一 布尔什维克确立发展方向

1918年1月3日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社会革命党立宪会议党团局和捍卫立宪会议联合会代表联席会议上，中央委员会禁止任何形式的武装暴动，认为它是不合时宜和没有希望的举动。切尔诺夫提出一个方法就是“通过道德使布尔什维克放下武器，为此，我们宣传绝对非暴力的公民游行，采用粗鲁的暴力反对这种游行变得不太容易。我们认为，一切都取决于不给布尔什维克转向流血留下道德说教的口子。我们认为，只有到那时，甚至武装起义的最坚决的捍卫者都可能发生动摇，而我们最不坚定的朋友也会变得坚强”。^①

社会革命党的愿望落空了，布尔什维克在列宁的主导下下令解散了立宪会议，并用武力加以驱逐。布尔什维克提出的理由是：第一，“根据十月革命前拟出的候选人名单选出的立宪会议，反映了过去在妥协派和立宪民主党人执政时的政治力量的对比。当时，人民在投社会革命党候选人的票时，还不可能在拥护资产阶级的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拥护社会主义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之间进行选择。因此，这个应该是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花冠的立宪会议，就不能不成为横在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道路上的障碍”。第二，“十月革命把政权交给了苏维埃，并通过苏维埃把政权交给了被剥削

^① Ю. Г. Фельштинский, Большевики и левые эсеры Октябрь 1917 - июль 1918.

的劳动阶级，因此引起了剥削者的拼命反抗，他对这种反抗的镇压充分显示出它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第三，“在1月5日召开的立宪会议上，由于……右派社会革命党……拒绝讨论苏维埃政权……提出的非常明确、毫不含糊的建议，即承认苏维埃政权的纲领，承认《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承认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这样，立宪会议就隔断了它同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一切联系”。^①

十月革命确立了俄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俄国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走向社会主义革命不是其自身的问题，而是整个世界的问题。俄国的革命和战争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俄国交战的对象都是资本主义国家，从1853~1855年克里米亚战争中的英法，到1904~1905年日俄战争中的日本，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俄国的每一次参战都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力不从心，但不参战毋宁死。俄国不得不边改革边战斗。无疑，从1861年农奴制改革到1906年的斯托雷平改革，俄国经历了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发展。无论哪一次改革都引起了国内的激烈的社会动荡。这种动荡并不是传统观点认为的沙皇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的结果，而是恰恰相反，是改革极大地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正是由于“农奴制关系是被自上而下废止的，而不是从自身内部瓦解的。从经济角度来讲，农奴制经济尚未完全发挥其潜能。广大的农民和地主尚未做好在自由市场经济下实行新的生产方式的准备。”^②所以，农民不断地成立自发的组织反对政府的改革。政府与社会之间的矛盾，或者说资产阶级有产者与劳动人民无产者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直到1905~1907年的第一次革命和1917年的第二次革命。虽然俄国不断经历革命，但是还是跌跌撞撞地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俄国社会也分化成为有产者和无产者。由于俄国经济发展的落后性决定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曲折性，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矛盾特别尖锐。当俄国还常常为资本主义要不要发展引发争论的时候（如民粹派和马克思主义者之争），德国却走上了劳资合作的发展道路。俄国的有产者不仅要大踏步地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而且还要对无产者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耐心和照顾，从而赢得无产者的理解和支持。从发展道路来说，俄国不仅要快速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且还要快速进入社会主义的轨道，只有这样，才能在与德国的竞争中占据上风。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以死亡游戏的方式向俄国提出

^① 《列宁全集》第33卷，第239~240页。

^② 鲍·尼·米罗诺夫：《俄国社会史》上卷，第423页。

了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问题。

俄国的资产阶级还没有成长起来就已经衰老了，于是俄国才出现了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咄咄怪事。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刚刚结束，俄国的社会主义者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正准备开展社会自治的时候，他们由于迟迟不能解决俄国的战争问题、土地问题而成为小资产阶级。开展社会主义革命的布尔什维克一下子宣布过去的伙伴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成为人民敌人。社会革命党感觉非常冤枉，它一方面为农民的权利呐喊，为此提出了土地社会化纲领并确实得到了农民的支持；另一方面又不能理解自私自利的农民如何一下子能够成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社会革命党领导人切尔诺夫在这种矛盾中提出了在资本主义的政权下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基础的妥协纲领。社会革命党的摇摆政策得不到资产阶级的支持，于是，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布尔什维克便把支持资产阶级纲领的右派社会革命党划入资产阶级的行列，支持社会主义纲领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便被划入社会主义的行列。

所以，列宁说：“在推翻沙皇制度以后，俄罗斯的革命应当继续始终不渝地前进，绝不能局限于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因为战争以及战争给疲惫不堪的人民所造成的空前灾难已经为社会革命的爆发打下了基础。因此，说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和群众愤怒的加剧是某一个党、某一个人引起的，或者像有些人叫喊的那样，是‘独裁者’的意志引起的，这再可笑不过了。”^①既然俄国走向社会主义是一种必然，而由于无论是经济还是思想觉悟都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就势必会出现经济发展方式和思想之争，也势必会出现一个党内一批人属于资产阶级，而另一批人属于无产阶级的怪现象。

列宁的划分绝对不是随意的。但是，由于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够充分，列宁的划分从社会经济层面上来讲必定更多地具有乌托邦色彩。列宁为了证明自己的划分不是随意的，而是反映了当时整个世界的发展趋势，于是提出布尔什维克的观点是人民的意志，这就是1905年革命和1917年革命出现的苏维埃。列宁说：“革命之火的光辉就表现在建立了劳动者革命的支柱苏维埃。俄国人民实现了巨大的飞跃，从沙皇制度跃进到了苏维埃。这是一个确凿的、任何地方还不曾有过的的事实……它坚决地命令人民：斗争！把一切都掌握在自己手里！组织起来！”^②

① 《列宁全集》第33卷，第243页。

② 《列宁全集》第33卷，第243页。

列宁抓住革命之中产生的苏维埃这样一个群众组织，采取了与社会革命党完全不同的策略，这就是相信它是一个社会主义的组织，并用社会主义的思想组织它，发展它。虽然农民和工人暂时不具备社会主义思想，但是，经过社会主义的先锋队共产党的组织，它就可以成为与资产阶级进行战斗的机构。第二次联合政府时期的社会革命党也曾抱着同样的想法组织俄罗斯，但是，由于它一直没有足够的信心，只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一遭遇来自工人农民内部的不成熟，如举行罢工、抢劫土地等行为，一遭遇资产阶级的攻击，如切尔诺夫在担任农业部长时遭到立宪民主党的诬陷等情况时，就表现出极端的不冷静：不是谴责人民是暴民，就是谴责资产阶级不好说话。列宁遇到这种情况则非常冷静地加以处理，把组织工人农民过程中出现的困难看做“唤起的革命的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错误和失策，而把资本主义等同于“战争和屠杀”。

列宁对工人农民无产者的“偏袒”，对于资本主义的“冤枉”显然是从发展的视角考虑的，这是为千疮百孔的俄国寻求出路所必然面对的问题。如果列宁不是从战略高度和发展前景来看待俄国的问题，俄国将在灭亡的道路上越陷越深。这也就是列宁不同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等社会主义者的原因。

列宁深感自己对俄国农民无产者的偏袒以及对资产者的“冤枉”。他在1920年写作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说：“我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所具有的意义，不是局部地区的、一国特有的、仅限于俄国的意义，而是国际的意义……所谓国际意义是指我国所发生过的在国际上具有重要性，或者说，具有在国际范围内重演的历史必然性。”^①用罗莎·卢森堡的话说就是：“布尔什维克在确定自己的政策时完全着眼于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②但是，列宁非常清楚，具有国际意义的俄国革命“是靠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的觉悟和它对革命的忠诚，是靠它的坚忍不拔、自我牺牲和英雄气概；是靠它善于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首先是同无产阶级的劳动群众，但同样也同非无产阶级的劳动群众联系、接近，甚者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同他们打成一片；是靠这个先锋队所实行的政治领导正确，靠它的政治战略和策略的正确，而最广大的群众根据切身经验也确信其正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132页。

② 罗莎·卢森堡：《论俄国革命·书信》，殷叙彝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第3页。

确”^①换来的。一旦没有党极严格的铁的纪律，没有得到整个工人阶级全心全意的拥护，没有得到工人阶级中所有善于思考、正直、有自我牺牲精神、有威信并且能带领或吸引落后阶层的人的全心全意的拥护，那么这场革命是保不住的。

无产阶级革命能够坚持下来一方面要得益于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另一方面要同国际资本的力量和国内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习惯的力量和小生产作斗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不断强调领袖、无产阶级与群众在观念上的协调一致。因此列宁说：“消灭阶级不仅意味着要驱逐地主和资本家……而且意味着要消灭小商品生产者，可是这种人不能驱逐，不能镇压，必须同他们和睦相处；可以（而且必须）改造他们，重新教育他们，这只有通过很长期、很缓慢、很谨慎的组织工作才能做到。”而为了抵制小资产阶级的懦弱性、涣散性、个人主义以及由狂热转为灰心等旧病就必须在“无产阶级政党的内部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②

当布尔什维克的嫡系部队喀朗施塔德水兵在1921年成为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力量时，列宁不得不在俄国推行新经济政策，向被“冤枉”的资产阶级让步。列宁说：“我们的无产阶级由于战争和极严重的经济破坏，已经丧失了阶级特性，就是说，它已经失去本阶级的生活常态，不再作为无产阶级而存在了。”列宁让步的目的不是为发展资本主义而发展资本主义，而是“恢复资本主义也就是恢复无产阶级，使他们在大机器工厂里生产有利于社会的物质财富，而不去做投机生意，不去制造打火机出卖，不去干其他一些不太有益但在我们工业遭受破坏的情况下必然存在的‘活计’”。^③

正是列宁的这种既有战略高度又有战术经验的做法才使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之后站稳脚跟。从这个意义上讲，列宁提出以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对抗一切权力归立宪会议是从劳资合作的战略高度提出的，无论对于俄国资产阶级来说，还是对于一切小资产阶级来说都会面临着天大的“冤屈”，但是，这是当时的国际形势引发的，是不可避免的。

这样，列宁要求立宪会议接受《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就不是一个政党对于所有其他政党的强加，相反，是全球大局和俄国不发达的社会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136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154页。

③ 《列宁选集》第4卷，第578页。

经济所造成的。如果从战略高度加以理解，必然就是理性的顺从，如果从政治利益角度出发，必然就成为居心叵测的强制。布尔什维克提出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的内容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第一部分第一条说，俄国为工兵代表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和地方全部政权属于苏维埃。宣言在解释苏维埃共和国的性质时说：“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是消灭一切人剥削人的现象，完全消除社会的阶级划分，无情地镇压剥削者的反抗，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使社会主义在一切国家获得胜利。”^① 列宁意识到，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对于俄国来说有些超前，但是，为了使得俄国能够把这种情形化为现实，不仅对于俄罗斯国家利益是一种伤害，而且对于正在发展着的资产阶级来说也是一种伤害。

宣言第一部分第二条说：“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是建立在自由民族的自由联盟基础上的各苏维埃民族共和国联邦。”这一条对于曾经是各民族的监狱的俄国来说无疑是一颗重磅炸弹。列宁尊重各民族的选择无异于肢解俄罗斯，也正是这一点让热爱祖国的俄罗斯人无论如何不能接受。对于日益兴起的俄国资产阶级来说，废除土地私有制，重申苏维埃关于工人监督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法令，以便保证劳动人民对剥削者的统治，将一切银行收归国家所有，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等都需要在思想上作出重大的转变，否则无论如何是无法接受的。在外交关系上，同资产阶级文明世界的野蛮政策完全断绝关系，宣布芬兰完全独立、从波斯撤退军队以及宣布亚美尼亚有实行自觉自由的政策无疑将把俄国与外部世界隔绝起来。^② 因此，从国家利益角度考虑，完全有理由认为“列宁是俄罗斯的叛徒”。

从《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有利于俄国的弱势阶级，如解决俄国的土地问题、战争问题、民族压迫问题的角度考虑，这些看起来似乎是叛国的政策无疑具有了非常重要的价值。首先，列宁的政策受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指引，不仅能够重新凝聚人心，而且通过发动德国式的无产阶级革命使俄国重现生机；其次，列宁的选择已经成为最后一个选择。所以，尽管俄国其他政党对于列宁的政策有各种否决的理由，但从列宁的政策执行效果来看，其他的政党也不可能拿出比这更好的办法。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布尔什维克的做法首先是从世界战略的高度

^① 徐天新选译《世界史资料丛刊·现代史部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第104页。

^② 徐天新选译《世界史资料丛刊·现代史部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第106页。

对俄国的社会进行重建，在重建的过程中凡是与战略原则相抵触的所有法律政策都会成为打击的对象；其次在具体的政策执行上不同的历史时期采用不同的策略，如在一战结束之前向德国让步，签署布列斯特和约；在战争结束之后，勇敢地执行新经济政策等。

尽管社会革命党不满布尔什维克解散立宪会议的决定，但是，据切尔诺夫回忆，它对于布尔什维克基本上还是保持了等待观望的立场。^① 他们的分歧基本停留在执政的方式上，如社会革命党主张实行民主制度，而布尔什维克主张实行工农民主专政。但是，国家的社会性质属于价值观问题，它规定了俄国未来的发展方向，而执政方式与该国的文化水平有关。列宁从世界战略高度提出俄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在巩固政权、摆脱生存危机方面，凡是反对的必然成为布尔什维克打击的对象。

二 左派社会革命党的反应

受民粹革命思想的影响，左派社会革命党走上了与布尔什维克合作的道路。左派社会革命党与布尔什维克合作一方面是对党迟迟不能确定俄国发展方向的抗议，另一方面是想借助布尔什维克的力量实现和平与土地社会化纲领。但在政权问题上，左派社会革命党还是坚持建立清一色的社会主义政府，一方面可以通过和平方式完成政权的交接，另一方面保持与社会革命党的协调一致。所以，当布尔什维克拒绝组成由小资产阶级的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参加的联合政府时，左派社会革命党则拒绝参加人民政府，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矛盾之中。

最后，列宁做出让步，可以让退出第二次全俄工兵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回来，但前提是必须接受苏维埃政权。^② 社会革命党的多数受民主教条观念的左右不可能接受布尔什维克强加的条件，从而彻底断送了左派社会革命党在政权问题上联系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联合的桥梁作用。

社会革命党在退出与布尔什维克的合作后直到立宪会议解散一直强调布尔什维主义的强制性。如立宪会议解散后，社会革命党在致各地方党组

^① *Marc jansen*,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после октябрьского переворота 1917 года* Документы из архива П. С-Р, с. 8.

^② *Протоколы заседаний ВЦИК II созыва*, с. 21. Ю. Г. *Фельштинский*, *Большевики и левые эсеры Октябрь 1917 – июль 1918*. http://www.politology.vuzlib.net/book_0066.html 20 Jan 2004.

织的呼吁书中说：“国家的命运和革命成就巩固的程度取决于劳动人民及时地克服强奸他们意识、败坏民主力量、瓦解国家和人民生活的布尔什维主义。所以，揭露布尔什维主义，尽可能地用事实揭示它的本质就成为我们宣传鼓动工作的主要内容。”那么，在社会革命党眼里，布尔什维主义是什么意思呢？呼吁书解释说：“布尔什维主义表现为社会主义政变的意识形态并确立苏维埃政权（苏维埃共和国）。由于在贫穷和没有文化的国家缺乏相应的物质和社会心理前提，不可能进行社会主义的重建，不可能成功地发展大工业，不可能建立大的职业工人组织。历经军事崩溃和新的敌人入侵所带来的一切苦难，布尔什维克政权所培植的社会主义不可避免地退化成为直接的对抗，布尔什维主义的意识形态与其社会政治内容完全格格不入。”^①

在这样的情况下，左派社会革命党完全投入布尔什维克的怀抱，同时也借助布尔什维克的力量巩固在农民中的地位。1917年11月8日，左派社会革命党加入了苏维埃政府并把自己参加政府看做建立联合政府的第一步。从11月9日开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斯皮里多诺娃与布尔什维克商量农民代表苏维埃和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合并问题。11月10日，全国农民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会议。由于在第一次全国农民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社会革命党占据优势，^②特别是右派社会革命党占据优势，会议决定在莫吉廖夫召开第二次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为了在农民代表大会中获得优势，左派社会革命党与布尔什维克在9日当天从下层苏维埃和军队中召集了120名代表。10日参加会议的达到195人，来自左派社会革命党的110人。在10日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斯皮里多诺娃宣布赋予下层苏维埃以投票权。社会革命党缺乏勇气拒绝人民群众。左派社会革命党宣布这次会议为农民代表苏维埃非常代表大会，并于11月11日在彼得格勒召开，向社会革命党做出的让步是保证阿夫克先基耶夫和切尔诺夫的人身权不受侵

①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17. 10 - 1925, т. 3, ч. 2, с. 315, 316.

② 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 1917年5月4~28日在彼得格勒举行。参加会议的代表第一天为561名，19日为1340名，最多时是1353名。1167名代表享有全权，其中599名来自61个省和州，568名来自军队。来自各党派的代表中，社会革命党的代表占据多数，超过537名，超过136名代表的为无党派人士，孟什维克有90多名代表，人民社会党和劳动团代表不少于10名，布尔什维克代表只有9名。大会支持社会革命党的政策，其中阿夫克先基耶夫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主席，布列施科—布列施科夫斯卡娅、B. H. 菲克涅尔和切尔诺夫被选为荣誉主席。См., <http://slovari.yandex.ru>.

犯。社会革命党屈服了。他们不仅参加了会议，而且为左派社会革命党和布尔什维克在会议上占据优势提供了合法依据。11月14日，工兵代表苏维埃和农民代表苏维埃合并，接受了第二次工兵代表苏维埃通过的决议。这样，布尔什维克利用左派社会革命党轻轻松松地就打败了右派社会革命党，并把右派社会革命党置于反对苏维埃政权的位置上。社会革命党以离开会议，把全部的希望寄托于立宪会议收场。

12月9日，左派社会革命党参加了人民委员会，Л. Я. 施泰因贝格成为司法人民委员，屠鲁多夫斯基担任城市和地方自治委员，阿尔加索夫担任没有任所的部长——内务委员会成员，B. A. 卡列林担任国家产业人民委员，普罗相为邮电人民委员。1918年1月6日，左派社会革命党与布尔什维克联合解散了立宪会议并在1月8日召开的第三次工兵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把苏维埃送上了立法机关的位置。然而，左派社会革命党与布尔什维克的目标并不一致：左派社会革命党目的是借助于布尔什维克实现土地社会化与和平，布尔什维克的目标则不仅实现农民的土地纲领与和平，更主要的是在此基础上用社会主义的观点改造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布尔什维克不仅可以与德国签署不平等条约，而且还要借助这个条约鼓励俄国人民做社会主义革命的开路先锋。列宁以“普鲁士及其他许多国家因失败以及受征服者征服、凌辱和压迫而遭受困苦”，甚至“签署了比布列斯特和约更苛刻、更野蛮、更耻辱和更具有压迫性的和约，他们后来善于等待，坚定地忍受征服者的压迫，再次起来战斗，再次受压迫者的征服，再次起来战斗，再次受征服者的压迫，再次签订难堪的、极其难堪的和约，然后再次奋起，终于获得了解放”为由劝勉俄国也应该“在任何条件下都养精蓄锐，无论如何要一次在此地重新奋起”。^①

左派社会革命党面对布列斯特和约以及随后布尔什维克实行的余粮征集制立刻暴露了自己坚持社会主义革命愿望的底线。

布尔什维克公布和平法令之后，于1917年11月14日在布列斯特与德国签署了前线停战协定。12月9日，双方着手签署和平条约的谈判。德国接受了俄国的停战协定之后，并没有急着把军队从东方调往西方，而是继续进攻。德国要求保留它随后占领的俄国土地并要求俄国支付30亿卢布赔款。^② 根据这个要求，拉脱维亚的西南部、库尔兰和立陶宛以及波兰王国归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425~426页。

② К. В. Гусев, Крах партии левых эсеров, с. 147.

德国控制，俄国损失 15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土地是俄国人的命根子，这件事引起了布尔什维克内部的激烈争论，并分成主战派和主和派。托洛茨基主张不战不和，列宁力主接受德国的条件，布哈林发言要求用“革命战争”去反对霍亨索伦王朝和哈布斯堡王朝。^①

在 1918 年 1 月 8 日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被称为左派共产主义者的布哈林一派占据了上风。布哈林认为，接受德皇的指令就是在德、奥无产阶级的背后捅上一刀。Г. Я. 索科利尼科夫认为：“历史清楚地表明：世界的中心正在逐渐向东转移。18 世纪的世界中心在法国，19 世纪——在德国，现在的世界中心在俄国。”列宁对奥地利总罢工的结果持怀疑态度，把希望寄托在俄国身上。托洛茨基的不战不和理论出于两点考虑。一方面，托洛茨基把不战看做真正寻求世界和平的表现，这就是不割地不赔款，实行民族自决。托洛茨基的不战来自对帝国主义战争的蔑视。如他 12 月 8 日在国内演讲中说：“人是大自然的主宰，但却屈辱地蹲到壕堑里去，在那里从狭小的洞孔里像从牢房里一样向外窥探；他在那里埋伏着，窥视他的同类——他未来的牺牲品……人类堕落到何等地步……如果战争落得的后果只是使人们回到牛马槽里去拾取有产阶级餐桌上丢下来的可怜的面包屑，那么人类就会自行证明：几千年来一直经受的苦难以及自己思想上的惊人努力都是徒劳无益的。但这样的结果绝不会出现，也绝不可能出现。”正是这份自信使他在谈判中寸步不让，而且带着鼓动德军起义的传单进行谈判。他期待着各国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时刻来临，同时正在使俄国的军队和人民退出战争，期待当年春天农民士兵回到他们的土地上耕种，期待工人士兵回到工厂，制造建设工具，与耕地的农民一起建设社会主义新经济。不和则表现出托洛茨基为了革命流尽革命者最后一滴血的决心，以唤醒仍然沉睡中的苦难的人们。因为他深深地意识到：“昨天的奴隶突然发现自己是在火车头等车厢里，就撕下天鹅绒座套给自己做绑腿，就连这样的破坏性行为本身表现的也是人的个性的觉醒……他撕下天鹅绒，说他也有权捞些好处。两三天后，一个月后，一年后——不，只一个月后，他已经懂得他的行为的丑恶。而他觉醒了了的个性……人的个性，将会永远活在他身上。”^②

① 伊·多伊彻：《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 1879 - 1921·先知三部曲》，王国龙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第 410 页。

② 伊·多伊彻：《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 1879 - 1921·先知三部曲》，第 411、394 - 395、418、454 页。

但是，遗憾的是，当托洛茨基看到前线俄国战壕里几乎空无一人，驻守的士兵都已走光；当2月17日^①德国开始进攻没有遇到任何抵抗，战争几乎全在列车和汽车上进行的时候，他不得不同意列宁的建议，在更加苛刻的条件下支持与德国媾和。没有人愿意在和约上签字，托洛茨基在谈判结束之后辞去了外交部长的职务。

面对德国的羞辱，布尔什维克内部产生了巨大的分歧，因宣布土地法令与和平法令赢得的人气也降到了最低点，同时背上了卖国贼的称号，不能看透俄国革命精义的左派社会革命党自然也会走上与布尔什维克决裂的道路。

左派社会革命党在布列斯特和约上的态度并不像古谢夫所写的那样，认为“大多数农民违背了左派社会革命党意愿，在任何条件下都捍卫和平。农民比左派社会革命党领袖更好地理解签署虽然屈辱但现在必要的条约的行为，因为这是摆脱苏维埃共和国面临的困境的唯一出路”。^②左派社会革命党在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也出现了分歧。托洛茨基回忆说：“耐人寻味的是，应该当场指出，左派社会革命党并不是马上反对布列斯特和约的，至少斯皮里多诺娃刚开始的时候坚决支持签署和约。她说，‘农民不想打仗，任何条约都接受’。她从布列斯特谈判一回来就和我谈，马上签署和约。”^③随着德国在2月份不断地占领俄国城市，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大部分人不赞成签署布列斯特和约。左派社会革命党在这样的形势下也发生了动摇。

2月23日，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讨论布列斯特和约问题。列宁提议立刻批准更加苛刻的布列斯特和约并以辞职相要挟。中央委员会一半赞成，一半反对，最终以7票赞成，4票反对，4票弃权通过了决议。2月23日晚，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举行联席会议，在投票的时候，左派社会革命党反对签署布列斯特和约。2月24日，全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布尔什维克、左派社会革命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左派社会革命党坚持反对签署布列斯特和约，但为了支持列宁，投了弃权票，和约得以批准。^④3月3日，布列斯特和约签署。不到两周的时间，

① 1918年2月14日俄国开始采用公历，从这一天起，本书所有的时间为公历。

② К. В. Гусев, Партия эсеров: от мелкобуржуазного революционоризма к контрреволюции, с. 248.

③ Ю. Г. Фельштинский, Большевики и левые эсеры Октябрь 1917 - июль 1918. http://www.politology.vuzlib.net/book_0066.html 20 Jan 2004.

④ Ю. Г. Фельштинский, Большевики и левые эсеры Октябрь 1917 - июль 1918. http://www.politology.vuzlib.net/book_0066.html 20 Jan 2004.

德国人占领了基辅和乌克兰广大地区，奥地利人进入敖德萨，土耳其人开进特列比崇得。乌克兰作为独立的国家与俄国签订和约。^①

俄国所受的侮辱是前所未有的。布尔什维克除了丧失了领土之外，还把首都迁到了莫斯科。这样的屈辱连克伦斯基的临时政府都不曾经历过。它不能不引起人们对布尔什维克发动革命的动机产生质疑。左派社会革命党领导人卡姆科夫说：“不管统治政党出于什么样的动机，支持批准和约的布尔什维克政党自然就会扼杀革命。”^②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左派社会革命党走上了反对签署和约的道路。

接下来，左派社会革命党召开会议，决定退出人民委员会。列宁虽然谴责了左派社会革命党的行为，但是，鉴于左派社会革命党对于苏维埃政权的支持，布尔什维克继续吸收左派社会革命党在其他部门合作。如契卡部门共20名成员，其中7名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③

布列斯特和约签署以后，英、法为保护自己在苏俄的利益登陆摩尔曼斯克，日本从远东的符拉迪沃斯托克登陆，拉开了外国武装干涉的序幕。德国积极干预苏俄在外高加索、芬兰、乌克兰的撤离军队的行动。国内的局势由于布列斯特和约也陷入了分崩离析的局面。列宁一面坚持遵守布列斯特和约，一面抓紧命令托洛茨基加快军队的组建。

布列斯特和约是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第一次重大的考验。列宁强调签署布列斯特和约的目的是为了赢得喘息的时机。如果从布列斯特和约之后国外侵略者加紧入侵俄国以及国内瓦解考虑的话，列宁所说的“喘息之机”就会受到质疑，特别是布尔什维克一边解散旧军队，一边建立新军队好像有为了巩固自己政权而忘掉国家利益的嫌疑。如1918年5月14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莫斯科苏维埃联席会议上，布尔什维克和其他社会主义政党之间发生了真正的争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卡姆科夫声明：“布列斯特和约应该中止”，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科甘—别尔施泰因呼吁在立宪会议的领导下开展民族复兴，等等。^④可是，社会革命党这样的认识是对列宁的误解，也

① 伊·多伊彻：《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1879—1921·先知三部曲》，第432页。

② Ю. Г. Фельштинский, Большевики и левые эсеры. Октябрь 1917 – июль 1918. http://www.politology.vuzlib.net/book_0066.html20Jan2004.

③ К. В. Гусев, Партия эсеров: от мелкобуржуазного революционизма к контрреволюции, с. 250.

④ О. В. Волобуев и др., Россия XX век-Драм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Большевик и революция, М., Новый хронограф, 2002, с. 248 – 249, 252.

充分暴露出自己理论上的缺陷。

列宁在1918年3月6~8日召开的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和3月14~16日召开的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上对此做了说明。首先,俄国正在经历一场革命,这场革命不仅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且是社会主义革命;其次,革命面临着两个困难,第一个困难是内部组织任务。列宁指出:“社会主义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区别在于:在资产阶级革命时,现成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形式已经具备了;而苏维埃政权,即无产阶级政权,却没有这种现成的关系,有的仅是那些实际上只包括一小部分高度集中的工业而很少触及农业的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形式。组织计算,监督各大企业,把全部国家经济机构变成一整架大机器,变成一个使亿万人都遵照一个计划工作的经济机体……只有通过艰苦的、长期的自觉遵守纪律的办法,才能消灭战争给资本主义社会带来的瓦解现象;只有经过非常艰苦的、长期的、顽强的努力才能消灭这种瓦解现象,并战胜助长这种现象的分子……”第二个困难就是“必须解决国际问题,必须唤起国际革命,必须从我们仅仅一国的革命转变成世界革命。”因为,“从全世界历史范围来看,如果我国革命始终孤立无援,如果其他国家不发生革命运动,那么毫无疑问,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没有希望的”。^①

再次,列宁从文化的角度辩证地思考了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价值。他说:“现在资本主义大大提高了整个文化,其中包括了群众的文化。战争震动了群众,以空前未有的惨祸和苦难唤醒了他们。战争推动了历史,历史现在正以火车头的速度飞驰前进。现在,千百万人正在独立创造历史。资本主义现在已经发展到可以实现社会主义的程度了。因此,如果说俄国现在是在从‘蒂尔西特和约’走向——它无可争辩地正在走向——民族复兴,走向伟大卫国战争的话,那么这个复兴的出路就不是走向资产阶级国家,而是走向国际社会主义革命……我们说,‘仇恨帝国主义强盗’,‘仇恨资本主义’,‘消灭资本主义’,同时又说,‘要向德国人学习,要始终忠实于同德国工人的兄弟联盟。他们没有来得及援助我们。我们会赢得时间,我们会等得到他们的,他们一定会来援助我们。’”^②

列宁的三段论述无疑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俄国面对世界革命,不可能停滞不前,因为它是历史的发展趋势。列宁从这个世界历史的总的前

^① 《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92,第4~5、6、8页。

^② 《列宁全集》第34卷,第76~77页。

景出发得出结论：“商品生产产生了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又导致了帝国主义。这是总的历史前景，不应该忘记社会主义的基础。无论今后的斗争会有什么变故，无论有多少局部的曲折需要我们去克服。为了在这些历史的曲折和波折中不至于迷失方向，并牢记总的前景，以便能看到贯穿资本主义整个发展过程和通向社会主义整个道路的红线……在我看来，不丢掉我们旧的基本的纲领是重要的，在理论上也是唯一正确的。”^① 这也是罗莎·卢森堡在《论俄国革命》中反复加以肯定的。但是列宁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根据俄国的具体情况作出了具体的规划，如实行土地社会化、废除议会制、建立一支最不脱离人民的工农武装力量等。实行布列斯特和约也是根据战争情况作出的一种调整，其目的是等待世界革命的到来。

世界革命的总原则与历史传统的结合演化出来的具体政策，如布尔什维克在俄国提出的土地社会化、工人对工厂的监督、废除议会制度等措施对于巩固俄国的革命成果，迎接世界革命的到来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正如卢森堡在《论俄国革命》所指出的那样，“工会领导人迅速堕落。对此，严酷的恐怖措施无能为力。相反，他们还进一步腐化。唯一的解毒剂：理想主义和群众的社会积极性，不受限制的政治自由”。^② 托洛茨基通过不断革命论，即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过渡，社会主义革命以及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化来化解无产阶级专政所带来的孤立性。^③ 此时的布列斯特和约遭遇到的左派社会革命党的挑战，其核心也是担心无产阶级专政引发俄国革命性的丧失。

列宁的举措是凭着信心求得的。“正是这一点超出了自信的概念，这是一种既不合人的理解也不合逻辑的一种东西……这种信仰抓住了其他人，使他们迷醉，使他们催眠……正如马尔托夫讲的，列宁是一个把巴黎公社73天的革命者和清醒的国务活动家结合在一起的人。”^④ 列宁正是抱着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念，不仅把自己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划清了界限，把自己的政党改名为共产党，而且坚定地剥夺了左派共产主义者和左派社会革命党发表意见的权利。接下来，列宁率领着布尔什维克这个工人阶级的先

① 《列宁全集》第34卷，第43~44页。

② 罗莎·卢森堡：《论俄国革命·书信集》，第30页。

③ 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柴金如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6，第85~87页。

④ Ю. Г. Фельштинский, Большевики и левые эсеры Октябрь 1917 – июль 1918, париж, 1985, с. 127 – 128.

锋队，以顽强的意志在全国实行业务劳动制、余粮征集制、工人征粮队、贫农委员会。俄国进入了战时共产主义时期，进入了与国际资本主义和国内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争战状态。

列宁的坚定信仰感染了徘徊的革命者，也感染了工人、农民和士兵。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10月不超过7000人的彼得格勒赤卫队和莫斯科赤卫队的基础上到1920年已经发展成为500万人的军队了。工人、农民为自己的祖国而战，同情布尔什维克的沙皇将军们也开始为苏维埃政权效力。就连邓尼金也说：“苏维埃政府……用巧妙手段制服俄国将军和军官的意志和头脑，使他们成为虽不情愿但却惟命是从的工具……”^①在4月17~25日召开的左派社会革命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科列加耶夫承认：“我们以退出政权的形式背叛了农民。我们在战争问题上的革命立场没有聚集起群众：因为他们仍然追随布尔什维克，我认为，布尔什维克并没有改变社会革命，只是由于手中没有任何力量和机会捍卫我们的成就而暂时俯就人民。”屠鲁多夫斯基继续说：“摆脱现在的情形可能只有一条求全的、可协商的道路，为了社会革命或者与布尔什维克在中央政权共处，或者在反革命的领导下推翻布尔什维克。”^②结果，左派社会革命党由于没有批准布列斯特和约以及随后布尔什维克的农民政策而走上了与布尔什维克决裂的道路。

列宁的政策无疑损害了俄国的利益，布列斯特和约使俄国失去了1/3的土地，损害了大俄罗斯的自豪感。但是，正如列宁自己所说，帝国的军队早就因沙皇政策的衰败而腐朽了，而正是俄国十月革命才提升了人民的信心。由于沙皇俄国追逐利益太久而忘掉了社会的建设才招致了俄国前所未有的失败。列宁以对世界资本主义的洞察和俄国形势的把握，毅然决然地签署韬光养晦的布列斯特和约，使俄国在战争中完成了社会的转型。

受革命激情的影响，左派社会革命党在农民问题上走上了自杀的道路，最终导致党的灭亡。农民问题就是布尔什维克为了保证战争的胜利而采取的农民支援国家的一系列政策，包括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5月9日颁布的《粮食专卖法令》和6月11日成立的农民委员会。《粮食专卖法令》规定农民在一个星期内把全部余粮卖给国家，凡有余粮而不运到粮食收集站者一律被宣布为人民敌人，判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贫农委员会负责协助征粮队

① 伊·多伊彻：《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1879-1921·先知三部曲》，第446、456页。

② Ю. Г. Фельштинский, *Большевики и левые эсеры Октябрь 1917 - июль 1918*, с. 147.

搜寻粮食和领导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① 粮食的征集是残酷的，也是过多的。如1918年8月20日，布尔什维克“曾规定武装征粮队每队应不少于75人，并配备2～3挺机枪”。粮食的征集额逐年增多，如1917～1918年度征粮4750万普特，1918～1919年度达10790万普特，1919～1920年度达21250万普特，1920～1921年度达28300万普特。^② 残酷的征粮行动和征粮过多导致国家粮食播种面积减少和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列宁提出的征集粮食以及按照阶级原则在农村建立自己的基层组织贫农委员会是贯彻社会主义的一个必要步骤。列宁认为，这里“贯穿着三个主导思想，首先是集中的思想，或者说要把大家联合起来，在中央的领导下进行共同的工作：严肃认真，克服任何灰心丧气的情绪，不要任何粮贩的效劳，团结无产阶级的一切力量，因为在同饥荒作斗争的问题上，我们所依靠的正是那些被压迫的阶级，而且认为只有在他们顽强地反对剥削者，只有把他们全部活动联合起来，才有出路”。列宁讲的集中就是全国按照一个意思进行工作，由思想支配行为。当然这个思想不是资产阶级思想，而是无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是“靠卖私酒或倒卖私酒而发财致富，用一个卢布的本钱赚几个卢布的利润。”无产阶级的思想就是“把余粮看做人民的财产，并且充分意识到劳动者的利益。”^③

列宁把这种思想贯穿于整个社会之中并把它用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加以标示，并不是否定私有财富的价值，而是强调获取财富的正当性。如列宁在1918年4月间写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指出：“没有各种学术、技术和实际工作领域的专家，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不可能的，因为社会主义要求广大群众自觉地在资本主义已经达到的基础上向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迈进……但是，国家要利用优秀的组织家和最大的专家只有两种方式：或是按照旧的方式，资产阶级的方式（即付给高额薪金），或是按照新的方式，无产阶级的方式（即造成全民计算和自上而下的监督的局面，这样，就必然而且自然地使这些专家服从，并把他们吸引过来）。现在我们不得不采用旧的资产阶级的方式，同意对资产阶级最大的专

① 徐天新：《平等、强国的理想与苏联的实践》，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第43页。

② 沈志华：《新经济政策与苏联农业社会化道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第14、15页。

③ 《列宁全集》第34卷，第379、382、380页。

家的‘服务’付给高额报酬。”^①

由于“同先进民族比较起来，俄国人是比较差的工作者。在沙皇制度统治下和农奴制残余存在的时候，情况不可能不是这样的。”同时，俄国又遇到了一战这样帝国主义的最大的胁迫，所以，列宁就把俄国完成具有创造性意识的社会转型比作了一场类似十字军东征的“圣战”。他说：“我们希望，我们认为，我们深信，我们知道，十月革命已经使先进工人和贫苦农民中的先进农民把保持自己对地主和资本家的统治权力看做神圣的东西。他们知道，单纯用物质力量去影响人民群众是不够的。我们需要物质力量，是因为我们要建立专政，要建立用来对付一切剥削者的暴力，谁不懂得这一点，我们就鄙弃谁，免得白费口舌来空谈社会主义的形式。”^②

如果列宁没有改造俄国人民的愿望，仅仅为专政而专政，专政就变成党的专政、个人的专政了，布尔什维克也会变成仅仅为了谋取私利的政党。左派社会革命党并没有这种全局的观念，只是看到了俄国因布列斯特和约而遭受的侮辱，看到了因余粮征集制而造成的对农民的掠夺，因而作出了逆历史潮流的行动。

左派社会革命党认为，俄国社会生活的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卡列林在1918年6月11日会议上直截了当地指出：“农民资产阶级、富农、在农村有剩余粮食的人都是非常模糊的概念，农村的关系比他们描述的更加复杂。所以，专政除了带来农村动刀子打架，除了不谨慎地处理复杂的关系和不足以供养城市饥饿的人的那些不多的粮食外，什么也不会带来。”^③发言直接引发了左派社会革命党对布尔什维克农村改造政策的反抗，使其成为布尔什维克掌权以来唯一一个合法的反对派。

社会上对于布列斯特和约及由此而来的团结整个社会的运动的反应各种各样。据俄国学者O. C. 波尔施涅娃对社会各阶层给全俄苏维埃第四次代表大会发来的170封电报的分析可以看出，支持签署和约的占39%，反对签署和约的占54%，不战不和的占2%，不确定的占5%。反对签署和约的当中76%来自苏维埃，9%来自工人，5%来自农民和市民会议，3%来自布

^① 《列宁全集》第34卷，第160~161页。

^② 《列宁全集》第34卷，第170、382页。

^③ К. В. Гусев, Крах партии левых эсеров, с. 179.

尔什维克、左派社会革命党、社会民主党国际派, 2% 来自红军。支持签署和约的当中 57% 来自工兵农代表苏维埃, 29% 来自农民, 6% 来自市民会议, 3% 来自工人, 3% 来自工会和其他社会组织, 2% 来自民主化的士兵。支持签署和约的动机, 38% 的人只是为了签署和约, 14% 的人是为了准备保护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祖国免遭德国帝国主义的进攻, 11.6% 只是被迫签署和约, 只有 8.3% 的人准备同国内外资产阶级进行斗争, 7.4% 的人支持苏维埃政权及其政策并确信继续战争对于饥饿、崩溃、失业和无政府状态的国家会导致灭亡。反对签署和约的人中, 有 16.2% 的人没有理由, 还有 16.2% 的人是为了捍卫革命成果, 11.7% 的人害怕签署和约会导致国家和苏维埃政权的灭亡, 11.3% 的人认为和约是不可以接受的, 10.8% 的人支持革命动员并建立红军, 7.7% 的人认为和约会灭亡世界革命, 7.2% 的人认为不可能进行有组织的武装斗争, 只能进行游击战争, 5.4% 的人号召与国际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和世界革命。^①

综合对待布列斯特和约及政府政策的态度可以发现, 无论是支持的、还是反对的, 真正的理由还是人们不能接受布列斯特和约给俄国造成的伤害和侮辱。而摆脱帝国主义国家给俄国带来的困境, 最好的办法不是简单地与帝国主义开战, 而是能够分析战争的性质, 从而从根本上理解俄国在世界大战中的命运。显然, 列宁从世界战争的高度看待俄国的命运, 无论是接受屈辱的布列斯特和约还是在之后开展改造俄国的运动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如果从自身的利益出发, 从传统的价值观出发, 从俄国人民自身的能力出发, 以列宁为首开展的这种运动无疑是悖逆的。但是, 无论作为唯一合法反对派的左派社会革命党提出多少反对布尔什维克政策的理由, 无论这些理由从情理上来讲多么符合多数人的利益, 从战略角度出发, 左派社会革命党提出的模糊农村社会分化的事实都是对现实的一种回避。接下来, 左派社会革命党通过合法选举第五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的办法挑战苏维埃政权, 以及在挑战苏维埃政权失败后实施刺杀德国驻俄国大使 B. 米尔巴赫和逮捕契卡人员的举动, 在布尔什维克眼里就会成为试图推翻苏维埃政权的叛乱。^② 尽管 Ю. Г. 费尔施金斯基举出无数的事实或证据证明, 是布尔什维克一手策划了刺杀德国大使米尔巴赫的行动, 目的是借

① О. С. Поршнева, Крестьяне, рабочие и солдаты России накануне и в годы перв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с. 242 - 246.

② К. В. Гусев, Крах партии левых эсеров, с. 191.

助这一事件摧毁唯一的合法反对派，建立无产阶级专政，^①从而从根本上结束有关布尔什维克实行和平和农民政党引发的争论。

左派社会革命党因刺杀米尔巴赫以及由此引发的逮捕肃反委员会主席的行动导致13名叛乱的组织者被处死，参与叛乱的领导人卡姆科夫和普罗相被判处3年徒刑，斯皮里多诺娃被判处1年徒刑。之后，左派社会革命党组织因恢复对德国的战争和其他地区的攻击行动而被取缔。叛乱之后，一些人组织了新的独立政党，如1918年9月，科列加耶夫在萨拉托夫组织了革命共产主义党，扎克斯在莫斯科组织了民粹派共产主义者党。1918年11月，他们加入了共产党。^②

三 第三条道路的提出

左派社会革命党的失败印证了一个事实，即他们在追随布尔什维克建立工兵苏维埃政权的时候，因不能接受布尔什维克采取的屈辱地服务于德国、发动国内战争的政策而与布尔什维克分道扬镳。左派社会革命党的失败不只是证明了布尔什维克的不宽容，更主要的是证明左派社会革命党不支持在德国逼迫下俄国进行社会转型所必须遵循的常人无法忍受的原则。这就是列宁所说的俄国社会主义革命。

左派社会革命党从社会革命党分离出来的原因是社会革命党不能立刻在俄国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实现土地社会化。当布尔什维克党同意实现土地社会化法令的时候，立刻获得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支持并使其脱离社会革命党。但是，左派社会革命党的社会主义主张与布尔什维克的社会主义主张并不一致。左派社会革命党的社会主义仍然是农民式的社会主义，即通过合作社使农民摆脱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剥削，走向社会主义。^③布尔什维克的社会主义不仅使得农民摆脱剥削，更主要的是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列宁说：“要使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必须由无产阶级这一唯一真正革命的阶级完成下面的任务。第一个任务是：推翻剥削者，首先是推翻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主要代表——资产阶级，彻底粉碎他们，镇压他们的反抗……第二个任务是：不仅要争取和引导整个无产阶级或

① Ю. Г. Фельштинский, *Большевики и левые эсеры Октябрь 1917 – июль 1918*, с. 190.

② 徐天新：《平等、强国的理想与苏联的实践》，第45~46页。

③ В. Л. Кузьмин, Ю. Н. Ципкин, *Эсеры и меньшевики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России в период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войны 1917 – 1922 гг.* Хабаровск, Изд. ХГПУ и ДВГУПС, 2005, с. 23.

无产阶级的绝大多数，而且要争取和引导全体受资本剥削的劳动者跟着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共产党走；要在反对剥削者的英勇忘我、坚决无情的斗争的进程中，启发他们，组织他们，教育他们，培养他们的纪律性；要使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绝大多数人摆脱对资产阶级的依赖，使他们根据实际经验相信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的领导作用。第三个任务是：使几乎在一切先进国家里人数还相当多的必然动摇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资产阶级民主和苏维埃政权之间的农业、工业和商业中的小业主阶级以及和这个阶级地位相当的知识分子、职员等阶层保持中立，或者使他们不起有害的作用。”^①

列宁强调共产党对工人和农民的领导作用，是从价值观上考虑的。工人与资产阶级相对，共同建立在自我解放的思想基础上；地主与农民相对，他们则建立在宗法依附的思想基础上。虽然俄国资产阶级和工人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很低，自我解放的思想还多停留在知识分子阶层之中，但是，俄国的革命却符合历史的发展潮流。正如别尔嘉耶夫所说的那样：“我很早就认为俄国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和正义的，但我并不认为它是非常美好的。相反，我早就预见到，在革命中自由将被消灭，极端的仇视文化、仇视‘精神’的因素将在革命中获胜。”^② 因为“俄国革命呈现出来的既是劳动群众的社会主义利益和有产者阶级的资产阶级利益之间的斗争，当然也是社会主义思维类型和资产阶级思维类型之间的冲突。”^③

虽然别尔嘉耶夫把革命的深刻性指出来，但由于他把这种冲突仅仅看做两种思维方式的冲突，因而忽视了精神与物质、灵魂与肉体在冲突中的融合。俄国的冲突是人性与神性的冲突，正是由于文化、政治制度、利益等这种外在的东西压抑了人性的内在发展，所以，俄国只有通过对外在东西的否定，才能恢复心灵的平静，实现人性的解放。这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自己的作品中反复宣称“无论在什么地方，一切光明都采自生活最后的黑暗之中”的原因。^④

左派社会革命党的失败又一次使社会革命党回到了第四次代表大会提出的理论原则，这个原则被切尔诺夫概括为第三条道路。它是对社会革命党自1917年5月与资产阶级联合到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与布尔什维克建立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235～236页。

② 别尔嘉耶夫：《自我认识·思想自传》，第211页。

③ Н. Бердяев, Духовые основы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опыты 1917 - 1918 гг., с. 87.

④ 斯特凡·茨威格：《三大师》，申文林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第128页。

清一色社会主义政府两次失败^①的总结。社会革命党全面反思与资产阶级合作的右派道路，并回到中左派的道路上来，即在社会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建立民主政府。然而，布尔什维克对社会革命党社会主义原则的否定使得社会主义民主政府的建立变得异常曲折并最终夭亡。夭亡的原因非常简单。这就是社会革命党理论家切尔诺夫在十月革命刚刚结束时就明确社会革命党与布尔什维克的分歧不是原则问题，而是策略问题，与布尔什维克所认为的自己与社会革命党的分歧是原则问题而不是策略问题完全相反。他说：“我们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斗争不是反对他们所有的口号。我们同样也支持立刻实现普遍的民主和平，我们还在列宁没有出生的时候就为土地而斗争。我们只是他们策略、他们行为方式的敌人，我们反对的只是列宁败坏群众道德、破坏群众组织、使他们摆脱现实的阶级斗争和革命工作的行为。”^②切尔诺夫对待布尔什维克的指导思想决定了他更加执行与布尔什维克的妥协政策，放弃原则的斗争。

显然，俄国的问题不是推翻沙皇专制和解决俄国土地的问题，而是确立俄国发展方向的问题。由于切尔诺夫总是把眼光盯在民主和专制的政治形式上面，忽视了俄国发展方向的探索。这样，社会革命党就在政治层面上与资产阶级谈民主问题，而在社会层面上与布尔什维克谈农民问题。从归附于利益层面的政治和社会角度出发，社会革命党与资产阶级和布尔什维克都有妥协的基础，但是，它在价值观的问题上则忽视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本质差别。这个差别就是资产阶级属于贪婪的堕落者，而只有无产阶级才是精神贵族。正是这样，列宁才在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之间找到了精神联盟，也只有通过他们之间的联盟才能解决俄国的精神问题，从而实现俄国人性的全面解放。

俄国的解放属于精神解放的最大证明就是对战争的看法。在对待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社会革命党做了这样的回应。“布尔什维克所接受的和平的政治方针无论如何都是与外部敌人一起把俄国引向残酷的国内战争，可以预料，俄国面临的将是完全瓦解和软弱无力的状态。”^③他们认为，“布尔

① *Marc Jansen*,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после октябрьского переворота 1917 года документы из архива* п. с. -р, с. 45.

②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17. 10 -1925*, Т. 3, Ч. 2, с. 42.

③ *Marc Jansen*,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после октябрьского переворота 1917 года документы из архива* п. с. -р, с. 36.

什维克点燃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是人民委员会不明智的政策，是对中欧帝国主义国家联盟的无条件的投降”。从革命的角度，他们认为“布尔什维克在玩弄俄罗斯共和国的生存，各民族的自决权也因德国的刺刀而被取消。布尔什维克签署和约就是批准德国资本的要求，可能会使得俄国革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成就化为乌有。恢复德国臣民的财产权将使实现土地社会化、限制工厂工业资本的独裁面临危险。无力担负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巨额赔款落到了软弱无力的俄国人民身上。为了确保榨取这笔巨额的赔款必然导致军事占领并把我们的海关、铁路和其他国家收入来源交给侵略者。人民委员会同意完全取消军队，完全丢弃不受保护的俄国国土，为把俄国肢解成国际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开辟了广泛的可能。国际民主派，这个只有在拯救俄国人民的条件下，经过共同协调努力才能结束战争的团体，现如今在俄国革命中不是自动归属的中心，而是最大的无政府和分散力量的中心”。^①

社会革命党对于布列斯特和约的回应是功利的。首先，社会革命党把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看做布尔什维克发动的。如果从帝国主义战争的性质出发，从世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大较量，从俄国成为这两场斗争的总中心来看，布尔什维克发动说是错误的。世界大战连接着革命，也就是说，俄国从接受世界大战的那一刻起就接受了世界革命，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是任何人无法回避的。俄国参战之所以引发剧烈的革命，原因在于俄国的社会组织能力正在接受严峻的考验。正如德国驻俄国大使米尔巴赫所说：“在莫斯科，布尔什维克政权主要靠拉脱维亚营和政府征用的汽车维持，汽车经常穿梭于城市，并在需要的时候把士兵运到危险的地方。这样一来，完成没有必要占领两个首都，我们任何一场大规模的行动会立刻自动导致布尔什维克的瓦解。”^② 德国随时可以结束苏维埃政权，支持右派。但是，俄国还没有一支力量像布尔什维克那样与德国合作。也正是德国与布尔什维克的合作成为布尔什维克在俄国乃至整个欧洲发动革命的条件。^③ 最后，列宁取得了胜利。列宁胜利的原因很简单，这就是托洛茨基所说的而列宁同样相信的，“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不仅由目前技术设备的条件

① *Marc Jansen*,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после октябрьского переворота 1917 года документы из архива п. с. -р*, с. 36 - 37.

② *Ю. Г. Фельштинский*, *Большевики и левые эсеры Октябрь 1917 - июль 1918*, с. 131.

③ *Ю. Г. Фельштинский*, *Крушение мировой революций Брестский мир: Октябрь 1917 - ноябрь 1918*, М., ТЕРРА, 1992, с. 34.

决定，而且还受这个国家内在的潜力决定”。^① 列宁就是这样通过革命家的信仰组织起俄国的人民，战胜了德国给俄国设置的巨大的考验。

其次，社会革命党攻击布尔什维克接受和约的理由无非是俄国遭遇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物质损失，进而侮辱了大俄罗斯的自豪感。回顾俄国历史上的历次战争，几乎都是在夺取土地的条件下展开的，俄国的改革和革命也围绕着土地进行。如果战败使俄国失去了土地，那么，俄国的土地革命更是让有产者失去土地，从而改变社会两极分化的局面。如果从革命的角度来理解，社会革命党能够接受在全国分配土地，那么为什么不能接受被俄国强制纳入版图的国家获得独立？可见，社会革命党在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的态度就可以证明他们提倡的民族自决是停留在理论上的。社会革命党提出的依靠国际社会主义会议和国内各方面的努力实现普遍公正和平的方法虽然表面上义正辞严，但是，从临时政府的实践来看是失败的，重复实践也不可能获得有效的支持。相反，列宁牺牲了俄国民族利益而开展了世界革命，不仅解决了沙皇是各族人民的监狱的问题，有力地支援了世界民族解放运动，而且实现了俄国从对外扩张向内部建设的社会转型。这就是列宁提出的向德国这个敌人学习的革命内涵。由于列宁的革命已经超越了民族利益、文化利益，不仅是对俄国封建农奴制度的批判，而且也是对资本主义贪婪的批判。列宁的革命不仅损害了有产者的利益，而且损害了俄国整体的文化利益，因而在不理解这种革命的人眼里就必然成为民主革命和国家利益的背叛者。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社会革命党与资产阶级和君主立宪分子结合在一起，成为苏维埃政权的反对者。列宁也从这个意义上把社会革命党称为反革命。

由于切尔诺夫在土地革命上支持布尔什维克，同时从劳动的意义上也不反对无产阶级，于是社会革命党就把与布尔什维克的分歧当做策略上的分歧而不是原则上的分歧。切尔诺夫以策略之争代替原则之争，实际上放弃了对原则问题的进一步探索，从而间接地放纵了布尔什维克并使其最终走上了无产阶级专政。社会革命党实际上成为布尔什维克形式上的反对派。

基于同一个原因，社会革命党内部也在处理与布尔什维克的关系问题上发生了分裂。右派社会革命党成为社会革命党的主流，走上了反对布尔什维克的道路，左派社会革命党成为布尔什维克的支持者，以切尔诺夫为

^① 伊·多伊彻：《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 1879 - 1921·先知三部曲》，第 403 页。

首的中派虽然试图以第三条道路的思想凝聚整个社会革命党，但是，由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文化和思维方式上的截然对立，不可能在第三条道路上获得突破。所以，切尔诺夫关于“正是布尔什维克对革命的歪曲才把广大的农民、知识分子甚至部分工人投入了白军的阵营，所以为了把这些人重新纳入革命的阵营就必须站在独立的第三支力量的立场”^①的观点是根本不能成立的。从理论上来说，第三条道路的思想注定了社会革命党既不能在布尔什维克专政的旗帜下与白军进行战斗，也不能在白军的旗帜下反对布尔什维克。社会革命党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徘徊之中。切尔诺夫在党内的地位一落千丈，不得不转入理论研究。

成为社会革命党主流的右派社会革命党完全陷入了没有原则的利益之争。为了团结国内外民主革命的支持者，政治上社会革命党围绕立宪会议的召开公开走上了反对布尔什维克的道路，在社会政策方面批判布尔什维克的反工会运动，反对建立苏维埃国家，反对工人监督，反对银行国有化，反对义务劳动制，反对土地社会化政策，等等。

1918年5月7～16日，社会革命党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八次党务会议，对于“第三条道路”理论下的工作进行了部署。关于时局，决议说，“布尔什维克六个月的政活动使国务活动陷入了瘫痪、财政全面崩溃、经济生活组织涣散、对外联系被摧毁，这一切使得俄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整体不复存在。与此相伴随，有产资格分子内部反动的情绪在滋长，在外交问题上以德国为指针的倾向正在加强，复辟一派有强化的危险，甚至完全可能借助德国的刺刀取得胜利。政治复辟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社会的复辟。在乌克兰已经完全恢复了土地私有制，不仅庄园和资产归还了地主，就连革命当中的损失也归还给他们”。鉴于这种情况，社会革命党建议俄国革命的主要任务就是“为恢复俄国的独立和在解决二月革命提出的社会政治任务的基础上振兴国家民族的统一。这个任务的完成只有在结束内战，团结国家所有创造性力量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在复兴民族国家的大业上，劳动民主派担负起创建全民统一战线的使命，通过建立真正强大的城乡阶级组织实现这个目标”。^②

社会革命党提出的任务进一步明确了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

①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в первые годы советской власти,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2006, №4, с. 9.

②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17. 10 – 1925, Т. 3, Ч. 2, с. 389.

质，在明知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已经由于价值观的问题而变得不可调和的情况下继续维持妥协政策，名为妥协，实为实现阶级利益。他们为了对付因调整价值取向而激化社会矛盾也就是国内战争的布尔什维克，不惜与沙皇时期的盟国英法重新结盟，与国内其他的社会阶层、政党结成复兴同盟，恢复与德国之间的战争即所谓东方战线。社会革命党的政策不仅破坏了其在人民当中因为主张实现土地社会化而赢得的信誉，而且把已经停止的与德国的战争进一步深化。俄国的问题越来越复杂了，不仅有因社会革命党借助国际力量实现民主革命而出现的外国干涉，而且有因沙皇将军、保皇党和资产阶级政党联合发动的内战而激发的人民对恢复沙皇政权的恐惧。社会革命党尽管在外国武装力量干涉俄国内部事务而造成对俄国主权的践踏方面有所顾虑，提出盟国越过俄国领土要经过拥有武装力量的合法政权的允许，^①但是，在国家已经缺乏统一军队的情况下，借助于外国的力量是不可能恢复国家的战斗力的，更不可能通过这样的战斗挽救被德国灭亡的命运。社会革命党捍卫民主革命成果的举动加剧了国内战争。当然，社会革命党变成地道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名声也越做越实。

首先，社会革命党坚定地认为布尔什维克的专政只能代表阶级组织，与代表民主组织的立宪会议无论如何不能相提并论。这样，立宪会议不仅压制了苏维埃阶级愿望的表达，而且成为一切反对布尔什维克革命者利益的堡垒。由于社会革命党与立宪民主党、君主党、将军代表缺乏联系，他们于1918年3~4月间成立一个复兴同盟。复兴联盟的含义，就是复兴立宪会议。发起者是右派社会革命党阿夫克先基耶夫和阿尔古诺夫。参加者有立宪民主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各2人、人民社会党3人、无党派人士1人。右派社会革命党越来越脱离党的纪律约束，以复兴联盟的身份积极开展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军事斗争，与萨温科夫组织、布鲁希洛夫将军^②、民族中心^③和君主派组织积极联系，利用非社会主义组织和盟国派驻俄国的军事力量建立西伯利亚临时政府。右派社会革命党放弃原则而追求民主形式的做

①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17. 10 - 1925, т. 3, ч. 2, с. 390.

② 布鲁希洛夫(1853~1926)，1912年担任沙皇将军，1916年担任西南前线司令，1917年5~6月担任总司令，10月革命后反对布尔什维克，后来为布尔什维克服务，曾任红军骑兵督监。

③ 民族中心是反布尔什维克的政党和组织的联合机构，1918年5月在莫斯科成立，在彼得格勒和其他城市还有分支机构。1919年秋被取缔。主要组成人员是立宪民主党和十月党。

法虽然愿望良好，但是在所有社会阶层缺乏联合意愿的基础上，为民主而民主的做法加剧了国家进一步的专政。

其次，社会革命党追求建立联邦共和国代替苏维埃共和国，表面上尊重各个国家和民族的主权，但是，在沙皇专制给各个民族造成伤害的情况下，联邦共和国演变成为乌克兰独立，芬兰独立以及波兰与苏俄之间的敌对战争。

最后，社会革命党推迟了国内的社会改革。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角度来说，社会革命党认为俄国没有建立民主政权，不能实现土地社会化，布尔什维克对土地社会化的歪曲是夸大了社会的创造力。社会革命党建议推迟土地社会化的实施，把重点放在社会关系的培植上，为土地改革做准备。按照 C. 马斯洛夫的观点就是临时分配土地，即分配私有土地和在土改时没收的机关的土地，份地和小私有土地不在分配之列；保护生产，具有国民经济意义的土地退出重分，组织分配机关（土地委员会）和解决争议的协调机关。在工人监督问题上，社会革命党认为它既不能解读为直接实现社会主义的措施，也不能看做实现社会主义的准备。因为工人监督不能消灭资本主义固有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并在全国范围内组织整个国民经济。在社会革命党看来，在工业国有化的前提下，工人监督既不能提高生产力，也不能提升或降低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这样一来，由于解散军队加剧的失业问题不仅过去达到了，在不久的将来还会达到更大的规模，与之进行的全国范围内的斗争只有在整个国家层面上才是可能的。^①

社会革命党第八次党务会议决议完全反映了所谓第三条道路的摇摆政策，而基于民主的要求开展的第三条道路的探索就变成了反对新的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斗争。从实际的结果来看，这种做法不仅没有带来俄国的社会民主，相反破坏了农民工人劳动者解放的大业。

第二节 第三条道路的尝试

一 国家政权的建立

从立宪会议解散到第八次党务会议召开的几个月的时间里，社会革命

^①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17. 10 - 1925, т. 3, ч. 2, с. 382, 385, 386 - 387.

党一直致力于恢复人民主权和捍卫祖国尊严的斗争。随着布尔什维克查封反对派的报纸，社会革命党不得不逐渐转入地下，开展非法斗争。

彼得格勒是布尔什维克的重镇，社会革命党在彼得格勒无所作为。在社会革命党的倡议下，以社会革命党为中心的立宪会议代表组成了跨党立宪会议代表委员会，包括社会革命党、社会民主党、人民社会党、爱沙尼亚人、犹太人和穆斯林。跨党立宪会议委员会成立的目的是在布尔什维克控制不严的地方着手恢复立宪会议，如基辅、顿河地区、高加索和西伯利亚。他们中的一些人首先探讨把立宪会议迁往乌克兰的可能性，由于布尔什维克浪潮很快席卷了乌克兰而作罢。于是，跨党立宪会议委员会成员把活动的中心转向了莫斯科。

社会革命党以立宪会议中的多数自居，即他们在立宪会议的 703 名成员中占 338 名，因而理所当然地承担起了恢复立宪会议、结束内战的重任。社会革命党之所以着力恢复立宪会议原因在于它秉承的民主原则。社会革命党人相信，如果不把俄国的民主力量团结起来就不足以解决俄国的问题和发展方向。然而，社会革命党中的右翼一直坚持在立宪会议中整个国家的利益高于狭隘的政党利益的观点。^①正是这种观点才使得社会革命党右翼越来越丢弃了价值观的革命，反而陷入了以追求国家利益为目标的小团体的利益。社会革命党右翼认为追求国家利益高于政党利益符合道义原则，因而坚决反对具有价值观革命意义的劳资团结的德国普鲁士精神和以此精神为榜样的布尔什维主义。

社会革命党的民主革命既要反对沙皇专制，又要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专政，所以，在布尔什维克推翻了 1917 年二月革命以来的民主体制，特别是不顾人民和祖国的利益而与德国签署布列斯特和约之后，社会革命党便公开地走向了依靠坚持民主原则的英法盟国和国内资产阶级，反对德国帝国主义和布尔什维克的道路。俄国学者以此为由把社会革命党称为“民主反革命”，认为他们“为了捍卫‘人民主权’，利用外国的资助建立以君主情绪的军官为首的队伍，为白卫军专政扫清了道路，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直接傀儡和最反动的资产阶级地主集团腾出了地方”。^②古谢夫的认识忽视

^①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в первые годы Советской власти,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 6, 2006, с. 5.

^② К. В. Гусев, Партия эсеров: от мелкобуржуазного революционаризма к контрреволюции, с. 279.

了德国普鲁士精神劳资合作的社会转型特点，混淆了国内地主与资产阶级之间在价值观上的区别。

社会革命党一直追求人民主权，即在坚持言论、集会、出版、结社自由的条件下，通过普遍、平等、秘密、直接的选举建立民主政权，反对任何情况下的专政。社会革命党为消灭差别，主张土地社会化并把它作为实现社会主义最高目标的基础。然而，俄国没有经过宗教改革，西方文化与本土文化没有实现有机的结合，无法进行自我再生产，^① 导致“精神本身来不及回归自我，太多的事物在吸引着它，妨碍着它，使它处于异己的存在之中”。^② 布尔什维克一下子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就是在激烈战争的环境下，通过社会上层对社会下层的超越阶级利益的关爱，重建社会共同体。这是一种结合了世界革命和民族传统而进行的精神改造，也是对沙皇专制和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超越。布尔什维克精神改造的特征强调对世界和俄国社会的奉献，唯如此才能超越帝国主义，才能超越资产阶级。列宁以坚定的信仰换取全世界无产者的支持与俄国无产者的同情，是对社会民族主义者和俄国有产者的挑战，是对他们追求个人和国家利益与权利的强制剥夺。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革命党关注人民主权，关注国家利益就变成了一种私利。虽然这种私利能够一时满足有产者和人民的需要，但却不能获得在国际上和国内各民族面前的发言权。这样，社会革命党越是强调布尔什维主义建立在刺刀基础上的残酷性，越是忽视布尔什维主义所具有的内在的精神革命；越是强调布尔什维主义对沙皇资产阶级祖国的背叛性，越是依附于英法盟国和国内的有产者甚至君主分子反对苏维埃政权，从而成为布尔什维克的敌人和无产阶级祖国的背叛者。这就是社会革命党第三条道路带来的悲剧。

社会革命党与布尔什维克的斗争并不容易，一方面由于不少工人站在布尔什维克一方，以至于组建志愿军比较困难；另一方面，布尔什维克采取了非常严厉的措施，用津季诺夫的话说采用了枪击、搜查和挑唆手段，^③ 使得斗争比沙皇时期更加艰难。在莫斯科，社会革命党的莫斯科委员会也

① 徐凤林：《从东正教领袖传统看俄国文化史——霍鲁日的俄国文化史观》，参见《“俄罗斯发展道路：历史与现实”学术研讨会暨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2009年年会会议手册》，第55页。

② 格·弗洛罗夫斯基：《俄罗斯宗教哲学之路》，第572页。

③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в первые годы Советской власти,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2006, No. 6, с. 8.*

曾经采取许多反制措施，如吸收虽与社会革命党政见不同，但反对布尔什维克专政的人物为政党服务。一位叫做 T. 特卡琴科的战争期间参谋部作战处前处长，军队的指挥官之一，帮助莫斯科的社会革命党建立了一个严格的密谋组织，参加者有几千人。一个从罗马尼亚前线下来的总参谋部的上校、社会革命党党员马辛，利用布尔什维克招募军官的机会，打入布尔什维克司令部，为社会革命党提供情报。与捷克斯洛伐克兵团作战的时候，马辛组成了一个几乎只由社会革命党组成的参谋部，在需要的时候把乌法交给了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和人民军，率部归顺了立宪会议成员委员会，直到 1918 年 12 月。

然而，社会革命党最大的问题还是它的摇摆政策。据津季诺夫回忆，由于社会革命党执行联合政策，他们不知道依靠什么人，在他们周围存在着各种看得见的阴谋，受到萨温科夫组织、布鲁希洛夫将军、立宪民主党民族中心以及君主组织的算计。虽然社会革命党声明与仇视布尔什维克相比更仇视右派组织、君主组织和德国组织，但是社会革命党因为争取保卫本土的“爱国”政策而牺牲自己的原则导致自己很快在莫斯科失去了根基。^①

切尔诺夫、季莫费耶夫、津季诺夫一面与盟国谈判对抗德国和苏维埃政权，一面把大部分中央委员疏散到北方州、沃洛格达、乌拉尔近区、伊热夫和沃特金工厂区、乌拉尔和伏尔加河流域，^② 发展自己的力量，建立自己的政权。

社会革命党首先建立的是西伯利亚政权。受斯托雷平改革的影响，西伯利亚农民经济获得了很大发展，成为社会革命党的基地之一。^③ 为了建立政权，右派社会革命党在立宪会议解散后加紧在这个地方的活动，与自由派、君主派和其他社会主义者建立联合政权。

1918 年 1 月，西伯利亚州杜马在托姆斯克建立，由右派社会革命党人 И. А. 亚库舍夫担任主席，并接受了社会革命党提出的以恢复立宪会议为目标的“西伯利亚州杜马宣言”。1918 年 1 月 28 日，西伯利亚临时自治政府

①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в первые годы Советской власти,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2006, № 6, с. 9.*

② *В. Л. Кузьмин, Ю. Н. Ципкин, Эсеры и меньшевики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России в период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войны 1917 - 1922 гг., с. 68.*

③ *В. В. Гармиза, Крушение эсеровских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 М., Мысль, 1970, с. 66.*

(ВПАС) 成立, 由社会革命党 П. Я. 德贝尔任主席, 参加政府的有立宪民主党人 П. В. 沃洛戈茨基、孟什维克 И. С. 尤金, 大部分为社会革命党。由于害怕被此地的苏维埃解散, 政府迁往不受苏维埃控制的符拉迪沃斯托克; 留在西伯利亚的是西伯利亚临时自治政府建立的区域委员会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ые коллегии-комиссариаты)。西西伯利亚区域委员会设在托姆斯克, 东西伯利亚区域委员会设在伊尔库斯克。

西西伯利亚区域委员会成为各种势力聚集的中心。委员会由社会革命党前立宪会议成员 П. Я. 米哈伊洛夫、П. Д. 马尔科夫、М. Е. 林贝格和托姆斯克地方自治管理局主席 В. 西多罗夫组成, 其办事机关则由社会革命党和资产阶级的“无党派”人士组成。委员会希望办事机关是自己意志的执行者, 但后者不愿受到限制。于是, 两个机构发生了冲突。比如, 委员会希望保持捍卫苏维埃工人阶级职业利益的职能, 抑制私有制企业的发展, 实施 1918 年 1 月 5 日立宪会议通过的土地社会化法案; 但办事机关则倾向于尽快取消决议。为了解决这种分裂的局面, 社会革命党主张尽快与国家右翼团体建立联合政府。

萨马拉是社会革命党群众基础较好的地区之一。社会革命党立宪会议代表利用哥萨克军队战胜布尔什维克军队, 以及伊热夫工厂、沃特金工厂爆发起义之机, 建立立宪会议政权。

根据布列斯特和约, 战争中被俄国俘虏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通过符拉迪沃斯托克返回协约国法国。虽然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同情右派社会革命党, 但是不愿意卷入俄国内战。1918 年 6 月 8 日, 当载着军团的军列途经萨马拉时, 遇到了布尔什维克军队的阻挡。军团被迫加入对布尔什维克的作战。^① 萨马拉的社会革命党利用这一契机, 劝说军团留下来, 帮助自己组建军队。在军团的帮助下, 萨马拉的政权很快脱离布尔什维克的控制, 转交到社会革命党手里。社会革命党联合其他社会力量, 建立了立宪会议成员委员会政权, 简称科木奇 (КМУЧ), 是社会革命党最大的政治中心。

萨马拉当局向人民发出呼吁, 宣布布尔什维克政权被推翻, 号召所有珍惜人民主权思想、珍惜祖国完整与独立的人, 站在立宪会议的旗帜

^①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в первые годы Советской власти,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2006, № 6, с. 17.

之下。^①

萨马拉当局要求恢复地方自治，在建立全俄政府之前，将所有的公民权和军权转交给萨马拉省普选产生的由立宪会议成员组成的委员会；组建人民军，把指挥军事力量和保护城市和各省秩序的权力交给军事司令部管理；同时恢复言论、出版和集会自由，废除不符合真正人民民主原则的革命法庭，恢复区人民法院。^②

立宪会议成员委员会为最高权力中心，选出的州政府应与委员会协商，以履行全民族和全国的任务，直到全国立宪会议产生。由于执政的五位官员都是社会革命党人，其他各政党和组织都质疑，认为该委员会为党的政权。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6月11日，委员会下令萨马拉城市杜马重新选举。8月1日，委员会发表声明，委员会执掌政权直到立宪会议召开，并做相应的准备。委员会在行动上忠于祖国并致力于民族振兴，恢复战斗能力，确立秩序，改善国家的经济状况，确立国家的民主原则。但在战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社会革命党的行动变成了与盟国一起消灭苏维埃政权。

立宪会议成员委员会主要由社会革命党人组成，虽然为了赢得其他政党的支持，社会革命党采取了妥协政策，但是，它的社会主义主张不可能不在土地政策和工人政策上留下自己的痕迹。比如7月24日颁布的土地政策中规定，“土地一劳永逸地转为人民财产，任何尝试把土地交给地主的做法都是不允许的。买卖和抵押农业用地以及林业设施一律禁止，秘密的和虚假交易宣布无效”。又比如，“工人阶级有权要求国家实行一系列社会改革，保证他们免遭社会剥削……立宪会议保证8小时工作制”^③，等等。

反映社会革命党社会思想的这些政策，在其他政党中立即引起了异议。立宪民主党在萨马拉《伏尔加河日报》上激烈抨击委员会的社会政策。右派社会革命党为了缓和与其他政党的矛盾，着手建立联合政权。

第一次联合是西伯利亚临时政府（BCП）的建立。1918年6月30日，在西伯利亚州杜马会议上，西西伯利亚区域委员会把权力移交给新建立的

^①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в первые годы Советской власти,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2006, №. 6, с. 17–18.

^②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в первые годы Советской власти,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2006, №. 6, с. 18.

^③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в первые годы Советской власти,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2006, №. 6, с. 24, 25.

西伯利亚临时政府。立宪民主党人沃洛戈茨基任政府主席，社会革命党人米哈伊洛夫担任了内务部副部长。西伯利亚临时政府宣布，只由本政府与西伯利亚州杜马共同对西伯利亚的命运负责。但是，西伯利亚临时政府没有把西伯利亚杜马看做立法机构，而是看做巩固自己法律地位的工具。西伯利亚临时政府完全执行了与社会革命党相反的政策，宣布归还没收的公家、私人、教会、修道院、学校的土地和份地，取消所有土地委员会，宣布经济活动自由，取消国家在各方面对公民的所有限制，等等。

为了赢得主动地位，右派社会革命党占优势的西伯利亚临时自治政府提出召集西伯利亚州杜马和全西伯利亚立宪会议。

9月，西伯利亚临时政府部长会议主席沃洛戈茨基把自己的管辖范围扩展到远东，取消了德贝尔领导的西伯利亚临时自治政府和中东铁路主管Д. Л. 霍尔瓦特的办事机关，并得到了立宪民主党和英、美、日外国势力的支持。^①

右派社会革命党的第二次联合，是萨马拉立宪会议成员委员会和西伯利亚临时政府的联合。1918年7月15～16日，在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介入下，两个政府决定在乌拉尔的车里雅宾斯克召开联合会议，讨论共同建立全俄统一政权的问题。由于各不相让，会议决定在乌法召开国务会议，邀请所有州政府代表、现有的立宪会议成员和各政党的中央委员会代表参加。

国务会议在1918年9月8～23日举行。与会代表共142人，其中立宪会议代表70人，各州和哥萨克政府代表32人，各政党代表12人以及其他各社会组织的代表。会议提交了12份宣言，就建立统一政权问题提出了两种不同的观点。多数人认为，执行机关应对立法机关负责，但关于对什么样的立法机关负责存在争论。立宪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统一派提出建立无责任政府的主张，因为建立责任内阁会妨碍内阁的活动。两派意见不分胜负。会上，乌拉尔临时政府和复兴联盟提出按照联合原则组建中央政权，建立由所有派别和集团参加的、严格遵循联合原则的国家监察机关。

经过会上争执和会下的军事较量，最终两派达成妥协。乌法会议决定：西伯利亚临时政府在1919年之前以无责任政府发挥作用，立宪会议在1919年1月1日召开，前提是与会法定人数不得少于201人；如果法定人数不足

^① В. Л. Кузьмин, Ю. Н. Ципкин, Эсеры и меньшевики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России в период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войны 1917–1922 гг., с. 86.

201人，会议推迟到2月1日举行，但参加人数不得少于立宪会议成员的1/3。^① 双方妥协的结果是，社会革命党保住了立宪会议；西伯利亚临时政府建立了无责任政府。

1918年9月23日，西伯利亚执政府宣布成立。这标志着统一的全俄临时政府的建立。执政府不对任何人负责，其任务是积极筹备新的立宪会议。政府由5人组成，分别是Н. И. 阿斯特罗夫（立宪民主党）、В. Г. 博尔德列夫将军（复兴联盟）、阿夫克先基耶夫（社会革命党），Н. В. 柴科夫斯基（人民社会党），П. В. 沃罗戈茨基（西伯利亚临时政府成员）。实际执政的则是阿夫克先基耶夫、博尔德列夫将军、В. П. 维诺格拉多夫将军、津季诺夫和В. В. 萨波日尼科夫。

乌法会议的结果在社会革命党内引发了争议。中央委员根捷里曼认为，“乌法会议对社会革命党是一个巨大胜利，它最为成功地捍卫了现有成员的立宪会议”。但切尔诺夫却认为，乌法会议是一个失败，一是它放弃了立宪会议原则；二是建立的无责任执政府是对民主原则的践踏。^②

实际上，乌法会议从诞生时起，就是一幕悲剧。新公布的纲领不仅排除了社会革命党民主制的法律条文，而且没对未来的国家制度做出具体规定。在土地问题上，不仅没有执行1918年初立宪会议通过的土地纲领，而且不允许改变现有的土地关系。社会革命党与国家右翼团体只是在外交政策和经济措施方面达成一致，以维持暂时的生存。从各个政党的利益来看，不同政治组织之间仍然需要磨合，这就为右翼君主派和军人专政提供了可以利用的契机。

为了加强中央权力，执政府颁布法令，剥夺所有州政府的权力。根据阿夫克先基耶夫的建议，执政府迁往鄂木斯克，西伯利亚临时政府的各部长成办事人员。办事机关吸收了越来越多的具有君主思想的将军，如海军将领А. В. 高尔察克、И. Н. 克拉希利尼科夫等。根据津季诺夫回忆，为了建立统一政权，执政府尽量淡化政党倾向，无论哪一个组织都无权召回自己的代表。阿夫克先基耶夫把这种政策称为“蒙蔽”政策，亦即完全放弃

① В. В. Журавле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совещание, См., К истории консолидации антибольшевистского движения на востоке России в июле-сентябре 1918 г. http://www.zaimka.ru/2007/siberian_counterrevolution3/.

② В. М. Чернов, Черновская грамота и Уфимская директория,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2006, №. 2, с. 10.

了政党纲领。蒙蔽政策虽然促成了新的联合，但是未来俄国政府的候选人问题是由复兴会议联盟和立宪民主党的民族中心决定的。^①而自从政府迁往鄂木斯克的一刹那，政权就转入了西伯利亚政府手中。

在西伯利亚政府的压力下，执政府同意组建部长会议，参加者是所有西伯利亚政府的行政委员会委员和各部部长。这样，西伯利亚政府变成了全俄政府。部长会议没有一位社会主义者。执政府成员中只有伊万·米哈伊洛夫担任了部长，代替被暗杀的社会革命党人诺沃西洛夫。津季诺夫回忆：“西伯利亚行政委员会决定消灭我们，把全俄政权全部掌握在自己手中，把我们变成装饰。”^②

1918年10月22日，根据切尔诺夫的指示，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公布了给各级党组织的指导信，批评乌法会议和执政府的政策，声明执政府只有在具有民主性质同时在军队中为自由宣传社会革命党的观点创造条件的情况下才会得到党的支持。阿夫克先基耶夫称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的信是把执政府送入棺木的最后一颗钉子。^③

1918年11月16日，执政府在罗马尼亚的亚斯克召开了新的会议，各党派政治势力争吵不休，削弱了相互的力量。11月18日，高尔察克海军元帅以切尔诺夫反对执政府为由发动政变，逮捕了社会革命党的阿夫克先基耶夫、津季诺夫、阿尔古诺夫和内务部副部长E. Ф. 罗戈夫斯基。几天后，又把他们驱逐到海外。高尔察克成了最高执政。这样，以社会革命党为代表的民主派，便被迫走上了既与布尔什维克又与君主派的白军两线作战的绝路。

社会革命党的北方政权比萨马拉政权建立得晚，但结束得早。北方政权总部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包括阿尔汉格尔斯克省、沃洛格达省、雅罗斯拉夫省、科斯特罗马省、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省。社会革命党在北方各省建立政权借助了协约国的力量，正是这一点成为俄国学者断言社会革命党投靠帝国主义的证据。如1918年7月中旬，协约国代表通知“俄国复兴同盟”，协约国将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登陆。别尔格上校和阿尔汉格尔斯克的社会革命党人杰杜先科、马斯洛夫和科瓦尔斯基指挥的白军为迎接协约

① O. B. Коновалова, В. М. Чернов о путях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и, с. 128.

② O. B. Коновалова, В. М. Чернов о путях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и, с. 131.

③ O. B. Коновалова, В. М. Чернов о путях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и, с. 132.

国发动了反革命政变。^① 其实，把社会革命党和白军混为一谈归结为反革命的看法是错误的。像萨马拉的立宪会议政权一样，社会革命党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建立的政权是为了恢复立宪会议而暂时建立的，与白军和协约国的关系是出于和平的目的以及贪恋民主革命模式而采取的步骤。至于说协约国登陆摩尔曼斯克，占领阿尔汉格尔斯克以及远东和高加索，一方面有战略方面的原因，即在俄国寻找沙皇政府的替代人以完成第一次世界大战；另一方面有策略方面的原因，即保护协约国在俄国的军事物资。协约国登陆俄国是在1918年3月，也就是布列斯特和约签署之后，持续到1918年的8月。首先登陆的是英国，在3月6日登陆摩尔曼斯克，4月5日，日本和英国军队登陆符拉迪沃斯托克，8月英国占领巴库。英国军人初次登陆摩尔曼斯克事先得到了以布尔什维克 A. M. 尤里耶夫为代表的摩尔曼斯克苏维埃的邀请，^② 随后又有法国和美国军队的登陆。到了6月又有英国、法国、美国 and 意大利的军队携带军事物资和食品登陆。^③

尤里耶夫的决定遵循的是3月3日布列斯特和约之前人民委员会的命令。布列斯特和约签署之后，列宁指示尤里耶夫放弃与协约国的合作，尤里耶夫没有遵守。这样，英国的登陆以及尤里耶夫的邀请就不再合法。英国等协约国的军队就开始寻找能够与协约国合作的政治力量。

社会革命党、人民社会党、孟什维克、立宪民主党成为这样的力量。于是，协约国与俄国的利益之争就变成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革命性质之争。列宁首先宣布不执行中央新命令的尤里耶夫为人民敌人，社会革命党等反对布尔什维克布列斯特和约的政党也成为反革命的白军。布尔什维克在反对派政治力量的聚集区阿尔汉格尔斯克进行查封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报纸以及把私人工厂国有化的工作。从6月2日开始，社会革命党呼吁人民起来反对苏维埃政权，在7月29~30日，协约国军队到达阿尔汉格尔斯克前两天发动政变，占领了所有的苏维埃机关和电台并得到协约国的支持。^④

1918年8月2日，苏维埃政权的反对派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组建了新政

① К. В. Гусев, Партия эсеров: от мелкобуржуазного революционаризма к контрреволюции, с. 291.

② Биография: Алексей Михайлович Юрьев, http://www.peoples.ru/state/statesmen/aleksey_uriev/.

③ В. В. Гармиза, Крушение эсеровских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 с. 116.

④ В. В. Гармиза, Крушение эсеровских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 с. 121, 124.

府——北方州最高管理局。管理局有6名社会革命党人，他们是古科夫斯基、杰杜先科、M. A. 利哈奇、马斯洛夫、Г. А. 马尔秋申和H. H. 伊万诺夫，两名立宪民主党人B. Ю. 祖波夫和H. A. 斯塔尔采夫。但是，第二天斯塔尔采夫就退出了政府，转而担任阿尔汉格尔斯克的政府委员。

反对派政府成立以后，虽然第一个命令是邀请协约国军队来阿尔汉格尔斯克，但是，社会革命党从一开始就推卸与入侵者一起推翻苏维埃政权的责任。在分配政府职务的时候，社会革命党推举人民社会党人、维亚特卡省立宪会议成员柴科夫斯基担任最高管理局的主席，立宪民主党人、沃洛格达的副市长祖波夫担任秘书。各部门的领导人分布如下：柴科夫斯基担任外交部门的领导，军事和农业领导由社会革命党人、沃洛格达省立宪会议成员马斯洛夫担任，司法部门、内务部门、邮电部门的领导分别为社会革命党人、诺夫哥罗德省的立宪会议成员古科夫斯基和立宪民主党人祖波夫担任，社会革命党员、喀山省立宪会议成员马尔秋申担任财政部门的领导，社会革命党人、萨马拉省立宪会议成员杰杜先科担任食品、工业和贸易部门的领导，一周后任交通部门领导，前北方前线立宪会议成员、社会革命党人利哈奇担任劳动和人民教育部门领导。社会革命党推荐人民社会党人柴科夫斯基为主席，原因是他比较温和，能够为资产阶级和社会革命党所接受，期望通过和平选举的方式组建联合政府，共同承担俄国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历史考验。他们向人民宣布，自己的政府只是临时政府，组成全俄政府以后立刻分解自己的权利，依靠俄国所有人民和协约国政府来实现自己的纲领。他们为了避免被指责引入外国军队来俄国损害俄国的主权利益，反复声明，“协约国来到这里是为了帮助人民摆脱崩溃和毁灭，他们不会追求俄国的某些领土，不打算破坏俄国的领土完整，不干涉俄国的内部事务并把自己的政治制度强加给俄国，他们的主要目的就是对抗德国”。^①

美国驻俄国大使弗兰西斯在1918年9月第三届阿尔汉格尔斯克省地方自治局会议上说，协约国不干涉北方州的内部事务，他们像阿尔汉格尔斯克政府一样不承认布列斯特和约，来这里就是阻止德国夺取边区的自然资源并帮助当地居民改善经济状况。

苏联学者卡尔米扎从功利的角度出发认为，在边区居民处于饥饿的困

^① И. И. Минц, Интервенция на Севере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М., 1933, с. 15 - 16. См., В. В. Гармиза, Крушение эсеровских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 с. 129.

境，对最必需的工业品感到非常需要的时候，所谓互利贸易条件下的全面的食品、军事、财政和经济援助在军队占领的情况下就是对国家自然资源的掠夺。^① 社会革命党等反对派政党建立的联合政府也就成为引狼入室的卖国政府。社会革命党的阿尔汉格尔斯克政府根据形势实施的废除苏维埃法令、消灭苏维埃机关，工业、商船队、房产和银行非国有化，恢复私人贸易、恢复军事法庭和死刑等措施就变成了反对人民的措施。

的确，社会革命党执行集体原则以及依靠外国力量实现民主革命是不独立的表现，其发展的结果也如萨马拉政权和西伯利亚临时政府的结果一样，最终归附于 E. K. 米列尔将军。但是，把发生军事政变的原因归结为君主主义者借助社会革命党的不作为而把政治权利交给侵略者指挥是错误的。

社会革命党之所以动摇不在于它向外国出卖国家利益，而是在俄国因战争而变得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有病乱投医，是追逐民主革命的表现。摇摆或者说借助于外在的力量保持国家的利益也存在于布尔什维克内部。尤里耶夫以及支持尤里耶夫的托洛茨基与协约国达成妥协也是出于同样的理由：希冀借助精神的力量唤醒战争中失去理性的正义力量，赢得革命的胜利，保卫俄罗斯的尊严。但是，列宁非常清楚，不为此付出些什么，俄国的革命是不可能得到别人认可的，这就是只有媾和才能拯救革命^②的道理。布尔什维克内部以及布尔什维克与反对党之间相互指责背叛国家利益是对普世价值的忽视，也是把利益与价值观对立起来的表现。协约国登陆俄国把俄国从德国的魔爪中拯救出来进而追求普世价值的意义，也有为协约国国家利益压制俄国的意思。协约国征求苏维埃同意登陆俄国以及德国 1918 年 11 月 11 日战败投降后协约国准备派 12 ~ 15 个师到俄国南部干涉苏俄事务都是推广自己价值观的表现，而美国总统威尔逊在 1919 年 1 月 22 日倡议俄国境内各政府立即停战谈判并于 1919 年 4 月 2 日全面退出乌克兰、远东和北方也有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的含义。随后的协约国干涉只是借助于曾经是俄国地盘但在战争结束之后获得独立的芬兰、波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乌克兰和高加索地区的力量完成的。与其说这是外国力量对俄国利益的侵犯，不如说是对列宁推动世界革命的反制措施更加恰当。因此，曾经流传了几十年的“苏维埃俄国成立后所面临的最危险的敌人不是国内的地主资产阶级，而是国际帝国主义；苏维埃政权不是通过战

① В. В. Гармиза, Крушение эсеровских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 с. 130.

② 伊·多伊彻：《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 1879 - 1921·先知三部曲》，第 442 页。

胜白卫军，而是靠打败美英法协约国才得以巩固的观点”^①是错误的，至今档案中还没有发现协约国组织全俄白卫军颠覆苏维埃计划的方案。^②俄国虽然遭遇了德国和协约国的胁迫，但是，它完成的是一场结合了俄国历史的世界革命。俄国的精英和大众都参与了这场革命^③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二 反对高尔察克的斗争

整个1918年是社会革命党与资产阶级和协约国合作反对德国和苏维埃政权的一年，合作的目的是反对布尔什维克因签署布列斯特和约可能给俄国带来的殖民奴役，保护自1917年2月以来获得的革命成果。但是，随着临时革命政权的建立，特别是具有民主思想的社会经济改革措施的实行，社会革命党与资产阶级和具有君主思想的将军之间的矛盾马上暴露出来。复辟的西伯利亚自治政府的执政高尔察克在1920年接受审讯时公开阐述了自己对于立宪会议的态度。他支持军事专政并继续与德国的战争，对于所有的社会主义政党和从根本上歌颂切尔诺夫领导的国际主义的立宪会议持否定态度。在他看来，社会革命党和立宪会议不过是共产主义的狭隘党性。^④

邓尼金在自己的回忆录《混乱史纲》第三卷中指出了具有君主思想的将军的追求。他说：“阿列克谢耶夫将军并没有预先确定俄国的君主制度，相信，他的理解是自然而然和无病态的。我们并没有这样的信仰，罗曼诺夫斯基和马尔科夫完全同意我的观点。所以，我们坚持不预先确定国家制度的观点是真诚的。……我把祖国的幸福放在了第一位，我为了祖国的解放而工作，执政的形式对于我来说是第二位的。如果为执政形式而战斗，我不会参与。但是，无论如何我不会强加良心，我认为只要忠诚地为祖国服务，无论在君主形式下还是在共和国形式下都是一样的。我只是想确信地知道，俄国人民希望哪种政权。可以相信的是，你们的预先决定是空谈，

① 徐天新：《评“十四国武装干涉苏俄”及其他》，《平等、强国的理想与苏联的实践》，第197页。

② 徐天新：《平等、强国的理想与苏联的实践》，第196页。

③ 沈志华主编《一个大国的崛起和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上册，第11页。

④ В. Л. Кузьмин, Ю. Н. Ципкин, Эсеры и меньшевики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россии в период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войны 1917-1922гг., с. 88, 91.

人民自己会说，他们想要什么。”^①

邓尼金的话让人以为他是真心服务于他的祖国，至于这个祖国采取什么样的执政形式他并不在意，而且如果说在意的话，他也会听从人民的意见。如果从他在第一卷中关于信仰、沙皇和祖国的看法来看，他还生活在对沙皇祖国的信仰之中，他高度看重的是对祖国的愚忠和为祖国的献身。为此，他说，俄国之所以发生革命在于军人中招募了太多追求物质利益的人，败坏了俄国的道义形象。“如果允许战争失败就会导致我们祖国的各个方面特别大的灾难。失败会导致国土的损失、政治的崩溃和国家经济的奴役。所以，胜利是必须的。所有其他问题都可以往后推迟，可以争论，重新决策和改变方式。这样简单但完全具有深层次的生活含义和民族自我意识的战争态度，俄国社会的左翼是不会明白的，并最终导致他们走向齐美尔瓦尔德和昆塔尔。所以，不用奇怪，当不明国籍的和俄国的革命民主派领袖，面对是拯救国家还是革命的两难选择时，他们选择了后者，在1917年2月有意识地摧毁了军队。”^②

邓尼金的话代表了所有君主派将军的观点，也反映了具有君主派思想的广大民众的观念。一方面，邓尼金从信仰的角度捍卫了祖国，对这个祖国是什么性质的祖国并没有追问，为此指责革命者为了利益而忘掉了道义；另一方面，邓尼金反对签署布列斯特和约的理由是会损害国家的利益，即国土的损失、政治的崩溃和国家经济的奴役。邓尼金用国家的利益损失指责革命者缺乏道义正是回避道义革命的问题。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私人利益逐渐占据上风，邓尼金等将军提出的建立军人专政就有为地主贵族私人利益张目的嫌疑，而忘掉了引领资本主义前进的道义。

以高尔察克、邓尼金为代表的君主派力量被称为白军势力，与代表工农大众力量的苏维埃红军势力对抗。代表农民和中间阶层的社会革命党则由于没有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个具有方向性的问题上提出自己的建议而被归入白军行列，以至于一些学者得出“在解决俄国现实的根本问题上，白军运动的不同派别的观点原则上是很相似的”^③结论。而在古谢夫那里，

① А. И. Деникин, Очерки русской смуты, Том III. Белое движение и борьба Добровольческой армии. <http://www.magister.msk.ru/library/history/xx/denikin/denia003.htm>.

② А. И. Деникин, Очерки русской смуты-крушение власти и армии (февраль-сентябрь 1917 г.), М., Айрис-пресс, 1991, с. 89.

③ В. Г. Медвидев, Белый режим под красным флагом (Поволжье, 1918), Ульяновск, СВНЦ, 1998, с. 79.

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在 1918 年末到 1919 年初的所作所为被称为最公开的黑色百人团反动派。^①

被称为恢复君主制度的高尔察克究竟采取了哪些措施来维护君主制度呢？1919 年 1 月 14 日，高尔察克签署的政府通告说：他号召人们团结在政府周围，同布尔什维克作斗争，采取一切措施保证军队的供应并建立后方。他们呼吁极端派活动家，即社会主义者，在为了拯救国家和自由而拼命努力的时候，民主派的未来取决于今天对自己能力的控制。声明谴责那些好像是捍卫国家性，实际上在力量和国家的尊严之间摇摆以便追求自我管理的人。要求服兵役和民役的人完全服从。政权的目的是使国家摆脱布尔什维克的压迫，挽救人民的最后一点财产，在人民自由参与全国机关和地方自治机关原则的基础上，秩序而理智地重建人民生活。只有到那时，才能在公正的基础上稳固地保证俄国农夫的土地、振兴俄国的工业、保证俄国工人拥有良好的劳动和生存条件。政府答应近期召集制定选举全俄民族会议条例的委员会。^②

高尔察克的举动和科尔尼洛夫的动机是一样的，无非是想把俄国带到立宪会议。但从高尔察克所采取的措施来看，他把布尔什维克所采取的积极措施当做了对祖国的背叛，而为了保护祖国就必须消灭布尔什维克。而为了把战争进行到底，高尔察克不仅恢复了地主土地私有制，而且降低了工人工资，在布尔什维克提出的土地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上重新回到了十月革命之前。所以，高尔察克的政变既没有得到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政党的支持，也没有得到农民的支持。依靠英法和日本势力的支持在人民的眼里同样无法逃脱国家背叛者的名声。

高尔察克和布尔什维克的根本区别在于，高尔察克把争取战争的胜利看做实现俄国革命的条件，而布尔什维克则把战争看做了革命。前后次序之争，反映了两派不同的价值观念：高尔察克把抽象祖国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但从根本上损害了人民的利益，从而脱离了人民；布尔什维克从热爱人民出发，虽然暂时使国家的领土完整受到了损害，但是却从根本上解放了社会力量。

^① К. В. Гусев, Партия эсеров: от мелкобуржуазного революционаризма к контрреволюции, с. 294.

^② Павел Зырянов, Адмирал Колчак, верховный правитель России, М.,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2002, с. 277.

高尔察克把自己看做自由民主国家的建设者，像立宪民主党一样强调超阶级的利益，但是高尔察克恢复私有制，恢复沙皇时期的一切政策措施并继续进行战争，说明高尔察克执行了和沙皇时期执行的一样的政策，这样，超阶级的利益就变成了一句空话。相反，布尔什维克强调政党的利益，强调无产阶级的利益，把与资产阶级的斗争看做布尔什维克党的神圣使命，表面上损害了有产者的利益，实际上是纠正了有产者为了利益而忘掉的道德价值，承认了阶级利益并时刻提醒人们注意这种利益的斗争，人们就会明确阶级利益之上还有着共同的超阶级的利益。

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布尔什维克不断遭遇着资产阶级自发性的冲击。当布尔什维克执行工人、贫农攻击富农、团结中农的农村政策时，出现了富农破坏生产力的现象；当布尔什维克以俄国为堡垒发动世界革命的时候，造成了波兰、芬兰、波罗的海沿岸、高加索地区的独立与自治问题，俄国的完整与统一遭遇了严重的挑战。

1918年11月德国投降以后，布尔什维克不仅没有停止国内的斗争，相反把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推向国际，造成了帝国主义的紧张。不仅德国断绝了与俄国的外交关系，而且英、法、美、日等国家掀起了对俄国革命的联合干涉。列宁认为：“十月革命一开始，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就成了我们最主要的问题，这不仅因为帝国主义从此意味着世界各国紧密地结成一个体系，甚至可以说是结成了一个血污，而且因为社会主义革命要在一个国家内取得完全胜利是不可思议的，它至少需要几个先进国家（我们俄国还谈不上先进国家）最积极地合作。因此，我们能使革命在其他国家扩展到什么地步，在那之前能给帝国主义以多大的回击，这成为革命的一个主要问题了。”^①

列宁的不退反进的策略并不是产生于德国投降以后，而是十月革命以后，即揭露俄国与德国签署的秘密条约。正是通过揭露这些秘密条约，才让英国等国家的无产阶级知道了好些事情，才让他们得到觉醒。1918年初，俄国向英法等国的无产阶级吁请“用没有兼并和赔款的民主方式结束这场战争”，但没有得到响应，因此“不得不付出代价，签订了强制性的布列斯特和约，被迫接受了一种令人十分痛苦的和平，使得许多同情者感到灰心失望”。虽然列宁使俄国暂时遭受了屈辱，但是他没有放弃。正是这个屈辱

^① 《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92，第150页。

让人们认识到了帝国主义战争的目的。经过近一年的努力，人们终于达成了一致，“一支人民群众创造的、奋不顾身的军队，经过四年血腥的大屠杀之后又投入战争了”。因为他们“明确认识到他们流血牺牲确实是为了自己的事业，为了工农苏维埃，为了社会主义共和国。”^①

列宁把对外战争看成一个社会问题，把战争看成结束俄国对外战争的手段，是基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不可调和的斗争的原理，也正是这一点成为与具有君主思想的将军和具有民主革命思想的社会主义者分歧的焦点。正如列宁自己所说，“在全世界斗争中成长起来的革命能由我们来开始，绝不是由于俄国无产阶级有什么功劳，也不是由于它比别人先进，相反地，正是资本主义的特别软弱和落后，以及特别逼人的军事战略形势，才使我们在事变过程中没有得到其他队伍赶上来和行动起来，就走到他们前头”。^②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俄国才不得不经受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但是，是不是由于俄国的软弱和落后就可以放弃开展社会革命的使命呢？显然不是。因为社会革命不是条件本身，而是决定俄国社会前进的发展方向。也正是因为俄国长期沉溺于对外扩张而忽视了俄国社会的发展，以至于真正的帝国主义战争来临的时候，俄国内部无法凝聚起保卫祖国的力量，以至于军队陷入疲惫和瘫痪。列宁指出俄国发展的症结，不惜俄国的解体而勇敢地发动了社会革命。

强烈的信念和痛苦的煎熬果然带来了预想的喜悦。用列宁的话说，“还在半年前（1918年3月签署布列斯特和约的时候）它还根本不把我们的使馆放在眼里，认为在他们那里任何一幢红色的房屋都不可能存在。最新的电讯说，德国帝国主义正号召群众保持镇静，说和平就要到来。”^③列宁之所以敢这样做并取得成功在于他看到了德国的帝国主义是一种冒险的失德政策，是为了掠夺别国的财富。列宁通过签署布列斯特和约和通过大使馆对德国的无产阶级所做的宣传，揭露了德国资产阶级的阴谋。当英法通过战胜德国而向德国提出比布列斯特和约更加苛刻的赔偿条件时，当英法为了自身的利益而与俄国的具有君主思想的将军联合扼杀苏维埃政权的时候，布尔什维克又一次与英、法决战，揭露它们的帝国主义阴谋。

① 《列宁全集》第35卷，第143、144页。

② 《列宁全集》第35卷，第137页。

③ 《列宁全集》第35卷，第152页。

这样，布尔什维克在国内外矛盾交织的情况下走过了两场革命：一场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另一场是社会主义革命。从内部的条件来讲，俄国根本不具备发动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但是，在帝国主义战争的条件下，俄国要想争取独立的的活动空间必须发动条件更加苛刻的社会主义革命。这对于俄国显得有些残酷了；曾经已经非常革命的资产阶级落伍了，还没有开始尝试建设民主式的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也成为反革命，俄国进入了激烈的阶级斗争时期。

布尔什维克把世界革命分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暴力革命，并从俄国的角度出发盛赞无产阶级专政高于资产阶级的议会民主，忽视了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普世价值并成为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永远不可化解的冤仇，的确值得学者们认真地关注。

高尔察克等具有君主主义思想的将军们反对布尔什维克在于保卫俄罗斯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能由于俄国的制度之争而损害了俄国的利益；切尔诺夫以争取民主为由捍卫农民的利益，造成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实际瘫痪，被大企业主和右派军官们当做布尔什维克。^① 切尔诺夫与布尔什维克的分歧在于通过民主渐进的方法而不是暴力的方法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渐进的方法在于社会革命党从来就不相信俄国的农民工人能够建设社会主义，而如果“尝试用强制的方法应用于俄国现实之中除了导致反动派的胜利不会有别的结果”。^② 暴力的方法则认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是阶级矛盾内部所固有的，如果无产阶级和农民撇开阶级斗争而追求抽象的民主，就会成为“白军不理智的走卒并帮助高尔察克的产生”。^③

布尔什维克和高尔察克都在追求强制。他们的不同在于，布尔什维克是在俄国的劳动者不具备管理能力的条件下使有产者能够自愿地为劳动者提供这样的条件，有产者在特权思想的支配下以劳动者愚昧为由拒绝提供这样的条件，从而导致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强制；高尔察克的强制以俄国的主权和领土的完整为由推迟了革命的展开，复辟过去的秩序。布尔什维克与高尔察克的分歧是发展方向与现实利益之间的分歧；社会革命党以

① В. Л. Кузьмин, Ю. Н. Ципкин, Эсеры и меньшевики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России в период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войны 1917 - 1922 гг., с. 91.

② В. Г. Медведев, Белый режим под красным флагом (Поволжье, 1918), с. 71.

③ В. Л. Кузьмин, Ю. Н. Ципкин, Эсеры и меньшевики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России в период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войны 1917 - 1922 гг., с. 91.

劳动者没有参与管理的能力而祈求资产阶级发善心，最终导致专政的出现，召开立宪会议成为高尔察克应付社会革命党的挡箭牌。布尔什维克坚决与高尔察克划清界限，是从帮助劳动者学会管理而不是以劳动者愚昧为借口推迟改革的角度进行的；反对社会革命党的无原则的妥协而最终把社会革命党赶到了国外。

俄国在战争中暴露了俄国专制统治手法的弊端，不改革或者改革缓慢都不能拯救俄国，俄国只有死路一条。在与高尔察克的斗争中，布尔什维克的地盘越来越大，而社会革命党因不能把纲领付诸实施而遭到了劳动者的抛弃。

所以，当切尔诺夫没有意识到俄国的革命只能是通过暴力开展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社会革命党陷入了左右追随的摇摆和抱怨之中。如社会革命党在西伯利亚成立的社会革命党西伯利亚联合会中央局给所有社会革命党的呼吁书中说：“1917年末到1918年初社会革命党第四次代表大会新选举的中央委员对于局势的认识没有多少改变。党的右翼仍像以前一样不受处罚地把党引向与反动派组织达成各种各样的妥协冒险。有影响的社会革命党党员阿尔古诺夫、阿夫克先基耶夫、巴甫洛夫等在‘复兴俄国联盟’的旗号下建立半黑色百人团类型的组织，几乎没有遭到中央委员会的任何抵制。”^① 切尔诺夫把右派社会革命党与其他政党建立的组织称之为半黑色百人团组织，无非是指右派社会革命党向西伯利亚临时政府做出的妥协让步，也就是建立对西伯利亚州杜马这个社会革命党占据优势的立法机关不负任何责任的临时执政并担任执政，认为这是社会革命党革命和历史上不光彩的一页。随后，担任执政的右派社会革命党对非社会革命党的其他政治组织组成的行政中心发动政变解散西伯利亚州杜马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并与地方的右翼组织一起进攻州杜马。更为让人不可理解的是，右翼不仅执行自由主义的政策，而且抵制社会革命党西伯利亚边区政府的政策。在推翻布尔什维克之后，边区政府甚至提出淡出政治的口号，在君主派的军官一下子组织起来的情况下，完全禁止党务工作者在军队中建立自己的党组织，禁止社会革命党以党的旗帜与反动派作斗争。^② 当阿夫克先基耶夫、津

^① *Marc Janse*,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после октябрьского переворота 1917 года* Документы из архива П. С-Р, с. 360.

^② *Marc Jansen*,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после октябрьского переворота 1917 года* Документы из архива П. С-Р, с. 361, 363 - 364.

季诺夫等人被逮捕以后，他们迅速选择了出国。经中国的上海到达巴黎以后不久，阿夫克先基耶夫等人就开始呼吁西方人支持高尔察克和邓尼金，认为他们有能力重建俄国的民主。^①

右派社会革命党为了致力于民主革命而放弃了自己的旗帜与君主派将军合作，根源不在于右派社会革命党，而在于社会革命党的纲领对俄国革命的定性。社会革命党一直不认为俄国有条件发动社会主义革命，无论他们怎么倾向于劳动者，甚至取名于人民劳动革命，建设性的社会主义，但如果他们不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成为空谈。俄国不仅要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发动这样的革命不是俄国人可以规定的，不进行这样的革命，俄国便没有生存的机会。

执著于教条的社会革命党在高尔察克发动政变之后，迅速从人民主权思想的角度对于高尔察克政变提出指控，并迅速做出反对高尔察克的指令。但从新成立的西伯利亚社会革命党委员会提出的反对高尔察克措施来看，仍然没有改变摇摆政策。首先，集中全部力量同国内和插手俄国特别是西伯利亚的国外反动派作斗争。其次，推翻高尔察克政府并根据党的纲领确立人民主权制度。再次，在与反动派和国外力量及其支持者的斗争中，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暴动，必须把组织力量派进人民群众以便加紧准备全面起义。最后，为了保证起义准备得有计划有规模，同时也为了在起义开始保证出现一个权威的人民政府，委员会认为必须由仍然忠于选民的立宪会议成员建立国家法律机关，西伯利亚委员会将采取一切措施支持这样的机关。^②

社会革命党没有完全放弃合法的斗争方式，也没有放弃对外国力量的依赖，如对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寄予厚望。由于对自己缺乏信心，虽然社会革命党在与白军力量合作共同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遭到失败后重新与布尔什维克合作，但仍然没有忘记自己的民主思想。不同的是不再与白军合作重建立宪会议，而是与布尔什维克合作，在战胜高尔察克反动派之后在立宪会议和苏维埃之间由全民做最后公决。^③

社会革命党的举动是没有出路的，主要的原因在于俄国革命不仅要反

① Павел Зырянов, Адмирал Колчак, верховный правитель России, с. 263.

② Marc Jansen,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после октябрьского переворота 1917 года Документы из архива П. С-Р, с. 365.

③ Marc Jansen,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после октябрьского переворота 1917 года Документы из архива П. С-Р, с. 341.

对封建主，而且要反对资产阶级。不是说俄国的资产阶级不比封建主先进，而是俄国长时期的极端榨取，人民已经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冷漠心理。无论是封建主还是资产阶级都没有信心产生自我认识的价值观念，并被人民深深地异化。俄国不经过有产者深度的精神忏悔，是不可能演化出真正的私有者的。这就是为什么俄国产生社会主义并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来发泄无产者对私有财产的愤怒。所以，列宁一再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民主，而资产阶级民主就是资产阶级专政。这样的逻辑只有在俄国这个存在极端压榨的国家才能理解，也只有极深刻的无神论才能唤醒人民心中的正常的世俗意识。当战争结束以后，列宁从人民的苦难中才认识到了有产者的可贵之处并成为新经济政策诞生的基础。这个认识上的转变过程是秉承宗法理念的贵族地主和秉承民主理念的社会主义者无论如何不能超越的。

三 重新审视与布尔什维克的关系

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在社会革命党右翼与高尔察克反动派合作问题上无所作为，^① 最终导致右翼社会革命党远走海外。当高尔察克在 1918 年 12 月 3 日逮捕 30 多名萨马拉立宪会议成员委员会的（科木奇）人员并派一支力量到乌法镇压社会革命党的时候，社会革命党立宪会议委员会成员切尔诺夫、沃尔斯基、Н. В. 福明等人立刻转入地下，在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帮助下躲过了一劫并顺利退到叶卡捷琳堡。^②

经历了高尔察克的镇压之后，社会革命党秘密组织乌法起义。据孟什维克党员尼古拉耶夫斯基回忆，温和派的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 М. А. 利哈奇、Н. Н. 伊万诺夫思考准备反对高尔察克的武装起义，他们的态度甚至比东西伯利亚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 Я. Д. 杨松和 1919 年 2 月到达伊尔库斯克的孟什维克领导人 И. И. 艾哈迈托夫更加激进。但在社会革命党西伯利亚委员会的阻止下，最终放弃了起义。社会革命党的主要工作围绕着与布尔什维克的合作展开，最终目的不仅为了推翻高尔察克，而且最主要的是把布尔什维克转向和平民主的轨道，通过全民公决在立宪会议和苏维埃之间进行抉择。^③

① О. В. Коновалова, В. М. Чернов о путях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и, с. 130.

② Павел Зырянов, Адмирал Колчак, верховный правитель России, с. 265.

③ Marc Jansen,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после октябрьского переворота 1917 года Документы из архива П. С-Р, с. 327, 365.

当1919年1月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莫斯科局决定暂时停止与布尔什维克之间的关系并掉转枪口反对复辟力量的时候，以沃尔斯基、斯维亚基茨基、H. A. 什梅列夫为代表的乌法社会革命党成员在1919年1月10~17日与乌法城和乌法省的革命委员会即苏维埃政权机关举行谈判。沃尔斯基、斯维亚基茨基和什梅列夫签字号召人民军、西伯利亚、哥萨克和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部队停止与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与苏维埃政权——现在俄国唯一的革命政权一起，与高尔察克政权进行斗争。^① 沃尔斯基等人的举动一下子让多数社会革命党党员认为，社会革命党即将放弃第八次党务会议通过的与布尔什维克专制斗争的决定，与布尔什维克联合起来反对白色专制，这是社会革命党方针政策的转向。

鉴于这种情况，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在致俄国南方所有组织的呼吁书中解释了自己政策选择的原因，它承认，虽然布尔什维克的专政和白卫军的专政在形式上有相似之处，但是它们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布尔什维主义是穷人走向美好未来一种不理智、丑陋的冲动形式，而邓尼金的专政是过去的特权有产阶层渴望对劳动人民复仇的政权。^② 中央委员会的声明不足以解决社会革命党未来的发展走向，社会革命党在西伯利亚和乌拉尔的中央委员会代表团对沃尔斯基等人与苏维埃政权的谈判作出了指示。第一，沃尔斯基、斯维亚基茨基、什梅列夫代表现有的中央委员和社会革命党立宪会议党团领导同志所作的声明是冒牌的，沃尔斯基和斯维亚基茨基所称的似乎他们的纲领得到切尔诺夫、格尔施泰因、韦杰尼亚平、H. 伊万诺夫和费奥多罗维奇等中央委员的同意是虚假的。第二，1918年12月5日中央委员会、立宪会议成员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和西伯利亚临时政府管理机关乌法委员会通过的停止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武装斗争，集中所有民主力量掉转反对在西伯利亚得胜的反动派并不意味着与布尔什维克寻求妥协、结盟，而是在两条战线上作战：既反对西伯利亚反动派，又反对布尔什维克反动派。第三，从党的观点出发，与布尔什维克反动派和西伯利亚反动派结盟只有在人民主权完全投降的情况下才是可以理解的，否则，与他们的任何合作都是承认布尔什维克或者军事专政的纲领，就不再称为社会革命

①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17. 10 - 1925, Т. 3, Ч. 2, с. 416.*

② *О. В. Коновалова, В. М. Чернов о путях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и, с. 134.*

党了。^①

为了明确党的路线,1919年2月8日,社会革命党在苏俄地区的社会革命党组织代表会议对当前的形势和党所采取的策略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代表会议从人民主权的高度看待与布尔什维克的关系。会议认为,俄国的经济生活使得城乡劳动农民尤其是城市无产阶级陷入了难以忍受的困境,这种困境是内外战争引发的。为了结束这种状态必须在俄国统一和内部和平的条件下消除经济崩溃。经过与布尔什维克的武装斗争,协约国帝国主义者借口帮助俄国和无政府现象作斗争,利用自己的军队占领俄国部分领土,恢复的却是革命前的秩序并实现了君主复辟。经过与资产阶级的合作,资产阶级政党完全暴露出了自己的反动本质,幻想个人专政并恢复了无限的经济专横。虽然布尔什维克实行恐怖和强制政策,压制劳动人民的独立,如同农民斗争、野蛮镇压他们、经济上掠夺农村等等,但是,在劳动民主派分散软弱,反革命的力量急剧增长的情况下,代表会议坚决反对通过武装斗争推翻苏维埃政权。因为这样做不仅不利于布尔什维克的改变,相反会被反动派利用达到复辟的目的。^②

为了利用各种机会争取人民主权,利用所有方法组织劳动人民,代表会议建议党员通过非正常手段实现公开的政治斗争,积极参加工农代表苏维埃选前运动来保证恢复民主自由,为保证工人阶级在苏维埃的真正代表创造条件。^③

代表会议的决议为社会革命党协调与布尔什维克的关系提出了建设性的建议,也正是这一点促使布尔什维克在白军力量和外国入侵者围攻苏维埃政权的情况下,于1919年2月26日大赦了所有放弃与布尔什维克进行武装斗争的社会主义组织。社会革命党中央也重新迁回了莫斯科,并复刊《人民事业报》。切尔诺夫也于3月非公开地来到莫斯科,积极参与宣传工作,号召群众与高尔察克和邓尼金斗争,同时对布尔什维克施加影响。^④

①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17. 10 - 1925, Т. 3, Ч. 2, с. 417 - 418.

②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17. 10 - 1925, Т. 3, Ч. 2, с. 420 - 421.

③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17. 10 - 1925, Т. 3, Ч. 2, с. 422.

④ О. В. Коновалова, В. М. Чернов о путях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и, с. 135.

第三节 社会革命党的再次分裂

一 在两条战线上的斗争

社会革命党停止与布尔什维克的武装斗争向布尔什维克释放了和解的善意，布尔什维克也大赦了社会革命党。但是，社会革命党公开活动的时间不长。原因很简单，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从根本上不赞成布尔什维克的政策，不断谴责他们对农民和民主力量的压制，要求在民主选举的基础上召开立宪会议和组建地方自治机关。^①

起初，社会革命党对于布尔什维克的态度，布尔什维克并不了解。通过以加米涅夫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团和以拉基特尼科夫、沃尔斯基、布列沃依为代表的社会革命党乌法代表团的谈判，社会革命党的立场才得以澄清。1919年3月，社会革命党的报纸《人民事业报》和孟什维克的《永远前进报》一起被查封，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被纳入了反革命的行列。布尔什维克判定他们的标准很简单，认为“你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只要在人民面前这样责备我们（指发动国内战争），他就是高尔察克分子，因为他不懂得，在我们粉碎了的帝国主义战争和我们招来的国内战争之间，存在着任何一个识字的人都知道的起码的基本差别……我们竭尽全力要在这次国内战争中战胜资产阶级，铲除阶级压迫的根源。从来没有而且不可能有一种革命，不需要进行长期的、艰苦的、可能充满重大牺牲的斗争。谁不能识别在一切有产者、一切反革命阶级反对革命的情况下为了革命胜利而在革命斗争中遭到的牺牲，谁不能把这种牺牲同掠夺者、剥夺者的战争所带来的牺牲区别开来，谁就是愚昧无知的人……”^②显然，布尔什维克与高尔察克掀起的是一场有关价值观的斗争，而不是争夺领土或者争取民主或者专政制度的斗争。这样一来，社会革命党作为社会主义者在布尔什维克和高尔察克之间保持中立就等于间接支持了高尔察克。

1919年3~4月举行的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全会尽管反对与布尔什维克达成妥协，但是也不恢复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武装斗争。全会谴责社会革

^① В. Л. Кузьмин, Ю. Н. Ципкин, Эсеры и меньшевики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России в период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войны 1917 - 1922 гг., с. 107.

^② 《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92，第327页。

命党代表参加乌法国务会议、执政府，西伯利亚、乌拉尔、克里木地区政府会议以及1918年11月举行的俄国反布尔什维克力量的亚斯克会议。全会反对外国入侵，认定欧洲的革命运动在飞速发展。正是由于社会革命党认定来自右派的危险太大才拒绝与布尔什维克的武装斗争。^①

中央委员会全会的指责当然针对的是社会革命党右翼，而造成社会革命党右翼与资产阶级和高尔察克这些具有君主思想的将军合作的根本原因是社会革命党中央在思想路线上不明确，是党联合策略的继续。作为党的理论家，切尔诺夫虽然批评右翼的政策，但在1918年10月全会上原则上还是支持建立执政府的方案。^②

1919年3~4月莫斯科中央全会进一步明确了社会革命党的发展方向，厘清了第三条发展道路的内涵。社会革命党根据切尔诺夫关于资本主义积极面和消极面的理论，正式承认资本主义有利的东西并使之合法化。文件说，“联合劳动民主派纲领的本质特征是把限于具有最大的创造性和最小的破坏性的经济领域的资本主义合法化；在资本主义不能发挥自己组织职能的农业等领域采取一系列措施有机和无病态地发展劳动农民的平均主义原则，如土地社会化、加强对超额份地的税收征缴、实行更加有利的级差地租等；随着消费需求、生产资料供给的合作化或者市有化，小型经济向大型经济的过渡变得越来越有利，劳动经济自下而上的社会化得以确保；消费需求的合作化和国家调节供给与分配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具有进步意义的那些没有过时的领域被强制辛迪加化，并在劳动人民的大型阶级组织的直接参与下，在日益加剧的国家监督下加以调整；随着业务培训相关人员的必要条件的成熟，必要的行政机关的组建等，国家、地方自治和市有经济的范围较之资本主义经济逐渐扩大；换句话说，除了在市有社会主义合作化、生产国有化和私有经济自下而上的社会化的绿洲上直接建立民主之外，消灭资本家的工厂专制，发展工厂立宪以转向完全的工业民主。这种寄希望于对劳动民主的长期社会建设，就是从过时的资本主义时代向未来的社会主义时代过渡的纲领。”^③

① В. Л. Кузьмин, Ю. Н. Ципкин, Эсеры и меньшевики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России в период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войны 1917–1922 гг., с. 107.

② О. В. Коновалова, В. М. Чернов о путях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и, с. 130.

③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 3, Ч. 2, М., РОССПЭН, с. 446–447.

社会革命党虽然只是从经济领域认可资本主义，虽然把资本主义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正面的东西以辛迪加的名义看做俄国通往社会主义的基础，但是，它像孟什维克一样正式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当然也从原则上放弃了对俄国发展道路的探索。

社会革命党并不认可自己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它提出的理由就是它既反对俄国的资产阶级，也反对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俄国的资产阶级由于不可捉摸的事物发展逻辑被推到了反革命的阵营，与官僚和贵族一起成为俄国社会的寄生阶层。社会革命党没有解释为什么被马克思称为历史进步力量的资本主义在俄国变成了消极力量，只是有利因素和消极因素一对比，消极因素战胜了积极因素，离心力战胜了向心力。战争与革命并没有改变俄国的资产阶级，相反，他们由于贪恋于掠夺达达尼尔的计划而放弃了召开立宪会议的计划，贪恋于传统的大俄罗斯中心主义，直接反对能够消除离心派别危险，并在中央政权和远离中央政权的有价值的地方自治机关之间建立联系纽带的分立的联邦建设，堕落成为所有反动分子的基地。布尔什维克坚持少数人对多数人专政的雅各宾原则，把社会主义从下层集体主义的群众性的创造变成了兵营式的阿列克切耶夫式的共产主义。布尔什维克共产主义的方法就是大笔一挥跳过日常的、技术的和社会心理的障碍转向人民并没有准备好的、不是停留在纸面上就是在实施时被扭曲到不可知程度的那个领域。这样，布尔什维克的方法不仅使毁灭性的工作远远超过创造性的工作，而且在整个国民经济方面带来的不是生产力的高涨，而是衰退。至于说战争时期出现的生活成本的大幅度提升、发行纸币、企业的倒闭乃至生活基础的动摇和整个文化的溃败都是布尔什维克的蛮干造成的结果。^①

社会革命党于是把经济上坚持资本主义的工厂立宪和农村的土地社会化，政治上的民主化和联邦制作为自己的发展目标，恢复第二国际，把国联从体现大国口味的招牌变成全世界各民族国家社会组织的萌芽。劳动民主派，特别是社会革命党由于没有足够的力量在两条战线上斗争，面对来自右派的危险，必须放弃同布尔什维克的武装斗争，使群众摆脱只能耗尽所有能量、加剧总的崩溃的不协调一致的暴动和罢工。但是，劳动民主派永远也不要忘记，未来反革命最好的谋划者就是布尔什维克制度本身。未来布尔什维克是和平地还是暴乱地离开政权取决于布尔什维克本身的表现。

^①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 3, Ч. 2, М., РОССПЭН, с. 451, 452, 448.

社会革命党在这个时刻不能袖手旁观，而是在斗争中赢得人民自己的权利。^①

社会革命党的第三条道路也就是自由民主道路。社会革命党一再声明自己坚持了1917年二月革命以来的革命成果。但是，他们不清楚的是为什么曾经追求民主革命的俄国资产阶级最终放弃了民主道路而选择专制制度，为什么一直称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布尔什维克经过了一场战争就走向了社会主义革命，走向了与资产阶级势不两立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不是社会革命党考虑的资产阶级迷恋大俄罗斯中心主义、迷恋达达尼尔海峡以及布尔什维克不懂俄国落后的现实这样简单，也不是科诺瓦罗娃认为的内战的环境演绎了切尔诺夫的悲剧。^② 社会革命党依靠的是农民。战争虽然使得俄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地主贵族已经毁于一战的熊熊大火之中或者战死在内战的战场上，资产阶级大部分死的死、逃的逃，产业工人也被彻底摧垮了，只有农民被完整地保存下来。但是，俄国的农民仍然是马铃薯，虽然“体积庞大，形象可怕，一声不响地躺着。没有人能够离开它、忽视它或者任意践踏它而不受惩罚……然而，这袋马铃薯对于这个四分五裂、溃不成形的社会却不能提供任何支柱、结构、意志，也提不出任何建议或要求”。^③

布尔什维克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走向了改造农民的道路，依靠布尔什维克的钢铁意志和武力把曾经柔弱不堪的农民改造成为自觉的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布尔什维克不是不清楚俄国农民乃至无产阶级的状况，他们是愚昧和没有文化的，是不觉悟的。但解决农民不觉悟的问题不是等待地主资产阶级的恩赐，也不是让他们重新回到过去受有产者压制和奴役的地位，而是让他们在激烈的阶级对立之中扮演必须扮演的角色，这就是阶级角色。布尔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最大的不同是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是创造条件消除他们身上的惰性。这就是劳动的精神，也是苏维埃精神。列宁在解释苏维埃制度的实质时说：“从前管理国家的总是富人或者资本家，而现在却第一次由正是遭受过资本主义压迫的那些阶级而且是为数众多

①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17. 10 - 1925, Т. 3, Ч. 2, с. 450.*

② *О. В. Коновалова, В. М. Чернов о путях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и, с. 130.*

③ 伊·多伊彻：《先知三部曲·被解除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1921 - 1929）》，周任心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第6~8、10页。

的人来管理国家……我们清楚地知道，在我们苏维埃政权机构中还有许多缺点。苏维埃政权并不是神丹妙药。它不能一下子治好过去的毛病，不能一下子消除文盲、不文明、野蛮战争的后果和掠夺性的资本主义的遗毒。但是它提供了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它使受压迫的人能够站立起来，能够逐渐地担负起对国家、经济和生产的整个管理。”^①

苏维埃制度是人民在革命中创立的，但是是布尔什维克赋予了苏维埃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因而也是自上而下的。布尔什维克第一次把人民称为劳动人民，贯穿的就是劳动而不是剥削的精神。资产阶级的民主可能在西欧曾经起到过非常进步的作用，但是，正如社会革命党所明确的那样，冥冥之中的内在逻辑却使得这种制度在俄国变成了投机主义的压迫行为。布尔什维克经过实践放弃了适合西欧但不一定适合俄国的民主制度，根据俄国的特点创造了一种劳动的制度。从精神上来说，劳动制度就是一种“劳动纪律，冲天干劲，自我牺牲的决心”^②，这种决心在《共产主义义务劳动》中演化成为一种“自由的自觉的纪律”^③；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劳动的制度就表现为建立强大的红军和劳动的大军。^④

列宁《在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把自由平等的精神与阶级联系在一起，从而反对超阶级的自由和平等，他的一个著名的口号是：“自由如果同劳动摆脱资本压迫相抵触，那就是骗人的东西。”^⑤正是这一点导致了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并进而导致党的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基于这样的一种理念，即“党的自力更生精神、优越感、革命使命感、内在纪律性和权威是与无产阶级革命不可分割的”^⑥信念，把党完全献身于工人阶级并最终消灭了工人阶级。阶级的消灭唤醒了人民为共同事业献身的精神，但是最终也消灭了阶级差别。列宁消灭阶级的计划当然净化了人民的灵魂，从而创造了俄国的精神和物质奇迹。这种净化是痛苦的，但在精神颓废、经济衰败、政治凋敝的俄国来说是不可避免的。他通过大公无私的精神激发了对有产者的无比仇恨，从而重新唤起俄国社会的凝聚力和创造力。这种情况只适合于俄国，是俄国独特的地理位置造成的。通过这种独

① 《列宁全集》第36卷，第226页。

② 《列宁全集》第36卷，第228页。

③ 《列宁选集》第4卷，第10页。

④ 《列宁全集》第36卷，第224-225页。

⑤ 《列宁全集》第36卷，第334页。

⑥ 伊·多伊彻：《先知三部曲·被解除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1921-1929）》，第15页。

一无二的造就，俄国度过了一战给它造成的危机，但也为社会的冲突埋下了伏笔。当然，秉承人道基本理念的社会革命党对此无论如何是不能接受的，也必然遭遇失败的历史命运。

二 各自为战

通过中央委员会的酝酿，第三条道路作为党的指导方针确定下来。第三条道路显然是教条主义的路线，是对西欧发展道路的拙劣模仿。第三条道路是对党的第八次党务会议决议的全面修正，也是切尔诺夫路线的胜利。切尔诺夫的路线虽然是教条主义的，同时遭到党内右翼和左翼的反对；但在左翼和右翼都遭到失败的情况下，切尔诺夫的教条主义路线成为党的指导方针，并在第九次党务会议上得到了贯彻。第九次党务会议是思想统一的大会，但是，缺乏权威的第三条道路却进一步分化了本已不统一的政党，造成地方政权的各自为战。

第九次党务会议是对1919年3～4月中央全会决议的具体化。在战争问题上，社会革命党认为，随着一战的结束，协约国帮助俄国对抗德国的使命已经完成，已经没有任何根据进一步留在俄国的土地上了。此外，第九次党务会议注意到一种悲剧性的经验：不久前外国人的入侵意图正逐渐恶化，整个俄国地区变成了殖民政策和复辟力量统治的试验区。会议坚决谴责那些在国外的党务工作者，谴责他们不顾党的屡次三番的决定，为侵略辩护，认为他们有义务完全停止那些与继续留在党的队伍中不相容的举动，同时提醒所有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督促本国帝国主义政府停止对俄国的野蛮的突然袭击、封锁以及对俄国反革命提供的军事和物质援助。同时声明，协约国承认高尔察克政府将被视为对俄国民主派的敌对行动。^①

社会革命党对协约国进入俄国的态度突然发生本质性的变化在于战争的结束，特别是布列斯特和约的废除给他们提供了发展的机会。他们幼稚地认为，随着战争的结束，不仅贵族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官僚被打得七零八落，就是布尔什维克所依靠的工人阶层也被消灭，一部分工人还屈辱地成为靠国家吃饭和养老的人，为国家官僚资本主义所奴役，并为此通过在

^①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17. 10 - 1925, Т. 3, Ч. 2, с. 462.

苏维埃高级和低级官僚中安排大量舒服的位置得到补偿。^① 战争唯一没有打垮的就是农民阶层了。

社会革命党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农民身上。作为农民要求的代言人，社会革命党认为国内最大的矛盾就是劳动农民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比重与前所未有的发展和政治意义极端贬低之间的矛盾。随着劳动农民数量的增多以及越来越多的工人和平民的出现，社会革命党宣称，将根据西方民主的原理，通过普遍和平等的投票保证他们获得以前没有，现在则根据自己在国家和国民经济肌体中所占的比重赢得的管理国家的决策权。由于农民在地域上的极端分散以及统一行动上的困难，预先警告农村放弃左派社会革命党建议的消耗农民力量的暴动策略，以免各个击破。进一步支持使农民摆脱孤立、实现在各条战线上协调一致地捍卫公民权利的行动方法。对于劳动公社和苏维埃经济，党组织应该用经济世俗化的口号抗衡本能的富有攻击性的口号，即消灭那些具有官僚性和腐败特权的经济，把它们交给民主产生的农业土地委员会和大的合作社统一管理。虽然布尔什维克依靠中农的口号富有欺骗性，但是可以广泛地利用他们提供的机会消灭贫农委员会，把所有的来自苏维埃和政治委员的官员赶出去，代之以真正的劳动农民的代表。为了这一点，也为了将来有组织地管理，必须把农村有创造力的组织变成纯粹的党的农民兄弟会，与全党集体有联系的兄弟会的地域联盟，以便把此时的所有策略口号快速地从中央传遍周边。党的兄弟会应该千方百计地阻止类似“把播种的规模减少到不能保证布尔什维克粮食征收的最低程度”等自杀性口号在农民中传播，让农民明白，布尔什维克政权只是一个过渡政权，减少播种面积的结果让任何政府都没有机会整顿毁灭的社会和国民经济机制。这样，党的所有的兄弟会都应该有这样的意识，即对于国家，仅仅借助布尔什维克那富有欺骗和蛊惑的许诺灌输到头脑中的观点，无论如何没有好的结果，未来的人民政府要求社会人士把能量和牺牲都奉献给人民的共同利益。布尔什维克在工农之间人为制造的、有长期妨碍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危险的分歧给党组织提出了一个任务，即通过宣传劳动农民和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的思想消除分歧。另外，党的兄弟会时刻也不能忽视另一个基本任务，与富农斗争。通过粗暴的方法，布尔什维克不仅没有消灭富农，反而使之普遍复兴。在红色布尔什维主义的庇护

^①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17. 10 - 1925, Т. 3, Ч. 2, с. 462 - 463.

下，各地富农人为地与劳动农民保持紧密联系，布尔什维克几乎按人头把农民编进富农的队伍。农民兄弟会应该教育某些地方的农民耐心地等待时机，一旦重大的政治事件出现，党发出相应的策略号召，就是农民把赢回失去权利的日常斗争变成更具决定形式的斗争的信号。^①

社会革命党在争取合法反对派地位的过程中，重复了布尔什维克加强工农联盟的思想。社会革命党指责布尔什维克消灭农民是为了工人的利益而榨取农民的血汗，是对农民的剥夺。可是，社会革命党在凝聚分散的农民过程中也处处感到凝聚的艰难，没有忘记在1917年出现农民夺取土地的抢劫行为而被他们称为暴民的情形。但是，社会革命党一直不能突破工人与农民在社会行为中出现的阶级对抗，把布尔什维克对农民改造、把有产者为农民改造付出的代价看做布尔什维克的阴谋。所以，在社会革命党的所谓第三条道路的探索中，一方面反对高尔察克、邓尼金提出的恢复私有制的行为，称他们为反革命或者是复辟专制制度；但另一方面也反对布尔什维克争取人民权利的所谓的专政。社会革命党把目光专注于民主自由，但不了解民主自由背后的自主价值的背景，更不理解一战利益集团背后发展道路的较量，只是粗略地从反专制争民主的角度反对德国的开明专制的发展道路，赞成英法的民主模式，从根本上丧失了对俄国革命内涵的真正理解，当然也造成了对布尔什维克的严重误解并最终导致丧失合法地位和各地社会革命党组织的分裂。

社会革命党内部第一个分裂出来的就是曾经在乌法与布尔什维克谈判而被解散的乌法代表团。乌法代表团在乌法与布尔什维克谈判寻求合作的做法遭到第九次党务会议的批评之后，沃尔斯基等人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并决定带着自己的纲领参加苏维埃。拉基特尼科夫和布列沃依退出了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②

1919年8月17日，社会革命党乌法组织在《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发表了该组织致所有社会革命党党员的呼吁书。“呼吁书请求社会革命党全党团结苏维埃政权，在它的领导之下与反革命作斗争。呼吁书承认布尔什维克政权是真正的工农政权。乌法组织不是口头而是实

①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17. 10 - 1925, Т. 3, Ч. 2, с. 465 - 466.*

② *В. Л. Кузьмин, Ю. Н. Ципкин, Эсеры и меньшевики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россии в период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войны 1917 - 1922гг., с. 108.*

际走在它指明的道路上，公开并正式地参加苏维埃执行和领导机关，开展负责的政治和行政工作。”^① 乌法组织的呼吁书明显违背了党的第九次党务会议精神。8月23日被勒令解散。随后，乌法组织以出版的《人民报》为名成立了“人民小组”。

人民小组成立之后，对于社会革命党十月革命之后执行的右倾路线提出批判并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现阶段的发展路线。小组认为，世界大战引发的各国革命运动已经发展成为普遍的社会革命。小组呼吁放弃第九次党务会议通过的第三种力量的政策。如果继续下去，俄国革命将面临灭亡的危险。^② 小组呼吁中央委员会建立统一的革命战线同白军作斗争，拿起武器反对反动派，继续同布尔什维主义做思想斗争，聚集力量，在所有社会主义政党都有宣传自由的基础上重新选举苏维埃。拉基特尼科夫甚至指出，在布尔什维克和反动派之间没有第三种力量。^③

当邓尼金开始逼近莫斯科的时候，人民小组决定把自己的支持者交给布尔什维克工农国防委员会支配，呼吁中央委员会号召全党和劳动人民帮助红军。10月25日，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认为人民小组的行为是破坏组织的行为，决定解散小组，取消把所有力量交给布尔什维克工农国防委员会支配的命令。1919年11月4日，作为回敬，人民小组又成立了“社会革命党少数派组织”。少数派组织的领导人布列沃依、沃尔斯基、И. С. 达舍夫斯基、Л. А. 利伯曼和 Н. П. 斯米尔诺夫呼吁工农选举权平等并组织苏维埃自由选举，他们仅有的近1000人加入了工农红军。^④

人民小组变成“社会革命党少数派组织”有着特定的含义，人民小组只是党的一个不合法的反对派，而少数派组织则变成了与社会革命党并驾齐驱的全国性组织。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坚决反对人民小组的举动，同时告知俄国所有的政治组织不要把现在的社会革命党与打算覆盖全国的

^① Marc Jansen,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после октябрьского переворота 1917 года* Документы из архива П. С-Р, с. 201.

^②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17. 10 - 1925*, Т. 3, ч. 2, с. 477.

^③ В. Л. Кузьмин, Ю. Н. Ципкин, *Эсеры и меньшевики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России в период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войны 1917 - 1922 гг.*, с. 109.

^④ В. Л. Кузьмин, Ю. Н. Ципкин, *Эсеры и меньшевики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России в период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войны 1917 - 1922 гг.*, с. 109 - 110.

人民小组混为一谈。^①

人民小组从乌法组织演变而来，发展成为社会革命党少数派，表面上是追求社会革命，实际上如社会革命党基辅组织全体会议认为的那样，是取消了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革命行动。^② 如果结合党的发展历史来看，社会革命党在关键时刻的不断分裂反映了俄国社会分化的历史现象，同时也说明社会革命党追求第三条道路充分认识到了俄国的价值观革命特点。但从社会革命党第三条道路缺乏群众的支持看，它仍然没有找到适合群众需要的发展道路。

第二支分化的力量是流亡的右派。1917年二月革命以后，右派路线在社会革命党中一直占据优势，十月革命之后特别是立宪会议解散之后走得更远，甚至出现放弃革命路线走向执政的道路，为君主派将军高尔察克政变创造了条件。高尔察克政变后，右派社会革命党被迫流亡海外。

第九次党务会议纠正了党的策略之后，流亡海外的右派社会革命党领袖对普通流亡党员极力掩盖第九次党务会议决议。他们认为应该继续执行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斗争，同反布尔什维克的右翼力量结盟。前右翼社会革命党萨温科夫在1919年12月给邓尼金将军的信中祝贺白军运动。当白军反对苏维埃政权没有什么成效之后，他们又责备邓尼金政府执行反民主政策，建议坚定不移地同反动的白卫军进行斗争，建议弗兰格尔通过立宪会议建立伟大的哥萨克和农民民主派。^③

1919年5月16日，流亡法国的克伦斯基、阿夫克先基耶夫、津季诺夫、阿尔古诺夫、罗科夫斯基、米诺尔、Н. Н. 索科洛夫、М. Л. 斯洛尼姆、С. А. 伊万诺夫、Я. Л. 杰列夫斯基和 О. И. 罗森菲尔德的巴黎小组发表了一个声明。声明说：“只有保持二月革命以来取得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革命的成就，首先在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选举的基础上召开立宪会议，才能复兴俄国，结束国家被肢解、以前的反动派被确立、西方的民主遭到危险的国内战争。”“由于必须在全世界范围内反对无政府和反动派，巴黎

① Marc Jansen,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после октябрьского переворота 1917 года* Документы из архива П. С-Р, с. 218.

② Marc Jansen,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после октябрьского переворота 1917 года* Документы из архива П. С-Р, с. 219.

③ В. Л. Кузьмин, Ю. Н. Ципкин, *Эсеры и меньшевики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России в период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войны 1917 - 1922 гг.*, с. 109 - 110.

小组一般允许外国政府以他们现有的形式干预俄国的内部事务。”^①

巴黎小组的命令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得到执行。据高尔察克内务部的一些不太确凿消息称，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似乎想通过恢复克伦斯基的政府抵制高尔察克君主派，应该扮演复辟角色的是 H. M. 波塔波夫将军和 B. И. 多马涅夫斯基将军，似乎克伦斯基本人也应借道日本回到俄国，以便领导社会革命党的工作。1919 年 6 月，高尔察克的反侦探局说，社会主义政党的地方组织积极开展活动，为恢复克伦斯基政府做准备。这件事还得到美国人的支持。各个地方组织相信，未来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可能合并，以便清洗组织，为恢复临时政府奠定基础。在巴黎的阿夫克先基耶夫与克伦斯基见面之后，组成了六人委员会，六人分别是克伦斯基、阿夫克先基耶夫、齐赫泽、索科洛夫、С. А. 伊万诺夫和隐蔽的萨温科夫。六人委员会发表宣言，声明承担同高尔察克和邓尼金斗争的领导工作。

克伦斯基的副手 Д. О. 加夫龙斯基在英国的报刊和议会宣传反对高尔察克政府，号召支持社会革命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领导人也在报刊贯彻一种思想，认为协约国政府直到现在不支持高尔察克政府意味着美国人民愿意承认克伦斯基新的民主政府，指出西伯利亚早就准备发动政变。克伦斯基为了应对政治形势的变化还提出把俄国划分成 30 个独立共和国，从结构到管理上将模仿美国。克伦斯基时代流亡的一些人也来到弗拉基米尔和伊尔库茨克，确立了与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和协约国特别是美国政府代表的联系。^②

留在乌拉尔和远东的右派社会革命党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执行巴黎小组的命令，另一部分独立开展反高尔察克政府的活动。反对高尔察克的以 В. М. 克鲁托夫斯基、Г. Б. 帕图申斯基、М. Б. 沙季洛夫为代表，他们反对取消执政把政权转交给高尔察克的做法，并通过滨海州地方自治管理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城市杜马以及各地的市区自治管理局开展工作。1919 年 1 月 18 ~ 28 日，滨海州召开了远东地方和城市边区自治代表大会，大会批评高尔察克及其政府没有道德权威，同时也警告存在着左和右布尔什维主义

^①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17. 10 - 1925, т. 3, ч. 2, с. 495, 496.

^② В. Л. Кузьмин, Ю. Н. Ципкин, Эсеры и меньшевики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России в период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войны 1917 - 1922 гг., с. 123.

的危险，认为未来的出路只能是恢复 1917 年临时政府颁布的法律并在全民投票的基础上召开西伯利亚立宪会议。会议成立了边区委员会，社会革命党人 A. C. 梅德韦杰夫当选为主席。^① 但是，组织成员在 1919 年 3 月 2 日即被逮捕。

1919 年 7 月 24 日 ~ 8 月 4 日，滨海州地方自治非常会议在高尔察克当局的监督下召开。参加会议的人员不全，但是要求当局停止对地方自治机关的迫害，停止内战并通过立宪会议振兴俄国。1919 年 5 ~ 7 月选举城市杜马州议员，远东的选民表现出高度的冷漠。地方自治局和城市杜马不得不在白色政权的监督和财政匮乏的条件下工作。地方自治机关试图反对政权的白色恐怖。如哈巴罗夫斯克的城市杜马在社会革命党议员卢萨诺夫和前士兵委员会主席 A. H. 格列库洛夫的领导下向来自国外的领导人抱怨白军的趁火打劫。^②

高尔察克并不理解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在自治局和杜马中的活动，这一点使得他的社会基础越来越小。高尔察克对社会革命党等社会主义者的镇压政策引起了美国的注意。美国在远东的代表支持社会革命党的民主政策，把他们作为取代高尔察克的候选人。由于美国政策的改变，退出了外国入侵者的行列，社会革命党利用美国的支持赢得民主政权化为泡影。

高尔察克曾在 1918 年 11 月成立了国家非常经济委员会。参加委员会的阿穆尔地方自治局的代表、阿穆尔州政府的前领导人 A. H. 阿列克谢耶夫斯基是远东区的唯一代表。他回来后，谴责高尔察克制度，为此被捕并遭流放。1919 年秋，高尔察克决定增加社会人士参加政权机关，签署了关于国家地方自治会议的条例并把它看做咨询机关。1919 年 10 月，社会革命党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认为高尔察克的做法无法弥合政府与社会的鸿沟。1919 年 12 月 15 日，符拉迪沃斯托克城市杜马举行了国家地方自治局会议代表的选举。滨海州地方自治局局长梅德韦杰夫声明，选举人民不信任的代表参加国家地方自治局会议例会是不合适的。杜马议员在会议上提交了温和的社会主义者的委托书，建议把国家自治会议变成立法机关，消除引发群众不满并滋生内战的条件，停止军事政权对国家管理事务的干预，采取一系

① В. Л. Кузьмин, Ю. Н. Ципкин, Эсеры и меньшевики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России в период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войны 1917 - 1922 гг., с. 115.

② В. Л. Кузьмин, Ю. Н. Ципкин, Эсеры и меньшевики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России в период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войны 1917 - 1922 гг., с. 117.

列类似国家干预的措施，消除危机。^①

右派社会革命党中还有一派独立反对高尔察克。同情右派社会革命党的伊尔库茨克省长 П. Д. 雅科夫列夫指出，社会革命党与布尔什维克的妥协冲动基本上影响了社会革命党的工人群众，而知识分子基本上对布尔什维克持敌视态度。因为布尔什维克拒绝通过立宪会议建立统一的反高尔察克统一战线。

高尔察克和外国侵略者的强制行为引起了人民的游击运动。许多独立的社会革命党人纷纷成为游击队的领导人，比如滨海州奥利津斯克县的地方自治局主席、社会革命党人 И. С. 马斯列尼科夫领导了该县的游击运动。1919年春，以 П. 米哈伊洛夫为首的社会革命党小组组成了社会革命党西伯利亚联合会。这个联合会认为必须停止同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给人民提供机会独立选择政权形式，或者立宪会议，或者苏维埃。联合会的主要目的就是同君主反动派及其外国的支持者作斗争。西伯利亚联合会在白军和外国入侵者的队伍中开展工作。1919年10月，联合会呼吁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反对高尔察克或者回家，不要干预俄国恢复自由的斗争。^② 社会革命党西伯利亚边区委员会把他们称为僭越者。

1919年7月，西伯利亚立宪会议同盟组建。他们在给全体西伯利亚公民的呼吁书中宣布为建立社会主义清一色政府同反革命作斗争，制定选举西伯利亚立宪会议的法律，实施立宪会议通过的土地法。1919年8月初，西伯利亚社会革命党建立了“捍卫人民主权军事社会主义同盟”。同盟在白军中宣传，特别是在 А. Н. 佩佩利亚耶夫的西伯利亚第一军中宣传。同盟的办事处有两个中心，一个是伊尔库茨克，另一个是符拉迪沃斯托克。在印发的传单中号召发动反对高尔察克制度、建立西伯利亚立宪会议和自由西伯利亚的起义。^③

社会革命党第三支力量的中心是1919年11月12日在伊尔库茨克成立的政治中心。政治中心的领导是前立宪会议成员、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成员 Ф. Ф. 费奥多罗维奇。政治中心包括了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无党派合作社

^① В. Л. Кузьмин, Ю. Н. Ципкин, Эсеры и меньшевики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России в период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войны 1917–1922 гг., с. 120, 121.

^② В. Л. Кузьмин, Ю. Н. Ципкин, Эсеры и меньшевики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России в период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войны 1917–1922 гг., с. 124.

^③ В. Л. Кузьмин, Ю. Н. Ципкин, Эсеры и меньшевики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России в период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войны 1917–1922 гг., с. 124.

和地方自治机关。政治中心还有地方自治机关政治局、劳动农民联合会中央委员会、社会革命党西伯利亚边区委员会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西伯利亚组织局的人员。

政治中心的主要目的就是借助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力量推翻高尔察克统治，建立缓冲国。由于缓冲国的原则是民主和市场原则，这个建议得到了在远东的美国、日本和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支持，成为替代高尔察克政府的后备方案。^①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 P. 盖达一直与高尔察克有矛盾，同情社会革命党。他在 8 月 8 日与西伯利亚的社会革命党人 E. E. 科洛索夫取得联系，准备在伊尔库茨克发动政变。到达符拉迪沃斯托克后，盖达开始批评高尔察克制度。社会民主工党西伯利亚组织局也在 8 月发布了发动政变的消息，同时准备借助捷克人和塞尔维亚人建立由左派立宪民主党、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组成的联合政府。联合政府将宣布与布尔什维克停战，并就建立全民政权的程序举行全民公决，反对外国侵略者并支持把西伯利亚和远东与欧俄联合起来。

起义军在盖达周围聚集。美国人也开始与捷克人谈判支持右派社会革命党，提供资金和情报。在游击队的支持下，盖达决定发动政变。高尔察克在远东的驻军司令 C. H. 罗赞诺夫打算在东西伯利亚和蒙古建立独立国家，与社会革命党达成协议：自由活动，互通消息。社会革命党的短视延迟了计划。政变者准备联系博尔德列夫将军，但遭到了拒绝。随后，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准备和布尔什维克谈判。布尔什维克害怕政变会增大与自己斗争的变数也加以拒绝。政变者转向协约国。9 月 28 日罗赞诺夫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发动暴动，但在协约国的压力下，被迫退出符拉迪沃斯托克。10 月，社会革命党找到布尔什维克远东委员会，要求他们参加推翻高尔察克的行动。布尔什维克提出释放所有政治犯、停止军事入侵以及放弃反对苏维埃战争的条件。社会革命党同意了前两条，拒绝了第三条，但声明将与苏维埃政府举行谈判。^②

1919 年 11 月 10 日，在红军的压力下，高尔察克被迫离开了鄂木斯克。11 月 12 日，盖达在《艾哈》报纸透露了自己发动政变的计划，建立了新政

① В. Л. Кузьмин, Ю. Н. Ципкин, Эсеры и меньшевики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России в период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войны 1917 - 1922 гг., с. 127.

② В. Л. Кузьмин, Ю. Н. Ципкин, Эсеры и меньшевики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России в период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войны 1917 - 1922 гг., с. 130.

府并与苏维埃政府谈判。11月14日，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发表最后通牒，要求捷克斯洛伐克军团退出西伯利亚。11月16日，社会革命党和盖达举行起义。但在协约国的压力下，特别是邓尼金进攻莫斯科正酣的时候，起义以失败告终。18日，起义被镇压，盖达流亡。起义失败源自协约国的立场，他们不想放弃邓尼金而把政权转交给社会革命党。

1919年12月末，政治中心在伊尔库茨克发动起义。它的影响波及托姆斯克、叶尼塞、伊尔库斯克、雅库斯克、后贝加尔和滨海州。布尔什维克准备参加暴动以期在有利的条件下建立政权。

1919年12月21日，政治中心在切列姆霍沃开始起义，22日组成了以H. C. 卡拉什尼科夫大校为首的人民军，总数1300人。在游击队和工人赤卫队的支持下，在伊尔库茨克省长雅科夫列夫的帮助下，12月24日，政治中心包围了伊尔库茨克。伊尔库茨克政权转交给了A. A. 切尔文—沃达理、M. B. 汉任、A. H. 拉里奥诺夫为首的执政。

社会革命党准备恢复第三种力量的政策。在与伊尔库茨克执政谈判的同时，打算事先争取协约国的支持。社会革命党通知协约国外交官将继续与布尔什维克斗争。政治中心不允许白军疏散，因为这将给红军进入后贝加尔打开大门。社会革命党认为自己是全权政权，将承担起全部义务。

1919年的最后时刻，政治中心与白军在伊尔库茨克城外展开激战。由于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美国、英国和法国都站在起义者的一边，1920年1月1日，捷克斯洛伐克军团与Г. М. 谢苗诺夫军队展开激战。1月4日，高尔察克把权力分别交给了邓尼金和谢苗诺夫。1月5日，伊尔库茨克政权转交给了政治中心。

1月12日，临时西伯利亚人民管理委员会成立。社会革命党在其中占据优势，分别是前西伯利亚临时自治政府和国家经济会议的成员。

为了建立缓冲国，政治中心与托姆斯克的孟什维克艾哈迈托夫取得联系，与布尔什维克人民军事委员会第五军举行谈判。布尔什维克鉴于自己的力量远离西伯利亚，担心与日本发生战争，特别是邓尼金未被摧毁和波兰战事的问题，同意设立缓冲国。政治中心鉴于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中立化，同时为防止与日本发生军事冲突，也同意建立缓冲国。^①但出于自己无

^① В. Л. Кузьмин, Ю. Н. Ципкин, Эсеры и меньшевики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России в период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войны 1917 – 1922 гг., с. 134, 135.

力抗衡日本，政治中心把军权交给了布尔什维克。

根据政治中心谈判的结果，捷克斯洛伐克军团根据协约国军队的决定把高尔察克、佩佩利亚耶夫和黄金储备交给了政治中心以换取撤出俄国。

1920年1月21日，从前线下来的白军到达伊尔库茨克，政治中心、伊尔库茨克布尔什维克军事委员会和工人赤卫队联席会议，建议把权力交给共产党，建立以A. A. 希里亚莫夫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伊尔库茨克军事革命委员会。1月25日，伊尔库茨克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政治中心解散。布尔什维克稳固政权之后，对高尔察克进行了审判。鉴于白军的进攻，布尔什维克处死了高尔察克；鉴于担心与日本交战，重新启动了在远东建立缓冲国的计划。

社会革命党的第三条道路的学说还体现在乌克兰的民族问题上。社会革命党在乌克兰有两支力量。一支是乌克兰社会革命党，一支是社会革命党本身。早在1917年4月，乌克兰社会革命党就从社会革命党中分离出来。乌克兰社会革命党的领导机关是乌克兰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而社会革命党在乌克兰的领导是全乌克兰州委会。

立宪会议被解散以后，根据中央第八次党务会议发展各个地方力量的指示，乌克兰的社会革命党在乌克兰民族独立和建立联邦国家之间发生了分歧。1918年4月之前，统治乌克兰的中央拉达就寻求民族独立，社会革命党对此表示支持。1918年5月，在德国的支持下，盖特曼П. П. 斯科罗帕茨基执掌了政权，社会革命党又对他表示敌意。1918年12月德国投降之后，政权又转到B. K. 温尼琴科和C. B. 彼得留拉执政的手中，直到1919年2月布尔什维克占领乌克兰。在乌克兰问题上，社会革命党一直坚持与俄罗斯建立联邦的原则。^①但是，由于执行第三条道路的路线，社会革命党的民主思想在乌克兰问题上就会直接演变成乌克兰脱离俄国独立。

问题很简单，社会革命党把空想的东西当做了现实。

首先，从民主原则出发，只要俄国完全存在自由选举运动，即存在言论、集会和出版的自由，以及保存临时政府的选举法，就不应该反对重新选举。^②换句话说，社会革命党以临时政府实现了民主自由及其选举作为依

^① Marc Jansen,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после октябрьского переворота 1917 года Документы из архива П. С-Р, с. 511.

^② Marc Jansen,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после октябрьского переворота 1917 года Документы из архива П. С-Р, с. 519.

据，而不顾自由选举给俄国带来的结果执意追求民主。

其次，社会革命党以地域为单位分裂党组织造成国家的分裂。德国占领乌克兰期间，社会革命党和乌克兰社会革命党开始私下谈判，进而演变成乌克兰州委员会和乌克兰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团两党之间的谈判。乌克兰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首先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社会革命党乌克兰州委会如何对待乌克兰国家性、乌克兰国家的独立问题。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在给乌克兰州委会的信中说，必须支持和巩固乌克兰国家是建立全俄联邦民主制度的基础之一。乌克兰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代表把这个思想理解为，从经济、民族和政治基础方面，乌克兰建国是有益的，它已经做好了这个准备，进而承认联邦是可能的。^①

乌克兰社会革命党对于社会革命党中央的回应反映了乌克兰社会革命党把国家独立看做了革命的第一步。根据乌克兰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的意见，社会革命党提出乌克兰的独立不是源自经济、文化和民族理由本身的观点，而是因为乌克兰事实上已经独立。乌克兰以前没有与任何人结成过联邦，而且把乌克兰国家独立看做重建俄罗斯联邦的一个阶段。与此同时，乌克兰社会革命党认为需要明确，在普通党员的观念里，社会革命党在理解联邦问题上曾经发生过变化。以前社会革命党纲领在联邦问题上只是提出了一个总体框架，认为重要的只是原则，细节问题只有在实践中才能明确。而现在面临着实际操作，党就要弄清楚以前俄国的各个组成部分（独立的和没有独立的）应该如何开展建立联邦国家的具体过程，即如何自下而上走联邦化的道路。^②

乌克兰州委员会认为，连研究与事实上已经民主化、革命化的社会主义俄国搞联邦制的必要性都是多余的。它更没有幻想过自己可以与资产阶级的俄国、无政府的布尔什维克的俄国搞联邦制。

乌克兰社会革命党和乌克兰州委员会在乌克兰未来走向的问题上产生的纷争，对社会革命党的民主原则构成了挑战。切尔诺夫第三条道路的妥协性政策无助于问题的解决，最终只能交给乌克兰全民公决决定。^③

①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17. 10 – 1925, Т. 3, Ч. 2, с. 641.

②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17. 10 – 1925, Т. 3, Ч. 2, с. 642.

③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17. 10 – 1925, Т. 3, Ч. 2, с. 643.

社会革命党在民族问题上的第三条道路的方针直接导致1919年初彼得留拉民族资产阶级政府的建立，为邓尼金的志愿军进入乌克兰打开了方便之门。

随后，两派展开了关于如何对待彼得留拉政权问题的讨论。乌克兰社会革命党认为，党提出了在国内战争继续的条件下，政权应该交给没有资产阶级的劳动人民，那么应该如何对待民主和自由问题？社会革命党的乌克兰州代表回答说，他们继续坚持人民主权和民主的原则，但是，要明白，在实现民主政权并创造条件的过渡和革命时期，可以实现的人民主权的现实原则只能是乌克兰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所提出的这种形式，但这种形式是暂时的，是实现人民主权和民主的手段。^①乌克兰社会革命党只能以我们仍然遵循了民主原则作答。

社会革命党乌克兰州代表随后提出了如下问题：第一，乌克兰社会革命党如何对待波兰占领军和彼得留拉政权；第二，乌克兰社会革命党如何对待将尝试推翻波兰—彼得留拉占领的政党和组织；第三，如何理解报纸上登载的乌克兰社会革命党以负责的反对派的立场来对待彼得留拉政权的文章；第四，乌克兰社会革命党对于自治是什么态度，是否认为可以担任被任命的地方自治局中的职务，如果新的地方自治局政治委员的职务是现政权设立的，是否将参加它的选举；第五，乌克兰社会革命党认为应根据什么原则建立职业联合会，是民族原则还是阶级原则；第六，组织农民应该遵循民族原则还是阶级原则，乌克兰社会革命党如何对待农民乌克兰社会民主联盟。

社会革命党对这些问题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只是从一般意义上谈民主原则。然而，在政权问题和农民问题上又试图干预乌克兰社会革命党，希冀保持党的统一和国家的完整。乌克兰社会革命党由于第三条道路指引，不能把乌克兰的人民聚集在自己周围，在政权问题上依附于波兰—彼得留拉政府，并通过波兰—彼得留拉政府提供的合法机会去赢得自己的权利。这符合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提出的“党不能轻视利用合法机会……但我们的方法不是赎买，而是赢得合法机会”的原则，不过，并不能像社会革命党所要求的那样，做到“不拿自己的观点做交易，不削

^①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17. 10 – 1925, т. 3, ч. 2, с. 643.

弱自己的党”。^①

乌克兰社会革命党认为，他们不放弃反对派的地位并继续同彼得留拉政权斗争，但是，因为现在的乌克兰政府将建设乌克兰国家，他们将在经济和文化上给政府以支持。这就是乌克兰社会革命党所理解的负责任的反对派的含义。既然在经济和文化上支持彼得留拉政府，那么乌克兰社会革命党如何能够贯彻第三条道路提出的联邦原则呢？再看农民问题。社会革命党提出按照阶级原则处理农民问题，但是农民是一个未分化的阶层，为了能够贯彻民主原则，乌克兰社会革命党不得不按照民族原则对待农民。显然，民族原则必然包括有产者和无产者，从阶级对立的观点出发，有产者和无产者如何能够融合在一起？这样，乌克兰社会革命党最终只能从乌克兰的实际出发，按照民族原则组织全体乌克兰人民。^②乌克兰社会革命党走上了分裂俄国的道路。而造成这样的结果的就是切尔诺夫提出的第三条道路。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社会革命党所坚持的民主和联邦原则不过是“村社原则”。^③

通过对社会革命党各地实践的描述可以看出：虽然社会革命党第九次党务会议确立了独立发展的第三条路线，但由于第三条路线不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现实，各地社会革命党在反对高尔察克和布尔什维克的斗争中败下阵来，成为民主教条的牺牲品。流亡国外的中央委员会尽管总结第三条道路的经验，并为召开第十次党务会议做准备，但从社会革命党各地的发展情况来看，基本上转入了理论的探索和群众组织中的宣传。社会革命党作为群众性的政党逐渐淡出了俄国政治舞台。

三 党章的修改与在远东的实践

1920年1月，随着反对反动派和外国武装干涉的斗争逐渐接近尾声，布尔什维克已经进入了反攻时期。反攻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国内的社会经济改革；一个是与周边民族关系的调整。

连年战争，国内社会生活凋敝，开小差、要求过和平生活的呼声逐日

① Marc Jansen,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после октябрьского переворота 1917 года* Документы из архива П. С-Р, с. 529.

②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17. 10 – 1925*, Т. 3, Ч. 2, с. 644, 645.

③ В. Л. Кузьмин, Ю. Н. Ципкин, *Эсеры и меньшевики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России в период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войны 1917 – 1922 гг.*, с. 216.

增多，国内甚至出现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因一战而获得独立的波兰在1918年11月建立了独立的波兰共和国，即波兰第二共和国。共和国建立后，波兰边界问题成为重中之重。共和国元首毕苏斯基主张与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建立联邦国家。^①1920年4月25日，毕苏斯基发动了大规模的俄波战争。

俄国再次陷入了尚武精神之中。^②社会革命党一方面反对毕苏斯基的军队和国内的反动派弗兰格尔，为捍卫祖国的完整而战；另一方面又着手与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作斗争。

社会革命党内部的分裂和组织的削弱促使中央委员会召开了社会革命党九月代表会议（1920年）。对于国际形势，决议认为世界大战的结果使得现代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内容远远超出了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关系的范围。^③社会革命党由此推论出世界革命将从此进入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劳动民主革命过渡的阶段，也就是“社会革命”阶段。

对于俄国来说，布尔什维克由于依靠无产阶级夺取了国家政权，违背了其他劳动阶层的意志，把内战引入劳动者内部，灭亡了社会革命事业。^④因此，党号召人民起来用武力推翻布尔什维克。

社会革命党反对波兰和П. Н. 弗兰格尔是担心外国入侵者占领俄国领土，保卫国家领土不被外国占领的优先性使得社会革命党处理起与布尔什维克的关系非常谨慎。一方面，社会革命党肯定布尔什维克为了祖国的完整而发动的反对波兰的战争；另一方面，否定布尔什维克专政带来的对俄国其他政党和劳动人民的掠夺。社会革命党把处理同波兰之间的关系与世界社会革命对立起来，忽视了俄国革命在国际革命中的地位。

的确，一战深化了社会革命，但是这种局面并没有在俄国出现。正如社会革命党决议所讲的那样，“群众不仅组织上分散，思想上也分散，在广大的劳动阶层中间缺乏政治上成型的，思想上联合的，把对现有法律秩序的否定态度转化成创造性工作的口号，这就失去了现在开展任何积极行动的机会，因为，在争取政治和社会成就的斗争中，社会革命党不能依靠政

① 刘祖熙：《波兰通史》，商务印书馆，2006，第354页。

② 伊·多伊彻：《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1879-1921·先知三部曲》，第502页。

③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17. 10 - 1925, Т. 3, Ч. 2, с. 655.

④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17. 10 - 1925, Т. 3, Ч. 2, с. 656.

治上没有组织的、不牢固的暴动，如果这样，就只能给各种蛊惑和利用群众的愤怒搞投机开辟道路”。“俄国周边反革命的情绪滋长，资产阶级阴谋集团打着高度民主的旗号登上政治斗争的舞台，使得党面临不由自主地卷入与敌视民主的社会集团合作的危险，中央委员会指出这一点，就是警告党组织和个别党员们不要与资产阶级和观点不明确的组织妥协，再一次提醒，不允许与非社会主义政党联合。”^①

社会革命党不能在理论上清楚说明俄国在世界革命中处在什么位置上，只是从经验的角度把责任推给了农民、资产阶级和非社会主义政党，造成自己在俄国革命中的孤立。

社会革命党把布尔什维克与资产阶级区分开来，所以才在第三条道路中小心对待布尔什维克并与之进行思想斗争。但是，社会革命党对于布尔什维克的思想斗争又是不清楚的。它提出的理由是布尔什维克专政是党的专政，脱离了人民主权，而实现人民主权一方面要具备客观经济前提，另一方面多数人民要站在它的一边。夺取政权的少数人通过武力实施社会主义措施，从而把多数人吸引过来的任何尝试预定是失败的。民主作为多数人的统治，不仅不是实现社会主义的障碍，而且是保证社会主义革命事业成功的唯一政治形式。^②

既然社会革命党把是否实行民主作为评判坚持社会主义与否的标准，而自己又以俄国客观经济前提以及人民的多数不站在政党一边而否定开展社会主义革命，这样，社会革命党既不能开展革命，也不允许别人以其他的方式开展革命，社会革命党开展第三条道路的斗争直接导致俄国既不能举行革命，也不能恢复秩序。社会革命党又以各地因战争疲惫而爆发的农民起义作为发动武力推翻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借口。当然，社会革命党并不能直接开展与布尔什维克的武装斗争，原因很简单，在它的眼里，布尔什维克之所以取得胜利，不是由于红军的英勇，而是由于后方的人民起义软弱无力。所以，从理论上讲，俄国地主资产阶级政权不能取得胜利，布尔什维克也不能取得胜利，这样一来，不可避免地产生内在的反革命运动和国际帝国主义的蓄意侵害。为了人民主权，社会革命党必须与布尔什维

^①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17. 10 - 1925, т. 3, ч. 2, с. 653 - 654.

^②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17. 10 - 1925, т. 3, ч. 2, с. 657.

克进行武装斗争。而考虑到群众的分散，党的首要任务是组织人民的积极力量，以达到以上目标。^①

根据对形势的分析，切尔诺夫提议对 1905 年以来没有修改的党章进行修改。党章的修改充分说明了社会革命党再一次以民主的形式回到了民粹派那里，俄国的革命成了挂着西方民主招牌的农民革命。

切尔诺夫对于世界大战给资本主义带来的影响作了这样的概括。一方面，大战使得资本主义由古典资本主义进入有组织的帝国主义阶段。在这个阶段，资本主义通过私法组织与教权、等级、军国主义结合在一起，如德国的皇帝威廉成为资本家的推销员。虽然帝国主义国家暂时消灭了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并具有一定的组织和建设作用，但是，帝国主义的将来就是战争。伴随着经济的衰落和文明的黑暗，第一次出现了国联和帝国主义战胜国联盟最高委员会，出现了两大阵营的对立。另一方面，切尔诺夫把资本主义理解为过分地重视工业和城市，轻视了农业和乡村。战争促成了城市的衰落，它们贪婪地看着乡村，工业国贪婪地看着农业国，乡村和农业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即通过资本主义的工厂立宪和非资本主义的农村合作社走向社会主义。^②

切尔诺夫的认识虽然也像列宁一样提出了帝国主义就意味着战争和阶级对立，但是，由于他仅仅把资本主义简单地理解为工业国和农业国，城市和乡村间的社会范畴的划分，忽视了资本主义带来的不同于传统农业社会的人的创造性。显然，从创造性的角度来理解，对于资本主义来说，工业与城市就是人类创造的崭新世界，而农业和乡村则仍然是等待改造的自然状态的社会。这样，从和谐的角度、从消灭阶级纷争的角度，在工业和农业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搞调和，甚至以资本主义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和帝国主义的垄断引发的战争骄傲地宣告城市和工业国将有求于乡村和农业国，无疑是一种盲目的乐观。

切尔诺夫进一步以布尔什维克八大为内容，对其民族自决政策和土地社会化纲领进行批判。切尔诺夫把布尔什维克的民族自决政策看做是为了自己的整体民族利益而对东方民族统一战线的利用，是对劳动民主派利益的出卖；

①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17. 10 - 1925, Т. 3, Ч. 2, с. 658.

②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17. 10 - 1925, Т. 3, Ч. 2, с. 660 - 661, 664.

把布尔什维克实行土地社会化纲领和来自合作社理论的联邦制思想看做是对社会革命党纲领的剽窃，是对农民社会主义的官僚主义的强加。^①

最后，切尔诺夫虽然认识到资本主义已经到了该消灭的时候，但是，他从资本主义如秋后的蚂蚱还可能会咬人的角度，肯定了民主价值，通过发展社会自治进一步促进俄国民主并把它作为社会主义的标志。如果提出先启蒙后民主，就是借着启蒙剥夺了人民的民主权利，是伪善的贪权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厚颜无耻的哲学。^②

1921年8月，社会革命党组织局根据农民起义和新经济政策的发展，在萨马拉召开的第十次党务会议上重新部署了党的任务。

社会革命党认为：“布尔什维克执政者进行的社会主义试验造成的总的、特别是国民经济的瓦解和瘫痪极大地震动了城市工业，使得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社会阶级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这样一来，俄国无产阶级持续增加的人数减少了，在俄国整个经济中的比重也降低了。与此同时，政府试图通过发放各种食物和大量的特权券维持无产阶级饥饿死亡面前那点可怜的同情，自然而然地使他们为了活下来而去投机、偷盗工厂物资、工作时间利用工厂材料为自己偷偷加工产品的政策，将造成无产阶级队伍巨大的精神堕落、扭曲和阶级意识的败坏，整体上造成马克思所讲的关于社会的建设性阶级和非建设性阶级学说中最高心理价值上的非阶级化。”^③

社会革命党把工人阶级非阶级化归结为布尔什维克执行了兵营式的假社会主义，打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把个别的工人变成了没有心灵、敌视工人的国家机器上最坏的奴隶。社会革命党要继续布尔什维克的工作，使工人摆脱劳动的奴役。它所提供的方法是，“只有在自己的工会和合作社组织完全自由和独立的情况下，只有在有利的民主国家——完全的人民主权的环境下，只有在自己的阶级独立充分发展的条件下，俄国的无产阶级才能摆脱笼罩在他们身上的灾难——即使自己摆脱来自复活的资本主义最残

①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17. 10 - 1925, Т. 3, ч. 2, с. 666, 668.

②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17. 10 - 1925, Т. 3, ч. 2, с. 675.

③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17. 10 - 1925, Т. 3, ч. 2, с. 774.

酷的剥削，确立进一步发展的最有希望的经济基础。”^①

社会革命党把俄国资本主义的重新复活简单地归结为布尔什维克执行了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专政，认为布尔什维克执行的土地社会化政策只是部分地把土地交给了农民，带来了土地关系的混乱，中止了这样的机会并重新使得土地关系的解决复杂化：一方面，农民群众的阶级组织遭到破坏，即直接的阶级敌人地主被消灭了；另一方面，代之而起的与劳动农村对立的是打着工兵代表苏维埃旗帜的执政的共产主义官僚，他们实行了毁灭性的食品政策、设立了寄生的国营农场和国家公社等等。这样，大部分储备地的重新分配只能依靠执政的共产党的恩赐，而不是有组织的人民的意志，农民自己调整土地已经失去了被认为是固定的和合法的机会，而且，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曲折政策为了自我拯救只能突然妥协，没有杜绝大工业和农业加工业中培植大型租让制和国家小型资本的机会。那么，巩固农民成就并进一步发展的唯一条件和最现实的保证就是，根据劳动农民群众在国家生活中所占的社会经济分量，让他们参与国家建设和国家管理。^②

根据这种情况，尽一切努力加快消除农民群众的阶级组织的破坏进程，既要坚决与来自左边的冒险的非社会主义流派划清界限，也要坚决与来自为了自己的利益和目的极力利用农村的暴动情绪的右派敌对阶级集团划清界限。具体的做法是，向农民解释自发暴动反对共产主义政权的专制制度不仅没有什么结果，而且有危害；建立城乡间已具有紧密思想、经济和政治联系的组织，实现劳动农民和城市工业工人之间的阶级联合。比如土地社会化、农民拥有扣除劳动能力所及的国家税收之外的全部劳动产品、农民合作社和劳动组合（特别是农业合作社）的自由和独立、反对布尔什维克强加的各种各样的农民生产联合体、克服俄国共产党专政、把全俄立宪会议当做建设新俄国的起点、反对农民中出现的各种反革命情绪（痛恨城市和城市无产阶级、反犹主义、对知识分子的毁灭性情绪、对个别人采取复仇行动）以及各种恢复地主政权的可能。在政治上赢得所有的政治自由，即言论、出版、集会、良心自由，在普遍、直接、平等和秘密选举的基础

^①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17. 10 – 1925, Т. 3, Ч. 2, с. 775.

^②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17. 10 – 1925, Т. 3, Ч. 2, с. 777, 678.

上确立人民主权作为最完全地表达人民利益和意志的制度。^①

社会革命党一方面反对布尔什维克为了吸收劳动者参与国家管理所采取的改造措施；另一方面又通过宣传与合法斗争的方式建立起团结的城乡劳动人民团体。社会革命党并不是反对布尔什维克团结城乡劳动人民的意图，而是反对布尔什维克所采取的团结劳动人民的方法，即阶级斗争的方法。但是，社会革命党非常清楚，资本主义的阶级对立是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是资本主义制度无法克服的，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才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的命题。然而，社会革命党面对社会主义的建设同样不能回避对自身的改造这样命题的时候，它没有了答案。社会革命党只能以“用新型的社会主义代替旧的资产阶级关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劳动阶级在与现在的统治力量进行革命争夺的时候将进一步限制了资本主义关系的统治范围，确立集体主义对非集体主义并最终完全消除非集体主义”^②这样的老生常谈作答。

社会革命党对布尔什维克的揭露既不能说服跟随它的工农群众，也不能说服它的党员同志，社会革命党只能通过加强党的纪律重建党的权威。显然，社会革命党已经没有这样的机会了。原因很简单，一方面社会革命党的领导人没有能力进行理论上的突破；另一方面布尔什维克已经把它纳入被取缔的行列。社会革命党只能通过争取合法斗争的机会寻求毫无意义的反抗。

社会革命党在远东与布尔什维克的合作与竞争充分反映了它追求第三条道路的成效。

自从社会革命党与布尔什维克战胜高尔察克和外族入侵之后，俄国进入了和平的经济建设时期。和平建设走无产阶级专政道路还是走民主道路成为布尔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等右派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分歧。

时间进入1920年，苏维埃的主要力量用于应对西方协约国利用波兰等俄国周边的民族向布尔什维克发动的挑战，在遥远的远东地区为缓冲国的建立提供了机会。

远东地区社会比较复杂，有布尔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人

①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17. 10 - 1925, Т. 3, Ч. 2, с. 779.

②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17. 10 - 1925, Т. 3, Ч. 2, с. 781.

民社会党、白军残余、哥萨克以及美国、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和日本等外国势力。白军以及外国势力已经式微，但是还没有完全撤离，还可以借助俄国社会主义者和哥萨克的力量复活。远东地区成为两种社会主义模式较量的试验场。

1920年4月6日，后贝加尔的劳动人民代表大会在维尔赫涅乌金斯克（今天的乌兰乌德）建立了远东共和国，地域包括后贝加尔、滨阿穆尔河、滨海各州以及堪察加和归属于中东铁路的地带。1920年5月14日，布尔什维克予以承认。^①

建立远东共和国是布尔什维克和平收回远东地区以及协调与社会革命党等社会主义者关系的手段。而社会革命党则把建立远东共和国看做了建设民主国家的目的本身。1920年4月6日当天，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就派代表到未来的国家政权机关并指导他们按照议会的模式建设共和国达成一致。布尔什维克同意按照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秘密的方式选举政权，民主派则容许共产党在宪法基础和经济政策方面有少量特权，即在资产阶级民主外衣下执行共产党的政策。^②

为了领导远东组织，社会革命党西伯利亚州委会在1920年9月建立了社会革命党远东局，出版了自己的机关报《自由》。负责远东局工作的是著名的社会革命党人E. A. 特鲁伯。社会革命党远东局没有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站稳脚跟，随后迁往赤塔，出版了机关报《劳动报》。

远东共和国建立前，社会革命党通过1920年1月31日成立的州地方自治管理局在滨海州发挥作用。参加工作的有A. C. 梅德韦杰夫、A. H. 卢萨诺夫和П. П. 波波夫。梅德韦杰夫担任主席。管理局宣布自己是政府。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停止内战并把滨海州从入侵者手中解放出来，释放政治犯，消灭高尔察克政权的残余，恢复言论、集会和结社的自由；在经济方面由社会监督工业和贸易，组织居民的供应，使工资正常化，调节土地关系等。^③ 布尔什维克支持政权交给地方自治局。

1920年2月5日，滨海州建立财经委员会，布尔什维克主持执行局。

① В. Л. Кузьмин, Ю. Н. Ципкин, Эсеры и меньшевики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России в период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войны 1917 - 1922 гг., с. 148.

② В. Л. Кузьмин, Ю. Н. Ципкин, Эсеры и меньшевики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России в период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войны 1917 - 1922 гг., с. 149 - 150.

③ В. Л. Кузьмин, Ю. Н. Ципкин, Эсеры и меньшевики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России в период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войны 1917 - 1922 гг., с. 153.

布尔什维克在滨海州与右派社会主义者合作正常，在维尔赫涅乌金斯克也正常，但在阿穆尔州，布尔什维克占据优势。

在缓冲国建立的过程中，赤塔成为一个异己力量。在高尔察克之后，阿达曼谢苗诺夫在赤塔占据了优势，并在日本人的帮助下试图建立白色缓冲国。谢苗诺夫的意图得不到美国、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等民主力量的支持。为了在远东建立民主制度，美国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领事馆建议梅德韦杰夫提出一个宪法草案，建立滨海州地方自治共和国作为未来远东联合州的基础。曾经支持过社会革命党立宪会议成员政权的卡波别列夫的军队指挥、社会革命党人民军的 С. Н. 沃伊采霍夫斯基将军、Г. А. 韦尔日比茨基将军、В. М. 莫尔恰诺夫将军、И. С. 斯莫林将军、П. П. 彼得罗夫将军也都支持梅德韦杰夫。^①

1920年3月末至4月初，以彼得罗夫为首的沃伊采霍夫斯基将军的特使从赤塔来到符拉迪沃斯托克与梅德韦杰夫谈判。梅德韦杰夫不支持 В. О. 卡贝利将军们的反苏维埃的情绪，希望卡贝利与布尔什维克妥协，在各种力量之间做一个协调者。虽然布尔什维克和卡贝利将军之间在军队问题上争执不下，但他们在反对日本入侵者这个问题上达成了一致。

1920年4月4~6日，日本军队进攻滨海州和游击队，但在美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反对和布尔什维克等各派力量的阻止下，以失败告终。谢苗诺夫转而与维尔赫涅乌金斯克的远东共和国政府谈判，宣布选举人民边区会议。1920年8月4日，日本人退出阿穆尔州和后贝加尔之后，谢苗诺夫在9月9日宣布解散人民边区会议，在赤塔成立有布尔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右翼社会主义者参加的东后贝加尔临时人民会议。日本人的进攻与布尔什维克在滨海州推行布尔什维克化政策有关。^②此后，布尔什维克借后贝加尔宣布建立远东共和国之机，加强了与社会革命党等社会主义者的合作。东后贝加尔临时人民会议知道自己不过是谢苗诺夫的傀儡，试图依靠卡贝利军队控制后贝加尔，进而掌管远东共和国的军队，但在布尔什维克的反击下失败。谢苗诺夫也在社会革命党人民军和游击队的联合进攻下于1920年11月中旬撤退到满洲里。从此以后，白军的势力削弱了。

① В. Л. Кузьмин, Ю. Н. Ципкин, Эсеры и меньшевики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России в период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войны 1917 - 1922 гг., с. 155.

② В. Л. Кузьмин, Ю. Н. Ципкин, Эсеры и меньшевики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России в период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войны 1917 - 1922 гг., с. 157, 156.

白军的失败推进了远东共和国的联合。1920年10月29日，赤塔召开了远东各州联合代表大会。根据宣言，从色楞格河和贝加尔湖到太平洋广大地区被宣布为具有民主政权的独立共和国，立法机关为远东共和国立宪会议，各地政府成为各州的政府。

1921年1月9~11日，远东共和国举行了立宪会议选举。选前，布尔什维克攻击社会革命党和其他组织与高尔察克、资产阶级和外国侵略者合作，陷工农政权于血泊之中。社会革命党则攻击共产党专制和压迫，取消政治法庭、合作社的自由、工会的独立和选举的地方自治机关。虽然双方互有责难，但选举正常进行。在选举中，共产党取得了胜利，获得了92席，连同支持者占据了72%的席位；右派社会主义者共获得了18席，西伯利亚社会革命党只获得了6席，连同支持者占据了21%的席位。^① 社会革命党成为共产党在后贝加尔、滨阿穆尔河、哈巴罗夫斯克和维尔赫涅乌金斯克最有力的竞争者。

社会革命党利用与布尔什维克的合作之机，准备实现自己的纲领原则。由于社会革命党在远东共和国的政府中并没有占据优势，它把主要的精力用于宪法的制定，意图把决定权掌握在议会手中。1921年3月10日，社会革命党人A.利西延科批评苏俄的政治制度和国家政治保安局的活动，认为他们恣意妄为。布尔什维克则指责社会革命党与外国入侵者有染并在白军中供职。利西延科的指控因缺乏证据不了了之。1921年4月5日，右翼社会主义者又在人民会议上对政府解散阿穆尔州塔尔博嘉泰区农民代表大会一事提出质疑。社会革命党与孟什维克和少数农民一起要求政府按照命令追究停止农民代表大会的地方政府的责任。但是，多数投票以农民代表大会阴谋推翻远东共和国政治制度为由予以否决。^②

根据新经济政策的意图，苏维埃政府建议把堪察加划归俄罗斯联邦并建立B.万德里普领导的美国租赁公司，右派社会主义者对此迟迟不予讨论。社会革命党认为这是布尔什维克把俄国的整个州出卖给日本，进而抨击政府的外交政策。1920年4月6日，远东共和国立宪会议（即人民会议）就日本军队退出远东给日本政府发出早在3月24日就准备好的最后通牒，4

① В. Л. Кузьмин, Ю. Н. Ципкин, Эсеры и меньшевики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России в период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войны 1917 - 1922 гг., с. 160.

② В. Л. Кузьмин, Ю. Н. Ципкин, Эсеры и меньшевики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России в период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войны 1917 - 1922 гг., с. 167.

月 27 日又通过了致美国政府的类似通牒。

社会革命党对远东共和国政府行为的连续指控本无可厚非，但他们的目的不是解决农民自治和外国人的撤军问题，而是把权力掌控在人民会议手中。1921 年 3 月 16 日例会上，右翼社会主义者就惯例问题的固定说法进行讨论，社会革命党代表 B. 库兹涅佐夫建议把全部政权转交立宪会议，肢解政府的全权。1921 年 4 月 26 日，社会革命党党团申请讨论政府的构成问题，坚决反对由共产党及其同情者组成的清一色政府。4 月 27 日，第一届立宪会议通过远东共和国基本法。为了制定宪法，布尔什维克吸收右派社会主义者组成 117 人的专门委员会。会议参考了多国的宪法，把远东共和国当做“新经济政策”的试验田。

宪法认为，远东共和国为民主国家，是个人与国家之间的社会契约。国家建立混合经济、公民社会，遵守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实行多党制、权力分割和法律至上。法律废除等级划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证公民言论、集会、出版、良心和发表个人意见、结社的自由。每个公民都应该服从法律，可以做法律不禁止的事情。宪法宣布个人、住宿和通信不可侵犯。有权变更居住地和迁徙自由。废除死刑。法院是独立和公开的。基本法不宣布任何一个政党的领导地位，不调整国家与社会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准则。共和国保存私有制度，不把大工业国有化，只是个别企业经过赎买收归国家所有。与俄联邦宪法不同，国家不在经济中占据指令高位，不实行外贸垄断，不把银行国有化。私有经济在缓冲国的经济中占据稳固的地位。地下矿藏属于国家所有，但是可以采用社会组织 and 劳动组织以及私人租赁和租借的办法加以开采。^①

通过宪法的规定，社会革命党基本上实现了不同于苏维埃政府的政治经济措施。远东共和国实行总统的集体领导，参加者有 5 名共产党和 2 名无党派人士。领导人为 A. 克拉斯诺晓科夫。部长会议为执行机关，立宪会议以人民会议的名义运行。部长会议由政府任命，但对立宪会议负责。社会革命党参加了部长会议，但只获得了次等职位，如社会革命党人 E. 特鲁伯和 B. 塔拉索夫担任了司法部长和农业部长（随后农业部长换成共产党担任），人民社会党人 K. 施赖贝尔担任教育部长，孟什维克 K. Я. 卢克斯担任民族事务部长，等等。关键的劳动部长、农业部长、贸易部长、邮电部长、

^① В. Л. Кузьмин, Ю. Н. Ципкин, Эсеры и меньшевики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России в период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войны 1917 – 1922 гг., с. 168 – 169.

军政部长、内务部长和国家政治保安局、外交部、国家监察局和最高法院等要害部门都掌握在共产党的手中。^①

随后，社会革命党决定抵制低级的政府职务。特鲁伯最初由于不履行党的决定而被开除出党。于是，党内关于与共产党合作问题产生了分歧。社会革命党于是把主要精力用于消减政府机构、加强地方力量。

首先，社会革命党等右派社会主义者以部门经济入不敷出为名压缩政府机构，如减少军队的开支，取消亏损的机构并把它们私有化，压缩部门开支，等等。在右翼社会主义者的压力下，远东军政部长和人民革命军总指挥 B. K. 布柳赫尔元帅重组共和国的武装力量，急剧压缩膨胀的和纪律的军队。1921年5月26日，聚集在滨海州的白军们在日本的支持下发动了政变并准备建立白色制度。布柳赫尔在1921年9月~1922年4月与日本军人在戴琳（Дайрен）举行谈判。日本以远东共和国政府代表拒绝签署对于苏俄完全是卖国的条约终止谈判。^② 1921年11月30日，白军开始进攻哈巴罗夫斯克。社会革命党完全站在布尔什维克一边反对反动派。社会革命党远东局还在人民会议上揭露日本在俄国远东地区的掠夺意图，同时放弃了对远东共和国政府的攻击。他们还试图通过这件事进入远东共和国的军政部、国家政治保安局和外交部等要害部门。由于社会革命党等右翼社会主义者对远东共和国代表团与日本谈判的不信任态度，导致布尔什维克与右翼社会主义者之间合作的终结。布尔什维克全力接管了远东共和国的政权。

其次，经过这件事之后，社会革命党全力转战地方社会组织。1921年7~12月，社会革命党在后贝加尔和滨阿穆尔河地区组织了一系列罢工。1921年12月初，后贝加尔召开了合作社边区代表大会。远东合作社代表大会由于布尔什维克与右翼社会主义者的分歧按照党派分别召开了自己的会议。社会革命党等社会主义者召开的会议支持合作社独立，以确立自己在合作社中的影响，揭露布尔什维克操纵选举。于是，合作社分裂了，苏维埃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远东分社得到了苏俄的支持，合作社联合会远东分会则得到了俄国国外合作社的支持。合作社联合会远东分会拒绝服从苏维埃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的领导，声明把所有的资金调拨给莫斯科救济穷人。

^① В. Л. Кузьмин, Ю. Н. Ципкин, Эсеры и меньшевики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России в период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войны 1917 - 1922 гг., с. 170.

^② Н. Копылов, В. К. Блюхер. http://militera.lib.ru/science/bluher_vk/pre.html.

当白军进攻正酣的时候，滨海州合作社联合会中断供给人民革命军 30 万普特的粮食。^①与此同时，社会革命党还从事反对粮食税的工作。

1922 年初，社会革命党远东局因滨海州组织成员 И. С. 阿尔科、И. И. 卡柳日内、Ф. С. 曼斯韦托夫参加了符拉迪沃斯托克的白军人民会议以及擅自去布拉格咨询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而被开除出党。为了抗议，在后贝加尔工作的社会革命党远东组织著名的党务工作者 Т. С. 达利斯基和普里曼退出社会革命党。社会革命党西伯利亚联合会远东边区委员会通过了反对滨海社会革命党背叛和两面派行为的激进决议，要求把滨海州社会革命党组织开除出赤塔社会主义政党跨党会议。虽然 1922 年 5 月，被开除的社会革命党恢复了党籍，但是，社会革命党由于执行模棱两可的政策陷入了分裂。社会革命党在远东共和国立宪会议的党团领导人特鲁伯呼吁社会革命党放弃第十次党务会议决议，停止与布尔什维克的武装斗争。^②社会革命党在远东共和国执行的第三条路线的政策宣告失败。

随后，社会革命党在远东扮演了布尔什维克反对者的角色，支持社会革命党的不仅有神甫、商人和过去的军官，而且有地方政权机关的领导人。1922 年夏，社会革命党在维尔赫涅乌金斯克县的代表 И. А. 巴甫洛夫和 Г. Е. 韦利昌斯基因非法选举乡人民革命委员会和诽谤其主席而被捕。社会革命党的合法权益不再受到保护。布尔什维克攻击社会革命党邀请侵略者，参加反革命政府；社会革命党则把所有的责任归咎于共产党专政。

布尔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相互指控都有一定的事实支撑。鉴于俄国的形势，维护国家统一的任务远远超过争取自由主权的任务，社会革命党为人民争取主权的斗争在维护国家统一面前就成为反革命的投敌行为。以此为理由，共产党取缔了非共产党合法政党、社会组织和机关报的活动。1922 年 4 月，恢复死刑。1922 年 10 月 25 日，远东共和国的人民革命军进入符拉迪沃斯托克。随后，在远东的各个城市逮捕社会革命党。1922 年 10 月 30 日，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远东局通过了取缔社会革命党的决议。11 月 14 日，人民会议自行解散，远东共和国成为俄罗斯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

① В. Л. Кузьмин, Ю. Н. Ципкин, Эсеры и меньшевики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россии в период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войны 1917 – 1922гг., с. 173.

② В. Л. Кузьмин, Ю. Н. Ципкин, Эсеры и меньшевики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россии в период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войны 1917 – 1922гг., с. 174.

国的一部分。^① 社会革命党作为反革命政党开始接受苏维埃政府的审判。

第四节 对农民士兵暴动的应对

一 应对坦波夫省农民起义

社会革命党对第三条道路的探索还特别表现在对待农民暴动的问题上。

1918年以后,随着布尔什维克反对国内外反动派斗争的不断深入,特别是余粮征集、征兵工作的不断加强,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中积攒的人气逐渐丧失。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开小差和拒绝交纳粮食的人增多,引发农民暴动。从1919年春天开始,开小差变得初具规模。其中的表现形式有拒绝应招,占75%;从报名点退出,占18%~20%;从前线撤退,占5%~7%。在多数县,收购余粮的对象主要不是村社,而是农户。贫农委员会和征粮队给他们施加的压力缺乏效率,导致进一步的强制。比如图拉省粮食委员会通过贫农委员会和征粮队三个月内在8个省只收到了2633850普特的粮食。在整个收购年,各省只获得了38.3%的余粮。^②

布尔什维克对农民强制的升级,特别是向农民征收非常税、罚款和敲诈勒索使农民走上了暴动的道路。如1918年11~12月,欧俄138个县发生了被动员的农民参加的起义。最严重的起义发生在坦波夫省萨波什科夫县,11月6日,起义军杀死了40名共产党员、苏维埃和贫农委员会的成员。农民的共同理由是,对征收和非常税不满、厌恶个别苏维埃代表的工作、不理解政教分离的法令、不希望当兵。^③

对于农民起义,布尔什维克采取了强制镇压的态度。比如,根据契卡的材料,1918年因参加起义被枪杀的有2431人;因号召起义被枪杀的有396人,被送进集中营的有1791人,被送进监狱的有21988人,被当做人质的有3061人。^④

① В. Л. Кузьмин, Ю. Н. Ципкин, Эсеры и меньшевики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России в период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войны 1917 - 1922 гг., с. 179.

② Т. В. Осипова, Российское крестьянство в революции и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войне, с. 302, 208.

③ Т. В. Осипова, Российское крестьянство в революции и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войне, с. 261, 264, 267.

④ Т. В. Осипова, Российское крестьянство в революции и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войне, с. 275.

1919年，布尔什维克逐渐把农民起义与邓尼金、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等反对派政党联系起来，并把他们称为反革命。农民暴动也就具有国内战争的意味。农民则躲进森林，成了“绿林”好汉。对于农民来说，“他们被迫起义，不反对苏维埃政权，而是反对劫掠和使他们破产，不能为劳动农民着想，过去和现在都有劣迹的共产主义的匪帮。”^①就这样，一些不满布尔什维克统治方法的农民参加了顿河哥萨克的起义，也有一些加入了邓尼金的行列。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1920年坦波夫省的农民暴动。

列宁对农民的改造是俄国革命的一部分。土地社会化和土地国有化的改造使得俄国农民中农化。例如，经过1918年夏天开始的“第二次重分土地”之后，革命前富农占有的8000万俄亩的土地，几乎有5000万俄亩转到贫农和中农手中。而据俄罗斯联邦51个州的调查材料，占有13~25俄亩土地的农户只有1.7%，占有25俄亩以上土地的农户仅有0.3%。^②以特维尔省为例，无地者获得了88088俄亩土地，平均每人4.5俄亩。不足5俄亩的农民土地增加了2倍；有5~8俄亩的农民土地增加了73%。^③

土地社会化只是对农民改造的第一步，而把农民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才是土地革命的关键。所以，列宁在论述土地社会化和农民改造的关系时说：“有些人认为，把地主的土地转交给农民，似乎就是社会主义的措施。这是错误的。这种做法连一点社会主义的气味也没有。但是，为了真正消灭奴役和农奴制的压迫，这种转交土地、而且免交赎金的办法，却完全是符合农民利益的唯一合理的措施，既符合整个国家发展的需要，又符合进步和文明的要求。”^④

为了实现对农民的改造，必须限制农民的依附性。借助战争的机会，列宁从余粮征集制开始。1920年，列宁在谈论对外战争结束之后的国内形势时说：“只要搞到粮食，我们就有了基础，有了根本。1917~1918年征集到3000万（普特）。第二年为11000万。我们现在有了保障，（因为）我们有3亿多普特粮食，也许可到36000万普特……有了这个基础，我们就不必胆战心惊地望着那些花花绿绿的票子了……这些纸币表明这个基础只是玩

① T. B. Осипова, Российское крестьянство в революции и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войне, с. 306 - 307.

② 沈志华：《新经济政策与苏联农业社会化道路》，第26、336页。

③ T. B. Осипова, Российское крестьянство в революции и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войне, с. 227.

④ 《苏共历史问题》，1980年第4期，第4页。参见沈志华《新经济政策与苏联农业社会化道路》，第25页。

具，（它）已受到破坏。这不过是资产阶级破旧外衣上的碎布条。只要国家按照余粮征集制并作为工业需求的一定条件从农民手中一年征集到 25000 万普特粮食，我们就有了建设的基础，那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完全放开手脚去解决妥善分配的问题。”^①

列宁在《论粮食税》一文中承认从农民手中拿来了全部余粮，甚至有时不仅是余粮，而是农民手中的一部分必需的粮食，但是他没有否定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对农民的改造功绩。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文献》中，列宁承认改造小农，改造他们的整个心理和习惯需要花几代人的时间，但他没有放弃对农民的改造。^② 列宁从余粮征集制转向新经济政策只是对农民习惯适应性的改变。

明白了这一点，就不能因布尔什维克改造农民政策的激进性而否定改造农民的价值。改造农民出现的问题不是战略问题，而是战术方法的问题。农民反对布尔什维克甚至发生农民战争不构成破坏布尔什维克社会基础的问题。当列宁意识到农民已经成为战争之后的主体，就必须考虑农民的习惯，给农民发展的空间。同时，在列宁以后退的方式逐渐接受私有制时，对农民的改造也逐渐落到了实处。

社会革命党则将农民反对余粮征集制问题上升到了列宁脱离人民，搞一党专政，向资产阶级投降的高度。1920 年 9 月，右派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和西伯利亚、库班、伏尔加河流域以及其他地方的社会革命党组织代表在莫斯科召开了秘密会议。会上提出改变与共产党专政斗争的策略问题，好像不再走 1918 年的道路，不通过与共产党斗争的方法清除反动派的道路产生了问题。代表会议毫不妥协地号召，只要是推翻共产党，不惜与任何人结盟。^③ 社会革命党的选择与其说是看清了布尔什维克的真谛，不如说是在农民反抗布尔什维克的改造，特别是农民逐渐恢复了村社土地所有制的情况下，放弃了对农民改造的目标，成为地地道道的民粹派。

社会革命党提出的口号仍然是：土地社会化；农民完成国家税后有权拥有所有的劳动产品；农民合作和劳动联合体（尤其是农业合作社）保持自由与独立；同布尔什维克以扼杀其他农民自由经济和文化联合体的方式强加某种生产联合体的意志作斗争（如人为培植村社）；同官僚播种委员会

^① 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4 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第 332 ~ 333 页。

^② 《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501 ~ 502、447 页。

^③ T. B. Осипова, Российское крестьянство в революции и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войне, с. 329.

作斗争；消灭真正的国家粮食工厂并把它们变成适应农业技术任务的、减少了耕地面积的经验示范点；克服俄国共产党专政并把全俄立宪会议作为建设新俄国的起点；同农民中出现的反革命情绪作斗争（厌恶城市和城市无产阶级、反犹主义、对知识分子的屠杀情绪、通过各种地主复辟的办法对某人开展流血复仇行动）。^① 社会革命党把农民当做自己发展的基础，而由于农民还不能成为独立发表意见的劳动者，立宪会议不能成为建设新俄国的起点，反对农民出现的反革命情绪只能加剧农民对社会革命党的反感。

坦波夫省是社会革命党领导人切尔诺夫产生土地社会化纲领的故乡。这里按居民成分来说是俄罗斯各省中农民最多的一个省份：农村居民有 325 万，城市居民只有 25 万（将近 8%）。手工业相当发达。坦波夫是一个产粮省，全省每年运出的农产品约 6000 万普特，其中有 2600 万普特运往国外。土地社会化的实施使得这个地方收益最大，无产和半无产农户差不多已经消失，富农户也明显减少了。由于农业发达和靠近前线的缘故，这里余粮征集得比较厉害，农民的情绪也很不稳定。据省粮食委员会的专家委员会的资料，人均占有粮食（扣除播种需要的种子，但没有扣除饲料粮）4.2 普特，下达的余粮收集任务 1100 万普特如果完成，农民人均就只能剩留 1 普特粮食和 1.6 普特土豆。到 1920 年 1 月，全省已经有半数农民饿肚子，乌斯曼县、利佩茨克部分地区和科兹洛夫县出现吃树皮和饿死人的情况。^②

余粮征集制引起了农民的暴动。根据社会革命党在农村开展大量工作的指示，1920 年 5 月 13 日成立了“劳动农民联盟”，主要任务就是组织起义和消灭苏维埃。^③ 社会革命党坦波夫省委指示社会革命党人 A. C. 安东诺夫停止游击斗争，全力投入“组织工作”。中央的第三条道路的路线没有得到坦波夫省代表团的支持，表现出一种与布尔什维克势不两立的好斗态度。当社会革命党的坦波夫省委组织被契卡摧毁之后，该地社会革命党人的活动基本上在组织上不受该党中央委员会的控制。

领导坦波夫起义的是自称独立社会革命党的亚历山大·斯捷潘诺维奇·安东诺夫。安东诺夫在克伦斯基当政的时候曾因抢劫酒馆和杀死警察而被流放西伯利亚，也因镇压基尔萨诺夫的布尔什维克起义而担任基尔萨

①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17. 10 – 1925, Т. 3, Ч. 2, с. 705.*

② 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5 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 50 ~ 51、55 页。

③ *Т. В. Осипова, Российское крестьянство в революции и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войне, с. 328.*

诺夫县的警察局长。他通过这个职务从捷克斯洛伐克军车上夺取了一批武器，运到拉姆祖、切尔那府库和伊尔门湖等地储藏起来。^①

安东诺夫主张搞地方自治，而且通过武力建立地方政权。安东诺夫的主张不仅与布尔什维克政策相矛盾，代表布尔什维克宣称的“富农的利益”，而且与社会革命党的第三条道路，即通过和平方式争取合法空间，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有分歧。在余粮征集正酣的时候，早在1919年11月就开始摧毁国营农场和乡苏维埃执委会的斗争。1920年2月18~23日摧毁了从坦波夫和莫尔尚斯克县搭界的村苏维埃，3月烧毁房屋并杀死苏维埃代表。5月就建立起农民政权机关，并提出了相关各种要求。^② 要求共有18条，首先是政治要求，即言论、出版、良心、结社和集会的自由，按照平等、普遍、直接和秘密的原则召开立宪会议，选举时不预设政治制度，保留选民召回不能履行人民意志的代表的权利。其次，在经济方面要求完全实现前立宪会议通过和批准的土地社会化，调节国家控制的工业品价格，局部的工厂非国有化，理解恢复与国外的政治和贸易关系。农民特别要求所有公民一律平等，不划分阶级，停止战争，建立和平生活，实现民族自决、手工业生产和普遍教育。^③

安东诺夫领导的劳动农民联盟政权提出的对抗布尔什维克的纲领虽然满足了农民的要求，但是，这种要求并不能带来与布尔什维克采取积极措施促进经济发展、保证粮食供应、胜利结束战争相比拟的效果，相反起到了分裂苏维埃国家的作用。从革命的角度来说，安东诺夫领导的劳动农民联盟的目标和社会革命党基本一致，回归了传统的民粹派，因不确定政治方向放弃了对政治发展前途的探索，也就是放弃了革命。所以，坦波夫起义不仅反对十月革命，而且反对二月革命，反对整个左派民主，反对整个1917年从二月开始就表现出深刻的保守性。农民反抗的不是共产主义制度的个别的临时的措施，而是反对所有的社会主义改造。^④ 安东诺夫放弃了对

① Обзор особого отдела губчека о зарождении и развитии повстанческого движения во главе с Антоновым, №168. В. Данилов и Т. Шанин, Крестьянское восстание в тамбовской губернии в 1919 - 1921 гг. Антоновщина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амбов, редакционно - 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отдел, 1994. <http://www.tstu.ru/win/kuktur/other/antonov/voj168.htm>

② Т. В. Осипова, Российское крестьянство в революции и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войне, с. 330.

③ Программа Союза трудового крестьянства, №. 67. <http://www.tstu.ru/win/kuktur/other/antonov/voj168.htm>

④ Т. В. Осипова, Российское крестьянство в революции и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войне, с. 336.

农民的改造就等于失去了政治方向。发动社会主义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必然首先对其从政治上给起义定性，将它确定为社会革命党、资产阶级和君主政权联合发动的反革命叛乱。

社会革命党是谁？社会革命党是地主的仆从，是1917年以克伦斯基为首的临时政府执政八个月，许诺给农民“土地和自由”，但最终却为地主服务，把“擅自夺取主人土地的农民委员会”送进监狱里的人。红军是谁？红军是劳动人民忠实的儿子，是苏俄工农共和国的第一公民，是战胜П. Н. 克拉斯诺夫、邓尼金、高尔察克、Н. Н. 尤登尼奇、弗兰格尔等敌人的人，是使国际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领袖英国、法国、美国与俄国签署和平条约，使意大利、德国、瑞典等其他国家往苏俄派出贸易使节并与苏俄开展商品交换的人，是以自己的胜利鼓舞全世界劳动人民与资产阶级斗争的人，是被解放的俄国工人农民和全世界被压迫的穷人充满热情感激所仰望的人。^① 布尔什维克对自己和社会革命党的定位使自己找到了镇压社会革命党的法理依据，即便安东诺夫再想利用余粮征集制给布尔什维克带来的压力号令推翻苏维埃政权，也不能改变1917年8个月的执政留下的负面影响。

接下来，布尔什维克从快解决了暴动和产生暴动的根源。列宁亲自给共和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Э. М. 斯克良斯基写便条，要求秘密地任命М. Н. 图哈切夫斯基为坦波夫军区部队司令，责令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其他部门不得干预图哈切夫斯基的事务。^② 图哈切夫斯基命令红军“消灭最后的敌人——社会革命党这伙蝗虫，让这伙蝗虫在新的丰收前在红军的一次打击下灭亡。”他甚至“建议坦波夫指挥部动用毒气攻击”。^③ 对于安东诺夫叛乱的解决，中央从三个方面展开。首先，通过政治活动使农民基本群众对盗匪活动保持中立，把盗匪活动限制在某些富农阶层中；在军事方面，紧密配合上述任务，迫使匪徒们放弃他们的主要基地，在“野战”中将其击溃，并牢固地、长期地占领这些基地，进行长期的清洗工作和重建苏维埃政权的工作；在谍报方面，肃反委员会和特别部的任务是收集“游击

① Наказ красноармейцу, действующему против эсеров-бандитов, № 133. <http://www.tstu.ru/win/kukturn/other/antonov/voj168.htm>

② Записки В. И. Ленина и Э. М. Склянского о поручении, №164; М. Н. Тухачевскому подавить Тамбовское восстание, №. 165; Выписка из протокола N 18 заседания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РКП (6). <http://www.tstu.ru/win/kukturn/other/antonov/voj168.htm>

③ 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4卷，第363、364页。

队”、内卫队和劳动农民同盟各级委员会成员的名单，消灭反革命的领导组织。^①对于农民，布尔什维克则采取安慰政策。列宁在1921年2月14日接见来自坦波夫的农民时说：“亲爱的坦波夫农民同志们，向我说说你们有什么不满啊，安东诺夫匪帮是谁啊，他们都做了些什么？”农民博恰罗夫说：“有人向我们征收了力所不及的余粮。”列宁问：“1918年和1919年你们缴纳征收的余粮时有没有丢丑啊？”博恰罗夫回答说：“没有丢丑，只是今年歉收严重，余粮的征收无法完成。”列宁问：“地方政权的态度怎样？”农民回答说：“粮食机关的人员不管不顾，只管要求、索取，不注意权力的行使。令我们非常气愤的是，他们收了土豆，我们也运出来了，结果土豆烂了，还强迫我们清理场地。我们农民非常遗憾，红军和工人没有利用我们的劳动。”农民走的时候，列宁安慰农民们有事来找他。^②随后，列宁安排停止了坦波夫的余粮征集制，缩减了他们的税收，供应农民的生活必需品。

列宁对社会革命党与农民执行的不同政策迅速巩固了仍然不稳定的苏维埃政权，更为主要的是通过加强对党员机关的整肃，通过深入了解农民的状况，逐渐明确了采取适合农民认识水平的发展方式，使得他们逐渐走上工农联盟式的改造农民的道路。

布尔什维克对安东诺夫的镇压是残酷的。据政治工作委员会6月1日至7月2日的统计：抓获匪徒1748人、逃兵2452人；投案自首的匪徒1449人、逃兵6672人；以上各项合计为12301人。扣留单个人质3430人、913家。没收财产的农户为157户，烧毁或拆除的房屋有85幢。对匪徒活动猖獗的坦波夫县的几个乡的处置极为严酷。这里共处决了154名匪徒人质，逮捕了227个匪徒家属，烧毁房屋17幢，拆除24幢，并将22幢房屋交给贫农使用。^③全省设立7个集中营，关押了13500人。劳动农民联盟被摧毁，安东诺夫的总委员会被捣毁。安东诺夫本人被跟踪，1922年6月被杀死在H. 希伯来庄园。^④

通过坦波夫起义，列宁痛苦地认识到继续实行军事共产主义，很可能

① 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5卷，第63页。

② Листовка Полномочной комиссии ВЦИК “Что сказал тов. Ленин крестьянам Тамбовской губернии”, №. 131. <http://www.tstu.ru/win/kuktur/other/antonov/voj168.htm>

③ 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5卷，第80、81页。

④ Т. В. Осипова, Российское крестьянство в революции и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войне, с. 339.

就意味着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崩溃，由此开始了对农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思考。而社会革命党在坦波夫的失败等于社会革命党合法存在的丧失。因为在布尔什维克急需把农民引向社会主义的条件下应对西方的列强，任何民主都会葬送布尔什维克的思想统一，而这对于还没有觉醒的农民俄国来说是必须付出的代价。

二 应对喀朗施塔德水兵的暴动

如果说社会革命党应对坦波夫农民起义是对第十次党务会议依靠农民恢复立宪会议的直接斗争，那么它对于直接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水兵起义——喀朗施塔德暴动则采取了间接支持的态度。

喀朗施塔德水兵起义是农民反对布尔什维克改造政策的继续。因为水兵是布尔什维克推翻临时政府依靠的对象而为学者们所关注。一些学者认为喀朗施塔德事件是苏维埃政权从理想型的无产阶级专政向现实的政治国家转变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是出于巩固政权需要而采取的镇压措施。笔者认为，布尔什维克对喀朗施塔德士兵所采取的镇压措施背离了社会公众的选择取向，发生了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国家权力机制的蜕变，为斯大林日后的个人专制埋下了伏笔。^①

喀朗施塔德起义起源于彼得格勒工人的罢工，即工人们抱怨恶劣的粮食供应状况。工人们除了提出提高粮食定量以及转厂自由等经济要求外，还提出了权利和自由，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改选苏维埃等政治要求。配合彼得格勒工人的罢工，喀朗施塔德的水兵决定派代表团去城里了解真相。代表回来后，“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全体水兵召开会议，决定声援罢工。士兵们提出了一系列要求。首先，提出了推翻布尔什维克领导地位的政治要求。如决议说，鉴于现苏维埃不能代表工人和农民的意志，应立刻通过不记名投票重新选举苏维埃；撤销各类政治部门，因为任何一个党都不能利用特权来宣传自己的思想并为此获得国家拨款，代之以各地选举的文化——教育委员会，国家应向这些委员会拨款；在所有部队中撤销共产党员战斗队，在各工厂亦撤掉共产党员组织的各种执勤。其次，争取一系列政治经济权利，如实行工会和农民联盟集会自由，对工人、农民、无政府主义者、左翼社会党派实行言论和出版自由，召开彼得

^① 沈志华主编《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上册，第127页。

格勒市、喀朗施塔德市和彼得格勒省工人、红军战士和水兵的无党派会议，对全体劳动者均等供应口粮，给农民按照其愿望耕作自己土地的全权，使他们也可以靠自力（即不用雇工）喂养和使唤牲畜；允许依靠自己劳动从事自由的手工生产。^①

水兵提出的要求让布尔什维克骑虎难下，为共产党的社会改造政策敲响了警钟。如果任其发展，不仅共产党会失去政权，而且会毁灭社会主义的事业。但从士兵们提出的要求来看，分明没有共产党所秉承的社会主义目标，这就为共产党如何应对农民的传统价值观与共产主义价值观的对接提出了挑战：是保持对工农改造的无产阶级的灵魂，还是听从人民的召唤可以罢免布尔什维克？即是坚持共产党专政还是坚持无产阶级的民主？^②本来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灵魂，而此时的无产阶级却提出不要这个灵魂，提出了放弃政治方向，追求物质利益的愿望。难道社会主义的理想与工人的现实是对立的？还是工人阶级的改造还没有彻底经过资本主义的炼狱而不能实现这种改造，以致出现向资本主义的大退却？从托洛茨基、Г. И. 季诺维也夫和列宁所发电报的内容来看，他们显然做出了喀朗施塔德暴动是国内外反动派不甘失败而发动的反攻倒算的阴谋的结论。如1921年2月28日全俄肃反委员会关于加强同反革命斗争的命令中说：“社会革命党分子和孟什维克分子利用工人因生活条件恶化而自然产生的不满，力图号召旨在反对苏维埃政权和俄共的罢工运动，并使这一运动具有组织性和全国性。”^③如托洛茨基给波罗的海舰队政治部主任Э. И. 巴季斯的电报中说：“近一段时间以来，国外报刊连篇累牍地报道有关喀朗施塔德和波罗的海舰队串通一气、密谋暴动的消息。过去的全部经验表明，事件发生之前都会发生大量谣言，因为密谋的中心在国外，流亡的白卫分子总会在国外报刊上发布种种图谋的消息。”^④

布尔什维克的“反革命阴谋论”建立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对立理论的基础上，而苏俄普遍出现的工农反对布尔什维克的现象是资产阶级不够发达的标志。这就为布尔什维克坚定镇压反对社会主义改造的喀朗施塔德

① 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3～24页；沈志华主编《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上册，第133～134页。

② 伊·多伊彻：《先知三部曲·被解除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1921-1929）》，第16～17页。

③ 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19页。

④ В. И. 纳乌莫夫等编《1921年的喀朗施塔得》，任建华等译，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6～37页。

暴动提供了理论依据，并不失时机地把暴动的责任推给国内外反动派。至于农民、工人水兵发生暴动则属于行为不明智。列宁在随后召开的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把这种现象称为工团主义、半无政府主义，属于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而这种小资产阶级的自发性无疑要比邓尼金、尤登尼奇和高尔察克合起来还要危险。列宁主张，在“清除党内的非无产阶级分子和不可靠分子，反对官僚主义，发扬民主和工人的主动性等问题上，任何切实的建议，都应当十分认真地加以考虑，并在实际工作中加以考验”。^①对于农民提出的对布尔什维克不信任的问题，列宁则从俄国面临的恶劣环境考虑，恢复无产阶级专政与小资产阶级的和平妥协，即通过与英法资本主义国家恢复贸易和租让实现周转自由和为农民提供商品和产品，从而刺激、鼓励和推动农民发展生产。列宁的“政紧经松”的政策成为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型道路的新探索。

社会革命党则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做法。它认为：“目前我们国家所经受的粮食危机和经济总危机不是临时的和暂时的。危机是整个布尔什维克式经营的必然结果……布尔什维克在破坏资本主义工业之后，根本没有能力根据新的原则重建工业，重点部门原料、燃料以及粮食的消耗靠关闭非重点部门和牺牲在这些部门就业的极端贫困的工人的利益来保证……显而易见，整个布尔什维克工业仅仅是为巩固布尔什维克政权服务，即为警察保安机构和国内战争的需要服务。”社会革命党这种站在农民立场的本位主义使它得出了结束布尔什维克制度的结论。它说：“布尔什维克政权就像沙皇政府一样把‘煽动分子’和社会党人看成是万恶之源……他们已经以暴政和恐怖实现了反革命，以掠夺农村和在工厂实行拘禁式的强制劳动对劳动者进行连地主和资本家都没有实行过的剥削……布尔什维克制度下的流血混乱只要没有布尔什维克就能消除，只要没有布尔什维克就会减少贫困和饥饿。”^②

社会革命党把布尔什维克看做国内冲突的根源，却把解决布尔什维克的条件设为停止国内和国外战争。而停止国内国外战争“只有停止一切暴政和对劳动者的各种专政，只有人民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只有恢复各种自由并通过立宪会议确定人民政权制度，才能实现这一条件。”^③社会革命

① 《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4，第18~19、82页。

② B. П. 纳乌莫夫等编《1921年的喀朗施塔得》，第339~340、341页。

③ B. П. 纳乌莫夫等编《1921年的喀朗施塔得》，第341~342页。

党显然又重新回到了1917年的结论，而实践证明，这样的结论不能摆脱国内国外战争。

显然，从社会革命党提出的挽救国家的第二个条件——给人民以经济自主^①来看，社会革命党抓住了俄国问题的症结，但是在世界大战条件下，在俄国经济不能应对战争的情况下，解决个人主动性无异于把国家置于死地，布尔什维克就处于这种两难之中，国内的骚乱也正是从这种两难的改造中产生出来的。社会革命党此时站在处于困境中的农民立场上，煽动不明真相的人民情绪只能加剧整个局势的动荡。

喀朗施塔德士兵的整个行动完全印证了以上的看法。首先，暴动是一种激愤的发泄。暴动是有关彼得格勒工厂关闭和艰难的物质生活状况引发了工潮的消息被打听消息的喀朗施塔德水兵说走了样引发的。2月28日召开了全体舰员大会，“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上群情激愤，充满了对立情绪，不让委员会的报告人讲话。在各部队的10个会议中，3个通过了党务会决议，7个没有通过。委员会会议决定所有武装的共产党员由舰队政委H. H. 库兹明同志指挥。3月1日下午2时举行了集会，通过了社会革命党破坏性的决议。根据库兹明回忆，会上贯穿始终的主要思想就是改选苏维埃。3月2日，工程学校举行了代表大会，会上研究改选苏维埃的问题。当会场里的人们从窗户看到众多特别处支队人员一点点逼近时，都吓坏了，于是宣布成立临时革命委员会并选举出革命委员会成员。^②城市和要塞的全部权力转交给临时革命委员会，逮捕了波罗的海舰队政委库兹明和喀朗施塔德委员会主席И. Д. 瓦西里耶夫等人。3月4日，委员会发出了或者走向光明或者奴役、二者必居其一的宣告。他们相信，工农政府是不愿走向流血的，是会被迫让步的。^③

其次，临时革命委员会成员共有15人，他们虽然分属不同的党派，但没有统一的纲领。临时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分别是：3月2日选举的С. М. 佩特里琴科、雅科文科、奥索索夫、图金和奥列申；3月4日补选的И. Т. 阿尔希波夫、巴依科夫、B. A. 瓦利克、С. С. 韦尔希宁、Э. 基利加斯特、库波洛夫、帕夫洛夫、Ф. 彼得鲁舍夫、И. М. 佩列佩尔金和罗曼年科。佩特里琴科被选为委员会主席。革命委员会成员大部分没有党籍归属，可以确

① B. П. 纳乌莫夫等编《1921年的喀朗施塔德》，第342页。

② B. П. 纳乌莫夫等编《1921年的喀朗施塔德》，第411、412、415页。

③ 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119页。

定的有瓦利克——俄国社会民主党党员、罗曼年科——俄国社会民主党党员、奥列申——人民社会主义党党员、佩特里琴科——右派社会革命党党员。《喀朗施塔德革命委员会消息报》的技术指导是积极的社会革命党成员、极端主义者 A. H. 罗曼诺夫，这份报纸的最重要工作人员普季林，是人民社会主义党党员，等等。他们提出的口号是政权归苏维埃，不归党。依据的理由是：无论怎样的政党，一旦掌握了政权，它就不可避免地成为独裁者，因为政党有的只是计划性的、策略性的条条框框，但条条框框不是生活所要求的，而是在办公室里创造出来的。领导权力应该交给人民。因为劳动人民常处于生活的熔炉中，通过生活观察和学习而得来的真理可以断定哪种体制可以给他们完整的自由。当政权里不仅有一个党，而是几个党的时候，事情将变得更糟，各党派都为在掌权中占据优势而处心积虑，根本没有时间考虑和关心劳动人民。^① 既然一个党会独裁，许多党会勾心斗角，那么劳动人民掌握政权为什么就不会出现二者之一的情况呢？显然，喀朗施塔德临时委员会没有给出一个有力的答案。

第三，起义者在布尔什维克采取强力镇压和经济安抚的情况下变得无能为力。接到喀朗施塔德的挑衅之后，布尔什维克迅速做出反应。先是把起义者的家属扣为人质以此解救被喀朗施塔德起义者扣留的人质。3月8日，派以图哈切夫斯基为司令的军人对喀朗施塔德要塞发动进攻，经过一个多星期的战斗，到3月17日21时，政府军迫使起义军退出喀朗施塔德城。3月18日11时，完成了全部的军事任务。虽然喀朗施塔德士兵中开始时出现退党，中间曾经打退过政府军，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就如佩特里琴科所预料的只有三条路，一条是完全投降，一条是把喀朗施塔德居民迁移到芬兰沿岸，一条是向全世界发出呼吁，请求援助。^② 当他们选择了第三条道路之后，获得的帮助也不能摆脱他们悲剧的命运。当社会革命党领导人切尔诺夫主动提出给他们武装援助并希望去喀朗施塔德的时候，佩特里琴科谢绝了他有关武装援助的建议。^③ 其实，佩特里琴科清楚，社会革命党等反对党已经没有什么组织了。当他们不断向彼得格勒工人发出呼吁而没有响应的时候，他们只能任由群众摆布了。

布尔什维克在进攻喀朗施塔德士兵的同时，颁布了新经济政策，虽然

^① 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121、92~93页。

^② 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128页。

^③ B. П. 纳乌莫夫等编《1921年的喀朗施塔德》，第372~373页。

临时委员会把它看做布尔什维克施加的小恩小惠，但是，在经济极端艰难的条件下，它具有非常强的号召力。

根据布尔什维克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加强党的统一的决议，布尔什维克对参与的共产党员进行了严厉的处罚。从3月2日到4月15日，共逮捕了3000名积极参加者，其中40%的人被判处死刑，25%的人被判处强制劳动5年，35%的人被释放，小部分人（数量极少）被判处社会劳动1年，缓期执行。^①对叛党分子的惩处分为四类：第一类，退党并积极采取对立行动、逮捕时持有武器的人，退党的政委和指挥官以及集体的组织者，提出恶毒的退党声明、欢欣鼓舞寄希望于叛乱分子和革命委员会并抬高其威望的人被判处死刑。第二类，提出退党声明但语言不甚恶毒、政治上无行动、被动参加叛乱的年轻人被判处强制劳动5年。第三类和第四类，提出退党声明但没有任何动机的人，在说明材料中未发现退党但自己承认提出过的人，虽提出过退党声明但仍然受到革命委员会成员监督的人都予以释放，少部分人被判处社会劳动1年，缓期执行。社会革命党等对于叛乱起到间接作用的人则坚决予以取缔、清洗，并在1922年开展对他们的逮捕、隔离、审判和流放。^②

社会革命党对喀朗施塔德起义的支持直接敲响了自己存在的丧钟。而这一点也直接成为学者批判布尔什维克独裁的有力依据。如果说布尔什维克必须发动对农民的社会改造遵循了社会发展的规律，那么在处理与反对党的关系时是否可以缓和一下呢？这就必须对新经济政策的社会作用做出评价。

三 对新经济政策的误读

新经济政策是什么？对于已经失去农民支持的社会革命党来说，这是必须搞清楚的问题。一方面，在坦波夫起义和喀朗施塔德起义中，社会革命党似乎取得了重新组建政权的优势，但转眼之间就灰飞烟灭了；另一方面，弄清楚新经济政策的含义可以真正明白布尔什维克究竟在做什么样的工作，以获得扩大自己影响的筹码。很可惜，作为社会革命党理论家的切尔诺夫没有突破资本主义就等于剥削的误区，最终葬送了社会革命党在苏俄存在的机遇。

① B. П. 纳乌莫夫等编《1921年的喀朗施塔德》，第436页。

② B. П. 纳乌莫夫等编《1921年的喀朗施塔德》，第437、453页。

社会革命党和切尔诺夫把新经济政策的目的当做巩固政权，认为它实际上是投降资本主义。切尔诺夫说：布尔什维克的“目的很清楚，应该把政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为此，可以与世界资本妥协，把灵魂出卖给魔鬼，撒谎、背叛和作假。”“布尔什维克的变化不是经验、坚定的信仰和对最终目标的诚实的认识推动的演变，而是通过快速的退却到早已准备好的保持新进攻立场的无原则的尝试。”^① 切尔诺夫提出了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布尔什维克通过新经济政策把“地下资本主义合法化”，像维特一样，通过国家政策的倾斜，把发展的重担压在没有力量的农民经济之上。第二个理由是，新经济政策确立了国家对私营企业的领导，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切尔诺夫把国家资本主义理解成为封建的分封制度：“国家管理局和中央就这样实行了黑色平分，结果国家保存了最高主权，托拉斯则保存了基本的财经职能。”^②

切尔诺夫把城市对农村的剥削、工人对农民的剥削简单地等同于资本主义。他说：“我们的生活不能回避那些方面，可以说是旧的资产阶级世界所固有的城市与乡村对抗性的矛盾。这个最主要和最深刻的对抗性矛盾之一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固有的内在矛盾。”他说，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不同的生产部门似乎可以按照某种等级秩序加以安排，如材料部门、加工部门。“但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应该反过来。它首先控制最高的工业部门并充分地发挥和调动自己所有的组织潜力，接下来，在逐渐克服重重困难之后调头向下。每一个工业部门，只要遵守一定的序列，在进攻性的资本主义压力之下，会一个部门接着一个部门地发生变化。然而，每到这个时候，我们碰到的都是整个变化周期的不同时刻。资本主义世界在它不同的交叉路口出现的五光十色的现象都是基于这一点……到那时，资本主义摧毁多于推动，挤压、剥削多于对生产率的提升，让多数人脱离生活的轨道——更多的非阶级化多于新生活原则下的协调和组织。”资本主义农村和农业的应用就是把工业领域的发展规律机械地应用到农业领域（индустриоморфизм），这可以与人类精神文化史上的人类学观点作类比，即人在发展的初期，在知识储备非常微小和贫乏的情况下，根据已知来推

① В. Р. Эволюция или беспринципность? 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Россия. 1921, №. 9, с. 1 - 4. См., О. В. Коновалова, В. М. Чернов о путях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и, с. 175.

② О. В. Коновалова, В. М. Чернов о путях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и, с. 176, 177.

论未知。^①

切尔诺夫根据俄国的工业生产力繁荣的同时造成了农业衰退的事实，坚决反对把工业领域的规律机械地套用到农业领域，更反对以工业为中心来理解国民经济的演变。这种认识只是切尔诺夫站在宗法伦理道德基础上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顺序的总结，但他却把它当做了资本主义的规律本身。他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种矛盾不是暂时的，而是命中注定的，导致悲观地对待农村观点的胜利。^② 切尔诺夫根据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就是从个人阶段发展到有组织的阶段来克服资本主义的矛盾性原理，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资本主义矛盾总爆发的原理，得出战争为农业和农业国提供了发展机遇的结论，主张放弃城市压迫农村，工人压迫农民的资本主义剥削方式。

根据以上原理，切尔诺夫认为，列宁的战时共产主义只是延续城乡斗争并使之更加尖锐的手段。战争不仅意味着资本帝国主义的危机，而且意味着旧的以工业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的危机。因为“旧的以工业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是狭隘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③ 最后他得出结论，国家非集中化和联邦主义才更加符合劳动农民经济的实质，即通过合作社发展到更高的形式，而谁谈合作社就是谈自治、非集中化和联邦制。

切尔诺夫最终回到了民粹派的农业社会主义。他说：“农业社会主义的原则就其内容来说，就是确立劳动经济主动、直接、没有任何过渡地，绕过资本主义清洗发展到社会主义。联邦制的原则就其内容来说就是确立任何软弱的、落后的、非历史的人民独立发展的权利，绕过帝国主义宗主国的庇护和殖民地阶段。”^④

切尔诺夫借用左派共产主义的观点把布尔什维克颁布的新经济政策称为国家资本主义，是具有亚细亚暴政的、对社会主义最蹩脚的伪造。它最基本的特征是官僚化的集中化，通过对官员的任命来管理经济，具备因循守旧、缺乏弹性、没有经营、不经济、到处滥用、对于社会和个人极端强权和国家暴力等官僚制度的所有弱点。^⑤

① В. М. Чернов, Конструктивный социализм, с. 516, 517, 518.

② В. М. Чернов, Конструктивный социализм, с. 520, 521.

③ В. М. Чернов, Конструктивный социализм, с. 532.

④ В. М. Чернов, Конструктивный социализм, с. 533.

⑤ В. М. Чернов, Конструктивный социализм, с. 536.

切尔诺夫把战时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连起来看，认为战时共产主义建立了工人对农民的剥削，而新经济政策干脆倒退到国家资本主义。切尔诺夫从剥削的角度考察了国家资本主义。他认为，苏俄建立起来的是等级社会，第一级是国家，所谓的工人国家；第二级是先进的工人阶级，人民的精华；第三级就是先锋队，先进部分中的先进，精华中的精华；第四级就是党，先锋队中的先锋队，精华中精华的精华。剥削的主体就是提问题的主体——党，垄断的、以专政突出等级的执政党。^①

切尔诺夫认为布尔什维克的专政是建立在超阶级的基础上的。它的垄断不是来自自然成长起来的经济的最深处，而是从政治法律上层建筑的高处进入到各个领域深处的。有等级的前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构成就是这样。他认为布尔什维克的专政不仅表现在政权方面，而且表现在对工业的垄断上。它掌控的是工业中的垄断地位，整个国家就是它的领地。这个垄断的、集中的、封闭的、仅仅遵循党的片面性就是集体主义的剥削主体。^②

切尔诺夫进一步分析了剥削主体并因此把它等同于资产阶级的剥削。它说：“理论上和字面上，国营企业的所有权属于所有的劳动人民，没有单个的区分，实际上它属于专政制度下通常掌管所有权利的那个人。这样，直接完全掌握国家工业的完全不是工作的人，甚至不是其中的一部分——组织起来的、作为一个阶级的无产阶级……而是通过它的先锋队、通过它的党组织起来的、有自觉意识的少数。”当把国家的、政治的寡头带进工业领域实施统治，俄国就有了百分之百的国家资本主义。依据这样的事实，俄国通过垄断的党的专政制度制造了新的更深的社会鸿沟，国家也急剧地分裂为管理者和被管理者。这些牢牢结成执政党的管理者就是国家工业的真正主体。如果说新经济政策之前国家资本主义是绝对集中的，那么新经济政策之后就是非集中的、分散的、封建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是新的经济采邑制度。^③

接下来，切尔诺夫分析了被列宁看做社会主义属性的四个特征，即企业的土地属于国家，企业使用的生产资料属于国家，企业完全由国家掌管以及掌管一切的国家属于工人阶级。切尔诺夫利用了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类型的企业就是生产过程本身的人之间结成的关系的原理，指出列宁的解

① В. М. Чернов, Конструктивный социализм, с. 541.

② В. М. Чернов, Конструктивный социализм, с. 541.

③ В. М. Чернов, Конструктивный социализм, с. 542, 544.

释失去了社会主义类型企业的特征。首先，工厂的组织完全是权威的；其次，内部的管理者完全是工厂专制；再次，在工厂工作的人们完全脱离企业命运的决策；最后，工厂的班组、机关、企业的所有人都是旁观者，完全没有组织，在工厂决策的时候完全发不出自己的声音。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在企业里出现的完全是老一套和官僚主义，所有这一切对于社会类型的企业来说没有任何意义。^①

切尔诺夫用 19 世纪 80 ~ 90 年代流行于德国的俾斯麦国家社会主义比附列宁的国家社会主义。他说：“俾斯麦的国家社会主义，第一，国家诚挚地关心和保护工人。工厂立法应该采取措施强调国家给予工人的福利。这个立法的核心不是工人组织，而是官僚对工人的关心。第二，所有的资本主义的利润都转交给国家。企业主——国家控制国内市场，在关税保护制度下，商品的价格可以使自己给予工人社会保障提供更大的开销，其花费可以转嫁给消费者。工人应该用顺从替代不满，国库的利益也完全得到了维护。”^② 俾斯麦的目的就是从生活的根基上彻底消除德国的社会民主党。

切尔诺夫进一步利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李卜克内西的话指出：“国家社会主义用现代话来讲就是已经达到了逻辑极限的国家化，即把国家的各个工业部门国家化，如在铁路经济中得到大部分实施，在烟草工业中进行了尝试。接下来一个企业接着一个企业国家化，由国家接替私人雇佣者，资本主义的经营照旧，只是更换了剥削的主体，以国家代替私人资本家。作为主人的国家雇佣工人做低级官员，其经济地位与其他工人相比没有丝毫的改变：国家完全扮演着剥削者的角色，遵循曼彻斯特经营者的原则，压低工资并以同样的原则回敬工人较高的工资要求，因为每一个空闲岗位愿意以同样的工资应聘的有好几百位。如果国家决定把所有的企业掌控在自己的手中，那么工人在国家之外不可能为自己找到工作，就不得不服从由国家提出的任何条件。这样一来，在国家社会主义条件下，其实是国家资本主义条件下，无论是经济依附还是政治依附都尖锐到可以想象的极限，经济奴役加强了政治奴役，而政治奴役又强化了经济奴役。这就是我们决议中讲的国家社会主义双重桎梏的含义。我们这里讲的伪造的名词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国家社会主义者先生们，我重复一下，不应该叫做国家社

^① В. М. Чернов, Конструктивный социализм, с. 546.

^② В. М. Чернов, Конструктивный социализм, с. 547 - 548.

会主义，而应该叫做国家资本主义。”^①

切尔诺夫根据德国社会主义者的认识概括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甚至把它称为“穷人的专政”。如果说国家资本主义是把利润交给国家，那么，穷人的专政就是把亏损国家化。如果说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经营不善和亏损是通过私人资本家自己破产和预先消除企业亏损的办法消除的；那么，掌握在国家手中的企业就可以长期存在，因为不管愿意不愿意亏损都可以由纳税者的税收弥补。这样一来，国营企业经营的结果由于经营不善而化为乌有，国营企业最终在各种混进企业的人和冒充中间商、经纪人、代理人、无数高级职员、监督者等非生产者手中一一倒闭。^② 由于国家的垄断，工人会更加受约束，例如连更换坏主人为好主人的机会都失去了。老板——国家由于垄断经营重要的工业部门，同时又完全控制权力资源，就是比普通资本家更有实力的工人在国家面前也不能不感到自己微不足道。既然如此，国家资本主义拿什么来吸引人呢？切尔诺夫说：“当生活成本由于企业托拉斯化造成局部自然垄断而提高的话，人们可以向国家投诉托拉斯；在国家垄断的情况下，被告同时也是法官……这样，对于特别希望战胜街头混混、文化愚昧以及固执地认为社会主义绝对不会实现的不自信的人，马克思主义常常添油加醋地把社会主义的观念说得更接近于现代日常生活现实，并使习惯和生活现实神圣化。结果出现了简单化和庸俗化情形，例如，出现了使国家资本主义极端化的发达的制度，并辅以无产阶级专政，这样就万事大吉了：似乎社会主义已经完全准备好了。”^③

切尔诺夫最后得出结论，社会主义不是资本家换成了社会主义者，而是一种新的社会经济类型。“社会经济类型首先是由生产过程中的活的要素——人和社会集团的相互关系决定的。第一个要素是体现凝聚在产品中的活劳动的直接生产者。第二个要素是体现服从生产过程的经济计划的组织者。第三个潜在要素是体现社会对产品需求的消费者。在自然经济状态下，消费者、生产者和经济的组织者不可分地融合在一起，但只存在于家庭劳动基层的微小宇宙中。在手工业状态下，生产的组织者和直接劳动还没有分离，或者分离还处在萌芽状态。但消费与生产已经分离了。其联系的环节首先是订单，订单不够的时候，兴起了货郎、商品交易会——概括

① В. М. Чернов, Конструктивный социализм, с. 549.

② В. М. Чернов, Конструктивный социализм, с. 550.

③ В. М. Чернов, Конструктивный социализм, с. 551 - 552.

起来叫初期的市场。古典资本主义状态下，消费者完全不再直接影响生产，其影响只是间接的，通过市场，通过竞争，通过价格显示供销的起伏。生产的组织者——它的法人所有者或者代表其利益的专家——是唯一的工厂立法者和独裁者。生产者被看做工厂的异己，与工厂没有组织联系，受聘的、离职的、替换的人只满足于一定货币的发放，与企业完全缺乏更深层的联系。在深层次上，这三个要素是分离的，经常处在矛盾状态并暗中较力。”^①

切尔诺夫通过分析以上三个要素在不同时期的表现形式，希望在未来社会主义的条件下，把被资本主义隔离的和分散的东西重新有计划地有机地组织起来，使生产中三个基本的活的要素实现新的和更高程度的综合。其程序是，过去的臣民组成的工人变成全权的企业公民；而过去开始时不受限制的、后来受到限制的君主——主人，由这些公民选举产生的总统替换；在这个企业中工作的工人小组不再是独裁者；以前通过悄悄地、迂回地、自发地影响市场的办法影响工厂经济政策制定的消费者变成公开地、有组织地参加经济民主，与直接的生产者一起参与生产的管理；接下来，成为企业灵魂的企业组织者不只是工人的代表，还是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利益和需求的有机协调者。如果企业的内部组织仍然是旧的，无论是提出以社会主义官僚代替资产阶级的专家和官僚当家，还是提出让无产阶级政党代替保守的或者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政党当家，在社会经济类型方面都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②从这个意义上讲，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突出的特点是在它的上面贴上了社会主义的标签。

切尔诺夫认为：“社会主义就是经济民主制度，它依靠的是人在经济活动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关系。纯粹的政治民主是从这些关系中抽象出来的。对于民主来说，人的经济标准和专业资格没有意义，它们只对成为公民的一般意义上的人有意义。只是出于统计的需要，出于技术的考虑，公民才在地域上按区加以划分。在称号、地位、日常生活和文化水平等方面比较相近的人不加区分地结成一个没有社会实质内容的集体核算单位，在这个单位里，人们就像一个抽象的代数符号。”^③

切尔诺夫把经济民主看成完全不同的东西，用他的话说，“具有社会本

① В. М. Чернов, Конструктивный социализм, 1997, с. 552.

② В. М. Чернов, Конструктивный социализм, с. 553 - 554.

③ В. М. Чернов, Конструктивный социализм, с. 555.

质内涵”。第一，它是按照生产角色和职业特征把人归类的；第二，它是根据一定经济福利的特别利益把人归类的（如农业生产者的联合是为了监督农业机械和工具的生产，城市居民的住宅联合会是为了监督建筑工业过程，等等）。^① 无论是政治民主在宪法中重视协调不同地域集团，说不同语言、具有不同文化程度以及分属不同民族和信仰不同宗教的人们之间的利益，以及从政治民主中引出的中央政权与地方自治、城市与乡村、区域自治与民族集团自治、集中原则与联邦原则之间的相互关系；还是在经济领域出现更复杂的任务，如寻找有机协调各种利益集团的经济宪法组织原则以及本身体现各种经济范畴、各种人员之间的协调关系，都应该给每一个有社会本质内涵的集团应有的地位以及在开放的经济民主体制中应有的具体任务范围和权利。真正的政治民主是多数和少数、社会与个人、中央与地方、国家与民族等范畴间相互协调权利与职能的一种开放的制度。真正的社会主义是经济民主开放的一种制度，即类似体现不同经济范畴、具有不受任何保护和专政束缚的独立性和首创性、自治组织起来的具有社会本质内涵的集团在权利与职能上的相互协调。这两个制度的完善过程、这些利益更加合理的协调过程就是民主发展的过程；民主不是一劳永逸、理性赋予、一开始就在逻辑上比较严密不动的一种制度，它需要稍稍开放，以便安抚处在底层的人；民主仿佛是某种变换内容的永恒规律。民主的形式遵循永恒运动、不间断、不停止演变的规律。同样，社会主义也不是一劳永逸的社会天堂，应该遵循永恒变化的规律。^②

而国家社会主义想把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对立起来，从社会主义中剔除所有的民主主义的东西。它们越过民主，把两个似乎矛盾的旗帜人为地联系起来，提出一个不同的方案。如果实现俾斯麦意义上的普遍国家化的国家社会主义，那么它将对现代阶级划分是个严重的打击，工业企业主与为之生产剩余价值的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也将消除。但是，社会分化并没有随之消灭，它只是接受了另一种形式。在保守式的国家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被划分成管理者和被管理者。这样，人就成为决定性的因素，它扮演的只是固定的社会职能。职能创造机关，而不是相反。如果这种社会职能是管理职能，有组织地脱离其他社会职能，凌驾于其他人之上，用全权武装，自己保护自己，那么，具有这种职能的人，无论来自哪个阶级，最终反映的都是管理职能的

^① В. М. Чернов, Конструктивный социализм, с. 555.

^② В. М. Чернов, Конструктивный социализм, с. 556 - 557.

组织性质。红色官僚实际实现了白色官僚所幻想的东西，即为了专制的利益而利用了社会主义。这样，社会主义就脱离了自己的灵魂——自由，留下来的是一具没有呼吸的僵尸——共产主义的图画。^①

切尔诺夫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认识，揭示了民主不发达的条件下官僚的独断性，充分解释了战时共产主义时期为什么会出现农民对布尔什维克强制的反抗，也说明了新经济政策时期为什么明明出现了市场经济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局面却引起布尔什维克党内关于资本主义反攻倒算的争论，把本该有利的商品经济看做权宜之计随时准备中止，并酿成了1925年的粮食收购危机。^②

新经济政策是借着巩固苏维埃政权而在经济领域实行的让步措施。无论把新经济政策看做是为“社会团结和消除等级旧制残余并为国家进一步的现代化创造一定条件”，^③还是“对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突破，即把市场经济引入社会主义”^④，都不能回避一个问题，那就是人们心目中的恐资病。切尔诺夫激烈抨击新经济政策就是向资本主义的倒退，强烈地要求发展农业，并以经济民主的口号对抗政治专制，还人们以自由。在这里必须解开人们惧怕但又无法回避的一个心结。

在俄国人的眼里，资本主义就等于投机、剥削，只要社会主义者随时准备对他们发动进攻，缩小私营商业的活动范围，用公有制战胜非公有制成分，社会主义就会战胜资本主义。^⑤其实，从理论上讲，这种担心就是心理上害怕异化。异化这个词是黑格尔最先使用的，被马克思推广开来。异化的含义就是一个人的存在与其本质的分离。但是，什么是人的存在，在这个问题上，黑格尔和马克思有分歧。黑格尔认为存在就是理性的存在，而马克思认为存在是一种实践的存在。然而，无论是理性的存在还是实践的存在，都建立在对人理性启蒙的基础之上。俄国是一个没有完成理性启蒙的国家，俄国人的行为还深受宗教神学的影响。“革命后的执政党不是宗教信徒，相反，他们是无神论者。但无神论是对有神论的否定，因

① В. М. Чернов, Конструктивный социализм, с. 559、560.

② 沈志华主编《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上册，第160页。

③ О. В. Коновалов, В. М. Чернов о путях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и, с. 182.

④ 沈志华主编《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上册，第179页。

⑤ 沈志华主编《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上册，第179页。

此无神论的倡导者仍然是有神论的俘虏。”^① 俄国社会对于资本主义的惧怕以及通过取消私有制、发展公有制实现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同时把这些东西当做一种教条加以遵守，最终酿成你死我活的宗派党争。

但是，俄国面对战争的严峻考验，不得不完成这种社会转型。无数的政党都由于不能完成这种转型相继垮台。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也是不断地改弦更张，吸收各个政党的政策并大胆尝试，造成社会思想的极大混乱。俄国没有一种比较稳定的政策能够治疗俄国的病症，以至于切尔诺夫把社会主义当做了永远变化着的规律。

俄国布尔什维克从利用社会革命党土地社会化纲领到实行新经济政策，政策变化的幅度之大超乎人们的想象。用一种生产方式来统率整个俄国显然不能解决俄国的问题。但是，列宁非常清楚，在俄国存在的五种生产方式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自发势力，列宁把它称为“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自发势力”前面尽管有小资产阶级这个修饰语，但是这里列宁显然是指资产阶级以前的所有的自发势力。无论如何，俄国要想完成社会改造，必须对他们加以治理。用切尔诺夫的话说，把他们从臣民改造成为公民，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其实，俄国一直致力于这样的改造，争论的只是方法。俄国民族观念有以下特点：第一，这个民族可以界定为一个集体人格；第二，这个民族由诸如血缘和故土等原始种族因素形成；第三，这个民族具有某种高深莫测的灵魂或精神。这种民族精神存在于“人民”之中，却通过有教养的中介即精英揭示出来，对“人民”的崇拜又常常与精英主义和对愚蠢大众的鄙视相对应。^②

俄国的改造一定是权威主义的。列宁以一种超越西方启蒙方式的担当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式的启蒙方法。他一边以共产党代替无产阶级，形成党的专政；一边和各种社会势力进行着反改造的斗争。切尔诺夫的确揭示了俄国社会基础的落后，指出仅仅通过党的专政不可能实现改造的目标。但是，在人们对于改造不认同的情况下，在外在的敌人咄咄逼人的态势下，俄国没有选择。列宁在政治上、思想上牢牢把持无产阶级专政，在经济上

^① 勃朗克·霍尔瓦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吴宇晖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第99、100、34页。

^② 里亚·格林菲尔德：《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王春华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第317页。

又为各种社会的发展打开了绿灯，创造性地探索了俄国社会主义道路。由于列宁的过早谢世，由于改造思想的不稳定性，才造成左右派的不断摇摆。社会革命党由于不能从理论全局认识俄国的现实社会转型，失去了自己的社会立足。社会革命党也以自己的激进行为成为俄国疾风暴雨式社会改造中的牺牲品。

第五节 社会革命党的结局

一 图圖中挑战布尔什维克

在经历了内战洗礼后，社会革命党从风云迭起的工人、农民和军队起义中再次看到了希望，希冀通过谋求合法的反对派挑战布尔什维克，考验布尔什维克提出的社会发展方向。

布尔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关系走过了合作、敌对、合法利用的道路，但在双方分分合合的过程中，社会革命党没有经受住屈辱的布列斯特和约和对农民改造的考验，走上了反对布尔什维克方针的道路。他们在1921年8月萨马拉召开的第十次党务会议上评价布尔什维克五年走过的道路时用了“完全破产”这个词，把布尔什维克采取的新经济政策看做向国内外资本的投降，而且认为这种投降“非常残酷地扼杀了劳动民主派的独立和自由，把自己培养成为资产阶级遗产的继承人”。^① 社会革命党给布尔什维克指出了一条道路，就是“告别旧的专政的统治方法和不受监督的、垄断的党的管理方法，回到民主，向所有社会主义政党伸手，以便共同努力，依靠被解放的劳动人民的独立性，使一切自由英勇地集中劳动人民的意志可以拯救的革命成就不致崩溃。”^②

社会革命党争取的是参与统治的政治权利，但在给人民的呼吁中没有充分认识如何才能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他们只是说：“在这个具有决定性的历史时刻，工人阶级不能只做一个旁观者。劳动民主派应该聚集和培育自己的力量。为此，为了民主保证和自由；为了自由选举苏维埃，以解决我

① С. А. Красильников и др., Судебный процесс над социалистами-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ами (июнь-август 1922 г.) подготовка, проведение, итоги,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с. 364.

② С. А. Красильников и др., Судебный процесс над социалистами-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ами (июнь-август 1922 г.) подготовка, проведение, итоги,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с. 363.

们与人民政权之间的争执；为了自由的合作社；为了解除工业的束缚，在对整个国民经济最重要的部门社会化、确立对其他部门的社会监督的条件下，保证国家生产力健康发展，捍卫工人阶级的利益；为了不由征粮队和党支部而由自由选举的人民自治机关征收粮食税；为了自由和独立的职业联合会；为了调节土地关系，以各种形式有计划地实施土地社会化原则，促进农业的发展和巩固；为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所有日常需要，走上一条斗争的道路。”^①

从人民厌战和政治冷漠来看，人们不能正确理解斗争的含义。社会革命党为了没有具体内容的自由和独立再次鼓动人们走上斗争之路不可能打动疲惫的人们。它旁观布尔什维克为了拯救灾难的国家经济生活而被自发的国内外资本主义势力进攻，但坚定地摒弃与资产阶级联合的思想，试图利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力量消灭无产阶级专政。^② 这样，民主就成为社会革命党奋斗的目的本身。既然布尔什维克对工人和农民的改造不能为工人和农民所承担，引发了大规模的社会动荡，社会革命党进一步追求民主的革命运动势必加剧俄国的社会动荡。于是，布尔什维克把资本主义的因素限定在经济领域，同时利用政权的力量对之加以调节，以稳定社会的发展方向；在政治和思想领域必然取缔放弃社会发展方向探索的政治对手，阻止其对于政治思想的动摇。

布尔什维克可能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有些专制，但是面对俄国的自发势力，民主绝对会导致无政府。社会革命党虽然在第十次党务会议上进一步明确社会主义的方向，但是，它不相信俄国威权式的改造会发展出民主制度来，笃信“经济和政治上软弱的祖国资产阶级不能为这样和那样的复辟尝试提供稳固的基础，布尔什维克为了巩固政权而对资产阶级做出的让步只能培养工人阶级的健康意识，不妥协地对抗布尔什维克政权；在农村激发起农民的政治联合，反对深深敌视农民的布尔什维克国家”。^③ 社会革命党在民粹派社会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成为布尔什维克通过新经济政策走向社会主义的最大障碍。相信政治高于一切的布尔什维克走上了对社

① С. А. Красильников и др., Судебный процесс над социалистами-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ами (июль-август 1922 г.) подготовка, проведение, итоги,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с. 364.

② С. А. Красильников и др., Судебный процесс над социалистами-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ами (июль-август 1922 г.) подготовка, проведение, итоги,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с. 366.

③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17. 10 - 1925, т. 3, ч. 2, с. 772.

会革命党政治取缔的道路，对社会革命党的审判成为“国内战争的一个阶段”。^①

关于对社会革命党的审判，学者们更关注于布尔什维克做法的不人道。如俄国学者 Д. Б. 巴甫洛夫说：“政权的意图就是以任何做法和方式完全和最终镇压反对派，直到从肉体上消灭每一个社会主义异端思想的载体。”^② С. А. 科拉希利尼科夫通过分析布尔什维克对社会革命党的审判材料，看到了布尔什维克对社会革命党审判的另一面，即“苏维埃制度绝不仅仅依靠刺刀和内务人民委员会工作人员的肩膀来维持，而是依靠多数人民的支持维持的”，但同时也肯定了“俄国新民粹派的某些理论遗产今天仍然没有失去自己的意义”。^③ 摇摆的科拉希利尼科夫最终得出结论，“正确的不是有权利的，而是谁更有权利”。为什么是布尔什维克更有权利而不是社会革命党？其实，从整个的审判过程来看，社会革命党除了赢得人们同情之外，并不能给当时的俄国社会指明发展的方向；布尔什维克的做法尽管血腥，但是它引导着俄国走上了痛苦转型的发展道路。可能换一个时间和地点，俄国社会转型的血腥会减弱一些，但是，在当时处于激烈的帝国竞争的条件下，经济和文化落后的俄国要想实现快速转型，血腥的代价是不得不承受的。这也是流亡在国外的知识分子在二战之中之后转向苏维埃政权所能证明的。

对社会革命党的审判共分为三个阶段：审判前阶段（1921年末到1922年6月初）、审判阶段（1922年6月8日到8月7日）和审判后阶段（1922年8月7日到1924年1月14日）。^④ 布尔什维克对社会革命党的司法审判做了大量的准备，包括寻找罪证、在群众中造声势以及邀请共产国际的律师进行辩护。在审判的过程中，布尔什维克对共产国际的律师采取了逼迫的做法。在审判之后，对监禁中的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领导人采取了非常不人道的做法，甚至导致社会革命党人绝食、自杀等现象的发生。在国际

① *Марк вишняк, Годы эмиграции (1919 - 1969) . Гл. 5. http://www.e-reading.org.ua/bookreader.php/11613/Vishnyak_-_Gody_emigracii.html*

② *Д. Б. Павлов, Большевицкая диктатура против социалистов и анархистов 1917 - середина 1950 - X годов, М., РОССПЭН, 1999, с. 104.*

③ *С. А. Красильников и др., Судебный процесс над социалистами-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ами (июль-август 1922 г.) подготовка, проведение, итоги,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с. 132, 144.*

④ *С. А. Красильников и др., Судебный процесс над социалистами-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ами (июль-август 1922 г.) подготовка, проведение, итоги,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с. 19.*

舆论的压力下，布尔什维克对 11 名被判处死刑的社会革命党领导人改判 5 年监禁，但最终并没有将其释放。如根据苏联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决议关于改判 1922 年审判的犯人的处罚决定，被判处死刑的社会革命党领导人 А. Р. 戈茨、Д. Д. 顿斯科伊、Л. Я. 格尔施泰因、М. Я. 根捷里曼、М. А. 利哈奇、Н. Н. 伊万诺夫、Е. М. 拉特纳、Е. М. 季莫费耶夫、В. В. 阿卡波夫、А. И. 阿尔托夫斯基、Е. А. 伊万诺娃、С. В. 莫罗佐夫共 12 人，除了莫罗佐夫自杀外，其余都改判五年监禁。А. В. 利别罗夫、Н. И. 阿尔捷米耶夫、Д. В. 拉科夫、Ф. Ф. 费奥多罗维奇、М. А. 韦杰尼亚平缩短监禁时间一半，期限五年；В. Л. 乌特果夫、Е. С. 别尔格、М. Л. 利沃夫减至两年半。其余拘押的犯人立即释放，但禁止居住在工业和人烟稠密的地方，由国家政治保安局指定居住地并由当地的国家政治保安分局监视。^① 出狱后的中央委员改为流放。但根据 1990 年解密的档案材料，除了阿尔托夫斯基活到 1975 年之外，其余的人没有活过 1941 年。^② 判处死刑和改判更多地具有宣传性质。

对社会革命党的审判从头至尾涉及了一个主题，即俄国社会主义者与西方社会主义者辩论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方式问题。这场争论产生于第二国际创建以后社会主义者组建社会主义政党时期，特别是产生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期资本主义转向帝国主义时期。帝国主义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资本向经济落后国家的大扩张，造成殖民地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对峙。帝国主义使私人资本家借助于银行和政权的力量扩张自己的实力，导致国内剥削的加剧和帝国主义的战争，社会主义运动也不断高涨。

资本主义时代是一个商品交换的时代，它提倡的是个人的创造力。帝国主义时代是一个社会化的时代，它强调的是富有创造力的个人的社会合作。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分为两种：一种是资本主义内部的社会主义，即第二国际所坚持的社会主义；一种是资本主义外部的社会主义，即第三国际所坚持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内部的社会主义目的是使资本主义更富有人情味，缓和它的不利影响，改善工人和农民阶层的状况，

① С. А. Красильников и др., Судебный процесс над социалистами-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ами (июль-август 1922 г.) подготовка, проведение, итоги,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с. 382.

② С. А. Красильников и др., Судебный процесс над социалистами-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ами (июль-август 1922 г.) подготовка, проведени, итоги,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с. 129.

创造更好的公共服务。外部的社会主义就是使用资本主义历史上所使用过的同样技术，但是没有资本家。^① 针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开展社会主义运动的社会主义政党出现了修正派和激进派之争，即与资本家开展和平斗争和推翻资本家政权之争。争论涉及自由民主是否具有普世价值的问题。修正主义者以实证主义的方式理解马克思的理论，试图通过折中的方式让宗教信仰和科学伦理发挥作用，进而提出社会主义不是目的，运动就是一切的观点。^② 伯恩施坦提到的宗教信仰和科学伦理的确还在发挥作用，但是，在伯恩施坦这里却变成了主观因素，从而纠缠于主观与客观而丧失了真理性。于是就出现了把社会主义看成长期的革命目标而直接固守成人普选权、无记名投票、官吏直选、提高所得税、每天八小时工作制、禁止使用14岁以下童工等具体要求的功利主义的纲领，^③ 使社会主义目标与社会主义具体的纲领相脱离。

激进派则以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为纲领，缺乏细化的举措，把社会主义泛化，具有宿命论的色彩。如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代表卢森堡认为，自由民主是工人意识中的应有之义，正是“通过这些活动和斗争，无产阶级的觉悟即意识就成为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就被组织成一个阶级”。^④ 卢森堡坚决反对领导从外部灌输社会主义的思想，认为，如果自由民主变成“某个政党的特权，其效力就化为乌有了……列宁的做法是错误的。”^⑤ 对于帝国主义，卢森堡把它看成了资本主义在落后国家的延伸，正是落后国家的存在才延缓了资本主义的灭亡。^⑥ 这样，在帝国主义战争来临的时刻，她坚决反对社会主义者支持军事预算，并在1918年直接发动革命，被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工人杀害。

修正派和激进派的争论直接导致第二国际的分裂，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① 梅格纳德·德赛：《马克思的复仇——资本主义的复苏和苏联集权社会主义的灭亡》，王澄清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第158、159页。

② 爱德华·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殷叙彝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3，第5、55页。

③ 梅格纳德·德赛：《马克思的复仇——资本主义的复苏和苏联集权社会主义的灭亡》，第97页。

④ 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李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第三章激进派（2）http://read.dangdang.com/content_501570?ref=read-2-D&book_id=1201

⑤ 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第三章激进派（4）。

⑥ 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第三章激进派（3）。

结束的1922年已经分裂成共产国际及其所属红色工会国际、社会党国际工人联合会、战后恢复的第二国际及其所属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所代表的左、中、右三派。^① 经过1922年4月2~5日的柏林会议，建立三个国际统一战线的工作以失败而告终。恢复的第二国际和社会党国际工人联合会（即第二半国际，也叫维也纳国际）在1923年5月23日在汉堡召开合并大会，建立了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俄国共产党领导的共产国际独立开展工作。

列宁与第二国际和维也纳国际的分歧在于后者坚持议会斗争的道路，放弃了社会主义的原则。列宁坚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垂死的、腐朽的和寄生的资本主义。列宁一直寄希望于德国社会主义革命，以实现世界革命的目标。1921年德国革命失败以后，特别是国内喀朗施塔德起义之后，列宁开始正视资本主义的问题，提出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列宁在落后国家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并最终坚持下来，若从欧洲的内生型社会主义的立场出发，无疑是一场偶然的革命。但对俄国这样一个缺乏资本主义土壤的国家来说，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无疑是一种乌托邦，不靠坚定的信仰和严格的纪律是无法完成的。列宁对帝国主义的批判以及对国家资本主义的认可无疑都是根据俄国的现实对马克思方法论的灵活运用。在社会主义转化成纲领的过程中，如果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德国的社会主义者都出现了工团主义的情形，那么，俄国的社会主义者内部出现工团主义的倾向更是无法避免的。社会革命党作为农民政党，不顾俄国缺乏自由民主发展的现实，以布尔什维克推行专政为借口，利用群众运动的方法实践民主目标，放弃对俄国农民的改造，犯了激进主义的错误。社会革命党以坚持民主为由反布尔什维克专制，阻挡了俄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1921年2月，政治局通过了关于例行加强对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逮捕的决议。^② 1921年12月28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会决定将社会革命党提交最高法院审判。^③ 1922年三个国际柏林会议提出了有关对社会革命党审判不判死刑的动议，共产国际会议代表布哈林予以认可，同时承诺公开

① 程玉海：《论1922年三个国际柏林会议》，《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0年第3期，第180页。

② Д. Б. Павлов, *Большевистская диктатура против социалистов и анархистов 1917 – середина 1950 – X годов*, с. 61.

③ С. А. Красильников и др., *Судебный процесс над социалистами-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ами (июнь-август 1922 г.) подготовка, проведение, итоги*,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с. 147.

审判、允许自由选聘辩护人、三个国际代表可以出庭旁听并可做速记记录。^①

布尔什维克对社会革命党审判起诉的理由是：组织武装推翻苏维埃政权；对苏维埃政府著名的领导人实施恐怖，从事抢劫活动。^② 指控是布尔什维克根据曾经暗杀布尔什维克领袖的社会革命党党员、现在已经加入布尔什维克的 Г. 谢苗诺夫（真名瓦西里耶夫）在柏林出版的小册子《1917~1918 年社会革命党军事和战斗工作》和他的助手 Л. В. 科诺博列娃给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展开的。具体的指控是社会革命党在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初期尝试推翻布尔什维克，在 1917~1918 年秋冬破坏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在立宪会议召开的时候计划发动武装起义，由谢苗诺夫领导的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中央战斗队在 1918 年暗杀 В. 沃洛达斯基^③、М. С. 乌里茨基^④、列宁和托洛茨基，还实施了一系列抢劫。1917 年末和整个 1918 年，社会革命党策略的特点是，为了和苏维埃政权斗争倾向于利用一切手段和可能，包括恐怖、结盟、军事暴动和黑色百人团，利用一切暗的、明的机会，但又害怕在党员群众面前和国际上公开。^⑤

对于布尔什维克利用已经加入布尔什维克的前社会革命党党员的指控起诉社会革命党，社会革命党领导人切尔诺夫在柏林的《俄罗斯之声报》上发表文章，揭露谢苗诺夫的行为为“犹太之吻”，是布尔什维克为了揭露社会革命党的反苏罪行的应时的宣传。文章说：“谢苗诺夫—瓦西里耶夫先生在这本小册子（《1917~1918 年社会革命党军事和战斗工作》）里描写了布尔什维克法律视角下的（社会革命党的）各种罪行。如他和社会革命党的各种大人物共同反对苏维埃政权，或者从这些大人物口中听到类似情况。这些大人物有被关在布尔什维克高墙内并被伤寒弄瞎眼睛的中央委员顿斯科伊、透过布德尔斯克监狱的栅栏看到了上帝之光的 А. Р. 戈茨……至于谢苗诺夫—瓦西里耶夫，往好里讲是叛徒的告密，这个往好里讲就是假定他说的真话。”3月3日，社会革命党党员 С. С. 马斯洛夫给《俄罗斯之声报》

① 程玉海：《论 1922 年三个国际柏林会议》，第 183 页。

② С. А. Красильников и др.，Судебный процесс над социалистами-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ами (июнь-август 1922 г.) подготовка, проведение, итоги,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с. 166.

③ В. 沃洛达斯基（真名 М. М. 格尔施泰因，1891~1918），苏联出版人民委员，1918 年 6 月 20 日被社会革命党战斗队员谢尔盖耶夫杀害。

④ М. С. 乌里茨基（1873~1918），俄共（布）中央委员，革命军事党中央和军事委员会成员，彼得格勒契卡主席。1918 年 8 月 30 日被人民社会党人 Л. И. 康涅基谢尔暗杀。

⑤ С. А. Красильников и др.，Судебный процесс над социалистами-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ами (июнь-август 1922 г.) подготовка, проведение, итоги,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с. 160.

编辑部去信谈前社会革命党党员谢苗诺夫的奸细活动。^①

关于 Ф. Е. 卡普兰建议自己暗杀列宁的事，切尔诺夫引用津季诺夫的话说，它没有得到中央委员戈茨的批准，因为戈茨当时根本不在莫斯科，而是去了彼得格勒。^② 切尔诺夫是 1922 年 2 月 25 日讲的这番话，3 月 1 日即声明对柏林亲苏的《新世界报》编辑科尔斯京博士在 2 月 26 日登载彼得罗夫根据谢苗诺夫小册子写的《政治泔水池——评社会革命党》一文的诽谤^③ 追究司法责任。同一天，切尔诺夫给这件事的始作俑者发了一封公开信，指出执政党为了进行共产主义试验，不择手段地铲除他们。切尔诺夫认为自己不是托尔斯泰主义者，他们有权反抗，等等。^④ 指控社会革命党罪行的 Л. В. 科诺博列娃在 3 月 25 日~4 月 4 日之间给切尔诺夫发了公开信，指出切尔诺夫撒谎，同时说明是她提出暗杀列宁的计划并得到了中央委员会的批准，领导他们的中央委员 В. 里希特亲自给了她有罪的子弹。^⑤

判定布尔什维克的指控是真是假，已经成为判断是布尔什维克迫害异己，还是社会革命党为了追求权力而成为政治流氓的试金石。关于社会革命党是否亲自领导了暗杀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以达到推翻苏维埃政权的的问题已经有四种答案，第一，谢苗诺夫和科诺博列娃领导的战斗小组是假托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工作；第二，战斗小组在个别纵容谢苗诺夫恐怖情结的中央委员会成员如顿斯科伊和戈茨知晓，而其他人反对的情况下开展工作；第三，党的领导人知道存在履行破坏职能而不是恐怖职

① С. А. Красильников и др., Судебный процесс над социалистами-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ами (июнь-август 1922 г.) подготовка, проведение, итоги,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с. 175, 186.

② С. А. Красильников и др., Судебный процесс над социалистами-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ами (июнь-август 1922 г.) подготовка, проведение, итоги,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с. 176.

③ 《新世界报》是 1922~1923 年在柏林出版，由科尔斯京博士任主编的亲苏的有关政治、文学和经济问题的日报。1922 年 2 月 26 日刊登了评价社会革命党的文章《政治泔水池》，该文认为，社会革命党的领导人是一些政治流氓，而切尔诺夫是伪君子。切尔诺夫提起诉讼之后，该报又以不署名的文章《疯子的呓语——没有洗清切尔诺夫这个淫棍》，揭露社会革命党组织阴谋反对苏维埃政权，开始了白色恐怖，并积极参加这场阴谋，是白色恐怖主义者。切尔诺夫和报纸都找了律师为自己辩护，最终没有结果。参见 С. А. Красильников и др., Судебный процесс над социалистами-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ами (июнь-август 1922 г.) подготовка, проведение, итоги,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с. 664-665。

④ С. А. Красильников и др., Судебный процесс над социалистами-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ами (июнь-август 1922 г.) подготовка, проведение, итоги,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с. 180.

⑤ С. А. Красильников и др., Судебный процесс над социалистами-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ами (июнь-август 1922 г.) подготовка, проведение, итоги,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с. 189, 190.

能的谢苗诺夫战斗队，但谢苗诺夫越权做事；第四，顿斯科伊批准卡普兰实施个人暗杀，但社会革命党和领导人不承担责任。^① 但是，直到现在都没有确凿的答案。其实，若明白俄国不良的社会条件以及社会革命党的民粹主张，真实的答案立明。

布尔什维克从打算取缔社会革命党开始，就把原本 1919 年 2 月 26 日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的关于特赦所有放弃与苏维埃政权开展武装斗争的社会主义组织的命令丢在了一边。据社会革命党立宪会议党团成员 Н. В. 斯维亚基茨基在 1922 年 3 月 19 日证实，虽然社会革命党的广大党员，特别是中央负责同志在十月革命的初期具有强烈的反对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的恐怖情绪，但自从 1912 年结束恐怖活动以来，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没有一个有关恐怖的正式决议，最后的定调是 1919 年 6 月的第九次党务会议有 2 ~ 3 个发言人提出恐怖问题，但没有获得支持。^② 自从社会革命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对左派和右派的行为作出批判以来，社会革命党就致力于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切尔诺夫称之为第三条道路。虽然第三条道路的探索并不成功，但是却阻止了社会革命党肆无忌惮地推翻苏维埃政权。不是社会革命党对布尔什维克有什么好感，而是最起码布尔什维克还属于社会主义政党，还得到工人和部分农民的支持。基于人民喜欢的就是党支持的民粹派原则，社会革命党对于布尔什维克必然有所顾忌，否则就会失去群众在道义上对他们的支持。社会革命党在第九次党务会议放弃与布尔什维克的武装冲突，寻求和平的斗争方法也再次证明了以上分析。

对于是否放弃恐怖方法从事革命活动，社会革命党一直没有一个原则性的决断。据 Н. И. 拉基特尼科夫 1922 年 3 月 8 日的证词，1918 年 2 月或者 1 月（具体时间记不清了），中央委员会提出了采取恐怖方法反对布尔什维克的问题。大多数中央委员反对恐怖，特别是左派。因为对于社会主义者采取恐怖做法是不允许的。但是，根据中央委员 К. С. 布列沃依证实，在 1918 年 2 月末，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提出了对布尔什维克采取恐怖的问题。据斯维亚基茨基的材料，反对恐怖的有拉基特尼科夫、布列沃依、科甘—别尔施泰因和利哈奇；赞成恐怖的有切尔诺夫、津季诺夫、季莫费耶

① С. А. Красильников и др., Судебный процесс над социалистами-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ами (июнь-август 1922 г.) подготовка, проведение, итоги,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с. 630 - 631.

② С. А. Красильников и др., Судебный процесс над социалистами-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ами (июнь-август 1922 г.) подготовка, проведение, итоги,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с. 619.

夫和戈茨。切尔诺夫反对无条件反对恐怖的中央委员苏姆金（Сумгин）。由于切尔诺夫等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模棱两可，作为权宜之计，社会革命党有时还使用一下恐怖手段以发泄群众的愤怒，如社会革命党军事委员会下设的战斗小组在1918~1919年初炸毁铁路和桥梁时，顺便暗杀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鉴于社会革命党没有正式实施以恐怖手段对待布尔什维克的决议，支持可以偶尔使用恐怖方法对付布尔什维克的中央委员批准谢苗诺夫战斗小组实施暗杀列宁的计划，但要他们自己承担责任也就顺理成章了。就如科诺博列娃所揭示的，是戈茨批准了他们暗杀列宁的计划，是顿斯科伊批准了他们抢劫的计划。^①

社会革命党领导人做了但又不承认自己的所作所为并没有如《新世界报》讲的是政治流氓那样严重，纵观社会革命党在探索第三条道路过程中的反反复复，就可以知道俄国的社会转型之艰难，表现了社会革命党既可爱又可恨的悲剧人生。正如起诉社会革命党的科诺博列娃在起诉报告中所说的：“如果革命需要，那我们应该做也必须做（指暗杀），虽然从人性道德的角度来说，这是不能接受的。”^②

了解了布尔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之间关于起诉理由的争论，就会明白审判过程中布尔什维克为什么会为第二国际和维也纳国际派来为社会革命党辩护的埃米里·王德维尔德、库尔德·罗森菲尔德和泰奥德尔·李卜克内西等辩护人进行监视，也会明白为什么布哈林对三个国际柏林会议上做出的公开审理的承诺被大打折扣。如布尔什维克在审判的过程中组织群众示威游行，声讨社会革命党罪行，在报刊公开社会革命党的反革命行为，等等。

在审判的第二阶段，社会革命党被分成了两组：第一组为中央委员，第二组为普通的社会革命党人。第一组在判决时被执行了最高刑罚——处决。很显然，这是刑事的司法审判按照政治审判执行了。布尔什维克的不宽容引起了国际社会主义者和俄国共产党内部的纷争。俄共中央委员会委派的起诉人之一，教育人民委员 A. 卢那察尔斯基的意见就击中了布尔什维克在审判社会革命党问题上的要害。卢那察尔斯基举出了几个方面，如社会革命党在西伯利亚粉碎高尔察克政权方面的作用。卢那察尔斯基认为：

^① С. А. Красильников и др., Судебный процесс над социалистами-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ами (июнь - август 1922 г.) подготовка, проведение, итоги,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с. 627, 190.

^② С. А. Красильников и др., Судебный процесс над социалистами-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ами (июнь - август 1922 г.) подготовка, проведение, итоги,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с. 150.

“我非常清楚地知道，虽然社会革命党在粉碎高尔察克方面发挥的作用不大，也不尽合理，但是它帮助了粉碎高尔察克，之后又当面责骂他们。我非常清楚地理解，我们从西伯利亚这一段将不会汲取到有利于我们的一些东西，只有 В. И. 伊格纳季耶夫的证明，似乎社会革命党在西伯利亚党的框架内组织了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无党派农民联合会。”^①

接下来，卢那察尔斯基指出了布尔什维克不严肃的做法造成的结果，那就是“社会革命党由于探监引发的误会宣布绝食。结果呢，被审判的左派组织发神经到了极端的程度，他们的辩护人 П. А. 舒宾也发神经说，被审判人费奥多罗维奇的证词是自相矛盾的，因为他几近昏厥。当然了，这是胡说八道，因为没有一个人会因一顿不吃而昏厥，但这件事也证明了参加审判人员的情绪”。卢那察尔斯基认为，允许社会革命党绝食是帮了社会革命党大忙。就连契卡的副主席 И. С. 温施利赫特和最高法院院长 Н. В. 克雷连克都不理解为何要这么恶意地对待被审判者。“这样，英勇地绝食、昏厥、完全退出审判、千方百计地同情被审判的人、痛恨压迫他们的人就有了非常好的理由。这会带来什么？它将使魔鬼跟随被审判者，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这对于我们来说比绝食示威更加坏上百万倍。中央委员会的三人团（捷尔任斯基、加米涅夫、斯大林），我觉得，如果这样的不得体的现象不能立即消除，那么事态将沿着自己应有的逻辑演进。”^②

果然，事情的结果沿着卢那察尔斯基的设想发展了。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被判处了死刑，在他们服刑的过程中受到了非人的待遇。如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伊万诺夫所说：“完全把同志们隔离，失去阅读报纸的权利，没有机会从事严肃的科研工作，得不到充足的散步，监牢空气污浊，基本上变成石头监牢。我们的监禁变成了侮辱和真正的苦役，折磨得我们没有足够的力气。这种情况导致我们绝食。”^③

虽然经过欧洲社会主义者和国内如高尔基这样的人文学者的呼吁，监狱的情况有所好转，对被判处死刑的中央委员做了改判，但是，为了巩固苏维埃政权，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还是通过了关于无限期拘禁社会

① С. А. Красильников и др., Судебный процесс над социалистами-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ами (июнь-август 1922 г.) подготовка, проведение, итоги,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с. 292.

② С. А. Красильников и др., Судебный процесс над социалистами-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ами (июнь-август 1922 г.) подготовка, проведение, итоги,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с. 292 - 293.

③ С. А. Красильников и др., Судебный процесс над социалистами-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ами (июнь - август 1922 г.) подготовка, проведение, итоги,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с. 372.

革命党人的决定，导致被审判的社会革命党把最后的陈述变成了为自己理想献身的宣誓。中央委员莫斯科局的领导人 A. 戈茨一方面谴责布尔什维克通过阴谋夺取政权，声明社会革命党早在 1918 年 1 月 5 日就放弃了各种暴动的尝试；另一方面又把布尔什维克通过新经济政策组织群众产生的贸易活动和野蛮的资本主义形式看做对革命成就的清扫。戈茨为了驳斥布尔什维克对社会革命党的审判导致社会革命党为了活命而放弃自己信仰的观点，提出“将把革命的义务执行到底”的誓言。他说：“我不知道命运判我们是生还是死。如果是死，我们就作为革命者去死，勇敢地直面死亡；如果是生，我们将继续聚集力量，作为社会主义者，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斗争。”中央委员 Н. И. 阿尔捷米耶夫说得更加直接：“你们公布的第 60 条，即因为参加一个以推翻现有制度为目的的组织就判处死刑……难道血腥的沙皇制度会像你们这样镇压自己的对手吗？请记住，公民们……老的沙皇法律条文对于参加以推翻政权为目的的政党也不过判四年苦役，而你们为了这样一个行为判处我们死刑。你们是因我们参加为劳动阶级的权利而斗争的组织而实施的死刑。”最后，阿尔捷米耶夫引用克拉拉·蔡特金的话结束自己的遗言：“对于每一个革命者来说，为了工人阶级的幸福献出了生命，不仅是义务，更是幸福。我们是革命者和社会主义者，走向斗争，时刻准备去我们还没有到达的地方——赴死。我们将自豪地接受你们判处的死刑。”^①

Е. С. 别尔格是一名工人，也是社会革命党人。他说：“我从 15 岁开始就进厂当工人，只是当某一只强有力的手把我拖出了工厂，投入了监狱或流放的时候，我才离开了工厂。我 1905 年和 1917 年都是苏维埃成员，直到你们逮捕了我。我总是在工人中间，1905 年 1 月 9 日我在被沙皇枪杀的工人中间，1918 年 1 月 5 日当你们枪杀工人的时候，我在他们中间。我在无产阶级中间的工作结束于 1919 年 3 月 15 日，当时我是被一个叫拉尔藏的布尔什维克逮捕的……我荣幸地作为社会革命党员 20 年，我从来没有放下过自己的党旗。如果我的同志们被判处了死刑，我将继续他们的事业，继续

^① С. А. Красильников и др., Судебный процесс над социалистами-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ами (июнь-август 1922 г.) подготовка, проведение, итоги,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с. 507 - 508, 511, 519, 520.

我们共同的事业，希望完成他们未竟的事业。”^①

无论是老牌革命家戈茨，还是老工人别尔格，他们顽强地战斗就是因为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不能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他们看到的只是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在争取自由、平等和博爱的过程中获得的自由、平等和功利，而不明白这种功利的道德已经把荣誉和良心看得一钱不值。所以，在社会革命党不参透这个道理之前，其态度是不会发生转变的。相反，由于他们把自由、平等和功利当做理想膜拜，而不明白隐藏在其中的道理，才酿成这样的悲剧。他们说：“我们和你们不同路。我们的目光像从前一样专注于未来，我们不会用任何的功利来换取我们的理想。这个理想就是我们一直以来的理想，你们没有用自己的成功改变它们，也不会用自己的成功替代它们。这就是我们敌视的根源。”^②

社会革命党的理论不能突破自己的禁锢，布尔什维克进一步加之于他们的苦难氛围更强化了他们的禁锢。这种禁锢是属于多数人的，包括处在自身革命状态的布尔什维克。1924年，布尔什维克对社会革命党进行了改判。但是，随着列宁的去世，特别是斯大林教条化的一派占据上风，社会革命党成为自己理论教条的牺牲品。

二 流亡中对第三条道路的再次考验

从第九次党务会议通过了暂停与布尔什维克的武装斗争以来，流亡在国外的社会革命党右派便出面反对。他们提出：“反对欧洲各国政府从法律上承认苏维埃政权，但特别赞成民主化条件下的白军政权；欧洲国家不要承认新组成的波罗的海国家的独立；承认外国入侵俄国；等等。”从克伦斯基给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做出的解释来看，流亡欧洲的社会革命党试图建立一个既反对白军政府，又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权，为此将适度地利用外国人的援助获得在国际会议上平等的伙伴地位。^③ 这些观点又被称为“克伦斯基宣言”。

流亡国外的社会革命党右派是高尔察克政变之后到达巴黎的。最早到

① С. А. Красильников и др., Судебный процесс над социалистами-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ами (июнь-август 1922 г.) подготовка, проведение, итоги,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с. 523.

② С. А. Красильников и др., Судебный процесс над социалистами-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ами (июнь-август 1922 г.) подготовка, проведение, итоги,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с. 542.

③ Marc Jansen,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после октябрьского переворота 1917 года Документы из архива П. С-Р, с. 731, 659.

巴黎的是克伦斯基，1918年6月从伦敦过来，并在1919年与西伯利亚来的右派社会革命党 Н. Д. 阿夫克先基耶夫、В. М. 津季诺夫、А. А. 阿尔古诺夫、Е. Ф. 罗科夫斯基、М. В. 维什尼亚克、А. И. 古科夫斯基、И. Н. 科瓦尔斯基、О. С. 米诺尔、В. В. 鲁德涅夫、М. Л. 斯洛尼姆、Б. Ф. 索科洛夫、И. И. 丰达明斯基—布纳科夫等人组成了侨民协会。^①

巴黎也有社会革命党的国际组织，是社会革命党派驻国外联系国际社会主义组织的专门代表。常驻国外的是 И. А. 鲁巴诺维奇。1918年之后中央委员会又陆续派出了 Н. С. 卢萨诺夫、В. В. 苏霍姆林、Д. О. 加夫龙斯基。到1920年秋，他们共同组成了社会革命党国外代表团，负责向西欧社会通报俄国发生的事件、社会革命党对它的态度以及充任党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代表。^②虽然1919年中央委员会4次确认他们的权力，但是，他们仍然不能得到巴黎右派社会革命党的认可。一方面是因为财政问题；另一方面是因为左右派观念上的分歧。国外代表团在国际社会主义问题上无所作为，如在对待第二国际的问题上，加夫龙斯基和苏霍姆林承认参加国际社会主义中左派力量，对于第二国际只限于通报消息；卢萨诺夫坚持无条件地脱离第二国际，鲁巴诺维奇则坚决反对。社会革命党要想在国际上有所作为亟须确定发展方向。

受俄国复兴联盟的指派，克伦斯基把右派社会革命党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同时发表了确定俄国社会主义者发展方向的“克伦斯基宣言”。为了进一步扩大影响，1919年5月，右翼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 И. М. 佩斯金以及来自俄国共和国同盟的 О. И. 罗森菲尔德共同发表了“致全世界民主派呼吁书”，号召世界民主派帮助俄国民主派，谴责布尔什维克和高尔察克将军专政以及欧洲对他们的承认。^③呼吁书希冀与白军的合作，其目的就是通过俄国民主派的努力和协约国的压力使俄国民主派再生。这种依靠国外力量，忽视俄国专制力量强大的现实强行推行民主必然是对国家和革命利益的出卖。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坚决谴责了社会革命党巴黎小组的卖国行为，认为他们破坏了党的纪律，是对中央和社会革命党国外代表团权力的

① Marc Jansen,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после октябрьского переворота 1917 года* Документы из архива П. С-Р, с. 641.

② А. П. Новиков, В. М. Чернов в годы третьей эмиграции: эстонский период (1920 – 1922), А4, с. 1. <http://socialist.memo.ru/firstpub/y06/novikov2.htm>

③ А. П. Новиков, В. М. Чернов в годы третьей эмиграции: эстонский период (1920 – 1922), А4, с. 3.

篡夺。中央派季莫费耶夫代表中央给巴黎小组写信，要求小组解散，扩大国外代表团的权力；要求国外代表团自我宣布为社会革命党流亡者的中心，同时把国外流亡的社会革命党团结在党的纲领之下。国外代表团感到力不从心，这种力不从心有财力上的，也有观念上的。为了使右派妥协，苏霍姆林参加了社会革命党右派周报《为了俄罗斯》的编辑，而左派报纸《俄罗斯自由》邀请克伦斯基加入。1919 ~ 1920年，几乎是右派社会革命党巴黎小组左右了流亡社会革命党的局势。^①

1920年9月，社会革命党中央为了保护切尔诺夫的安全，决定让他撤退到国外延续社会革命党的使命。切尔诺夫选择了群众基础较好的爱沙尼亚，在首都列维尔（塔林）办了《人民事业报》和《革命的俄罗斯》，后来《革命的俄罗斯》重新成为党的机关报。切尔诺夫的到来加强了中左派国外代表团的力量，同时做了大量团结中左、中右两派的工作。

1921年初，中央委员会在一封信中区分了左中右几派。属于左派的有В. И. 列别杰夫、Ф. Е. 马辛、М. Л. 斯洛尼姆、Е. А. 斯塔林斯基和Г. И. 施赖德尔；中派有И. М. 布鲁施威特、津季诺夫、克伦斯基和米诺尔；右派有阿夫克先基耶夫、布纳科夫、维什尼亚克、古科夫斯基、科瓦尔斯基、罗科夫斯基和鲁德涅夫。^② 切尔诺夫作为党的理论家虽然偏左，但还能够做左右之间的协调工作。

切尔诺夫在1920年的9月份已经开始着手建设性社会主义的探索，这是对第三条道路的总结。切尔诺夫对于第三条道路的追求在于平等，也就是平等的法律意识。切尔诺夫希望尊重农民，当出现侵犯农民利益的时候，国家通过拨地或者割地以及征收累进税实现平衡。当然，切尔诺夫意识到，土地社会化不是一天能够实现的，他在消费定额和劳动定额之间寻求平衡。但是，切尔诺夫困惑的是他总不能找到合适的方法加以推行，陷入了有关平等的误区。他指责布尔什维克缺乏保护农民的法律意识，通过新经济政策为富农的出现创造了条件。^③ 切尔诺夫与布尔什维克的不同在于他站在农民的立场上争取平等的权利，反对对农民意识的任何强加；而布尔什维克

① А. П. Новиков, В. М. Чернов в годы третьей эмиграции: эстонский период (1920 – 1922), А4, с. 5.

② Marc Jansen,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после октябрьского переворота 1917 года Документы из архива П. С-Р, с. 642.

③ Marc Jansen,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после октябрьского переворота 1917 года Документы из архива П. С-Р, с. 697.

则站在科学公理的立场上面对平均主义和私有制的问题，先后进行了战时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的探索。让切尔诺夫不明白的是，自己尊重农民的法律意识，引来的却是农民的反对；布尔什维克把“自己的意识”强加给农民，却逐渐掌握了农民。这就是切尔诺夫一方面坚决反对布尔什维克排挤其他反对党，另一方面又不与布尔什维克进行武装斗争的原因。这也是党的第十次党务会议确定对外要承认苏维埃政权，但是在内部还要反对布尔什维克专政的原因。

但是，切尔诺夫在社会革命党遭遇布尔什维克抓捕和审判的过程中越来越声讨布尔什维克的专制，立志推翻布尔什维克政权。如他在离开俄罗斯之前说：“我声明，我不仅不相信布尔什维主义的演变，而且从来不保证布尔什维克完全相信。我非常熟悉，在他们的环境中占统治地位的是特别的政治上的非道德主义或者道德虚无主义。为了自己的胜利，他们可以做出任何庄严的承诺并且又毫无良心地破坏它们。”^①在切尔诺夫眼里，宗教信仰从来都是人们怕死而发明出来的一种东西，是个人的事情，他从来没有把它看做超人的意志。当遭遇布尔什维克考验的时候，切尔诺夫马上放弃了关于社会主义的探索，开展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斗争。切尔诺夫把民主，特别是平等看做第三条道路的精髓，这常常使他陷入左右摇摆的境地。在接下来右派社会革命党进一步争取民主而放弃国家利益和社会主义原则的时候，切尔诺夫又一次扮演起和稀泥的角色。

流亡的社会革命党主要的活动方式是办刊物。办刊物就需要大量的资金。为了获得俄国在国外的资产，克伦斯基成立了超党民主联合会（внепартийное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е объединение）。一方面，克伦斯基与捷克斯洛伐克的外交部长 Э. 贝尔斯签署了有关“组织拨款”的协议；另一方面，捷克斯洛伐克总统马萨里克与米留科夫的关系闹僵。克伦斯基的超党联合会大部分是右派社会革命党，之所以称为超党，一来可以超越意识形态，以立宪会议成员而不是某一个党的代表接管捷克斯洛伐克军团从俄国带出来的属于俄国人民的黄金；二来可以对散落于国外的各种社会力量进行整合，特别是对社会革命党左派。克伦斯基的承认不允许外国武装力量干涉俄国内部政治斗争和经济封锁，特别是认为在现在复杂条件下与布尔什维克政权开展武装斗争以及组织政治联合为时过早、不太合适，也进

^① В. М. Чернов, *Перед бурей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Нью-Йорк,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имени чехова, 1953, с. 401.

一步弥合了社会革命党左右两派的裂痕。^① 切尔诺夫走上了通过克伦斯基整合社会革命党的发展道路。

实际上,超党联合会是一个流亡在国外的民主派力量的政治组织,它的主要目的就是在外国政府面前发出民主派的声音。^② 超党联合会又称为行政中心(Административный центр),总部设在巴黎,在欧洲各主要国家都设有分部,最大的分部在布拉格。超党联合会的主要工作就是信息出版活动。如资助布拉格出版《俄罗斯自由》(Воля России),列维尔出版了《人民事业报》(Народное дело)和《为人民》杂志(За Народ),巴黎出版了《现代人札记》(Современные записки)和信息简报《为了俄罗斯》(Pour la Russie),在罗马出版了《俄罗斯劳动报》(La Russia del Lavoro)。形成了左派布拉格列维尔的《俄罗斯自由》、《人民事业报》,中右派巴黎的《为了俄罗斯》和右派巴黎的《现代人札记》三个中心。切尔诺夫在列维尔办的《革命的俄罗斯》(第十次党务会议确立为社会革命党中央机关报)也获得了资助。作为探索俄国民主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一条路径,该杂志经常刊登类似津季诺夫、拉扎列夫、列别杰夫、克伦斯基、米诺尔、鲁巴诺维奇、卢萨诺夫、斯洛尼姆、Г. 施赖德尔等人的文章,把他们团结在一起。^③

业务上的联系增进了切尔诺夫和克伦斯基之间的了解。切尔诺夫为了让克伦斯基发挥协调作用,主动给克伦斯基写信,称赞克伦斯基富有革命的激情,希望克伦斯基能够回到政治的舞台,即加入社会革命党国外代表团中来。但是,克伦斯基礼貌地拒绝了切尔诺夫的邀请。^④

1921年1月8~21日,根据阿夫克先基耶夫、克伦斯基和米诺尔的倡议,流亡到欧洲的56名俄国立宪会议成员中的33名在巴黎召开了大会。从党派来看,这33名代表中有社会革命党人22名,立宪民主党人5名,十月

① А. П. Новиков, В. М. Чернов в годы третьей эмиграции: эстонский период (1920 - 1922), А4, с. 6.

② Marc Jansen,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после октябрьского переворота 1917 года Документы из архива П. С-Р, с. 659.

③ А. П. Новиков, В. М. Чернов в годы третьей эмиграции: эстонский период (1920 - 1922), А4, с. 12, 9.

④ А. П. Новиков, В. М. Чернов в годы третьей эмиграции: эстонский период (1920 - 1922), А4, с. 15 - 16.

党人1名，人民社会党人1名，少数民族代表4名。^①会议的发起者是聚集在米留科夫和M. M. 维纳韦尔周围的立宪民主党巴黎小组，其目的是在国外建立一个由立宪会议成员组成的代表机关。立宪民主党的想法符合右派社会革命党的想法，即在国外建立一个继承三月革命（1917年二月革命）遗产的共和国民主机关，反对布尔什维克专政。与立宪民主党的合作不符合社会革命党中央精神，克伦斯基、阿夫克先基耶夫等人就单独给立宪会议成员发了一个呼吁书，召开立宪会议成员会议。右派社会革命党与立宪民主党合作等于放弃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目标，其实会议就如右派立宪民主党B. Д. 纳博科夫和И. В. 格森所认为的那样，是克伦斯基想利用此办法夺回临时政府在国外寄存的资金，作为国外流亡者活动的经费。^②召开会议的的主张不仅遭到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左派社会革命党、乌克兰委员会、西伯利亚委员会等社会革命党组织的反对，而且遭到了多数立宪民主党的反对。他们提出的理由是违背了政党原则。

会议选出了执行委员会，参加者有社会革命党的阿夫克先基耶夫、津季诺夫、克伦斯基、H. B. 马克耶夫和米诺尔；立宪民主党有米留科夫、维纳韦尔和科诺瓦罗夫，穆斯林代表C. H. 马克苏多夫。社会革命党罗科夫斯基和哥萨克代表B. A. 哈尔拉莫夫为候补委员。

根据原则，切尔诺夫坚决反对会议的召开。但是，切尔诺夫本着妥协的原则参加了这次会议，其目的是亲自了解流亡者的情况并说服克伦斯基和津季诺夫这样的人物，孤立右派。切尔诺夫在巴黎逗留了两个月，拜会了流亡在欧洲各大城市的俄国政治人物，了解了国外代表团由于经济原因而完全无所作为的局面。切尔诺夫没有作为官方人士正式出席会议，但他还是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影响民主派人士朝着有利于社会革命党方针的方向发展。如据切尔诺夫说，在他的影响下，决议谴责外国人的入侵以及在俄国确立任何的军事专政，认为经济封锁俄国也是不合适和不能允许的。切尔诺夫坚持接受针对全世界社会主义政党的社会革命党立宪会议党团呼吁书，旨在警告欧洲社会主义者不要把俄国革命和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混淆起来，因为布尔什维克社会主义掏空了社会主义的灵魂——自由，

^① Marc Jansen,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после октябрьского переворота 1917 года* Документы из архива П. С-Р, с. 644.

^② А. П. Новиков, В. М. Чернов в годы третьей эмиграции: эстонский период (1920 - 1922), А4, с. 16, 17.

留下的只是国家共产主义的奴役。^①

表面上看来，切尔诺夫给立宪会议成员施压影响了会议的决议，但实际上会议并不承认苏俄，同时组成了反对苏俄的执行委员会。切尔诺夫承认这是自己的失败。但是，从他对1921年1月28日和2月4日收到的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指责他参加会议的信的回复来看，他忽视了社会革命党右派与国内中央委员会之间的原则分歧：右派社会革命党放弃了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而国内中央委员会则在如何发展俄国问题上与布尔什维克进行较量。他认为中央委员会对巴黎会议的反应是病态的，是俄国兴起的反布尔什维克的人民运动、极端地怀疑某种复辟和非社会主义力量，怀疑各种与他们的结盟使然。他给中央委员会写了一封简短的信，要求中央能够改变决议，以缓和中央与右派社会革命党之间的矛盾。^②

从西方对苏俄的态度以及俄国国内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及其地方社会革命党组织对切尔诺夫做法的抗议来看，切尔诺夫完全成为右派社会革命党的俘虏，不仅重新走上与有产者联合的道路，而且彻底放弃了探索俄国第三条发展道路的努力。据维什尼亚克回忆，旨在建立自由民主俄国的米留科夫和阿夫克先基耶夫的主张并没有得到外国人的支持，1921年3月16日，英、俄在伦敦签署了贸易协定。3月18日，俄、波签署了对双方都有利的里加条约，结束了1919~1920年的俄波战争。执行委员会只存在了一年就销声匿迹了。^③ 西伯利亚社会革命党边区委员会对于切尔诺夫的妥协态度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组织包括与主要的入侵队伍、高尔察克、邓尼金等有着血肉联系的立宪民主党在内的政治委员会违背了我们的政策，无疑，也有害于我们同布尔什维克斗争的事业。不仅如此，这些行动大大地阻碍了我们党的工作，它们将帮助人们对我们形成不好的印象，破坏我们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威信。”^④ Ю. О. 马尔托夫更是形象地把它看做“社会革命党与布尔什维克斗争最有利的时刻送给布尔什维克的一个最大的

① А. П. Новиков, В. М. Чернов в годы третьей эмиграции: эстонский период (1920 – 1922), А4, с. 18.

② А. П. Новиков, В. М. Чернов в годы третьей эмиграции: эстонский период (1920 – 1922), А4, с. 20.

③ Вишняк Марк, Годы эмиграции. http://www.e-reading.org.ua/bookreader.php/11613/Vishnyak_-_Gody_emigracii.html

④ А. П. Новиков, В. М. Чернов в годы третьей эмиграции: эстонский период (1920 – 1922), А4, с. 20.

礼物。”

果真，接下来，切尔诺夫在利用喀朗施塔德事件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过程中遭到了喀朗施塔德水兵的拒绝。这样，喀朗施塔德的失败、国外社会革命党在给予国内起义者以军事援助的软弱无力，社会革命党流亡者的内部矛盾以及党在俄国的绝望形势动摇了超党联合会在它的同盟者及其庇护者眼中的地位。英国，特别是法国逐渐失去了对流亡的俄国右派集团的兴趣。这个无党派组织事实上从1921年夏天就已经遇到了严重的财政困难。1922年4月，跨党组织因财政匮乏问题宣告解散。^①

社会革命党国外代表团也因无党派组织而陷入危机。1921年6月1日，立宪会议成员会议的15名社会革命党党团成员（即右派社会革命党）给中央委员会来了一封信，谴责中央委员会1921年2月4日和4月5日对他们做出的决议，认为自己召集立宪会议成员会议绝不是破坏党的纪律，而是完成党和俄国民主派所需要的事业，为了开展政治上反布尔什维克的工作必须与左派立宪民主党合作。这封信是根据切尔诺夫的建议写的，曾经反对这次会议的斯洛尼姆和苏霍姆林也在这封信上签了字。^②

1921年6月末，切尔诺夫收到了H. H. 伊万诺夫的通知，通知说，中央组织局坚决要求所有党员退出全俄立宪会议成员会议执行委员会。据列维尔的马辛讲，由于社会革命党参加全俄立宪会议成员会议执行委员会，有许多的党员离开了党组织。中央组织局和莫斯科党组织要求国外社会革命党不仅要考虑自身的情况，也要考虑俄国劳动人民的心理。但是右派社会革命党不仅不执行退出的决议，而且写文章为联合政策辩护。1921年8月，第十次党务会议向国外社会革命党发布命令，立刻组成党小组，由国外代表团领导国外社会革命党的整个工作。会议确定了国外代表团的任務，希望他们不是把希望寄托于外国政府，而是寄托于国际社会主义工人组织；不是与立宪民主党人联合，而是与国外的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联合，协调政治斗争，建立统一的民主社会主义阵线。1921年10月19日，中央组织局责令国外代表团确定结束有关立宪会议代表团问题的日期、停止他们活动的条件和形式，责令由切尔诺夫、苏霍姆林、卢萨诺夫和津季诺夫

① А. П. Новиков, В. М. Чернов в годы третьей эмиграции: эстонский период (1920 - 1922), А4, с. 25.

② А. П. Новиков, В. М. Чернов в годы третьей эмиграции: эстонский период (1920 - 1922), А4, с. 26.

新组成的国外代表团完成这项工作。^①

第十次党务会议的决议和中央委员会的命令对于切尔诺夫是一个考验。右派社会革命党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方针，但为了获得中央的信息，1921年11月10日开会批准津季诺夫脱离全俄立宪会议成员会议执行委员会，加入国外代表团，代表右派和中右派社会革命党的利益。1921年11月15~16日，国外代表团也在巴黎召开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鲁巴诺维奇、卢萨诺夫和苏霍姆林，津季诺夫正式宣布退出执行委员会。经切尔诺夫同意，会议讨论了国外代表团的人员问题。会议坚决执行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津季诺夫也支持中央的决定。然而，津季诺夫执行决定并不彻底，他提出了几项条件：第一，希望中央委员会不要立刻执行决议，而是等到立宪会议成员会议执行委员会没有资金时自动解散，鉴于中央的纪律，自己退出中央委员会；第二，坚持要求克伦斯基加入国外代表团；第三，希望把总部设在巴黎。^②

针对以上情况，切尔诺夫对于国外社会革命党的情况做了总结。他认为，国外社会革命党工作的无作为说明了党分立政策的失败。他借选择国外代表团新地址的契机，改变了国外社会革命党的方针，希望未来的国外社会革命党加强党的工作。为了协调行动，他建议取消国外代表团这个提法，把新的总部设在靠近俄国的地方，克伦斯基由于特别强调个人印记不合适加入。最后，在切尔诺夫的建议下，新的国外代表团成员由津季诺夫、鲁巴诺维奇、卢萨诺夫、苏霍姆林和切尔诺夫组成。津季诺夫为候选人，等待他退出执行委员会。

1921年12月16日至1922年1月8日，在布拉格召开了国外代表团第一次会议。参加者有切尔诺夫、津季诺夫、鲁巴诺维奇、卢萨诺夫、苏霍姆林和《革命俄罗斯》的编辑波斯特尼科夫。会议讨论了加强与国外工人和社会主义政党的联系，恢复统一的社会主义国际；与乌克兰、白俄罗斯社会革命党、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亚美尼亚民族党社会革命派、哥萨克民主派的联系；讨论了在外交上承认苏维埃政府、俄国国债、给俄国提供贷款，对远东共和国的态度以及帮助苏联监狱中的社会革命党等问题。最后，会议确定了集中主义原则，把总部初步设在布拉格。由于党的出版物

① А. П. Новиков, В. М. Чернов в годы третьей эмиграции: эстонский период (1920 - 1922), А4, с. 27.

② А. П. Новиков, В. М. Чернов в годы третьей эмиграции: эстонский период (1920 - 1922), А4, с. 27.

安顿在柏林，计划把国外代表团办事处设在柏林。卢萨诺夫和鲁巴诺维奇驻在巴黎，便于与社会主义组织的联系。超党派联合会和执行委员会问题转回社会革命党中央局。这次会议以切尔诺夫重新回到中左派并在国外代表团站稳脚跟而告结束。^①

1922年4月6日，国外代表团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全俄立宪会议成员会议执行委员会成员不迟于4月15日解散该组织。津季诺夫拒绝投票，认为时间太短。1922年5月23日，中央局通过国外代表团决定等待执委会对最后通牒的回答。1922年11月，国外代表团再次写信给相关人员询问执委会的事情。阿夫克先基耶夫、马克耶夫和罗科夫斯基没有回复。1923年2月再次收到国外代表团的一封信。阿夫克先基耶夫回信通知国外代表团“全俄立宪会议成员会议执行委员会早在1922年9月就根据立宪会议成员的投票取消了”，并质问其动机。国外代表团因地下报纸《俄罗斯之声》登载的关于开除阿夫克先基耶夫和布纳科夫的消息而取消了开除他们出党的命令。^②

切尔诺夫的出尔反尔，不仅激化了自己与社会革命党左派的矛盾，而且激化和了右派社会革命党的矛盾。在国外形成了以巴黎为据点的右派社会革命党和以布拉格为据点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两个中心。国内形势由于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成员的被捕和审判而日益严峻。

为了缓和国外社会革命党之间的矛盾，1923年11月16~24日，在布拉格召开了第一次国外社会革命党组织代表大会。会议选举了社会革命党国外组织州委员会领导党在国外的组织。参加州委员会的有В. Я. 古列维奇、列别杰夫、马辛、米诺尔、И. М. 涅斯捷罗夫和罗科夫斯基。国外代表团只负责联系俄国和社会主义国际的工作。1923年末，国外代表团与《革命的俄罗斯》杂志从柏林迁到了布拉格。1925年4月24日，中央局批准古列维奇、波斯特尼科夫、斯洛尼姆、斯塔林斯基、苏霍姆林、切尔诺夫和Г. 施赖德尔为国外代表团的新成员。

综合1920~1925年切尔诺夫的行动看，切尔诺夫的联合以失败结束。

① А. П. Новиков, В. М. Чернов в годы третьей эмиграции: эстонский период (1920–1922), А4, с. 29–30.

② Marc Jansen,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после октябрьского переворота 1917 года Документы из архива П. С-Р, с. 709, 647.

三 社会革命党的结局

1925年对于社会革命党来说是一个转折点。从国内的情况来看，社会革命党经过布尔什维克的审判已经失去了任何威力；从国外的情况来看，社会革命党由于不能获得国外民主派和社会主义政府的有力支持而陷入为生计奔波的命运。

社会革命党为什么会陷入为生计奔波的困境，这与社会革命党放弃对俄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而追求抽象的民主有关，当然更与俄国也陷入同样的命运有关。布尔什维克从1921年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经历了三步走战略，即以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工业的国家资本主义以及农村的合作化，三步战略可以说把新经济政策从向农民的让步转向向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是抽象的社会主义与俄国社会现实的对接，不仅接受了资本主义，而且接受了村社集体主义。列宁把国家资本主义看做“实现社会主义的全部条件”，把“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制度”看做“社会主义的制度”。^①列宁留下的最大疑问就是他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改变了其真实意蕴，给后来的学者留下了无限争论的空间。大部分学者把新经济政策看做列宁在经济领域做的一次市场经济的尝试，并把新经济政策的失败归结为没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②

其实，对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解读面临的最大的一个误区就是把新经济政策看做“向资产阶级和农民所做的一个让步，所依据的理由是俄国落后，不具备立即实行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需要通过市场来改变资源配置的方法，促进生产的发展，为社会主义准备条件”。^③这样就把社会主义与前资本主义的文化对立起来，摆出了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作为社会主义者必然提出，为什么俄国实现了社会主义还要向资本主义倒退，这不是重新陷入剥削吗？如果党和政府不允许反对派提意见势必使得党和政府陷入官僚主义的泥潭。这是左派共产主义者提出的问题，也是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提出的问题。列宁对这个重大理论问题即抽象的社会主义与具体的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留下了影响党内团结和国内团结的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493、771页。

^② 郑异凡：《在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十字路口——新经济政策研究（1921-1929）》，参见沈志华主编《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上册，第187页。

^③ 沈志华主编《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上册，第167页。

巨大隐患。1922年布尔什维克对社会革命党的审判以及1925~1929年布尔什维克的党内斗争都是这个理论没有获得突破产生的恶果。

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理论，也是一种实践，不仅是一种抽象，也是一种现实。列宁在《论合作制》一文中说：“从实质上讲，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使俄国居民充分广泛而深入地合作化，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因为现在我们发现了私人利益即私人买卖的利益与国家在这种利益的检查监督相结合的合适程度，发现了私人利益服从共同利益的合适程度，而这是过去许许多多社会主义者碰到的绊脚石。”^①如果说列宁在合作社当中找到了公私结合的度就是找到了社会主义，那么，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社会主义道路也就落到了实处。遗憾的是，列宁来不及把它推广开来，它最终被党派之争消灭。这样，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俄国与西方就对立起来。也同样由于这样一个理论不能突破，导致共产国际和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之间的分裂。

1923年5月召开的第二国际和维也纳国际合并的汉堡会议上，英国的代表贝雅特里奇·韦伯提出一个问题：俄国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能否被允许参加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因为他们在国内反对社会主义政府。^②虽然这个观点遭到了与会者的反对，但是韦伯提出的却是如何看待俄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问题。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共同参加了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但是他们揭露俄国布尔什维克政权的专政和恐怖性质的举动遭到了英国的抵制。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为了在国际局的席位问题打得不可开交。社会革命党在1925年8月22~27日的马赛国际代表大会上派出了考茨基出席。^③

1926年4月在苏黎世组成了委员会以解决这个问题。孟什维克的P. A. 阿布拉莫维奇、社会革命党的E. A. 斯塔林斯基和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И. Г. 策里铁里作为第三方调停人参加了委员会。阿布拉莫维奇为孟什维克辩护，理由是社会革命党在俄国已经被消灭，没有党组织，没有出版党的文献，也没有年轻人加入。斯塔林斯基引用8月20日斯洛尼姆和波斯特尼科夫给他的信证实，由于布尔什维克的迫害，党的人数很少，行动也很秘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768页。

② Marc Jansen,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после октябрьского переворота 1917 года Документы из архива П. С-Р, с. 592.

③ Marc Jansen,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после октябрьского переворота 1917 года Документы из архива П. С-Р, с. 593.

密, 党的出版文献 1925 年已经停刊, 党的刊物《革命的俄罗斯》从国外偷运回俄国。然而, 党在苏联还是比较活跃并在青年中有影响, 尽管遭到苏联政府的取缔, 但不能证明社会革命党不存在了。最后结局是, 孟什维克保留了在社会主义国际局的代表位置, 社会革命党只在执委会保留了自己的位置。^①

1926 年 6 月 16 日, 社会革命党国外代表团冲突再起。代表团中的苏霍姆林和古列维奇发生了矛盾。苏霍姆林要求古列维奇退出代表团, 得到了斯洛尼姆和斯塔林斯基的支持。作为妥协, 波斯特尼科夫建议三人都退出, 由全会讨论。斯洛尼姆、斯塔林斯基和苏霍姆林支持波斯特尼科夫的建议。然而切尔诺夫、古列维奇和 Г. 施赖德尔认为不合法, 离开会议, 拒绝参加代表团的其他会议。国外代表团分裂了。波斯特尼科夫、斯洛尼姆、斯塔林斯基和苏霍姆林认为自己是多数派, 切尔诺夫、古列维奇和施赖德尔把卢萨诺夫拉到自己一边以示对抗。不久, 切尔诺夫小组抓住了机关报《革命的俄罗斯》。苏霍姆林被开除出编辑部, 不久波斯特尼科夫辞职。1927 年 10 月, 苏霍姆林在巴黎创办了自己的杂志《社会革命党》。^②

在社会革命党国外代表团陷入分裂的情况下, 切尔诺夫从国外代表团中独立出来, 组成新东方联盟。参加的主要是加入苏联的乌克兰、白俄罗斯、亚美尼亚的少数民族代表, 提出了民族自决的主张。切尔诺夫的民族自决旨在建立由类似波兰、芬兰和波罗的海共和国组成的超国家联合体, 这对当时追求联合的护国派来讲无异于肢解俄国。反对切尔诺夫的社会革命党人苏霍姆林认为, 新东方联盟的纲领脱离了党的纲领。克伦斯基等右翼社会革命党以《日子报》为阵地支持苏霍姆林。孟什维克也反对切尔诺夫的新东方政策。1928 年 3 月, 切尔诺夫中断了与社会革命党国外组织州委员会的联系, 组建了社会革命党国外联盟。而其余的社会革命党组织组成了广泛的联盟: 包括以阿夫克先基耶夫、布纳科夫、鲁德涅夫、维什尼亚克为首的《现代人札记》小组, 以克伦斯基、津季诺夫为首的《日子报》小组, 以斯洛尼姆、斯塔林斯基、苏霍姆林、列别杰夫为首的《俄罗斯自

① Marc Jansen,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после октябрьского переворота 1917 года Документы из архива П. С-Р, с. 737.

②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России,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с. 451.

由报》小组。^①

1928年4月29日~5月6日，社会革命党国外组织在巴黎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切尔诺夫的国外联盟没有参加会议。

切尔诺夫左派与阿夫克先基耶夫、津季诺夫中右派的争论焦点在于社会主义的真谛。切尔诺夫坚持革命的社会主义，也就是在俄国这样一个农民没有开发的社会建立民主社会，正如维什尼亚克所讲，这种表述只是限于否定专政，没有一种正面的东西可以替代。^②经历了追求民主而不断失败的右派社会革命党终于转向宗教，希望通过振兴宗教而走向社会主义。鲁德涅夫不是政党和教会结合的支持者，因为在俄国教会常常成为政治的附庸。社会主义国际委员会希望社会革命党两派联合，让切尔诺夫做正代表，苏霍姆林做副代表。1930年5月9日谈判在柏林开始，1931年末谈判停止，妥协没有达成。

从此以后，切尔诺夫把重点转向对社会主义的理论探索。他曾经在旧金山发表演讲，宣传社会革命党的主张，遭到美国共产党的攻击。切尔诺夫还支持把俄国农民移民墨西哥的计划，建立美国斯拉夫移民托拉斯，帮助俄罗斯农民流亡者向美洲移民；还写作了《建设性的社会主义》一书探索俄国的社会主义道路。

随着苏联农业集体化的实施，社会革命党内部又开始了对苏联农业集体化与土地社会化关系的探索。用鲁德涅夫的话说，农业集体化的野蛮方法引起了社会革命党的厌恶，他们当中谁也不会无条件地接受它，至少一些人在经历之后不太相信：一半肯定，一半否定。1930年，米诺尔认为，布尔什维克实行集体化虽然有些歪曲，但是实现了社会革命党纲领的某些要点。苏霍姆林在《俄罗斯自由报》上同样表达了对集体化的一些正面的观点。鲁德涅夫则坚决否定农业集体化，他从中看到的是国家种植园、农民大规模地农奴化。阿尔汉格尔斯基说，农业集体化不是合作化，而是国家工役制，等等。^③

切尔诺夫把农业集体化与国家主义联系起来，反对农业集体化。他利

① *Marc Jansen*,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после октябрьского переворота 1917 года* Документы из архива П. С-Р, с. 739.

② *Вишняк Марк*, *Годы эмиграции*. Гл. 5. http://www.e-reading.org.ua/bookreader.php/11613/Vishnyak_-_Gody_emigracii.html

③ *Marc Jansen*,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после октябрьского переворота 1917 года* Документы из архива П. С-Р, с. 743.

用马克思主义就是过分强调工业而忽视农业的观点，指责农业集体化就是通过牺牲农民的利益加强工业化，是“城市共产主义对劳动者农村的专政”。切尔诺夫认为“政权找到了打通无产阶级公民积极性的新形式（突击运动），它努力支持它的道德精神，在宣传时宣布工人为新社会建设的先进队伍。”切尔诺夫把这种制度视为垂直动员，通过这个可以接受的广泛民主阶层的构成，使成千上万的天才和有毅力的工人和农民代表可以沿着社会的台阶上升，充实整个苏联的上层社会。切尔诺夫不认为这是苏联倒退回资本主义，而是借用奥地利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 P. 希法亨的观点称之为“极权的国家经济”，或者称之为“具有内在平衡和演变成更加成熟、典型和完整形式的特殊倾向的国家主义”。切尔诺夫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批判这种主义忘掉了“人本身”，而“更加荣耀的新文化不能建立在消灭人的基础上”。^①

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不能不关注法西斯制度。法西斯制度对于流亡的社会革命党来说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现实问题。正是因为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日益兴起，他们失去了在欧洲，特别是柏林的活动基地。苏联遭受德国入侵之后，他们不得不迁往美国。对于法西斯的态度，社会革命党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希特勒进攻苏联之前，第二个阶段是从卫国战争开始到 1943 年，第三个阶段是从 1943 年到战争结束。^② 战前的观点基本上把共产主义制度与法西斯制度联系在一起。如 1933 年 3 月 16 日社会革命党巴黎组织通过决议说，“无论是苏联政府，还是完全支持它的共产国际，在同希特勒法西斯斗争的过程中不可能成为社会主义民主的同盟”。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结成统一战线是有害的。^③

苏霍姆林小组对统一战线并不持否定态度，在巴黎组织通过决议之后，斯洛尼姆、斯塔林斯基和苏霍姆林等人主动和切尔诺夫寻求接近。他们在 1935 年 10 月 10 日给社会主义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中提出和共产党建立统一战线的条件，即在苏联恢复民主自由，恢复社会国际中的生存权。此时的切尔诺夫把建立统一战线的条件也设定在苏维埃政权民主化

① O. B. Коновалова, В. М. Чернов о путях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и, с. 193, 196, 198, 204, 203.

② O. B. Коновалова, Неонародническая эмиграция в США и Россия во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е, <http://socialist.memo.ru/firstpub/y05/konovalova.htm>

③ Marc Jansen,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после октябрьского переворота 1917 года Документы из архива П. С-Р, с. 743.

上，因为他认为“法西斯和共产主义者在意识形态上是同一类型的反民主”^①的思想。

希特勒德国和日本法西斯对苏联战争危险的增加激发了社会革命党的爱国热情。1932年3月20日，社会革命党国外组织州委员会就日本占领满洲里通过决议，呼吁社会革命党在日本和苏联发生武装冲突的情况下和自己的人民站在一起，用各种方法阻止夺取俄国领土的各种尝试。1936年1月8日，列别杰夫、马辛、斯洛尼姆、斯塔林斯基、苏霍姆林和社会革命党国外州委员会的技术人员B. C. 米纳霍林在巴黎发表声明。声明说：“鉴于俄国遭遇进攻，所有的社会革命党都将尽力保卫祖国。”从1936年1月开始，列别杰夫、斯洛尼姆在巴黎参加了“俄国国外护国运动委员会”。斯洛尼姆发表文章谴责流亡者对于苏联的否定态度，主张努力保持与俄国的精神联系。列别杰夫欢迎一切有利于扩大俄国武装、工业和道德力量，提高其在国际政策中的比重，保证可靠的盟国的一切措施。马辛甚至在1938年出版了夸奖苏联军队的书籍，后来加入了南斯拉夫共产党并死在了南斯拉夫。^②

苏霍姆林在父亲B. И. 苏霍姆林的影响下，最早通过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文献思考布尔什维克对俄国发展道路的探索。苏霍姆林在1940年2月23～25日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执委会最后一次会议期间见到切尔诺夫的时候曾否定自己与布尔什维克的关系，但是他通过捷克人提出不加任何诋毁苏联政治荣誉地合法返回俄国的建议，指出了民主派表现出来的共同的不独立性和软弱性，认为法西斯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这两个真正的对抗者之间的斗争对于欧洲的命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③

流亡的社会革命党内部出现的亲苏主义情绪曾经受到欧洲社会主义者和右派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的反对。一些为苏联辩护的社会革命党甚至遭到欧洲当局的逮捕。但在1941年6月22日德国入侵苏联之后，去往美国路上的苏霍姆林就写下了《致俄国流亡者书》，呼吁俄国流亡者支持苏联政府。他说：“每一个俄国爱国者的义务就是在他们反对德国侵略者及其走狗

① О. В. Коновалова, В. М. Чернов о путях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и, с. 267.

② Marc Jansen,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после октябрьского переворота 1917 года Документы из архива П. С-Р, с. 745, 746.

③ Marc Jansen,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после октябрьского переворота 1917 года Документы из архива П. С-Р, с. 751.

的斗争中全力和不加任何条件地支持苏联政府和红军……俄国流亡者应该忘记过去的一切牢骚和分歧，牺牲一切达到一个目的——摧毁德国军队，解放德国占领的俄国领土。”^① 苏霍姆林的建议得到了多数社会革命党的支持。社会革命党对法西斯的态度也随之发生改变。

随着苏德战争临近，流亡的社会革命党人陆续到了美国。他们主要有克伦斯基、阿夫克先基耶夫、维什尼亚克、津季诺夫、列文和切尔诺夫。之前形成的社会革命党纽约小组，成为流亡社会革命党的中心，办起了新杂志《为了自由》。1941年5月出版了第一期。德国突袭苏联之后，右派社会革命党如一战时一样重操护国主义旗帜，不过提出的前提条件是苏联政府必须停止同人民的战争，特别是同农民战争，走上这条道路的第一步就是实行普遍的政治大赦。^② 维什尼亚克说：“我们是俄国和欧洲的爱国者，也是民主派和社会主义者。我们的爱国主义经常与一定的政治文化形式和公民水平联系在一起。所以，俄国的政治家和爱国者无权不在人民与制度、国家利益与政权利益之间做出区分。我们相信，俄国人民既不是尼古拉二世能够弥补的，也不是斯大林能够弥补的，正如同德国人民既不是希特勒能够弥补的，也不是戈培尔能够弥补的一样。”^③

切尔诺夫不赞成为了民主的胜利而使苏联失败的做法。他认为布尔什维克制度的崩溃也就是国家和人民的灾难。他在1943年之后完全寄希望于苏联胜利之后民主制度的改变。但是，切尔诺夫深信，斯大林进攻希特勒是西方帝国主义祸水东引的结果，东方战线如果没有盟国的援助不可能发生根本的改变。^④

社会革命党主流罔顾布尔什维克在现代化中取得的成就，简单地把它归结为苏维埃制度只是在这个时候比资产阶级民主国家更加稳定和具有生命力，忽视了布尔什维克对广大社会基础的依靠，是简单地把国家主义与资本主义对立起来的表现。其实，法西斯主义深植于西方文明基础之中。^⑤

① *Marc Jansen*,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после октябрьского переворота 1917 года* Документы из архива П. С-Р, с. 753.

② *Marc Jansen*,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после октябрьского переворота 1917 года* Документы из архива П. С-Р, с. 753.

③ *О. В. Коновалова*, *В. М. Чернов о путях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и*, с. 290.

④ *О. В. Коновалова*, *В. М. Чернов о путях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и*, с. 287.

⑤ *О. В. Коновалова*, *В. М. Чернов о путях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и*, с. 283.

1942年初，苏霍姆林因与右翼社会主义者的分歧而退出了纽约小组，与此同时，斯洛尼姆、斯塔林斯基、列别杰夫及其妻子、М. И. 雅科夫列夫兄弟也离开了纽约小组。斯塔林斯基在纽约期间继续编辑亲共产主义报纸，战后回到了法国。他以各种笔名激烈地抨击俄国社会主义者的反共产主义的行为，1945年10月造访了苏联驻外使节。1947年，他接受了苏联国籍，1951年到捷克斯洛伐克治病。法国以此为由把他作为共产主义间谍驱逐。他于1954年回到苏联。

在苏联取得卫国战争胜利的时刻，回到苏联成为一种潮流。1945年2月12日，曾在俄国临时政府时任驻法国大使的В. А. 马克拉科夫率领立宪民主党访问了苏联驻巴黎大使馆，轰动一时。^① 社会革命党对于布尔什维克的社会主义探索做出的庸俗主义解释使自己失去了重新认识俄国社会主义的新的机会。

1947年6月，纽约小组的《为了自由》停刊。小组的成员阿夫克先基耶夫于1943年去世，列文于1948年去世。纽约小组中曾经的敌人，切尔诺夫和维什尼亚克和平相处。从1940年5月开始，孟什维克国外代表团组织与社会革命党小组的各个代表见面。孟什维克驻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代表阿布拉莫维奇在1951年给更新的国际写信说：“现在我们和社会革命党之间已经没有任何分歧或者竞争了。”^② 切尔诺夫也完全同意这种看法。但是，俄国的社会主义者再也不能发挥一战前在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中所发挥的作用了。建立统一的俄国社会主义政党成了社会革命党最后的一个步骤。1952年4月15日，切尔诺夫去世。1953年10月20日，津季诺夫去世。社会革命党纽约小组则坚持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

① *Marc Jansen*,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после октябрьского переворота 1917 года* Документы из архива П. С-Р, с. 756.

② *Marc Jansen*,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после октябрьского переворота 1917 года* Документы из архива П. С-Р, с. 756.

结语：俄国民粹主义的最高阶段

社会革命党从1905年正式成立到1925年退出政治舞台经历了20年的时间，若从1901年秋或1902年初新民粹小组的合并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纽约小组的消亡算，则跨越了半个多世纪。对于社会革命党社会地位的评价，传统观点常常把它看做小资产阶级政党归入资产阶级阵营，^①抹杀了民粹派在社会革命党时期经历的波澜壮阔的历史变化。

社会革命党继承了民粹派的学说，在俄国资本主义不断发展的情况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改良主义，对传统民粹派观点做出了修正，提出了建设性的社会主义的主张。但是，社会革命党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新民粹派政党，其社会主义是对俄国传统宗法社会与西方民主观念的不成功的嫁接，留下了传统宗法社会向现代公民社会转型的历史教训。

一 对于人民的信仰

对于社会革命党这个新民粹政党来说，对人民的信仰仍然是其存在的基础。美国犹太裔学者里亚·格林菲尔德说，对于人民的探索起源于彼得大帝。但他的西方化斩断了人民对于神的信仰，开始了神与人的斗争。因此，弗洛罗夫斯基说：“彼得一世改革的新颖之处不在于西方化，而在于世俗化。”^②世俗化的含义就是国家政权自己确定自己的独立存在，决定自己的主权独立，教会不仅服从和附属自己，而且被接收，进到自己的内部，

^① Гл. Ред. О. Ю. Шмидт, Большая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Т. 44, М., “сов.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1926, с. 289; Большая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Т. 49, М.,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1957, с. 176; Большая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Т. 30, сов.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1978, с. 246.

^② 格·弗洛罗夫斯基：《俄罗斯宗教哲学之路》，第121页。

成为自己的一部分和国家体制和秩序的一环。^① 把人对神的崇拜转变成为对沙皇的崇拜，把动态的世界观变成了静态的世界观。^②

从动态世界观变成静态世界观就是用改造国家的方式改造臣民的思维方式，把臣民当做奴隶来看待。彼得强迫臣民们接受的西方新学问是实用的，他所追求的不是教育，而是对专家和技术人员的培训。^③ 于是，俄国社会出现了精神灵修传统和世俗文化传统之间的冲突，即精神上的害怕和沉默与文化上的行政命令之间的冲突。用克柳切夫斯基话说，彼得想“利用政权的疾风暴雨唤醒受奴役社会的首创精神”，^④ 结果却出现了利哈乔夫讲的“对宗教的不敬同时无疑又笃信上帝、残忍与善良并存”的巴洛克式的文艺复兴。

这种矛盾在19世纪初期爆发了。当俄国在对外战争中战胜拿破仑登上欧洲巅峰的时候，俄国贵族却在精神上发出了对专制制度的声讨。П. Я. 恰达耶夫说：“我们独特的文明之最悲哀的特征之一就是，我们刚刚发现的真理，在其他一些地方，甚至是在那些于许多方面都远远落后于我们的民族中间，都早已成了老生常谈。这是因为，我们从未与其他的民族携手并进；我们不属于人类的任何一个大家庭；我们不属于西方，也不属于东方，我们既无西方的传统，也无东方的传统。我们似乎置身于时间之外，我们没有被人类的全球性教育所触及。”“看一眼我们，便可以说，人类的普遍规律并不适用于我们。我们是世界上孤独的人们，我们没有给世界以任何东西，没有教给它任何东西；我们没有给人类思想的整体带去任何一个思想，对人类理性的进步没有起过任何作用，而我们由于这种进步所获得的所有东西，都被我们所歪曲了。自我们社会生活最初的时刻起，我们就没有为人们的普遍利益做过任何事情；在我们祖国不会结果的土壤上，没有诞生过一个有益的思想；我们的环境中，没有出现过一个伟大的真理；我们不让自己花费力气去亲自想出什么东西，而在别人想出的东西中，我们又只

① 格·弗洛罗夫斯基：《俄罗斯宗教哲学之路》，第121页。См., Георгий флоровский, Пути русского богословия. Вильнюс, 1996. <http://www.vehi.net/florovsky/puti/04.html>

② 徐凤林：《从东正教灵修传统看俄国文化史——德鲁日的俄国文化史观》，参见《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2009年年会会议手册》，第57页。

③ 里亚·格林菲尔德：《民主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第227页。

④ 瓦·奥·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四卷，张咏白等译，商务印书馆，2009，第214页。

接受那欺骗的外表和无意的奢华。”^①

赫尔岑把恰达耶夫的谴责看做划破夜空的枪声，随后在俄国的思想界掀起了西方派与斯拉夫派之间关于俄国发展道路的争论。两派之间虽然针锋相对，甚至到了决裂的程度，但是正如弗洛罗夫斯基所说的，他们都是为了神学而斗争，为了清理俄国精神与文化之间的矛盾。由于历史的原因，俄国走过了三条道路：“第一条路是变得像西方，模仿它。第二条道路是把西方界定成对俄国不适合模仿的榜样……要走自己的、与西方无关的道路。第三条路就是拒绝西方或怨恨，因为西方是邪恶的。”^②

怨恨是一个非常具有创造力的情感，能够无穷分裂、繁殖并发酵出新的情感和观念，造成一个意识形态的温床，最后建设一条既有普适性又有民族性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总结的宗教斯拉夫主义的道路。他认为，人和神的关系不再是彼此分离的两个存在物的外在关系，而是本质统一和相互补充的关系，神秘的动态关系。神性是完整人性的理念，动态人生的终点。任何一个具体的生存的个人，都只是完整人性的一个局部，动态人生的一个阶段，他自己在这个经验世界绝不可能达到这个理念和终点。但是，因为人的精神理想在这个世界的不可实现，就完全否定神性本身，导致对上帝存在的怀疑和无神论，也是错误的。因为神性是人性的内在精神，神对人来说又不是完全外在的东西，而正是努力的目标、路程的终点。^③

民粹派和新民粹派以为社会下层争取权利而反对贵族走过了革命民粹派、自由民粹派和保守民粹派^④的道路，都不能消除贵族与社会下层之间的矛盾，其原因不是贵族代表了自由主义，社会下层代表了人民主权，而

① 恰达耶夫：《箴言集》，刘文飞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第6、13页。

② 里亚·格林菲尔德：《民主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第309-310页。

③ 徐凤林：《俄罗斯宗教哲学》，第31页。

④ 关于民粹派走过的道路有两种分法：一种是革命民粹派和自由民粹派，这是列宁的分法；一种是革命民粹派和合法民粹派，这是西方学者的分法。前一种是从探索发展道路的手段讲的，后一种是从对政权的态度上讲的。两派其实都没有涉及民粹派的价值观。金雁先生从价值观的角度把民粹派划分为革命民粹派和警察民粹派，意在说明从争取人民主权转向人民专制了，这里已经全然没有了“自由主义”的影子了（参见金雁《苏俄现代化和改革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第194页）若从神与人的关系角度来看，把民粹派分为革命民粹派、自由民粹派和保守民粹派就是神性降临到人身上，追求陀思妥耶夫斯基讲的“内在的自由”了。实际上，社会革命党的革命道路又重复了这个演进，最终服从了布尔什维克的合题。

是贵族曾经成为西方文化的载体，而社会下层成为俄国文化的载体。其实，由于彼得以来俄国传统文化的割裂，俄国的文化没有得到正常发展而与西方文化对立；造成贵族与社会下层之间极大的情感伤害，进而引发俄国文化的代表者对西方文化的抱怨和反抗，出现了俄国社会下层特别是多数农民的膜拜。而受被俄国篡改了的西方文化熏陶的民粹派尽管为社会下层争取权利抛头颅洒热血，但是他们并没有得到他们为之奋斗的对象——社会下层的理解，走上了恐怖主义和蒙昧主义的道路，造成了社会的激烈动荡。俄国是一个有信仰的民族，在遭遇东西方外族文化入侵的过程中迷失了方向，为了获得自己的方向只有确立坚定的信仰，从爱的角度汲取曾经侵略过自己的民族的素养，才能摆脱因情感伤害所产生的不正常的社会生活。俄国需要个人的独立，但更需要彼此的热爱。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出的斯拉夫主义的道路，也是俄国人所钟爱的社会主义。

二 对农村公社的依恋

农村公社曾经是民粹派所钟爱的社会主义的载体，也是社会革命党所认为的劳动人民法律意识的依靠。由于对农村公社的不同认识，出现了西方派和斯拉夫派的争执。争执的基础是爱，只不过“斯拉夫派从母亲的角度来爱，西方派从孩子的角度来爱”。把农村公社当母亲来爱则从中挖掘出内在的价值，若把它当做孩子来爱，看到的则是内在的不足。西方派奇切林认为，古代俄罗斯的村社与古日耳曼的马尔克极为相似，没有任何俄罗斯的特殊因素；现在的村社是农民被束缚起来（变成农奴）之后，由国家创造的，以政治手段建立起了村社的土地关系、生活方式和内部管理。^① 斯拉夫派认为，村社占有划给村民的全部土地，实现了“集体划一”的米尔社会占有形式。村社共同占有牧场、休闲地和森林，个人占有宅院地、果菜园、可耕地和草场。村社分配土地时，都是用课税单位计量土地的方法来平均分配土地，同时照顾到劳动人手的数量和体力。这种土地分配方法不是农民根据某种理论得出的，而是他们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相沿成习的惯例，这种惯例正是“人民意愿的反映”。^②

西方派与斯拉夫派的认识不同其实是站在了不同的动机之上。西方派

^① 白晓红：《俄国斯拉夫主义》，第187～188页。

^② 白晓红：《俄国斯拉夫主义》，第190页。

对村社的认识建立在世俗的角度，即沙皇代表的国家把人民引上了获利的轨道，阻滞了人民关于利益来源的道德基础的思考。沙皇代表的国家如果要巩固自己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念，就要不断地在利益上获得成功，为此国家统率了能够调动人民进取的一系列因素，形成了榨取人民的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随着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向各个领域的渗透，国家的作用逐渐加大了，这就是西方派重视国家作用的道理。而斯拉夫派则从爱敌人的角度出发，从农村公社在俄国历史上发挥作用的角度还原了村社的本来面目，这样就把沙皇和人民之间统治与服从的法律关系的道德基础揭示了出来：即人民服从沙皇是建立在俄国公共安全高于一切的考虑的基础上的，但在人格上他们是平等的。这样，专制制度在斯拉夫派这里就有了新的含义：即专制制度是独立主事的意思，它出于基于共同信仰的统一的人民，而非出于在社会不同阶层和集团敌对基础上分裂的人民。^① 如果专制制度堕落成为压榨人民的工具，特别是专制制度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农奴制度不能在人民的公共安全即战争中发挥作用就会引发人民对沙皇制度的道德追问，直到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如果沙皇专制制度还在努力地改变自己的不足，如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主动废除农奴制度，着手司法、军事、宗教的改革，乃至还准备进行政治制度的改革，那么，沙皇专制制度就会通过改革的办法完成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使命，这就是无论西方派还是斯拉夫派都维护国家体制的原因。

然而，西方派还对产生西方自由制度的基督教进行了道德追问，为此，作为西方派鼻祖的恰达耶夫加入了基督教，对俄罗斯做出了一无是处的谴责，引发了俄国前所未有的虚无主义的浪潮，进而演化成政治激进主义。西方派与斯拉夫派在个人关系上的决裂，自由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政党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都是这种认识在社会政治领域的反映。而斯拉夫派回到了基督教的源头，指出了西方文化的理性主义的根源，同时指出了俄国文化中非理性的因素，这就是包括了内在自由、社会有机和恩典与爱的聚合性原则。^② 斯拉夫派从基督教的源头揭示出来的聚合性原则不仅把俄国的制度带到了基督教道德的起点，而且生发出指导俄国社会发展的原则，是对基督教道义的更深一步的理解，也是对人类文化的杰出贡献。由于斯拉夫派受到来自文化层面和制度层面的反抗，即西方派对他们否定理性文化的

^① 白晓红：《俄国斯拉夫主义》，第156页。

^② 徐凤林：《俄罗斯宗教哲学》，第20-21页。

声讨和革命民主主义者对他们拥护专制制度和人民专制的声讨，斯拉夫派对于俄国做出的宗教层面的探讨遭到了埋没，换来了政治社会领域激烈斗争式的探讨，付出了血腥的代价。当政治社会斗争的硝烟结束散去，俄国学者才重新回过头来探索现代社会与古代传统之间的关系，在农村公社问题上才认可了斯拉夫派的认识：即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必须巩固农村公社。^①

民粹派和新民粹派都走过了探索农村公社的发展道路。到了社会革命党的政治组织的成员切尔诺夫，从村社中挖掘出农民的法律意识并作为构建新社会的精神基础，建设社会主义。然而，切尔诺夫由于过分执著于农民政治社会权利的斗争，忽视了斯拉夫派开发出来的聚合性精神在社会政治领域的落实，造成民粹派精神基础的失落。虽然切尔诺夫在政治上把人民主权和资产阶级政权混合起来，在社会经济领域把村社经济和个体经济混合起来；但是，由于他没有从斯拉夫派聚合性精神的高度上把俄国的集体主义权利和个人权利统一起来，把村社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统一起来，造成俄国资产阶级西方文化的代表和俄国传统文化代表的斗争，耗尽了俄国社会的斗争力量。社会革命党虽然能够从俄国的集体主义精神角度提出类似土地社会化的革命性主张并得到人民的拥护，但是由于不能从信仰的高度坚持把它付诸实施，错过了聚合社会的大好机会。列宁利用行政力量聚合了俄国社会并进一步发展了社会革命党提出的合作社思想，但激烈的社会斗争造成的感情伤害一次又一次地把社会变成一盘散沙，从反面验证着斯拉夫派的聚合性思想。

三 向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

聚合性原则发展成一种意识形态叫做社会主义，这是西方派与斯拉夫派相互砥砺探索的结果。社会主义思想成为俄国社会运动的精神底蕴，不仅在精神上聚合了分散俄国的社会，而且逐渐成为俄国政治运动的思想基础。社会主义思潮的产生逐渐冲击了沙皇专制制度的基础。沙皇尼古拉一世的教育大臣乌瓦洛夫为了解决专制制度的道德依据，提出了东正教、专制制度和人民性三位一体的政治理念。但是，东正教仅仅维持在捍卫专制制度的政权崇拜基础上，显然不能应对已经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的理念，

^① С. Г. Кара-мурза, Советская цивилизация, Т. , I. с.115. [http://kara - murza.ru/books/sc_ a/sc_ a6. htm#hdr_ 8](http://kara-murza.ru/books/sc_a/sc_a6.htm#hdr_8)

于是亚历山大二世着手清理社会主义思潮给政权的合法性带来的冲击，做出了以废除农奴制为主题的一系列社会改革，想以此重新赢得社会的信任。然而，政府的让步不仅没有获得社会的信任，相反激起了国家的恐怖主义浪潮。

民粹派的恐怖主义并不反对政权，而是对政权提出了道义的追问。正如民意党执行委员会给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写的信中所说的那样：“请相信，一旦最高当局不再独断专行，一旦它决心实现出自人民意识和良心的要求，您就能勇敢地驱逐那些玷污政府的暗探，把护送队送回营房，把残害人民的绞刑架付之一炬。执行委员会将停止自己的活动，在它周围组织起来的力量也将分散到各地，以便将自己贡献给为祖国人民谋福利的文化工作。”^①民意党人把亚历山大二世推行的改革称为“公开制造了一个危害最大的投机商阶级……只能导致人民遭受更多的奴役和更大的剥削”，^②是对沙皇推行的资本主义改革动机的质疑。西方派以为政府不理解这个时期出现的怀疑资本主义的面目与人民整个文化水准有密切联系，建议俄国“只有向资本主义学习才能培养起这个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力——阶级自觉。没有这个‘学习’，‘没有觉悟和有关阶级积极性的激起’，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就不可能”。^③结果，资本主义制度越发展，俄国的革命浪潮越激烈；俄国革命浪潮越激烈，资本主义造成的道德败坏越向纵深发展，形成了俄国特有的怪圈和悖论。

社会革命党从坚决反对资本主义到承认资本主义，从反对自由派资产阶级剥夺人民主权到通过自由派资产阶级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始终存在着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存在着有产者阶层对无产者阶层的蔑视和无产者阶层对有产者阶层的仰望。究其原因就在于社会革命党不清楚资产阶级为什么一定要对工人、农民实施“剥削”，更不清楚俄国具有西方化思想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会瞧不起人民的“赤胆忠心”。于是切尔诺夫一方面批判着资产阶级的剥削性，另一方面又祈求资产阶级通过工厂辛迪加对工人的锻炼实现工人智慧的增长，切尔诺夫和他所领导的社会革命党不仅成为利用资产阶级干社会主义事业的阴谋家，而且成为命中注定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不仅遭到了资产阶级的唾弃，而且让劳动者们远离。社会革命党徘徊于西

① 《俄国民粹派文选》，第547页。

② 《俄国民粹派文选》，第546页。

③ 张建华：《俄国知识分子思想史导论》，第169页。

方自由主义自由民主的怪圈中不能自拔，丧失了自斯拉夫派俄国知识分子开始形成的对俄国资产阶级分子们“自由、民主”的道德追问，以此确立的引领俄国社会革命党和人民前进的发展方向，消弭于“资本主义铁锅蒸煮”形成的恐惧之中。

俄国知识分子形成的反资本主义的情绪反对的不是资本主义本身，而是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功利主义应用。无论是自由派知识分子还是革命派知识分子都期望俄国社会进步的同时能够带来社会的和谐，社会主义几乎成为他们的共同的追求。如俄国学者米罗诺夫引用俄国大企业家 П. А. 布雷什金的话说，俄国资产阶级对待自己事业的态度“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他们认为，自己从事企业活动不仅是为了个人致富，而且是为了完成上帝或命运赋予他们的某种使命。他们认为，财富是上帝交给他们使用的，因此，需要做出回报，这也是俄国商业界特别热衷慈善活动的原因。他们认为这是在尽某种神圣的义务”。也就是由于这个原因，俄国真正的资产阶级意识始终没有形成，直到 20 世纪初期还没有自己的政党。^①

于是，民粹派提出的绕过资本主义实现向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就成为俄国社会发展常常面对的重大课题。马克思尽管对于社会主义的前提——资本主义的高度发达深信不疑，但是对俄国民粹派提出的俄国资本主义不发达的问题始终没有做出正面的回应，而是提出了“如果说土地公有制是俄国‘农村公社’的集体占有制的基础，那么，它的历史环境，即它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同时存在，则为它提供了大规模地进行共同劳动的现成的物质条件。因此，它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②的直接过渡的理论。到了恩格斯晚年则进一步提出“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③的结论。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俄国直接过渡的理论成为社会革命党和布尔什维克争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关系的焦点。不管是社会革命党依据此理论得出俄国不需资本主义的铁锅蒸煮，还是布尔什维克依据此理论得出俄国一定要经历资本主义铁锅蒸煮，恩格斯提出的俄国必须掌握资本主义背后的真精神作为建设俄国社会主义的起点则是毋庸置疑的。恩格斯就此

① 鲍·尼·米罗诺夫：《俄国社会史》下卷，第 340、341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770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444 页。

说：“在俄国将最容易做到，因为这个国家的一部分本地居民已经吸取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文化精神，因而在革命时期这个国家可以几乎与西方同时完成社会的改造。”^① 恩格斯这里讲的资本主义文化精神当然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道德基础，也就是马克斯·韦伯讲的资本主义的节俭禁欲的精神。只不过俄国在与西方资本主义的激烈竞争中以反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形式完成了米罗诺夫所说的俄国生活世俗化的转变。^②

在社会革命党仍然不明白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是等到资本主义发展到足以装备起劳动者的物质条件还是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候，布尔什维克直接宣布在俄国物质条件不充分的情况下建设社会主义，把社会革命党打了个措手不及。

四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

从社会形态理论来讲，社会主义是一个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形态，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常常与资本主义对立并埋葬资本主义。然而，世界的历史进程常常超越人们的预期。社会主义不仅没有超越资本主义，相反与资本主义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甚至出现了美国学者弗兰西斯·福山提出的社会主义的历史终结论。^③

当然，历史并没有终结。无论是资本主义的历史还是社会主义的历史都还在从事着回归历史道德的使命。从民粹派和新民粹派走过的道路来看，民粹派在探索农民社会主义和建设性社会主义的道路中，都没有忘记提醒有产者负起对社会的道德责任，没有忘记曾经为国家的富强付出过的农民。民粹派曾经因为资本主义不能反映人民的意志而说俄国资本主义是一种“移植、模仿”，^④ 从而进一步得出结论，“它的繁荣不需要俄国人民进一步失去土地，自然也不需要消灭村社，使失地农民在工厂找不到工作。相反，由于俄国大工业必须主要依靠国内销售，因此它的繁荣程度与人民群众的富足程度有直接关系；每一无地农民离乡外逃都会减少对它的产品的需求”，^⑤ 从而希望国家发展加强生产。新民粹派代表、社会革命党领导人切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43页。

② 鲍·尼·米罗诺夫：《俄国社会史》下卷，第342页。

③ 弗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黄胜强等译，远方出版社，1998，第1页。

④ 《俄国民粹派文选》，第655页。

⑤ 《俄国民粹派文选》，第655页。

尔诺夫则希望通过加强工业的辛迪加和农业合作社的工业资本主义道路和农业非资本主义道路走向社会主义。切尔诺夫以自己容忍资本主义并在村社的基础上开发出农业合作社的观点而把民粹派发展到了最高阶段。

但是，新旧民粹派都不能克服的问题是，俄国发展资本主义带来的一定是道德败坏。沃龙佐夫说：“俄国资本主义遭到的失败并不等于对我国祖国文化历史的死刑判决；这一现象不能证明俄国人因循守旧、不求进步，这应当认为是对我们有利的征兆，证明我们有能力参与全人类的文明事业，利用人类文明的一切纯洁财富，避免沾染其弊端，超越欧洲目前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据一些学者和政论家的意见，这一阶段是构成文明的阴暗面的罪恶之源。”^① 切尔诺夫说：“沃龙佐夫试图猜测资本主义和军国主义之间紧密联系的生活逻辑。现在已经非常清楚了，资产阶级的热爱和平、热爱自由和文化自由主义不是有组织的明确标志，它只是临时的伴随现象，尤其适应古典纯粹的无政府主义的资本主义。相反，它的最高组织阶段是追求威权国家形式的阶段。它的局部表现就是与过去的教权、等级和君主主义残余的结盟。”^② 沃龙佐夫的罪恶之源和切尔诺夫的旧时代残余之说都是从道德上对资本主义进行的审判，而与此同时他们又羡慕资本主义的发展成果：一个试图通过发展人民生产代替发展资本主义，一个则是在资本主义内部打进一个楔子抗衡资本主义，从而回避对资本主义道德本身的考察，绕过俄国宗法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伦理的共同基础的探索。

切尔诺夫把社会主义与自由民主连接在一起。他不厌其烦地重复，社会主义的灵魂就是自由，如果消灭了自由实行专制就是掏空了社会主义的灵魂。但是，从人伦道德出发，切尔诺夫所强调的自由就是劳动的自由。他说：“民主的基石是与其他人有平等价值的自由个性。当浪漫的辛迪加主义者批评民主的虚假就是把某些抽象的公民混同于无形的算术符号的时候，其实就是把公民当做了法律上的虚构，地域上的毗邻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外在，而人的真正联系是生产中的联系，人的真正的本质是生产者的品质，脱离一定的职业的人是不能想象的。他们在树木之后看不到森林，就像在职业之后看不到人一样。”^③ 接下来，切尔诺夫以民主作为目的本身，同时

① 《俄国民粹派文选》，第 698 ~ 699 页。

②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 - 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17. 10 - 1925, Т. , 3, Ч. , 2, с. 661.

③ В. М. Чернов, Конструктивный социализм, с. 571 - 572, 573.

赋予了民主以劳动的条件，即民主就是劳动的民主，为农民争取平等的劳动权利。他不仅以劳动的标准区分社会成分，而且以劳动标准把非劳动分子纳入社会劳动制度。他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不同的只是实现的方法，即不通过革命消灭非劳动分子。

切尔诺夫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社会，把威权者以神圣的最高祭司、绝对正确的教皇和涂油皇帝的身份发布命令当做否定少数人对真理掌握的事实，同时连同发布命令的威权统治形式一起否定，就如同倒水连同小孩一同倒掉一样，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别尔嘉耶夫认为这是从一种谎言转入另一种谎言，是从对恺撒的膜拜转向对人民的膜拜。俄国的问题不是政治形式的转换，而是人民的心灵遭受了毒害。别尔嘉耶夫说：“立宪民主党就其成分来讲，是国家高级知识分子、教授、地方自治局成员组成的政党，资产阶级的成分从该词的准确意义上来讲发挥的作用不大。为民主原则辩护，要求召开立宪会议以及一切等到立宪会议解决，不能没有它，是一种失了真的谎言。革命的社会主义民主直到立宪会议，也就是在没有主权人民意志的条件下解决执政形式、农业问题、区域自治等基本问题……失了真的谎言是对群众性的革命自发性的膜拜。”^①

当自发性变得不受约束，民主性也就变成了无政府。切尔诺夫把资本主义对人的改造简单地归结为有产者对无产者个人意识的强加而抹杀了资本主义的道德性，又根据民主特别是劳动民主就是社会主义的真谛而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不仅没有挖掘俄国已经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的道德底蕴，而且丧失了未来社会主义的道德追求。这样做，不仅得不到资产阶级的支持，而且也得不到劳动人民的拥护。因为对于资产阶级来说，劳动民主带来的只是索取，没有责任；对于劳动人民来说，劳动民主过于抽象，否定了个人的价值利益。

那么，俄国社会形成的彼此抱怨的过错到底归结于谁呢？用别尔嘉耶夫的话，归结为俄国整个精神现实和精神价值的原子化和模糊化。这样一来，教会、祖国、国家和文化就遭到了瓦解，而留在它后面的只有赤裸裸的利益。^②当然，失去了道德支撑的利益之争带来的必然是你死我活的阶级之争，互不相让，两败俱伤。最后，俄国神学家弗罗洛夫斯基从宗教哲学的高度给出了答案。他说：“俄罗斯灵魂受两种诱惑的迷惑。一个是神圣生

^① Н. Бердяев, Духовные основы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опыты 1917 - 1918 гг., с. 136 - 137.

^② Н. Бердяев, Духовные основы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опыты 1917 - 1918 гг., с. 146.

活的诱惑。它来自古代罗斯，来自旧礼仪派，是一种历史的土地上播种的基督教乐观主义，它像影子一样，隐藏在其后的是分裂当中启示录般的否定。一个是虔敬主义慰藉的诱惑。它来自新知识分子，同等程度地来自西方派和民粹派。就其性质而言，这种诱惑也是一种对日常生活的贪恋，一种对精神舒适的迷恋。它不能作为一种伟大的贡献、一种漫长的旅行和事业创造性地理解历史……这样，摆脱它的出路就不再来自文化和社会层面，而是来自禁欲生活和精神回归上的内在修持。”^①

^① *Георгий флоровский, Пути русского богословия. Статья ix : разрывы и связи,*

参考文献

一 中文文献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2009、1995。

《列宁全集》、《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84、1995。

《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

爱德华·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殷叙彝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3。

阿·泰勒：《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何抗生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

白晓红：《俄国斯拉夫主义》，商务印书馆，2006。

鲍·尼·米罗诺夫：《俄国社会史——个性、民主家庭、公民社会及法制国家的形成》，张广翔等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

别尔嘉耶夫：《精神王国和恺撒王国》，安启念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

别尔嘉耶夫：《自我认识·思想自传》，雷永生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程玉海：《论1922年三个国际柏林会议》，《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0年第3期。

博戈斯洛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叶芳等译，黄河文艺出版社，1986。

勃朗克·霍尔瓦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吴宇晖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

B. II. 纳乌莫夫等编《1921年的喀朗施塔得》，任建华等译，人民出版社，2009。

II. 司徒卢威：《俄国经济发展问题的评述》，李尚谦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

波克罗夫斯基：《俄国历史概要》上册，贝璋衡等译，三联书店，1978。

曹维安：《俄国史新论——影响俄国历史发展的基本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察哥洛夫：《俄国农奴制解体时期经济思想概论》，厉以宁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下册，周扬等译，三联书店，1962。

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李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德·谢·利哈乔夫：《俄罗斯思考》，杨晖等译，军事译文出版社，2002。

德·阿宁编《克伦斯基等目睹的俄国一九一七年革命》，丁祖永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俄国民粹派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

弗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黄胜强等译，远方出版社，1998。

高放：《封建主义的社会主义不同于社会封建主义》，《东欧中亚研究》2001年第4期。

格·弗洛罗夫斯基：《俄罗斯宗教哲学之路》，吴安迪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金雁、卞悟：《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村社传统与俄国现代化之路》，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

金雁、秦晖：《无产阶级专政与“人民专制”》，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7年第3期。

赫尔岑：《往事与随想》，项星耀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赫·韦尔斯：《世界史纲——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吴文藻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卡尔·洛维特：《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历史哲学的神学前提》，李秋零等译，三联书店，2002。

科恩：《科学中的革命》，鲁旭东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

李永全：《俄国政党史》，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里亚·格林菲尔德：《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王春华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

刘文飞：《伊阿诺斯，或双头鹰——俄国文学和文化中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思想对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刘祖熙：《夏日堂史集》，人民出版社，2007。

刘祖熙：《改革和革命——俄国现代化研究（1861~1917）》，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刘祖熙：《波兰通史》，商务印书馆，2006。

刘显忠：《近代俄国国家杜马：设立及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

梁士琴科：《苏联国民经济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4。

《路标集》，彭甄等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

罗兰·斯特龙伯格：《西方现代思想史》，刘北成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罗莎·卢森堡：《论俄国革命·书信》，殷叙彝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马克·斯坦伯格、弗·赫鲁斯塔廖夫：《罗曼诺夫王朝的覆灭》，张蓓译，新华出版社，1999。

梅格纳德·德赛：《马克思的复仇——资本主义的复苏和苏联集权社会主义的灭亡》，王澄清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尼·米·尼科利斯基：《俄国教会史》，丁世超等译，商务印书馆，2000。

《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三联书店，1964。

普罗托波波夫等《别林斯基、杜波罗留波夫、皮萨列夫、冈察洛夫》，翁本译译，海燕出版社，2005。

恰达耶夫：《箴言集》，刘文飞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

斯特凡·茨威格：《三大师》，申文林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沈志华：《新经济政策与苏联农业社会化道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沈志华主编《一个大国的崛起和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苏文：《从不公正的改革到反改革的革命——沙皇斯托雷平改革述评》，《开放时代》1998年第1期。

孙成木：《俄国资产阶级的形成及其历史作用》，《世界历史》1989年5期。

孙成木、刘祖熙、李建主编《俄国通史简编》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

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柴金如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6。

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施用勤译，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

瓦·奥·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四卷），张咏白等译，商务印书馆，2009。

沃尔特·G·莫斯：《俄国史（1855—1996）》，张冰译，海南出版社，2008。

徐凤林：《俄罗斯宗教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徐凤林：《从东正教领袖传统看俄国文化史——霍鲁日的俄国文化史观》，《“俄罗斯发展道路：历史与现实”学术研讨会暨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2009年年会会议手册》。

徐天新：《平等、强国的理想与苏联的实践》，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

徐天新选译《世界史资料丛刊·现代史部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商务印书馆，1997。

谢·卡拉—穆尔扎：《论意识操纵》，徐昌翰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谢·尤·维特：《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维特伯爵回忆录》，张开译，新华出版社，1983。

谢·尤·维特：《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续集）——维特伯爵回忆录》，张开译，新华出版社，1985。

姚海：《俄罗斯文化之路》，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

姚海：《近代俄国立宪运动源流》，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

伊·多伊彻：《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1879—1921·先知三部曲》，王

国龙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伊·多伊彻：《先知三部曲·被解除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1921 - 1929）》，周任心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彭淮栋译，译林出版社，2001。

扎依翁切可夫斯基：《俄国农奴制度的废除》，叔明译，三联书店，1957。

张建华：《俄国史》，人民出版社，2004。

张建华：《俄国知识分子思想史导论》，商务印书馆，2008。

郑异凡：《史海探索》，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

祝政宏：《罗曼诺夫朝的最后日子——沙皇灭亡前的上层危机》，海天出版社，2000。

二 俄文文献

А. А. Кононенко, Современная зарубежная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я партии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2005, № 2.

А. А. Кононенко,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я создания и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партии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в 1901 – 1922 гг. , Тюмень, 2005.

А. А. Смирнова, От коалиции к катастрофе петроградские социалисты в мае-ноябре 1917 года, Спб. , ООО «Береста», 2006.

А. Агарев, Борьба большевиков против мелкобуржуазной партии эсеров, Пропагандист, 1939, № 16.

Погрег. А. Ё. зубова, Устория Россп хх lek: 1894 – 1939, и. , Астерпб АСТ, 2009.

А. В. Луначарский, Бывшие люди: 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партии эсеров, М. , Гос. изд. , 1922.

А. В. Добровольский, Эсеры Сибири во власти и оппозиции (1917 – 1923) , Новосибирск, Наука, 2002.

А. Гейфман, В сетях террора Дело азефа и Рус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М. , АИРО, 2002.

А. И. Деникин, Очерки русской смуты, Т.1 – 3, М. , Айрис-пресс, 2006.

Под ред. А. И. Зевелева и др. ,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артии России: истор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М. , РОССПЭН, 2000.

А. И. Спиридович,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и её предшественники, Пг. 1916.

А. М. Анфимов, Неоконченные споры,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7, № 5 – 9.

Отв. ред. А. П. Корелин,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артии России в период революции 1905 – 1907 гг. Количественный анализ, М., Б. и., 1987.

А. Н. Медушевский Демократия и авторитаризм: Российский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ализм в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й перспективе, М., РОССПЭН, 1998.

А. П. Новиков, В. М. Чернов в годы третьей эмиграции: эстонский период (1920 – 1922), <http://socialist.memo.ru/firstpub/y06/novikov2.htm>

А. П. Новиков, Эсеровские лидеры и Кронштадтский мятеж 1921 года,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2007, № 4.

А. Ф. Жуков, Идеи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крах эсеровского максимализма, Л., ЛГУ, 1979.

А. Ф. Керенский, Россия на историческом повороте мемуалы, М., ТЕРРА, 1996.

А. Ф. Смирно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дум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1906 – 1917, М., Книга и бизнес, 1998.

А. Ю. Сулов,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в годы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войны: современная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я. http://www.sgu.ru/faculties/historical/departments/oinp/viip_7/docs/029.pdf

Б. К. Ярцев, Чернов, эсеры и большевистский режим, 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 XXI, 1994, № 5.

Б. П. Балугев, Либеральное народничество на рубеже XIX – XX веков, М., Наука, 1995.

Под ред. Б. С. Итенберг, Революционеры и либералы России, М., Наука, 1990.

В. В. Гармиза, Крушение эсеровских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 М., Мысль, 1970.

В. В. Журавле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совещание, К истории консолидации антибольшевистского движения на востоке России в июле—сентябре 1918 г. http://www.zaimka.ru/2007/siberian_counterrevolution3/

В. В. Кожанов, Россия Век XX – й 1901 – 1939, М., Алгоритм, 2001.

В. В. Комин, Банкротство буржуазных и мелкобуржуазных партий России

в период подготовки и победы Великой Октябрьской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М., Московский рабочий, 1965.

В. В. Сазонов, У истоков крестьянского восстания на Тамбовщине,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2001, № 4.

В. Г. Медведев, Белый режим под красным флагом (Поволжье, 1918), Ульяновск, СВНЦ, 1998.

В. Г. Хорос, Народническая идеология и марксизм (конец XIX в.), М., Наука, 1972.

В. Г. Хорос, Идейные течения народнического типа в развивающихся странах, М., Наука, 1980.

В. Г. Хорос, Русская история в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м освещении, М., Центр гуманитарног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1996.

В. Г. Тюкавкин, Великоорусское крестьянство и Столыпинская аграрная реформа, М., 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2001.

Под ред. *В. Г. Тюкавкина*, Хрестоматия по истории СССР, 1861 – 1917 гг., М., Просвещение, 1990.

В. Данилов и Т. Шанин, Крестьянское восстание в тамбовской губернии в 1919 – 1921 гг. Антоновщина,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амбов, Редакционно-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отдел, 1994.

В. Д. Федров,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1861 – 1917, М., Высшая школа, 2001.

В. Е. Козляков,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вопрос и неонароднические партии (начало XX в. -конец 20 – х), Минск, БГТУ, 2001.

В. Л. Кузьмин, Ю. Н. Ципкин, Эсеры и меньшевики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россии в период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войны 1917 – 1922 гг., Хабаровск, 2005.

В. М. Чернов, Записки социалиста-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а, Т. 1, Берлин-Петербург-Москва, Изд. З. И. Гржебина, 1922.

В. М. Чернов, Перед бурей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Нью-Йорк, Изд. Имени чехова, 1953.

В. М. Чернов, Конструктивный социализм, М., РОССПЭН, 1997.

В. М. Чернов, Великая рус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учредительного собрания 1905 – 1920, М., ЗАО Центрполиграф, 2007.

В. М. Чернов, Черновская грамота и Уфимская директория,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2006, №. 2.

В. Мецержаков,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 – 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ч. I – II, М., Гос. изд., 1922.

В. Н. Гинев, Аграрный вопрос и мелкобуржуазные партии в России, Л., Наука,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е отделение, 1977.

В. Н. Гинев, Борьба за крестьянство и кризис русского неонародничества 1902 – 1914 гг., Л., Наука,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е отделение, 1983.

В. Т. Рязанов,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развитие России-Реформы и российское хозяйство в XIX-XX вв., Спб., Наука, 1998.

Г. А. Герасименко,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науки (дооктябрьский период), М., Изд. РАГС, 2002.

Г. Д. Алексеева, Народничество в России в XX в. Идеиная эволюция, М., Наука, 1990.

Г. И. Злоказов, Большевистско-эсеровский ВЦИК Советов в 1917 году, М., Наука, 1997.

Г. И. Шмилев, Национализация земли в теоретических схемах большевиков и в реальности.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2003, №. 2.

Гражданская война на востоке России Проблемы истории, Новосибирск, Новосиб. Гос. ун-т., 2001.

Д. А. Колесниченко, Аграрные проекты трудовой группы в I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думе,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записки, Т. 82.

Д. А. Колесниченко, В. М. Чернов, см., Россия на рубеже веков: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портреты, М., Политиздат, 1991.

Д. А. Колесниченко, Трудовики в первой россий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М., Наука, 1985.

Д. Б. Павлов, Большевистская диктатура против социалистов и анархистов 1917 – середина 1950 – X годов, М., РОССПЭН, 1999.

Е. А. Луцкий, Борьба вокруг декрета «О земле» (ноябрь-декабрь 1917 г.),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47, №. 10.

Е. А. Скрипилев, 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е учредительное собрание историко-правово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М., Наука, 1982.

И. Д. Колесниченко, *Т. Л. Моисеенко*, *Н. Б. Хелунская*, Социальн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строй крестьянск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Европейской России в эпоху капитализма, М. , МГУ, 1988.

И. Д. Ковальченко, Аграрный строй России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ы XIX – начала XX в. , М. , РОССПЭН, 2004.

И. М. Игнатенко, Революция в историческом процессе: очерки, Минск, Беларуский кнпн газбор, 1997.

К. Гусев, Крах партии левых эсеров, М. , Изд.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63.

К. Гусев, Партия эсеров: от мелкобуржуазного революционаризма к короткореволюции,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 М. , 1975.

К. В. Гусев, В. М. Чернов Штрихи к политическому портрету, М. , РОССПЭН, 1999.

Под ред. *К. В. Гусев*, Непролетарские партии России в терх революциях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М. , Наука, 1989.

К. Н. Морозов,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 – 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в 1907 – 1914 гг. , М. , РОССПЭН, 1998.

К. Н. Морозов, Судебный процесс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и тюремное противостояние (1922 – 1926): этика и тактика противоборства, М. , РОССПЭН, 2005.

К. Н. Морозов, Индустриальный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террор в России XIX – Начало XX в. 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М. , «МЕМОРИАЛ», 1996.

Л. В. Милов, Великорусский пахарь и особенность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процесса, М. , РОССПЭН, 2001.

Под рек. *Л. М. Спирина*, Непролетарские партии России уроки истории, М. , Мысль, 1984.

Л. Г. Прайман, Террористы и революционеры, охранники и провокаторы, РОССПЭН, М. , 2001.

Л. Г. Протасов, 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е Учредительное собрание: исторя рождения и гибели, М. , РОССПЭН, 1997.

Л. Д. Троцкий,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Т.1, М. , ТЕРРА, республика, 1997.

Л. М. Спирина, Непролетарские партии России уроки истории, М. ,

Мысль, 1984.

Marc Jansen,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после октябрьского переворота 1917 года Документальное из архива П. С. Р, Amsterdam, 1989.

Михаил Геллер,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Т. 3,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ИК”, 1997.

М. И. Леонов,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в 1905 – 1907 гг., М., РОССПЭН, 1997.

Н. Блинов,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артии России в зеркале энциклопедии: проблемы и решени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1997, №3.

Н. Бердяев, Духовые основы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опыты 1917 – 1918 гг. . Спб., Русский Христианский гуманитарный институт, 1999.

Н. Д. Ерофеев, Народные социалисты в первой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М., МГУ, 1979.

Н. Стариков, 1917 разгадка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М., ЯУЗА, ЭКСМО, 2008.

О. В. Будницкий, Терроризм в российском 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м движении: идеология, этика, психология (вторая половина XIX – начало XX в.), М., РОССПЭН, 2000.

О. В. Коновалова,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деалы В. М. Чернова: взгляд через годы, Красноярск, Сибирский юридический институт МВД России, 2005.

О. В. Коновалова, В. М. Чернов о путях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и. М., РОССПЭН, 2009.

О. В. Коновалова, Преодоление народнических догм. В. М. Чернов о типах 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эволюции, 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 XXI, 2001, № 4.

О. В. Коновалова, “ Смешанная экономика ” Вариант Виктора Чернова, 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 XXI, 2002, № 3.

О. В. Коновалова, В. М. Чернов и аграрная программа партии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2002, № 2.

О. В. Волобуев и др., Россия XX век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Драм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большевики и революция, М., Новый хронограф, 2002.

О. Л. Протасова, А. В. Пешехонов Человек и эпоха, М., РОССПЭН, 2004.

О. С. Поршнев, Крестьяне, рабочие и солдаты России накануне и в

годы перв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М., РОССПЭН, 2004.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00 – 1907. 6, Т. 1, М., РОССПЭН, 1996.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07. 6 – 1917. 2, Т. 2, М., РОССПЭН, 2001.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17. 2 – 10, Т. 3, Ч. 1, М., РОССПЭН, 2000.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17. 10 – 1925, Т. 3, Ч. 2, М., РОССПЭН, 2000.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в первые годы Советской власти,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2006, №. 2 – 4, 6.

Гл. Ред. П. В. Волобуев,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деятели России 1917 год, М., Большая рос. Энцикл., 1993.

П. Н. Милюков, Россия на переломе большевистский период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Т. 1, Париж, La source, 1927.

П. Н. Милюков, История второй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Т. 1, София, Российско-болгаское книго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1921.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артии России: истор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 М., РОССПЭН, 2000.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артии России Конец XIX – первая треть XX века,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М., РОССПЭН, 1996.

Программы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партий России Конец XIX – начало XX вв., М., РОССПЭН, 1995.

Протоколы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партии социалистов – 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с комментариям В. М. Чернова, Воросы истории, 2008, №8.

Павел Зырянов, Адмирал Колчак, верховный правитель России, М.,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2002.

Р. А. Городницкий, Боев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ПСР (1901 – 1911 гг.), М., РОССПЭН, 1998.

Р. К. Баландин, Мифы революции 1917 года, М., Вече, 2007.

Реформы или революция? Россия 1861 – 1917, Спб., Наука, 1992.

Россия и первая 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 (материалы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научного

коллектива), Спб., Дмитрий Буланин, 1999.

С. А. Аскольдов, Н. А. Бердяев, С. А. Булгаков и др., Из глубины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о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М., Моск. ун-та, 1900.

С. А. Красильников и др., Судебный процесс над социалистами-
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ами (июнь-август 1922 г.) подготовка, проведение, итоги,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М., РОССПЭН, 2002.

С. В. Леонов, Партийная система России конец XIX в. – 1917 год,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9, № 11 – 12.

С. Е. Руднева,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е совещание сентябрь 1917 г. История
форума, М., Наука, 2000.

С. Кара-Мурза, Советская цивилизация, Т. 1, М., Алгоритм, 2001.

С. М. Дубровский, Сельское хозяйство и крестьянство России в период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М., Наука, 1975.

С. М. Дубровский, Крестьян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революции 1905 – 1907 гг.,
М., Изд. АН СССР, 1956.

С. Н. Булгаков, Христианский социализм, Новосибирск, Наука
сибирское отделение, 1991.

С. С. Ольденбург, Царствование императора николая II, Ростов-на-
Дону, Феникс, 1998.

Т. В. Осипова, Российское крестьянство в революции и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войне, М., Стрелец, 2000.

Т. Шанин, Революция как момент истины 1905 – 1907 гг., М., Весь
Мир, 1997.

Х. М. Астрахан, Большевики и и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ротивники в 1917
году, Л., Лениздат, 1973.

1917 год в судьбах России и мира Октябрь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от новых
источников к новому осмыслению, М., Институт ро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1998.

Ю. Г. Фельштинский, Большевики и левые эсеры Октябрь 1917 –
июль 1918, Париж, 1985.

Ю. Г. Фельштинский, Крушение мировой революций Брестский мир:
Октябрь 1917 – ноябрь 1918, М., ТЕРРА, 1992.

Ю. С. Пивоваров, Русская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ь, русская власть, русская мысль, Росс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2002, №1.

三 英文文献

H. Immonen, *The agrarian program of the Russian social - revolutionary party, 1900 - 1914*, Helsinki: Finnish Historical Society, 1988.

M. P. Perrie, The social composition and structure of the Socialist - Revolution Party before 1917, *Soviet Studies*, 1972, Vol. 24, No. 2.

O. H. Radkey, *The agrarian foes of Bolshevism promise and default of the Russian social revolutionaries*, New York and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8.

人名译名对照表

A

Авксентьев Н. Д.	阿夫克先基耶夫
Абрамович Р. А.	阿布拉莫维奇
Агапов В. В.	阿卡波夫
Агарев А.	阿加列夫
Агафонов В. К.	阿加福诺夫
Азеф Е. Ф.	阿泽夫
Аксельрод П. Б.	阿克雪里罗德
Алгасов В. А.	阿尔加索夫
Алексеев М. В.	阿列克谢耶夫
Алексеева Л. Г.	阿列克谢耶娃
Алексеевский А. Н.	阿列克谢耶夫斯基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П. А.	亚历山大罗维奇
Алко Л. С.	阿尔科
Альтовский А. И.	阿尔托夫斯基
Анненский Н. Ф.	安年斯基
Антонов А. С.	安东诺夫
Анфимов А. М.	安菲莫夫
Аргунов А. А.	阿尔古诺夫
Арефьев Н. С.	阿列菲耶夫
Артемьев Н. И.	阿尔吉米耶夫
Архангельский А. В.	阿尔汉格尔斯基
Архипов И. Т.	阿尔希波夫

Астров Н. И.
Астрахан Х. М.
Ахматов И. И.

阿斯特洛夫
阿斯特拉罕
艾哈迈托夫

Б

Байков
Бакунин М. А
Балуев Б. А.
Балмашев С. В.
Барыков С. И.
Батис Э. И.
Бах А. Н.
Бенеш Э.
Берг Е. С.
Бердяев Н. А.
Бенкендорф А. К.
Беркенгейм А. М.
Билит Б. Г.
Биценко М. С.
Блюхер В. К.
Боголепов Н. П.
Богров Д. Г.
Бонч-Осмоловский А. О.
Болдыров В. Г.
Брешко-Брешковская Е. К.
Брусилов А. А.
Брушвит И. М.
Брышкин П. А.
Бубликов А. А.
Булгаков С. Н.
Булъгин А. Г.
Буревой К. С.
Бурцев В. Л.

巴依科夫
巴枯宁
巴卢耶夫
巴尔马舍夫
巴雷科夫
巴季斯
巴赫
别涅什
别尔格
别尔嘉耶夫
本肯道夫
贝尔肯海姆
比利特
比岑科
布柳赫尔
博戈列波夫
博格罗夫
邦奇—奥斯莫洛夫斯基
博尔德列夫
布列什科—布列什科夫斯卡娅
布鲁希洛夫
布鲁施威特
布雷什金
布勃利科夫
布尔加科夫
布里根
布列沃依
布尔采夫

Бурштейн И. И.	布尔施泰因
Бухарин Н. И.	布哈林
Быховский Н. Я.	贝霍夫斯基
В	
Вальк В. А.	瓦利克
Васильев П. Д.	瓦西里耶夫
Вандерлип В.	万德里普
Вандервельде Э.	王德维尔德
Веденяпин М. А.	韦杰尼亚平
Величанский Г. Е.	韦利昌斯基
Вержбицкий Г. А.	韦尔日比茨基
Вершинин С. С.	韦尔希宁
Винавер М. М.	维纳韦尔
Винниченко В. К.	温尼琴科
Виногардов В. П.	维诺格拉多夫
Витте С. Ю.	维特
Вихляев П. А.	维赫利亚耶夫
Вишняк М. В.	维什尼亚克
Войцеховский С. Н.	沃伊采霍夫斯基
Вознесенский В. А.	沃兹涅先斯基
Вологодский П. В.	沃洛戈茨基
Володарский В.	沃洛达尔斯基
Волобуев П. В.	沃洛布耶夫
Вольский В. К.	沃尔斯基
Волховский Ф. В.	沃尔霍夫斯基
Воронов Б. В. (Лебедев)	沃罗诺夫
Воронцов В. П.	沃龙佐夫
Врангель П. Н.	弗兰格尔
Высоцкий А. Д.	维索茨基
Beatrice Webb	贝雅特里奇·韦伯
Г	
Гавронский Д. О.	加夫龙斯基

Гапон Г. А.	加邦
Гайда Р.	盖达
Геденомовский А. В.	格杰奥诺夫斯基
Гейфман А.	柯依弗曼
Гендельман М. Я.	根捷里曼
Герасименко Г. А.	格拉西缅科
Герцен А. И.	赫尔岑
Гершуни Г. А.	格尔舒尼
Герштейн Л. Я.	格尔施泰因
Гессен И. В.	格森
Гинев В. Н.	基涅夫
Гиппиус З. Н.	吉皮乌斯
Голицын Н. Д.	戈利岑
Горемыкин Л. И.	戈列梅金
Городницкий Р. А.	戈罗德尼茨基
Гоц А. Р.	戈茨
Гоц М. Р.	戈茨
Грекулов А. Н.	格列库洛夫
Григорьев Е. К.	格里戈里耶夫
Грушевский М. С.	格鲁舍夫斯基
Гуковский А. И.	古科夫斯基
Гуревич В. Я.	古列维奇
Гусев К. В.	古谢夫
Гучков А. И.	古契科夫
Д	
Дальский Т. С.	达利斯基
Дан Ф. И.	唐恩
Даниельсон Н. Ф.	丹尼尔逊
Дашевский И. С.	达舍夫斯基
Дедусенко Я. Т.	杰杜先科
Деконский П. П.	杰康斯基
Делевский (Юделевский) Я. Л.	杰列夫斯基

Деникин А. И.	邓尼金
Дербер П. Я.	德贝尔
Джордж Д. Ллойд	劳合·乔治
Добвольский А. В.	多布罗沃利斯基
Добролюбов Н. А.	杜勃罗留波夫
Доманевский В. И.	多马涅夫斯基
Донской Д. Д.	顿斯科伊
Дубасов В. Ф.	杜巴索夫
Дубровский С. М.	杜布罗夫斯基
Дурново П. Н.	杜尔诺沃
Дьяков И. А.	季亚科夫
Е	
Ельяшевич А. Б.	叶里亚谢维奇
Емельянова Л. С.	叶梅里亚诺娃
Еремин А. М.	叶列明
Ерофев Н. Д.	叶罗费耶夫
Ж	
Железняков А. Г.	热列兹尼亚科夫
Житловский Х. О.	日特洛夫斯基
Жуков А. Ф.	茹科夫
З	
Зак С. С.	扎克
Закс Л. С.	扎克斯
Затонский М. П.	扎东斯基
Зарудный А. С.	扎鲁德内
Зевелев А. И.	泽维列夫
Зензинов В. М.	津季诺夫
Зильберберг Е. И.	西尔伯贝格
Зиновьев Г. И.	季诺维也夫
Злоказов Г. И.	兹洛卡佐夫
Зубатов С. В.	祖巴托夫
Зубов В. Ю.	祖波夫

И

Иванов Н. Н.
Иванов С. А.
Иванова Е. А.
Ивановская-Волощенко П. С.
Игнатьев В. Н.
Иммонен Х.
Ишугин Н. А.

伊万诺夫
伊万诺夫
伊万诺娃
伊万诺夫斯卡娅—沃洛申科
伊格纳季耶夫
伊姆莫涅恩
伊舒京

К

Калашников Н. С.
Калюжный И. И.
Каменев Л. Б.
Камков Б. Д.
Каплан Ф. Е.
Каппель В. О.
Кара – Мурза С. Г.
Каратаев И. И.
Карпович П. В.
Кауфман А. А.
Качура Ф. К.
Карелин В. А.
Керенский А. Ф.
Кильгаст Э.
Ключевский В. О.
Коварский И. Н.
Коган – Берштейн М. Л.
Кожин В. В.
Кокошкин Ф. Ф.
Колегаев А. Л.
Колесниченко Д. А.
Колесниченко И. Д.
Колосов Е. Е.

卡拉什尼科夫

加米涅夫
卡姆科夫
卡普兰
卡贝利
卡拉—穆尔扎
卡拉塔耶夫
卡尔波维奇
考夫曼
卡丘拉
卡列林
克伦斯基
基尔加斯特
克柳切夫斯基
科瓦爾斯基
科甘—别恩施泰因
科日诺夫
科科什金
科列加耶夫
科列斯尼琴科
科列斯尼琴科
科洛索夫

Колчак А. В.	高尔察克
Комин В. В.	科明
Кондратьев Н. Д.	康德拉季耶夫
Коновалов А. И.	科诺瓦洛夫
Коновалова О. В.	科诺瓦洛娃
Кононенко А. А.	科诺年科
Коноплева Л. В.	科诺博列娃
Корнилов Л. Г.	科尔尼洛夫
Короленко В. Г.	科罗连科
Корстин Н. Д.	科斯京
Костин В. В.	科尔斯京
Кочаровский К. Р.	科恰罗夫斯基
Кошелёв А. И.	科舍廖夫
Кошко И. Ф.	科什科
Красильников С. А.	克拉希利尼科夫
Краснов П. Н.	克拉斯诺夫
Краснощеков А. М.	克拉斯诺晓科夫
Крутовский В. М.	克鲁托夫斯基
Крафт П. П.	克拉夫特
Крыленко Н. В.	克雷连克
Крымов А. М.	克雷莫夫
Кудрявцев А. П.	库德里亚夫采夫
Кузнецов В. А.	库兹涅佐夫
Кузьмин Н. Н.	库兹明
Куполов	库波洛夫
Кучин Г. Д.	库钦
Л	
Лавров П. Л.	拉甫罗夫
Лазарев Е. Е.	拉扎列夫
Ларионов А. Н.	拉里奥诺夫
Леонов М. И.	列昂诺夫
Леонов С. В.	列昂诺夫

Лебедев В. И.	列别杰夫
Леонович В. В.	列昂诺维奇
Леонтье К. Н.	列昂季耶夫
Линберг М. Е.	林贝格
Либерман Л. А.	利伯曼
Либеров А. В.	利别罗夫
Либкнехт Т.	李卜克内西
Лисиенко А. П.	利西延科
Лихач М. А.	利哈奇
Лихачёв Д. С.	利哈乔夫
Лопухин А. А.	洛普欣
Луженовский Г. Н.	卢热诺夫斯基
Лукс К. Я.	卢克斯
Луначарский А. В.	卢那察尔斯基
Луцкий Е. А.	卢茨基
Львов Г. Е.	利沃夫
Львов М. Л.	利沃夫
Люстик В. И.	柳斯季克
М	
Мазурин В. В.	马祖林
Мазурин Н. В.	马祖林
Мазурин С. В.	马祖林
Макеев Н. В.	马克耶夫
Маклаков В. А.	马克拉科夫
Маклаков Н. А.	马克拉科夫
Максудов С. Н.	马克苏多夫
Мансветов Ф. С.	曼斯韦托夫
Марков Б. Д.	马尔科夫
Мартов Ю. О.	马尔托夫
Мартюшин Г. А.	马尔秋申
Масарик	马萨里克
Маслеников И. С.	马斯列尼科夫

Маслов С. Л.	马斯洛夫 .
Махин Ф. Е.	马辛
Медведев А. С.	梅德韦杰夫
Медушевский А. Н.	梅杜谢夫斯基
Мельников М. М.	梅利尼科夫
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Д. С.	梅列日科夫斯基
Мещеряков В.	梅谢里亚科夫
Миллер В. И.	米列尔
Миллер Е. К.	米列尔
Милов Л. В.	米洛夫
Милюков П. Н.	米留科夫
Милютин В. П.	米留金
Минахорян В. С.	米纳霍林
Минор О. С.	米诺尔
Мирбах Вильгельм	米尔巴赫·威廉
Миронов Б. Н.	米罗诺夫
Михайлов И. А.	米哈伊洛夫
Михайлов П. Я.	米哈伊洛夫
Михайловский Н. К.	米海洛夫斯基
Михалевич С. Ф.	米哈列维奇
Молчанов В. М.	莫恰诺夫
Морозов К. Н.	莫罗佐夫
Морозов С. В.	莫罗佐夫
Мстиславский С. Д.	姆斯季斯拉夫斯基
Мякотин В. А.	米亚科京
Н	
Набоков В. Д.	纳博科夫
Натансон М. А.	纳坦松
Нестеров И. П.	涅斯捷罗夫
Никифоров Л. П.	尼基福罗夫
Никитский А. А.	尼基茨基
Никитин А. М.	尼基京

Николаевский Б. И.
Новиков А. П.
Ногин В. П.

尼古拉耶夫斯基
诺维科夫
诺根

О

Оболенский И. М.
Овруский Л. М.
Онипко Ф. М.
Орешин И. Е.
Ососов.

奥博连斯基
奥夫卢斯基
奥尼伯科
奥列申
奥索索夫

П

Павлов
Павлов И. А.
Панкратов В. С.
Парвус А. Л.
Патушинский Г. Б.
Пепеляев А. Н.
Переверзев В. Н.
Перепелкин П. М.
Перри М. (Peggie M. P.)
Пескин И. М.
Петлюра С. В.
Петриченко С. М.
Петров П. П.
Петрушев Ф.
Пешехонов А. В.
Плеве В. К.
Плеханов Г. В.
Победоносцев К. П.
Покровский М. Н.
Попов П. П.
Порошни (Рифкин Г. А.)
Постников С. П.

巴甫洛夫
巴甫洛夫
潘克拉托夫
帕尔乌斯
巴图申斯基
佩佩利亚耶夫
佩列韦尔泽夫
佩列佩尔金
佩里
佩斯金
彼得留拉
佩特里琴科
彼得罗夫
佩特鲁舍夫
佩舍霍诺夫
普列韦
普列汉诺夫
波别多诺斯采夫
波克罗夫斯基
波波夫
波罗申 (里夫金)
波斯特尼科夫

Потапов А. И.	波塔波夫
Потапов Н. М.	波塔波夫
Прилежаев И. А.	普里列扎耶夫
Протасов Л. Г.	波罗塔索夫
Прошьян П. П.	普罗相

Р

Разгон А. И.	拉兹贡
Раков Д. В.	拉科夫
Раков Д. Ф.	拉科夫
Ракитников Н. И.	拉基特尼科夫
Ратнер Е. М.	拉特纳
Рихтер В. Н.	里希特
Роговский И. Ф.	罗戈夫斯基
Родзянко М. В.	罗将柯
Розанов В. В.	罗赞诺夫
Розенфельд К.	罗森菲尔德
Розенфельд О. И.	罗森菲尔德
Романенко	罗曼年科
Романов А. Н.	罗曼诺夫
Романов Алексей Н.	罗曼诺夫·阿列克谢
Романов М.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罗曼诺夫·亚历山大罗维奇
Романов Николай II	罗曼诺夫·尼古拉二世
Романов С. Алесандрович	罗曼诺夫·亚历山大洛维奇
Розенблюм Д. С. (Фирсов Р. Н.)	罗森布吕姆 (菲尔索夫)
Рубанович И. А.	鲁巴诺维奇
Руднев В. В.	鲁德涅夫
Русанов Н. С.	卢萨诺夫
Рэдки О. (Radkey O. H.)	莱德基

С

Савинков Б. В.	萨温科夫
Сазонов А.	萨佐诺夫
Сазонов С. Д.	萨佐诺夫

Сапожников В. В.	萨波日尼科夫
Святицкий Н. В.	斯维亚基茨基
Селюк М. Ф.	谢柳克
Семенов Г. И.	谢苗诺夫
Семёнов Г. М.	谢苗诺夫
Сидоров В.	西多罗夫
Сипягин Д. С.	西皮亚金
Скобелев М. И.	斯科别列夫
Скоропадский П. П.	斯科罗帕茨基
Склянский Э. М.	斯克良斯基
Слетов С. Н.	斯列托夫
Слоним М. Л.	斯洛尼姆
Смирнов Н. П.	斯米尔诺夫
Смолин И. С.	斯莫林
Соколов Н. Н.	索科洛夫
Сокольников Г. Я.	索科利尼科夫
Соловьев С. М.	索洛维约夫
Соловьев Ю. Б.	索洛维约夫
Сорокин П. А.	索罗金
Спиридонова М. А.	斯皮里多诺娃
Спиридович А. И.	斯皮里多诺维奇
Спирин Л. М.	斯皮林
Сталинский Е. А.	斯塔林斯基
Старцев Н. А.	斯塔尔采夫
Столыпин П. А.	斯托雷平
Струве П. Б.	司徒卢威
Сумгин М. И.	苏姆金
Сухомлин В. В.	苏霍姆林
Суханов Н. Н.	苏汉诺夫
Сыщанко А. О.	瑟强科

Т

Тарасов Б.	塔拉索夫
------------	------

Тардов В. Г.	塔尔多夫
Теодорович И. А.	泰奥多罗维奇
Терещенко М. И.	捷列先科
Тетеркин И. И.	捷杰尔金
Тимофеев А. Г.	季莫非耶夫
Тихомиров Л. А.	吉霍米罗夫
Ткачѐв П. Н.	特卡乔夫
Ткаченко Т.	特卡琴科
Трепов А. Ф.	特列波夫
Троцкий Л. Д.	托洛茨基
Трупп Е. А.	特鲁伯
Трутовский В. Е.	屠鲁多夫斯基
Туган – Барановский М. И.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
Тукин	图金
Тургенев И. С.	屠格涅夫
Тухачевский М. Н.	图哈切夫斯基
Тюкавкин В. Г.	秋卡夫金
Тютчев Н. С.	秋切夫
У	
Уваров С. С.	乌瓦洛夫
Уншлихт И. С.	温施利赫特
Урицкий М. С.	乌里茨基
Устинов Е. М.	乌斯季诺夫
Устинов А. М.	乌斯季诺夫
Утгоф В. Л.	乌特果夫
Ф	
Фейт А. Ю.	法伊特
Фельштинский Ю. Г.	费尔施金斯基
Фёдорович Ф. Ф.	费奥多罗维奇
Фигнер В. Н.	菲克涅耳
Фомин Н. В.	福明
Фролов Г. Н.	弗罗洛夫

Фундаминский И. И. (Бунаков И.)

丰达明斯基 (布纳科夫)

X

Ханжин М. В.

汉任

Харламов В. А.

哈尔拉莫夫

Хильдермайер М. (Hildermeier М.)

希德迈尔

Ховрин А. А.

霍夫林

Хорос В. Г.

霍罗斯

Хомяков А. С.

霍米亚科夫

Хренков С. Г.

赫连科夫

Ц

Церетели И. Г.

策里铁里

Цегкин К.

蔡特金

Ч

Чадаев П. Я.

恰达耶夫

Чайкин В. А.

柴金

Чайковский Н. В.

柴科夫斯基

Чаянов А. В.

恰亚诺夫

Червенский П. П.

切尔文斯基

Червен - Водали А. А.

切尔文-沃达理

Черненко Б. А.

切尔年科夫

Чернов В. М.

切尔诺夫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Н. Г.

车尔尼雪夫斯基

Чичерин Б. Н.

奇切林

Чухнин Г. П.

丘赫宁

Чхеидзе Н. С.

齐赫泽

Ш

Шатилов М. Б.

沙季洛夫

Швейцер М. И.

施维策尔

Швецов С. П.

什韦佐夫

Ширямов А. А.

希里亚莫夫

Шишко Л. Э.

希什科

Шмелев Н. А.

什梅列夫

Шрейбер К. С.		施赖贝尔
Шрейдер А. А.		施赖德尔
Шрейдер Г. И.		施赖德尔
Штернберг Л. Я.		施泰因贝格
Шубин П. А.		舒宾
Шульце – Геверниц		舒尔采—格弗尼茨
Шульгин В. В.		舒利金
	Щ	
Щегловитов И. Г.		谢格洛维托夫
Щеголев П. Е.		谢格列夫
	Э	
Эмиль Вандервельде		王德维尔德
Эфрон А. Я.		埃夫龙
	Ю	
Юделевский Я. Л.		尤杰列夫斯基
Юденич Н. Н.		尤登尼奇
Юдин И. С.		尤金
Юзов И.		尤佐夫
Юрьев А. М.		尤里耶夫
	Я	
Якимова А. В.		亚基莫娃
Яковлев А.		雅科夫列夫
Яковлев П. Д.		雅科夫列夫
Яковенко		雅科文科
Якушев И. А.		亚库舍夫
Янсен М. (Marc Jansen)		马克·詹森
Янсон Я. Д.		杨松
Ярцев Б. К.		亚尔采夫

后 记

从2001年选作本题至今，已经10年过去了。经过老师、朋友和个人的不懈努力，这本带着泪水与汗水的书稿终于有了结尾。通读全书，我已经没有了收获的喜悦，留下的只是内心的平静和进一步完善的渴望。

拙作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重新写就，中间经过了我所在单位和教育部立项，获得了多方面的资助和支持。本人由于愚钝，始终纠缠于社会革命党为民受难但又遭遇政府和社会的误解的命运而不能自拔，希望为他们鸣不平。然而，研究的结果发现，我的“努力”失败了。社会革命党像一个怀揣赤子之心的侠客，为苦难的俄国人民抛头颅洒热血，流尽最后一滴血，虽有满腔赤诚，终不能大展宏图，让人唏嘘。

一个朋友问我为什么选作这样的题目，我笑答是命运使然。对于社会革命党的研究也使我长大、成熟，对社会和人性有了自己的认识。本书是对我半辈子人生的总结，从这个意义上讲，它让我花费的心血有所补偿，对于老师、亲朋的期许也有所交代。

感谢帮助我成长的老师和朋友，在这份名单中最应该记住的是我的硕士导师侯尚智先生、博士生导师刘祖熙先生。侯先生让我了解了苏联经历过的风雨，初识了英勇背后的酸甜苦辣；刘先生让我领略了俄国的全貌，懂得了酸甜苦辣的意义。侯先生的犀利，刘先生的厚重在我的成长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不断激励我奋勇前行。他们是我的人生导师。

拙作的完成还得到了孙成木、金雁、沈仁安、宋成有、戴桂菊、马龙闪和姚海等先生的帮助，对他们的鼓励和鞭策深表谢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宋成有先生，他对我的博士论文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正是他的一席话引导了我毕业后对民粹派思想渊源的研究，厘清了社会革命党悲剧的根源，也使我的认识上了一个大的台阶。

在资料收集和课题研究的过程中，感谢我的师兄罗爱林教授、张宗华副教授、朱剑利助理研究员的帮助。在生活上得益于我的妻子李丹霞女士的默默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本书的出版得益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编辑宋培军先生、赵薇博士的辛劳。他们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太多的努力，特表感谢。

最后，向为本书的面世做出努力的所有老师朋友道一声感谢，正是你们的支持才成就了这本小书。

解国良

2011年10月8日于苏州天翔花园